社会性别研究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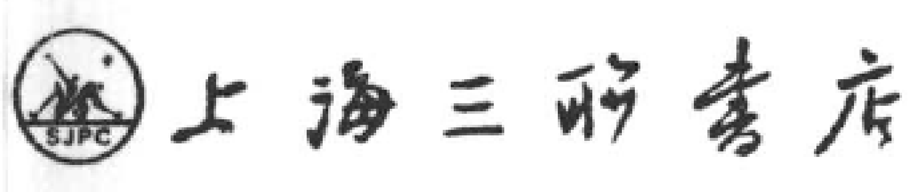
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 编

丛书主编 陈雁 王政

男性研究

Masculinity Studies

主编 王政 张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性研究 / 张颖，王政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5
（社会性别研究译丛）
ISBN 978-7-5426-3750-5

Ⅰ.①男… Ⅱ.①张…②王… Ⅲ.①男性—研究—文集
Ⅳ.①C913.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1827 号

男性研究

主　　编 / 张　颖　王　政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徐蕾娜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28.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750-5/C·416
定　　价 / 48.00 元

前　　言

当"社会性别学"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显学，许多基本概念已经广泛地流通在各个学科领域之时，"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学术界仍处边缘。渴望了解这一领域在国际学术界发展状况的青年学子，往往苦于无从寻觅相关理论书籍。由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 年·北京）的推动，"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核心学术概念在中国各类妇女组织和活动中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许多具有学术背景的妇女活动分子有效地运用跨国女权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各种理论方法，从各个方面进行改变中国社会性别等级制的工作，包括在高等院校开拓和发展妇女与社会性别课程。但是，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和妇女活动界对"社会性别"的理解基本上是把它作为仅与"妇女"相关的概念。

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于 1986 年发表在主流学刊《美国史学评论》上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收入本集）一文，[1]是女权主义学者拓展社会性别理论概念的一篇经典之作。在梳理学术理论状况时，她对"社会性别"一词当时在美国学界的情况做了如下分析：

---

[1] 我们获得《美国史学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允许，重新翻译这篇网上下载率一直名列前茅的学术论文。《美国史学评论》于 2008 年 12 月开辟专栏，讨论 20 多年来斯科特论文对国际学界的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该论文的第一个中译版发表于译文集《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等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

> “社会性别”一词最新、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作为“妇女”的同义词。在过去几年里，很多研究妇女史的书籍和文章都在题目中将“妇女”换成了“社会性别”。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替换虽然模糊地涉及了某种分析概念，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个领域的政治里更容易被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社会性别”是为了表示一部著述的学术严肃性，因为“社会性别”听上去比“妇女”更为中立、客观。“社会性别”似乎同社会科学的科学术语很相称，于是它把自身从（听上去刺耳的）女权主义政治中分离出来。在这种用法里，“社会性别”既不携带着关于不平等或权力的必要声明，也不去识别受到不公正对待（及迄今为止被历史遮蔽）的一方。鉴于“妇女史”这个术语强调（和惯常的实践不同）妇女也是被认可的历史主体，以此宣告了自己的政治性，而“社会性别”包括妇女，却不特指妇女，因此显得没有造成什么关键的威胁。“社会性别”的这种用法可以说是在80年代女权主义学术，追求学术合法性的一个侧面。

斯科特对美国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的分析，用于当代中国学术界也颇为贴切，不同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已经有大批学者投入生产种类繁多的关于“社会性别”的著述，而在21世纪的中国关于社会性别（包括仅把社会性别作为“妇女”的替换词）的学术研究，依然为数不多。需要强调的是，在过去20多年里，在国际学术界，社会性别理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并且早已不是美国学者的专利品。世界各地都有学者从本国、本土文化的实践出发，积极参与了对该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种来自不同文化和学科背景的探索反过来也深刻地改变了国际人文社科领域的内涵。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社会性别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各个学科相互吸收、相互交融，并且往往是改造更新传统学科的关键驱动力。

为了拓宽中国学术界对“社会性别”的理解，我们选择了社会性别学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研究的一些学术成果，推荐给读者。相比于社会性别学的其他内容，“男性研究”在国内学界的知晓度和关注度更低，在此我们需要对这个学术领域出现的背景简单介绍。只有了解了一个学科或理论概念产生发展的特定背景，才可能比较深入地理解各篇译文的探讨目的和争辩要点，也才可能更进一步地考虑在本土文化的背景中运用和发展这些理论概念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同时，译介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还涉及棘手的翻译转达概念的问题，我们也将花费一些笔墨来探讨在不同语境和不同历史时期语言的使用和翻译。这个讨论是为了提醒读者关注词语对社会性别概念发展的重要性，以便理解各篇文章的作者所努力揭示词语受具体时空限制的含义。这个讨论也是希望帮助读者对自己所习以为常的词语产生自省和反思，包括最日常的词语：“男性”、“女性”、“男子气”和“女性味”等。保持对文化现象被自然化的警觉和抵制是有效阅读本译文集的前提。

本译文集所推荐的著述运用的理论方法可能是国内学术界所不熟悉的，但是，作者所探讨的问题却并非与中国学界无关。19 世纪中叶，西方学术被作为现代性的内容引进中国。时至今日，许多产生于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西方理论概念，依然被很多人作为科学真理对待。社会性别学术对这些理论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审视与分析，近年来兴起的男性研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男性研究”对西方传统学术和文化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知识生产的时空具体性和权力关系，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分析工具，以展开对人文社科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传统学术理念的质疑和解构。要能从批判知识生产历史过程的角度去阅读本译文集，就需要我们细心体察作者们质询的态度背后的政治含义，并思考这些批评与我们自己所具有的知识构成的相关性。

一、男性研究与女权主义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在美国等地区蓬勃发展的女权主义运动、对妇

女和社会性别进行的研究和理论化，与后来我们称之为“男性研究”的学术领域的兴起，是一个辩证的历史发展关系。在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中，很多男人意识到，性别歧视既伤害妇女也伤害男人。他们开始积极地参与到女权主义实践和研究当中来。当时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研究者有两种立场。有些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性别压迫者，因此不认为男性参与的活动对女权主义有什么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是，更多的女权主义者却指出，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各种不平等（包括种族、性存在和阶级等）是一个交叉的、互相关联的体系，所以必须要联合有批判意识的男性，并且把社会性别议题和其他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很多女权主义研究很早就超越了僵化的“妇女”范畴，转而探讨“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女权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第一次进步的男性运动，力图通过批判父权制和男性至上，来推动个人和体制两个层面的社会性别权力变化。这是“男性研究”作为一个批判性研究领域产生的背景。

与进步男性运动平行展开的是对女权主义的敌视。这种敌视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男权反弹，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反弹的一个典型表述就是指责女权运动是造成美国社会和文化各种“危机”和问题的根源。这种反弹还表现在旨在恢复昔日社会性别秩序和重振大男子雄风的言论和活动的频繁出现。如美国流行心理学家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所著《铁汉约翰》（*Iron John*）一书，提倡所谓与“女性特征”截然不同的“男性特征”。该书成为1990年的畅销书，并非偶然。这类活动和这一社会思潮也被称为“男性运动”（Men's Movement），在大众媒体中广为传播。美国男人中这两种立场迥然不同的潮流在发展中有了各自的标识性名称：“男性运动”是一个争议色彩强烈的词汇，它指涉的是具有反女权立场的男人活动，也可被用作男权主义反扑的社会风潮的代名词，大部分倾向女权主义的男性学者和活动家，不把自己与“男性运动”或同类的所谓“男性解放”挂钩。“男性研究”领域则

继承了早年的进步男性运动的目标，与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以及种族研究等批判性研究领域一起迅速发展，并在诸多理论层面对女权主义和社会性别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男性研究”，指的是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框架中发展的一个跨学科领域，它始于把男人作为“具有社会性别的人”的研究，发展出主题多样、内容开放的学科领域。比如对男性特质(masculinity)的建构的考察，已进入社会、历史各个方面，包括研究男性特质如何在保障权力的各种机制中，发挥它在语言表达、意识形态层面的效力(见本书马里娜力尼・辛哈(Mrinalini Sinha)一文)。男性研究的突出贡献是，它帮助我们深入探讨社会性别—性的机制是如何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角落运行，特别是当我们观察的对象是男性的集体和个人的时候，比如历史上只对男人开放的政治领域、军队、男性文化团体、男性社会交往圈、经济和金融活动等等。在这种“男性同性社交”(homosocial)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女人”的直接参与，是不是社会性别就毫不相关了？还有，女人和女性特质(femininity)与男性至上的社会文化制度之间是如何互相依存和建构的？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把“男人”作为社会性别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来看待。男人的社会性别，是没有被标识出来的(如在国家颁布的政府权力机构人员名单中，仅对妇女作性别标识)，正如在美国，白人的“种族身份”不用像黑人那样被标识出来一样，这背后蕴涵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是需要深入探究的。不研究男人，并不是简单地“遗漏”了一些人群的问题，而是不能更彻底地解构社会性别权力体系的所有层面。

过去20多年里，国际学界对“男人”(men)、“男性特质”(masculinity)的具体研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活跃地展开，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有特点、有见地的学术著作。男性研究的学术期刊也在近十年当中出现了。这个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本书将对“男性研究”领域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概念、分析视角和框架、方

法等等进行一个概览，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较全面深刻地理解：社会性别和性存在在历史上、在现实中，如何深植于各种权力的框架之中，并且它们作为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的基本方式与其他如种族、阶级、年龄等差异范畴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方式有何异同、有何关联。男性研究的这些中心问题，和已经相当成熟并学科化了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所探究的议题相同。那么，“男性研究”和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二、男性研究与妇女/社会性别学的关系：权力（power）和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问题

我们今天笼统地称为男性研究的这个领域，与妇女/社会性别学的关系颇为复杂。女权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开拓性探索为男性研究学术发展提供了基础。斯科特的文章是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理论化努力的一个典型。她梳理了不同学科背景中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等级结构和主体性建构的分析，指出了那些主要学说的长短，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已对社会性别的理论定义。她的宗旨非常明确：把社会性别研究拓宽到对妇女及妇女传统领域的研究之外，来重新审视那些看似与妇女毫不相干的领域，如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认识，将社会性别建构过程（包括二元对立、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形成）作为历史学的主题，将其置于多种历史过程的复杂交错关系中来具体研究。不仅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组织权力的基本方式在运作，还要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基本的指涉权力的象征性表达方式产生效应。本译文集选入的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响应了斯科特的呼吁。这些作者对男性特质的研究都基于这样的认识：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一个不断录写和重写社会性别含义的过程。有意义的研究不能停留在讨论似乎定型不变的男人群体对女人群体的权力关系，而是要深刻地挖掘什么具体历史过程使得男人成为男人，使

得某些男人比其他男人更具有“男子气”，这样的社会性别制度到底在维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反过来又怎样在支撑某种社会性别制度？正如马里娜力尼·辛哈精辟地归纳的：“‘男性特质’只有在具体实践中获得含义，它没有必然的情境或起源。”[1]

那些力图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视角来分析“男人”以及对“男人”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与探讨，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使女权主义者避免把男人看作无差别的整体。一些女权主义者也很早就在关于种族和阶级的讨论中意识到：压迫者、被压迫者的二元区分太狭窄；男人与女人一样都生存于权力等级架构中，不同的男性群体也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各种权力关系。但同时，女权主义者对男性研究也有不少担忧和警惕，因为重新把男人放到研究的中心地位本身有可能不过是换了一个进步旗号，却继续采用男性中心的视角和框架。这样的担心并非杯弓蛇影。有不少男性研究的确非常强调男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忽视了男人对妇女的权力关系。

本译文集收入的论文中，很多理论思考都与这个问题相关：什么样的关于“男人”的研究是女权主义的、是真正具有批判性的、是避免了复制男权视角的、并且能更加复杂地看待“社会性别”作为基本分析范畴的？例如，托比·第兹(Toby Ditz)在回顾美国史研究中的“新”男性历史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在这些男性历史研究中权力关系的“缺失”：目前使用的分析范畴、分析框架以及被研究的题目(比如，某些特定人群)如何将妇女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问题边缘化？社会性别(特别是男人)身份构建、变化过程与大的历史过程——比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等——之间的关联得不到学者足够的重视，这反映了哪些大的历史认识的缺陷和政治上的盲点？“(男人的)社会性别危机”这样的主题和假设折射出研究者什么样的认识误区？此外，杰夫·荷恩(Jeff Hearn)对“霸权男性特质”这一分

[1] 请参阅本文集所收辛哈的文章。

析范畴的质疑、康瑞文(R. W. Connell)[1]与詹姆士·梅瑟施密特(James W. Messerschmidt)对这个概念的修正和辩护,其实都围绕着"社会性别权力关系"这个中心问题展开。

除了这些理论性的讨论,在有女权主义立场的具体研究中,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包括它与其他权力关系的互动、交叉)也是基本的、重要的关注点。本译文集收入了一个很好的文学批评研究个案,即依芙·萨芝维克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分析。她对一个虚构的空间中的能指、修辞所表达的情感和权力结构进行了剖析,给各个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社会性别权力建构的模式。而大卫·霍尔朴林(David Halperin)和依坂真纪(Maki Morinaga)[2]对前现代语境中的性存在(sexuality)的考察,也是紧密地与社会性别、阶级结构联系的。他们在男性同性社交(homosocial)和同性情欲(homoerotic)的具体关系当中,分析权力等级(和阶级、年龄等级)。而印度殖民史学家马里娜力尼·辛哈则将对男性特质的考察置于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者与印度本土各族裔精英之间的互动中,揭示殖民遭遇本身如何既产生了英国精英殖民者的极度男性特质的语言表达,又产生了该语言表达的推论,即本土精英之间的"男人气"和"女人气"的区分,并提出了"殖民男性特质"的概念。她指出,"男性特质本身的含义源自具体的权力关系,男性特质的含义又被运用来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再生产这些权力关系"。

女权主义学者致力于发展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强调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与种族、国家、阶级等等范畴是纠缠在一起的。运用这个理论,很多男性研究不把男性特质局限在仅仅是同女性特质的对照中来审视。本书中盖儿·比德曼(Gail Bederman)和辛哈的文章就是如何在男

[1] R. W. Connell(原中文译名康奈尔)现用名 Raewyn Connell,中文名康瑞文,现为女性。在本译文集收入的这些原作发表时,作者是男性。本译文集其他文章中提及康瑞文的原名,或用阳性人称代词"他",以及参考书目中出现 R. W. Connell 的名字,我们一律遵照原文。

[2] 作者的名字现为 Maki Isaka,我们用的中文/日文翻译是她的现名。

性研究中运用交叉性的视角和方法的范例。比德曼对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美国社会中社会性别与种族身份的交融建构过程的精辟分析，与对当时的“文明”话语的批判性剖析结合起来，而这种很有力度的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显然不会仅仅限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

男性研究领域不仅承袭，而且突出了社会性别研究对性存在的关注，因为性存在与社会性别权力密切相关。本书中收人的大部分文章都涉及了性存在的问题。比德曼和辛哈在某个具体历史研究中分析了性存在和社会性别、种族的关联。萨芝维克、霍尔朴林和依坂真纪的研究精彩地展示了，在历史上性存在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最微妙的历史变化，常常被现代性话语笼罩之下的研究所忽视或误解。比如，霍尔朴林的古典研究成果显示，西方前现代体制中的同性情欲和性行为的分类，基本上与社会性别观念相关，而“性存在”的概念则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对于行为与社会地位的管理是由社会性别制度独立完成的；然而，“同性恋”(homosexuality)作为现代概念和范畴出现，则成为一个新的分类原则，把同性的性对象选择作为决定着性差异与社会差异的首要原则。作者指出：“同性恋”是一个新的性存在制度的一部分，“它为每一个人指派一种性倾向和性身份”。这样，它将新的元素引入社会组织、人类差异的社会表达和欲望的社会生产中，最终，将此新元素引入“自我”的社会建构中。霍尔朴林的探讨以及依坂真纪对日本江户时代歌舞伎的研究里另一重要阐述是：对同性情欲的接纳，并不意味着权力上的平等，它很可能是构成某种阶级和社会性别权力等级的重要因素。

最后，男性研究对女权主义学术的继承还表现在该领域对学术与政治变革关系的关注。本译文集收录的荷恩的文章最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立场。他指出，男性批判研究“需要对知识的社会基础——包括国家的、地区的和文化的情境对知识的影响——有强烈的自觉”、有强烈的自我反思。他把男性批判研究自身放在与霸权相关的位置上看待，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诸如“如何深刻地研究男人，才能抵制霸权以及抵制霸权性的

定义和势力？男性批判研究如何挑战或难以挑战霸权？男性批判研究当中的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同情在哪里？在男性批判研究中参考了和运用了哪些女权主义？什么样的女权主义未被参考和运用？这些研究是否产生改造的作用？理论、实践和政治的关系是什么？这些研究占据着什么样的思想、道德和哲学空间？"（回顾历史，类似的问题也曾经无数次地、并仍然被各族裔的女权主义学者针对妇女和社会性别学提出。）这些既是实际的政治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康瑞文和梅瑟施密特甚至试探性地提出一个乐观的想法——即，也许有可能在男人之间建立一种"倾向男女平等的男性特质形态"，使它成为一种积极意义的"霸权"。这一提议，也又一次地引起学者们针对某些理论分析范畴的争论。这些思考和讨论清晰地告诉我们，男性研究领域作为女权主义学术的一部分，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活力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知识场域。

下面，我们结合介绍本译集中的文章，概要梳理一下有关这个领域中关键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三、术语的问题：使用、解释与翻译

作为研究者，用什么语言写作和讨论，其学术和政治意义远远超过"语言"层面。术语的问题（这里主要指的是分析范畴和理论概念）在当前全球化了的社会性别学领域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术语在起源地的历史，反映着那个地方社会性别政治斗争的历史；术语的翻译和传播，是知识、认识论，以及它们后面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的翻译和传播过程；术语的翻译和传播，对与社会性别有复杂关联的话语场域会产生影响；恰恰是术语在翻译和传播中的困难和挣扎，反映其含义的时空具体性及其效应的不确定性。由于今天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包括性存在研究和男性研究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规模的、有相当体制支持的发展是从现代西方开始的，我们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和介绍，不可避免地

要使用外来的术语，而针对陌生术语的讨论，常常是新的理论认识发起的源头。

在男性研究这样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的领域，学者们一直围绕着分析术语的问题展开着激烈的、意义深远的争论。作为这类学术辩论的一个例子，本文集收入一组关于“霸权男性特质”(hegemonic masculinity)讨论的文章。这一组文章，以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康瑞文的著作《男性特质》(*Masculinities*)开始。在这里，康瑞文第一次完整、清晰地阐述了“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此后，学者们围绕这个概念有很多理论和具体研究方面的探讨；针对这些探讨，康瑞文在2005年与学者梅瑟施密特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来回答批评并对这一概念提出修正。另外，荷恩在他的文章中，提醒我们思考“霸权男性特质”与“男人的霸权”(the hegemony of men)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托比·第兹在美国男性史学研究回顾的文章中，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和政治的角度，讨论了包括这个概念在内的男性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中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误区和危险。

介绍这一组讨论，我们主要有两个目的：(1)“男性特质”这个概念/分析范畴在目前英语世界的男性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产生了一大批关于社会性别与种族/族裔、阶级和性存在的交叉研究，使得对社会性别和性存在的研究能够围绕着男人当中的“权力”这一关键问题进行。对这个概念的关注是怎么来的？有哪些理论和具体研究的基础与背景？这种理论概念的讨论使得什么样的研究和实践成为可能？这一组文章清楚地回答了这些基本问题。我们相信这些文章能帮助读者对这个新兴领域的知识生产历史有个初步的了解，并思考哪些理论方法可以有效地运用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2)这个概念和分析范畴的出现和使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英语世界男性研究作为一个领域，与各种社会性别话语和社会性别权力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学者们围绕它的争论，也反映着社会性别研究和多种社会批评、运动当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这些争论于是成为我们了解“术语”的重要意义的绝好例子。

本译文集收入了美国现代史学家盖儿·比德曼关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种族关系的历史著作《男人气质与"文明"》(*Manliness & Civilization*)中的一章,[1]作为一个实例来说明词语变化背后的深刻历史含义。比德曼详细回顾了在美国历史上几个与"男人"有关的概念/词语的含义变化。(这里我们保留她所分析的这几个概念的英文原文,以便读者理解她的阐述。)她追溯了在世纪之交的美国,manliness(男人气质)和masculinity(男性特质)两个词汇的含义和关系,指出了这两个词汇所表达的不同的社会性别、阶级和种族关系。人们通常把"manly"和"masculine"两个词语当成同义词换着使用,其实这两个词在19世纪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她发现,"manliness"在当时主流话语中被定义为:"作为一个男人应具有的高尚品格和行为"。它包含着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崇尚的男性所具备的一切高尚的和有道德的特征。很多历史学家都提出当时的manliness指代"维多利亚式关于男人身份(manhood)的理想"——比如,性自律、意志坚强、高尚的品格。所以,19世纪晚期,由于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对理想男人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manliness"所表达的社会性别理想也就动摇了。比德曼的研究显示,世纪之交的科学(包括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话语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基督教话语互相建构,其中产生的对"种族差别"的定义直接影响了对"masculine/masculinity"(男性化的/男性特质)的定义。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应对来自于工人阶级男性、黑人男性和移民男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挑战,需要一个比"manliness"(男人气质)内容更广,而且被社会科学和医学本质化了的新词汇来表达他们在性别和种族(以及阶级)方面的优越。此后,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希望动用一种不同形式的男性权力来定义白种优越、遮蔽阶级矛盾的时候,他们就日益频繁地使用像"masculine"(男性化的)和"masculinity"(男性特质)这样的词语。

---

[1] 该书英文全名:*Manliness &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作者通过这样的话语分析、对语言的历史研究来展开政治、文化、社会和宗教各个层面的思考，读者则得以通过“masculinity”(男性特质)、“manliness”(男人气质)和“manhood”(男人身份)这三个词来更深刻地了解美国历史的重要一节。这篇文章也促使我们思考：我们今天对这些英文词汇的翻译，如何能更贴切地体现英语世界女权主义史学家对它们所做的历史探讨？很多外文词汇进入我们的学术语言的时候，需要我们创造词汇来翻译。虽然“没有透明的、对等的翻译”已经是一个共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较合适的语汇来完成这个任务。华裔学者史书美在一篇讨论“女权主义”的含义与中西女权主义学者对话的文章中指出：“造成差异之不可调和的，不是本质的或者绝对的差异，而是无知。”[1]作为译介者，我们希望尽量用贴切的汉语来翻译英语概念，不仅转达这些外来语汇在今天的用法，也说明它们的含义在其本土历史上的变化。读者对外来词来龙去脉的把握，是消除概念上认识差异的前提。同时，我们希望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我们所选用的汉语对应词也都有自己的具体历史。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详述。在此我们想强调的是：鉴于男性研究领域在中国还很年轻，它的很多术语的翻译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希望读者、译者都能对概念性词汇翻译的复杂性有高度的认识，以减少对这个翻译过来的领域的误读和滥用。同时，我们应该集思广益，在阅读中共同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在翻译中加深对泊来学术的理解，并提出我们自己的批评。

目前，国内的论文和学术出版物基本上把“masculinity”翻译为“男性气质”，把“manliness”翻译成“男子气概”或“大丈夫气”。而“manhood”没有什么常用的普遍译法。显然，这是在中国历史相关研究缺位的情况下，中译者基本无视原文的社会性别研究的来龙去脉，直接选择现代汉语的

[1] “Incommensurability is thus the consequence not of difference made essential or absolute, but of ignorance.”原文：“Towards an Ethics of Transnational Encounter, or ‘When’ Does a ‘Chinese’ Woman Become a ‘Feminist’?” in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13.2(2002),97。

词汇，简单对应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这些英文词汇。举例而言，目前在国内出版的、最有影响的男性研究著作，当属康瑞文的《Masculinities》，中文译为《男性气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但如果我们如果了解到欧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成果——比如上文提到的盖儿·比德曼的文章——就会意识到，上述三个词语的汉语翻译需要在相互对照中进行，要能有区别地表达它们在英语历史语境中的关联和差异，只有如此，我们的翻译才不至于抹去这些词语所反映的欧美社会性别政治的历史演变。

康瑞文是社会学家。在这本著作中，她努力把"masculinity"作为一个有它自己的历史的词汇加以关注。她认为"masculinity"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和相关的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情境下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质疑这个概念的普遍性。康瑞文还提醒我们必须思考："masculinity本身作为一个文化性很强的概念，是否在欧洲—北美文化之外有任何意义？"她指出，由于"masculinity"这一概念"有其内在的关系性"，并且只能与"femininity"对应存在，如果一个文化并不把女人和男人当成两极对立性质特征的携带者，那么(至少在原则上)这个文化就没有像现代欧洲—北美文化中的那种"masculinity"的概念。[1] 康瑞文对词汇具有时空具体性的认识，其实这是女权主义社会性别史学家的研究早已关注的问题。对"masculinity/femininity"(男性特质/女性特质)这样的分析范畴的使用，目的正在于深入探究对塑造了当今主导性的社会性别观念的现代科学、文化、政治、社会关系的产生、发展和运作的历史过程，从而揭示而不是复制霸权的学术和政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批判地看待和使用社会性别研究的范畴，是"重写历史"的一个突破点和契机。今日的许多历史研究，在横向的层面上，把社会性别看作权力体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在纵向的层面上，通过社会性别话语和实践更深入地思考东—西、古—今的关系，以及(特别是)历史研究者本人作为一个历史的产物和历史的创

---

[1] R.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68.

造者、在什么话语场域里制造什么样的知识和权力关系。

从康瑞文对"男性特质"这一概念的使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概念运用的复杂性的另一层面。虽然康瑞文提出了对这个词语/范畴的历史性的认识，但她在全书的分析中，仍然把"男性特质"这个概念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康瑞文强调，18世纪，在欧美逐渐出现了一个"使得现代意义上的男性特质产生和稳固下来的社会性别秩序"。[1] 但在描述早期北美时，康瑞文不仅使用了男性特质一词，而且标识出如"gentry masculinity"(绅士男性特质)之类的类型为"hegemonic masculinity"(霸权男性特质)。这时，她并未追问在"masculinity"这个词汇出现之前的时代与地区，当时的人们在使用的是什么词语/概念呢？显然，康瑞文的历史回顾没有像比德曼那样能够密切关注词语的历史演变，她的阐述只使用了一个分析范畴：masculinity。

这个例子反映了当代研究者的两难：一方面，我们意识到语言就是社会性别历史的一部分，是流动变化的；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今天的理论背景中发展出有效的分析范畴和概念来，并用今天的分析概念去分析历史；而今天的分析概念又往往必须用有具体历史的语汇来表达。男性研究领域中的关键词"男性特质"就是这个棘手问题的具体体现。如何在有效使用今日的分析范畴的同时保持对词语历史演变的敏感性呢？本译文集中不少作者做了示范性的探索。比如，霍尔朴林虽然是个古典学者，讨论的也是前现代史的问题，但是他使用了男性特质这个范畴；依坂真纪分析的是前现代的日本情境，也用了这个范畴。他们的文章讨论了具体历史和文化情境下的社会性别形构、社会性别身份认同，以及社会性别与性存在、年龄和阶级这些范畴之间关系。虽然在分析框架上他们使用了"男性特质"和"同性恋"这样于彼时彼处不存在的范畴，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古代的某些具体称谓、身份及其反映的权力制度体系的敏锐洞察和分析

[1] R.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189.

深度。如霍尔朴林指出，"homosexuality"(同性恋)这个词是现代的创造(它出现在19世纪末)，它在古代的前身至少有四个概念/范畴，它们和"同性恋"的意义涵盖内容是不同的，而那丰富的历史差异被现代科学和现代性话语抹去，以至于现代西方人往往只能透过"同性恋"这个概念去理解历史上男人之间的各种亲密关系。于是，"同性恋"吸收和连接了它出现之前的多种性话语传统，却在现代各种话语之中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超历史的、统一的存在。同样，"男性特质"作为一个现代词汇也有类似的"魔法"，上面提及的比德曼的研究已经展现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当这些词汇成为男性研究领域所使用的关键分析范畴时，它们又开始了在学术界的独特历史旅程。这个历史也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这几个外来词语在中国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此对这几个词的翻译历史做一个初步调查。1916年，中国海关总署在上海出版了一部英汉词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中文名《官话》)。[1] 以下是与本译文集相关的一些词语在当时的翻译。(在这部词典中，femininity 和 masculinity 尚未被收入，这也可作为对比德曼研究发现的一个验证。)

Feminine：妇女样式的，婆婆妈妈的，妇女的，属于女流的，类乎妇女的，像女的，阴属

Manly：有男子气的，有好汉的样子，像丈夫，有男子性质

Masculine：阳，男子的，公，牡，雄，阳类的，阳属的，(语法)公性类(新)

Manhood：成人的身份，人格

---

〔1〕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官话)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 by K. Hemeling, Ph. D., Commissioner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Based on the Dictionary of the late G. C. Stent, published 1905 by the Maritime Custom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Womanhood:女人的身份,妇道,女格(新)

编者在前言中指出,英文词汇的含义的中文翻译表达试图体现中国的情境。[1] 但显然,词语翻译带进了英语世界当时主流的社会性别观念和语言。比如“manhood”和“womanhood”的翻译。“成人身份”和“人格”仅用于男人;而女人则不能与没有性别标识的“人”相连,这是西方男权文化表达权力的一个重要象征符号。在“feminine”和“masculine”这对对应词的翻译中,有趣的是对前者的定义用了“婆婆妈妈儿的”这样的贬义词,而对后者却未附加价值评判词语,显然这个英文词的词义从“manly”的转换尚未完成。“Womanhood”的翻译既沿用了汉语中的“妇道”又创造了“女人的身份”这个新词语,相当贴切地反映了当时处于中西碰撞初期的中国,多种社会性别话语并存的状况。“女格”是一个新出现的词语,不知何故未能流传下来。[2]

在这部出版于1916年的英汉词典中“sex”一词的翻译颇耐人寻味:Sex,类,造,性,属。在这四个总的定义性翻译之后,又说明该词若用于按生物学分类的鸟、花、昆虫、哺乳动物则需分别用一系列中文对应词:公母、牡牝、雄雌、阳阴。用于人类则为男女、乾坤、男女特性。今日中国人早就习以为常的翻译“性别”一词在彼时尚未出现,而这也是西方生物学科引入中国的初期。可见,当时国人对西方生物学中以性器官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的生物决定论“sex”概念尚无确切的把握,所以仍沿用了“男女”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标识社会性别等级的词作为其对应词。即使有了“男女特性”这样的翻译,对“特性”二字的理解恐怕更接近对“类,造,性,属”的认识而非与性器官的联系。此刻,对“sex”含义的不确定和“性”这个汉字含义的不稳定还表现该词典对“female sex”和“male sex”的不同翻译

[1] “Preface”(前言),页 ii。

[2] 该词典前言中说明:“现代词汇用(新)标出,但也大部分是从旧中文和日文中而来。它们中很多在口语中已经广泛使用。”见《官话·前言》,页 i。

上。当这两个词出现在“sex”词条下时，分别被译为“女性”、“女造”和“男性”、“男类”、“男造”。而这两个英文词分别出现在“female”和“male”词条下时，“female sex”和“male sex”则被译为“女流”、“女造”和“男流”、“男类”、“男造”。显然，对词典的编撰者而言，“性”与“男女”的连缀仍嫌生疏。

让我们对照一下 1930 年出版的《英汉模范词典》(*Mode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1] 这本词典收入了 femininity 和 masculinity，其他几个词的中文翻译也发生了变化。

> Feminine：女性的，妇女的；阴属的
> Femininity：女性；脂粉气
> Manhood：人格，人性；成人；刚勇，刚毅；男子，男丁
> Manly：如男子的，有丈夫气的；刚毅的，勇敢的
> Masculine：男性的；如男子的，有丈夫气的，粗鲁的；刚毅的
> Masculinity：男性；刚毅
> Womanhood：妇女身份，妇道；女流，女界
> Womanly：宜于妇女的；如妇女的，有脂粉气的，柔弱的
> Sex：性；男女之别
> the fair (gentle, softer, weaker) sex[美丽(温顺、较柔和、较软弱)的性]，女性，妇女，—the sterner sex [更坚强的性][2]，男性，男子。

比较两部词典，时隔十几年，中国有关性别的语汇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没有的“男性”“女性”“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些词语，通过对西方

[1] 张世鎏、平海澜、厉志云、陆学焕编辑。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30。

[2] 此处为词典的英文用法举例，方括号中的翻译为译者所加，编者。

现代科学的翻译，在20世纪上半叶迅速成为中国基本的现代性别词汇。西方的生物学、心理学、性学和社会学中对男女二元对立、基于生物性的本质主义的认识，也依托着这对词语进入了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的生活、自我认识以及主体性的建构。就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社会性别与历史》(*Gender & History*)发表了学者乐怀璧(Leon Antonio Rocha)的新研究，“性：现代中国关于性爱与人性的话语”。这篇文章通过考察词典用法、学术及文化语言的变迁，分析了20世纪初悄然出现的“性/性爱/人—性的综合”这一认识以及相关新词语，指出在20世纪10—20年代，“性爱(sex)被植入、塞进、投入到‘性’(xing)这个汉字中，使得这个字的含义——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既指性爱又指人性的这个字(从而性爱即是人性)——得以自然化”。[1] 表面上看，“性”是不带有任何道德价值判断的生物学术语，是科学的、是“现代的”。但实际上，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通过对“性”这个汉字的转义以及新的语汇来创造了关于人的本质、性存在与社会性别的新“真理”和“历史事实”，对“人”的解放和“女性”的解放的讨论都与此类语汇的变迁紧密相关。

让我们回到前面1930年词典的例子上来。此时，男女不仅已经被“性”界定，而且被鲜明的社会性别语汇——“刚毅”、“坚强”和“脂粉气”、“软弱”来标记。至此，具有性征的身体和被分配、被描述的行为特征牢固地粘连在一起，被认为是自然的客观存在。“Masculine”一词的定义变化最明显，与“manly”的区别模糊了，甚至几乎重叠，显然，两个词语在英语语境中内涵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中文中对应词语含义的演变。在此，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比德曼对同一时期相关词语在美国的变化的描述：

---

[1] Leon Antonio Rocha, “*Xing*: The Discourse of Sex and Human Nature in Modern China,” *Gender & History* Vol. 22 No. 3(Nov. 2010), 608. 这篇文章的历史分析，主要涉及性这个汉字如何被用来作为sex的译词，来表达性爱和性存在这两个含义，此文基本没有涉及“性别”作为sex的另一译词的问题。为了反映作者的原意和保持语言表达通顺，在讨论此文时我们只用“性爱”来翻译sex。而本书中收入各篇文章的术语翻译将sex主要译作“性别”和“性爱”。

> 正当中产阶级男人们试图给男性的“品质和状态”增添一层层新的含义和权力的时候，“masculine”和“masculinity”这两个词语的含义被定义得越来越清晰。到 1930 年的时候，“masculinity”这个词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更接近二十世纪美国人熟悉的“男性的”理想（“masculine” ideals）——比如咄咄逼人、身强力壮、男性的性行为——的混合体。[1]

美国社会性别史研究使我们看到，英文和中文的社会性别语言都在变化，而中文的社会性别语言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的变化则镌刻着伴随着翻译同时泊来的社会性别观念——当然，这里的“翻译”不仅指上述英汉词典的重要翻译活动（以及其他语言如日语的参与），也指广泛的跨文化话语实践。

上面引用两部英汉词典的例子不算是严谨的历史分析。社会性别语汇作为社会性别话语实践的一个方面，它们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和跨文化流通需要我们运用大量的史料（至少包括中、英、日文的材料），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做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有所把握。但是这个小例子足以说明：第一，现代中国人所习以为常的许多关于性别的语汇是 20 世纪初才进入中国的外来语，包括“性别”一词。[2] 第二，这些外来语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新词汇，更重要的是 20 世纪初西方世界体现、支撑其特定社会性别制度的社会性别观念。第三，这些早已成为现代中国人主体性构成部分的外来语，如“男性”、“女性”，嘲弄着任何文化本质主义的宣称。第四，了解当代学者对西方社会性别话语的历史分析和批判，不仅是为了理解西方社会性别的历史和现状，也是理解中国社会性别历史以及解析自我主体性建构历史的必要步骤。第五，鉴于每个社会性别词汇的具体历史含义，其翻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像“manhood”、

[1] 参照本译文集所收比德曼的著作。

[2] 在 1929 年版的《英汉模范字典》中“性别”作为对“sex”和“sexuality”的译词出现。

“manliness”和“masculinity”这些在当代研究中被用做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的词语，对它们的翻译要尽量准确地、清晰地反映出目前已有的批判性学术的研究和思考。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对这三个词语的翻译提出以下建议，并且我们在本译文集中统一采用下列译法：

Manhood：男人身份
Manliness：男人气质
Masculinity：男性特质

“男人”和“男性”的区别使用，可以突出“masculinity”这个概念的现代性，即它被西方现代科学（尤其是性学、心理学和生物学）和文化高度本质化、普适化了。“身份”在语言上可以反映出，男人的生理特点使他有条件获得成年男子应取得的身份（当然，“成年”的定义因时因地不同）。“气质”作为一个通常有褒义暗示的词语，表现出“manliness”——“像男人一样”这个含义中所包含的社会性别优越感（以及经常与之相连的阶级优越感）；同时，这个译词表达的社会和文化理想的意义，比较符合历史上“manliness”这一概念的用法。“特质”强调“masculinity”这个概念的本质化和普世化，以及它作为“femininity”（女性特质）的构成性他者这一特点。

其他一些词汇的翻译也是同样地复杂，我们在本译文集中使用的翻译往往是长期讨论的结果。比如，“sexuality”的翻译，一直是一个难题。目前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有各种各样的译法：性、性行为、性相、性存在，等等。在本译文集中我们采取了根据情境决定译法的办法。“Sexuality”含义的复杂性使我们不能用一个词语来翻译。语言本身的暧昧性，恰恰使它能够在实践中发挥非常灵活和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翻译也试图尽量体现这种暧昧性和多变性。在本译文集中我们主要使用“性存

在"来翻译"sexuality"这个词，但是根据具体情境，并斟酌作者英文使用特点，在适当地方也将它译为：性、性行为、性意识和性话语。

鉴于各学科青年学者英语阅读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在本集附录部分收入康瑞文的《男性特质》第三章的英文原文，以便读者把我们译介的关键词语放回英文语境中阅读，进一步体会这些词语和概念在翻译中可能遗漏的含义。阅读此篇原文，也将有助于加深理解本译文集各位作者对"男性特质"概念的讨论。同时，我们在附录中列出本译文集涉及的英文关键词，欢迎读者和我们商讨这些词语的翻译。附录中还包括了文集中涉及的主要英文作者英汉姓名，便于感兴趣的读者寻找这些作者的英文著作。

本译文集部分内容是复旦—密西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举办的社会性别博士课程班的阅读材料。本译文集的翻译和出版费用获得美国路斯基金会的资助，特此鸣谢。

最后，作为本译文集的主编，我们衷心感谢参加翻译的学者。他们以对介绍新学术领域的一片热诚接受、并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难度很高的翻译工作。译文中若还有错误，是负责译文校对的主编的疏漏，敬请读者指正。

张　颖　王　政

2009年春节初稿于密西根大学

2010年12月定稿

目　录

第二部分

附　录

“社会性别研究译丛”

-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王政、高彦颐　主编）

- 《男性研究》

（王政、张颖　主编）

- 《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

（冯芃芃、郑岩芳主编）

- 《社会性别与文化读本》

（卢丽安　主编）

- 《跨国女权主义研究读本》

（李旭、郑岩芳　主编）

第一部分

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
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琼·W.斯科特(Joan W. Scott)

Gender，名词，仅为一语法术语。如果用该词指人或生物拥有男性或女性的属性，即男性或女性的性别，一般表示戏谑(根据上下文决定是否有这个含义)，或者属于用词错误。

——《牛津现代英语用法词典》，1940，福勒出版社

那些规定词义的人是在打一场输定了的仗，因为词语，就如词语所指涉的观点和事物一样，有着自己的历史。不论是牛津大学教授，还是法兰西学院院士，都不能不受人的干预和想象力的影响去阻挡历史潮流，去抓住或者固定某个词的意义。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在风趣地指责"女性"时用下面的说法添了一丝尖刻："我作为那个 gender(社会性别)中的一员的唯一安慰，就是知道我不会和她们中的任何人结婚。"[1] 在这里，她故意误用了这个语法词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语法范畴的术语来制造一些形象化的隐喻，来表现性格或性存在

方面的特点。例如,1876年出版的《法语词典》给gender的用法是:"人们这样议论一个自我隐匿、感情不外露的男人:'我们不知道他的社会性别(gender)是什么,是男性还是女性'。"[2]1878年,格拉斯通(Gladstone)做了以下的区分:"雅典娜除社会性别(gender)外并无性别(sex),除形状外没有什么是女人的。"[3] 最近,女权主义者开始以更严肃的态度从字面意义上使用"社会性别"这个词,用它来讨论对男女关系的社会组织。这种新用法刚出现不久,所以还没进入词典和《社会科学大百科》。这个词与语法的关联很明显,而这个关联也充满了尚未经过审视的多种可能性。说其语法意义明显,是因为这个词在语法上的用法涉及与男性或女性的命名相应的正式规则;说其充满未经审视的可能性,是因为在很多印欧语言中,的确存在一个第三类别,指无性或中性。在语法中,社会性别被理解为一种把现象分类的方式,是一种社会约同的区分制度,而不是对固有特点的客观描述。此外,分类意味着不同范畴间的一种关系,它使得对群体的区别和分隔成为可能。

"社会性别"一词的最新用法看来首先由美国女权主义者提出。这些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性别是社会性质的区分的基础。"性别"或者"性别差异"这些词汇在使用时,总隐含着生物决定论的意思。"社会性别"一词的使用意味着对生物决定论的摒弃。"社会性别"同时也强调对女性特质规范定义中的关系性方面。有些人担心妇女学的学术过于狭窄或片面地只关注妇女,所以她们用"社会性别"一词,把一个关系性概念引入我们的分析词汇中。根据这种观点,女人和男人是互为界定的,要理解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做完全分开的研究。因此,1975年,纳塔利·戴维斯(Natalie Davis)指出,"看来,我们应该对女人和男人的历史都感兴趣,我们不应该只重视对第二性的研究,就像我们在研究阶级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聚焦在农民身上。我们的目标是解释历史上性别、社会性别群体的意义。我们的目标是发现不同社会和历史时期中,性别角色和性别象征意义的不同种类,去理解它们的意义何在,以及它们如何起到维持社会秩

序或促进社会变革的功能。”[4]

更重要的是，“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术语，是由那些坚信妇女的学术会从根本上改变学科范式的人提出来的。女权主义学者早就提出，对妇女的研究不仅会增加新的研究主题，而且会重新批判性地审视现在已有的学术研究的前提和标准。三位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写道：“我们认识到，将妇女写入史册必然意味着重新定义和拓宽关于历史意义的传统观念，意味着在公众和政治活动之外还要包容个人的和主体的体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在开始时举步维艰，但是，这种方法论意味着这不仅仅是在撰写新的妇女史，也是在撰写全新的历史。”[5] 这种新史学将如何包括妇女和解释妇女的体验，取决于“社会性别”一词能在多大程度上发展成一个分析范畴。在这里，“社会性别”与阶级以及种族之间的类比关系非常明显；实际上，最具有政治包容性的妇女学学者总是将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作为书写新历史最重要的三个范畴。[6] 对阶级、种族、社会性别的兴趣说明：一、学者致力于把被压迫群体的故事，以及对这种压迫的意义与性质的分析纳入历史；二、一种学术理解，即权力的不平等至少是围绕这三条轴线组织起来的。

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的连缀使用意味着这几个词语的相等，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大部分情形中，“阶级”是基于马克思精心阐释（以及被后人再阐释）的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发展理论，而“种族”和“社会性别”却不具有这样的联想。在使用“阶级”这个概念的学者中，也没有一致性。有的学者运用韦伯式观念，有的学者则把阶级当作临时的启发性教学工具。尽管如此，在我们使用“阶级”一词时，我们总是或者遵循或者反对一套定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一词总是涉及经济因果关系的思想，以及历史的辩证发展道路的展望。种族和社会性别这两个概念却没有这样的清晰性或连贯性。就社会性别而言，该词的用法涉及各种不同的理论立场，也有的仅仅用来描述男女关系。

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她们所受的训练使她们精

于描述而疏于理论概括。但是,她们日益关注寻找合适的理论模式。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两个原因促使她们这样做。首先,妇女史个案研究的迅猛增长在呼唤某种综合性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连续性与间断性,解释始终存在的不平等和迥然不同的社会体验。其次,近年来妇女史有很多高质量的著述,但妇女史在整个史学领域中却继续处于边缘地位(这从教材、课程大纲和专著中都可看到),这之间的不一致凸显了史学描述方法的局限性,它们没有去针对这一学科的主导性概念,或者至少没能以动摇、改造这些主导概念的方式来做这项工作。对研究妇女史的历史学家来说,仅仅证明妇女有其历史,或者仅仅说明妇女参与了西方文明的主要的政治动荡,那是远远不够的。在妇女史问题上,大部分非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承认妇女有历史,他们或者持分离论观点,或者认为不必对其加以考虑("妇女有独立于男性的历史,所以让女权主义者去研究妇女史吧,和我们没关系";或者"妇女史是关于性别和家庭的,应该和经济史、政治史分开来研究")。在妇女参与问题上,史学家最好的反应也是无甚兴趣("即使知道妇女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也丝毫不会改变我对大革命的理解")。归根结底,这些反应所提出的都是理论上的挑战。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分析过去男性和女性经历之间的关系,也要分析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社会性别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究竟如何发挥作用?社会性别如何对历史知识的组织和知识观念的产生赋予意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有赖于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

历史学家对社会性别所做的理论探索,大部分依然停留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框架里,通过长效的公式法则来提供普世性的因果解释。这些理论都有局限性,因为它们倾向于含有简约化或过于简单化的归纳,这不仅削弱了历史学科中对社会因果关系复杂性的理解,也削弱了女权主义对导致变革的分析方法的投入。我们先对这些理论做个回顾,来暴露它们的局限性,以便我们能提出一种不同的方法。[7]

大部分历史学家采用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是描述

性的，即指出现象或现实的存在，而不做任何阐释、说明，或解释现象产生的前因后果。第二类方法是因果法，它对现象或现实的本质进行理论化，试图理解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过程。

“社会性别”一词最新、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作为“妇女”的同义词。在过去几年里，很多研究妇女史的书籍和文章都在题目中将“妇女”换成了“社会性别”。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替换虽然模糊地涉及某种分析概念，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个领域的政治里更容易被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社会性别”是为了表示一部著述的学术严肃性，因为“社会性别”听上去比“妇女”更为中立、客观。“社会性别”似乎同社会科学的科学术语很相称，于是它把自身从（听上去刺耳的）女权主义政治中分离出来。在这种用法里，“社会性别”既不携带着关于不平等或权力的必要声明，也不去识别受到不公正对待（及迄今为止被历史遮蔽）的一方。鉴于“妇女史”这个术语强调（和惯常的实践不同）妇女也是被认可的历史主体，以此宣告了自己的政治性，而“社会性别”包括妇女，却不特指妇女，因此显得没有造成什么关键的威胁。“社会性别”的这种用法可以说是在 80 年代女权主义学术追求学术合法性的一个侧面。

但这只是一个侧面。将“社会性别”用作“妇女”的代名词，说明与妇女有关的信息也必然是和男子有关的信息，社会性别也意味着是对男子的研究。这种用法说明，女人的世界是男人世界的一部分，被男人世界所创造，并存在于男人世界之中。这种用法否定分离的领域这个观点在分析中的有效性，并认为，孤立地研究妇女会巩固那种虚构，即，一个领域（一种性别的经历）和另一个是基本不相干的。此外，社会性别也被用来表示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用法明确地驳斥了各种生物论的解释，例如，从女人有生育能力，男人有较强的肌肉力量这类事实中去寻找各式各样的女性从属性的共同基点。因此，社会性别成为表示“文化建构”（即一整套社会创造的男女合适角色的观念）的方式，成为关涉到男女主体身份仅有的社会根源的方式。在这个定义上，社会性别是一种强加在性身

体上的社会范畴。[8] 随着对性、性存在的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性别成为一个特别有用的词，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区分性实践和男女被赋予的社会角色的方式。虽然学者们认为，性和（研究家庭的社会学家所说的）“性别角色”之间有联系，但他们指出两者间没有简单、直接的关联。使用社会性别一词，强调的是整个关系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包含性，但并不直接被性所决定，也不直接决定性存在形式。

上述对社会性别的描述性用法经常被史学家用来标识一个新的领域。当社会历史学家开始转向新的研究对象时，社会性别就成为与妇女、儿童、家庭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相关的概念。换言之，社会性别被仅仅应用在上述这些涉及两性关系的领域，包括结构和意识形态层面。因为从表面上看，战争、外交和国家安全并非明显地和这些关系相干，所以社会性别似乎就不能应用到历史学家对政治、权力议题的研究中，也就继续和这些历史学家的思考无关。其实际效果就是在历史书写中，接受了某种深植于生物学中的功能主义的观点，继续巩固了分离领域的观点（性或政治，家庭或国家，女人或男人）。虽然在这种用法里，社会性别一词强调两性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它一点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社会关系被建构成这个样子，没有解释这种关系如何运作，或者会如何变化。这样，在这种描述性的用法中，社会性别是一个与妇女研究相关的概念。它是一个新话题，一个新的历史研究的领域，但是它缺乏分析力度，不能挑战或改变现存的历史研究范式。

当然，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努力动用可能解释社会性别概念、说明历史变迁原因的各种理论。实际上，这其中的挑战是将理论与史学研究进行协调，现有的理论是用归纳性或普世性术语框架起来的，而史学研究却是致力于对特定情景中的具体事物和根本变化的研究。这类协调的结果充满折中主义色彩：对理论的部分借用削弱了某个具体理论的分析力度，或更糟糕的是，借用了一些理论原则，却忽视了这些原则的含义；或者，解释历史变迁，但因为运用了普世性理论，结

果却论证了不变的主题；或者在一些非常具有想象力的研究中，理论却藏而不露，以至于这些研究不能成为其他调查研究的榜样。因为史学家所运用的理论其全部的含义往往还没有被详细清晰地表述出来，所以看来还很值得花费时间来做这样的工作。只有通过这样的实践，我们才能评价这些理论的实用性，才能开始表述一种更有力度的理论方法。

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在分析社会性别方面使用了多种方法，这些方法最终可归纳为对三种理论立场的选择。[9] 第一种力图解释父权制的起源，这完全属于女权主义的奋斗。第二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从这一传统中寻求对女权主义批评的接纳。第三种理论立场是从有根本区别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和英美客体—关系理论中，吸取不同的精神分析学派来解释主体社会性别化身份的生产与再生产。

研究父权制的理论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妇女的从属地位上，在男性有统治女性的"需要"这一点上找到了自己的解释。玛丽·奥布赖恩(Mary O'Brien)天才地引用了黑格尔的观点，把男性统治定义为：男人在人类再生产方式中被异化，男性统治是男人超越这种异化的欲望的效果。代际传承的原则重建了父子关系的重要性，遮蔽了妇女在生育工作中的真实劳动和社会现实。妇女解放的源泉来自"对人类再生产过程的恰当理解"，即理解妇女的再生产劳动的实质与(男性)意识形态对这种劳动的神秘化之间的矛盾。[10] 根据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观点，再生产是女人的"痛苦的陷阱"。不过在她较为唯物主义的分析中，她认为，妇女解放也许随着生育技术的变化而来，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女人的身体不用再担当物种再生产的必要代理。[11]

对有些人来说再生产是父权制赖以存在的关键，对另一些人来说性存在才是问题的答案。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cKinnon)的大胆设想既是她个人的，也具有某种方法的特色。她说："性存在对于女权主义正如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一样：它们主要是属于个人自己的，却基本被剥夺了。""对女人进行性的物化，是压制女人的首要步骤。这过程把行动与

言语、建构与表达、观念与强制、神话与现实融合起来。男人占有女人；主体主宰客体。”[12]麦金农继续用和马克思主义的类比提出，与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一样，提高觉悟应该是女权主义的分析方法。她论证说，通过表达共同的被物化的体验，妇女会认识到她们共同的身份，政治行动就会成为可能。对麦金农来说，性存在是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是可以作为未被中介影响的体验事实来发现的。尽管在麦金农的分析中，性关系被界定为社会关系，但她只表述了性关系的内在的不平等，而对于这种权力体系为什么会如此运作，她却没做任何分析。男女不平等关系的根源说到底就是男女不平等关系。尽管她认为性存在是不平等的根源，这个不平等是体现在“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中”，但对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却缺乏分析。[13]

父权制理论家们从许多重要方面对男女不平等进行了探讨，但对历史学家来说，她们的理论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当父权制理论家提出一种针对社会性别制度内部的分析时，她们又声称在所有社会组织里这个社会性别制度具有首要性。但是父权制理论没有揭示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怎样构成了其他的不平等关系。其次，男性的统治或者来源于男性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窃用，或者来源于男人对女人的性物化，不论是哪种情况，这种分析都是以生理上的差异为基础的。即使父权制理论家注意到了社会性别不平等形式和制度的变化是存在的，但是生理差异总有种普遍的永恒不变的样子。[14]这种以生理差异为单一变量的理论给历史学家们出了难题：它假设了人类身体具有持续、固有的意义，它独立于社会、文化建构之外，于是，社会性别本身也就成了一个非历史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成为陪衬，它只不过为固定的社会性别不平等这一永恒主题提供无穷的变奏而已。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有较历史性的方法，因为她们有一个历史理论的指引。但不论她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样的变奏或改编，对社会性别一定要有个“唯物”角度的解释这个自我要求，限制了或至少是减缓

了新的分析方法的发展。不论是提出一个“双制度”解决方案（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两个分离而又相互作用的领域），还是把分析更严格地建立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方式的讨论上，她们总是在劳动的性别分工之外找到对社会性别制度的起源及其变化的解释。家庭、家户以及性存在到最后都是变化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恩格斯在其《家庭的起源》中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5]那也是经济学家海迪·哈特曼的分析最后结束的地方。哈特曼强调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看成是分离但相互作用的制度的重要性。然而，随着她的论点的展开，经济因果总是第一位的，父权制总是依赖于生产关系而发展和变化的。当她提出：“要结束男性统治，必须先根除劳动的性别分工”，她的意思是结束工作中的男女隔离。[16]

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之间的讨论总是围绕下面一系列问题：拒绝本质主义的观点，如认为“生物繁衍的迫切需要”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性别劳动分工；将“再生产方式”纳入生产方式的讨论的无效性（再生产方式仍是一个对立的范畴，并没有获得和生产方式同等的地位）；认识到经济制度不直接决定社会性别关系，而实际上，妇女的从属地位在资本主义前就出现，在社会主义阶段仍存在；但依然寻求一个摒弃自然生理差异的唯物主义的解释。[17]首先跳出了上面这个疑难圈的重要理论尝试是琼·凯利（Joan Kelly）的研究，在《女权主义理论的双重视野》这篇文章里，她指出，社会的和历史的体验是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性别制度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这两个制度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构成原因，但“同时起作用，复制一个具体的社会秩序中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男性统治结构。”凯利指出，社会性别制度是独立存在的，这相当关键地开拓了理解社会性别概念的空间。但是她的分析仍然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这使她仍然特别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对社会性别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两性关系根据、通过社会经济结构运作，同时也通过性/社会性别结构运作。”[18]凯利提出了“基于性的社会现实”这一观点，但是她倾向于强调这种社会现实的本质是社会的，而不是性的。而且，更经常的是，在她的用

法中，“社会”指的是生产中的经济关系。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存在最为意义深远的探索反映在《欲望的力量》一书中。这是 1983 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19]当时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性存在是历史语境的产物”的思想很有影响，同时，人们认为当时的“性革命”值得认真研究，在美国政治活动分子和学者中开始对性存在研究越来越关注。在这一系列影响之下，这本书的作者们将“性政治”作为探索的焦点。在这个主题的引导下，作者们提出了因果关系的疑问，并提供了很多解决方法；实际上，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其分析的多样化以及其分析中的矛盾性和张力。即使有些作者倾向于强调社会语境（这个词经常指“经济”因素）是根本原因，他们也会同时强调研究“社会性别主体身份的心理结构”的重要性。如果有的文章里提出“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反映”了经济与社会结构，作者也会指出，非常有必要理解“社会和长久以来存在的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20]一方面，书的编者同意杰西卡·本杰明的观点，认为政治必须包括对“人类生活中情欲和幻想成分”的关注，但是，另一方面，全书中只有本杰明的文章充分地或严肃地讨论了这个理论问题。[21]相反，一个贯穿全书心照不宣的假设是，马克思主义能被扩展到对意识形态、文化以及心理学等问题的讨论中，这种扩展可以通过对证据的具体检验来实现，就如书中大部分文章所做的那样。这种编辑思路的好处是它可以避免截然不同的立场，而弊端则在于它让一个已经充分表述的理论止步不前，从两性为基础的关系又走回到生产关系。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研究是探索性的，相对来说范围很广。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则同具有强大又有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关系更贴近。对两者的比较显示，英国研究者在挑战严格的决定论阐释的束缚方面更有难度。这种困难在最近米歇尔·巴莱特(Michele Barett)与她的批评者在《新左派周刊》的辩论中可以看出来。批评者指责她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劳动性别分工问题上抛弃了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22]这种难度也表现在另一方面。在英国女权主义学者中，一开

始有人提出要尝试将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糅合在一起，认为这两个理论有可以交融的地方。[23]但后来这些学者又提出，这种糅合观点行不通，两者只能取其一。英美两国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工作都有难处，这点在我上面提到的一些研究中非常明显。对两国学者来说，她们面对的难题和父权制理论提出的问题相反。在马克思主义中，社会性别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变化着的经济结构的副产品，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一直以来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评论心理分析理论首先要弄清不同流派，因为不同的研究方法是根据不同国家的创始人和众多的实践者来分类的。英美流派以客体关系理论为基础。在美国，南茜·乔多萝(Nancy Chodorow)是这一流派的代表。此外，卡罗·吉利根(Carol Gilligan)也对美国的学术，包括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吉利根的研究受乔多萝的影响，但比较少关注主体的建构问题，更关心道德发展与行为研究。与英美流派相比，法国学派是以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从语言学理论出发对弗洛伊德的研究为基础(对女权主义来说，关键人物是雅克·拉康)。两个学派共同关心的问题是主体身份的形成过程；二者都关注儿童的早期发展，以寻找社会性别主体身份形成的线索。客体关系理论家强调儿童的具体经验(儿童看见、听见、接触抚育他们的人，这些人首先是儿童的父母)的影响，而后结构主义者则强调，在交流、阐释和再表现社会性别的过程中，语言具有中心地位。(对后结构主义者来说，“语言”不是词语，而是意义体系，是象征秩序，这种体系在人对言语、阅读与写作等能力的实际掌握之前就存在。)这两个流派间另一个区别是在无意识问题上。乔多萝认为，无意识最终受意识理解的制约，而对拉康来说则不然。拉康认为，无意识是主体建立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它是性别差异产生的一个场所，因此，无意识也是社会性别主体的持续的不稳定的场所。

近年来，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这些理论，因为可以用这些理论的概括性评论来支持一些具体的研究发现，或者因为这些理论似乎为社

会性别的探讨提供一个重要的理论表达方式。那些用"妇女文化"的概念做研究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引述乔多萝或吉利根的论点,作为自己的历史阐释的依据和说明;而那些竭尽全力探索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则引用拉康。我认为,最终这两种理论对历史学家来说都不完全奏效,认真分析这两种理论可以让我们明白其中的原因。

我对客体关系理论有保留,因为这个理论拘泥于字面意义,并且只用相对来说很小的一个互动结构来解释社会性别身份的产生和变化。在乔多萝的理论中,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和每个父母职责的实际分配具有关键作用。盛行的西方制度的结果就是男女之间的明显界限:"女性基本的自我意识是和外界联系在一起的,而男性基本的自我意识是独立的。"[24]根据乔多萝的理论,如果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过程,更多地参与家庭生活,那么恋母情结戏剧的结局就会截然不同。[25]

这种解释把社会性别概念局限在家庭经验中,这使历史学家无法将社会性别概念与其他社会经济、政治、权力制度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解释意味着,社会安排要求父亲外出工作,母亲更多地承担育儿任务,家庭这个组织结构因此形成。但是,这样的安排由何而来?为什么这样的安排是通过劳动的性别分工来实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清楚。与分工不对称性相对照,那个不平等问题也没有被解释。在这个理论中,我们怎样能解释在这种社会安排中,为什么男性特质始终与权力相关呢?怎样解释为什么男人身份总是被赋予高于女人身份的价值呢?而且,为什么即使孩子不在这种核心家庭长大,或者在夫妻平等分担育儿工作的家庭里长大,他们也学会了这些对男女不同的联系与评价呢?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就要重视象征体系,重视社会如何再表现社会性别,怎样用社会性别来表达社会关系规则,怎样赋予体验以意义。没有意义,就谈不上体验。没有语言对现实的意指过程,就谈不上意义(这并不是说语言就是一切,但是如果一种理论不考虑语言的象征、意指问题,就不会关注到在定义人类个性与人类历史过程中象征、隐喻、概念等起到的巨大作用)。

语言在拉康的理论里占据中心地位;语言是引导儿童进入象征秩序的关键。社会性别化的身份通过语言而被建构。拉康认为,菲勒斯(阳具)是性别差异的中心能指。但是菲勒斯的意义必须被解读为是种隐喻。对孩子来说,恋母情结戏剧开启了文化互动的用语,因为阉割的恐惧代表着权力,代表着(父亲的)法律规则。孩子与法律的关系有赖于性别差异,有赖于孩子与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的想象(或幻想)性的认同。换言之,对社会互动法则的强迫接受过程本来就是非常具体地社会性别化的,因为女性与菲勒斯之间的关系一定不同于男性与其之关系。但是,社会性别认同虽然看上去总是连续的、固定的,但实际上,它是非常不稳定的。像词语一样,多种主体身份也是差异与区分的过程,要获得(或创造一种幻觉的)连贯性和共同的理解,就要压抑歧义和相反的成分。男性特质的观念是建立在对女性侧面必要的抑制上——抑制主体的双性的可能性,此外还要将冲突引入男性化与女性化的对立。被压抑的欲望进入了潜意识,因此也就持久地威胁着社会性别认同的稳定性,否定社会性别身份的统一性,颠覆它对安全的需求。还有,关于男性化与女性化的有意识的观念不是固定的,因为这些观念随着特定情景中的具体用法而变化。这样,主体需要某种完整的模样,但由于术语的不精确,主体意义的相对性,以及主体对压抑的依赖,所以冲突总是存在。[26]这种解释使"男人"、"女人"这些范畴问题百出,因为男性化与女性化都不是内在固有的特点,而是主观自我意识的(或者是虚构的)建构。这种解释也意味着主体处于一种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并且,通过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场所,它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方法来阐释在意识与无意识层面的欲望。因此,我认为它颇具启发性。

但是,我也有很受困扰的地方。在这种解释里,与"主体"相关的问题成为唯一被关注的对象,男性与女性在主观意识中出现的初始对立被具体化为社会性别的中心事实。此外,"主体"是如何建构的概念虽然具有开放性,但这理论还是有将男性女性这些范畴和关系普世化的倾向。对

历史学家来说，其结果是对历史证据进行简约性的解读。虽然这个理论考虑了社会关系，将阉割和禁忌与法律联系起来，但这个理论并不允许讨论历史的具体性和多样性。菲勒斯是唯一的能指；最终，社会性别主体的建构过程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总是同样的。电影理论家特蕾莎·德·劳蒂斯（Teresa de Lauretis）指出，如果我们要考虑到主体性在社会语境、历史语境中的建构，那仅仅在拉康给出的理论框架中是无法把这些语境具体化的。实际上，即使是在劳蒂斯的分析中，社会现实（意思是，"物质的、经济的和人际的[关系]实际上都是社会的，而且从大的视野来说，是有历史具体性的。"）也似乎存在于主体之外，游离于主体。[27]现在还缺乏一种用社会性别来思考"社会现实"的方法。

拉康理论中的性别对立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它表现出一种超时间性质，即使是在萨莉·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对该理论很好的历史分析中也是这样。亚历山大分析了拉康，然后得出结论，"两性间的对立，是获得性别身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如果这种对立总是潜在的，那么，历史就有可能不能提供任何最后的解决方法，而只能是对差异的象征体系以及劳动性别分工进行不断的重新塑造、重新组合。"[28]这样的结论让我犹豫，觉得不能接受，这也许是因为我头脑里顽固的乌托邦思想，也许是因为我还没有脱离福柯所说的古典主义哲学的影响。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亚历山大的表述巩固了这种观点：把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作为唯一可能的男女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生存的一个永久的状态。她的表述是强化，而不是质疑了丹尼斯·赖利（Denise Riley）所说的"性别二元对立的可怕的永恒性"。赖利写道："这种[男女间的]对立本质上是历史建构的，建构的效应之一就是这种不变的乏味单调的男女对立的印象。"[29]

正是这种对立，这种单调、沉闷的对立，在卡罗·吉利根（Carol Gilligan）（回到英美学派）的著作中被进一步提倡。吉利根说，由于男孩和女孩的不同的"经历"（生活现实），所以，他们道德发展的途径也不一

样。很多妇女史学者参照她的观点，来解释她们的研究使她们听到的“不同的声音”。这并不令人意外。但对该观点的借用带来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逻辑上有相关性。[30]首先，有个在确定因果关系时经常出现的论点滑移：从“妇女的经历使她们容易根据具体情景和关系做道德选择”这个论点，变成了“妇女之所以这么想和这么做是因为她们是女人”。这种推理路线隐含着即使不是本质主义的，也是非历史的妇女观。吉利根等人做了样本很小的对20世纪后期一些美国学生的研究，她们把由此产生的描述推导成一个关于所有女人的陈述。这种推论在一些讨论“妇女文化”的历史学家那里也很明显（尽管不限于这些历史学者），这些历史学家从早期圣徒到现代勇猛的劳工运动积极分子那儿寻找证据，然后把它们缩减成对吉利根假设的证明，即女性全都更重视人际关系。[31]对吉利根的观点的这种运用，和1980年《女权主义研究》的专题讨论上展示的严谨的、有具体历史语境的“妇女文化”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2]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女权主义研究》里的一系列文章和吉利根的论断做一个比较，就能看到后者观点的非历史性的程度：把男/女界定为普遍的、自我复制的二元对立，并且这个对立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固定。通过强调固定的差异（在吉利根的例子中，她把说明性别和道德推理方面较复杂的结果的数据简化了，以此强调性别差异），女权主义者们为自己要反对的思想贡献了力量。尽管她们坚持要重新评估“女性”这个范畴（吉利根认为妇女的道德选择可能比男人更仁慈），她们却没有审视二元对立本身。

我们需要拒绝二元对立的固定和永恒的性质，我们需要对性别差异的词语进行名副其实的历史化和解构。我们必须要有更强的自省意识来区分我们自己的分析语汇与我们分析的材料。我们必须寻找方法（无论多不完美）来不断让自己使用的范畴接受批评，并对自己的分析做自我批评。如果我们用雅克·德里达关于解构的定义，那么，这种批评就意味着分析任何二元对立运作的语境，扭转或取代产生这种二元对立的等级建构，而不是把二元对立作为真实的、不证自明的、事物的本质来接受。[33]当

然，某种意义上，女权主义者多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历史，就是在具体语境中拒绝对男女关系的等级建构的历史，就是试图扭转或取代这种运作的历史。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现在正处在将自己的实践理论化，将社会性别发展为一个分析范畴的有利位置上。

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是20世纪末的新生事物。在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主要的社会理论中，它一直是缺失的。当然，在那些理论中，有的就是从男女对立上类推出来的，有的承认有个"妇女问题"，还有的讨论到了主体的性身份形成，但社会性别作为讨论社会或性别关系的制度的一种方式还没有出现。这种忽视可能部分地说明了当今的问题：当代女权主义者们在把社会性别融入现存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在说服这种那种理论学派的追随者把社会性别纳入其语汇的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社会性别一词是当代女权主义者在定义的土壤上划出自己的领地的部分努力，它也关系到女权主义者所坚持的观点，即现存的理论体系不能充分解释男女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有一点看来很有意义，对社会性别一词的使用出现在认识论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这个变化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中，表现为社会科学家们开始从科学范式转向文学范式（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话说，就是从强调原因到强调意义，模糊了学科探究问题的风格），[34]在另一些情况中，这个变化的形式表现为对理论的辩论：有的人声称事实是透明的，有的人坚持所有的现实都是被阐释的或建构的；有的人维护"人"是自己命运的理性的主宰的观点，有的人则质疑这一点。在这场开辟了理论空间的大讨论中，人文学科发起了对科学的批评，后结构主义者发起对经验论和人文主义的批评。女权主义不仅在这个空间发现了自己的理论声音，而且还找到了学术上和政治上的盟友。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我们必须把社会性别发展为一个分析范畴。

历史学科被一些新近的理论家不屑地看成人文主义思想的残余。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应该做何反应呢？我不认为我们该放弃档案，抛弃

对过去的研究，但我们确实应该改变我们以往的某些工作方法，改变我们以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审视我们过去的分析方法，搞清楚自己的操作假设，解释我们怎么理解历史变迁的发生。与其寻找事件单一的原因，我们必须把历史中各种过程构想成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当然，我们要寻找研究问题，这些问题成为我们进入复杂的多种过程的切入点。但是，我们要始终牢记过程本身。为了回答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我们要更多地询问，事件是怎样发生的。用人类学家米歇尔·罗塞尔多(Michelle Rosaldo)的话来说，我们不应该追求一般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因果，而是要做出有意义的解释："现在，在我看来，妇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任何直接意义上说都不是她的行为的结果，而是在具体的社会互动中她的活动所获得的意义的结果。"[35]为了寻求意义，我们即要研究社会组织，也要研究个体的主体，表述它们相互关系的实质，因为这两者都对我们理解社会性别怎样运作、变化怎样发生至关重要。最后，我们需要消除这种观念，即社会权力是统一的、连贯的、集中的，取代它的应该是像福柯所说那种权力概念，即权力是各种不平等关系弥散的组合，是在社会"力量场域"中由话语建构起来的。[36]在这些过程和结构中，有一定的空间来容纳人的能动性的概念，即在某些限制内，通过语言来构建主体身份、生活、各种关系以及一个社会的努力(至少是部分理性的)。这里的语言指的是概念性的语言，这种语言既设定各种界限，又包含了否定、反抗、重新解释、隐喻性的创造和想象作用的可能性。

我对社会性别的定义由两大部分和几个小部分构成，这些部分间互相联系但又必须在分析上有所区分。定义的核心基于下列两个命题的相互关联上：社会性别是构成社会关系的一种要素，这种社会关系是基于人们认为的两性差异之上的；并且，社会性别是指涉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社会关系的组织方面的变化总是与权力的再表现上的变化相呼应，但变化的方向并不一定是单向的。社会性别作为基于人们认为的两性差异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它涉及四个互相关联的因素：第一，文化中可使用

的各种象征，这些象征引出了多重的（经常互相矛盾的）再表现——例如，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夏娃和玛丽是女人的象征，但也代表着光明与黑暗、纯洁与污染、天真与腐化的神话。对历史学家来说，有意思的问题是：哪种象征性再表现被动用了？是怎样出现的？在什么样的背景中出现的？第二，规范性的概念，这些概念提出对象征意义的阐释，试图限制或包含它们在隐喻上的可能性。这些概念是通过宗教、教育、科学、法律和政治信条来表达的，它们经常采用固定的二元对立的形式，斩钉截铁、明白无误地规定男性与女性、男性化与女性化的意义。事实上，这些规约性的表达依赖于对另类可能性的排斥或压抑，而且，有时候，对另类可能性的公开争斗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发生应该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但是，取得了主导地位的观点总是被说成是唯一可能的。后来的历史就写得好像这些规约性的观点是社会上意见一致的产物，而不是矛盾冲突的产物。这种历史写作的一个例子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意识形态的处理，写得好像这个意识形态一出现就是个整体，只是在后来才对各种差异巨大的观点做出反应，而不是把它写成一直是意见纷争的主题。另一个例子是目前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强行将他们的宗教实践与恢复妇女所谓更正宗的"传统"角色连在一起，但实际上，历史上几乎没有这类不加质疑地扮演这种角色的先例。新的历史调查的要点就是打破这种固定性的观念，发现争论或压迫的实质，这些争论或压迫导致了二元对立的社会性别再表现中的永恒性样子。这种分析一定要包含政治观念，一定要涉及对社会体制和组织的分析，这是社会性别关系的第三个方面。

有些学者，特别是一些人类学家，把社会性别的用法限定在对亲属制度的研究中（集中在把家户和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我们需要一个更宽的视野来包括不仅是亲属制度，（特别是在更复杂的现代社会）还有劳动力市场（性别隔离的劳动力市场是社会性别建构过程的一部分）、教育（全部男性、单一性别或男女同校的教育体制也是社会性别建构过程的

一部分），以及政体（普遍的男性投票权是社会性别建构过程的一部分）。把这些体制赶回到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功能是不明智的，论证当代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古老的、建立在交换妇女基础上的亲属制度的残留也没多大意义。[37]社会性别是通过亲属制度建立起来，但是不仅仅是通过亲属制度一条路径；社会性别也通过经济和政体被构建，至少在我们的社会里，经济和政体基本上是独立于亲属制度运作的。

社会性别定义的第四点是主体身份。我同意人类学家盖尔・鲁宾的看法，心理分析理论是研究社会性别再生产的重要理论，也提供了对"个人在进入文化的过程中改造了其生物性存在"的一种描述。[38]但是，心理分析的普世性断言也让我产生了疑惑。尽管拉康的理论在我们思考社会性别身份的形成方面有帮助，但历史学家需要以更注重历史的方式来工作。如果社会性别身份的基础就是唯一的普遍的对阉割的恐惧，那么历史探究的意义就被否定了。而且，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并不总是，或者，并不顶真地履行他们的社会对他们的规范，也不总是遵循我们的分析范畴。历史学家需要研究社会性别身份是以何种方式在实质上被建构起来，并把他们的发现和一系列的活动、社会组织和具体的历史中的文化再表现联系起来。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领域中最出色的工作是传记，这并不令人意外：例如比德・马丁（Biddy Martin）关于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 Salome）的阐释，凯瑟琳・斯克拉（Kathryn Sklar）对凯萨琳・毕秋（Catharine Beecher）的描绘，杰奎琳・豪尔（Jacqueline Hall）关于杰西・丹尼尔・阿密斯（Jessie Daniel Ames）生平的研究，以及玛丽・希尔（Mary Hill）对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分析等。[39]但研究一个群体也是可能的。如马里娜里尼・辛哈（Mrinalini Sinha）和罗・莱塔（Lou Ratte）把英国殖民地时期在印度的殖民官员，以及受英式教育的印度人（这些印度人后来成了印度反帝国主义民族运动领袖）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的社会性别建构。[40]

这样，我对社会性别的定义的第一部分由所有这四方面的因素构成，

而且它们互相关联,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作用。但是,它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同时运作,并非一个方面仅仅是其他几方面的一种镜像。[1] 实际上,这里对历史研究提出的问题是,这四个方面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我这里对社会性别关系建构过程的简略勾画,也可以同样用来探讨阶级、种族、族裔或者任何社会过程。我的意图是清晰而又具体地说明我们需要怎样来思考在社会和体制关系中社会性别的效应,因为这类思考往往做的不够精细和系统。不过,我对社会性别的理论化是在第二个命题中发展的:社会性别是指涉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或者更清楚地说:权力在社会性别这个基本场域中被表述,或通过这个基本场域得到表述。社会性别并非表达权力的唯一场域,但是,在西方,在犹太—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传统中,它似乎是持续反复出现的使得其对权力的指涉作用成为可能的一种方式。因为如此,这部分的定义似乎可以属于论证的规范性那部分,但是它并不是,因为虽然权力的概念可以建立在社会性别基础上,但权力概念并不总是完全关于社会性别本身。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写过"这个世界的划分"基于对"生物性差异"的参照以及"显而易见的那些与生育和再生产劳动分工有关的的差异",他论述了"这个世界的划分"是如何作为"根基最扎实的集体幻象"来运作的。有关社会性别的概念被建构成貌似客观的一套参照体系,它们结构起我们的感知能力,结构起对所有社会生活的具体的和象征性的组织。[41] 这套参照系确立起权力的分配(差异性地掌控或可享有物质资源或象征性资源),正是在这方面,社会性别深深地牵连到对权力本身的建构与构想中。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是这样说的:"不是性在社会中阴魂不散,而是社会纠缠住身体的性不放。身体上与性相关的差异总是被作为证据搜集起来,证明和性毫不相干的社会关系和现象。性差异不但是社会关系和现象的证据,也成了支持既有社会关系和现象

[1] 作者在此强调的是:对社会性别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假设一种固定的因果关联,而需要在具体的时空中作具体的历史调查。——译注

的证词,换句话说,被合法化了。"[42]

社会性别所具有的合法化功能有多种运作方式。例如,布迪厄指出,在一些文化中,农业活动围绕着一些时间和季节的概念进行,这些时间季节概念都是基于对男性化的和女性化的具体的对立性定义上的。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敏锐地分析了英美一些女作家对社会性别的运用。[43]娜塔利·戴维斯(Natalie Davis)探讨了关于男性化的和女性化的概念怎样和对法国早期现代社会的社会秩序的理解与批评有关。[44]历史学家卡罗琳·拜纳姆(Caroline Bynum)关注中世纪男性化、女性化的概念与宗教行为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这些概念以何种方式影响着当时的僧侣制度中的政治以及个人的宗教行为,她提出了重要的洞见,对中世纪的精神世界有新的揭示。[45]艺术史学家也开启了新的领域,她们从文学对男女的描述中解读社会含义。[46]这些新的阐释是基于这个观点:概念性语言运用区别来产生意义,而性别差异是意指区别的一种基本方式。[47]于是,社会性别就提供了一个方法,使人们能对意义进行解码,理解人类多样的互动形式中的复杂关联。当历史学家探究有关社会性别的概念用什么方式来建构社会关系,并使其合法化时,他们就会深刻理解社会性别和社会之间相互性的实质,领悟到在特定的语境中政治建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建构政治的具体方式。

政治只是社会性别能被拿来做历史分析的领域之一。我选择的下述例子都与最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与权力相关,即与政府和民族—国家相关。选择这些例子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由于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社会性别与政治要处理的问题无关,所以这个领域历来无人问津。第二,政治史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探究模式,这个领域一直最坚决地抵制在史料甚至研究问题里包含妇女与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被或明或隐地运用到政治学理论中,来合理化或指责君主制,来表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人们可能会料想到在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和法国的凯瑟琳·德·美弟奇主政时,当时人们对她们的君主

统治的辩论会是关于妇女是否适合执掌政治权力的问题。但是,当亲属关系和君主政体是一体的时候,对男性国王的讨论也同样对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着迷。[48]让·保丁(Jean Bodin)、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都用婚姻关系在辩论中做比喻。爱德蒙·伯客(Edmund Burke)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是围绕着丑陋、凶残的长裤汉巫婆("在这个身体畸形的最邪恶的女人身体里,燃烧着地狱的怒火")和温柔的、具有女性特质的玛丽·安特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之间的对照展开的。玛丽·安特瓦内特逃离人群,到"她的国王丈夫的脚下去寻找庇护",她的美丽曾唤起了民族自豪(为了说明女性在政治秩序中的恰当的作用,伯客说:"为了使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是可爱的。")。[49]但是人们并不总是用婚姻或异性恋做类比。在中世纪伊斯兰的政治理论中,政治权力的象征经常影射到男人与男童的性关系上,这不但表明类似福柯最近的著作里描写的古希腊文化中那种性关系是可以接受的,也表明妇女是和任何的政治概念与公共生活无关的。[50]

上面这最后一句评论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理论仅仅是反映社会生活。重要的是,对国家需要什么的看法也会产生社会性别关系的改变。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路易·德·伯纳德(Louis de Bonald)论点,1816年他这样争辩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期间关于离婚的立法应该取消:

> 就像政治民主"允许人民,政治社会中弱小的一部分,起来反抗现有权力",离婚,"名副其实的家庭内的民主",允许妻子,"婚姻中的弱小的一方,向婚姻中的权威造反"……"为了使国家权力不落入人民手中,必须保证家庭不落如妇女和儿童手中"。[51]

伯纳德用一个类比开始,很快就建立了婚姻与民主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重提历史上曾有过的"秩序井然的家庭是秩序井然的国家的基础"的论点,实施了这种观点的立法重新界定了婚姻关系限制。同样,在我们的时

代,保守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法案,来规范家庭的组织和行为,从而改变目前的实践。人们注意到独裁统治与对妇女的控制之间的关系,但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在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制政权的关键时刻,在斯大林争夺领导权的时刻,在纳粹政策在德国实施的时候,在霍梅尼政权取得胜利的时期,不论在哪个时期,统治者上升时期都把主宰、实力、中央集权和统治权等合法为男性化的(敌人、外人、颠覆分子、软弱则被表现为女性化的),并把这种编码用文字写入法律(禁止妇女参政,宣布堕胎非法,禁止母亲从事有酬工作,规定女性着装准则),要妇女循规蹈矩不得出格。[52]这些行动及其发生时间本身是不合情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政权从控制妇女上得不到什么直接的、物质的回报。只有当我们把这些行动看作是建构、巩固权力的一部分,这些行动才讲得通。一个妇女政策成为追求控制或实力的表达形式。在这些例子里,对性别差异的构想是通过对女人的统治和控制。这些例子使我们得以洞察现代历史中被建构起来的各种权力关系,但这种具体的关系形式不是一个普世性的政治主题。例如,20 世纪的民主政权也以不同的方式,运用社会性别化的概念建构其政治意识形态,并将其变为政策;比如说,福利国家的法律对家长制的保护是冲着妇女与儿童来的。[53]在历史上,一些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对控制的种种隐喻形式都采取完全拒绝的态度,它们颇具想象力地用对社会性别身份的改造,来表达对具体的政体或社会组织形式的批判。在 18 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构想了一个和谐的未来的理想,这个理想的表达是通过个人天性的互补,以男女结合为典型,男女是"社会的个体"。[54]众所周知,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拒绝传统的资产阶级婚姻,还展望了一个性别差异不意味着等级制的世界。

这些例子明显地反映了社会性别与权力之间的联系。但这只是我关于社会性别是指涉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这个定义的一部分。对社会性别的关注常常是不明显的,但是,它依然是组织平等与不平等关系的关

键部分。等级化的社会结构建立在对所谓的男女天然关系的理解上。在19世纪，阶级的概念也是通过社会性别来表述的。例如，在法国，中产阶级的改革家对工人的描绘是用那些被编码为女性化的词语（从属、软弱、像妓女一样受到性剥削）。而劳工和社会主义领导人则强调工人阶级的男性化地位（生产者、强壮、妻儿的保护者），来反击中产阶级。这些话语中的术语不一定明显地是关于社会性别，但是都依赖对社会性别的参照，通过对一些术语进行社会性别式的“编码”来建立它们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有历史具体性的、规约性的社会性别的定义被生产出来（这些定义被理解为是一种既定状态），被镶嵌进了法国工人阶级的文化中。[55]

传统的政治史学者总是拿战争、外交和国家安全等主题质疑社会性别对他们的工作的意义。但在这里，我们也需要不仅是考察行动者和他们所说的话的字面意思。国家间的权力关系，殖民地臣民的地位，这些都是通过与男女之间的关系的类比被理解的（同时这些关系也被合法化）。要使战争有合法性（要使为保护国家而牺牲年轻人的生命有合法性），常见的多种形式中或是直截了当地求助于男人身份（需要保护脆弱的妇女与儿童），或者是含蓄地依靠儿子有对领袖或（父）王效忠的责任的信仰，还有就是将男性特质和民族实力联系起来。[56]国家安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概念，因为它的重要性、公共权力，以及它拥有崇高权威的事实和原因，都建立在它把妇女排斥在外的前提上。在政治权力的构想、被合法化和被批评中，社会性别总是频繁地被涉及。政治权力不仅涉及了也建立了男女对立的意义。要维护政治权力，对社会性别的涉及必须显得确信无疑内涵稳定，是不属于人类建构的，而是自然的、神的秩序的一部分。这样，社会性别中的二元对立和社会性别关系的社会过程都成了权力意义本身的一部分；质疑或改变社会性别的任何方面，都会威胁整个体系。

如果社会性别和权力的指涉作用互相建构了对方，那变革如何发生呢？对这个问题的笼统回答是，变革可以在许多地方发生。大的政治动

乱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在寻求新的合法性形式时，这个过程可能会修改社会性别的术语和组织方式。但也可能是另外的结果：旧的观念也许反过来帮助确立新的政权。[57]由食物匮乏造成的人口危机、瘟疫，或者战争，可能使人们质疑异性恋婚姻的规约性看法（在20世纪20年代有些国家就是如此），但是这些事件也可能生发出鼓励生育的政策，主张妇女的母性和生育功能是唯一重要的东西。[58]就业模式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婚姻策略的变化，也可能导致主体性建构的多种可能。但是，新就业模式也可能变成尽职的妻女们的新的活动领域。[59]新出现的文化象征可能会重新解释或重新书写恋母情结的故事，但是，新的文化象征也可以用来以更明确的语汇去重新刻录那个糟糕的戏剧。政治过程会决定是何种结果出现。所谓政治，就是指不同的行动者、不同的意义在互相斗争，争夺控制权。这个过程的性质，以及这些行动者们行动的性质都将由其所处的具体的时间、空间来决定。只有认识到“男”和“女”都是既空洞又充溢的范畴，我们才能书写那个过程的历史。空洞，是指“男”与“女”两个概念都没有绝对的、超验的意义。充溢，是指即使在这两个概念看上去是被固定的时候，其内部仍然包含很多另类的、否定的或被抑制的定义。

在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史是在社会性别场域中被展现的。这个场域看似固定，实际上它的意义在不断斗争、不断流动中。如果我们把男与女之间的对立不是看作已知事实，而是作为一个疑问，作为由具体语境定义的，并不断被建构的，那么我们就必须不断追问，那些援引社会性别来解释或合理化自己的立场的各种宣言和辩论，其要害是什么？更要问，对社会性别心照不宣的理解是怎样被援用的？又是如何被重新刻录的？关于妇女的法律和国家的权力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妇女参与了大大小小的人类历史事件，但为什么（从何时起）作为历史主体却变得不可见？社会性别有没有为专业性职业的出现提供了合法性？[59]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不是也是性别化的（这句话模仿法国女权主义者露西·伊丽格瑞的一篇新发表的文章）？[61]国家政治和同性恋成为犯罪行为有什么关系？[62]社会

体制是如何把社会性别溶入到自己的假设和组织中的？有没有过真正平等的社会性别概念，并用这样的概念规划了政治制度，即使这样的政治制度尚没有被建立起来？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能构成一部新的历史，来提供新的视野去考察老的问题（例如关于政治统治是如何强加的，战争如何影响社会等），用新的术语重新定义老问题（例如在经济学或战争研究中引进对家庭和性存在的考虑），使妇女成为可见的积极参与者。还有，在看上去似乎是固定的历史语言和我们自己的研究术语间保持一个分析的距离。此外，这个新历史还会开启新的可能性，使我们能思考当前的女权主义政治策略和（乌托邦式的）未来，因为新历史表明，我们必须重新定义、重新建构社会性别，并把它和对政治、社会平等的愿景联系起来，这个愿景不仅包括性、也包括阶级和种族。

（本文发表于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No. 5. December 1986, pp. 1053－1075）

郑岩芳 译　王　政 校对

注释

1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61 年版），第四卷。
2 E. Littre, *Dictionaire de la langue francaise*（巴黎，1976）。
3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纽约，1983），第 285 页。
4 Natalia Zemon Davis, "Women's History in Transitions: The European Case", *Feminist Studies*，第 3 期（1975－1976 冬），第 90 页。
5 Ann D. Gordon、Mari Jo Buhle 与 Nancy Shrom Dye, "The Problem of Women's History", 见 *Liberaing Women's History*（厄本那，插图版，1976），Berenice Carroll 编，第 89 页。
6 最好及最微妙的例子可参见 Joan Kelly 所著 *Women, History and Theory*（芝加哥，1984）一书中的"The Problem of Women's History"，第 51－64 页，特别是第 61 页。

7 关于对近期有关妇女历史的著作的综述，可参见"Women's History; The Modern Period"，Joan W. Scott，*Past and Present*，第 101 期（1983），第 141 - 157 页。

8 有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是对性差异的社会意义的强调，因此反对使用社会性别一词。参见"A Critique of the Sex/Gender Distinction"，Moira Gatens; *Beyond Marxism? Interventions after Marx*（悉尼，1983），J. Allen、P. Patton 编，第 143 -160 页。

9 关于以某些不同方法进行的女权主义分析，参见 Linda J. Nicholson，*Gender and History: The Limits of Social Theory in the Age of the Family*（纽约，1986）。

10 Mary O'Brien，*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伦敦，1981），第 8 - 15 页，第 46 页。

11 Shulamith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纽约，1970）。短语"痛苦的陷阱"，bitter trap，来自于 O'Brien 所著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第 8 页。

12 Catherine Mckinnon，"Feminism，Marxism，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Signs*，第七期（1982 年春），第 515 页，第 541 页。

13 同上，第 541 页，第 543 页。

14 关于对"父权制"一词的优劣所做的讨论，参见历史学家 Shelia Rowbotham、Sally Alexander 与 Barbara Taylor 三人之间的讨论，*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伦敦，1981），Raphael Samuel 编，第 363 - 373 页。

15 Frederick Engels，*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and the State*（1884；再版，纽约，1972）。

16 Heidi Hartmann，"Capitalism，Patriarchy，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Signs*，第一期（1976 春），第 168 页。同时参考"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Capital and Class*，第八期（1979 年夏季刊），第 1 - 33 页；"The Family as the Locus of Gender，Class，and Political Struggle: The Example of Housework"，*Signs*，第六期（1981 年春），第 366 - 394 页。

17 有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讨论包括以下文章：Zillah Eisenstein，*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纽约，1979）；A. Kuhn，*Structures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in the Family*，*Feminism and Materialism*（伦敦，1978），A. Kuhn、A. Wolpe 编；Rosalind Coward，*Patriarchal Precedents*（伦敦，1983）；Hilda Scott，*Does Socialism Liberate Women?*（波士顿，1974）；Jane Humphries，"Working Class Family，Women's Liber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Histor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第九期（1977），第 25 - 41 页；Jane Humphries，"Class Struggl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Working Class Famil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第十二期（1971），第 241 - 258 页。同时参见关于 Humphries 文章的相关讨论，见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第十二期（1980 年夏），第 76 - 94 页。

18 Kelly，*Double Vision of Feminist Theory*，第 61 页。

19 Ann Snitow、Christine Stansell 与 Sharon Thompson 编，*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纽约，1983）。

20 Ellen Ross 与 Rayna Rapp，"Sex and Society: A Research Note from Social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Powers of Desire*，第 53 页。

21 "Introduction"，*Powers of Desire*，第 12 页；Jessica Benjamin，"Master and Slave: The Fantasy of Erotic Domination"，*Powers of Desire*，第 297 页。

22 Johanna Brenner 与 Maria Ramas，"Rethinking Women's Oppression"，*New Left Review*，第 144 期（3、4 月刊，1984），第 33 - 71 页；Michele Barrett，"Rethinking Women's Oppression: A Reply to Brenner and Ramas"，*New Left Review*，第 146 期（7、8 月刊，1984），第 123 - 128 页；Angela Weir 与 Elizabeth Wilson，"The British Women's Movement"，*New Left Review*，第 148 期（11、12 月刊，1984），第 74 - 103 页；Michele Barrett，"A Response to Weir and Wilson"，*New Left Review*，第 150 期（3、4 月刊，1984），第 143 - 147 页；Jane Lewis，"The Debate on Sex and Class"，*New Left Review*，第 149 期（1、2 月刊，1985），第 108 -120 页。同时参阅 Hugh Armstrong 与 Pat Armstrong，"Beyond Sexless Class and Classless Sex: Towards Feminist Marxism"，*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第十期（1983 年冬），第 7 - 44 页；Hugh Armstrong 与 Pat Armstrong，"Comments: More on Marxist Feminism"，*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第十五期（秋季刊，1984），第 179 - 184 页；Jane Jenson，"Gender and Reproduction"；or，"Babies and the State"，未发表文章，1985 年 6 月，第 1 - 7 页。

23 关于早期相关理论论述，参见 Papers on Patriarchy：伦敦 1976 年会议（伦敦，1976）。感谢 Jane Caplan 告诉我这本会议论文集已经出版，并感谢她和我分享她的论文以及她的观点。关于精神分析角度的分析，参见 Sally Alexander，"Women，Class，and Sexual Difference"，*History Workshop*，第十七期（1984 年春），第 125 - 135 页。1986 年初，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Juliet Mitchell 似乎重新开始强调对社会性别的唯物主义分析的重要性。关于如何走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析的理论困境的讨论，参见 Coward，*Patriarchal Precedents*。同时参见在这一方向来自美国的卓越的贡献，Gayle Rubin，"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Rayna R. Reiter 编，*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纽约，1975），第 167 - 168 页。

24 Nancy Chodorow，*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伯克利，加利福尼亚，1978），第 169 页。

25 "我的论述试图说明，这些与社会性别相关的问题可能在恋母情结时期就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恋母情结的唯一的焦点或结果。这些问题的博弈发生在更广泛的对象—关系过程与自我形成过程之中。这些更广泛的过程对男人、女人的心理结构形成、精神生活与关系模式都有同等的影响。对于心理分析学家所描述的较不对称的恋母情结问题，这些过程可以解释身份认同和异性恋倾

向的差异性模式的原因。和较传统的恋母情结后果一样，上述这些结果的产生也是因为家庭中父母亲职能的组织的不对称，妈妈是最重要的，父亲总是疏远得多，父亲主要的投入是在孩子的社会化，特别是在一些社会性别特征形成的领域。"Chodorow，*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第 166 页。必须指出，在解释与方法上，Chodorow 与英国对象—关系理论家存在区别。英国对象—关系理论家接受 D. W. Winicott 与 Melanie Klein 的理论。Chodorow 的方法最大的特点是更加社会学，运用更社会学的理论。她的方法是美国女权主义者的主要的方法。关于英国对象—关系理论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参见 Denise Riley，*War in the Nursery*（伦敦，1984）。

26 Juliet Mitchell 与 Jacqueline Rose 编，*Jacques Lacan and the Ecole Freudienne*（伦敦，1983）；Alexander，*Women*，*Class*，*and Sexual Difference*。

27 Teresa de Lauretis，*Alice Doesn't*：*Feminism*，*Semiotics*，*Cinema*（布鲁明顿，1984），第 159 页。

28 Alexander，*Women*，*Class and Sexual Difference*，第 135 页。

29 Dense Riley，"Summary of Preamble to Interwar Feminist History Work"，未发表论文，彭布罗克中心研讨会，1985 年 5 月，第 11 页。

30 Carol Gilligan，*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麻省剑桥，1982）。

31 一些有用的对 Gilligan 著作的批评见于：J. Auerbach 等，"Commentary on Gilligan's *In a Different Voice*"，*Feminist Studies*，第 11 期（1985 年春）；"Women and Morality"，*Social Research* 特刊，第五十期（1983 年秋）。我对历史学家援引 Gilligan 的趋势的分析来自于我阅读的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和项目申请书，在这里引用这些文献多有不便。五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些资料，这些资料的数量不但很大，而且逐年增长。

32 *Feminist Studies*，第六期（1980 年春），第 26－64 页。

33 通过"解构"一词，我意图提出德里达的讨论，这个讨论虽然不是发明了它所描述的分析程序，但是它的确将这个分析的过程理论化，使其成为一种有益的分析方法。关于对德里达的明晰的讨论，见 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伊萨卡，纽约，1982），特别是第 156－179 页。同时可参见 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巴尔的摩，1976）；Jacques Derrida，*Spurs*（芝加哥，1979）；另见彭布罗克中心研讨会的会议记录，1983，发表于 *Subject/Objects*（1984 年秋）。

34 Clifford Geertz，"Blurred Genres"，*American Scholar*，第四十九期（1980 年 10 月），第 165－179 页。

35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The Uses and Abuses of Anthropology：Reflections on Feminism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Signs*，第五期（1980 年春），第 400 页。

36 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卷，*An Introduction*（纽约，

1980)；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纽约，1980)。

37 关于这个讨论，参见 Rubin，"Traffic in Women"，第 99 页。

38 Rubin，"Traffic in Women"，第 189 页。

39 Biddy Martin，"Feminism，Criticism and Foucault"，*New German Critique*，第二十七期(1982 年秋)，第 3－30 页；Kathryn Kish Sklar，*Catharine Beecher：A Study in American Domesticity*(纽黑文，康涅狄格州，1973)；Mary A. Hill，*Charlotte Perkins Gilman：The Making of a Radical Feminist，1860－1896*(费城，1980)。

40 Lou Ratte，"Gender Ambivalence in the Indian Nationalist Movement"，未发表论文，彭布罗克中心研讨会，1983 年春；以及 Mrinalini Sinha，"Manliness：A Victorian Ideal and the British Imperial Elite in India"，未发表论文，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1984。

41 Pierre Bourdieu，*Les Sens Pratique*(巴黎，1980)，第 246－247 页，第 333－461 页，特别是 366 页。

42 Maurice Godelier，"The Origins of Male Domination"，*New Left Review*，第 127 期(5、6 月刊，1981)，第 17 页。

43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Critical Inquiry*，第 12 期(秋季刊，1985)，第 243－246 页。参见 Kate Millett，*Sexual Politics*(纽约，1969)。Luce Irigaray 在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en*(伊萨卡，纽约，1985)一书中，分析了西方哲学主要著述中女性化指涉的运用。

44 Natalie Zemon Davis，"Women on Top"，选自其著作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斯坦福，加利福尼亚，1975)，第 124－151 页。

45 Caroline Walker Bynum，Jesus as Mother：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High Middle Age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1982)；Caroline Walker Bynum，"Fast，feast，and Flesh：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ood to Medieval Women"，*Representations*，第十一期(1985-年夏)，第 1－25 页；Caroline Walker Bynum，"Introduction"，*Religion and Gender：Essays on the Complexity of Symbols*(即将出版，Beacon Press，1987)。

46 例如 T. J. Clarke，*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纽约，1985)。

47 在这个问题上，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待各种差异范畴的看法有多大的开放程度。由于后结构主义者们对于差异的各种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安置一个普世性的意义，他们的方法更能够传达我所提倡的历史分析。

48 Rachel Weil，"The Crown Has Fallen to the Distaff：Gende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tharine de Medici"，*Critical Matrix*(Princeton Working Papers in Women's Studies)，第一期(1985)。同时参见 Louis Montrose，"Shaping Fantasies：Figurations of Gender and Power in Elizabeth Culture"，*Representations*，第二期(1983 春)，第

61 -94 页;以及 Lynn Hunt, "Hercules and the Radical Imag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s*,第二期(1983 年春),第 95 - 117 页。

49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1892;再版,纽约,1909),第 208 - 209 页,第 214 页。参见 Jean Bodin,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1606;再版,纽约,1967);Robert Filmer, *Patriarcha and Other Political Works*, Peter Laslett 编(牛津,1949);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690;再版,剑桥,1970)。同时参见 Elizabeth Fox-Genovese, "Property and Patriarchy in Classical Bourgeois Political The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第四期(1977 年春夏),第 36 - 59 页;Mary Lyndon Shanley, "Marriage Contract and Social Contrac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第三十二期(1979 年 3 月),第 79 - 91 页。

50 感谢 Bernard Lewis 关于伊斯兰的介绍。Michel Foucault, *Historie de la Sexualite*,第二卷,*L'Usage des plaisirs*(巴黎,1984)。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社会性别身份是怎样的,福柯理论是否可以解释这种身份的建构过程,这些都是笔者发出疑问的地方。关于古雅典的妇女情况,参见 Marilyn Arthur, "Liberated Woman: The Classical Era",选自 Renate Bridenthal 与 Claudia Koonz 编, *Becoming Visible*(波士顿,1976),第 75 - 78 页。

51 引自 Roderick Phillips, "Women and Family Breakdow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Rouen 1780 - 1800",*Social History*(1976 年 5 月),第 217 页。

52 关于法国大革命,参见 Darlene Gay Levy, Harriet Applewhite 与 Mary Johnson 编,*Women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 - 1795(厄本那,插图版,1979),第 209 - 220 页;关于苏联相关法规制度,参见 Rudolph Schlesinger, The Family in the USSR: Documents and Readings(伦敦,1949),第 62 - 71 页,251 - 254 页;关于纳粹的政策,参见 Tim Mason, "Women in Nazi Germany", *History Workshop*,第 1 期(1976 年春),第 74 - 113 页,以及 Tim Mason, "Women in Germany, 1925 - 1940: Family, Welfare and Work", *History Workshop*,第 2 期(1976 年秋),第 5 -32 页。

53 Elizabeth Wilson, *Women and the Welfare State*(伦敦,1977);Jane Jenson, "Gender and Reproduction";Jane Lewis,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Child and Material Welfare in England 1900 - 1939*(蒙特利尔,1980);Mary Lynn McDougall, "Protecting Infants: The French campaign for Maternity Leaves, 1890s - 1913",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第 13 期(1983),第 79 - 105 页。

54 关于英国乌托邦主义者,参见 Barbara Taylor, *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纽约,1983);关于法国,参见 Joan W. Scott, "Men and Women in the Parisian Garment Trades: Discussions of Family and Work in the 1830s and 40s",选自 Pat Thane 等编, *The Power of the Past: Essays for Eric Hobsbawm*(剑桥,1984),第 67 - 94 页。

55 Louis Devance, "Femme, Famille, travail et morale sexuelle dans l'ideologie de 1848",选自 *Mythes et representations de la femme au XIX siecle*(巴黎,1976); Jacques Ranciere 与 Pierre Vauday, "En allant a l'expo: l'ouvrier, sa femme et les machines", *Les Revoltes Logiques*,第一期(1975 年冬),第 5 - 22 页。

56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Draupadi' by Mahasveta Devi", *Critical Inquiry*,第八期(1981 年冬),第 381 - 390 页;Homi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October*, 第二十八期(1984 年春),第 125 - 133 页;Karin Hausen, "The Nation's Obligations to the Heroes' Widows of World War I",选自 Margaret R. Higonnet 等编,*Women, War and History*(纽黑文,康涅狄格,1986)。同时参见 Ken Ingl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on Australian War Memorials",未发表文章,贝拉吉奥社会性别、科技与教育会议,1985 年 10 月。

57 关于法国大革命,参见 Levy, *Women in Revolutionary Pari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参见 Beth Norton, *Liberty's Daughters*: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en*(波士顿,1980); Linda Kerber, *Women of the Republic*(北卡罗纳大学教堂山,1980); Joan Hoff-Wilson, "The Illusion of Change: Wome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文章见于 Alfred Young 编,*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迪卡尔布,1976),第 383 - 446 页。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参见 Steven Hause, *Women's Suffrage and Social Politics in the French Third Republic*(普林斯顿,纽约,1984)。Maxine Molyneux 的研究是关于最近一个个案的非常有趣的分析,见 Maxine Molyneux, "Mobilization without Emancipation? Women's Interests,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Nicaragua", *Feminist Studies*,第十一期(1985 年夏),第 227 - 254 页。

58 关于鼓励生育,参见 Riley, *War in the Nursery*;以及 Jenson, "Gender and Reproduction"。关于 20 年代,参见 *Strategies des Femmes*(巴黎,1984)中的文章。

59 关于对新工作给妇女带来的影响的形形色色的分析,见 Louise A. Tilly 与 Joan W. Scott, *Women, Work and Family*(纽约,1978); Thomas Dublin, *Women at Work*: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Community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1826 - 1860(纽约,1979);以及 Edward Shorter,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纽约,1975)。

60 例如 Margaret Rossiter, *Women Scientists in America*: *Struggles and Strategies to 1914*(巴尔的摩,马里兰,1982)。

61 Luce Irigaray, "Is the Subject of Science Sexed?" *Cultural Critique*,第一期(秋季刊,1985),第 73 - 88 页。

62 Louis Crompton, *Byron and Greek Love*: *Homophobia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伯克利,加利福尼亚,1985)。这个问题在 Jeffrey Weeks 著,*Sex, Politics and Society*(纽约,1983)一书中也有论述。

霸权男性特质：针对此概念的再思考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R. W. 康瑞文　詹姆士·梅瑟施密特
(R. W. Connell and James W. Messerschmidt)[1]

概要：

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不仅影响了许多学术领域的社会性别研究，而且引发了严肃的批评。本文作者追溯了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初如何出现在各种观点的交汇当中，描绘了当男性研究和男性特质的研究不断扩展时，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应用的。作者评价了针对这个概念的主要批评，为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当中所包含的“男性特质”这一概念进行了辩护。他们指出，大部分研究对这概念的使用，既非把抽象概念当成具体事物来对待，又非本质化的。然而，作者承认，那些针对社会性别特征分析模型和僵化的类型归纳的批评是合理的。最近发展的心理学模型，可以使对霸权男性特质研究得以提高，尽管我们必须认识到话语的灵活性

〔1〕本文作者之一R. W. Connell现用名Raewyn Connell。康奈尔现为女性。在本译文集收入的这些原作发表时，康奈尔是男性。本译文集其他文章中提及康奈尔的原名，或用阳性人称代词“他”以及参考书目中出现R. W. Connell的名字，我们一律遵照原文。——编者注

是有限的。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并不等同于一个社会再生产的模型;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社会斗争中,多种从属性的男性特质也会影响占主导地位的霸权男性特质。最后,作者回顾了早先对这个概念的阐述中值得肯定的内容(包括男性特质的多样性的认识,霸权的概念,以及对变化的强调),并指出其中有哪些内容是需要被摒弃的(比如,对等级过于简单的认识,通过人的特征来理解社会性别)。作者建议从四个方面来重新阐述这个概念:建立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别等级分析模型以强调妇女的能动性;对男性特质的分布有一个明确认识,强调地方的、区域的和全球层面之间的互动;要在特权和权力的分析框架中更具体地讨论身体体现(embodiment)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强调霸权男性特质动态性,使得我们认清其内部的各种矛盾,以及向社会性别民主(gender democracy)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产生于20年前的霸权男性特质(hegemonic masculinity)这一概念,对近年来关于男人、社会性别和社会等级的思考有着很大的影响。而正在成长中的多个领域的研究——男性研究(也被称为男性特质研究和男性批评研究),男人和男孩的各种普遍焦虑,女权主义者对父权制的分析,社会性别的社会学模型——之间就是由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它也被用于教育、反暴力工作、健康和咨询等应用性领域。

数据库检索显示,有200多篇文章在其题目或摘要中一字不差地使用了"霸权男性特质"这个术语。使用了变通的提法,或在正文中提到"霸权男性特质"的文章则有好几百篇。各种学会的内容也显示了人们对这个概念持续的兴趣。比如2005年5月初,在英格兰曼彻斯特大学召开了一次名为"霸权男性特质与国际政治"的大会;2004年斯图加特召开的一次跨学科大会,旨在探讨"霸权男性特质"的主题(Dinges, RundaL and Bauer, 2004)。

然而这个概念也引起了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后结构主义者和唯物主

义者(如 Demetriou, 2001; Wetherell and Edley, 1999)等几个方向的严肃批评。在学术领域之外,它被攻击为——引用最近在互联网上一个报复性的帖子——一心要证明男人太大男子气的、"新时代心理学家的发明"。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对研究当前关于权力与政治领导、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暴力,以及家庭与性存在的变化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对霸权男性特质概念的全面重新审视应该是有价值的。如果这个概念被证明仍然有用,那它必须以当代的术语加以重新阐述。我们在本文中试图完成这两项任务。

起源、形成及应用

起源

霸权男性特质概念首次在几个场合提出:关于澳大利亚高中的社会不平等情况做的一些调查研究报告(Kessler 等,1982),一个与此相关的针对男性特质构成和男性身体体验的相关概念讨论(Connell, 1983),以及一场关于男人在澳大利亚劳工政治中作用的争论(Connell, 1982)。那个高中研究项目提供了有关多种等级制的具体证据——用社会性别以及阶级的术语——这些等级制与社会性别建构的种种活动交织在一起(Connell 等,1982)。

这些初始论述在"走向男性特质的新社会学"一文中(Carrigan, Connell and Lee, 1985)得到系统归纳。该文全面批评了"男性角色"研究并提出了一个多种男性特质和权力关系的分析模式。然后,这个模式被纳入一个系统的、关于社会性别的社会学理论。《社会性别与权力》(Connell, 1987)[1]这部著作中有六页关于"霸权的男性特质和被提倡的

〔1〕 *Gender and Power* (Connell, 1987)。——译注

女性特质"的内容,就是这样来的,结果这就成为被引用得最多的有关"霸权男性特质"的文献。

澳大利亚的这个研究小组对这个概念的阐述,代表了对各种不同来源的观点和证据进行综合的结果。但观点的汇聚并不是出于偶然。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和活动家也在把密切相关的问题放在一起思考。可以说,当时做这种综合分析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这个概念最基本的来源是女权主义关于父权制的理论,以及对改造父权制过程中男人所起作用的相关争论(Goode, 1982; Snodgrass, 1977)。新左翼阵营当中的一些男人,试着组织起来支持女权主义,这种尝试又使人们开始注意具有阶级差异的男性特质的表达(Tolson, 1977)。此外,非白人妇女——如玛可欣·芭克莎·秦(Maxine Baxa Zinn, 1982),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 1983)和贝儿·胡克斯(Bell Hooks[1], 1984)——批评道,如果仅仅就性别差异来思考"权力",其实就是种族偏见。这些批评为质疑关于"男人"这个范畴的任何普世性论断奠定了基础。

那时,研究者试图理解阶级关系是如何稳定下来的(Connell, 1977),正值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风靡之时。在二重体系理论(dual systems theory)的情境中(Eisenstein, 1979),"霸权"很容易地就被移用到类似的社会性别关系的问题上。这很有可能就造成错误理解。葛兰西的著作关注的是,牵扯到整个阶级的动员与瓦解的结构性变化的动态过程。如果没有一个极其明确的对历史变化的关注,霸权的观点就会被简化为一个文化控制的简单模式。在大量关于社会性别的讨论中,大规模的历史变化未成为关注重点。这是后来霸权男性特质这个概念难以解决某些问题的原由之一。

即使在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关于"男性角色"(male sex role)的社会心

[1] Gloria Jean Watkins 的笔名。她坚持自己的姓名以英文小写字母开头。——译注

理学和社会学著作就已经认识到,男性特质的社会本质和男人行为的变化有各种可能性(Hacker, 1957)。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出现了大量关于“男性角色”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用角色规范来理解男人从事压迫行为的理论(Brannon, 1976)。更具批判性的角色理论,为早期反性别歧视的男人的活动实践提供了主要概念基础。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性别角色理论的弱点(Kimmel, 1987; Pleck, 1981),其中包括“行为”和“规范”这样的语言的模糊使用、角色的概念往往抹杀差异,以及在解释“权力”时的困难。

另一方面,在当时,权力(power)与差异(difference)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两个核心概念;这一运动发展出有关男人遭受压迫、男人实施压迫的复杂细致的分析(Altman, 1972)。一些理论家认为,同性恋解放与批判社会性别刻板印象是紧密相关的(Mieli, 1980)。男性特质有等级划分。这一观点,从同性恋男人关于异性恋男人对他们的暴力和偏见的体验中直接发展而来。“同性恋恐惧”(homophobia)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认为它的根源是传统男性角色(Morin and Garfinkle, 1978)。针对同性恋男人与父权制、主流男性特质之间的矛盾关系,理论家们也发展出越来越细致的描述和解释(Broker, 1976; Plummer, 1981)。

这个概念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基础是具体的社会研究。越来越多的田野调查研究记录了在学校里(Willis, 1977)、在男人占主导的工作中(Cockburn, 1983)以及在乡村社区中(Herdt, 1981; Hunt, 1980)的地方性社会性别等级和男性特质的地方性文化。这些研究增加了有关性别角色的研究成果中所缺乏的民族志方法的现实性,确认了男性特质的多样性和男人的社会性别建构的复杂性,并为葛兰西“霸权”概念中所隐含的重要观点——即,为争取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是存在的——提供了证据。

最后,这个概念还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弗洛伊德自己撰著了第一部对男人的分析型传记,并通过“狼人”的个案史证明,成人性格是一种

处于紧张状态下的系统，它的对抗因素虽然被压制着但是无法被彻底去除（Freud [1917]，1955）。精神分析学家斯托勒（Stoller，1968）使得"社会性别身份"的概念流行起来，并描绘了它在男孩成长中的种种变异，特别是导致变性的种种变异。同样受精神分析学影响，另外一些学者开始研究男人的权力、社会性别发展过程有哪些可能性，以及主流男性特质内部的张力和矛盾等主题（Friedman and Lerner，1986；Zaretsky，1975）。

形成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上述这些复杂的情况之下，在政治社会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用社会性别语汇表达出来的很相似的研究：权力结构的研究重点是占支配地位的那个群体。霸权男性特质被理解为一种实践模式（即被做出来的事情，而不仅是一套角色期待或一个身份），这种实践模式使得男人对女人的支配得以继续。

这样的研究把霸权男性特质与其他男性特质区分开，特别是与从属性男性特质（subordinated masculinities）区别开。在统计学意义上，霸权男性特质并不被认为是"标准的"，因为只有少数男人可能会实践它。但它绝对是规范性的。它体现了作为男人最荣耀的方式，它要求所有其他男人据此对自己进行定位，它还在意识形态上为所有的女人服从于男人提供着正当性依据。

有些男人从父权制中得到利益，但并没有实行强势的男性统治，他们可以被看作是显示出共谋性男性特质（complicit masculinity）。正是因涉及了这个共谋群体以及异性恋女人的顺从，"霸权"的概念才最有用。霸权并不意味着暴力，尽管它可以被强制力量所支持；它意味的是通过文化、制度和规劝来实现的支配。

上述这些概念是抽象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是依据父权的社会性别制度逻辑来界定的。它们把社会性别关系看成是历史现象，因此社会性别等级是会变化的。因而，各种霸权男性特质是存在于特定条件下的，会随

历史发展而变化。更准确地说,对霸权的争夺是可能的,各种旧形式的男性特质可能会被一些新的取代。本来这个理论整体是悲观的,这可能是其中的一点乐观要素吧。也许有一种可能:一种更加人道的、较少压迫性的男人存在方式成为霸权性的;这会是走向最终废除社会性别等级的过程的一部分。

应用

霸权男性特质这一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很快找到了用处。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通过一系列学术会议、教科书(如Brod,1987)和一些学术性期刊的出版,以及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迅速扩展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关于男人和男性特质的研究被巩固成为一门学术领域。

其中,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被应用于教育研究,帮助理解课堂生活的动态关系,包括男孩子们当中抵抗和恃强蹦弱的模式。它还被用来探索课程设置的影响和中性教学法遇到的困难(Martino, 1995)。另外,这一概念还被用于理解教师采取的策略和教师身份,比如在体育老师这样的群体中(Skelton, 1993)。

这个概念也影响了犯罪学。所有数据都反映,在一般犯罪中,男人和男孩比女人和女孩数量多且性质更严重。此外,在集团犯罪和白领犯罪中,男性也占绝对数量优势。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有助于将各种男性特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犯罪之间的联系进行理论化(Messerschmidt, 1993);另外它还被用于对男孩和男人某些特定犯罪的研究,如瑞士的强奸犯罪,澳大利亚的谋杀犯罪,英格兰的"足球流氓"和白领犯罪,以及美国的攻击性暴力(Newburn and Stanko, 1994)。

这个概念还被用于研究媒体对男人的再表现,如体育和战争象征的相互作用(Jansen and Sabo, 1994)。因为霸权的概念有助于理解大众传媒中形象的多样性和选择性,媒体研究者开始标识不同男性特质再表现

之间的关系(Hanke, 1992)。商业体育是媒体对男性特质再表现的一个重点,正在发展中的体育社会学专业也大量地运用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Messner, 1992)。它还被用于研究身体对抗性体育运动的普及流行——这类运动是不断更新的男性特质的象征;它也被用于考察体育领域当中普遍发生的暴力和同性恋恐惧(Messener and Sabo, 1990)。

影响男人健康的社会因素已经在早些时候被提出,但因性别角色的概念过于松散而没什么用处。多样的男性特质和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理解男人的健康实践,比如"玩命"和高风险的性行为(Sabo and Gordon, 1995)。霸权性男性特质和从属性男性特质的概念不仅有助于理解为何男性易遭风险,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男性为何难以应对残疾和伤病(Gerschick and Miller, 1994)。

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官僚机构和工作场所的社会性别特点,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在对组织机构的研究中也被证明非常重要。民族志和访谈研究追溯了某些组织中各种霸权男性特质的制度化过程(Cheng, 1996; Cockburn, 1991)以及这些霸权男性特质在组织机构的决策制定中的作用(Messerschmidt, 1995)。这类研究的一个特别关注是军队,不过虽然军队中霸权男性特质的具体模式早已确立,他们越来越成问题(Barrett, 1996)。

涉及男人和男孩的专业实践的探讨也借助了这个概念。这些实践包括男人的心理治疗(Kupers, 1993)、针对年轻人的预防暴力项目(Denborough, 1996),以及对男孩的情绪教育项目(Salisbury and Jackson, 1996)。

这些是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自形成以来所应用的主要领域。但除此之外它还有着更广泛的应用。例如,在对艺术的探讨中(Belton, 1995),在一些学术领域如地理学(Berg, 1994)和法学(Thornton, 1989),以及关于男人的社会性别政治及其与女权主义的关系这样的广泛探讨中(Segal, 1990)。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多样的男性特质的分析和

霸权男性特质这一概念,取代了性别角色理论和父权制范畴模式,成为发展关于男人和男性特质研究的主要框架。

最终,这些不断壮大的研究带来了对这个概念本身的扩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丰富了它:描述霸权有哪些后果和代价;揭示霸权的各种机制;显示男性特质更丰富的多样性;追溯各种霸权男性特质的变化。

就霸权的代价和后果而言,对犯罪学的研究揭示某些形式的攻击性行为是如何与霸权男性特质相关联的——这种关联不是霸权男性特质导致的机械性结果,而是通过对霸权的追求而形成(Bufkin, 1999; Messserschmidt, 1997)。另外,梅斯那(Messner, 1992)的开创性研究显示,霸权男性特质在职业体育中的展现,不仅复制着严格的等级制,同时也令胜利者付出巨大代价,使其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损害。

揭示霸权的各种运行机制的研究也成果斐然。某些运行机制是易于看到的,如在电视体育报道中展示的男性特质的"盛典"(Sabo and Jansen, 1992),以及罗博兹(Roberts, 1993)称之为针对从属群体的"训斥"的社会机制——包括孩子之间随便的称呼外号、将同性恋行为犯罪化等。而其他一些霸权机制的运行则是无形的,使得某一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特质的形式不具有被谴责的可能性(Brown, 1999)。康撒尔沃(Consalvo, 2003)考察了有关科伦拜校园事件[1]的媒体报道中指出,男性特质的问题被划到这些报道的考察范围之外,结果媒体只能将枪手描绘为"怪物"。

国际上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早期洞见,即,社会性别秩序建构着多种男性特质。瓦尔德和奥拉瓦里亚(Valdes and Olavarria, 1998)的研究显示,即使是在智利这样文化上单一的国家,男性特质也不是单一的,因为其模式因阶级和世代有所不同。在另一个著名的单一文化的国家,日

[1] Columbine High School massacre。1999 年 4 月 20 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美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校园枪杀事件之一。两个男生枪杀了 12 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并造成 24 人受伤。——译注

本，石井-昆慈（Ishii-Kuntz，2003）追溯了最近社会历史中“多样的男性特质的出现”；作者认为育儿实践的变化是其关键的一个发展。另外研究者也发现男性特质的多样化出现在某些特定组织机构中，如军队（Higate，2003）。

古特曼（Gutmann，1996）曾经做过一个极为出色的有关男性特质的现代民族志考察。他研究了一个有着明确界定的公共男性特质身份——墨西哥式“大男子气概”（machismo）。他阐述了大男子气概的形象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个形象与墨西哥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如何交织在一起，结果它使得人们无法意识到墨西哥男人实际生活是极具复杂性的。古特曼在他所研究的城市工人社区梳理出四种男性特质的模式；他强调，即使这四种模式也与其他社会类别群体交叉影响，在日常生活中被不断地调整。

最后，还有不少研究表明，各种男性特质不仅有区别，而且它们不断变化。对于霸权的挑战是普遍的，而应对这些挑战的调整也很普遍。莫瑞尔（Morrell，1998）收集了很多证据说明在南部非洲，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社会性别也发生了变化；种族隔离制度也是既有隔离又互相竞争的多种父权制度。佛古森（Ferguson，2001）追溯了爱尔兰那些历史悠久的男性特质典范的衰落——这些典范包括终身不婚的神父和辛勤工作的顾家男人；取而代之的，是更“现代化的”和市场导向的一些男性特质模式。达斯古普塔（Dasgupta，2000）追溯了日本男性特质的典型——“白领男人”，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泡沫经济”后，一种“逃避的白领男人”的文化形象出现了。塔戈（Taga，2003）记录了日本年轻中产阶级男人对于变化的多样反应，其中包括与女人建立各种新的家庭伙伴关系。缪塞尔（Meuser，2003）回顾了在德国的世代变化，认为其部分原因是男人在应对女人身上的变化。许多（尽管不是全部）年轻男人现在希望女人抛弃父权制的社会关系，他们正在构建一种他们自己的“实用平等主义”。莫里斯和埃文斯（Morris and Evans，2001）对英国乡村男性特质和女性

特质形象的研究,也发现了霸权男性特质的再表现虽然变化节奏放慢,但却日益变得更微妙和分散。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从最初建立在比较狭窄的具体研究基础上的一个概念模式,发展为研究和讨论男人与男性特质的最为广泛使用的框架。这个概念被应用于不同的文化情境中,被用来研究很宽范围内的实际问题。因此这个概念招致了一些批评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些批评。

批　评

关于这个概念的争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研究者们主要提出了五种批评。在这一部分,我们依次评价每种批评,希望能发现在早先提出的霸权男性特质这一概念中什么值得保留、什么现在需要重新阐述。

(霸权男性特质当中的)男性特质概念

从两个不同观点出发,有些人批评男性特质的基本概念有缺陷。这两个视角是:实在论的(realist)[1]和后结构主义的。柯林森和荷恩(Collinson and Hearn, 1994)以及荷恩(Hearn, 1996, 2004)的批评认为,男性特质这一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其含义上是不确定的,还倾向于忽视权力和统治问题的重要性。它对于理解和挑战男人权力来说,最终并非必要的。同时,他们认为,男性特质多样性(multiple masculinities)的概念会产生一些教条的固定分类。

彼特森(Petersen 1998,2003)、柯里尔(Collier, 1998)和马克因斯(MacInnes, 1998)认为,男性特质这个概念的缺陷,来自于它将男人的性格本质化,或将一个虚假的统一强加于一个动态的并且充满矛盾的现实

[1] realism在某些领域可译为“现实主义”。这里取其在哲学和一般社会科学中的译法。——译注

之上。持这个基本观点的，其中有些批评了男性特质研究，是因为这些研究没有采用具体的后结构主义工具，例如，没有强调身份的话语建构(Whitehead, 2002)。还有学者批评，男性特质的概念建立在异性恋规范性的社会性别定义框架中，这种框架把男女差异本质化，并忽视了社会性别范畴内部的差异和排他性。他们认为，男性特质这一概念的逻辑基础，是把性(生物意义的)和社会性别(文化意义的)建立为二元对立，因而将身体边缘化或自然化。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人都不会否认，在关于男性特质的众多研究文献中，有大量的概念性混淆和本质化倾向。在大众心理学、神话诗性男性运动中，以及关于生物意义上性别差异研究的新闻报道中，他们对男性特质的解释往往的确是这样的。然而，断言"男性特质"这个概念一定是混乱的或本质主义化的，或甚至认为研究者对这个概念这样混乱的运用很典型，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可以说，关于男性特质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之所以在过去20年得到了蓬勃发展，正是因为所应用的基本概念并没有被具体真实化或被本质主义化。如果认为男性特质概念具有本质化或同质化的后果，这样的看法很难解释民族志学者和历史学家在这个概念的帮助下所记录的数量众多的多样化社会建构(Connell, 2003)。至于说到研究者对具有女性身体的人所展现的男性特质的探讨(Halberstam, 1998; Messerschmidt, 2004)，那就与本质主义更没有关系了。男性特质不是一种嵌于个人的身体或性格特征中的不变实体。男性特质是实践活动的各种组合，这些组合在社会行动中完成，因而由于具体社会环境中社会性别关系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有人认为对男性特质多样性的认识必然会导致一成不变的分类，这样的观点同样不能被现有研究的发展所支持。一个范式性的例子就是前面以及提到过的古特曼(Gutmann, 1996)的民族志研究。古特曼能够梳理出不同类型的男性特质——例如大男子气的和"怕老婆的"，认识到并

详细阐述了,这些男性特质不是单一的身份,而总是处在各种关系中,并常与其他社会区分和社会实践交错。华仁(Warren, 1997)对一所英国小学的考察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他发现了男性特质的不同建构,这些建构对课堂生活产生了影响,虽然许多男孩并不完全符合主要的类别;实际上,男孩们展示出对这些类别既依附又排斥的复杂关系。

有一种我们都已经熟悉的批评,认为社会性别的概念就是根植于异性恋规范的(Hawkesworth, 1997)。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批评(Scott, 1997)。如果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范畴模式的概念,那么这种批评则正确地指出了问题。但是,这个批评对关系性模式的社会性别概念(relational model of gender)(Connell, 2002; Walby, 1997)是无效的;对把社会性别的范畴建构作为考察对象的历史研究方法,上述批评也不合适。在霸权男性特质概念的发展过程中,男人之间的区分——特别是对同性恋男人的排斥和压迫——曾经是非常关键的问题(Carrigan, Connell, and Lee, 1985)。异性恋的监控,从那时起已经成为探讨霸权男性特质的一个主要题目。

有学者批评男性特质的概念将"身体"边缘化或自然化(因为他们假定,这个概念建立在性—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基础上),这可能是批评中最令人惊讶的了。说"令人惊讶",是因为身体与社会进程之间的互动从开始就是男性特质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初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的研究项目之一,是梅斯那(Messner, 1992)对职业运动员男性特质的阐述,他考察了运动员"将身体作为武器",及其对男人身体的长期损害作用。在残障情况下男性特质的建构(Gerschick and Miller, 1994)、劳动阶级男人的劳动的身体(Donaldson, 1991)、男人的健康与疾病(Sabo and Gordon, 1995),以及男孩之间的暴力(Messerschmidt, 2000),这些例子都可以证明:解释身体如何受到社会过程影响,是男性特质研究的主题。而在理论层面上,人们也探讨了"身体的新社会学"与男性特质建构之间的关联(如 Connell, 1995,第 2 章)。

然而，男性特质的概念无论是在研究还是在大众读物中，都有一种倾向，即：将男人和女人的体验二分对立。学者们的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正如布洛德(Brod, 1994)准确观察到的，在男性研究领域有一种倾向，就是假定“分离领域”的作用，仿佛女人不是分析中相关的一部分，因而在分析男性特质时仅仅考察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但正如布洛德同时指出的，这种倾向不是不可避免的。办法就是，坚持把社会性别作为关系性的概念——而不是抛弃社会性别或男性特质的概念。

模糊与重叠

对这个概念早期的批评，提出了“谁真正代表霸权男性特质”这一问题。我们都知道，许多拥有庞大社会权力的男人并不是理想男性特质的体现。另一方面，唐纳森(Donaldson, 1993)认为，那些被研究者视为具有霸权性的男性似乎并没有多少男性化的内容。他分析了康奈尔(Connell, 1990)描述的澳大利亚“铁人”冲浪运动冠军的例子，很流行的一个霸权男性特质典型。但这个地区性的霸权性身份，事实上不允许拥有它的年轻人做当地同伴们认为“很男人”的事情——肆无忌惮、炫耀卖弄、醉酒驾车、打架斗殴，以及捍卫自己的地位。

马丁(Martin, 1998)批评说，霸权男性特质这个概念导致了不规范应用。有时它指的是一个固定类型的男性特质，另一些时候指的是在某些时间和地点任何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特质类型。类似地，威瑟列尔和艾德里(Wetherell and Edley, 1999)指出，这个概念不能具体揭示，服从于霸权男性特质，在实践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怀特海德(Whitehead, 1998,58;2002,93)认为，究竟谁是具有霸权男性特质的男人——“是约翰·韦恩还是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迈克尔·泰森还是贝利？又或者，在不同的时候，他们都是？”——以及关于谁在实行霸权性实践的问题，这些都很混乱。

我们认为这些批评正确地指出了概念使用的含混。我们需要避免将

霸权男性特质作为一个固定的、超历史的模式使用。这种用法会违背社会性别的历史性,忽视男性特质的社会定义不断变化的大量证据。

但是在另一些方面,社会性别过程中的模糊性可能对认清一个霸权的运作机制是很重要的。设想在社会过程中,一个理想化的男性特质定义是如何构成的。在整个社会的层面(我们在下面的框架中会称之为"区域性的")传播着一些备受敬爱的男性行为模式,被教堂所提倡,被大众媒介所传讲,或者被国家所赞许。这些模式既涉及了,又以各种方式扭曲了日常生活中社会实践的现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政府对斯塔科汉诺夫(*Stakhanovite*)式产业工人的宣传,[1]那是以煤矿工人阿列克桑德尔·斯塔科汉诺夫(Aleksandr Stakhanov)命名的,表彰他在1935年开创了单日挖煤102吨的世界记录,引发了争破该项记录的大竞赛。这里被部分扭曲的事实是,那些"令人震惊的工人们"是在同事们大量的无名帮助下才达到这样的数字的。

因此,各种霸权男性特质的建构,并非一定与任何男人的实际生活密切对应。但这些模式的确以多种方式表达出被广泛传播的理想、幻想和欲望。它们提供了与女人的关系的模式,提供了解决社会性别关系问题的模式。此外,各种霸权男性特质与男性特质的实践松散地勾连在一起,成为每日具体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就这种情况来说,霸权男性特质参与着整个社会层面的社会性别秩序中的霸权。所以,有些男人在区域层面被作为男人典范(如唐纳森(Donaldson, 1993)所讨论的"铁人"),但他们会表现出矛盾,这并不令人意外。

在地方层面,男性特质的霸权性模式深嵌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比如正式的组织机构。例如,在罗坡尔(Roper, 1994)和瓦日克曼(Wajcman, 1999)所研究的英国大企业中,有着明确的管理者男性特质模式。在家庭当中,也存在着被社会合理化的男性特质模式。例如,荷其施而德

[1] 苏联时期工人劳模。——译注

(Hochschild, 1989)的研究显示,男人的社会性别策略决定了家务劳动分工和美国家庭的"双班"现象。[1] 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对男性特质的霸权性模式既有接触也有挑战。社会性别的建构,发生在学校里和邻里社区内,通过朋辈群体结构、学校空间的控制、约会的模式、同性恋恐惧的言论以及骚扰行为等而形成的(Macan Ghaill, 1994; Thorne, 1993)。我们不能相信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霸权男性特质能够作为一种清晰定义的模式与所有其他男性特质模式彻底区别开来。如果霸权在发生有效作用,那么霸权性和共谋性男性特质之间就极有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重叠和模糊。

我们要认识男性特质之间的重叠,还可以通过观察谁在建构男性特质。卡文德(Cavender, 1999)展示了霸权男性特质的一些典型,在电影故事片中的建构在20世纪40年代是如何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不仅是写入了剧本当中的人物角色问题。地方性的具体实践——即,作为演员在拍摄电影中实际的面对面互动——最终构成了在整个社会/区域性层面霸权男性特质的幻想模式(在他这个研究中,是"侦探"形象)。(我们将在本文的"重新阐述"部分探讨这两个层面的关系问题。)

概念被具体化的问题

学者们还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另外一类批评,即,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在运用中,被简化为权力或毒害的具体表现。霍特勒尔(Hotler, 1997, 2003)在概念层面上提出了最为细致的批评,他认为,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在妇女的直接体验中——而不是在妇女受压迫的结构性基础中——建构男人的权力。他认为,我们必须区分开"父权制"——即长期存在的使女人受压迫的结构——与"社会性别";社会性别形成于现代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特定交换制度。如果认为建构在各种社会性别关系中的

[1] "second shift"原意为双班或者多班工作制中的第二班,引申含义指职业妇女在家庭中担负的劳动之重,好比第二份工作。——译注

男性特质等级与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在逻辑上是一贯的,这是错误的认识。他(1997)明确地指出,挪威的调查研究显示,男人的各种社会性别身份,并没有完全对应到致力于性别平等的具体实践上,如对待暴力的态度。

霍特勒尔(1997)认为,从男人向女人直接施加个人权力这样的现象上推导出各种男性特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错误。他的这个观点当然是正确的。至少,我们还必须考虑以下诸多因素: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制度化,文化建构的作用,以及种族、阶级和区域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动态互动。

其实,正是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并没有陷入概念具体化。比如,对组织机构的各种男性特质最出色的研究,恰恰揭示了它们非常微妙的差异,如,在美国海军这一种军队当中的各单位之间,就有这样的差异(Barrett, 1996)。还有一些研究是关于地方性的各种具体的霸权男性特质,它们被建构在类似新西兰乡村酒吧这样的场所,表现出男性特质与乡村身份之间的密切关联(Campbell, 2000)。其他研究,特别是对学校教室生活的研究(Martino, 1995; Warren, 1997),说明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这些实践的产生和博弈是如何缜密地进行的。

柯里尔(Collier, 1998)批评了霸权男性特质在描述暴力和犯罪的研究中最典型的用法。他认为,在犯罪学的"男性特质转向"中[1],霸权男性特质被仅仅与负面特征联系起来,将男人描述成冷漠的、独来独往的、无爱心、进攻性强的,以及不易动情的——这些都被视为犯罪行为的原因。马丁(Martin, 1998,473)同样观察到一种趋势,即,把霸权男性特质不仅看作是一种类型,而且是一种负面类型。例如,有观点认为,"要求捍卫枪支拥有权就是捍卫霸权男性特质。"

柯里尔的批评很有力量。它的一个基础就是麦克马洪(McMahon, 1993)对男人和男性特质研究的心理学中心论[2]进行的有力批判。男人

〔1〕"转向"之说通常指某一理论或概念方法突然引起的格外关注和大量应用。——译注

〔2〕Psychologism 是一种哲学思维,认为心理学在解释其他非心理学现象和规律时起着关键的作用。——译注

的行为被具体化在一个男性特质的概念中，然后以一种循环论证的方式，这个概念又成为对那个行为的解释(和借口)。这可以见诸于许多对于男人健康问题和男孩教育问题的讨论中——其实，这见之于所有当前被归于“男性特质危机”标题之下的问题讨论。在大众心理学中，新的性格类型的发明简直成了风尚，像什么“强男”(the alpha male)，“细腻型新时代男儿”(the sensitive new-age guy)，“雄男”(the hairy man)，“新少”(the new lad)，“粪青”(the “rat boy”)等[1]。在这个环境中，霸权男性特质可以成为一个听上去挺科学的同义词，代表一种死板、盛气凌人、性别歧视的“具有大男子气概”的男人(英语的用法，例见 Mosher and Tomkins, 1988)。

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是建立在使男人对女人的集体统治得以持续的实践之上的。所以，在某些情境下，霸权男性特质实际上就是指男人从事的有害活动(包括身体上的暴力)，这些活动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巩固着社会性别统治。这很好理解。然而，暴力和其他有害行为并不总是最重要的特征，因为霸权有着多种构成形式。的确，如威瑟列尔和艾德里(Wetherell and Edley, 1999)不无嘲讽地指出，在某些地方环境中，“有个男人样儿”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或许正是要表现出与区域性霸权男性特质之间的距离。

柯里尔(Collier, 1998)认为，霸权男性特质这个概念的一个关键缺陷，就是它没有包括男人“正面的”行为——即，那些满足女人的利益或愿

---

[1] 这些是西方英语世界的用法和“现象”。“The alpha male” 源自动物行为学，指某些哺乳类动物中雄性领头者，对食物和雌性动物占有优先权。后指男性中强势者，在各种场合要占优势和主宰地位。“The sensitive new-age guy”是美国出现的词，指善意有合作精神的男性，感情细腻且理解妇女的需求；“The hairy man”是美国流行心理学家 Robert Bly 所作的 1990 年畅销书 Iron John 中的寓言人物，象征着本质主义的与“女性特质”截然不同的“男性特质”。“The new lad”是 1990 年代英国出现的词，指反女权主义，坚持性别歧视的青年男性，他们在行为上倾向暴力，酗酒，热衷汽车和足球。“The rat boy”是英国成人连环画杂志创作的一个人物形象，是青少年犯罪的夸张表现，该少年长相如鼠，偷盗成性，并以入户盗窃时留下粪便来表示不敬。——译注

望的行为。一旦我们超越了僵化的性格特征论,这其实就基本不是问题了。大多数对霸权男性特质的描述,包括了"正面的"行为,比如,把工资带回家、维持性关系以及成为一个父亲。其实,如果统治群体的唯一特点就是暴力、攻击性和自我中心,很难说霸权这个概念还与其相关。这些特点或许意味着统治,但基本不能构成霸权——霸权的观点,包含着各种从属群体的协同和参与的意思。

柯里尔(Collier, 1998,21)正确地指出,关于霸权男性特质与犯罪(我们还可以加上健康和教育)的许多讨论的真正对象,实际上是"一系列关于什么是理想的或现实中什么叫'有个男人样儿'的各种大众意识形态"。然而他忘记了,复杂精深的研究一贯在探讨那些意识形态与男孩及男人日常生活的关系——包括它们之间的不协调、矛盾和抵制。

正是男人和男孩与男性特质的集体形象或典型之间的现实关系——而不是对这些形象的简单反映,才是理解社会性别如何影响暴力、健康和教育问题的关键。自从梅瑟施密特(Messerschmidt, 1993)阐述了不同男人通过不同的犯罪来建构各种男性特质这一发现后,这一点就非常清楚了。柯里尔认为这个观点不可接受,因为它要么语义重复且有普遍化倾向,要么就在解释当中过度细分。但是,多样的实践是从各种共同的文化模式中生成的,这个观点并不出奇。"霸权男性特质"的观点,在概念层面上并没有普遍化的倾向。协调和规范管理存在于各种群体、各种机构体制以及整个社会的日常社会实践中。霸权型男性特质概念,并没有要被当成"万金油"或者解释一切的主要因素;它是理解社会过程中某些动态的一种方法。

男性的主体

一些作者认为,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建立在一种差强人意的主体理论上。威瑟列尔和艾德里(Wetherell and Edley, 1999)从话语心理学的立场发展了这一批评,认为霸权男性特质不能被理解为任何一群男人定

型的性格结构。我们必须要问,“如果一种理想形象根本没有男人可以实现,男人们怎么会遵循这种理想、并将自己变为共谋的或抵抗的类型”(p. 337)?

他们(1999)认为,我们应当将霸权性规范理解为:它界定男人在话语中的一个主体位置,而这一位置是他们在特定条件下策略性地选择的。霸权男性特质有着多重含义——有些人在对这个概念的批评中提出这一观点,而威瑟列尔和艾德里则将其视为一个正面的出发点。男人可以根据其需求在多重含义中巧妙应对。男人可以在有利时采纳霸权男性特质;但同样这些男人也可以在其他时候选择策略性地与霸权男性特质保持距离。其结果是,“男性特质”代表的不是某一类男人,而是男人通过话语实践自我定位的一种方式。

怀特海德(Whitehead, 2002,93)认为,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仅仅“看到”结构,使得主体消失:“个体迷失在——或者用阿尔都塞的术语,受制于——一个意识形态机器和一种固有的对权力的追求中。”对于怀特海德来说,这个概念没能具体说明某些异性恋男性如何、为什么能复制和生产其支配力并将其合理化;尽管在社会上他们相对于女人和其他男人是一个少数群体,他们是如何做到了这些?因此,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导致了困惑,导致了将流动不定的男性特质与大的结构混为一谈,最终造成了‘抽象的结构性动态’”(Whitehead, 2002,93--94)。怀特海德认为,最好集中探讨话语的问题,把它看作是男人得以认识自我、实践身份以及实施社会性别权力或抵抗的方式。

与此相关的一个批评源自精神分析学。它认为,霸权男性特质的模型,假定一个统一主体的存在;但是深度心理学揭示了多层次或分裂的主体(Collier, 1998; Jefferson, 1994)。杰佛逊(Jefferson, 2002)认为,男性特质的研究“对男性主体的理解过度社会化”,因而忽视了实际上男人如何在心理层面上与霸权男性特质发生关联。鉴于男性特质的多样性,杰佛逊认为研究者应当思考:“现实中有着自己独特经历和特定心理结构

的男人，如何认同于各种各样的男性特质”(p. 73)。他认为，男孩和男人之所以选择某些话语位置，是因为可以借助它们驱除焦虑和逃避被剥夺权力的感觉。

这个来自话语心理学的论点很有说服力，而且它与一个成果斐然的研究方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里亚和奥博恩的研究(Lea and Auburn, 2001)。他们分析了某性犯罪研究课题项目中一个已被定罪的强奸犯的自我陈述。这个罪犯的叙述，显示了他如何在各种互相矛盾的、有关性接触的意识形态之间移动，使得自己可以减少强奸罪责。另一个例子是阿切尔(Archer, 2001)考察英国年轻穆斯林男人关于身份认同的谈话。这个研究显示，他们如何使用某一种具体的霸权男性特质模式(“强有力的，父权的”)，在与非裔加勒比男人、白种男人以及穆斯林妇女的关系中自我定位。从这项研究中，我们不但能够了解各种男性特质是如何在话语中建构的，而且知道了它们是如何在话语中被运用的。特别是，我们还了解到，一个地方性的霸权男性特质，在面临如种族歧视性诋毁的情况时，如何可以被用来提升自我尊重。

话语分析角度强调的是符号层面，而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最初是在对于社会性别多维度的理解中形成的。尽管任何对于霸权男性特质的具体说明都通常要涉及文化理想的构成，但这个概念不应当被视为仅仅是一种文化规范。社会性别关系也是通过非话语实践构成的行为，包括工薪劳动、暴力、性活动、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以及一些不假思索日常活动。

认识到社会性别有非话语和不假思索的方面，会使我们对话语灵活性的局限有所理解。这种局限的确存在。这正是卢宾(Rubin, 2003)在对女性变为男性的变性人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个有力论点。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不能任意选择社会性别位置；选择，作为一种话语行为或反应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身体具体体现、体制的历史、经济因素以及个人和家庭关系的限制。做出某种话语选择的代价，可能会极其高昂——

正如进行变性活动的人们的高自杀率所显示的。

局限还源自个人。卢宾(Rubin, 2003)的调查对象实施了变性,不惜高成本,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是男人——尽管他们出生时具有的是女性的身体,而且被当作女孩来养大。他们确信自己是统一主体,虽然他们生活在一种矛盾中,而这种矛盾恰恰似乎是杰佛逊(Jefferson, 1994,2002)提出的分裂主体的一个例子。我们同意杰佛逊的观点,认为精神分析的实践和理论是理解社会性别实践的复杂主体的重要资源。然而,杰佛逊所运用的精神分析方法并非没有问题(Messerschmidt, 2005)。我们需要认识到精神分析传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一点很重要。像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把男性特质作为课题来理解:一种男性身份,总是生命过程中一个暂时的成就。阿德勒精神分析强调孩童时期经历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情感后果,导致了"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这个观点的出现,这一观点在当代关于被边缘化青年的研究中仍然产生着共鸣。

我们最初提出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时,正是深切地意识到精神分析在以下诸方面的探讨:多层面的和矛盾的性格特征,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斗争,为维持霸权而采取的必要的策略性组合(Carrigan, Connell, and Lee, 1985; Connell, 1987)。有些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这个概念被批评为过分简化主体。当然,这个概念经常以各种简化了的形式被应用,这是事实。

这个概念必定会抹除主体吗?怀特海德(2002)认为,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把分析简化为结构决定论。对此观点我们完全不同意。我们对男性特质的定义是,与社会性别关系结构相关联而组织起来的一个实践活动的组合方式。人类的社会实践行为,在历史上创造了社会性别关系。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包含了有关社会性别的历史动态认识,而在这个认识中抹除主体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生命历史研究会成为霸权男性特质研究中典型的体裁。

只有当这个概念被简化为社会性别关系的某一层面(通常是象征层

面的),并且被视为某一规范的具体表达的时候,这个概念才将主体同质化。只要我们认识到社会性别关系的多维度(Connell, 2002)和社会性别关系中危机倾向的存在(Connell, 1995),就不可能将在这些关系中建构起来的主体视为一元统一的。当然,表现主体的不统一性的方式有很多。后结构主义的概念语言只是其中一种方式;精神分析以及描述在充满矛盾的社会结构当中的能动性的模式,则提供了其他的方式。

社会性别关系的模式

在社会性别的各种社会理论中,常有一种功能主义倾向——即,视社会性别关系为一个封闭的、自我再生产的体系,对于每个元素的解释都基于它对整体进行再生产的功能。霍克斯沃斯(Hawkesworth, 1997)发现在绝大多数现代的社会性别理论中都有这种倾向。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最近对于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解释,赋予了社会性别分析的功能主义新的生命。

男人的主宰和女人的从属,构成的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自我再生产的体系。"男性的主宰"永远要面对挑战、需要大量努力才得以维持。尽管这一点在对霸权男性特质概念的早期陈述中就被提了出来,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性的观点。有具体的研究表明,排斥女人是维持这种主宰所采取的策略,包括博德(Bird, 1996)的同性社交研究,柯林森(Collinson)、耐慈和柯林森(Knights and Collinson, 1990)、柯克博恩(Cockburn, 1991)以及马丁(Martin, 2001)的针对组织机构的研究。

有大量证据说明,无论是通过习得倾向还是其他机制,霸权型男性特质不是一个自我再生产的形式。维持某种霸权模式需要对男人的管戒、对女人的排斥和贬低。这些机制的表现有很多:在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威胁、战争的"刚性"世界中,"柔性"政策被鄙视(Hooper, 2001);同性恋恐惧性质的攻击和谋杀(Tomsen, 2002);在学校里嘲笑男生有"女孩气"的各种方式(Kimmel and Mahler, 2003; Messerschmidt, 2000),等等。

德莫特里欧(Demetriou, 2001)对霸权男性特质概念的谨慎批评,充分注意到社会性别的历史性。但他认为有另外一种简单化倾向。他指出,有两种形式的霸权:内部霸权和外部霸权。“外部霸权”指的是男人对于女人统治的制度化;“内部霸权”指的是某个群体的男人社会地位上升到凌驾于所有其他男人之上。德莫特里欧认为,这两种形式的关系在霸权男性特质这个概念的最初阐述中并不清楚,在目前的使用中也没有明确。此外,内部霸权通常被理解为“精英论”的方式,即,从属和被边缘化的男性特质被看作对于霸权男性特质的建构没有影响。各种非霸权男性特质与霸权男性特质共存,他们之间存在张力,但非霸权男性特质无法渗入或影响霸权男性特质。于是,就有了对各种男性特质的二元性表述。

德莫特里欧(2001)认为,这种概念归纳没有认识到内部霸权的“辩证实用主义”(dialectical pragmatism);而霸权男性特质就是通过它来占用其他男性特质中任何似乎对延续其统治有用的东西。这种辩证关系的结果,不是一种一元统一模式的霸权男性特质,而是把多种模式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历史性整体”,它的混杂性本质就是实施外部霸权最好的策略。一个博弈、转化和再组合的过程不断地进行。

这种理解造成了对男性特质的历史变化的另一种看法。霸权男性特质并不是仅仅去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应该说,霸权性的男性特质整体是一个杂糅体,由于它挪用了各种内容,因而“能够重新组合自己并适应新的历史局面中的具体情况”(Demetriou, 2001,355)。作为这一进程的一个例子,德莫特里欧(2001)探讨了同性恋男性特质在西方社会文化中日益增加的可见度。这使得某些异性恋男性得以挪用同性恋男人的风尚和实践中各种大大小小的元素,建构社会性别行为的一种新的杂糅组合。这种挪用模糊了社会性别差异,但却并没有削弱父权制。

德莫特里欧(2001)在“内部霸权”中提出的辩证实用主义的理解是有益的,而且他还有力地说明:男性特质的某些再表现,以及一些异性恋男人的日常社会性别行为,挪用了同性恋男性特质的一些内容。显然,具体

的男性实践可以被挪用于其他男性特质,并创造出一个杂糅体(如一些工人阶级白人少年男孩接受说唱和街舞的风格和语言,以及独特的同性恋"克隆"杂合风格)。但他仍然不能证明,他(2001)所描述的杂糅体是霸权性的,至少是超越了地方性。尽管同性恋的男性特质和性活动在西方社会中可见度越来越高——我们都目睹了大众如何地迷恋如《六英尺以下》、《欲望与体面》和《正统男人的酷儿之眼》等电视节目中同性恋男性角色——但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杂糅体已经成为区域的甚至全球层面的霸权男性特质。

霸权性集群的概念使我们关注多种霸权男性特质的问题。杰佛逊(Jefferson, 2001,71)等批评了只讲一种模式的倾向——"霸权男性特质总是用单数形式"。这里有一个矛盾。因为每一种民族志研究都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社会性别文化,每一个生命历史研究都揭示出独特的男人生命轨迹,每一个结构性分析都界定了种族、阶级、社会性别和世代的新的交叉,那么似乎我们当然可以定义无数种男性特质的变异形式(Meuser and Behnke, 1998)以及霸权的拥有者。梅斯那(Messner, 1997)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一个观点:美国的男性特质政治,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运动,但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运动中的绝大多数都宣称某一种方式才应是男人思考和生活的方式。无论男性特质实际上如何多种多样,对霸权的争夺,意味着社会性别等级的最顶层没有多数。我们还会再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它对于理解社会性别政治非常重要。

回顾与重新阐述

我们现在整理这些脉络,提出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应如何重新阐述。这个概念最初的阐述中,有些内容是经过研究和批评证明仍然是有效的,我们把它们提出来;我们也要标明一些应当被摒弃的内容,以及(会更详细地)说明这个概念在哪些地方需要更新阐述。

应被保留的内容

这个概念的根本特征是认为男性特质存在多元性、多种男性特质当中存在着等级。这个基本观点已在过去 20 年的研究中得到了检验。多种模式的男性特质在许多研究中、在很多个国家、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中都被发现。还有一个普遍的研究结果：某些男性特质比其他的更具社会重要性，或者说更与权威和社会权力相连。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里，各种非霸权男性特质处于从属地位。世界各地的研究表明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同样有充分证据支持的另一个内容是：各种男性特质当中的等级是一种霸权的模式，而不是一种简单地基于强制的统治模式。文化上的协同、话语中心地位、制度化以及将其他男性特质进行边缘化或使其非法化，都是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特质普遍特征。这个概念的另外一个原创观点也得到充分支持，即，霸权男性特质不必是男孩和男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模式。反之，霸权的运作，部分是通过制造男性特质的榜样（如职业体育明星），这些榜样是具有权威的象征——尽管绝大多数男人和男孩事实上无法完全达到。

霸权男性特质这一概念最初的阐述，强调了这样一些内容：社会性别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男性特质的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是被挑战的——这种挑战可能来自妇女对父权制的抵抗，也可来自代表其他男性特质的男人。研究彻底证明，（各种）霸权男性特质是历史建构和再建构的。在地区的和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男性特质形成的条件因时而变。这些变化引发了社会性别关系的新策略（如伴侣性质的婚姻）并导致了重新定义什么是理想的男性特质（如，家庭伙伴取代了维多利亚式家长）。

什么应被摒弃

早期关于霸权男性特质的观点中有两个内容被正确地批评了，它们

应当被摒弃。第一个是围绕着霸权男性特质的社会关系的模式——它过于简单了。《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一书,试图在一个单一权力模式——即男人对女人的"普遍统治"当中来确定所有男性特质(和所有女性特质)(Connell, 1987,183)。当时,为了避免男性特质多样性的观点被等同于一系列互相竞争的生活方式,这一模式还是有用的。但现在看来,这对于我们理解男人的各个群体与各种男性特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群体的女人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特质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在社会性别关系中占支配地位,涉及代价与收益的相互作用;对霸权男性特质的挑战,源自于被边缘化的族裔群体的"抗议型男性特质";还有,资产阶级妇女会挪用霸权男性特质的一些方面来建立其在大企业的或其专业当中的地位。显然,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来理解社会性别的等级。

虽然《社会性别与权力》对特征心理学提出批评,并且倾向于借鉴有关无意识动机的精神分析学观点,然而早期对霸权男性特质这一概念的阐述在试图描述男性特质的实际内容时,却往往反过来求助于特征语汇,或者至少说它没能提供另一种语汇。男性特质的概念如果被当作是多种特性的一个集合,其结果就是有些人将霸权男性特质视为一种固定的特征类型。这种观点已经带来了很多麻烦,而最近的心理学研究对这种观点给予了恰当的批评。我们需要彻底超越的,不仅是男性特质的本质主义定义,而且是普遍把社会性别当成特征来考察的研究方法。

什么应当被重新阐释

鉴于如上探讨的研究和批评,我们认为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需要从四个主要方面进行重新阐释:社会性别等级的本质、男性特质构成的地理状况、社会性的身体体现的过程和各种男性特质的动态。在下面各节中,我们对上述每一个问题都提供了一些思路和一些研究建议。

社会性别等级

与对这个概念最初的阐释相比，当代研究展示出各种男性特质的不同建构之间复杂的关系。最近话语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不同地方，男性特质的不同建构如何可以成为策略性的替代选择。男性特质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存在于所有地方环境当中，男人青睐于它的某一具体霸权形式的动机因地方环境而不同，并且这种地方上的男性特质不可避免地彼此有所差异。德莫特里欧(2001)的有关辩证实用主义的论述，抓住了男性特质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这一问题；霸权男性特质模式会通过吸纳其他男性特质中的元素而发生变化。

现在关于各种男性特质之间关系的分析研究，更加清楚地承认了从属的和边缘化群体的能动性——其能动性往往受其具体的位置约束(详见下面的探讨)。在这个意义上，“抗议型男性特质”(Poynting, Noble and Tabar, 2003)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建构于地方劳动阶级环境中的男性特质的模式，有时是在因族裔被边缘化的男人当中建构；它体现了西方国家中区域性霸权男性特质颇具典型的权力诉求，但是它缺乏支撑区域性和普遍霸权男性特质模式的经济资源和制度权力。

一些研究还表明了非霸权男性特质模式的持久性和生存能力，这些都可能是代表着针对种族/族裔边缘化、身体残障、阶级上的不平等以及性取向歧视等等进行精心策划的回应。霸权的成功运行，或许正是通过将这样的男性特质吸纳到正在运转的社会性别秩序之中，而不是通过以诋毁或暴力为形式的积极压迫。在实践中，吸纳与压迫可以一起发生。例如，西方大城市中心同性恋男性特质当前就处于这个位置。同性恋社群可以体验到一系列不同的待遇：既有来自同性恋恐惧的暴力和文化诋毁，也有宽容，甚至在文化上受欢迎并有自己的政治代表。类似于这样的吸纳与压迫的过程，也会发生在参与建构着男性特质的女孩和妇女当中(Messerschmidt, 2004)。

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最初是与霸权女性特质(hegemonic femininity)的概念一并阐述的,但后者很快被更名为"被提倡的女性特质"(emphasized femininity),以表明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在父权制社会性别秩序中不对称的地位。在有关男人和男性特质研究的发展中,这种关系很快退出了关注焦点。从多方面看这都是令人遗憾的。社会性别总是关系性的,男性特质的各种模式,正是在与某种女性特质的模式——无论它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的对比区分当中得以在社会层面被定义。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仅仅关注男人的实践,我们就不会去探讨男人进行社会性别建构时女人的实践活动。生命历史研究已经充分地显示,女人在男性特质建构的许多过程中是非常关键的——作为母亲,作为同学,作为女友、性伙伴和妻子,作为有社会性别分工的劳动者等等。被提倡的女性特质这一概念关注的是对父权制的服从,这在当代大众文化当中仍然非常重要。但社会性别的各种等级关系还受到女人的身份认同和实践的新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年轻妇女——这越来越被年轻男人所认识。我们认为,关于霸权男性特质的研究,现在需要对女人的实践以及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因此我们建议,对于霸权男性特质的理解需要包含对社会性别等级更全面有机的理解,既考虑到占支配地位的群体的权力以及社会性别动态与其他社会动态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同样充分认识到从属群体的能动性。我们认为这样就会逐渐改变男性研究的孤立状态,并会凸显社会性别动态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正在探讨的一些问题之间的相关联系——这些问题包括全球化的后果、暴力、维和等诸问题。

男性特质的地理形态

在过去二十年里,霸权男性特质在地方的具体建构中发生的变化,一直是研究的一个主题。但随着对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关注,跨国领域对男性特质建构的重要性也被提了出来。胡坡(Hooper, 1998,2000)描述了

在国际关系中霸权性男性特质和其他男性特质如何被运用，康奈尔(Connell, 1998)提出了一个大企业领导者当中的“跨国商业男性特质”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相关的。

学者们仍然在讨论，这样的全球过程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比地方化和区域化的社会性别动态更重要。皮斯和普林格尔(Pease and Pringle, 2001)在近期的一本国际性文集中主张，应继续集中从区域和比较的角度来理解男性特质。至少，我们必须认识到，霸权男性特质的区域性和地方性建构，受到社会性别制度与全球化进程的勾连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基莫尔(Kimmel, 2005)最近考察了全球性霸权男性特质的影响，如何深刻地根植于区域性(美国和瑞典的白人优越论者)和全球性(来自中东的基地组织)“抗议型”男性特质的出现当中。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目前在男性特质研究中是无法回避的，并建议采用下面的简单框架。针对现实存在的霸权男性特质，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1. 地方的：构建在家庭、组织机构和本地相关社群之间面对面互动的空间中，常见于民族志和生命历史研究；

2. 区域的：构建于文化或民族—国家的层面，常见于话语研究、政治研究和人口研究；

3. 全球的：构建于如世界政治和跨国商业与传媒这样跨国领域中，如正在兴起的关于男性特质与全球化的研究。

这三个层面之间不但存在着关联，而且这些关联对于社会性别政治很重要。全球性体制施压于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社会性别秩序；而区域性社会性别秩序又提供了全球性领域中被采用的或被改写的文化素材，同时也提供了在地方性的社会性别动态中非常重要的男性特质模式。

让我们来具体考虑区域性和地方性男性特质之间的关系。区域层面

的霸权男性特质,通过一些在区域层面有影响的的地方性男性实践——比如被电影演员、职业运动员和政治家建构起来的那些——之间的互动而象征性地再表现出来。这些实践的确切内容因时间和社会身份而异。但是区域性霸权男性特质影响着全社会对男性特质现实的认识,因而它在文化领域的运行,是作为顺手拈来的材料,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环境中通过实践被变为现实,被修改或被挑战。于是,区域性霸权男性特质提供了一个可以在日常实践和交往互动中被实现的文化框架。

为了说明区域性和地方性霸权男性特质的互动,我们来看一个体育运动的例子。在西方社会,地方层面的实践——如参加职业体育竞赛活动——建构着区域层面的霸权男性特质的模式(如“体育明星”),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其他的地方环境。有关中学校园生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成功的体育活动参与在这个特定的地方环境中是一项突出的霸权性男性实践(Messner, 2002)。例如,赖特和克尔克(Light and Kerk, 2000)考察了一所优秀的澳大利亚高中,发现这所学校中存在着明显的多种男性特质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个具体的霸权性形式是通过橄榄球这一身体实践来塑造的——这种方式当然不局限于这个学校。这项运动以强势、攻击性、残酷的竞争性以及为学校全力奉献等为中心。(比较 Burgess, Edwards and Skinner, 2003 的类似研究结果)因而,在区域层面显著的男性特质典范模式影响着——尽管不是完全决定了——地方层面的社会性别关系和霸权男性特质的建构。

我们总有一种愿望,想要假定存在着一个简单的权力或权威的等级、贯穿了从全球到区域到地方的层面。但这样的假定会是误导的。在对全球化的探讨中,“全球性”的影响力往往被过高估计,而我们称作“区域性”的抵抗和力量又往往没有被认识到(Mittelman, 2004)。到目前为止,在全球领域中对男性特质的有限研究(Connell and Wood, 2005; Hooper, 2001)显示,没有一个全球层面的强大的男性特质有能力压倒区域性或地方性男性特质。但是关于社会性别全球动态变化的证据在不断增加。显

然，经济结构重新调整、远距离移民以及“发展”带来的动荡等诸多社会过程，有力量重塑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区域性模式（Connell，2005；Morrell and Swart，2005）。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各种全球性男性特质的互动，会在社会性别政治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这是未来有关霸权的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

采取一个将地方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男性特质区分开来的分析框架，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到地点的重要性（这一点也应用于女性特质），而不落入一个完全自我独立的文化或话语的单一世界。如上所述它还为多种霸权男性特质并存的问题给出了一些启示。尽管霸权男性特质的地方性模式是彼此有差异的，但它们通常会有所重叠，部分是因为它们与全社会的社会性别动态之间的互动。此外，正如我们刚刚提出的，霸权男性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男人与女人的互动关系当中建构的；与之对应，妇女的社会性别实践中的共同特点也会导致合流。因此，霸权男性特质的各种地方性建构之间有着某种“家族相似性”（借用维根斯坦的术语）而不具有一种逻辑身份。在这个意义上，男性特质的地方多元性与单一霸权男性特质在区域/社会层面的存在并不矛盾。各种地方性形式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由区域层面的一个而不是多个象征性模式来表现。

社会性的身体体现

霸权男性特质与对男人的身体的具体再表现及使用方式之间是相关联的，这一点在最早的概念阐述中就已经被认识到了。但是霸权所涉及的具体体现模式，还没有很好地理论化。

男性的身体体现对于身份认同和行为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境中可以看到。对于年轻人来说，技巧性的身体活动成为男性特质的基本表征，正如我们已经在体育运动中看到的。在西方文化中，这是异性恋与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关键方式：有异性伙伴的男孩被赋予威望，性方面的学习被想象成一种探险和征服。身体实践——比如，吃肉，危险驾车——

也与男性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于是在倡导健康生活时,会有消除社会性别的效果——如,挑战霸权男性特质,或使男人更趋向中性化。但是,去社会性别化的困难,也部分地源自身体体现,比如,通过坚持冒险活动在朋辈群体中树立男性声誉。

过去,一般社会科学通常将身体视为社会建构过程的客体,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是很不足的。身体相当积极地、密切地、也相当复杂地参与到社会过程中。这一点理论阐述从来都是强调不够的。身体通过标示社会行为的路径而参与到社会行动中——身体是产生社会实践的参与者。我们既要认识到男性特质是身体体现的,还要探讨这种体现与社会环境的交织。这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对霸权男性特质的身体体现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这一点在跨社会性别实践的问题上显得格外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在简单的社会建构模型中是很难理解的。这个问题已经被新兴的酷儿理论重构了。酷儿理论将社会性别跨越视为对社会性别秩序的颠覆,或它至少显示出社会性别秩序的脆弱。关于跨性主义(transexualism)已经开展了尖锐的争论,一些精神病学家质疑社会性别变化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太容易确定变性行为对于霸权到底意味着什么。根据卢宾(Rubin, 2003)和那玛斯特(Namaste, 2000)的研究,我们认为,在由女变男的变性人的生命历程当中建构的各种男性特质,并不一定必然是反霸权的。"自造的男人"可以追求社会性别平等也可能反对它,就像非变性男人一样。变性体验凸显的是,现代性把身体作为"使得众人之自我彼此接触的媒介"(Rubin, 2003,180)。

要理解身体体现和霸权,我们就需要认识到,身体既是社会实践的对象又是社会实践的能动者(Connell, 2002)。社会实践把身体的过程和各种社会结构联系起来,是有一定路径的——而且有许多这样路径。它们汇总起来,成为一个历史过程,即,社会被身体具现的历史过程。这些社会的身体具现的路径可能很直接很简单,也可能很长很复杂,经过了各种

制度、经济关系、文化符号等等，但是从来没有不涉及物质存在的身体。如果我们想想健康、疾病和医护治疗中的社会性别模式，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在占支配地位的男人群体中，社会的身体具现的路径总是牵涉到他们的特权赖以存在的各种制度。唐纳森和坡恩廷（Donaldson and Poynting, 2004）做过一个关于统治阶级男人日常生活的开创性研究，戏剧性地证实了这一点。例如，他们的研究显示，这些男人特别从事的运动、休闲和饮食行为如何有策略地使用着他们的财富，确立起相对于其他男人身体的距离关系和支配关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广袤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昂贵的技术——计算机系统、全球航空旅行、安全的通讯——如何增强了精英男人的身体的力量。

男性特质的各种动态

尽管各种男性特质的内部复杂性早已被认识到，但这只是在逐渐地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正如我们前面针对社会性别实践当中的主体的讨论所指出的，我们现在必须明确承认，在建构各种男性特质的所有实践活动中，存在着层级划分和内部潜在矛盾。这些实践活动，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对一个一元统一的男性特质的表达。例如，它们可能代表了一些相互矛盾的欲望或情绪的折衷形态，或因对不同社会性别策略的成本和收益难以准确盘算的结果。

生命历史研究指向了男性特质的另一个动态方面，即结构。男性特质是被建构的、不断展开的，并随时间而变化的实践活动样态。有两类研究文献强调了这一问题：第一类还不够多，它们研究男性特质和老龄化问题；另一类较多，研究童年与青年阶段。对生命历史的认真分析，或许会探测到一些互相矛盾的信念和制度变迁，它们反映了不同的霸权男性特质、但也保有变革的可能。

霸权男性特质很有可能涉及一些内部等级区分和情感冲突的具体模

式,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与社会性别权力之间有关联。与父亲的关系有可能成为张力之焦点,因为在养育子女方面存在着社会性别分工、在专门行业和管理中有“加班文化”以及富翁父亲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财富管理。另外一个张力的焦点是,针对妇女发生的变化的矛盾心态,可能导致同一个男人在接受还是拒绝社会性别平等之间来回摇摆。任何旨在维持权力的策略,都可能会有对他者的不人道对待,以及自我内部的同情心和情感纽带的相应衰竭(Schwalbe, 1992)。我们不必将拥有特权的男人视为怜悯的对象,但是应当认识到,霸权男性特质并不必然转化为令人满意的人生体验。

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尽管必然源于男性特质的内部矛盾,有时也可能是有意为之的。孩子和成人都有能力解构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并批判霸权男性特质,这种能力是许多教育干预和变革方案的基础。与此同时,霸权男性特质的承载者未必是“文化无知者”;他们可能会积极地试图改善社会性别关系,重塑男性特质就是这种实践的一部分。一个很积极的例子是公共领域组织机构当中的“新型公共管理”,它抛弃了陈旧风格的官僚制度,相信“更为扁平化”的组织、机会平等以及支持员工家庭生活的雇佣政策。然而,即使这些男性特质的进步也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正如缪塞尔(Meuser, 2001)指出的,这也造成了会导致进一步变化的矛盾。

社会性别关系总是充斥着各种张力。某个模式的霸权男性特质之所以具有霸权,在于它为这些张力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从而稳定了父权制权力,或在新条件下重构了这种权力。一个实践的模式(即,男性特质的一种形态),如果在旧的条件下而不是在新条件下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就会遭遇挑战——事实上是一定会被挑战的。

这种斗争持续不断地发生:通过妇女运动的努力(在地方、区域和全球的层面)、在一代代的移民社群中、在管理阶层男性特质的各种模式之间、在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对手之间、在娱乐业有影响力的人之间,等等。这种争夺是现实存在的,社会性别理论没有预测谁将获胜——这个过程

在历史上是开放的。因此，霸权也许会失败。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并不依赖于社会再生产理论。

换句话说，对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解释应当明确地承认，不但等级制度的再生产是可能的，社会性别关系的民主化和消除权力差异也是有可能的。要想向此方向转型，就需要努力在男人之间建立一种倾向于男女平等的男性特质形态，让它在男人当中具有霸权性（Demetriou，2001 所说的“内部霸权”的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定义一个完全“正面的”（在柯里尔[1998]的意义上）的霸权男性特质是可能的。最近的历史显示，在实践中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建立进步的霸权仍旧是当前改革努力的一个关键策略。

结　论

社会科学中的概念的产生，是对具体的学术和实践问题的回应。这些概念是用具体的语言和学术方式阐述出来的。但它们还有着传播的能力，并在传播中可能会获得新的含义。霸型男性特质的概念的确就是这样，它被应用的领域包括从教育和心理治疗到犯罪防范以及国际关系。其模糊之处遭到了批评，缘于对这个概念的不同使用，也因为在新环境中这一概念被以各种形式进行修正。

这一点可能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进行概念化的一个普遍问题。当一个理论公式在其他情况下并在他人手中被应用，这个概念必须变化——而且它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中向不同的方向变化。一个具体的概念因而可能会转化为一种一般的谈话方式，一种分析风格，或者论证中的一个特色部分。这个过程本身没有问题——这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知识的通常发展方式。但是它意味着新的使用必须面对批评，新的使用可能缺乏最初那个概念的一些实质内容或成立条件。

因而，我们欢迎大多数对霸权男性特质概念的应用和修正，因为它们

对理解社会性别动态关系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拒绝把它当成某种固定特征类型或一种有害特性的集合体。这样的用法并非微不足道——它们都试图在提出关于社会性别的重要问题,如暴力的持续性或统治的后果。但是它们的方法与对社会性别关系中对霸权的分析相抵牾,因而与这个概念的最初阐述和主要发展不相容(而不仅仅是一个变异用法的问题)。

如上建议的对霸权男性特质的重新阐释,对当前的社会性别政治越来越重要。在全球中心的富裕国家中,从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激进的市场发展论)向新保守主义(给宗教、种族中心主义和安全问题加上一层民意色彩)的转变,使得社会性别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进程使区域的和地方的社会性别秩序面对新的转型压力,同时也使得有权力的男人群体之间建立新的联盟。在跨国大公司、媒体和安全系统等全球领域,新模式的霸权正在形成。在随着历史而不断变化的社会性别秩序当中,霸权的产生和争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我们仍然需要概念性工具。

本文发表于:

Gender & Society, vol. 19 no. 6 (December 2005):829 - 859

姚　伟　杨丽静 译　冯芃芃　张　颖 校

参考文献:

Altman, D.. 1972. *Homosexual: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Sydney, Australia: Angus and Robertson.

Archer, L.. 2001. "Muslim brothers, Black lads, traditional Asians: British Muslim young men's constructions of race, religion and masculinity". *Feminism & Psychology* 11(1):79 - 105.

Baca Zinn, M.. 1982. "Chicano men and masculinity".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10 (2):29 - 44.

Barrett, F. J.. 1996. "Th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 case of the U. S. Navy".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3(3):129 - 142.

Belton, R. J.. 1995. *The beribboned bomb: The image of woman in male surrealist art*. Calgary, Canada: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Berg, L. D.. 1994. "Masculinity, place and a binary discourse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the human geography of Aotearoa/New Zealand".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2):245 - 260.

Bird, S. R.. 1996. "Welcome to the men's club: Homosocialit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Gender & Society* 10(2).

Bourdieu, P.. 2001. *Masculine domin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rannon, R.. 1976. "The male sex role: Our culture's blueprint of manhood, and what it's done for us lately". In *The forty-nine percent majority: The male sex role*, edited by D. S. David and R. Brannon. Reading, MA: Addington-Wesley.

Brod, H.. 1987.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The new men's studies*. Boston: Allen and Unwin.

Brod, H.. 1994. "Some thoughts on some histories of some masculinities: Jews and other others". In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edited by D. S. David and R. Brann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Broker, M.. 1976. "I may be a queer, but at least I am a man: Male hegemony and ascribed versus achieved gender". In *Sexual divisions and society*, edited by D. Leonard Barker and S. Allen. London: Tavistock.

Brown, D.. 1999. "Complicity and reproduction in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 *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 4(2):143 - 159.

Bufkin, J. L.. 1999. "Bias crime as gendered behavior". *Social Justice* 26(1):155 - 176.

Burgess, I., A. Edwards, and J. Skinner. 2003. "Football culture in an Australian school set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e identity". *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 8(2):199 - 212.

Campbell, H.. 2000. "The glass phallus: Pub (lic) masculinity and drinking in rural New Zealand". *Rural Sociology* 65(4):562 - 581.

Carrigan, T., R.W. Connell, and J. Lee. 1985. "Toward a new sociology of masculinity". *Theory and Society* 14(5):551 - 604.

Cavender, G.. 1999. "Detecting masculinity". In *Making trouble: 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crime, deviance and control, edited* by J. Ferrell and N. Websdal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Cheng, C.. 1996. "We choose not to compete: The 'merit' discourse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and 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men and their masculinity". In *Masculinities in organizations*, edited by C. Che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ckburn, C.. 1983. *Brothers: Male dom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London:

Pluto.

Cockburn, C.. 1991. *In the way of men: Men's resistance to sex equality in organizations*. London: Macmillan.

Collier, R.. 1998. *Masculinities, crime and criminology: Men, heterosexuality and the criminal (ised) other*. London: Sage.

Collinson, D., and J. Hearn. 1994. "Naming men as men: Implications for work,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1(1):2-22.

Collinson, D., D. Knights, and M. Collinson. 1990. *Managing to discriminate*. London: Routledge.

Connell, R.W.. 1977. *Ruling class, ruling cul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nnell, R. W.. 1982. "Class, patriarchy, and Sartre's theory of practice". *Theory and Society* 11:305-320.

Connell, R. W.. 1983. *Which way is up? Essays on sex, class and culture*. Sydney, Australia: Allen and Unwin.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Sydney, Australia: Allen and Unwin.

Connell, R. W.. 1990. "An iron man: The body and some contradictions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In *Sport, men and the gender order*, edited by M. Messner and D. Sabo.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Books.

Connell, R. W.. 1995.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Connell, R. W.. 1998. "Masculinities and globalizati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1(1):3-23.

Connell, R. W.. 2002. *Gen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Connell, R. W.. 2003. "Masculinities, change and conflict in global society: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of men's studies".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11(3): 249-266.

Connell, R. W.. 2005. "Globalization, imperialism, and masculinities". In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 masculinities*, edited by M. S. Kimmel, J. Hearn, and R. W. Connell.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nnell, R. W., D. J. Ashenden, S. Kessler, and G. W. Dowsett. 1982. *Making the difference: Schools, families and social division*. Sydney, Australia: Allen and Unwin.

Connell, R. W., and J. Wood. 2005. "Globalization and business masculinities". *Men and Masculinities* 7(4):347-364.

Consalvo, M.. 2003. "The monsters next door: Media constructions of boys and masculinity". *Feminist Media Studies* 3(1):27-46.

Dasgupta, R.. 2000. "Performing masculinities? The 'salaryman' at work and play". *Japanese Studies* 20(2):189-200.

Davis, A.. 1983.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Vintage.

Demetriou, D. Z.. 2001. "Connell's concept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A critique". *Theory and Society* 30(3):337 - 361.

Denborough, D.. 1996. "Step by step: Developing respectful and effective ways of working with young men to reduce violence". In *Men's ways of being*, edited by C. McLean, M. Carey, and C. White. Boulder, CO: Westview.

Dinges, M., E. Ründal, and D. Bauer. 2004. Program for the Hegemoniale Männlichkeiten conference, Stuttgart, Germany, 24 - 26 June.

Donaldson, M.. 1991. *Time of our lives: Labor and love in the working class*. Sydney, Australia: Allen and Unwin.

Donaldson, M.. 1993. "What is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ory and Society* 22:643 - 657.

Donaldson, M., and S. Poynting.. 2004. "The time of their lives: Time, work and leisure in the daily lives of ruling-class men". In *Ruling Australia: The power, privilege & politics of the new ruling class*, edited by N. Hollier. Melbourne: Australian Scholarly.

Eisenstein, Z. R.. 1979.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Ferguson, H.. 2001. "Men and masculinities in late-modern Ireland". In *A man's world? Changing men's practic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edited by B. Pease and K. Pringle. London: Zed Books.

Freud, Sigmund. [1917] 1955. *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Standard ed., Vol. 17. London: Hogarth.

Friedman, R. M., and L. Lerner.. 1986. "Toward a newpsychology of men: Psychoanalytic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Special issue, *Psychoanalytic Review* 73(4).

Gerschick, T. J., and A. S. Miller.. 1994. "Gender identities at the crossroads of masculinity and physical disability". *Masculinities* 2(1):34 - 55.

Goode, W.. 1982. "Why men resist". In *Rethinking the family: Some feminist questions*, edited by B. Thorne and M. Yalom. New York: Longman.

Gutmann, M. C.. 1996. *The meanings of macho: Being a man in Mexico 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cker, H. M.. 1957. "The new burdens of masculinity".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19(3):227 - 233.

Halberstam, J.. 1998. *Female masculin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nke, R.. 1992. "Redesigning men: Hegemonic masculinity in transition". In *Men, masculinity, and the media*, edited by S. Craig. Newbury Park, CA: Sage.

Hawkesworth, M.. 1997. "Confounding gende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2(3):649 - 685.

Hearn, J.. 1996. "Is masculinity dead? A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of masculinity/masculinities". In *Understanding masculinities: Soci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arenas*, edited by M. Mac an Ghaill.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Hearn, J.. 2004. "From hegemonic masculinity to the hegemony of men". *Feminist Theory* 5(1):49 - 72.

Herdt, G. H.. 1981. *Guardians of the flutes: Idioms of masculi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Higate, P. R.. 2003. *Military masculinities: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ndon: Praeger.

Hochschild, A..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Holter, Ø. G.. 1997. *Gender,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A social forms analysis*. Oslo, Norway: University of Olso.

Holter, Ø. G.. 2003. *Can men do it? Men and gender equality — The Nordic experience*. Copenhagen, Denmark: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hooks, b.. 1984.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Hooper, C.. 1998. "Masculinist practices and gender politics: The operation of multiple masculi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man" ques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M. Zalewski and J. Parpart. Boulder, CO: Westview.

Hooper, C.. 2000. "Masculinities in transition: The case of globalization". In *Gender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edited by M. H. Marchand and A. S. Runyan. London: Routledge.

Hooper, C.. 2001. *Manly states: Masculinit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end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unt, P. 1980. *Gender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acmillan.

Ishii-Kuntz, M.. 2003. "Balancing fatherhood andwork: Emergence of diverse masculinities in contemporary Japan". In *Men and masculinities in contemporary Japan*, edited by J. E. Roberson and N. Suzuki.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Jansen, S. C., and D. Sabo. 1994. "The sport-war metaphor: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 Persian-Gulf wa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1(1):1 - 17.

Jefferson, T.. 1994. "Theorizing masculine subjectivity". In *Just boys doing business? Men, masculinities and crime*, edited by T. Newburn and E. A. Stanko. London: Routledge.

Jefferson, T.. 2002. *Subordinating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6(1):63 - 88.

Kessler, S. J., D. J. Ashenden, R. W. Connell, and G. W. Dowsett. 1982. *Ockers and disco-maniacs. Sydney, Australia: Inner City Education Center.*

Kimmel, M. S.. 1987. "Rethinking 'masculinity':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In *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 edited by M. S. Kimmel. Newbury Park, CA: Sage.

Kimmel, M. S.. 2005. "Globalization and its mal (e) contents: The gendered 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errorism". In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 masculinities*, edited by M. S. Kimmel, J. Hearn, and R. W. Connell. Thousand Oaks, CA: Sage.

Kimmel, M. S., and M. Mahler. 2003. *Adolescent masculinity, homophobia, and violence: Random school shootings, 1982 - 2001*.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6 (10): 1439 - 1458.

Kupers, T. A.. 1993. *Revisioning men's lives: Gender, intimacy, and power*. New York: Guilford.

Lea, S., and T. Auburn. 2001.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ape in the talk of a convicted rapist". *Feminism & Psychology* 11(1): 11 - 33.

Light, R., and D. Kirk. 2000. "High school rugby, the bod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 5(2): 163 - 176.

Mac and Ghaill, M.. 1994. *The making of men: Masculinities, sexualities and schooling*.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MacInnes, J.. 1998. *The end of masculinity: The confusion of sexual genesis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modern society*.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P. Y.. 1998. "Why can't a manbe more like awoman? Reflections on Connell's masculinities". *Gender & Society* 12(4): 472 - 474.

Martin, P. Y.. 2001. "'Mobilizing masculinities': Women's experiences of men at work". *Organizations* 8(4): 587 - 618.

Martino, W.. 1995. "Boys and literacy: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egemonic masculinit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literate capacities for boys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English in Australia* 112: 11 - 24.

McMahon, A.. 1993. "Male readings of feminist theory: The psychologization of sexual politics in the masculinity literature". *Theory and Society* 22(5): 675 - 695.

Messerschmidt, J. W.. 1993. *Masculinities and crime: Critique and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o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Messerschmidt, J. W.. 1995. "Managing to kill: Masculinities and the space shuttle Challenger explosion". *Masculinities* 3(4): 1 - 22.

Messerschmidt, J. W.. 1997. *Crime as structured action: Gender, race, class and crime in the mak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Messerschmidt, J. W.. 2000. *Nine lives: Adolescent masculinities, the body, and*

viol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Messerschmidt, J. W.. 2004. *Flesh & blood: Adolescent gender diversity and violenc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Messerschmidt, J. W.. 2005. "Men, masculinities, and crime". *In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 masculinities*, edited by M. S. Kimmel, J. Hearn, and R. W. Connell. Thousand Oaks, CA: Sage.

Messner, M. A.. 1992. *Power at play: Sports and the problem of masculinity*. Boston: Beacon.

Messner, M. A.. 1997. *Politics of masculinities: Men in movemen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essner, M. A.. 2002.. *Taking the field: Women, men, and spor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essner, M. A., and D. Sabo, eds. 1990. *Sport, men, and the gender order: Critical feminist perspectives*.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Books.

Meuser, M.. 2001. "This doesn't really mean she's holding a whip":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nder order and the contradictory modernization of masculinity. Diskursl: 44 - 50.

Meuser, M.. 2003. "Modernized masculinities? Continuities, challenges and changes in men's lives". In *Among men: Moulding masculinities*, edited by S. Ervø and T. Johannson. Aldershot, UK: Ashgate.

Meuser, M., and C. Behnke. 1998. Tausendundeine Mnnlichkeit? Männlichkeitsmuster und socialstrukturelle Einbindungen. Widersprüche 67:7 - 25.

Mieli, M.. 1980. *Homosexuality and liberation: Elements of a gay critique*, translated by D. Fernbach. London: Gay Men's Press.

Mittelman, J. H.. 2004. *Whither globalization? The vortex of knowledge 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Morin, S. F., and E. M. Garfinkle.. 1978. "Male homophobia".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4(1):29 - 47.

Morrell, R.. 1998. "Of boys and men: Masculinity and gender in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Journal of South African Studies* 24(4):605 - 630.

Morrell, R., and S. Swart. 2005. "Men in the Third Worl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 In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 masculinities*, edited by M. S. Kimmel, J. Hearn, and R. W. Connell.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ris, C., and N. Evans. 2001. "Cheese makers are always women": Gendered representations of farm life in the agricultural press.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8(4):375 - 390.

Mosher, D. L., and S. S. Tomkins. 1988. "Scripting the macho man: Hypermasculine

socialization and enculturation".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5(1):60 – 84.

Namaste, V. K.. 2000. *Invisible lives: The erasure of transsexual and transgendered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ewburn, T., and E. A. Stanko. 1994. *Just boys doing business? Men, masculinities, and crime*. New York: Routledge.

Pease, B., and K. Pringle, eds. 2001. *A man's world? Changing men's practic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Zed Books.

Petersen, A.. 1998. *Unmasking the masculine: "Men" and "identity" in a sceptical age*. London: Sage.

Petersen, A.. 2003.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Some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heory for future work". *Men and Masculinities* 6(1):54 – 69.

Pleck, J.. 1981. *The myth of masculi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lummer, K., ed. 1981.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London: Macmillan.

Poynting, S., G. Noble, and P. Tabar.. 2003. "Intersections" of masculinity and ethnicity: A study of male Lebanese immigrant youth in Western Sydne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Roberts, P.. 1993. "Social control and the censure(s) of sex".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19(2):171 – 186.

Roper, M.. 1994. *Masculinity and the British organization man since 1945*.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ubin, H.. 2003. *Self-made men: Identity and embodiment among transsexual men*. Nashville, TN: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Sabo, D., and D. F. Gordon, eds. 1995. *Men's health and illness: Gender, power and the body*. Thousand Oaks, CA: Sage.

Sabo, D., and S. C. Jansen.. 1992. "I mages of men in sport media: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gender order". In *Men, masculinity, and the media*, edited by S. Craig. Newbury Park, CA: Sage.

Salisbury, J., and D. Jackson. 1996. *Challenging macho values: Practical ways of working with adolescent boys*. Washington, DC: Falmer.

Schwalbe, M.. 1992. *Male supremacy and the narrowing of the moral self*.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7:29 – 54.

Scott, J. W.. 1997. "Comment on Hawkesworth's 'confounding gende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2(3):697 – 702.

Segal, L.. 1990. *Slow motion: Changing masculinities, changing men*. London: Virago.

Skelton, A.. 1993. "On becoming a mal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The informal culture of stud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Gender and Education* 5(3):289 – 303.

Snodgrass, J. , ed. 1977. *For men against sexism: Abook of readings*. Albion, CA: Times Change Press.

Stoller, R. J.. 1968. *Sex and gend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New York: Science House.

Taga, F.. 2003. "Rethinking male socialization: Life histories of Japanese male youth". In *Asian masculinities*, edited by K. Louie and M. Low.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Thorne, B.. 1993. *Gender pla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Thornton, M. 1989. "Hegemonic masculinity and the acade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17:115 - 130.

Tolson, A.. 1977. *The limits of masculinity*. London: Tavistock.

Tomsen, S.. 2002. "Hatred, murder and male honour: Anti-homosexual homicides" in New South Wales, 1980 - 2000. Vol. 43.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Valdés, T. , and J. Olavarría. 1998. Ser hombre en Santiago de Chile: A pesar de todo, un mismo modelo. In *Masculinidades y equidad de género en América Latina*, edited by T. Valdés and J. Olavarría. Santiago, Chile: FLACSO/UNFPA.

Wajcman, J.. 1999. *Managing like a man: Women and men in corporate management*. Sydney, Australia: Allen and Unwin.

Walby, S.. 1997. *Gender transformations*. London: Routledge.

Warren, S.. 1997. "Who do these boys think they ar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ies in a primary classro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1(2):207 - 222.

Wetherell, M. , and N. Edley. 1999. "Negotiating hegemonic masculinity: Imaginary positions and psycho-discursive practices."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9(3):335 - 356.

Whitehead, S. M.. 1998.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visited".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6(1):58 - 62.

Whitehead, S. M.. 2002. *Men and masculinities: Key themes and new directions*. Cambridge, UK: Polity.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Farnborough, UK: Saxon House.

Zaretsky, E.. 1975. "Male supremacy and the unconscious". *Socialist Revolution* 4: 7 - 55.

从“霸权男性特质”到“男人的霸权”
From Hegemonic Masculinity to the Hegemony of Men

杰夫·荷恩(Jeff Hearn)

概　　要

本文探讨“霸权”(hegemony)这一概念对理论性地探讨“男人”有什么样的贡献。这个讨论是在“男性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on Men/CSM)的框架中进行,因为这个框架突出“权力”(power)作为中心问题;而在“男性研究”(Men's Studies)这样的领域,“权力”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最近很多对“霸权”概念的使用,比如男性特质(masculinity)分析中的“霸权男性特质”(hegemonic masculinity),我在本文中要仔细批评。另外我提出,我们的研究应该从男性特质转移到男人(men)、转移到关注“男人的霸权”(hegemony of men)上来。“男人的霸权”这个提法,目的是要探讨一个双重复杂的现象,即:男人既是一个被社会性别制度造就的社会范畴,也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集体与个体的能动者,而且通常是占统治地位的集体与个体的能动者。本文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关于男人的具体

调查研究，也会简单涉及CSM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本文的最后部分将考察这些观点与女权主义理论和社会理论领域中的各种讨论之间的关联。

对男人进行研究，这本身既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一定是激进的。关键问题是，这种研究怎么做。男人对男人进行研究也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称之为"历史"、"社会学"[1]或什么都可以。这些"男性研究"——通常无须冠名如此，简单说来就是由男人做的研究——未必明显地是关于男人的。这当中包括被玛丽·奥布里恩（Mary O'Brien, 1981）嘲笑地称为"男性主流"（malestream）的东西[2]——男人并不作为男人显著出场，或者，男人虽然被描述了，但是"男人"并没有被作为问题来分析。近年，以其他方式对男人进行理论化和阐述的著作也出现了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同性恋批评、酷儿理论、倾向女权主义的批评，以及如后殖民作品等男性主流之外的批判作品。这些批判研究针对的男人，是一个社会范畴，一个社会性别阶级，男人的具体群落，或者男人个体的集合。

另外，也有一系列关于男人的研究发展起来，一般就极笼统地称为"男性研究"（Men's Studies）。在这个框架内研究男人有很大的局限（见，Hearn, 1989,1997）。男性研究的某些版本，与妇女的利益背道而驰。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词也是模糊的：它是指关于男人的研究，还是由男人做的研究？它是"妇女学"（women's studies）的一个假对应。在最糟的情况下，它是反女权的。喜欢男性研究这个主意的某些男人，对于推动女权理论和实践根本不感兴趣。所以，我反对在"男性研究"的框架中发展我们这个领域，但我也意识到，这个词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含义。[1]

---

〔1〕原文中作者特别使用了"History""Sociology"大写加引号，以表达一种理论姿态，即历史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与权力密不可分；从社会性别意义上讲，占主流地位的研究多是男权主义的。——译注

〔2〕"malestream"是"mainstream"（"主流"）的故意误用，旨在指出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即男权的/男性的就是主流的。——译注

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在“男性批判研究”的框架内概述关于男人的研究,而这个框架关注到权力问题的要害性。我主要的关切点是“霸权”(hegemony)这个概念,以及在最近男性研究理论化过程中这个概念的主要用法。这些用法,与男性特质分析当中的“霸权男性特质”一样,在本文中都要加以剖析。我认为霸权的概念对把男人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来分析非常适用,比如“男人的霸权”这个提法。本文通过考察关于男人的实际研究以及 CSM 领域的体制发展简史来讨论。在文章最后,我将讨论这些论述与女权主义理论及社会理论之间的关联。

男性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on Men)

男性批判研究起源于数个不同的批判领域:主要是女权主义,还有同性恋与酷儿研究,还有男人对于女权主义,以及关于社会性别关系的回应——特别是倾向女权的男人的回应。所以,男性批判研究指的是,在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情境下批判地讨论男人的这一类学术领域。显然,它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以及女权主义者将男人作为“男人”来研究这一贡献(Hanmer, 1990)。其他批判领域也以不同的方式来讨论男人作为社会性别化了的人。同性恋研究因其考察的是相同社会性别的性存在,必然就要用社会性别的范畴来讨论人。同性恋以及某些酷儿领域的写作和研究,在关注男人这个问题上与女权主义写作和学术非常不同(例如,Beemyn and Eliason, 1996)。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批评不一定重合,这是有原因的(Edwards, 1994)。因为酷儿研究越来越成为社会性别和性存在的研究——包括男人和男人的性——这个广阔领域当中的主要力量。而男同性恋写作不一定都会分析男人的权力甚至“男人”这个范畴本身,但是大部分的酷儿写作则考察“男人”这个范畴,以及其他社会性别和性的二元对立。

近年来,既有女性又有男性参加的男性批判研究大获成功,出现了各

样的学术系列、学术期刊、网络、会议、研究课题,甚至具有百科全书规模的参考书籍。但是,关注男人,也带来了再一次排斥妇女的危险可能。减少这种危险的一个办法,就是不懈地审视“男人”是如何存在的,以及“男人”与妇女、儿童、青年和男人彼此之间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虽然我们不能一味地认定所有的社会情景中都有权力的问题(Holmwood, 1999),但是,坚持考察权力(power)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以往对男人的研究中出现的很多问题(Hearn, 1998b; Hanmer and Hearn, 1999)。

男性批判研究当中的“批判”(“critical”)这个字体现了它对权力问题、对社会性别权力问题的关切。权力以多种方式运作、流动和变形。然而在大多数的社会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则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男人在大部分的生活领域中,结构性地并且人际性地处于统治主导地位。我们可以称之为父权制或者具有历史性差别的各类父权制(Walby, 1986,1990; Hearn, 1987,1992)。这个研究方法不忽视男人彼此之间存在着年龄、阶级、族裔等等差异,包括与妇女的关系上的差异。相反,它强调在各种父权制内部男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是如何复杂地互动的(Hearn and Collinson, 1993)。

我采取这样一个讨论立场,是为了更准确——或者允许我大胆地说——更科学。[2] 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还没有讲究科学性,而且很多具体研究成果还未关注到,“男人”是社会性别化的人,是社会地建构和再生产出来的;他们不是经济学或政治学的标准课本上描述的那种无社会性别、无性、“中性”的成人、公民或人群。很多妇女还有少数男人已经注意到:首先,男人可能是具有社会性别的;其次,对“男人”可以用不同的、更有批判性的方式来研究。总而言之,男性批判研究这个术语和框架希望阐明的是:这样的男性研究必须具有批判性;是关于男人的;明确地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由男人和妇女分别或合作地进行。男性批判研究的发展意味着:(1)理清研究中采取的不同政治立场和话语实践(Hearn, 1998b);(2)适宜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Hearn and Morgan, 1990; Morgan,

1992; Pease, 1996, 2000a, 2000b; Hearn, 1998c);(3)对实际调查研究结果的诠释(Collinson and Hearn, 1994; Hearn, 1998c); (4)对学术领域的改造(Hearn, 1997, 1998a)。

权力的问题、男人的权力的问题

男性批判研究自身的"批判性"特别来自于对权力问题的关切,即:社会性别化的——通常主要是男人的——权力。[3] 这并不等于是说,所有的男人都是(非常)有权力的或者说男人全都是有权力的;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一点从全球角度看就格外明显。其实它要强调的是,权力是男人的社会关系、行为和经验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广泛存在的方面,这些在主流社会科学中还继续被忽视。另外,近来男性批判研究对"霸权"的思考应该被放在关于权力、社会性别化的权力和男人与这样的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大的讨论中。

这里我要探讨的是:某些男人对权力和重要资源的持续积累,男人的实践中对权力和统治的表达,以及"男人"这一社会范畴与权力之间强大的关联。男人的权力和统治可以是结构性的和人际性的,公共的和/或私领域的,被接受、被想当然认同的和/或被意识到、被抵制的,明显的或微妙的。它也包括所有这些形式的暴力或者对它们的触犯。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一直侧重于男人的各种不同方面,这总是涉及与权力相关的种种问题。我不仅在关于各种父权制进行理论上及历史分析的时候关注权力问题(Hearn, 1987,1992),在对于男人和权力的关联而进行的相当具体的考察研究中,我也是这么做的——例如管理的问题(比如,Collinson and Hearn, 1996),男人对女人的暴力(比如,Hearn, 1998c)的问题,等等。但同时,男人的大部分权力还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理论层面上讨论男人在父权制当中的权力,除了关注比如暴虐的丈夫或军人他们所具有的直接的力量,以及受到威胁的力量,还要处理的

一个问题是“协同”(consent)。[1] 就是在这个地方,“霸权”(hegemony)的概念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为了维持父权制权力关系,霸权所涉及的,既有某些男人的协同,也有——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某些女人的协同。至少,某些有权力的男人在建构女人的协同和复制男人的协同上,占有主导地位。在更加细致地考察“霸权”问题之前,我先来简单讨论一下如何去理解、分析和在理论上讨论权力。

分析“权力”的框架有很多(如,Clegg, 1989)。权力常常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能力、能够通过奖或罚来取得对他人的统治或影响的能力(Dahl, 1957; Lukes, 1974; Weber, 1978; Wrong, 1979)。权力还有一个方面也被提出来,就是某些人的利益永远不能提升到政策制定或议事日程的正式内容中(Bachrach and Baratz, 1962)。[4] 卢克斯还强调了权力的第三个层面,认为人们的“真正利益”被意识形态的制约所扭曲。这第三个层面或“激进的”观点,把主观意义上的利益移向宽泛的、假设的利益。因为对激进者而言,“所谓需要,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与人们的利益相悖的制度的产物,并且这个制度与他们的所想所欲是有关联的——如果他们自己真的能做选择的话”(Lukes,1974:34)。

这第三个层面引导我们思考结构层面的问题,包括霸权的运作。卢克斯(Lukes)的方法提供了进行结构性分析的一个模式,而结构性分析的模式和层面还有很多,包括:重视集体行动者;规范性与社会冲突和抵抗的持续性;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之间的交叉;生产的技术关系与生产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5] 卢克斯对结构的观点与对能动性的认识密不可分,尽管能动性所处的具体情境总在阻止人们“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最佳利益。突出“利益”的问题,是其长处也是其弱点,因为一方面把“非决策性”领域的考察延展到了更为基本的层次,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分析者的假设姿态。[6] 这里还是有对霸权理论的呼应。

---

[1] “consent”这个词,有时被译为“同盟”,此处我们译成“协同”。——译注

近年来，针对非实质性的和结构主义关于“权力”的认识的主要批判，都是在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激进多元文化主义当中发展的。后结构主义对于权力的理解，通常把个人看作是被其所处的话语环境建构的，因而“客观存在的”利益并不是以“等待被定义”的形式存在。[7] 虽然后结构主义的某些追随者着重关注微观及地区性问题，后结构主义并不一定反对全球性统治持久存在的认识（如，Foucault，1980）。

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激进多元文化主义有关权力/抵抗的探讨，把社会性别、性存在与冒犯以及它们与其他社会差别的交叉带到了中心舞台（Hennessy and Ingraham，1997；Willett，1998；Zack et al.，1998）。女权主义和福柯之间的接触（比如，Diamond and Quinby，1988；Sawicki，1991；McNay，1992；Ramazanoglu，1993；Macleod and Durrheim，2002），在探索社会性别化的与非社会性别化的“权力”观念之间的关系上，有格外的重要性。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交叉，继续创造着关于“权力”的重要认识——比如对内容和情境两者关系的思考，加强了有关“霸权”的讨论的复杂性。

虽然有关“权力”的讨论向多种不同方向展开，但是上述的权力的第三个层面的观点，与某些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方法有惊人的共识。它们都指出了考察那些人们不假思索的微观权力过程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和集体的“利益”的不确定性。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认识、有政治目的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和象征相互作用论者[1]所阐释的，在身份认同和叙述建构的政治群体中的历史变化（Plummer，1995），后结构主义有关话语权力关系的分析以及葛兰西式“霸权”的概念，确实都可以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思考。

---

〔1〕 相互作用（interactionalism）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微观社会学理论，认为意义是在个体之间的互动当中产生的。——译注

霸权(Hegemony)

在这一部分,我具体集中讨论"霸权"的概念,然后再探讨男性批判研究领域对它的应用。"霸权"的概念,使我们一些大的意识形态的讨论能够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是所谓日常的、不假思索的观念;一个是"有共识"、"非强制性"地实施的行为。"霸权"这个词,在近些年关于"男人"——主要是关于"霸权男性特质"——的争论中被广泛地使用(Carrigan et al., 1985);另外还有相当有限的比如"男性霸权"(male hegemony) (Cockburn, 1991)或者"霸权的异性恋男性特质"(hegemonic heterosexual masculinity) (Frank, 1987)。

霸权的概念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阿贝克鲁比和特纳(Nicholas Abercrombie and Bryan Turner, 1978)指出,马克思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第一种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的"前言"中提出(Marx, 1859/1975):"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因此特定社会阶级的、特定的社会体验就决定了那个阶级的成员的观念。所以,观念由直接的物质关系决定——即一般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位置,还有日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另外,这样的探讨就为表述以阶级为本的几个思想体系提供了基础,甚至也为一个相对的多元主义的分析提供了基础。马克思的第二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发端于"前言"但是更为著名地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经济结构,真正的基础"决定"一个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因此"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就是每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and Engels, 1845/1970)。这种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第一种一样,体现着物质和思想的力量;然而它却更加有决定论倾向,更多地关切社会形构而不是某些阶级和阶级分化的活动。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反对经济决定论和一种不那么教条的共

产主义，从而把上面的第二种思想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1971)。1921年他帮助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墨索里尼上台后将共产党定为非法，他被逮捕关押起来(1926—1937)。身处于2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框架中，葛兰西是在地位与权谋的斗争中来看政治和经济的。在他关于霸权的分析中，文化和思想领域甚至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更重要。因为对他来说，这些领域并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效应；而是本身能产生重大政治影响。

最重要的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解释了一个(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如何控制社会，鼓吹它自己对形势的定义。他认为这涉及被统治群体积极的协同(虽然这个协同也靠强制，特别是国家强制)。他同时指出在霸权的建构中那些集体政治力量的网络——国家、法律、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等。这样，他就提出了一种类似文化经济论的理论，或更精确地说，一种经济文化论。霸权的概念，就这样基本上追随着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第二种理论(Abercrombie and Turner, 1978)，但重要的是，它也借鉴了第一种理论对于日常(文化)实践的关注。

麦克·唐纳森(Mike Donaldson, 1993:645)是这样描述这一概念的：

> (它是)关于获得和掌握权力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群体的形成(和瓦解)。它思考统治阶级建立和维持其统治的各种方式。能够迫使人们接受对形势的一种定义，能够规定解释和讨论事情的方式，能够确立理想并且定义道德——这样的能力是这个过程关键的部分。霸权需要劝服人口中的大多数，特别要通过媒体，还需要把社会体制组织得看上去“自然而成”、“普通”、“正常的”。国家通过对不服从者的惩罚，就相当关键地卷入了这个博弈和强制执行的过程。

罗伯特·博可可(Robert Bocock, 1986:63)很清楚地归纳了这种过程，认

为霸权发生在“由统治阶级或分散的阶级所形成的联盟来提供的思想、道德以及哲学的领导能够成功地提供对整个社会的基本看法的时候。”我将回到这一定义上来。不过现在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与葛兰西从他所处的那个政治环境出发而写作的时候相比，所谓一个社会有着一个“基本看法”的观点，在我们目前看来更成问题。[8] 在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交汇点上，随着依时空而定的政治意义的变化流动，发生了广泛的、关于重新探究“霸权”概念的多种可能性的讨论。某种程度上说，后结构主义——至少其福柯式版本——已经代表了一种涉及物质（the material）与话语（the discursive）两层的理论探索。其主要支持者中，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uffe，1985，1987）针对马克思主义当中的本质主义进行了批判，因此对“霸权”的理解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话语地建构起来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进一步的反对意见，认为这在语言学的道路上“走得过远了”（Geras，1987；Clegg，1989；Butler et al.，2000）。另一方面，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非常具体地对比了两种对霸权的理解：一种观点“只考虑在政治领域里的权力运作——互不牵连的不同的权力集团互相竞争以掌控政策问题”；另一种霸权的概念“强调权力的各种运作方式如何构成了我们对社会关系的日常理解，如何组织着我们默认（并复制）那些不成文和暗藏的权力关系的方式”（Butler，2000：13—14）。我将在本文结尾再回到这一点上。

霸权的概念如何在男性批判研究里提出既重要又有意思的问题呢？首先，它让我们注意被复制的统治的形式和本质：谁的统治被复制？被谁复制？它还探讨强制之外的、发生在不假思索的、常识的、文化的领域当中的事情。它不仅是关于（政治）内容的，也是关于（政治）过程的。这些问题对于分析社会环境中的男人、对于分析有关男人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我先具体讨论前者，然后再简要地探讨后者。

霸权和社会环境中的男人

对社会环境中的男人进行社会分析，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社会性别的统治及其被不假思索地接受的状况，是主要与经济制度、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级（可为多个）有关、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关？还是说我们需要把霸权与社会性别制度（父权制）联系起来？如果是前者，即经济制度论，就需要重新考虑各种要素，要审视当今民族国家内部的种种变化、一个国际的和跨国的经济统治阶级的生成（这个阶级主要是男人，也有一些女人；不过通常它都是被以社会性别中立的语言来描述）（Sklair, 2001）。但是近年来，多数学者采用后者，即社会性别论，特别是用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作为对一般男性特质[1]分析的核心部分。我将首先探讨这种社会性别论，然后提出另外一种方法，一种围绕着男人的霸权（the hegemony of men）来进行分析的方法。

霸权男性特质(Hegemonic masculinity)

近年来，在社会性别关系这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内部，“霸权”的概念得以进入男性批判研究的辩论，主要是通过“霸权男性特质”这个概念。霸权男性特质最先提出时，是作为一种形式的男性特质，或者一种社会性别实践的模式，以区别于其他不那么占统治地位的，或者从属性形式的男性特质——共谋的、从属的、边缘化的（Carrigan et al., 1985; Connell, 1995）。的确，在90年代男性研究中，霸权男性特质这一概念已经成为被

〔1〕男性特质的英文是 masculinity，其复数形式 masculinities 被许多学者运用来讨论多种形式的男性特质。围绕着“复数”而产生的争论，在根本上是由于对“男性特质”的定义和含义的不同间接而衍生出来的争论，并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本文作者在后面有进一步阐述。在本文中，如果作者用的是复数，通常情况下译为“各种/多种男性特质”；个别情况下，于上下文没有太大关系，只译为“男性特质”。——译注

频繁使用并被广泛接受的一般概念手段。这本身就很了不起，说明了它的创造者所具有的洞察力；这也反映着，为加深讨论和书写男人与权力这个问题，急需这样的概念。

首先出现的关于“霸权男性特质”的重要探讨，是康奈尔（R. W. Connell）在 1979 年写的一篇题为“男人身体”的文章，收在 1983 年出版的《何为上？》（*Which Way Is Up?*）这本书里。它产生的背景是当时有关父权制的大讨论。这篇文章与关于父权制的理论探讨和对小学男女学生的实证研究的两篇文章一起发表。在后来另一篇更深入探讨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文章中，作者批评了对“霸权”这个概念的功能主义滥用（Connell, 1983：156）。在这儿，与多种男性特质相关的“霸权”是涉及社会性别关系的父权制里的霸权。私下里康奈尔曾谈到（2001 年 3 月 1 日），“我当时想把关注点移到父权制社会中男人活动的行为模式和情感模式，包括其中的一些复杂性、分歧还有矛盾；我当时还想在理论上对父权制的历史变化过程有一个把握。”

“男人身体”这篇文章从好几个方面看都非常有意思。它考察了男孩和成年男子实践活动中的（或许可以称之为）身体的社会建构。在讨论“男性的身体层面”的时候，康奈尔指出了体育作为“很多男孩学校生活中的最重要经历”的社会重要性（Connell, 1983：18），他强调以下的这些实践活动和经历：对空间的争取和占领，让身体保持紧张、技巧、个头、权力、冲力、力量，身体的成长，性行为。他指出，虽然主要的是霸权男性特质，其他（非霸权的）性行为模式中也有身体的大量介入。在讨论成年男子的身体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身体在三个领域中起的区别性作用：工作，性存在以及父职。文章的最后部分把重点放到男性特质的心理、社会动态上。这样就在分析那些生成了霸权男性特质的父权制关系的时候，融入了心理动态分析。最重要的是，康奈尔强调，“男性特质嵌入身体，这是一个社会过程，充满了张力和矛盾；连身体层面的男性特质都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不是一个生物学事实。……它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不断地在行动和

关系当中被建构,不断地被牵连到历史变化中"(Connell, 1983:30)。

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进一步发展,其背景则是男同性恋运动和对(男人)同性恋运动的研究回顾。它与同性恋解放理论的关系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提姆·卡里根(Tim Carrigan)和约翰·李(John Lee)这两位同性恋活动家到康奈尔这里来做研究助理,当时研究的课题是关于社会性别理论的社会理论考察。于是,就出现了霸权男性特质这个概念的重塑,表达了来自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解放两方面的针对"压迫"的分析。这个重组的概念被他们(Carrigan, Connell and Lee)于1985年发表在《理论与社会》一书中(p.586)。他们写道:

> 从这种论点(即异性恋—同性恋的男性特质存在着等级)里生成的是"霸权男性特质"这个重要概念,不是"男人角色",而是男性特质的一些特定内容——其他人,包括年轻的、女人气的以及同性恋男人,都要去服从。在父权制的性关系当中被压迫的男人,是某些群体的男人,并不是普遍的男人,是那些其处境与女人屈从男人的总逻辑相关的男人,尽管具体方式可以不同。把男性同性恋作为一个考虑的要素,就使得我们能够开始把男性特质更加动态地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一个结构。

与葛兰西理论一致,他们也认为,霸权"总是指一个历史局面、权力被夺得和被把持的一些环境条件。霸权的建构,不是对已经形成的群体颐指气使的问题,而部分地是一个形成这些群体的问题"。所以,"要想理解各种各样的男性特质,就需要考察霸权被构成、被挑战的各种实践活动——简言之,就是审视父权制社会秩序的政治技巧"(p.594)。这就涉及考察一系列社会性别化的过程——商业大众传媒、广告、劝说、幻想,以及各种差异性的对男性特质的再表现;被社会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及各种职责和工作的社会定义;国家和法律的活动,比如将同性恋定义为犯罪。与这些过

程有些相似的是需要投入情感认同的更为普遍的社会过程，如生产/工作/劳动关系以及权力等，这些社会过程组成了社会性别秩序和社会性别制度(Connell, 1987,1995)。

在《男性特质》[1]一书中，康奈尔(1995)对霸权男性特质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和运用。他重申了葛兰西通过文化关系的运作而进行的经济阶层分析与这个概念之间的关联，并且指出，霸权男性特质总是面临挑战和可能的变化。霸权男性特质在这本书里的定义略有变化，它是：

> 社会性别实践的模式，体现了当下被接受的对父权制之合法性问题的看法，保证了(或者说被用来保证)男人的统治地位和女人的从属性。(p.77)

康奈尔强调，霸权男性特质体现的是一个"当下被接受的"看法或策略。因此，尽管比较稳定，它还是被挑战，取决于斗争和变化的。有趣的是，他也指出，霸权男性特质文化理想最有力的提倡者，未必就是最有权力的个人。的确，拥有权力的个人，可能与那些代表着霸权男性特质文化理想的人有很大不同。即便如此，在文化理想与体制权力之间——比如在国家、企业和大集团权力之间——总有一些关联。另外，康奈尔还更加复杂地讨论了男性特质的四种形式之间的互动(霸权的、从属的、共谋的、边缘化的)。例如，一些黑人男性可能接受了霸权男性特质的某些方面，但是可能就霸权男性特质的授权而言，他们又是被边缘化的。

霸权男性特质这个概念极其成功的地方，是在归纳男人对女人以及其他男人的统治的各种形式上。然而，对男性特质的重新定义不是没有问题。虽然康奈尔(1993,1995)强调了各种男性特质的，甚至是男性特质这个概念本身的文化具体性，但还是有人指出，这个词语本身已经被

[1] 这部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书名译为《男性气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译注

广泛地、用众多不同的方式使用了，这可能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都是一个弱点（见 McMahon，1993；Hearn，1996b；Clatterbaugh，1998）。康奈尔自己也把霸权男性特质描述成一个“社会性别实践的模式”，而不是男性特质的一种，可是这个词语的使用常常似乎是被当成了一个种类。

唐纳森（1993）指出，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是不清楚的，本身可能就带有矛盾（比如，在体育明星的实践活动和再表现上），并且未能呈现社会性别制度的独立性。他认为定义霸权男性特质非常困难，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是“反霸权的”。举例而言，男人在父职或育儿方面更多地参与，是表明霸权男性特质的加强还是削弱？他认为，强调（霸权）男性特质的时候，经济阶级被忽略了，而它对政治和理论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

围绕着到底什么算是霸权男性特质的问题，也有很多挥之不去的疑问。它究竟是一个文化理想，还是一些文化形象，甚至是幻想？它是不是被集中表现在英雄们身上？它是不是“强硬”、“攻击性的”、暴力的？抑或是共同的体面？还是它就是异性恋歧视性的同性恋恐惧症？或者它就是父权制社会性别组织模式的普遍顽存？

最重要的是，有三个未能解决的问题。第一，我们说的是文化再表现、日常实践，还是体制结构？其次，男人这些主导性的统治方式究竟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强硬/攻击性/暴力；体面/团体性；对资源的控制，对形象的控制，等等？第三，既然“男性特质”的概念已经被批评了（Eichler，1980；Carrigan et al.，1985），并且被用滥到有时让人困惑的地步（McMahon，1993；Hearn，1996b；Clatterbaugh，1998），[9] 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使用它，而不是其他的提法，比如，“男人的实践活动”（Connell，1985，1987；Hearn，1996b）？

另外一点其实是从有关“霸权男性特质”的细致的实证研究中出来的，并且将问题更复杂化了，例如考察男人如何很现实地谈论自己。威瑟列尔和艾德里（Margaret Wetherell and Nigel Edley，1999）描述了在与

霸权男性特质的博弈中以及在“男性的”的身份认同中，有三种更为具体的“想象的立场与心理—话语实践”。它们是：英雄的立场，“普通的”立场，以及叛逆的立场。“英雄的立场”实际上非常贴近康奈尔提出的共谋的男性特质的概念。他们写道：“……它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具体表达霸权男性特质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很坚决地与传统的理想保持一致”(p. 340，原文的强调)。“‘普通的’立场”试图远离某些有关“男人的”的习俗或理想的观念；它强调的是“自我的普通性，自我是正常的、中庸的或者一般的。”“反叛立场”的特征主要在于他们的非传统性，是一种蔑视社会期待的想象的立场(p. 347)。这些自我定位——尤其是后二者——有趣的地方是，所谓“男人的”和男性特质的自我建构(不论是否霸权)，都有模糊性和微妙性，甚至存在矛盾。其实，“霸权的”概念的微妙之处可能恰好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很难将它简化为一套固定的立场和实践。

怀特海德(Stephen Whitehead, 1999)对这个概念的讨论反映了这些问题。他说：“构成着日常社会关系的，是一些灌输和抵制并存的复杂机制。霸权男性特质这个概念，在揭示这些复杂机制的工作上很难走远。它不能解释，在欧洲/美国/澳洲国家的社会史当下这个时刻，男性特质这个概念都带有哪些不同的含义。”(p. 58)(另见 Whitehead, 2002)这个判断也许有点严厉，但是它的确指出了对实际研究可能造成的具体局限。它还指出，我们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情境当中来审视概念，这样才能继续推进讨论。

男人的霸权(The hegemony of men)

虽然我已经描述了“霸权男性特质”引起的一些问题，我并不因此就断言“霸权”这个概念不能帮助我们深刻地分析男人。相反，我认为，霸权这个概念通常被用得太局限；对男性特质的关注过于狭隘。其实，现在应该从男性特质上回到男人上，开始考察男人的霸权以及与男人有关的霸

权。男人既是一个由社会性别制度构建起来的社会范畴，又是一个在社会实践中占统治地位的集体及个人能动者。考察“男人的霸权”就是要处理这样一个双重复杂性。

这样就更要求我们批判地考察那些普通的、被不假思索地接受的占统治地位的对男人的建构、他们的权力和权威——相对于妇女、儿童以及其他男人(既包括被压迫的男人，也包括处于权力等级高位的男人)。这就需要讨论，“男人”这个社会范畴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这个范畴会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以及男人那些理所当然的、通过协同而实现的统治和控制。对占统治地位的(Hearn, 1996a)“常识性的”男人这个社会范畴进行解构，是十分迫切的课题。如果没有了这个范畴——不是通过所谓“社会性别灭绝”而是通过社会性别改造，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

如此理解“霸权”可能会使我们走一条略微不同的路。我们的关注点不是“霸权”如何“对已经形成的群体颐指气使的问题”，而首先是“这些群体的形成问题”(Carrigan et al., 1985:594)。如果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所谓男性特质的各种形式(或者社会性别实践的各种模式——占统治地位的或其他的)，而是重视男人的分类和建构(在两种意义上)怎么变成了理所当然的，那么就更符合葛兰西对于霸权的最初定义。于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审视霸权在各种集体政治势力的网络中如何运作(这些集体政治势力包括国家，法律，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等)；审视“由统治阶级或分散的阶级形成的联盟所提供的思想、道德以及哲学的领导如何成功地提供对整个社会的基本看法”(Bocock, 1986:63)；以及考察霸权如何涉及被统治人群的积极协同(即便那种协同是由强制来支撑的)。

因此，考察社会生活中男人的霸权这样一个问题，要做的不是找出男性特质的某些形式或者找出霸权男性特质，而是要分析是什么决定了(在与女人、儿童和其他男人的关系中)“做男人”的不同方式。有趣的是，对“男人的霸权”的这种理解，也很可能会引导我们去问：男人被政府——包括国家，法律，医学，社会科学，宗教，企业，等等——归类，都通过哪些占

主导地位的方式进行？这些方式彼此之间是如何地交叉、互补和互相矛盾的？这些集体政治势力的网络并非固定不变的；有关男人的主张有不同定义和建构，这些定义和建构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考察这些变化。这包括通过全球化力量产生的变化，有动摇"整个社会的基本看法"的倾向。当代霸权可能并没有对于男人和有关男人的单一的基本看法。在结尾部分我将回到这一点上来。

这样考察男人以及由这种视角产生的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启示，似乎至少有七个主要的方面。

(1) 在某些社会过程中，对于男人这个范畴，有一种霸权性的接纳(hegemonic acceptance)。这种接纳包括：通过生物学和医学检查来归类出一些叫做"男人"的人（主要在人出生时和出生后强调阴茎的存在与否），而这个归类不被质疑，被不假思索地接受；国家行为——人口和统计数据分类；有组织的宗教和教育的实践；其他大量组织性和制度性的方式把某些男人分到"男人"这个社会范畴当中去的。比如，男女分开的卫生间，参军时和在军队内的社会性别具体措施，等等。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男孩"和"男人"之间关系性的区别。宗教的、教育的、军队的和工作的机构代表了这类霸权性定义的主要相关场所。

(2) 存在着一个对不同形式的男人，以及男人对待妇女、儿童和其他男人（以及我们今天通常说的各种男性特质）的实践进行区别和分类的体系。这是最接近目前"男性特质"（复数）这个词语用法的——虽然如上面所指出的，这个词语近年来的用法繁杂。但是，我希望大家更关注对男人和男人的实践进行区分的各种制度体系的社会建构，而不仅仅把男人的某些特别"形式"的社会建构作为男性特质来关注。

(3) 然后我们可以问：是哪些男人以及哪些男人的实践（媒体、国家、宗教等等）在规定区分体系的内容时权力最大？具有霸权性的，是这些普遍的观念和实践，而不是所谓霸权男性特质的某一个特定形式。

(4) 我们可以试着找出男人的实践中传播最广、重复最多的某些形

式。我们可能会发现,那些被称为“共谋的”形式很可能在男人的建构和男人存在的各种样态中起一个更关键的作用(以区别于妇女、儿童和其他男人)。正是“共谋”最具有霸权性。

(5) 男人的各种不同的、变化的所谓日常的、“自然(化)的”、“普通的”、“正常的”以及最理所当然的实践活动,我们可以在其与妇女、儿童和其他男人的关系中对它们进行描述和分析,对它们自身矛盾的、甚至是悖论性的涵义进行描述和分析——而不是仅仅描绘最被崇尚的文化理想,或者男人的实践中最夸张的或过度服从的那些形式。

(6) 还有一个问题是,妇女如何区别性地支持男人的某些实践活动、压制他们的另外一些实践活动和“作为男人”的方式。[10]这就引导我们去考察妇女对男人的霸权的“协同”。

(7) 以上六个方面之间有各种的互相关联。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霸权性的社会性别秩序当中(这个秩序也造就了“女人”,其他社会性别以及男孩),“男人”的形成,与以各种形式塑造着并重塑着男人之间的霸权性区分方式的那些男人实践,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总之,这样的探讨坚定地将生物学和生物差异放在文化的框架中去考察。当代“西方”的建构男人以及男人实践活动的那些体系,是文化的体系,那些体现着第三性和第三性别的体系和其他看似更为复杂的模式也是一样(比如,Herdt, 1994; Lorber, 1994)。霸权的问题,并非一定是——或者说不仅是——关于(各种)霸权男性特质某些形式的社会斗争和再生产,而是:在某一社会中或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里,围绕男人的霸权的斗争以及男人的霸权的再生产是怎么一回事(Hearn, 1996a);男人的霸权既是一个社会范畴,也体现在男人的实践活动中。这个思路会使我们有可能在跨性别和酷儿研究与唯物主义的、具体化的社会性别的阶级研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11]

正如马克·瑟曼(Mark Surman, 1994)所言:霸权,就是用一种方式

看问题，并说服人们，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是自然的、“事情本来就是那个样子”。这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包括关于男人和男人存在的“自然而然”，本身就可能越来越受制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各种过程（Connell，1998）。

不过，这样修正与男人相关的“霸权”还是有一些难题。我们要注意这个讨论与讨论以阶级为基础的概念的类似性和区别。“男人”——或许更准确地说“男人”应该被理解为——既是统治阶级又不是统治阶级。“男人”既在男人的霸权当中（或者说一个霸权性的社会性别秩序当中）被构建、也在构建那个霸权。一个霸权的社会性别秩序，建构了“男人”也建构了“女人”，但是男人也以各种方式，活跃地参与着构建和重建男人之间的各种霸权性区别分类。

霸权和男性批判研究

在进入“结论”部分之前，可能应该简要讨论一下这个研究男人的方法有哪些意义。在有关男人的实际研究中运用霸权的概念，对男性批判研究的学科发展也具有意义。这项研究内容有部分关注到概念的使用，其实，前面的具体讨论也关系到在男性批判研究中发展反霸权实践。明确地把男性批判研究自身放在与霸权相关的位置上，就要求我们思考：如何深入学术批评但又不复制男人的霸权？在学院、媒体、平等问题讨论、政治以及政府中它所占据的一些思想、道德和哲学空间里，男性批判研究需要反霸权，而不是继续生产霸权。这个观点也挑战了一种无意识的假设，即认为男性批判研究能够改造和解放女人和男人。

我们可以就男性批判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提几个问题：如何批判性地研究男人，才能抵制霸权以及抵制霸权性的定义和势力？男性批判研究如何挑战、或难以挑战霸权？男性批判研究当中的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同情在哪里？在男性批判研究中参考了和运用了哪些女权主义？什

么样的女权主义未被参考和运用？这些研究是否产生改造的作用？理论、实践和政治的关系是什么？这些研究占据着什么样的思想、道德和哲学空间(Messner，1997)？

男性批判研究和一般的批判性研究一样，需要对知识的社会基础——包括国家的、地区的和文化的情境对知识的影响——有强烈的自觉。这就要求在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上有一种非常具有权力批判意识的自我反思。社会环境中的男人内部生发的反思(May，1998)，必须要与针对男人的分析的指向性反思联系起来。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所谓“彻底的觉悟”，对知识的社会基础进行质疑本身就是批判的一部分，不管在普遍意义上还是针对男人。这意味着对于世界上发生的在男人身上和由男人导致的各种变化，我们要有基于实际调研的和政治的反应。某些情况下，这要求我们通过改变世界的诉求努力来了解在实际调研基础上可知的世界。更具体而言，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沉默的领域发言——不论这些是全球性的沉默，地方性的沉默，还是微观政治的沉默。

结　论

本文是探索性文字，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大家探讨当前男性批判研究的状况以及一些概念化实践的问题。近年来男性批判研究领域的工作多为具体研究，发展概念和理论，以及创建这一学术领域。当前的发展状态说明有必要重新思考概念和理论的问题，而无须花许多精力去讨论研究男人的合法性(这是早期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本文提倡的方法，希望能够使“霸权”这个概念像它当初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发挥作用，帮助我们打开批判性地研究男人的空间。但是，这个方法不同于当前在男性批判研究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对“霸权男性特质”具体表现的聚焦。后者虽然有明显的价值，但是在评价、解构、瓦解男人的霸权上它远远不得力。虽然“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一直

是并且仍然对男性批判研究来说非常重要，但男人的霸权（相对于女人、儿童和其他男人而言），在“男人”这个社会范畴的霸权以及男人的实践活动的霸权这两个层面上，还需要更加直接明了的分析。

在做男性批判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这类研究究竟有什么样的批判性。很多问题值得提出：这些研究和调查指向何处？它们为揭示和解构男人权力的复杂性、动摇男人权威、遏制暴力等等提供了方法吗？——还是它们仅仅为男人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使得他们可以介入社会性别政治和社会性别研究，不必承担什么责任，不必寻求变革，甚至让他们得到更多施展权力和权威的空间？它们如何颠覆父权制，或如何掩盖甚至加强了父权制？它们使妇女受益吗？如果是，那又是什么样的妇女从中受益？

这样对霸权的概念进行重新评价，结合了社会批判理论、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当代对权力和反抗的理论等领域中的诸多普遍问题。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其他批判理论政治，围绕着权力和抵抗问题提出了各种洞见，它们亟需被引入到针对男人相对于妇女、儿童和其他男人的社会性别权力的研究当中去。这包括男人对强制与协同的建构，男人自身对那种强制与协同的协同。与此相应，我们可以探讨下列理论中不同的“权力”概念：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的各种理论，权力的第三个维度，霸权与话语；并探讨这些概念是否适用于男人以及不同男人的社会性别权力问题。

在很多方面，霸权的概念与意识形态理论最贴近：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统治阶级的观念；而不贴近产生于女权主义和其他立场理论的观点，即认为观念来自不同阶级的差异性的社会实践。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与在社会性别制度霸权的框架中的男人与女人做一个比较呢？是否可以把这样的霸权意识形态看成是社会性别化的文化权力？如果是这样，谁的意识形态——相对于谁、又是为了谁而——成为“霸权的”？本文对男人的霸权的七点概括，就是试图回答这

个问题，因为男人既是一个由社会性别制度构建的社会范畴，又是社会实践中占支配地位的集体和个体能动者。

另一方面，更具体而言，关于男人的霸权的这个讨论，也探讨男人和社会性别的文化形构，特别是男人当中的分类与阶级分化，因而也适用于当代关于物质和话语两者之间的关联的争论。霸权的概念必然进入到文化的领域当中，而文化领域似乎比经济领域更不容易被界定和被决定。

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主要关切的是，如何讨论物质的和话语的两个层面并对它们都发生影响。当代唯物主义分析试图将其理论关注扩大到(并联系到)压迫与话语的多重性及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当代话语分析寻求同物质的多种形式建立联系。这种状况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里，如：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认可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话语的唯物主义理论，对多重压迫的分析，批判性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和全球化理论(的各种批判)，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有关年龄歧视和残障歧视的争论，有关身体的理论化，以及唯物主义/话语分析。[12]

如果能对一个宽泛的葛兰西式的“霸权”概念进行大规模的历史重塑，来解构其对于经济阶级的过度强调，那它可以说是预设了后来这许多关于物质和话语关系的各种争论，因为它使得我们的分析重心和政治关注移向经济政治(具体而言是阶级政治)内部的文化领域和文化政治，移向与经济政治相关的文化领域和文化政治。今天回顾起来，在葛兰西理论/实践内的这类运作，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整个“文化”或“语言学转型”的一部分，是对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用法理论合流的一个部分(Purvis and Hunt, 1993)。

同样地，霸权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其他二元对立；它使我们关注男人这个社会范畴被社会性别制度不断地肯定和建构，男人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集体和个体的社会实践能动者，以及这些分析元素之间的关系。这个概念因此审视了一种模糊性和一种辩证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男人”这一范畴的霸权(相对于妇女、其他社会性别以及——以不同的方

式——相对于男孩),男人内部和男人当中的霸权,不论是男人的存在方式还是男人的实践。[13]

当我们提出男人的社会性别(化的)霸权或父权制霸权问题的时候,不仅是葛兰西式的“阶级化版本”,任何僵化的、单一文化的“霸权”概念现在都需要极其谨慎地对待,甚至实际上可能已经被抛弃了。这是颇为自相矛盾的一个现象。下面这个论点现在看来就显得很成问题:存在着一个所谓“全社会的基本看法”(Bocock, 1986:63),它很成功地呼应了统治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分散阶级的联盟既定目标(不论是否社会性别化的)。[14]实际上,当代的霸权——有点自相矛盾的——似乎依赖于更加复杂的政治多元主义概念、“混合的”(资本主义)经济、多样化、“第三种道路”以及非激进形式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等。

这种日益复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代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尽管这类挑战可能比原先设想的要有限,Alasuutari, 2000)。在历史上,很多霸权的形成都是以某一社会或国家内部的统治为基础的。确实,民族国家在现代政治史上被表现为最强有力的霸权形式之一。但现在随着对全球关联的更强意识以及此背景下的新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一认识问题很多。全球和地区变化,比如通过欧共体的欧洲一体化,可能就是不断变化的男人的霸权的一个部分(Hearn et al., 2002; Novikova et al., 2004)。

当下另一个困难是,各种社会分野的建构和彼此关联看来都发生了变化。孤立地讨论社会性别或任何其他社会分野都显得越来越困难。这种状况也许历史上从来都是如此,不过直到最近人们才意识到。社会的变化,比如向虚拟与信息社会的发展,也会使得对各个社会分野之间交叉性的阐释有所增强。“人们”的构成——作为人,作为身体,作为个体——可能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过程。过去曾认为,人们主要是作为某些群体中固定不变的具体成员被建构,并由单一的社会分野所界定。现在来看,人们更加像是存在于并且构成于社会关系中以及多种权力差

别之间的空间与实践中。人和身体，不再是简单地被看作是对等的（Hearn，2004:207）。然而，与此同时，这些交叉性也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它们可能也是当今掩盖社会性别、男人和男人权力的霸权性途径。

另外，在操作层面也存在困难。如果霸权是一个如此深植且无所不在的社会过程，"我们"（我们都是多样地社会性别化的）如何研究"它"——特别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它的一部分？霸权的关键实质性元素包括依赖于多种力量而不仅是强制，依赖于分化群体的构成而不是单个的统治势力。更具体而言，男人通过强制和依靠强制而进行的统治，与不依靠强制而进行的统治之间，是什么关系？男人依靠强制的统治可以被正式地组织起来（比如，用团体暴力，军事暴力等），也可以是个人化的以及人际关系的（比如，男人对自己家里的女人和儿童的暴力）。男人不依靠强制的统治也可以被正式地组织起来（比如，男人的所谓"和平地"主宰管理层职位），或者是个人化的和人际关系的（比如，利用男人作为父亲和丈夫的社会地位）。这些不同形式的组织的或人际关系的统治，不管是否依靠强制，它们的构成模式和关联都是我们实际调查研究的一个关键任务。

最后，任何僵化的"霸权"概念当中的具体历史主体必须被解构。对有些问题——例如："是否存在一个具体的主体（如[新]葛兰西式霸权概念中），或者说它根本不存在（如[新]福柯式话语分析中）？"——已经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的答案了。普适主义和偶在性之间的不同，不是那么容易归纳。霸权概念的有用之处，不全在于葛兰西式以经济阶级为基础的文化经济论或经济文化论，而在于这个概念如何能够在理论实践当中被改造和再造。[15] 在父权制中，男人的强制与协同是什么意义，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像霸权这样的概念来帮助我们同时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物质及话语两个层面进行交涉。男人权力的各种形式的区分（靠强制的和不靠强制的）显示，具有多样区别的父权制，可以是稳定的也可以是变化的、固定的或者是灵活的。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的"男人"这

一社会范畴被上述各种定式和运动围绕着，辨识这些定式和运动中特殊的和不断变化的形式，是当今全球化形势下一个急迫的任务：“作为一个整体”的“男人”这个范畴的霸权（相对于女人，其他社会性别，以及以不同形式地相对于男孩）；男人内部和男人当中的霸权——不论是男人的存在方式还是男人的实践活动。以这类方式进行男性批判研究，也许有望看到废除“男人”作为权力的社会范畴的可能。

原文载于：

Feminist Theory，5(1)2004:49－72.

张　颖译　王　政校

注释：

1 在北欧地区，这个讨论被政府体制化，其形式就是在NIKK（北欧妇女学与社会性别研究院）任命了一位“男性研究协调员”。曾经有一位使用过“北欧男性批判研究协调员”的头衔。最近，这个头衔的英文名好像变回了“北欧男性研究协调员”。在NIKK的网站上不同的网页中两种名字都出现了（http://www.nikk.uio.no/index_e.html），另外还有一个“北欧有关男性研究协调员”。2000年3月欧盟第五次框架划出了一笔经费，用于支持一个三年的专题网络“社会问题与关于男性及男性特质的社会性批判分析”，在十个国家里都有体制内的成员（www.cromenet.org）。

2 本文的一稿在Karlstad的北欧会议上发表时，一位男性与会者说，我采取这个姿态是“为了讨好女权主义者”。

3 一般来说，这样的批判提醒我们注意几个方面：“与主题之间的批判性关系，包含作者对自身的反思，对作者和主题两者的社会位置都有所觉悟，思考知识的社会基础；致力于妇女和男人的政治解放；适当的时候，做实际调查研究而不是主观一端和臆测。”（Hearn，1998b:801）

4 这两种对权力的理解，特别是第一种，常常预先设想对权力的占有；第二种更注意质疑权力的占有，把它作为权力过程或政治过程。有些学者比较了拥有权力（的能力）和实施权力。在《权力》一书中，Wrong（1979）指出了两种形式的权力：占有的和实施的权力形式。在《权力的框架》中，Clegg（1989）指出了三种形式：基于能力的支配性权力，表达能动性的实施权力，以及协助性权力。

5 所有这些要素在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中都非常重要。从这些

理论中我们可以假设，抵抗甚至冲突都显示了利益的不同，从而显示了民主的或者原初民主的驱动力；没有抵抗甚至冲突，就永远只有统治和屈服。

6 要有把握且准确地具体描述不曾被清晰地表达出来的利益，有显而易见的难度。如果讨论生死，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比如 Crenson (1971)对(人们缺乏参与政治活动来反对)空气污染的研究，毕竟污染会害死所有人。

7 福柯的很多著作明显是谈到这个的；另见 Barbalet (1987)；Pease (2000a)的研究是最近一个用这样的思路来研究男人的例子。

8 Stewart Clegg (1989)对霸权建构和我们对霸权的分析提出下述需要进一步考虑的要素：

i. 对大众利益和需求有一个系统的思考；

ii. 在次要问题上适当地让步以维护和支持在一个先天不稳定的政治体系中的联盟(当然也要维护最关键的利益)；

iii. 为全国性目标提供的组织性支持——这些目标为统治群体的根本性长期利益而服务；

iv. 提供道德、思想和政治领导从而再生并形成一个集体的意志或全国性大众的观点。

9 最近，Connell 继续了关于男性特质(masculinity)，多种男性特质(masculinities)以及霸权男性特质(hegemonic masculinities)的讨论。在 *The Men and the Boys* (2000)一书中，他承认"男性特质"这个词语的诸问题，并建议，"给男性特质作出可接受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而这种困难正反映了社会性别关系中的种种危机倾向——这些危机倾向从多方面动摇了男人的处境"(页 17)。并见 Connell，2002。

10 我要感谢 Marie Nordberg，是她提出了这第六点。Bourdieu (2001)也提到了这一点。

11 到这里，有人或许想用"男性的统治"(masculine domination) (Bourdieu，2001)来重新表述社会性别制度的霸权。那种分析可能与我们的讨论相关，但是对于"男性的"(the masculine)的语言的/象征的和身体体现的/社会的层面的含义，这个词会造成模糊性，而且在处理"男人"的社会复杂性和男人在不同社会中与权力和霸权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的问题上，它也会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困难。更何况，这一理论并不介入探讨女权主义理论、新近的男性批判研究以及它自身的社会性别化的定位。

12 这些构成了相当大而且仍然在快速增长的相关学术著作，其中大部分是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交叉。除了 Hennessy and Ingraham，1997；Willett，1998；Zack et al.，1998；还可参考，Benhabib and Cornell，1987；Fraser，1989，1998；Hearn，1992，1998c；Cockburn and Ormrod，1993；Hearn and Parkin，1993；Landry and McLean，1993；Fairclough，1995；Hennessy，1995；Gibson-Graham，1996；Harding，1998；Fawcett，2000；Hanssen，2000。

13 这个一般的、通常无性别的主题——社会分类与社会行动，规范与控制之间的关

联——在社会批判理论当中相当显著,至少在 Mauss 和 Durkheim 那儿是这样。

14 这是霸权概念的一个比较有具体情境的版本,更适于 Laclau 和 Mouffe 长远重新思考霸权和政治,因为他们愈来愈强调各种社会要素、各种冲突对抗以及结构的时空具体性(contingency)。Howarth (2000: ch. 6)提供了一个对他们 25 年中的几次思维转折的简单评价。他比较了他们的著作:20 世纪 70 年代,与"基本社会阶级"相关联,互相竞争的霸权性组织的时空具体性;80 年代,伴随"霸权形构"的所有意识形态元素和社会能动者的时空具体性;90 年代的霸权性项目与社会结构主题的时空具体性,其中后者被理解为"'无法被决定的'存在,它们总是要有一个话语外部空间,既构成它自己的存在,又威胁它自己的存在"(2000: 111)。

15 这些问题在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和 Slavoj Zizek 之间一些精彩的对话中被探讨过。他们的讨论涉及批判理论领域中一个长期的题目,即,有没有可能,把有关主体和主体性的讨论与关于霸权的政治和普适性问题的讨论结合在一起进行。(Butler et al., 2000)

参考文献:

Abercrombie, N. and B. S. Turner (1978).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9(2):149 - 170.

Alasuutari, P. (2000).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An Appraisal of the Discussion", *Acta Sociologica* 43(3):259 - 269.

Bachrach, P. and M. S. Baratz (1962). "The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947 - 952.

Barbalet, J. M. (1987). "Power, Structural Resources and Agency",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8:1 - 24.

Beemyn, B. and M. Eliason, eds (1996). *Queer Studies: A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Anth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Benhabib, S. and D. Cornell, eds (1987). *Feminism as Critique: Essays on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Late Capitalist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Bocock, R. (1986). *Hegemony*. London: Tavistock.

Bourdieu, P. (2001). *Masculine Domin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utler, J. (2000). "Restaging the Universal: Hegemony and the Limits of Formalism", pp. 11 - 43 in J. Butler, E. Laclau and S. i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ebates on the Left*. London: Verso.

Butler, J., E. Laclau and S. iek (2000).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ebates on the Left*. London: Verso.

Carrigan, T., R. W. Connell and J. Lee (1985). "Towards a New Sociology of Masculinity", *Theory and Society* 14(5):551 - 604.

Clatterbaugh, K. (1998). "What is Problematic about Masculinities?", *Men and Masculinities* 1(1):24 - 45.

Clegg, S. (1989). *Frameworks of Power*. London: Sage.

Cockburn, C. (1991). *In the Way of Women*. London: Macmillan.

Cockburn, C. and S. Ormrod (1993). *Gender and Technology in the Making*. London: Sage.

Collinson, D. L. and J. Hearn (1994). "Naming Men as Men: Implications for Work,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1(1): 2 -22.

Collinson, D. L. and J. Hearn, eds (1996). *Men as Managers, Managers as Me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en, Masculinities and Managements*.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nnell, R. W. (1983). *Which Way Is Up?* London/Boston: Allen & Unwin.

Connell, R. W. (1985). "Theorising Gender", *Sociology* 19(2):260 - 272.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Cambridge: Polity.

Connell, R. W. (1993). "The Big Picture: Masculinities in Recent World History", *Theory and Society* 22(5):597 - 623.

Connell, R. W. (1995).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Connell, R. W. (1998). "Men in the World: Masculinities and Globalizati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1(1):3 - 23.

Connell, R. W. (2000). *The Men and the Boys*. Cambridge: Polity.

Connell, R. W. (2002).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Crenson, M. (1971). *The Un-Politics of Air Pollution: A Study of Non-Decision making in the Citie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ahl, R. A. (1957).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ural Science* 2:201 - 205.

Diamond, L. and I. Quinby, eds (1988). *Feminism and Foucault: Reflection or Resistanc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Donaldson, M. (1993). "What is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ory and Society* 22 (5):643 - 657.

Edwards, T. (1994). *Erotics an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Eichler, M. (1980). *The Double Standard: A Feminist Critique of Feminist Social Science*. London: Croom Helm.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arlow: Longman.

Fawcett, B. (2000).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Disability*. Harlow: Prentice Hall/ Pearson Education.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Pantheon.

Frank, B. (1987). "Hegemonic Heterosexual Masculinity",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24:159 - 170.

Fraser, N. (1989).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Fraser, N. (1998). *Justice Interruptus: Rethinking Key Concepts of a "Post-Socialist" Ag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Geras, N. (1987). "Post-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63:40 - 82.

Gibson-Graham, J. K. (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Hanmer, J. (1990). "Men, Power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Women", pp. 21 - 42 in J. Hearn and D. Morgan (eds). *Men, Masculinities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Unwin Hyman/Routledge.

Hanmer, J. and J. Hearn (1999). "Gender and Welfare Research", pp. 106 - 130 in F. Williams, J. Popay and A. Oakley (eds). *Welfare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London: UCL Press.

Hanssen, B. (2000). *Critique of Violence: Between Poststructuralism and Crit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Harding, S. (1998). *Is Science Multicultural? Postcolonialism, Feminism and Epistemologies*.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earn, J. (1987). *The Gender of Oppression. Men, Masculinity and the Critique of Marxism*. Brighton: Wheatsheaf;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earn, J. (1989). "Reviewing Men and Masculinities, or Mostly Boys" Own Paper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6:665 - 689.

Hearn, J. (1992). *Men in the Public Ey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Public Men and Public Patriarch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earn, J. (1996a). "Deconstructing the Dominant: Making the One(s) the Other(s)", *Organization* 3(4):611 - 626.

Hearn, J. (1996b). "'Is Masculinity Dead?' A Critical Account of the Concept of Masculinity/Masculinities", pp. 202 - 217 in M. Mac an Ghaill (ed.). *Understanding Masculinities: Soci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Arena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Hearn, J. (1997). "The Implications of Critical Studies on Men", *NORA. Nordic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3(1):48 - 60.

Hearn, J. (1998a). "Getting Organised: The Politics and Organisation of Critical Studies on Me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on Men Newsletter* 5(1): 15 - 17.

Hearn, J. (1998b). "Theorizing Men and Men's Theorizing: Men's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Theorizing Men", *Theory and Society* 27(6):781 - 816.

Hearn, J. (1998c). *The Violences of Men*.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Hearn, J. (2002). "Critical Studies on Men in Four Parts of the World", *NIKK Magasin* 3:12 - 15.

Hearn, J. (2004). "Information Societies are Still Societies", pp. 205 - 208 in T. Heiskanen and J. Hearn (eds).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Workplace: Spaces, Boundaries and Agency*. London: Routledge.

Hearn, J. and D. L. Collinson (1993). "Theorizing Un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between Masculinities", pp. 97 - 118 in H. Brod and M.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Hearn, J. and D. Morgan, eds (1990). *Men, Masculinities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Unwin Hyman/Routledge.

Hearn, J. and W. Parkin (1993). "Organizations, Multiple Oppressions and Postmodernism", pp. 148 - 162 in J. Hassard and M. Parker (eds). *Postmodernism and Organizations*.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CA: Sage.

Hearn, J., K. Pringle, U. Müller, E. Oleksy, E. Lattu, J. Chernova, H. Ferguson, Ø. G. Holter, V. Kolga, I. Novikova, C. Ventimiglia, E. Olsvik and T. Tallberg (2002). "Critical Studies on Men in Ten European Countries (1): The State of Academic Research", *Men and Masculinities* 4(4):64 - 92.

Hennessy, R. (1995).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New York: Routledge.

Hennessy, R. and C. Ingraham, eds (1997).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Herdt, G., ed. (1994). *Third Sex, Third Gender: Beyond Sexual Dimorphism in Culture and History*. New York: Zone Books.

Holmwood, J. (1999). "Radical Sociology: What's Left?", pp. 277 - 293 in P. Bagguley and J. Hearn (eds). *Transforming Politics: Power and Resistance*. Basingstoke: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owarth, D. (2000). *Discours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Laclau, E. and C.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Laclau, E. and C. Mouffe (1987).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New Left Review* 166:77 - 106.

Landry, D. and G. McLean (1993). *Materialist Feminisms*. Cambridge,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Lorber, J. (1994). *Paradoxes of Gen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Basingstoke: Macmillan.

Macleod, C. and K. Durrheim (2002). "Foucauldian Feminism: The Implications of

Governmentality", *Journal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2(1):41 - 60.
McMahon, A. (1993). "Male Readings of Feminist Theory: The Psychologization of Sexual Politics in the Masculinity Literature", *Theory and Society* 22(5): 675 - 696.
McNay, L. (1992). *Foucault and Feminism*. Cambridge: Polity.
Marx, K. (1859/1975). "'Preface' to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Marx, K. and F. Engels (1845/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ay, T. (1998). "Reflexivity in the Age of Reconstructive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1):7 - 24.
Messner, M. (1997). *Politics of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gan, D. (1992). *Discovering M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Novikova, I., K. Pringle, J. Hearn, U. Müller, E. Oleksy, E. Lattu, J. Chernova, H. Ferguson, Ø. G. Holter, V. Kolga, C. Ventimiglia, E. Olsvik and T. Tallberg (2004). "Men, Masculinities and 'Europe'", in M. Kimmel, J. Hearn and R. W. Connell (eds). *The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O'Brien, M. (1981).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ease, B. (1996). "Reforming Men: Masculine Subjectiv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and Practices of Profeminism". Doctoral thesis. Bundoora: La Trobe University.
Pease, B. (2000a). *Recreating Men: Postmodern Masculinity Politics*. London: Sage.
Pease, B. (2000b). "Researching Profeminist Men's Narratives: Participatory Methodologies in a Postmodern Frame", pp. 136 - 158 in B. Fawcett, B. Featherstone, J. Fook and A. Rossiter (eds). *Practice and Research in Social Work: Postmodern Feminist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lummer, K.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London: Routledge.
Purvis, T. and A. Hunt (1993). "Discourse, Ideology, Discourse, Ideology, Discourse, Ide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4(3):473 - 499.
Ramazanoglu, C., ed. (1993). *Up Against Foucault: Explorations of 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awicki, J. (1991). *Disciplining Foucault: Feminism, Power and the Bod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klair, Leslie (2001).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Oxford: Blackwell.
Surman, M. (1994). "From VTR To Cyberspace: Jefferson, Gramsci & the Electronic Commons", www document cited at: http://www.ncf.ca/ip/freenet/

conferences/comnet94/conference_papers/vtr/vtr7. txt

Walby, S. (1986). *Patriarchy at Work*. Cambridge: Polity.

Walby, S. (1990). *Theorizing Patriarchy*. Oxford: Blackwell.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an Interpretive Sociology*, 2 Vols. G. Roth and C. Wittich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therell, M. and N. Edley (1999). "Negotiating Hegemonic Masculinity: Imaginary Positions and Psycho-discursive Practices", *Feminism & Psychology* 9 (3):335 -356.

Whitehead, S. (1999).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visited",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6(1):58 - 62.

Whitehead, S. (2002). *Men and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Willett, C. , ed. (1998). *Multiculturalism: A Guide to the Current Debate*. Malde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Wrong, D. (1979).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Oxford: Blackwell.

www. cromenet. org [Critical Research on Men in Europe].

Zack, N. , L. Shrage and C. Sartwell (eds) (1998). *Race, Class, Gender, and Sexuality: The Big Questions*. Malde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新男性史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缺失的奇特现象：早期美国社会性别史的几点启示

The New Men's History and the Peculiar Absence of Gendered Power: Some Remedies from Early American Gender History

托比·第兹(Toby L. Ditz)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当大量的女性成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时候，她们立即向传统历史提出警告，指出它不过是把男人的历史(men's history)装扮成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到80年代初我取得博士学位的时候，第一批妇女史历史学家已经在出版全新的研究。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的激励下，这些学者使大家清楚地看到(除了那些最抵触的读者)，过去和现在妇女都在创造历史。这些历史学家受益于高校妇女学中心所促成的跨学科的对话和讨论，非常熟悉人文和社会科学每一个领域里提炼出来的社会性别理论。她们也让大家看到，社会性别是被大幅度地扩展了的历史疆域的一个主要部分。当1986年琼·斯科特(Joan Scott)发表了今天已成为经典的"社会性别：历史分

析中的一个有用的范畴"，她其实是出色地把当时已经非常丰富的有关社会性别和历史的理论讨论条理化并在全体历史学家当中推广。[1]

然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或者说，该发生的没有发生。妇女史学家原则上清楚，传统史学的第一个弊病——即妇女的缺席——导致了第二个弊病：历史学家不去考察他们研究的男性主体的社会性别。男性的特殊之处，如白人身份一样，一直是被忽视的，是因为它所隐含的权力与特权是霸权性的。在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当中占大多数的是男性，他们对欧洲和欧裔美国男人的言行有着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基本上把这样的历史研究对象当成其所属的阶级、行业或国家的代表，甚至把他们当成人类普遍理想的代言人；但是从不把他们当作具有社会性别的人来研究。在今天看来，有些特征可能来自历史主体的社会性别权力和文化所界定的男性身份，但在过去的历史书写中被"如此有效地自然化"，以至于它们"似乎都不具名称"。[2] 只要历史学家是"历史的客观诠释者"这种自我认识不被动摇，它就会支持这样的误解。轻描淡写地对待文化和政治权威的社会性别化过程，是男性研究者和他的研究对象双方的利益所在。[3]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里，一场针对男性霸权的大规模挑战正在进行，男性霸权的好日子到头了：历史主体的社会性别，不再是那么容易被忽略了。

即便如此，系统地解构男人气质和男性特质(manliness and masculinity)以及重新定位传统历史当中的男性主体的工作，被大部分研究妇女的历史学家推迟了五到十年。到了 90 年代，妇女史学家才开始以更强的冲击力，重新思考传统历史，与早期研究男性史的学者们一起来破坏"男性特权的诡计"。[4] 此时，男性史和男性研究本身已成为专门研究领域。它们(有时)承认得益于妇女史和女权主义，但它们也有独具特色的论坛、学术杂志、学术机构安排和典型的焦点问题。[5] 这种令人困惑的学术劳动分工，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男性史排除妇女，并忽视男人对女人的权力问题。尽管男性史试图书写"研究男人作为具有社会性别的人的历史"，正如马克・卡内斯(Mark Carnes)最近指出的，它还没有成为一种

"互动的社会性别史"。[6]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讨论男性史的几个定向性的前提,分析它们如何导致了对男人的社会性别权力的历史分析的缺乏。接着,我将探讨避免这种缺陷的几个策略。我使用的例子都是我本人的历史研究领域内的,即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历史以及早期美国史。

男性史的第一个前提从妇女与历史的角度看是很好的。这个前提是:男人气质和男性特质是压迫妇女和维持着"男权制红利"(patriarchal dividend)的大的社会性别秩序的一部分。"男权制红利"是社会学家康瑞文(R. W. Connell)在《男性特质》(*Masculinities*)一书中创造的概念。康瑞文指出,"霸权性男性特质"是"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使"男权制"合法化的"社会性别实践的形态"。确保男人对经济资源、国家机器和军队的优势控制,以及允许对妇女的暴力成为男性权利的一种表达方式。它"保证了男人的统治地位和女人的从属"。那么所谓的"男权制红利",就是男人所享有的、对宝贵的资源和政治文化权威机构的优势控制,以及与此相应的妇女之被排斥与边缘化。[7] 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特质,使"男权制红利"正当化,并在它面临挑战的时候维护它。听到这儿还是挺不错的,康瑞文讲得像一位好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并且,康瑞文并不是唯一写出这样认识的人,虽然他是在这方面的理论见识最高的人。[8]

男性史的第二个前提是,男性特质以及它所根柢的大的社会性别秩序,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男人之间的差异问题。从一开始,男性史的著作就主要集中在男性特质的多种形式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极丰富的相关词汇的出现,比如"霸权性"、"共谋性"、"从属性"和"边缘性"男性特质,就证明了这种兴趣的强度。[9] 这不仅是一个有关男人气质如何与种族、族裔和阶级的差异一起表达出来、在男人当中制造等级的问题。其实这一前提的关键是,社会性别秩序既是关于对妇女的压迫,也同样是关于男人之间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以及男人之间的竞争和联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洞见,在很大程度上获益于酷儿理论对男性研究的影响。酷儿理论对于占统治地位的

男性特质以及另类社会性别身份认同的(有缺陷的)再生产过程很有兴趣。但是,对多样的男性特质和它们的彼此建构的聚焦关注,也是"社会性别麻烦"[1]的一个主要来源。大多数人可能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为互补的、并非总是对立的词汇。我们通常的共识是,这两者互相产生并首先建立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的制度。但是男性史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就算不是大多数的,很多男性特质的形式——与种族和阶级一起——主要是在与其他形式的男性特质的关系当中衍生出来的。它们一起在男人中间对男性特权进行差异性的分配、定义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有用的洞见里所包含的危险倾向是: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勾连如何确保了男人相对女人的"特权、权力和权威"这一重要问题,就被无限期地搁置了。[10]

有好几个因素使这一危险倾向变得更复杂。美国和英国的第一批男性史学家,常常考察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的性别隔离,如兄弟会组织、学校和工作场所。与此类似,早期有些研究性行为的史学家,也挑选那些逐渐表达、建立和捍卫"同性爱"(gay)以及"同性恋"(homosexual)人群的居民区、娱乐场所和教育机构。[11]乔依·帕尔(Joy Parr)指出,"在这种情境中,成为一个男人就被看作是个人经历、一个在与其他男人的团结以及与另一些男人的区别当中实现的个人成就;但相当程度上和与女人的关系没有什么具体的关联"。[12]男性史的这种考察重点,部分也产生于直到 90 年代还在社会史学家中颇为流行的一种研究文化政治的方法,即认为不同阶级和族裔的成员会衍生出比较一致的和有特点的亚文化。虽然,这种方法在强调被奴役的劳动阶级,以及妇女(白人和非白人的)的自我塑造和历史能动的可能性方面硕果累累,但它也一直遭到批评,因为它忽略了受压迫人群内部的权力运作。[13]另外,这种方法在运用到对权力拥有

---

〔1〕 原文是 gender trouble,朱迪丝·巴特勒关于女权主义与酷儿理论的重要著作的题目即为此。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1999)。——译注

者进行研究时,错误地将他们都等而视之。不管有什么样的缺陷,就像对奴隶居住区、劳动阶级或城市同性恋聚集区的研究一样,对"妇女文化"的研究,如那时妇女史研究者们喜欢说的,是把以前被边缘化的历史行动者"凸显出来"的大课题的一部分。[14]但是,当这种强调分离状态的方法被用来研究早就挤满了历史舞台的白人异性恋男性的文化时,就会产生奇怪的相反效果:起初它的确使得男性史学者忽略他们所研究的男人是怎样对妇女行使社会性别权力的。

最近,像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一样,男性史和男性研究对文化和身份形成采取了一种更加强调过程性的观念。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看作男性史的第三个前提,即男性主体性内部就是复杂的、暂时的和充满变化的。盖儿·比德曼(Gail Bederman)非常出色地点明了这种在男性史分析模式中的转变。她指出:我们再也不能把"男人身份看作被文化界定的特征、属性或性别角色的集合"。相反,我们现在通常认为,"社会性别——不管是男人身份还是女人身份——是一个历史的、意识形态过程(a historical, ideological process)。通过这个过程,人既被定位,也把自己定位为男人或女人"。[15]但是,后结构主义的各种理论倾向对男人的社会性别的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也不一定就扭转了对妇女的摒斥。实际上,强调多种话语在文化领域的流通、知识与权力的连结点、特别是社会身份和社会差异范畴通过社会实践被无限制地建构,等等,都促使人们对于不同的男人身份及其复杂性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16]这一点上,康瑞文的《男性特质》一书又是代表。它的方法是绝对的建构主义以及强调过程性的(可勉强说是后结构主义的)。其结果是,对于日常社会和文化实践进行极度细致入微的研究(男人通过这些实践来内化和改变不稳定、不完整的社会性别身份)。比如,康瑞文关于同性情欲(homoerotics)和同性恋(homosexuality)的论述部分,运用特别敏感的视角清晰地说明了:对社会性别界线的管理,不仅维持着某些男人之间暂时的联盟,也同时为其他男人生产着另类的以及(或者)被鄙视的社会位置和身份。虽然有这么多

优点或者说正因为有这些优点，康瑞文的《男性特质》主要关注男权制红利是如何在男人当中进行分配的。相比之下，康瑞文不太关心在其论述当中处于边缘的妇女，或者造成妇女边缘地位的过程。在男性研究中同样具有里程碑式影响的其他几部著作，都有这个问题。[17]让我们觉得格外有意思的是，康瑞文不仅是男性特质的分析家，也是一位睿智的社会性别理论家。即便如此，男人对于妇女的社会性别权力，并未能深入地贯穿他这部男性特质的杰作。

如果我们搁下有影响的作品，转而看看对90年代的学术产生特别影响的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结果是一样的。几年前，就在这份学术刊物上，马里娜力尼·辛哈(Mrinalini Sinha)指出，印度史学已经相当注意“殖民话语在社会性别上的投入”，并且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妇女史的著作。但是专门的男性特质研究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则刚刚浮现。[18]正如她曾经呼吁的，近来在后殖民研究中已经产生了不少研究，明确地分析了占支配地位的以及下属群体的男性特质、以及它们在维持帝国主义霸权中或成功或失败的角色。后殖民主体的男性特质得到了充分的历史分析；它被认为是“由殖民统治中时空具体的实践所决定”。[19]虽然各种研究在理论重点上有很大差异，我们还是可以说，这个男性主体也被发现是不完整的、混合性的并且不稳定的。这个主体的自我认知和界定的结构，不仅基于种族化的社会性别差异和对立，而且基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白人和他们的种族他者(racial others)，当然还有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以幻想投射和交叉身份认同为形式的各种亲密交易。男性史领域对这种复杂性的包容，激励了学者们对殖民男性主体细致剖析，以及他与其他男人在帝国情境下的关系的探究。可是，除了一些精彩的特例之外(比如安·斯托勒[Ann Stoler]和安托瓦妮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的著作)，关于对妇女的社会性别权力的分配及其支撑或破坏帝国政体的作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在大部分情况下，“模仿的男人”(“mimic man”)仍然简单地暗指殖民地**男人**(colonial *man*)，甚至是一个抽去社会

性别的殖民地主体。[21]

特别强调(男性)身份形成的不稳定性和暂时性特征,导致了一种奇特的、被广泛提及的趋向:将男性主体视为相当脆弱的、濒危的甚至是处在经常的危机当中。这里我们说的男人,可能是那些最容易体现并受益于支配性男性特质规范的男人。在男性史和男性研究中对"危机"的强调如此地显著,说它是第四个前提可能都不太准确了,也许应该说是第四个主题。迈克尔·基莫尔(Michael Kimmel)的《美国的男人身份:一部文化史》(*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一书,对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的男人身份标准做了综述,影响很大。他就是强调危机和焦虑。美国史学者早就注意到,城市白人,主要是专业人士的男性,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重新发明了一种室外的、帝国主义的,肌肉发达型的男性特质,来对抗由所谓的现代性和(过度的)文明造成的自相矛盾而引起的神经衰弱性焦虑与疲劳的阵发。盖儿·比德曼在《男人气质与文明》(*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中对种族化的男人身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文化分析。她对历史学家使用"危机"一词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她又肯定了"中产阶级男性在世纪之交对男人身份格外地着迷"。当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特质理想开始吸纳所谓自然的激情和体魄时(这些本是被白人文化权威轻蔑地与底层、非白人的男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忧心忡忡的"强迫症"部分地得到了缓解。达那·耐尔森(Dana Nelson)在描述早期以及 19 世纪的美国时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国家的男人身份"(national manhood)的基础"是制造焦虑"。它给中产阶级白人男性一个错觉的承诺,似乎能够从"激烈竞争的、等级制的人际关系"逃避到建立在"兄弟般酷似"之上的"一种丰富的情感关系"。但是连这样一种补偿性的、对于归属感的幻想,都排斥非白人和工人阶级男人,并且掩盖着阶级和种族不平等所造成的差异性重负。如果再向前追溯到北美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 18 世纪作为庄园主的男家长们也是"充满焦虑";费城在海外的殖民商人们的男人身份也"处于险境"。[22]

尽管这些研究有时对于白人身份(whiteness)的特权、种族与社会性别身份的同步产生以及对阶级、性、种族的他者的边缘化等问题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些著作中叙述的特权男性常常是脆弱、充满渴望、自我分裂到病态的地步。他们早上能起床都是个奇迹;但他们却按照自己的利益建设城市工业经济,并把帝国主义制度强加给全世界,以别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如有些人指出的,这样的历史分析呈现的画面有问题。[23]最严重的是,这种对社会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及其多变的特征的专注,略掉了权力运作的问题并创造出虚假的对等。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仿佛庄园主对他当主子的责任的抱怨,和在他地里干活的男人女人的负担是同样沉重的;一个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由于他的子公司的法律诈骗或他个人的开支账户审计问题而焦急,和在密西根州的弗林特下岗的工人,或者在出口加工区的血汗工厂里做苦工的工人的苦恼,似乎也有了可比性。而且,一个典型的假设是,针对妇女、非白人、同性恋的暴力行为,标志着男性特质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总是那些缺乏安全感的恃强凌弱者为守卫自己的地盘而作出的反应。但是这种暴力不一定就是对危机作出的自卫性回应,它可以是一种被规则允许的丑恶的,经常被有些男人用来维护他们对妇女和其他男人的社会性别特权的伎俩。

有一种观点不无道理,它认为,男性史学术研究当中的"危机"这一主题,间接地反映了当前由妇女、种族与性弱势群体向白人男性对学术和专业高层职位的垄断提出的挑战。这类挑战是在社会和学术两方面进行的。有的男性史学者为了解释当代男性运动中更为怪异的反女权势力,也会把所谓男性特质受到攻击的认识(如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之流毫不隐讳地阐述的),投射到他们的历史研究对象上去。[24]除了这些背景因素之外,一个方法论或理论上的混淆也部分地造成了"危机"主题的过热。如前所示,很多搞男性史的学者坚信以下这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命题:霸权性男性特质和作为现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的男人,面临持续的挑战;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特质理想和它的另类本身都是很复杂的;社会性别

规范必须通过各种实践被不断重新录写到个人和制度中,而这些实践从不机械地例示或复制这些规范。有这种信念的学者,当然会花费大量的学术精力来考察男性特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动态。但其结果是,社会性别身份的塑造及重塑过程中发生的局部混乱和冲突,很容易被他们看成是"危机"。甚至在男人之间的竞争关系真的给霸权男性特质造成巨大挑战之际,这些研究也往往忽略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共同运作,忽略妇女在这些挑战中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未能将男性特质的危机与大的社会性别秩序危机清楚地区分开。前者是否总是导致重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导致对男人的社会性别权威的重大挑战、或者引起男性权威实施上的转变?在这点上,这些著述语焉不详。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关于男人之间的竞争和危机中的男性特质的这些描述,有遮蔽大的社会性别秩序动态的危险。

男性特质和男性历史的新研究最令人不安的是,叠加起来,它们颇具重复传统史学压迫性地勾除某些群体的危险。它们也有把男人——无论男人怎样被具体化、被区别对待、被社会地建构——重新放到我们历史叙述的中心的危险。布鲁斯·特雷斯特(Bruce Traister)对美国的男性特质研究的评价就含着不少疑问。他指出,通过"把男人返回到"其"历史上的特殊性","美国研究里的文化批判"有可能又变成"对男性人类的研究,"来取代"使得女权主义在学界文学研究领域得以发展的那些妇女以及文本"。[25]面对这样令人沮丧的前景,有人可能想干脆放弃这种研究,或是留在或是加入做理论上广博、以妇女为中心的历史的行列,因为那才是抵制这种倒退趋势、坚持女权主义反抗力量的最具希望的领域。

实际上,美国史学界关于男人身份的最有意思的研究已经出现在一些大的课题中,其关注点都主要不在男人或男性特质上。这方面,关于重建时期以及种族隔离时期的学术著作非常突出(当然也还有其他的)。比如赫泽尔·卡而比(Hazel Carby),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

用于回顾黑人女作家和活动家在19世纪晚期的文化和社会实践。可她的研究在分析伊达·威尔斯(Ida B. Wells)的反私刑运动及其对充满种族歧视的性刻板印象的不留情批判时,提供了对种族隔离时期美国南部白人男人身份最具说服力的描述。格兰达·吉尔莫(Glenda Gilmore)的《社会性别与种族隔离》(*Gender and Jim Crow*)具有同样的风格。吉尔莫对男性研究领域的发展很敏感,但她更多地受种族批判理论和妇女史的影响。她把对种族隔离时期在中产阶级美国黑人男性和白人种族主义者当中出现的新的男性特质标准的分析,置于以中产阶级美国黑人妇女为中心的大的历史叙事中。[26]此时期政治语言中男人气质和女性特质的主题、白人用来辩护他们恐怖活动所使用的性化的种族刻板印象,以及美国黑人对那些恐怖活动的抵抗,这些都为学者们提供了不寻常的强大动力和机会,使她们得以同时关注种族和社会性别,来书写男人和女人的综合历史。[27]

但是,这种综合历史本身并不能保证社会性别权力就一定能成为历史叙述的重点。最近有一个论坛,专门探讨控制"性和情感亲密关系"(sexual and affective intimacies)如何成为北美帝国管理手段。安·斯托勒的重要文章让我们注意那些跨文化接触的场所——那里,男人和女人曾经(也仍然是)相处在亲密和暴力的关系当中,创造着和重造着那些复杂的、决定了帝国统治结构的种族范畴和不平等。但是,虽然论坛参与者做到了把家庭、教育和性的领域同帝国主义的大课题联系起来,奇怪的是这些领域还是与社会性别权力脱离:评论者讨论斯托勒的文章的时候,未能把社会性别关系或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作为一个主题来系统地思考,尽管被论坛突出的"亲密关系"所处的差异性的领域很需要这样的分析。同样,近来有些早期北美的婚姻史研究,对处于婚姻核心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也是做了轻描淡写的处理。一些史学家认为上一代的妇女史学家对情爱不够关注,他们希望纠正这个问题,并揭示性别隔离领域这个"迷思",因而更多关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但是他们通常在研究设想上就将

社会性别化的权力这个传统的女权主义命题边缘化了。[28]

无论如何,把男人作为具有社会性别的人(gendered beings)来探讨的专门研究不会很快地消失。[29]在90年代,越来越多的在妇女史和妇女学领域的知识和专业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女权主义学者提出(虽然有时带着矛盾和歉疚的心情),[30]她们有权利将研究重点转向传统史学的男性主体。[31]这倒不必成为抱歉的理由。分析男人的社会性别是很重要的,狭窄一些的研究,做好了有时就是最好的方法。从女权主义的视角看,男性特质研究里最要害的问题"是(或应该是)男性特质的建构对妇女的影响"。[32]如果目前考察男性史的主要方法都不重视这样的影响,那我们更有理由要加强妇女史学者和男性特质研究者之间的友好关系。此外,这项事业也别有乐趣。如朱迪丝·艾伦(Judith Allen)最近提醒大家的,毕竟传统的史学家总觉得他们完全有自由偶尔偏离所谓普遍历史去审视妇女问题;并且,100多年来,某些专业就是通过把妇女"作为问题和审视的对象"来建立并维持自己的合法性。[33]所以,扭转这样的凝视(gaze)去审视男人的社会性别,的确是妇女的专业权力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妇女史和社会性别研究领域30多年来成果积累的合理延伸。

问题是:我们怎样做男人和男性特质的历史,才不至于遮蔽男人针对女人的社会性别权力的问题?以下我用自己研究领域(早期北美史)中的例子提出两类解决办法。我先说明:为了保证不脱离对社会性别权力的考察,有些对男人权力和女人从属状态的理论认识胜于别的认识。因此,对那些贯穿在我们研究中的那些隐含的导向性假设,保持清醒的认识是最有利的。在文章的其余部分我将探讨方法的问题,举出在选择问题、研究设计以及叙述表达方面的几个策略;事实证明它们可以很有效地帮助我们避免忽略男人对女人的权力的问题。

现在来看看我们的导向性假设。首先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康瑞文的《男性特质》一书中,社会性别秩序是基于一个包纳男性、排除女性的轴心:对宝贵的、关系着权力的资源和制度,男人有优势拥有权,妇女则缺乏

这些。社会性别秩序的关键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与其他社会差异的范畴一起,有差别地定位男人和女人与资源和机构的权利关系。在这个抽象分析层面上,还有另一种理论立场,即,社会性别秩序尤为重要的问题是,男人对女人的拥有权(men's *access to women*),以及这种拥有权是如何被维持、被挑战和被改变的。它的关键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如何与其他社会差异的范畴一起,给人们定位,使得男人更有优势拥有妇女的性、生殖能力、劳动力和/或她们亲属的资源和社会关系。从这个观点来看,差异性地分配对妇女的拥有权,则保证了男人彼此间的团结和等级关系。这一理论立场有个杰出的学术谱系,可以追溯到 70 年代及 80 年代初期的女权主义学术:当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如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直率地指出,"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人对女人劳动的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两方面","性别的劳动分工总是让男人获益"。同时,激进女权主义者,如卡特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安德里娅·多尔金(Andrea Dworkin)、艾德里安娜·利奇(Adrienne Rich)等认为,现代社会中社会性别统治的关键在于男人对女人的性存在(sexuality)的控制,尤其是"强制的异性恋"制度(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强制的异性恋制度因国家、国家的法律机制及其对男性暴力宽容而得到加强。这些学者认为,强制的异性恋成为霸权性的,是因为它使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性爱化(eroticize),进而将这种不平等关系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社会性别意识中。[34] 简言之,强制的异性恋制度保障了男人对妇女的性拥有权。

依芙·萨芝维克(Eve Sedgewick)的观点是这种理论立场的一个变异。她发展了盖尔·卢宾对结构人类学"女人交易"概念的女权主义重读,也创造了一个研究性存在(sexuality)和男性特质的统一的领域。她认为,男人主要被导向与其他男人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带来的情感和物质利益(而不是那种可以直接变成掌控妇女的利益)。但她同时也认为,同性社交纽带的整个关系的宽谱,既是两相情愿的也是有矛盾冲突

的,是通过对妇女的占有来调解的:妇女存在于“男人之间”。根据她的观点,社会秩序在根本上是三边的,男人和妇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决定其结构。特别是异性恋,总是在有力地警戒着同性社交的欲望(homosocial)与具体同性恋欲望(homosexual)之间模糊的界限;异性恋是这种调解的主要形式,并且至少从17世纪以来就是男人培养男性特质的关键。[35]同时,萨芝维克使我们注意到,异性恋规范制(heteronormativity)的巩固以及它对父权制权力的支持当中,有什么样的断裂和矛盾。这些断裂和矛盾,标志着男人们与文化上被认可了的男性特质形式之间的不同位置关系,也同时标志着他们与妇女和女性特质之间的不同位置关系。

上述各种观点都认为,确保“男权制红利”的——不管怎么理解它——首先不是把妇女从某种资源或某种社会权力中排斥出去,而是对妇女的占有。对妇女的拥有权定义着男性特权;是它使男人作为男人彼此相似(make men alike *as men*)并维系了男性纽带(male bond),不管这种维系是如何不完整。与此相关,对妇女的拥有权上的差别,是争斗着的各种形式的男性特质的核心,也是对与各种男性特质形式相关的男性特权提出差异性要求的核心。当然,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要找到一个社会场所(比如性存在或生殖劳动),来作为连接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所有体制的轴心,那是近乎堂吉诃德式的幻想。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女权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和很多理论一样,有着结构主义的痕迹和她们对马克思主义非常深的——或者说是批判性很强的——探讨。修正主义者,比如萨芝维克本人,倾向于一种更注重历史分析的方法。不过,即使那种对单一社会场所的追求现在看来是过时了,我们还是值得重新思考这个较笼统的命题:即,社会性别秩序取决于男人对女人的拥有权、这种拥有权在男人当中的不平均分配以及它面临的挑战。这样一个思路的优势是,它几乎必然要把男人气质(manliness)和男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紧紧地与他们同妇女的关系、与他们的社会性别权力联系在一起。

早期美国史的个案研究，显示了这样分析社会性别秩序和男性特质具有极大的阐释空间。在我开始讨论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和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之前，有必要对我的提法做个限定。目前，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比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这样一个认识，即维持男女不平等的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情境下是变化的，而不能被看作是先验的。在这个时刻，直截了当地声称社会性别秩序总是取决于男人对女人的拥有权，也冒着宣扬普遍主义谬论的风险。但是，美国的例子与其他一些社会形态构成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在这些社会形态构成中，亲属关系和/或者家庭成员的身份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组织起着关键作用。那么谨慎地说，在这些类似的情况当中，对妇女的拥有权也是社会性别秩序、特别是男性特质各种结构的一个中心特征。

目前关于早期美国史社会性别和男性特质的研究中隐含的逻辑思考，与强调男人对妇女拥有权的论点相当吻合。妇女史学家和其他一些学者早就指出，占主导地位的男人气质的标准，深植于殖民地时期家庭管理的结构中，深植于区分着男人和女人、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从而形成主仆关系的奴役结构中。不论在哪个具体的地区——以家户为单位的家庭劳动为主，或是以佃农和仆人为主，或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农业——这些主宰和依附的关系，包括连带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是英国殖民者社会的基本状态。这并不是说，这些关系在各地制度化的程度相同，或都处于霸权性的地位。但那些针对殖民统治扩张和巩固而发生的接受或者抵抗的宏观动态，是被这些关系决定的；这些关系也构造了日常生活中权力的微观动态。在英国殖民者内部和他们与土著美洲人之间的接触都是同样情况。当英国人在北美扩张殖民居住地和管理领地的时候，比起法国人或西班牙人，他们更注重将其家户管理的体系和相关的社会性别角色，以及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强加到当地人身上。结果，在欧洲人和土著美洲人往来中出现的社会性别方面的冲突，主要是针对这种强加企图的抵制、容纳或适应。在有些地区、某些历史时期混

合语言或混融文化的活力,其实就反映了英帝国的殖民过程中,这种统治策略在某些地方的弱点。

在一篇题为《家户管理》的很具挑战性的文章中,卡萝·沙玛斯(Carole Shammas)估计,在盎格鲁(英裔)美国人稳固控制的地区,生活在殖民地和早期合众国的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是家户依附者,即在法律上从属于他们的主人、父亲和丈夫的权威;这个比例比在英国本土高出很多。[36]相应地,在英国殖民地中被社会认可的成年男人身份(manhood),非常密切地与获取户主身份相连,这个身份通常包含了主人、父亲和丈夫的权威。这一身份并不属于所有的盎格鲁美国男人;更不要说非欧裔男人了。它代表法律许可的一种支配他人劳动、作为家户内部事物监督人以及在民事和政治上代表家户依附者的能力。男人的独立,意味着对他人行使控制,自己则从社会依赖中解脱出来。

当然,这种控制的支柱之一,是带了种族意义的控制与奴役制度的出现;这一发展始终与社会性别的动态变化纠缠在一起。妇女史学家们告诉我们,这个制度的早期历史清楚地显示,我们可以用对妇女的拥有权和控制权来很好地理解在这一情境下男人气质带来的特权。凯瑟琳·布朗(Kathleen Brown)的著作《良妻·荡妇·焦虑的家长》一问世便成了经典,因为她率先把社会性别的细致分析(包括男性特质的构成)纳入对17世纪晚期、18世纪早期弗吉尼亚地区奴隶制的制度化和种族主义的巩固过程的研究。盎格鲁美国人的社会性别制度与法律、意识形态以及其他构成差异观念的方式结合起来(这些差异包括非洲的和欧洲的,异教的和基督教的,野蛮的和文明的),使得原本不成形的种族话语系统化起来,并且产生了黑人与白人在女人身份和男人身份范畴里更加明确的区分。在法律和社会实践中系统化了的社会性别区分,现在被牢固地种族化,这样就为一种新的、更严酷的奴役政体打下了基础。这些区分尤其将种植园主阶级的男性特质紧密地与白人身份、对黑人男女的掌控权力的加强、对白人妇女的男权式保护联系起来。白人妇女越来越在意识形态层面被表

现为家内的、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优雅的。同时,奴隶主身份的特权,包括对妇女的权威,被系统地从黑人男性那里剥离。[37]

詹妮弗·摩根(Jennifer Morgan)研究了从巴巴多斯到南卡罗来纳地区的人口迁移和法律、习俗及社会实践的变迁。她的分析为这些主题提供了新的内容。当时奴隶制度正迅速地发展得更为依赖于自然生育和横跨大西洋的人口贩卖。摩根考察了这种情况下财产法和继承制度如何定义着并分配着对女奴隶的所有权。当时决定着继承权的法律手段和殖民者的社会舆论,很快就勾勒出女奴隶"劳作的身体"〔1〕的双重特征:他们对女奴隶身体的描述总是在生殖和劳动能力这两方面。对她们身体及其各种能力的控制,是种植园主阶级显赫起来的物质基础,是种植园主们获得作为父权式主子身份和一个新种植园社会主导成员的男人身份的关键。与此同时,对于被奴役的男人和妇女来说,限制种植园主对女奴隶"劳作的"身体的拥有权,是一个重要的反抗形式。[38]

成为独立的一家之主,在一般情况下取决于婚姻和财产所有权的联合运作。正因为如此,婚姻是英国殖民地以家庭为基础的管理制度的第二个主要支柱。显然,它是定义男人对女人的拥有权的一个重要体制,也是保障着性的不平等的中心要素。婚姻法创造了一个法律主体,即丈夫,他对另一个人,即妻子,可以拥有和掌控。这并不是要贬低另外一些出色的研究;它们讨论了丈夫的权力在事实上的局限、法律效应的复杂性和局限性,或者在某些地方妇女得以大大地施展她们的本领和责任以发挥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甚至取得一定的自主。但是,通过设定种种有利于丈夫却限制妻子的规定,比如对她的民事和政治能力、她的财产权、她对自己儿女的权利,甚至她的人身行动自由的权利等等的限制,婚姻将男人对女人的社会性别权力的主要形式体制化了。亨觉克·哈尔特格(Hendrik Hartog)最近发表了一本关于美国婚姻法的很全面的研究。他

〔1〕 原文中用的"laboring"一词,在英语中有双重含义:妇女生产的过程;正在劳动。——译注

写道:“关于有夫之妇的法律一箭双雕:把女人变成了妻子,并在婚姻内部建构和维护了一个权力结构。”[39]

最近研究男人身份的早期美国史学家对婚姻兴趣大增,部分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男人当中的差别和男人气质的定义,与婚姻紧密相关。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Foster)、马克·坎恩(Mark Kann)和理查德·歌德比尔(Richard Godbeer)的新作非常详细地展现了:男人从青年到婚姻的人生轨迹(或者逃离这样的经历),如何把青年人和男人区分成有权或无权享受成年男人身份的全部特权。制定和执行婚姻法的地方权力机构,干脆禁止某些男人结婚,阻挠或严禁跨种族结合。他们经常面临来自贫穷的白人、土著美洲人和黑人的挑战;这些人为自己创造了非正式的婚姻形式。婚姻法的总体效果是限制非白人男性对合法婚姻及其特权的拥有,并且建立一个非官方的默许的灰色地带,以便依照种族区分界限来巩固合法结合与非法结合之间的区别。并非所有的英裔美国男性都能通过婚姻来拥有妇女,不论是白人还是非白人妇女。那些没有财产、技能或个人的魅力或愿望去吸引女人和建立家庭的,就显得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不可靠——除非他们能够像有的男性精英那样说服本家族妇女做他们的代理妻子,并成为他们家户的女主人。以上这些研究的长处在于,它们把婚姻的性和情感层面与男人气质联系起来,同时并没有丧失对社会性别权力问题的关注。比如福斯特的著作显示,一些语言——男性气概和为人之父、婚姻中的性愉悦和爱情——把欲望的内部状态和性身体的男性化倾向,融入到丈夫对妻子的权威以及作为独立的统治者所享有的特权当中。18世纪里占主导地位的男人气质的标准,吸纳了婚姻的性爱。同时,边缘的和被谴责的性行为更成为文化关注点,被特别密切地与单身男子、非家户主,以及种族上的他者联系到一起。[40]

前面我们已谈到,婚姻及其维持的对妇女的拥有权,也构造着男人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有的男人不能成为丈夫,因此被剥夺了丈夫身份所连带的对妇女的权力。另一个原因是,婚姻既定义着一对夫妇,而且

也定义着一个社会三重关系：丈夫，妻子和其他男人。比如，对通奸的刑事诉讼和由丈夫提起的民事诉讼控告其他男人引诱妻子，定义了丈夫相对于其他男人，对妻子的性“占有”或“性垄断”这方面的权利。这些法律行为的目的是“补救男人彼此间的过失，补偿一个丈夫众多权利中界定他相对其他男人作为丈夫的权利和身份的一部分”。[41]这一主题经常出现在关于男人气质和政治的研究中。但是可能最出色地将它阐述出来的还是坎恩。他认为，婚姻这个关键的体制，把男人划分成值得和不值得被赋予政治参与权；因而它也是独立战争和早期合众国时期政治上的兄弟会的基础。尽管由财富、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等创造出的“独立男性”是不同的，已婚一家之主这样的身份，赋予他独立地或与他人一起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同时，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批评，将独身汉和未婚男青年与社会和政治的失序联系到一起。这样，婚姻——或者说对妇女的拥有权——在“政治兄弟会”值得尊敬的成员与这个联盟之外的不羁男子之间划了条界限。[42]

坎恩的分析，继承了从卡萝·培特曼(Carole Pateman)发展起来的一支女权主义政治理论。这一派的理论认为，美洲和欧洲革命年代的政权以及他们那时的继承者，从根本上来说是男权的。这并不意外：只有男人才是活跃的公民—主体，从定义上说他们的政治自主与占有在家内的妇女紧密相连。[43]坎恩的理论立场也与研究殖民地时期妇女史的学者是一致的：他们指出，作为一个历史议题，革命时期的政治与以前相比更加男权化。他们举出了几个因素：随着帝国和地方法律及行政的完善和规范，以家庭为基础的政治联盟的政治效果逐渐减弱；随之而来的是，在有势力的家庭中的妇女所发挥的非正式政治作用也慢慢丧失。另外，原来法律中有些漏洞，允许拥有财产的妇女(特别是未婚的)获得一些男人的特权。到 18 世纪晚期时，这些漏洞都被堵上了。[44]

并非所有人都像坎恩那样认为，早期合众国的政治基础在本质上是男权的。但是，几乎每个学者的描述都说明，在意识形态中对活跃的政治

集团和国家政治主体的设想,是彻底地男性化的。共和主义中的公民主体有具体的形体表达(concretely embodied),[1]那显然是男性。他是一个自由民;他是具有携带武器和拥有财产权利的家户主。这个身份确保他有捍卫自由的政治道德和能力。(这个时期的肖像艺术,通常表现的是他站在家门口,思考着他小小的领地、身边围着对他充满感恩之心的勤劳的妻子和忠实的儿子们。)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洛克的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的语言在彼此较量,它们的确将公民权利的享有者个体化和抽象化。但是,我们有理由说,同意参与组成政体的个体主体,此刻已被自然化了的男性特质(和种族)所标示;妇女已绝对不被作为政治主体来对待,因为她们被看作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别化的存在。此外,洛克理念中的公民,仍然占有一个妻子,与她一起有一个家户,尽管这个家户已经不再被想象成是政府的缩影或基本的政治单位,而是一个女性化了的非劳动生产性的"家"("home"),它以人们公认为自然的小家庭为中心,集中培养与女性和家庭相关的道德感悟和感情。[45]大略来说,社会性别史学家把早期美国理解为一个具有社会性别的政体,在这个政体中男性公民的建构是以他与妇女的关系为基础的。

以上对关于早期北美男人气质和婚姻,以及社会性别和种族勾连的最新研究方法的简略讨论,是想说明一个基本观点:关于社会性别的某些基本导向性假设比其他一些假设更好,有利于我们在书写男人和男性特质的历史时避免这个领域所特有的遮蔽性。早期北美史的研究例子说明,用男人对女人的拥有权来理解社会性别秩序,就能够把男性特质的动态变化和男人之间的竞争统一起来。同时,这样也能促使我们系统地探讨男性史的第一个前提,即男人获得其社会性别,涉及对妇女的权利问题(不论还有什么其他因素),而不仅仅是主张这个前提就完事。因为对妇

〔1〕 原文中的"embody"词义非常丰富,女权主义学术对它的使用和分析也是多样的。这里的翻译希望能够表达出两个层面的意思,即作为生物学上的男人和作为政治主体的男人之间的关联。——译注

女的拥有权的分配是不均等的，考察获得这种拥有权的方式还可以凸显男性史的第二个前提，即，社会性别秩序也关涉到男人中的差异问题。这一洞见应该被应用到早期北美史以外的其他社会背景中，在那些社会中，亲属和家户组织主要负责分配劳动和经济资源或者控制政治参与。我们可以继续思考和辩论：对妇女的拥有权的取得（即使是最广义的理解），是不是其他情况下的男性特质和社会性别秩序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在当今市场主导的政治经济和规训性质的国家里？当然，我们可以猜测，这样的研究关注点对很多问题的考察都会是很有用的。

虽然我们的理论设想并不一定只能同某个历史研究和阐释的具体方法相对应，但在下面，我将探讨几部著作是如何成功地把对早期北美男性和男性特质的研究置于对社会性别权力的分析。通过这些实例，我希望提供一套（虽然是不完全的）关于如何界定问题，以及如何进行历史阐释的有效策略。读者可能对不少策略都熟悉（至少在其他研究领域），但检视一下研究男性特质和社会性别的历史学家如何运用它们会有启发意义。提示一下总是好的。同时，这些研究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详细阐明，关注男人对妇女的拥有权，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男人和男性特质。

第一，即使一个学者所受的学术训练主要是关注男人，要避免[研究中]对妇女的遮蔽，比较的方法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对男人和妇女的比较，与仅仅考察男人或仅仅考察妇女相比，通常来说能够更细致地分析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因为比较的方法有助于准确发现，男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中到底什么是被社会性别化了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但是我们往往只说不做。简·卡门斯基（Jane Kamensky）就用了比较的方法来分析 17 世纪定居在新英格兰的英国殖民者的语言习惯。她认为，“公开演讲的特权，”是表演男性特质的关键，并且它标识出具有健全政治和公民能力的人与不被赋予这样能力的人之间的界线。[46] 卡门斯基考察了童年期以及男孩和女孩从童年开始的不同发展轨迹。她发现，无差别的语言习惯和教学法实践，把男孩和女孩培养得谦虚、小心甚至安静。但是成年

后,男人就被训练得采取与其社会身份相适的音韵腔调,从而获得公开演讲的特权,在各种公众空间和地点清晰地并且大胆地发言。同时,"端庄得体的"语言实践,迫使成年妇女的发言更加接近儿童的语言礼节而不是成年男子的,甚至对所谓适合"腼腆的"女性发言的场合也严加限制,基本上将其范围缩小到"虔诚的家庭"环境里。卡门斯基指出,"言语庄重"对女孩和女人来说,"成了一生的事业"。[47]当然,并不是所有妇女都对为她们规划出来的这种"事业"感兴趣。偶尔,也有人成为有造诣的演讲者,参加神学辩论——并且在男女混杂的情境下:最有名的是安妮·哈清森(Anne Hutchinson),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更多的人对虔诚的清教徒自律不感兴趣,她们大多数是下层妇女,在酒馆里或街上使用的是粗俗的口语语汇。但卡门斯基的比较研究至少告诉我们,为什么对于那些拒绝服从清教徒礼节对女性讲演者的定义、口尖舌利的妇女,新英格兰官员反应会如此愤怒。不论是贵妇人还是女佣,不讲妇道的语言挑战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和重要的男性特权。由于语言定义着具有公民人格的户主与他们的女性依附者之间的区别,这些妇女破坏了这类区分的一个主要方面。

第二,我们可以研究,男人在试图维持他们自己的异同、彼此监督遵从于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特质规范时,他们如何运用"象征性女人"(the symbolic woman)——这是妇女协调男人之间关系的方式之一。比如,男人关心他们的声誉,担心语言对声誉可能带来的损害——这在殖民地时代的晚期是非常明显的。我自己的研究表明,这些忧虑在远离家乡的商人当中非常严重;部分原因是,同行对他们的能力和道德的判断,不仅在当地舆论以及相对定义分明的空间当中传播,而且流布到了随着英帝国的大肆扩展而无限广大的商人网络。在特别不安的时候,商人们常常会在文字中使用攻击性极强的,通常是毫不掩饰的仇视女人的修辞和意象。妇女与恶毒无聊的闲谈之间的文化联系,一直长久地存在;现在它被这些男人发展了,如今他们把诽谤自己的男人与妓女和娼寮的无节制的交际(谈天的或性的)这样的事情联系起来。由于很难把高尚男人之间推心置

腹的，对别人的清醒评判同那些从散播流言蜚语中暗自取乐的情况区别开来，有的商人就把这种困境外化了：他们捏造各种具有告诫色彩的故事。在他们的描绘中，商人们不是毁于男人间不负责任的谈话，而是毁于"茶桌上的"女人们淫秽的谣言"从一个杂谈圈子传到另一个"。这样，通过利用"象征性女人"，他们不仅用"没有男人气"和"娘娘腔"来诋毁竞争对手，而且否认了他们自己对"男人气质"的理解中的矛盾，也外化了关于他们能否体现占主导地位的男人气质标准这方面的疑问。[48]

我们早就意识到了，18世纪大西洋两岸的男性政治善辩者经常提到女性妖怪的形象。她们的性贪婪与被溺爱的妻子习性，象征着宫廷的政治腐败或者商业的诱惑，标识出她们的男性配偶与谴责她们的、德行高尚的男人之间的道德差别。但是这些论者也依赖于贞洁的妇女来维持男人之间的区别。如卡萝尔·斯密司-罗森博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指出的，男性精英作家用家庭妇女〔1〕来提倡"资产阶级的"和共和政体的高尚道德，来贬斥贵族的奢华和所谓下层阶级的粗俗野蛮。[49]我们可以称诸如此类的对"象征性女人"的使用为"卢梭效应"：《爱弥儿》中那个爱家的但是又具有隐蔽的诱惑性的苏菲，保证了爱弥儿纯真的透明和有男人气质的坦诚。她——或者她的反面角色，即那些在茶桌上无聊八卦的妇女和性行为极度腐败的贵族女子——会突然地出现，将本来是男人之间的一个问题进行外化和女性化。同样地，关于新共和体的国家民族主义著述，也使用了一系列的象征性女人来衬托出一个新的美国男性政治主体。它突出了这个新公民的美德和雄劲，通过将美洲描绘成一个性开放的、但又纯真的土著女性，在她那里寻求逃避旧世界的腐朽，把她与欧洲人区分开来。与此同时，纯洁和爱家的白人妇女的形象，象征着使得他和他的弟兄们获得成为这块大陆合法守护者和继承者的文明教养（虽然偶尔地，他们也为被驱逐了的土著美洲人发出一两声悔叹）。[50]所以，我们或许可以

〔1〕 原文中"domestic woman"可表示多重含义：在家庭里的，善理家务的，为家庭自我奉献的等等。——译注

随依芙·萨芝维克一道指出：象征性女人存在于“男人之间”，其功能是确立男人当中的必要区别和联盟。

第三，即便我们的中心问题是男人当中的竞争关系和男性身份认同在这些关系中的作用，我们也要警惕，这些摩擦常涉及男人与妇女的联盟。关注这种联盟，是在历史研究中有效运用“妇女协调男人之间关系”这一理论的很好途径。比如简·林德曼(Jane Lindman)最近关于18世纪末弗吉尼亚的浸礼会当中的福音教男性特质规范的研究。她指出，白人福音教男性得以成功地挑战了精英阶层的男人气质的标准，部分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很多白人妇女的支持。这些妇女整体来说比男人更相信精神重生的教信。面对嘲讽和反对，这些男福音教徒们把男人气质定义为和平的隐忍和语言，而不是拳头和枪——并且，与主流的社会性别常规相反——是受苦和宽容，而不是为捍卫受损的荣誉去殴斗。男人和妇女的同盟还足以使福音教男性坚强到能够实现“身体举止”的根本性变化——他们的宗教严厉地排斥世俗的消遣，不管是粗俗热闹的(喝酒和赌博)还是文明高尚的(跳舞及展示高雅服饰)。这样的禁欲主义，大体上要求白人男性信徒不去“公开地表现”那种构成了传统男性特质的“雄劲”。[51]

同时，这场运动包括了美国黑人男女两性的信徒。英国式和美国黑人式的信仰形式，在两性混杂的会众当中融合。这突出了福音教所重视的皈依体现在情感和身体两方面的证迹。在与白人妇女和黑人男女两性一起的领受圣体过程中经历着一阵阵“颤抖、悲叹、呻吟”的“哭泣的罪人”，就是白人精英男性特质的反面——因为后者强调的是对身体的自控和情绪的节制。[52]此外，各地展开的宗教复兴运动的一个典型模式是，被福音教神父布道所吸引的妇女，接着就拉她们的男性家人入教。于是，对这些新的规范和身体实践，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杂交的或混合的男性特质规范？它们成功地吸引的不仅是为数众多的白种“中等阶层男人”，还有大量的“上流社会的人物”。[53]在这类例子中，男人和妇女以及黑人和白人的同盟共同作用着、改变着白人男性当中文化权威的分布，很多白人男

人实际上开始体现出另类的男性特质规则。

如果我们重视[男人]与妇女的联盟，就会注意到男性特质不断变化的实践、它的展开与男人统治女人的权力是什么关系；也会注意到男性特质占统治地位的定义和另类的定义，如何结合了社会性别权力。简·林德曼清楚地讨论了这些问题。福音教运动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为跨种族的伙伴关系以及在福音教会内部的男女平等开创了良好的环境。但是简·林德曼也指出，白人福音教男性很快就打压了这些对男权制权威的挑战。他们垄断了教会的领导职位，为自己保留了规诫教会成员的权力，限制入教条件。这样一来，福音教会"成为加强男性统治和白人种族优越的工具"。[54]这个最新巩固的体制领域，保证了改造后的男性特质的好处之一，就是"与志同道合的男人结成的新的集体伙伴关系"，这种结盟基本不被针对白人男性特权的挑战所干扰。[55] 18 世纪末弗吉尼亚的福音教运动较好地容纳了改造后的男性特质，但是在新的组织背景下，它重新确立了男人对妇女的宗教权威。[56]

这个结果与我要提到的第四点直接相关。对男性主体的历史研究中有一种倾向：男人被导入他们的男性身份的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小小挫折，都被研究者当成"危机"。然而，男人彼此为了他们那份"男权制红利"的斗争，不管语言上有多么尖利甚至充满暴力，这样的斗争本身并不象征着一场社会性别危机，尽管可能会引发这种危机。我们应该讲明，社会性别危机涉及对男人支配妇女的方式条件的挑战，而且我们一定要关注它的后果是什么。让我再一次用凯瑟琳·布朗的例子来说明。她对弗吉尼亚 17 世纪末的贝肯叛乱〔1〕的历史分析关系到了社会性别，她的方法在以前的历史研究中未被开拓过。首先，她将这个事件置于男性特质的历史中来考察，认为那不仅是一场在土著美洲人政策和执政条件方面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或是领袖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冲突，也涉及了"两种完

〔1〕 即 Bacon's Rebellion，1676 年英国乡绅贵族出身的贝肯（Nathaniel Bacon）领导弗吉尼亚小农和种植园主反对总督伯克利的起义。——译注

全不同的男性特质的文化”的斗争。[57]一种是以高贵的出身和贵族教养的表现为基础；另一种则是以极其恶毒的种族歧视和以枪械、斗鸡和酒馆为内容的过度男性化文化。贝肯的军队最终被击败，但是它充满种族意味的、尚武的“殖民地男性特质的语言”，在叛乱后上升为男人身份占主导地位的语言。[58]虽然它保留了旧的、崇尚男人荣誉的语汇，但它模糊了以前男人可以占有的相当精细地区分出来的荣誉的各种等级，取而代之的是以白人身份为基础的团结一致。于是，贝肯叛乱成了影响逐渐扩大的男性特质文化中的一个转折，同时还巩固了男人当中的种族区分。

布朗也在社会性别关系的长期不稳定及其解决方式当中来诠释贝肯叛乱及其后果。[59]1676年的叛乱之前，在弗吉尼亚这个刚建立不久的殖民地前哨，总的来说家户管理尚未被体制化。人口、社会和政治状况给男人对自由的妇女，尤其是对女仆的控制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户主个人和地方官员都无法清除基督教教友会女信徒的布道，也管不住那些“斗嘴的女人”。〔1〕他们屡次把这些女人拖到地方官面前，指责她们扰乱秩序，可还是限制不了这些女人在社区生活中作为道德裁判的权威。[60]然而，虽然妇女积极参加叛乱，叛乱平息之后的政治协议却将她们的非正式政治影响边缘化，并大幅度地将她们的文化权威削弱到仅限于家里和邻近街坊。这个协议把政治特权和财产权扩展到更多白人男性的身上；这些男人如今可以成功地宣称，他们具体表现着霸权男性特质的新规范。但是协议明确地阻止他们解放黑人，从而巩固了种族化的奴隶制与其他形式的奴役之间的区别。随着阶级的矛盾的缓解，立法者、法官和新扩充的白种男人选民群现在可以腾出手来强化自己的男权权威——不仅作为奴隶主，而且作为丈夫和父亲。新政权及其“白人男人身份的文化”建立起来的扩大了的“男人兄弟联盟”所享有的“特权”之一，就是强化了的对妻子、女儿

---

〔1〕“Brabling Woman”：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在1662年立法帮助由于其妻中伤诋毁邻居而被起诉的丈夫们。法律规定这些丈夫可以选择赔偿，或者让他们的妻子被公开扔到水里去作为惩罚。——译注

和女佣(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的权威,[61]布朗的研究准确地诠释了这个历史事件。它不仅是关于男人之间的竞争以及较量当中的男性特质的各种定义;它既产生于男人对妇女的社会性别权力的不稳定性,也是试图应对这种不稳定性。它显示了在男人对妇女的拥有权问题上的一个危机、以及这个危机的解决方式。

土著美洲人与欧洲殖民者的文化碰撞前沿地带,有一些很值得关注的社会性别危机的事件。这里我将讨论克罗地奥·桑特(Claudio Saunt)对于一个这类性质的事件的诠释,即 1813 年的克里克战争(Redstick War)。[62]通常的理解,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在阿拉巴马和西佐治亚的克里克土著美洲人之间的战争,是他们当中的"宗教本土主义者"与愿意容纳欧洲人的成员之间的战争。但是桑特认为,它也是一个长期的社会性别危机的最高点,不仅影响了男人之间的关系,也影响了男人和妇女之间的关系。[63]当时欧洲在那个地区进行的争夺,导致战争状态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几十年。这种状态抬高了战士及其"暴力的男性特质"文化的权力,牺牲的是原先克里克社会男性威信和影响得以存在的其他基础。战士文化的主导地位还产生了一个比原来更为两极分化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语汇。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与欧洲人的贸易导致克里克妇女在经济上对男人更加依赖。[64]在这种情况下,当英国人在 1763 年消灭了西班牙和法国对手,并试图(跟后来的美国人一样)通过劝诱克里克人学习小种植园主的安居方式来安抚他们时,英国人在许多克里克妇女那里找到了自愿的同盟。这些妇女直截了当地要约束那些变得意志消沉、日益卤莽的战士,并且试图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和纺织经济当中寻求其他收入来源。同时,有些克里克男人想要提高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在与美国改革者及其土著美洲人代理人那里把自己扮演成自己人民的正式代言人,积极接受新的男性特质规范——这种新规范用来衡量成功男人身份的标准是"牲口、奴隶和钱币"。[65]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各种矛盾持续着,克里克妇女在工作的条件问题上与白人和土著美洲人男性的

斗争，还有那些接受了男性特质的新文化（包括它的父权制特权）的克里克男人与那些愈发绝望的，或者抵制这种文化或者被它排斥的男人之间的矛盾。克里克战争就是这些矛盾冲突的结果。简言之，它是在东南部殖民地前沿的一次社会性别危机的暴力极致。[66]

前述中几个例子已经表明，对男性权力的威胁常常会激起仇视妇女的反弹。我们这里说的威胁，不仅是在男人彼此之间充满竞争的对抗（在这些对抗中妇女可能成为调解者或替罪羊），而是妇女侵蚀、颠覆或者直接挑战男人作为个人或集体的对女人的权威。我要说明的第五点就是，在历史上出现的反弹（不管如何令人感到气馁），是一个将男性特质研究和男人争取对妇女的拥有权（面临的威胁）结合起来探讨的机会。比如肯尼斯·洛克里治（Kenneth Lockridge）的著作中分析的三个南方种植园主恶毒仇视妇女的文字，就显示了男人个人的，但又具代表性的反扑。他认为，这三个人都是野心勃勃但又缺乏安全感的殖民者，被困在处于英帝国文化和政治边缘的位置上；尤其令他们苦恼的是，以伦敦为中心的任命权制度使殖民地精英们总是要为一点残羹去竞争。更直接的问题是，掌握着财产资源的妇女在这三个人的生活中都构成了障碍：托马斯·杰弗逊的母亲在他年轻的时候控制着他继承的财产，而在那些年里他是应该参加精英社会的求爱活动的。而拥有财富和地位的女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罗伯特·波林（Robert Bolling）和威廉姆·拜尔德（William Byrd）的求婚。由于婚姻是社会关系和财富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对于正在往上爬、有精英梦想的或者经济上还需努力的男人，这些失败的求婚对于波林和拜尔德自我定义的男人气质就构成了双重挑战，既威胁到他们男性特权的物质基础，也威胁着他们作为爱人的自尊心。

对此他们的反应是仇视女人的文字宣泄。点缀在拜尔德的通俗作品中的激愤的、充满种族歧视的、带有暴力色彩的性语言很有代表性：比如，关于黑人妇女的强烈性欲的陈词滥调的长篇论述，把巴西的有关女人月经的仪式各种各样的轶事拼凑起来没完没了地讲述，古罗马那些关于妇

女把自己的爱人活埋的传说，关于古人维持长时间勃起的那些技巧的淫亵报告，有关生殖器错位的充满刺激性的详细描写。洛克里治认为，这些"格外带有敌意的"文字的中心主题是：败坏的身体和"荡妇"失控的性欲，威胁了男人身体上的清正。[67]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所谓的女性异常，不过更加说明了象征性女人调解男人之间困难关系的方式：这些象征性女人，浓缩了源于腐败的欧洲帝国都市中心的、对殖民地男性权力的威胁。[68]虽然洛克里治在书中只是给予零散的关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当处于挣扎当中的男性在与妇女的关系上失败时，在金钱和性的交叉之处，这些文字宣泄同时也是男性焦虑和愤怒的扭曲和夸张的表达。18世纪的婚姻理念，结合了对财富和地位毫不掩饰的追求与对"最重要的朋友"之间的性亲密的梦想。因此，求爱就成为一个紧要关头。尽管妇女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不独立使得男人在求爱游戏中更有利，但原则上来说，妇女可以拒绝她们的追求者。正是在妻子从属于丈夫的权威这个大背景下，"共同的愉悦"这个承诺使妇女有权在定下契约的时候表达自己意愿和判断。拒绝，是在表明对她的追求者的社会资产和个人魅力的不满意，在保留自己的资源和感情。并不是所有的，也不是大多数的男人都对这类挫折有像洛克里治所分析的人物那样的激烈反应。但是由于在妇女那里受到的挫折而产生的愤怒而拐弯抹角的反应，的确显示了在社会性别秩序当中一些典型的不稳定之处——在这些地方，妇女可以直接地挑战男人获得对她们的拥有权的方式。[69]

当然，反扑也是一个集体现象。卡萝·卡尔森(Carol Karlsen)告诉我们，1692 年在沙勒木镇的巫术事件，〔1〕就是一个在早期美国历史上针对妇女的集体反攻倒算的典型案例。[70]它发生的时候，正是新英格兰的东北地区法国人、英国人和土著美洲人之间进行战争期间，也受到了短命但

〔1〕 1692 年 6—9 月，19 个被判了巫术罪的男人和女人被运到一个叫 Gallows Hill 的地方(在沙勒木镇附近)去执行死刑。还有好几百的人面临巫术的指控，很多人被关在监狱里。——译注

苛酷的安德鲁斯执政期以及光荣革命所造成的混乱的影响。面临战争中的重大失败,又加上新颁布的宪章和新任命的总督使得殖民地的稳定和男人们在家中的权力悬于一线,信奉清教的地方官员和牧师于是相信,殖民地最近的不走运,是因为神意的磨难降临到一些堕落者身上,而不是他们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暂时的失败。结果,他们把一个本来是地方的小事件变成了整个殖民地范围内的女巫搜捕。

由于当时的宗教文化还未脱去其神秘魅力,也未失去对抗魔鬼在世界上的活动的神学目的,主要是年轻女性的非难者(她们当中有些刚刚从被毁灭的殖民地前沿地区逃出来)得到了男性当权者的支持;她们的指控首先对准了那些特别有权力或者不羁的女子:拥有财产的妇女,好斗傲慢的邻居,还有不在任何人管辖范围的、四处游荡的女乞丐和女酒鬼。然后她们又转去攻击看上去被这样的女人影响了的任何人(无论男女),包括与沙勒木镇里夸夸其谈的女教友派信徒有关联的人,以及多少和前方战事失利有关的人——她们认为,这些家伙和土著美洲人结成配偶,是与魔鬼缔约。在这期间,信奉清教的地方官员、牧师和医生,开始先是不停地探察年轻的女非难者身体上的症状和看到的幻象,然后将其变成法律上可以解释的巫术的证据,把她们在家中的不满,无名的恐惧和渴望编成对被告的见证,通过一遍遍的审讯从女巫那里榨出招供来。就这样,面临对他们清教的家长这一身份的挑战,当权者取得了他们需要的证据、证词和招供,以最壮观的形式来重新树立国家权力。

但是,在把独立的、难以驾驭的女人和与她们有关联的人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公开教训之后,信奉清教的地方官员和牧师开始对年轻女非难者及其证词产生了疑虑。当非难者们开始牵连身居高位人士的时候,这种疑虑就更加强了。他们一下子换上另一副面孔,不再认为这些女孩子和年青妇女是在捍卫被尘世中和信仰上的敌人所包围的殖民地,而是无意识中被魔鬼驱使的侍女——魔鬼通过她们来说话。正如玛丽·柏丝·诺尔顿(Mary Beth Norton)指出的,这一新理解,很方便地就重新树

立了一个适于非战争时期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71]

对妇女的反攻倒算，不论是否以暴力形式出现，都是男人气质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一个重复出现的特点。18 世纪在英国殖民地和早期美国的妇女，利用了殖民地的秩序给她们提供的机会和语言，大声地发言，回嘴，说脏话，说“不”，在法庭上控诉男人或在大庭广众前对他们进行口头攻击，不给男人她们自己的财产、感情、身体和劳动，收起纺机或将它们捣毁，在谷仓后面喝酒、在马路上喧嚣，抛弃旧的教会去创建新教会，蔑视她们的主子并以自己的方式膜拜，布道做预言或用其他方式侵害男人的男权制红利。这时，反攻倒算通常很快到来并会取得成功，至少是暂时的。虽然这种情况未必出现在其他地区和时代，但不管怎样，对反攻倒算的关注凸显了社会性别权力动态变化中的不稳定之处。

最后一点也就是第六点，某些人的社会性别实践和身份认同打破了惯常的男人和女人、男性和女性的范畴，这为考察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互相建构以及这两者之间混乱的界线是如何被监察的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72]一个有名的例子是 17 世纪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托马斯娜·霍尔(Thomas/Thomasina Hall)。很多年里，这个人成功地来回穿越社会性别的文化分界线，有时做士兵和男仆，有时又做女仆或技巧高超的女裁缝和针线工。这可能是个范例。[73]但是女扮男装的妇女也制造了社会性别麻烦。在英国海军和陆军里、殖民地大陆部队甚至海盗团里那些以男装混入的妇女，在近代以前的英国和殖民地不算希罕。如马尔克斯·列迪克尔(Marcus Rediker)指出的，她们“利用了并继续了女扮男装这一长期存在的地下传统；这一传统在欧洲普遍存在，但是在近代前的英格兰尤其盛兴”。[74]她们当中有的留下了歹徒冒险题材的故事。故事当中，这些往往是相当贫困的妇女，融合了毫不掩饰的经济动机(她们需要差事，工资甚至养老金)与对于“更大的自由，声望和权力”的梦想。[75]她们表达了对自己“男人气的”勇力和航海技术的自豪。总之，她们对男性特质的彻底演绎，使她们得以进入原本对妇女关闭的空间、场所和职业，并获取了男

性特权的一小部分。[76]

这些妇女一旦被发现，就成为文化迷恋甚至钦羡的对象。当时关于她们的文字评论，显示出文化权威们如何地企图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语言来化解她们对“女性男性特质”（“female masculinity”）[77]的表达。戴安娜·德高（Dianne Dugaw）认为，评论者们对这些女主角典型的男性美德和成就，以及她们对此的自豪表达，总是轻描淡写。他们不能无视某些东西的时候——特别是作为这些叙述的轴心的男性衣饰和身体语言，他们就将这些简单解释成女人掩饰女性特质的花招。[78]他们还去掉故事中简单的经济目的，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这些女英雄所处的特殊情况并加入典型的女性动机，比如逃离对她们有性企图的男人，或者为了捍卫自己的性贞洁。至于这些评论是否完全地抹杀了“勇敢的女水手”的颠覆性、使读者无法体会这些含义，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不管当时的读者如何理解这些故事，女水手创造性地挪用了男性特质这一现象，非常清楚地凸显了社会性别范畴的社会构建（可能比只考察男人的男性特质研究更有效）。[79]的确，她们的主体性已经是不可知的了，我们究竟是该称她们为“女水手”还是“女易装者”都是一个问题。她们提醒我们，我们在讨论所谓男性和女性的历史主体时必须小心，不能轻易认为，社会性别化了的存在可以脱离于维持或者改变着他们的社会性别主体性以及针对他们的归类实践；我们必须思考诸如以下有意思的问题：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如何共同建构，以及渗透在这个过程中的权力动态变化是怎样的。

妇女史学家和其他投身女权主义的人，包括很多男性史学者自己，对男性特质研究有些不安。这种不安差不多与新男性史的兴起同时出现。关于男人和男性特质的专门研究的繁荣，并没有缓和这些忧虑。的确，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史学者在那个领域展示身手、新一代的专家们评价现有的学术，这种忧虑甚至在加深。本文开篇几页浓缩并系统地归纳了一些有批判性的洞见，它们是这种忧虑较早的表述。我提出，这个领域中在某些方面最有成果的一些指导性前提和方法论观点，其实恰恰导致了对

社会性别权力的忽视这一奇特现象。本文提出这样的批评，并对男性史典型的遮蔽状况的原因做了诊断。希望这个分析不仅在妇女和社会性别史领域的学者中广泛引起共鸣，而且超越本文作者自己的学术领域（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史和早期美国史）。

我相信审视男人的社会性别是一个重要的女权主义学术问题，而且出于更实际的考虑，我想新男性史还会继续繁荣一段时间。所以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探讨了男性特质和男人身份的研究如何可以更加可靠地，或者说更加坚定不移地把重点放在社会性别权力上。我提出，通过男人获得对女人的拥有权来思考社会性别秩序，在很多历史研究领域（和对很多不同的问题）都会是一个绝好的出发点。通过对早期美国史的说明阐述，本文列出了一系列（虽然是不完全的）方法；它们更能够突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互相建构，突出社会性别权力以及它所受到的挑战。这份单子虽然不完整，但是它旨在抛砖引玉，希望所有对男性特质和社会性别权力感兴趣的史学家能够发展它。我们在理论上的坚持和方法论上的选择，是干系重大的。新男性史有把我们引回没有女权主义历史以前的危险，但也可以坚持对权力形态的关注。权力的形态，渗透进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建构当中，并且组织着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是新男性历史对于男性主体建构的理解的根基。

本文发表在：

Gender & History, Vol. 16 No. 1 (April 2004), pp. 1－35.

张　颖译

注释：

1　Joan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1986), pp. 1053－1075.

2　Joy Parr, "Gender History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76(1995), p. 367. 引文。

3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Judith Allen 说:"像……历史上一直以来那样,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研究者——男人——作为一个群体,还没有显示出针对男人作为一个性别来研究的兴趣。在与统治和压迫问题的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仍然是未标识出的、透明的、不受审察的。" Allen, "Men Interminably in Crisis?: Historians on Masculinity, Sexual Boundaries, and Manhood",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2(2002), p. 192; Bruce Dorsey, *Reforming Men and Women: Gender in the Antebellum C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 - 6。

4 Toby L. Ditz,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The History of Men, The History of Gender in the 1990s", 38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2000), pp. 167 - 168. Michael Kimmel 认为,"男性特质的不可见性"正是与权力有关的一个"特权"。Michael S. Kimmel, *The Gendere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 - 6。但是 Bruce Traister 不认为,一个从事把"男人作为男人"来研究的姿态,就自然意味着这个人是"批判的先锋"。Bruce Traister, "Academic Viagra: the Rise of American Masculinity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 52(2000), pp. 281,282。

5 美国的 American 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在 1991 年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它的官方刊物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在 1992 年开始出现。此前,AMSA 一直以其他的名字附属于另一个组织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n against Sexism(成立于 1984),从 1980 年代早期开始就举行各种学会并出版一种快讯。关于男性研究的起源,参见 Judith Kegan Gardiner, "Introduction", in J. Gardiner (ed.), *Masculinity Studies and Feminist Theory: New Direc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 - 6。

6 Mark C. Carnes, "Foreword", in Laura McCall Donald Yacovone (*A Shared Experience: Men, Women, and the History of Gend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i. Nancy Cott 在 1990 年提出,在男人历史和妇女史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交叉的机会,男性历史可以帮助揭示我们称之为"性/社会性别制度"的运作。Nancy F. Cott, "On Men's History and Women's History", in Mark C. Carnes Clyde Griffen, *Meanings for Manhood: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y in Victoria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 206。

7 R.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77,82 - 83.

8 另见, Kimmel, *The Gendered Society*, p. 2。

9 术语是 Connell 创造的,但是它们及其同义语在我们当中广泛地使用。直到最近,男性史的研究者才开始关心语汇也是多种男性特质的存在和交错的记录方式之一。例如,Mark Kann 的分类,包括"传统的家长","贵族男人身份","绅士式家长","共和男人身份",还有"自我奋斗成功的男人"("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 "aristocratic manhood", "the genteel patriarch", "republican manhood", and "the self-made man")。他其实是从 Michael Kimmel 那里得到的启发。Mark E. Kann, *A Republic of Men: the American Founders: Gendered Language, and Patriarchal Polit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 - 15; Michael S. Kimmel,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10 Lynn Segal, "Changing Men: Masculinities in Context", *Theory and Society* 22 (1993), p. 626。另见 Parr,他同意 Segal 的观点,但也指出,"我们要意识到,有可能,男性特质的某些形式还没有被它们与各种女性特质的区别所界定,而是被它们与其他男性特质的区别界定。这个认识很重要。" Parr, "Gender History", pp. 370 - 371。Segal 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重申。Konstantin Dierks, "Men's History, Gender History", *Gender & History* 4(2002), p. 150; Mark Justad, 'Women's Studies and Men's Studies: Friends or Foes?',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8(2000), p. 402。

11 Mark C. Carnes, *Secret Ritual and Manhood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认为,男性兄弟会的秘密仪式和空间,是针对当时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取得的文化和社会权威而发生的反应。Carnes Griffen (eds.), *Meanings for Manhood*, and W. Jeffry Bolster, *Black Jacks: African American Seamen in the Age of Sai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在亚文化研究领域当中的同性恋者历史的最高成就,见 George Chauncey, *Gay New York: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1890 - 194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12 Parr, "Gender History", p. 369.

13 妇女史学家们当时基本上在一开始就进行了争论。Ellen Dubois, Mari Jo Buhle, Temma Kaplan, Gerda Lerner Carroll Smith-Rosenberg,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omen's History: A Symposium", *Feminist Studies* 6 (1980), pp. 26 - 64。

14 关于"虚假的对等",见 Cott, "Men's History and Women's History", pp. 205 - 206; Traister, "Academic Viagra", p. 299。它是 1990 年代中期女权讨论的一个方面,主要关于"gender"、"gender studies"类语言的学术政治及管理政治。Rosi Braidotti 更倾向于用"性别差异"的语言(sexual difference),认为 gender 这样一个概念,前提认识是"男人和女人是在对等的方式中被建构的",并认为 gender studies 造成了"政治上具有灾难性的体制性后果",其中特别是"关于男性特质的研究篡夺了女权主义的工作"。Rosi Braidotti, Judith Butler, "Feminism by Any Other Name",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6 (1994); Calvin Thomas, "Reenfleshing the Bright Boys: or, How Male Bodies Matter to Feminist Theory", in Judith Kegan Gardner (ed), *Masculinity Studies and Feminist Theory: New Direc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61,65 (quote)。

15 Gail Bederman, *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 -19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7. Bederman 的理论得益于 Joan Scott,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 *Critical Inquiry* 17(1991):773 - 797 以及 Teresa de Lauretis, "The Semiotics of Experience", in De Lauretis, *Alice Doesn't: Feminism, Semiotics, Cinem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58 - 186。

16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在美国的男性研究当中影响巨大。

17 Connell 之前发表过一部关于妇女及社会性别的在社会学当中很重要的著作: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最近新书是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类似的,比较 Michael Kimmel's *American Manhood* to his overview, *The Gendered Society*; E. Anthony Rotundo, *American Manhood: Transformations in Masculinit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18 Mrinalini sinha, "Giving Masculinity a History: Some Contributions from Indian History", *Gender & History* 11(1999), p. 447.

19 Sinha, "Giving Masculinity a History", p. 454.

20 Antoinette Burton, "A 'Pilgrim Reformer 'at the Heart of the Empire: Behramji Malabari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Gender & History* 8(1996), pp. 175 - 196; Catherine Hall, "Imperial Man: Edward Eyre in Australasia and the West Indies, 1833 - 1866", in Bill Schwarz,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Race, Ethnicity and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30 - 170; Mrinalini Sinha, *Colonial Masculinity: 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96);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2,90 - 104; Ann L. Stoler,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另见最近关于将北美史与后殖民研究更好结合的论坛。Ann L. Stoler, Ramón Gutiérrez Lori D. Ginzberg, Dirk Hoerder, Mary A. Renda Robert J. McMahon, "Empires and Intimacies: Lessons from (Post) Colonial Studies: a Round Tabl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2001), pp. 829 - 897。

21 Homi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October 28(1984),126－133. 关于 Bhabha 的社会性别中立的主体这一问题，参见 Anne McClintock,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xt*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362－364。另外，他对男性特质、焦虑和民族主义的独裁形式的理论探讨，见 Bhabha, "Are You a Man or a Mouse?", in Maurice Berger, Brian Wallis Simon Watson, *Constructing Masculin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22 Gail Bederman, *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11 (quote), 11－15; Kathleen M. Brown, *Good Wives, Nasty Wenches, & Anxious Patriarchs: Gender, Race, and Power in Colonial Virginia* (Chapel Hill, NC: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Toby L. Ditz, "Shipwrecked, or Masculinity Imperiled: Mercantile Representations of Failure and the Gendered Self in Eigh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1(1994), pp. 51－80; Dana D. Nelson, *National Manhood: Capitalist Citizenship and the Imagined Fraternity of White Me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6,19.

23 我这些关于"危机"的讨论受到下面这些分析的启发：Judith Allen, "Men in Crisis?", pp. 199－202; Bederman, *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10－20; Frank Mort, "Crisis Points: Masculinities in Social Theory", *Gender and History* 6 (1994), pp. 124－130; Traister, "Academic Viagra", pp. 285－299。Also see Judith Kegan Gardiner, "Introduction", in *Masculinity Studies and Feminist Theory*, pp. 6－11,14。

24 男性研究当中的主流学者，批判男性运动当中的政治保守趋向。Judith Kegan Gardiner, "Theorizing Age and Gender: Bly's Boys, Feminism, and Maturity Masculinity", in *Masculinity Studies & Feminist Theory*, pp. 102－107。尽管 AMSA 早期附属于反对性别歧视男性运动以及总体上进步的宗旨，但由于所谓接受多样的视角来诠释男人的体验，结果出现了对 Bly 的观点的接纳。"Mission Statement", American 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www. vix. com/pub/men/orgs/writeups/amsa. html〉; James Doyle and Sam Femiano, "Reflection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Field" 〈www. mensstudies. org/history. htm〉。

25 Traister, "Academic Viagra", p. 276.

26 Hazel V. Carby,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Women's Era: Lynching, Empire and Sexuality in Black Feminist Theory", in Henry Lewis Gates,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 301－316; Carby, *Reconstructing Womanhood: The Emergence of the Afro-American Woman Noveli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Glenda Elizabeth

Gilmore, *Gender and Jim Crow: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White Supremacy in North Carolina*, 1896 - 192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另见 Jaquelyn Dowd Hall, *Revolt against Chivalry: Jessie Daniel Ames and the Women's Campaign against Lynching*, rev.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和 Martha Hodes, *White Women, Black Men: Illicit Sex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Sou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Evelyn Brooks Higgenbotham 有一个关于种族与社会性别研究方法的出色文章,在 90 年代被广泛引用。"African-American Women's History and the Metalanguage of Race", *Signs* 17(1992), pp. 251 - 274。

27 Steven J. Stern's magisterial, *The Secret History of Gender: Women, Men, & Power in Colonial Mexico*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也是相关的一部著作。

28 Stoler *et al.*, "Empires and Intimacies", pp. 829 - 897; Laura McCall and Donald Yacovone, "Introduction", in *A Shared kxperience*, pp. 1 - 15; Lisa Wilson, *"Ye Heart of a Man": The Domestic Life of Men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9 Carnes 指出,他和不少人在 80 年代错误地预言,男性史和妇女史将"让位于"一个社会性别的"互动的"历史。"Foreword", p. xi。

30 比如 Dana Nelson,是个"毫不留情地批判白人身份对妇女和非白人而造成的体制与实践层面的后果"的历史学家。她就深切地感觉到,有时她需要做些解释,因为读者会觉得她对某些白人男性的分析和诠释"出人意料地有恻隐之情"(不管是这些男人是历史真实的还是文学虚构的)(*National Manhood*, pp. 25,26.)。

31 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妇女史学家进入了男性史的领域,比如:Elisa Barkley Brown 当年发展了"womanist consciousnesss"的概念来分析 19 世纪晚期美国黑人妇女的文化("Womanist Consciousness: Maggie Lena Walker and the Independent Order of Saint Luke", *Signs* 14[1989], pp. 610 - 633)。现在她在进行一个对 20 世纪早期美国黑人的男性友谊的全面研究。而 Catherine Hall, Lenore Davidoff 当年写了著名的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 - 1850* (London: Hutchinson, 1987),后来发表了 *White, Male, and Middle Class: Explorations in Femin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Darlene Clark Hine,过去参与编辑好几部美国黑人妇女的历史的文章和资料——包括 *Black Women in America: An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2 vols., Darlene Clark Hine, Elsa Barkley Brown, Rosalyn Terborg-Pen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为那个领域的研究体制化作出重要贡献。她现在在参与编辑一套有关黑人男人身份的研究。还有 Darlene Clark Hine Earnestine Jenkins (*A Question of Manhood: A Reader in U. S. Black Men's History and Masculinity*, vol. 1, *"Manhood Rights": The*

Construction of Black Male History and Manhood, 1750 - 187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以及 Carroll Smith Rosenberg,曾经早在 1970 年代就出版了关于 19 世纪妇女史的开拓性著作——包括"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n the inaugural issue of *Signs* 1 (1975), pp. 1 - 30,最近将注意力转向早期美国男性文学家的社会性别化语言:"Discovering the Subject of the 'Great Constitutional Discussion', 1786 - 1789",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9 (1992), pp. 841 - 873。

32 Thomas 概括并赞同 Kaja Silverman and Tania Modeleski 的观点:"Reenfleshing the Bright Boys", p. 62。强调为原文。

33 Judith Allen, "Men in Crisis", pp. 192 - 193.

34 Heidi Hartmann, "Family as the Locus of Gender, Class, and Political Struggle: The Case of Housework", *Signs* 6(1981), p. 372; Catharine A. MacKinnon,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Toward a Feminist Jurisprudence", *Signs* 8(1983), pp. 635 - 658; Adrienne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perience", *Signs* 5(1980), pp. 631 - 660.

35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na R.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Eve Kosofsky Sedgwick,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36 她的估计不包括很大一个群体的成年人儿女,其实他们也是依附者:生活在家里但没有自己的财产,不过在法律上有权利离开。Carole Shammas, "Anglo-American Household Gover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2(1995), pp. 123 (figures), 104 - 144。

37 Brown, Good Wives, *Nasty Wenches, and Anxious Patriarchs*.

38 Jennifer Lyle Morgan, *Laboring Women: Reproduction, and Slavery in Early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forthcoming, 2004); Morgan, "Some Could Suckle Over Their Shoulder": Male Travelers, Female Bodies, and the Gendering of Racial Ideology, 1500 - 1770',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4 (1997), pp. 167 - 192. 关于奴隶主对女性奴隶的性占有权、及其对界定他们的男性特质的重要性,参见 Natalie A. Zacek, "Sex, Sexuality,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Leeward Islands", in Merril D. Smith (ed.), *Sex and Sexuality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Kirsten Fischer's *Suspect Relations: Sex, Race, and Resistance in Colonial North Carol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39 Hendrik Hartog, *Man and Wife in America: A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5.

40 Wayne Bodle, "Soldiers in Love: Patrolling the Gendered Frontiers of the Early Republic", in *Sex and Sexuality in Early America*, pp. 217 – 239; Thomas A. Foster, "Deficient Husbands: Manhood, Sexual Incapacity, and Male Marital Sexu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6(1999), pp. 723 – 744; Foster, "Sex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n: Anglo-American Discourses of Sex and Manliness in Massachusetts, 1690 – 1765", PhD di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2; Richard Godbeer, *Sexual Revolution in Early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rk Kann, *Republic of Men*; Lisa Wilson, *"Ye Heart of a Man"*; Karin Wulf, *Not All Wives: Women of Colonial Philadelphia* (Ithaca: Cornell, 2000), pp. 106 – 110, 116 – 117. 关于所谓社会性别前线地带(gender frontier)的跨种族结合和自许的婚姻，见 Nancy F. Cott, *Public Vows: A History of Marriage and the 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 – 37; Albert L. Hurtado, "When Strangers Meet: Sex and Gender on Three Frontiers", *Frontiers* 17(1996), pp. 52 – 75; Philip D. Morgan, "Interracial Sex in the Chesapeake and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1700 – 1820", in Jan Ellen Lewis Peter S. Onuf (ed), *Sally Hemings and Thomas Jefferson: History, Memory, and Civic Cultur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9), pp. 52 – 84; Peggy Pascoe, "Gender, Race,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the Case of Interracial Marriage", *Frontiers* 12(1991), pp. 5 – 18; Martha Hodes, *Sex, Love, Race: Crossing Boundaries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41 Hartog, *Man and Wife in America*, pp. 137, 139. 性的"possession" and "monopoly"是他使用的词语。

42 Mark Kann, *Republic of Men*.

43 Pateman, *Sexual Contract*. For the French case, also see Joan B.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an Wallach Scott, *Only Paradoxes to Offer: French Feminists and the Rights of 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4 Cornelia Hughes Dayton, *Women Before the Bar: Gender, Law, and Society in Connecticut, 1639 – 178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Linda K. Kerber, "The Paradox of Women's Citizenship in the Early Republic: The Case of Martin vs. Massachusetts, 180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1992), pp. 349 – 378; Mary Beth Norton, *Founding Mothers and Fathers: Gendered Power and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Knopf, 1996), esp., pp. 282 – 292, 405. 并见 Karin Wulf, *Not All Wives*, esp. pp. 181 – 210 当中的出色评价。关于稍晚些的南部的建设，见 Stephanie

McCurry, *Masters of Small Worlds: Yeoman Households, Gender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Carolina Low Coun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这些作者的强调点有很大不同,但他们都强调政治的男性化。而这并没有出现在独立战争和早期美国的时代。见 Rosemarie Zagarri 有洞见的文章,她讨论了从苏格兰启蒙传统中出来的有关妇女的天赋人权观念。"The Rights of Man and Woman in Post-Revolutionary Americ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5(1998), pp. 228 – 229 (quote), 204. 关于美国精英当中的各种沙龙,见 Catherine Allgor, *Parlor Politics: in which the Ladies of Washington Help Build a City and a Governmen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Susan Branson, *These Fiery Frenchified Dames: Women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National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Park,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Patricia Cleary, *Elizabeth Murray: A Woman's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0), esp. pp. 167 – 220; Bruce Dorsey, *Reforming Men and Women*, pp. 11 – 49。

45 应该说,这样被想象的家庭是非政治的,但是并不属于私领域(与社会的相对或被个人拥有的)。早期美国的意识形态中,与家庭和日常联系在一起的天然的感情与感受力,明显地是将家内与其他社会内容连接起来的社会素质。Nancy Cott, Hendrik Hartog and Amy Stanley 近来有力地把婚姻的问题扩展开来,把它作为一个将 19 世纪男人当中的政治关系三极化的一个方式。比如,Stanley 认为,在一个越来越被契约及其各种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社会里,"家"开始被理解为市场逻辑的反面和限制、后者的所有物,以及一个男人的自由和公民权的标志。实际上对家的拥有权,是以种族和阶级为界线不均等地分配的。于是,获得家户主的地位,就成了被解放奴隶和穷苦的白人劳工的一个政治号召点。Amy Dru Stanley, *From Bondage to Contract: Wage Labor, Marriage, and the Market in the Age of Slave Emanci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另见 Nancy Cott,她揭示了,婚姻法在美国出生的欧裔者与移民和土著美洲人之间划出法律区分的时候,起了关键作用。Cott, *Public Vows*, pp. 120 – 123, 132 – 155。Also see Hartog, *Man and Wife in America*。

46 Jane Kamensky, "Talk Like a Man: Speech,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Early New England", in *A Shared Experience*, pp. 21, 22.

47 Kamensky, "Talk Like a Man", p. 27.

48 这是笛福的话。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New York: Alan Sutton, 1987), p. 141. Ditz, "Shipwrecked" and "Formative Ventures: Mercantile Letters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Experience", in Rebecca Earle Carolyn Steedman, *Epistolary Selves: Letters and Letter-Writers, 1600 – 1945* (London: Ashgate, 1999), pp. 59 – 78。

49 关于18世纪政治讨论中的厌女(misogyny),这方面的学术非常多。法国史领域:Lynn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关于卢梭、戏剧性与妇女,见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pp. 71 - 89. 关于18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和殖民地,见 Kenneth Lockridge, *On the Sources of Patriarchal Rage: The Commonplace Books of William Byrd and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Gendering of Pow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2 - 37, 104 - 111. 关于有美德的妇女及其复杂形式被用于代表其阶级的"标志与替罪羊",见 Carroll Smith-Rosenberg, "Discovering the Subject", pp. 861 (quote), 858 -862, and "Domesticating Virtue: Coquette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Young America", in Elaine Scarry (*Literature and the Body: Essays on Populations and Perso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62 - 166。

50 关于民族主义文学和消失中的土著美洲人,见 Carolyn Eastman, "'A Nation of Speechifiers': Oratory, Print, and the Making of a Gendered American Public, 1780 - 1830", PhD di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1; Dana Nelson, *National Manhood*, pp. 61 - 102, Carroll Smith-Rosenberg, "Discovering the Subject"。

51 Janet Moore Lindman, "Acting the Manly Christian: White Evangelical Masculinity in Revolutionary Virgini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7(2000), p. 395.

52 Lindman, "Acting the Manly Christian", pp. 401 (quotes), 405 - 410.

53 Lindman, "Acting the Manly Christian", p. 416.

54 Lindman, "Acting the Manly Christian", p. 415.

55 "男性福音教徒称其基督教友谊为'我们的兄弟情谊'。"Lindman, "Acting the Manly Christian", p. 414. 这里,Lindman 采用了 Susan Juster 发展出来的一个诠释。*Disorderly Women: Sexual Politics and Evangelicalism in Revolutionary New Englan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56 我们不应该就停留在这悲观的观点。相反,我们应该看到,在第二次大觉醒特别是在北方各州结果可能不一样的,而且在南方的程度也如此。弗吉尼亚福音教徒重新固了在新教会的父权权力之后,下一个世代的妇女在福间教会及道德改革组织内部争取了更大的自主。第二次大觉醒在男人当中重新分配了文化权威,但也使得妇女更成功地挑战他们的男性同盟者的社会性别权力。Christine Leigh Heyrman, *Southern Cross: the Beginnings of the Bible Belt* (New York: Knopf, 1997); Mary Ryan, *Cradle of the Middle-Class: The Family in Oneida County, New York, 1790 - 198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57 Brown, *Good Wives, Nasty Wenches*, pp. 139 (quote), 137 - 186.

58 Brown, *Good Wives, Nasty Wenches*, pp. 139 (quote), 174.

59 她也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在反叛中的妇女的参与,这是以往的历史学家没能做到

的。在战争当中,妇女担起了后勤和情报人员的工作——在两方都是,保卫了家园,并通过他们在社区中非官方的道德裁判员的角色来影响事件发展过程。Brown, *Good Wives*, *Nasty Wenches*, pp. 162 - 166,169,171,176。

60 Brown, *Good Wives*, *Nasty Wenches*, p. 145。关于"地方上的非正式公众"(Mary Beth Norton)当中妇女谣言的力量以及她们的道德权威,特别是作为性行为的监督者,见 Mary Beth Norton, *Founding Mothers and Fathers*, esp. pp. 19 - 21,253 - 277; also Norton, "Gender and Defam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rylan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4(1987), pp. 3 - 39。

61 Brown, *Good Wives*, *Nasty Wenches*, pp. 140 - 149,179 (quote).

62 其他关于欧洲殖民者和土著美洲人之间的文化往来和军事冲突并系统地分析各种男性特质、没有忽视妇女与男人的互动或整个社会性别权力的动态状况,见 JoAnn Barr, "The 'Seductions' of Texas: 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Gender in the Conquest of Texas, 1690 - 1803",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9, and Ann Little, *Abraham in Arms*: *Gender and Power on the New England Frontier*, *1620 - 1760* (University Park,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forthcoming)。

63 Claudio Saunt, "'Domestick... Quiet being broke': Gender Conflict among Creek India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Andrew R. L. Cayton and Fredrika J. Teute (eds), *Contact Points*, *American Frontiers from the Mohawk Valley to the Mississippi*, *1750 - 1830*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pp. 151 - 152.

64 妇女对越来越赚钱、商业化的鹿皮贸易的参与在减退,男性化的鹿皮贸易开始超越了妇女控制的工作所创造的经济价值重要性(包括谷物和纺织品)。Saunt, "Gender Conflict", pp. 156 (quote),154 - 159。

65 当然,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的改革者,有一个社会性别化的政治经济计划——即在一个"父权制的家庭经济基础上"的土著美洲"男人耕作农业";但它被克里克妇女接受。Saunt, "Gender Conflict", pp. 153 (quote), 163 - 166。

66 不满的男人们烧了学校,杀了牲畜,杀害白人妇女和男子并将其尸解(这些白人代表了新的"文明"秩序),有的克里克妇女放弃使用"欧洲东西",成为"宣传反对锄犁和纺车的预言者"——这些在她们眼里是魔鬼的交易。Saunt, "Gender Conflict", p. 173。

67 Lockridge, *Patriarchal Rage*, pp. 23,26 - 27。

68 他们也代表了男人气身份和举止的精英话语当中关于"自我"的内容——这样的内容被贬斥为没有男人气和低俗(但也是被悄悄地争取的内容),特别是激情以及对激情的无限制的表达。Lockridge, *Patriarchal Rage*, p. 37。

69 Lockridge, "Colonial Self-Fashioning: Paradoxes and Patholog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teel Iden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in Ronald Hoffman, Mechal Sobel, Fredrika J. Teute (eds), *Through a Glass Darkly*: *Reflections on Personal*

Identity in Early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pp. 279 – 287, 323. Richard Godbeer 提出一个对于 Byrd 的性存在及其与作为一个男性绅士的特权关系的不同解释。William Byrd's "Flourish: The Sexual Cosmos of a Southern Planter", in *Sex and Sexuality*, pp. 135 – 155。

70 Carol F. Karlsen, *The Devil in the Shape of a Woman: Witchcraft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New York: Norton, 1987). Paul Boyer Stephen Nissenbaum, *Salem Possessed: The Social Origins of Witchcraf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John Demos, *Entertaining Satan: Witchcraft and the Culture of Early New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ristine Heyrman, Commerce and Culture: The Maritime *Communities of Colonial Massachusetts, 1690 – 1750* (New York: Norton, 1984), pp. 109 – 125; Mary Beth Norton, *In the Devil's Snare: the Salem Witchcraft Crisis of 1692* (New York: Knopf, 2002).

71 她说,那些"由暂时的强力回到无力"的"年轻女人","又一次……成为随从而不是领袖、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沉默者而不是发言者"。Norton, *In the Devil's Snare*, pp. 304 (quote), also especially 297 – 298, 300。

72 男性史学家当中对于各种男性特质的兴趣,特别是被性史的研究鼓舞之后,引起了对那些造成"性别麻烦"的男人更大的兴趣。关于 18 世纪的"阴柔"和同性情欲友谊的话语,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领域,关于 18 世纪的同性恋主体的存在问题的讨论也非常地活跃。这些都见证了殖民史学家的兴趣。Patricia Bonomi, *The Lord Cornbury Scandal: The Politics of Reputation in British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Richard Godbeer, "'The Cry of Sodom': Discourse, Intercourse, and Desire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2 (1995), pp. 259 – 286; Jeffrey Merrick, "Sodomitical Scandals and Subcultures in the 1720s", *Men and Masculinities* 1 (1999), pp. 365 – 384; John Murrin, "'Things Fearful to Name' Bestiality in Colonial America", *Pennsylvania History* 65 (1998), pp. 8 – 43; Randolph Trumbach, "The Birth of the Queen: Sodomy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der Equality in Modern Culture, 1660 – 1750", in 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George Chauncey (eds.),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New York: NAL books, 1989), pp. 129 – 140。

73 最终的结果可能也是典型的:当那些官员最后赶上了 Hall,他们反复地尝试但是未能决定他/她的性别。由于不能把传统的关于社会性别的社会能指与解剖学能指变得一致,他们命令 Hall 穿上男人的衣服,但同时也要戴女人的帽子和围裙。也许可以说,法庭创造了一个第三性,但仅仅是以一个侮辱性的形式,而且同时稳固了社会性别界线。像 Hall 一样的人们,可能有时作为男人、有时作为女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强调外部身体形态、举止和技能的男性和女性本质的表达的文化里。但是他们不能同时占有两个范畴,除非被人当作活生生的矛盾体

和嘲笑的对象。Brown, *Good Wives*, *Nasty Wenches*, pp. 75 - 80; Norton, *Founding Mothers and Fathers*, pp. 183 - 197。

74 Marcus Rediker, "Liberty beneath the Jolly Roger: the Lives of Anne Bonny and Mary Read, Pirates", in Margaret S. Creighton and Lisa Norling Irun (eds.), *Men, Wooden Women: Gender and Seafar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1700 - 192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0.

75 Dianne Dugaw, "Female Sailors Bold: Transvestite Heroines and the Markers of Gender and Class", in *Iron Men, Wooden Women*, p. 46.

76 Dugaw 评论了一个水手,Mary Ann Talbot。她在生活中以 John Taylor 的身份,穿着和举止都是一个男人。她被当成一个男人,并且自己也基本上把自己看作"有男子气的"。"Female Sailors Bold", p. 45。

77 Judith Halberstam 一个很有问题的说法。See Halberstam,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Men, Women, and Masculinity", *Masculinity Studies and Feminist Theory*, p. 345。

78 Dugaw, "Female Sailors Bold", pp. 37 (quote), 37 - 43.

78 见 Sedgwick 的倡议:我们应该"不再认为:每一个与男人有关的事情都是男性特质的范围内的,所有和男性特质有关的是首先都与男人有关"。Sedgwick, "Gosh, Boy George, You Must Be Awfully Secure in Your Masculinity!", in *Constructing Masculinity*, p. 12。

第二部分

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交欲望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依芙·萨芝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

导言(节选)
Introduction

一、同性社交欲望(homosocial desire)

本书的主题是英国文化中相对比较简短的一节，它距离现在不算遥远，尚可了解，主要体现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小说中。这个时期对许多学科的理论家充满吸引力，原因显而易见：在这一时期，经济、意识形态、社会性别结构方面都发生了密集的、自我反思性的、并且影响广泛的变化。我将探讨：在男性"同性社交欲望"连续体结构中出现的变化，与其他一些更明显的变化之间有密切的——通常是因果关系的——联系；出现在此阶段的男人友谊、传业、特权、竞争以及异性恋、同性恋等各种类型，都与阶级有着密切而不断变化的关系；要理解

这一模式的任何元素,都必须考虑它们与妇女和社会性别制度整体之间的关系。

用"男性的同性社交欲望"作为本研究的题目,意在标识偏见与悖论。首先,"同性社交欲望"是自相矛盾的。"同性社交"(homosocial)这一词汇偶见于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用于描述同性之间的社会纽带;这是一个新词汇,显然是从"同性恋的"(homosexual)一词延伸而来,但其含义显然是有别于"同性恋的"。事实上,该词被用于诸如"男性纽带"(male bond)之类的活动;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此类活动的特征是强烈的同性恋恐惧,即对同性恋的恐惧与憎恶。[1] 将"同性社交"重新纳入"欲望"的范围,即可能的情欲的(the erotic)范围,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设想:同性社交与同性恋之间的连续体可能是不断裂的(然而对男人来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这一连续体已经基本上不可察觉了)。我的讨论将非常清楚地表明,关于这个连续体未断裂的这一假设,并不是遗传学意义上的假设:我并不认为,涉及生殖器的同性恋欲望是其他男性社交形式"之根本",而视之为归纳男人与其他男人的关系结构的一个策略,也是标记这一结构在历史上的差异的一个策略。本书就用"男性同性社交欲望"来命名这整个连续体。

我选择"欲望"一词而不是"爱"(love),来标示对情欲层面(the erotic)的强调;这是因为在文学批评和相关话语中,"爱"更容易被用于命名某种感情,而"欲望"则是对一个结构(structure)的命名。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动机的结构变化的论点来进行批判性的逻辑论证。在大部分情况下,我将使用"欲望"这个词表达类似于精神分析中"力比多"的用法——并不是指某种特别的情感状态或情绪,而是情感力量或社会力量,一种凝聚力——即便有时它表现为敌意或憎恶或某种感情色彩不太强烈的东西;它塑造了一种重要的关系。这个力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称之为"性的"(the sexual)(即,在历史上有的东西被看作是"性的",那意味着什么),这将是贯穿本书的问题。

本书的题目具体指明男性同性社交欲望,部分是因为要从一开始就点明本研究的局限性(并且强调此局限的严重性)。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较正面和根本的原因。本研究的主要宗旨之一是探索:性存在的形态,以及什么算是性存在这两个问题,以何种方式在历史上既依赖于权力关系、又影响着权力关系。[2] 一个推论是:在一个社会里如果男人和女人在对权力的获取方面有差异,那么性存在的结构和构成也会有重要的社会性别差异。

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男人面对着"同性社交"和"同性恋"之间鲜明的对立;而对女人来说似乎这种对立则没有那么彻底、那么二分化。在今天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一个在目标、感情和评价诸方面可被理解的连续体,把女同性恋主义(lesbianism)与其他形式的女性之间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例如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女性友谊、"建立关系网"以及女权主义的积极斗争。[3] 这个连续体与各种深刻的断裂——比如同性恋恐惧、种族和阶级冲突等——纠缠在一起,但是其可理解性已经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无论政治有多么艰难、无论各种感情如何矛盾,在当下的历史时刻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女人与女人相爱,女人通过教育、研究、培养、哺育女人,女人为女人而写作、斗争、投票、提供工作,女人以其他各种方式为其他女人争取利益——她们是在进行恰当的、密切相关的活动。因此,如果(就像历史学家卡萝尔·斯密司-罗森博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那样)[4] 用"同性社交的"这个词来形容女人之间的关系,它不需要特别地与"同性恋"对立;用它来命名整个连续体是指向明确的。

从"女人与女人相爱"到"女人为女人争取利益"之间的连续体——这个统一体——似乎很简单,它跨越情欲、社会、家庭、经济和政治领域;若非这一连续体与男性世界里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也不会如此引人注目。当里根(Ronald Reagan)和杰西·海尔姆斯(Jesse Helms)〔1〕拼命

〔1〕 Jesse Helms(1921-2008)曾是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他对美国社会保守主义运动曾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译注

拉票要通过“家庭政策”的立法时，他们是为男人争取利益的男人。（事实上，他们体现了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对父权制的定义：“[它]是男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它们有一个物质基础；虽然它们之间有等级，但是它们确立、创造男人内部的相互依赖和团结统一，从而使男人得以统治女人”。）[5] 但是，这样的纽带关系与一对相爱的男同性恋之间的纽带是不是一回事？里根他们会很憎恶地说“绝不是”。很多男同性恋伴侣也会很憎恶地说“绝不是”。但是为什么不是呢？难道“男人爱男人”与“男人为男人争取利益”之间的连续体，与女人之间的那个连续体相比，在直觉上不那么合理？

恰恰相反：近期关于父权制结构的研究中最有裨益的作品大多认为，“强制性的异性恋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亲属制度之中的；或者说，同性恋恐惧是父权制体制（如异性恋婚姻等）的必然后果。[6] 显然，虽然将各种男性之间纽带合并到一起是很方便的（这些纽带提高着男人的地位，两者之间可能是对称的），但这种合并企图会遭遇到严重的结构性障碍。就我们自己这个社会的方便角度来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要想象一种没有同性恋恐惧的父权制形式，都显然是不可能的。比如，盖尔·鲁宾（Gayle Rubin）认为：“对人类性存在中的同性恋内容进行压制，以及由此必然出现的对同性恋者的压迫是……一个制度的产物——与那个通过各种规则和关系来压迫妇女的制度是同一个。”[7]

在历史上，父权制对同性恋的压迫有各种表现形式，这些压迫是冷酷的，近乎无休止的。路易斯·克罗普顿（Louis Crompton）做过一个详细的论述，用“集团屠杀”来形容这个历史。[8] 我们自己的社会有残酷的同性恋恐惧；无论针对男性或女性，同性恋恐惧都并非偶然出现或没有缘由，而是与家庭、社会性别、年龄、阶级和种族关系密不可分。除非改变经济和政治结构，否则我们这个社会不会停止同性恋恐惧。

但是，我们还没有清楚地论述一个重要的认识：由于大多数父权制度在

结构上包含着同性恋恐惧,因此父权制度在结构上需要同性恋恐惧。K.J.德夫(K.J. Dover)近来完成的研究《希腊同性恋》(*Greek Homosexuality*)似乎提出了古典希腊的一个有力反例。根据德夫提供的证据,男同性恋是当时文化中一个广泛存在的、合乎情理,而且颇有影响力的部分。年长者对青少年男性身体的追求,是根据阶级地位来组织的,在公民阶级内则根据年龄来组织结构;这一追求方式,是用今天我们常用的浪漫异性恋爱情的刻板印象来描述的(征服、屈从、"冷血美人"、爱情对象的欲望缺席),而年轻男孩被赋予被动角色。但同时,因为男孩终究要成长为男人,角色的分配并非永恒。[9] 故此,这一爱情关系虽然暂时对处于爱情对象地位的人是压迫性的,却具有强大的教育功能。德夫引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鲍萨尼亚(Pausanias)的话说:"对于一个帮助他完善头脑和人格的人,他(男孩)提供任何服务都不为过。"[10]这里除了有情欲成分,还是一种培养关系;在雅典公民身份的作风和美德方面,男孩们是学徒,将继承公民身份的诸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向男女两性的奴隶,以及向任何阶级(包括他们同阶级)的女人发号施令。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女人和奴隶属于同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鲜明的阶级和社会性别压迫的体制是男性文化最看重的必然部分:"对体力劳动的蔑视,最初源于一种对摆脱生计束缚、获得自由的热切渴望,以及同样迫切的对于任何不留痕迹、无纪念意义、无回忆价值工作的憎恶"。[11] 因此,受鄙视的劳动就扔给了女人和奴隶。

我以为,希腊研究的例子表明:虽然异性恋对于任何父权制度的维持都不可或缺,但是对男性的同性恋恐惧决非必然。事实上,对于希腊人来说,"男人爱男人"与"男人为男人争取利益"之间的连续体看起来是天衣无缝的。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在大陆浴场(Continental Baths)[1]的

---

[1] 1960年代末,Steve Ostrow在纽约市第74大街230西的Ansonia旅馆地下室开辟大陆浴场,其广告语是缅怀"古罗马辉煌"。只有男性可以入内。1974年底,由于光顾者人数减少,这一活动被永远停止。——译注

男性纽带与波西米亚树林[12](Bohemian Grove)[1]的男性纽带,或是与董事会会议室、参议员衣帽间所有这些之间,人们似乎体会不到其中的不连续性。

显然,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存在着一个不对称现象:一方面是具有相对连续性的女性同性社交关系与女同性恋关系,另一方面是男性同性社交关系和男同性恋关系之间极端的不连续性。而且,希腊的例子(以及其他一些部落文化的实例,比如 G. H. 赫尔特[G. H. Herdt]的新几内亚桑比亚人研究[2])表明,同性社交连续体的结构是由文化条件决定的,而非所谓"男性"或"女性"的固有特征。的确,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显然与男女之间的权力问题密切相关,但我们需要一个比"父权制"更加精确的历史分析模式。因为无论是希腊还是美国社会,都以(哈特曼所描述的)男权权力结构为特征。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男性的与女性的同性社交在历史上彼此各异——正如它们自己各自发生历史变化一样,它们永远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经久不变的、权力不平等的表现和机制。

为什么同性社交连续体的各种不同形态应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这是一个**文学**问题(a *literary* question)?对作为弱势群体而争取权利斗争的同性恋运动来说,同性社交连续体有很重要的政治实用性。这一重要性,由近年来男、女同性恋在策略和哲学上的差异可见一斑。此外,同性社交连续体问题在理论上的意义,部分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思考更广泛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问题的思路:当一种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被性化(sexualized),这意味着什么,带来什么变化?如果同性社交纽带与同性恋纽带之间的关系如此难以捉摸,那么为了说明在性的关系与权力关系之间有何联系,我们有什么理论框架来做这个工作?

---

〔1〕 波希米亚树林是占地 11 平方公里的营地,位于加州蒙特里欧波希米亚大道 10601 号,属于旧金山一个被称为波希米亚俱乐部的男人艺术俱乐部。每年 7 月中旬,波希米亚树林都会举行为期三周的露营活动,参加者非权则贵。——译注

〔2〕 在新几内亚的桑比亚人中,男人们相信,如果他们想要成为成熟的异性恋成年男人,他们就必须吸收男人的精液(Herdt, 1981)。——译注

二、性政治和性含义

目前，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别政治运动出于运动的需要，已经以多种不同的形式提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例如，就权力强势与性施/受虐之间是否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女权主义者和男同性恋理论家各持己见。首先是两种引人注目的形象，它们出现在《符号—文本》杂志近期发表的一期“多样性”特刊(4, no. I [1981])。封面是肌肉结实的裸体摩托车手，封底是被毒打得不成样子的男性躯体(对该刊中所有的女人而言，应该称之为“多文本”的“半一性”特刊吧)。该刊的宗旨或许不仅仅为提供激进而时髦的刺激，而似乎要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施虐/受虐中的暴力并不往往是表演层面上的，而是与现实世界中的暴力完全接连的。反色情妇女组织(Women Against Pornography)与1980年的全美妇女组织(NOW)提出男女同性恋权利议案的起草者们在这一点上看法一致，只是表述缺乏杂志封面那种魅力。在她们看来有一点毫无疑问：通过性的表达呈现暴力、或是一个暴力的形象，是在拓展暴力的范围和势力，却不能改变它。[13]但是，正如其他的女权主义者提醒我们的，还有另外的可能。比如，女人的受虐性幻想，真的只是内化了和默许了(如果不是导致了)她更普遍的无力感和无能感吗？戏剧化的性行为真的不可能象征着她对于压迫的政治体验的某种拐弯抹角，甚至反抗的关系？[14]

男同性恋群体内外开展的关于“男—童恋”的争论，提出一个相关的问题：成人与孩子之间的性关系，会不会可能是更普遍的教育与养育关系的延续？或者说，如果把性纳入教育和养育关系，是否必然会把这一关系改变成剥削性的？全美妇女组织认为，在暴力的性再表现与真实的社会暴力之间，存在着不间断的连续性；但是在恋童问题上，她们的结论却完全相反——性内容的介入会改变(会破坏)这一关系的内容。因此，当问题从施虐/受虐转移到恋童问题时，“宽容”观和“禁欲观”实际上对换了它

们关于"性的领域"与"社会的领域"之间关系的认识。

因此,对某种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来说,"纳入了性,会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就是——不一定;就好像对不同政治环境中的不同群体来说,同性恋活动可能支持同性社交纽带,也可能反对它。通过这一点以及我在上文提及的其他例子来看,显然,脱离历史的性内容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性能量可以被简单地加进某种社会关系里,并使后者持续地向一个可预见的方向进行"性化",它也不可以脱离这种关系而自己毫无改变。我们也没有道理去假定某种被性化的形式一定象征着或者仅仅是浓缩了一种更广泛的关系。(例如,在《女性性奴役》(*Female Sexual Slavery*)一书中,凯瑟琳·白利(Kathleen Barry)认为:萨德侯爵[1]要为女人遭受的所有形式的压迫承担主要责任,包括传统的阴蒂切割、乱伦以及对妓女的经济剥削和性剥削。)

实际上,对性欲望与政治权力之间关系的考察,必须沿着两条轴线开展。首先,当然需要利用任何形式的分析,那些最有效地描述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权力不对称——比如阶级和种族分析,以及社会性别分析。但是与以上这些关联在一起的,还有对再表现的分析;只有再表现的模式才能够让我们合理地评价:性存在作为权力关系的一个能指,它以哪些方式(虽然广泛但并非无穷无尽或偶然)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修辞模式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降低性存在的问题,或者暴力和压迫问题的相关性与紧迫性,而是要帮助我们分析和利用从性这个领域产生的对政治相关性的另一种直觉。

例如,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最近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试图仔细回顾并消除各种女权主义思潮学派之间歧见。她如下总结所有社会性别议题中性存在所处的关键位置:

---

〔1〕 萨德(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贵族,人称萨德侯爵。他是性虐待文学的建立者,施虐狂(sadism)一词即由其名而来。——译注

> 女性社会性别(female *gender*)刻板印象的每一个元素事实上都是关于性的。脆弱(vulnerability)意味着容易被性占有的表象/现实;被动(passivity)意味着接纳、抗拒不力……;轻柔(softness)意味着易被征服……女人的被幼儿化(infantilization)激发恋童欲望;对被肢解的身体的癖恋……引发恋物欲;将乏味偶像化而引发恋尸癖。自恋确保女人认同于男人所欣赏的她的自我形象……受虐意味着侵犯的快感转化成为她的性快感。

麦金农是这样总结这段论述的:"在社会层面上,"女一性"(femaleness)意味着女性特质(femininity),意味着对男人的吸引力,意味着性魅力,意味着按男人心意可被享用的性。"[15]

其实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意味着"。通过展示出"意味着"的出人意料的涵义,麦金农努力揭示的是,每一种性存在的表达都带有相同意义。某种特征可以"意味着"(诸如服装时尚等)符号系统中的一个元素("轻柔意味着易被征服");或者在情欲本能层面,某种特征可能"意味着"其互补的对立面("女人的被幼儿化激发恋童欲望");或者是跨越时间的,该特征可能"意味着"它实施的结果("自恋确保女人认同于男人欣赏的她的自我形象……受虐意味着侵犯的快感转化成为她的性快感")。麦金农总结道:"界定着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那些特征,不过是能使男人兴奋的东西。"但是什么能够定义"界定"呢?性体验的每一个节点都与社会性别压迫的整个结构有某种符指关系(signifying relation),反之亦然;这是正确而且重要的认识。但是它还不足以用于分析具体的政治问题。这种概括总体性的分析会产生一个幻象:它似乎使我们得以知道到何处去寻找我们的性存在,一旦找到它了我们会知道如何保护它不被剥夺。但是这只是一个幻象,危险当然就在于这样的幻象。

不过,麦金农这篇文章帮助我们更巧妙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个问题被日益精妙地提出:我们(作为女人)所表演的性存在,它

的主体是谁或者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提出这一问题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有的是夸张的、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菲勒斯崇拜、有的是女性中心的，也有愤怒或颠狂的——简而言之，或许可称之为英格兰式或法兰西式。虽然情况不同，这同一个问题激发了各种讨论：无论是1960年代对美国“女人是性工具”的反对，还是70年代起关于“女人掌控自己的身体”的诉求，或是近期引进的法国女权主义者称之为“对主体的批评”。

我试举一例，这是白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典范与名著之一。它虽然只是虚构故事，但是连续几代美国妇女认同它所揭示的“女性”角色的限制：女性的个人抱负所遭遇的阻碍、女性个人抱负的迫切向往、经济动机的重要性、浪漫爱情的强制性和破坏性，以及（麦金农一定会强调的）女性情欲的中心地位和彻底异化。我说的这部著作，就是《飘》（同名电影译为《乱世佳人》——译注）。我们可根据麦金农的范式而预言，在郝思嘉（Scarlett O'Hara）的生活中，有一点毫无疑问：生而为女性，就意味着要完全通过与“淑女”（“lady”）角色的关系而被界定。“淑女”角色之形成和意义都源自这样一种性意识：她不是主体，而是客体。对于郝思嘉来说，作为女人，生存的确意味着学习一种观念：无论是性还是男性统治，或是她自己的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同样危险的东西。她的人生给所有人的一个经验就是：要像男人一样，默默地远离这些东西，学会从幕后把它们作为物件或者纯粹的能指来玩弄——这个经验虽然令人变得冷漠麻木却在她人生中非常有用。

但是，这一观点所推崇的，仅仅是白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就像在魔法屋中水向高处走、孩子看上去比父母更高大一样，只有从社会的某一个固定视角出发，性存在、社会性别角色和权力统治才能够仿佛排列在这个完美的模仿意义的链条上。从一个更为“异离—中心的”[1]或被剥夺权力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符指链上的误置与不连续性则显得愈发确定无

〔1〕原文是 ec-centric。——译注

疑。例如,在这篇小说中,如果说所有女性人物都的确存在于某种与“淑女”角色“充满一意义的”[1]关系中,随着女人们在社会上和种族上逐渐偏离这一角色,该符指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不定——尽管从这部小说的白人资产阶级立场来看,这种能指关系同时在增强其意义。媚兰(Melanie)是个女人也是个淑女;郝思嘉——如她所被期待的——是个女人,但需要成为淑女,并且假装是一个淑女;而亚特兰大的妓女贝尔·沃特林(Belle Watling)则极度欠缺“淑女”性格,她作为一个女人与“淑女”没有什么关联,只是构成媚兰和思嘉两个角色的反面互补和戏仿。至于嫫妈(Mammy),从这个观点来看,她的思想和生活完全受制于“淑女”的理想,但是她所处的社会关系却完全把她排斥在“淑女”理想之外:她是支持和实施郝思嘉的“淑女”角色的模板;她自己的女性气质,只要与郝思嘉的角色无关,就都失去了意义。嫫妈究竟是谁的母亲?

强奸的问题恰好处于统治与性的相交点上。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飘》都给我们呈现了一幅最可怕的强奸画面:

> 那黑人的脸因为淫荡的微笑变了形。他朝着马车跑来,她胡乱地对他开了枪……那黑人就在她身旁,因为靠得近,连他身上的臭味儿都闻见了。那黑人想把她拉下车去,她就用那只还能活动的手拼命挣扎,抓那人的脸,后来她觉得那人的大手摸到了她的喉咙,只听“哧”的一声,她的紧身衣从领口到腰全给撕开了,接着那黑手就在她胸口乱摸。她从来没感到过这么恐惧,这么恶心,就像疯女人似的大喊大叫起来。[16]

在这次攻击之后,这个文化关于“强奸”符指的整个机制开始发挥作用。思嘉身边的男人们和他们的三K党朋友在夜幕中出发去杀死袭击

[1] 原文是 meaning-ful。——译注

者，扬言“要把棚户区连窝儿都端了”。结果当然双方各有伤亡。人们广泛地讨论：为了白种男人的死，郝思嘉应该受到多少谴责。贝尔·沃特林替“淑女”角色说：“都是她惹出来的，一个人在亚特兰大到处乱跑，勾引那些黑人和无赖”；白瑞德一如既往地站在小说代表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立场上发言，安慰她说她那强烈的负疚感纯粹是荒谬的（第 46、47 章）。为了对这一主要事件进行铺垫，小说甚至提到了有关强奸受害者的法律问题（第 42 章）。上面提到的那个事件的结果，即为强奸的典型后果，导致思嘉自己的活动性以及她个人和经济权力被降低——要知道，她之所以必须要驾车经过棚户区，首要原因是她要发展自己的生意。

简言之，对思嘉的攻击完全意味着强奸，既针对她本人，也针对她所属于的文化中的各种势力；正是这些势力，生产和传播着各种强大的含义。构成强奸案的各项因素中，有一项在上述这个案子里不存在，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可是缺失的这个因素，恰好是性。攻击思嘉的目的是为求财，那黑手在她洁白的胸口上乱摸，是因为有人告诉那个家伙，那里是她的藏钱之处；郝思嘉知道这一点，知道他没有其他的动机。但是这一点也不重要。缺席的性行为在所有的强奸话语中都没有成为问题——无论是人物的还是小说的或社会的话语。

但是，《飘》这部小说并没有忽略强制的性。作者生动细致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实的强奸；但是当白人的手放在她洁白的胸脯上时，其意识形态命名是“幸福的婚姻”。“[白瑞德]在一个狂乱的夜晚制服了她，粗暴地占有了她，而她对此却十分得意呢”（第 54 章）小说也出现了白种男人对黑人妇女的性侵犯，但是从来没有提出来强迫与同意的问题。白种男人对黑人妇女的性异化，与对白人妇女的性异化被塑造得如此不同，以至于在前者的情况下，“强奸”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词语了。而且，如果这个世界里，黑种男女人物之间[1]的确发生过强迫性的性行为，这一性事件

[1] 此处原文为“between a Black male and female character”。作者似乎借此表达方式强调，在这样的文化中，黑人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译注

本身是不具有符指力量的,因为此时黑人的性存在不过"意味着"一个句子语法上的变化,而句子中隐含的真正的主体和客体都是白人。

于是我们在这部早期女权主义小说中,在它的这一意识形态微观世界里发现一种象征体系。这个象征体系里,强奸的意义和强奸本身都在持续不断地流通着。但是,由于社会存在着种族分裂,强奸及强奸意义的流通方向是彼此相反的。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在美国,种族分裂比其他的分裂被更加二元对立化(也许只有社会性别与其程度相似)。此外,其他的象征性分裂,比如阶级(我此处所谓"断裂"是指一些界线,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沿着这些界线,对权力的量的差别可以被当成性质上的差异并且被赋予别的称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各种社会结构中起着积极的破坏作用。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无论性之于权力的符指关系,还是性的异化之于政治压迫的符指关系,都不是最稳定的;它们恰恰是社会交叉点上最易变化的。

因此,我们用来考查符指关系的工具必须细致微妙、有区分能力,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另外也具有政治重要性的是,即便是面对恐怖的、真实地发生的暴力形象(尤其是关于、围绕或是针对性的暴力),我们的文学知识中关于复杂、隐晦的符指的解释,绝对不能被简单化。我们不能在主观上认定,性对权力的符指方式,仅仅是通过某种简单的、不变的隐喻或提喻关系。这样认定往往会导致一种盲点,不是对修辞和粉饰的盲点,而是对阶级或种族这样的历史范畴的盲点。性关系对各种压迫关系提供了杠杆力;在我们能够完全获得并利用对这一杠杆力的把握之前,我们需要更多——更不同的、更复杂的,适用于更广泛历史时期分析的、更不主流的,即——更加大胆地和清晰地运用我们目前对符号能指的理解。当一样东西被用来指涉另一样东西时,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性还是历史?

至此可见,本研究以性的问题为中心,这对本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努

力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对于性的主体，我将它作为一个被赋予特别意义的杠杆力点——或者说是社会性别和阶级（以及许多社会当中的种族）之间的意义交换点；把它作为我们通常用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分工的一套范畴。在方法论层面，女权主义理论内部在思考妇女压迫问题上有一个争议——究竟应该对此问题进行多大程度的历史性分析。本研究所做的文学解读希望对此讨论有所贡献。

粗略地说，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宽谱有两极，一极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最强调历史具体性的分析；另外一极是“激进女权主义”，最不关注历史具体性。当然，后者之所以被称为“激进女权主义”，不是因为它在传统政治地图上占据最“左”的空间，而是因为它认为，社会性别本身、而且唯有社会性别，才是人类经验中对人类分化最严重的东西，而且这种分化是变化相当少的。

此外，由于本研究的探讨目的，以及一些其他我将在后面的讨论中充分解释的原因，我将在激进—女权主义一极中纳入所谓“法国的”女权主义，即解构主义的以及/或者以拉康为基础的女权主义。“法国的”和“激进的”女权主义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持不同见解，比如对于每个人都被归为男性或女性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双方表示了不同的重视；但是在有些方面她们的立场相近，比如认为人类的文化、语言和生活首先是通过社会性别差异的故事来建构的，（无论多么粗糙或是细致）都是彻底地、跨历史地、本质上相近地建构的。（关于这一结构主义动机通过何种独特的方式在本研究中进行再现，我将在第一章进行充分地讨论。）法国女权主义者和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双方都以同样的方式，先知一般地——或许是帝国主义式地——使用现在时态。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论述背后的论辩动机就是一种欲望，试图通过在修辞上不稳定的性主体，来运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对再表现的细致分析手法，从而获得一个更加强调历史、更加具有判断力的分析方式。

目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在各自强调的主题

上有所区分。本研究选择把性存在作为主题,它会突出并质疑这种区分。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关注两个方面的深刻的相互连接关系,一个方面是历史和经济变化,另一个方面是社会性别区分的变迁;其理论发展一直以来未纳入有关性存在的理论,也并不太关注性存在的意义和经验。或者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隐含这样一种观点:女性的性存在,在根本上是再生产中的一小部分,因此适合用人口学来研究;或者说女性的性存在,根本上是在一个简单的、规范性霸权意识形态问题之中,因此要相应地通过思想史或者法制史进行研究。虽然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为基础的性存在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这只是在某些已经被我们社会的法律话语明确地标识为"反常"的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男人的同性恋研究和对女人的卖淫研究。在揭示妇女的异性恋体验有何历史意义这一问题上——或者女同性恋主义(lesbianism)在本世纪被法律、被医学如是标识之前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能提供的帮助则很少。[17]

然而同时,激进女权主义却相对成功地将性存在推到了一个突出的、被质询的位置上(我在"激进女权主义"这个标签下包括了它的许多不同形式);这个位置往往允许宽泛的空间来容纳边缘的和矛盾的现象。已经出现了非常多样的研究成果。这批学术包括:凯瑟琳·白利的《女性性奴役》、苏珊·格拉芬(Susan Graffin)的《色情与沉默》(*Pornography and Silence*)、吉尔博特和古芭尔(Gilbert and Gubar)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简·盖洛普(Jane Gallop)的《女儿的诱惑》(*The Daughter's Seduction*)以及安之里娅·多尔金(Andrea Dworkin)的《色情:男人占有女人》(*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等著作。虽然它们在风格、迫切性、鲜明的女权主义认同、法国派或美国派、引起争议的程度等方面差别很大,但是这些作品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认为,性存在,在妇女体验的形成中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且,不论表述的复杂程度如何,在我们称之为父权制的文化中,女性异性恋的

主体及其最终客体，都被认为是男的。无论是对现实的人际关系方面研究还是对被内化的心理和语言研究，这类研究凸显了性存在的重要性，而且往往在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所分析的“男性间的女人交易”这一结构中去理解它。

但是，与其他形式的结构主义相同，这一系列方法很难解决历史上的变化问题。结构的本质被定义为：结构能够进行自我再生产；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历史变化仿佛处于结构之外，并且威胁着结构——或者更糟糕的理解是，把历史变化看作对结构完全没有威胁，而不是把历史变化看作是与结构之间有一个互相塑造的辩证关系。于是，历史要么是不可见的，要么其差别被夸大得失去了意义。[18]或明或暗地，激进女权主义倾向于否认社会性别或性存在的意义曾经发生过重大改变；带来更糟后果的是，虽然改变现状是女权主义的期望，激进女权主义把未来的改变说得毫无可能，要不就是做灭顶之灾的预言。同时，她们也会极端地简化产生重大变化的必要条件。此外，在有普遍化倾向的结构主义的立场上看，即使把阶级或种族差异及冲突看成是历史的残留和无变化的形式，这个历史也变成了不可见的，或者被笼统地二分化处理。

因此，作为女权主义读者，处于解读“性”和解读“历史”之间，此刻我们似乎准备好了要做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看来是在共时性（the synchronic）和历时性（the diachronic）〔1〕之间（虽然这种选择一定是错误的）。我们知道这样看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在抽象层面，最终我们必须通过共时和历时之间的关系对它们进行思考；另外，因为在我们目前探讨的这些具体学科中，共时与历时是互相刻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叙事是如此生动形象，而结构主义关于性存在的图解则如此具有叙事性。

这两种方法之间有潜在的一致性。在本研究中，我将尝试激活、利用这些一致性。一直以来我不断在思考如何能够将意识形态这一范畴用于

〔1〕“the synchronic”指对在时间某个点上的事物的研究，不关注其历史变化；“the diachronic”则指经历时间长河的变化。——译注

对性存在的范畴分析的一部分,这也是我进行这种尝试的一个原因。看上去,这两个范畴在一些重要方面有可比性:例如,它们都在物质性领域(the material)和再表现领域(the representational)之间周旋;就像上文我们讨论过的性存在一样,意识形态既是更广泛的有关权力的社会关系的典型,自身也会对这些关系产生影响。我将阐述:意识形态与性存在两者都在历时性(社会经历的叙事性结构)与共时性(生动形象的图解)之间周旋。如果我们依据常识进行如下的大致分类:有历史分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历时性的和叙事的;而"激进女权主义",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和"法国"女权主义则是共时性的和图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两种具有调停作用的范畴在方法论方面大有前途。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明: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要掩饰现状中的矛盾,比如把这些矛盾放在一个关于起源的历时性叙事中去解释。与这一功能相对应地,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结构就是把旧制度下某些过时的价值观进行理想化并加以运用,从而为一个新制度辩护(而这个新制度实际上瓦解着这些价值观的物质基础)。[19]

例如,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分析了,家庭为在意识形态上解释资本主义转型的合法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 封建社会的农民群众有个人的私有财产;他们的理想只是希望有更多财产。资本主义社会看似提供了更多财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新情境下(或者说是在一个新理念的情境下)强调个人私有财产的理念。因此,资本主义除了提供个人主义(一种旧的价值),还有表面上全新的实现个人主义的途径——自由和平等(这些价值在封建主义下显然是缺席的)。但是,要为这一理想提供一个明显的具体的现实基础,就是在于对一种旧的体制——家庭——的维持中。于是,家庭发生了变化,从封建主义时期个人私有财产的经济基础,

> 变为新制度下关于个人私有财产的理念的焦点，但是这一新制度却将这样一种经济形式从它的核心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中排除出去……抱着让自己和家庭能够拥有个人的私人财产的希望，工人阶级在社会层面参与生产，使少数资本家能够获得私人财产。[20]

常言道："一个(男)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这句话为以上这样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一个精要得恰到好处的范例。它回去拿来一个早就被掏空了的封建主义制度下主人与家族融合的形象，以驱动工薪阶层男工人向前，在被异化的劳动中进一步提高技能，目的就是为了家——一个如今小型化了的、危机四伏但却备受理想化的家。拥有这样一个家的男人，与拥有城堡的地主是不同的人；他们所拥有的两种东西(前者[抵押按揭]之家/后者[继承遗产]之城堡)不仅各不相同，而且相互矛盾——如米歇尔所说。但是，地主对城堡周围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在意象上被转换为父亲对其房屋的居住者[1]的个人控制力。这种意象上的转换，缓解和填充了上述矛盾。由此，意识形态的阐述使得能动性、时间和空间得以交叉。重要的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便当它在形式上完全是宣言式的("一个[男]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它总是(至少是暗含着)有一个叙事；而且，为了遮蔽对意识形态的重新编织，这个叙事在结构上必然存在交错：即叙事开始时的主体与叙事结束时的主体不同，通过一个掩盖它们的不连贯性的修辞形象，两个主体得以彼此穿越。

还有一点重要之处在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叙事可以提供解剖的视角，让这些意识形态叙事矛盾的缝合之处完全暴露出来(那种叙事自身可能就是意识形态的)。此外，对现状中各种矛盾的历时性展现——即使这种历时性重构的目的是要掩盖那些矛盾——只能获得适得其反的效果，让矛盾更显现出来，从而使得新的批判成为可能。出于这些原因，把

〔1〕 作者在这里用了"inmates"一词，它还有"被囚禁在监狱中的犯人"的意思。——译注

意识形态叙事的建构与对它的批判区分开来,往往在理论上甚至都不具有可能性——即使对于比较简单的文本;本研究引以为例的那些文本内涵丰富,我们不尝试做这样的努力。

与意识形态相同,性存在依赖于共时性阐述和历时性阐述的互相重新界定以及互相排除。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一些学者已经说明,从发展过程看,将性存在命名为性存在,这本身也与那些构成着性存在的各种感觉和情绪之间处于一种倒溯关系(retroactive)。[21]这个认识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我们将要看到:什么被包括在性的领域,这是个变化的,而且本身就具有政治性的问题。政治领域与性的领域之间相互的边界,是一个依具体时空而定的不确定空间——一个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场所;实际上,这恰好是意识形态形成的最肥沃的土壤。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正如性存在一样——依赖于对主体的命名或标签化当中的倒溯性改变。[22]

政治领域与情欲领域这两个方面,必然彼此遮蔽和错误地再表现——其方式为参与着历史上的社会性别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力量提供了各种重要的,而且不断变化的行动可能性。

四、本书内容介绍

在本书的理论基础方面,女权主义的历史形式和结构主义的形式之间存在的张力既有困难,也有潜在的创造力;这种张力与书中所提到的另外一种张力彼此呼应——即,历史的与更加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性的组织、方法论和强调点之间的张力。鉴于我自己的能力和训练(这可能是最好的理由吧),本书中由始至终进行的历史讨论,必然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得到体现并且受之引导。不管其利弊如何,大的历史叙事对互不相连的文本解读的效应是不平衡的,正如文学分析的内向手法反过来对历史论述的效应也是不平衡的。结果本书的结构显现了它在历史化

(historicizing)与去历史化的(dehistoricizing)目标之间持续的博弈。我自己描述本书宗旨的两种方式,表现了相似的张力:首先,令读者更容易明智地特别关注那些贯穿着异性恋欧洲情欲思想的男性同性社交纽带;其次,通过对性存在这一主题的运用,显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某些历史范畴对于文学批评的帮助(到目前为止这些范畴尚未造成什么影响)。

本书第一章,“社会性别不对称与情欲三角关系”,在异性恋三角关系的欲望这一结构情境中对男性同性社交欲望进行集中讨论。勒内·基内尔、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尤其是盖尔·鲁宾对他的阐释)提供了“男性之间的女人交易”这一范式,它是本书的基础。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包括对三部作品进行的不同方式的解读:脱离历史地对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进行的解读;对威廉·威彻利(Wycherley)的《乡村妻子》进行部分历史性的解读;对劳伦斯·斯特恩(Sterne)的《感伤旅行》的解读,则与18世纪中期英国男人的社会性别、阶级与民族等纷繁复杂的焦虑相关。这些文本解读,既为讨论建立了持久的范式,也开始将它们放置于现代英国的具体语境中。

第五章和第六章,关于同性恋恐惧和浪漫主义的哥特风格,讨论小说当中偏执狂般的哥特传统,并以此分析英国18世纪以及18世纪以降同性恋恐惧不断变化的意义和重要性。我对詹姆士·豪格(James Hogg)的作品《一个情有可原罪人之表白》所做的解读,没有最直接地将同性恋恐惧视为对同性恋男人的压迫;它是把持着男性纽带整个宽谱——以及整个社会性别制度——的一个工具。

第七章和第八章主要讨论更为“主流”的、公共的维多利亚意识形态小说,以及陷于男性同性社会交换中的妇女的命运。这一部分选择了三部历史的或仿历史的维多利亚文本进行分析。这些文本都声称对妇女与男性纽带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了描述,包括艾尔弗雷德·丁尼生的《公主》、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以及乔治·艾略特的《亚当·贝

德》。本节最为明显地利用了关于性存在和社会性别的结构主义和历史分析的不同解释方式。

第九章和第十章研究狄更斯的维多利亚哥特小说，指出了狄更斯最后两部小说如何描绘了同性恋恐惧与19世纪阶级、种族以及社会性别差异之间的互动。

最后是结语部分——"走向20世纪:惠特曼的英国读者"。通过描述在英国关于惠特曼诗歌颇有影响力的一些(错误)解读，我试图勾勒出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性政治和人们熟悉的、(我们以为)自己了解的现代盎格鲁血统美国人关于男性同性恋、异性恋和同性恋恐惧等等之间的联系。

我选择这些文本来阐述我的论点，并不是意在单独划出所谓男性同性社交文学的经典。实际上，在我的论点中有一点至关重要，即:我们今天的欧洲经典，其实已经是这样一个男性同性社交的经典——特别是当它最显现异性恋特征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更应该将本书描述为重新阐述和关注勒内·基内尔在《欺骗、欲望与小说》中归纳的欧洲经典的三角结构(这在本书第一章中非常显著)。实际上，我只是凭自己的兴趣从英国经典内或与其相关的文本中挑选了一些，它们代表了一些有趣的解读问题，或者特别能够展示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节点，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男性同性社交的政治性。

冯筷筷 译　张　颖 校

注释:

1 Homophobia 这个概念本身也面临问题。首先，这个词在语源学上看是没有道理的用法。更严重的问题是，把恐惧和仇恨与-phobia以及这个词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确倾向于主观判断同性恋压迫的原因，即它是源于恐惧(而不是对权力的欲望等)、特权或者物质上的好处。另外一个词汇，异性恋主义(或译为异性恋歧视，heterosexism)，更明确指向它是集体的、结构性地录写地、基于物质基础的压迫。不过，本研究将继续使用 homophobia 这个词，主要出于三个原因。第一，我在这里要着重质疑(而不是强调)的一点是，同性恋(homo-)与异性恋(hetero-)通常

被看作是对称的反面;heterosexism 这个用法就隐含着这么一种有问题的认识。第二,本书的讨论不关注个人对男性同性恋的态度的原因论(etiology)。第三,本书研究的是18世纪以后对男性同性恋的在意识形态上和主题上的处理,它们把恐惧和仇恨用一种新的方式结合起来,的确应该称之为 homophobia。关于 homophobia 这个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概括,参见 Morin and Garfinkle, "Male Homophobia" in James W. Chesebro ed. *Gayspeak: Gay male and Lesbi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Pilgrim press, 1981, pp. 117 - 129)。

2 如果对此观点的背景讨论感兴趣,请参阅 Jeffer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London: Quartet Books, 1977)。

3 Adrienne Rich 在她的文章"强制性异性恋与女同性恋的存在"中形容这些纽带构成了一个"女同性恋连续体"(lesbian continuum)。"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in Stimpson and Person eds. *Women: Sex and 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 "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 in Cott and Pleck eds. *A Heritage of Her Own: Toward a New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9).

5 "The Unhappf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Lydia Sargent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6 例如,参照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an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pp. 182 - 183。

7 同上,p. 180。

8 "Gay Genocide: From Leviticus to Hitler", in Louie Crew ed. *The Gay Academic* (Palm Springs, Calif.: ETC Publications, 1978)。本书第5章讨论了用"群体灭绝"来理解同性恋男人的命运有那些局限性。

9 关于这一点,参阅 Jean Baker Miller, *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6),第一章。

10 Dover, *Greek Homosexua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1980), p. 91.

11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 83,由 Rich 引用在 *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Selected Prose 1966 - 1978* (New York: Norton, 1979), p. 206。

12 关于"波西米亚树林",一个美国统治阶层的全部由男人组成的夏令营,参阅 William Domhoff, *The Bohemian Grove and Other Retreats: A Study in Ruling-class Cohesivenes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另有一部更为生动的介绍书籍,有同性恋恐惧的倾向:van de Zee, *The Greatest Men's Party on Earth:*

Inside the Bohemian Grov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13 比如,NOW 的决议明确地将施/受虐,色情出版物以及恋童癖界定为“剥削和暴力”的问题,以区别于“感情的/性的倾向/取向”。*Heresies* 12, vol. 3, no. 4 (1981), p. 92。

14 更多的讨论参见:同上;Snitow, Stansell and Thompson eds. *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New Feminist Library, 1983); Samios ed. *Coming to Power: Writing and Graphics on Lesbian S/M* (Boston: Alyson, 1982)。

15 Catharine A. MacKinnon,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in *Signs* 7, no. 3 (Spring, 1982). pp. 530 - 531.

16 《飘》。其他的引用将融会在论述当中并标出章号。

17 关于这些局限性的讨论,参阅 Martha Vicinus, “Sexuality and Power: A Review of Curren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tiy”, in *Feminist Studies* 8, no. 1 (Spring 1982), pp. 133 - 156。

18 有关这一点,参阅 Michael McKeon, “The ‘Marxism’ of Claude Levi-Strauss”, in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6(1981), pp. 123 - 150。

19 Juliet Mitchell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方面的讨论参见她的著作 *Women's Est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1973), pp. 152 - 158。

20 同上,p. 154。

21 有关弗洛伊德理论这一方面讨论得最精彩最清楚的是 Jean Laplanche, *Life and Death in Psychoanalysis*, tr. Jeffrey Mehl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25 - 47。

22 本书第 8 章谈到这一点。

恋爱中的天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分析[1]

Swan in Love: The Example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男人表现出阴柔，不是因为他倒错，而是因为他在恋爱。"

巴特[1]

为了阐释三角关系[2]的灵活性和组织力量（即便是在一个去历史化的语境中），我将简要考察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本书只涉及两个非小说文本，这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草叶集》）。这两个文本之所以吸引我，原因是相近的：在某种非常具体的同性恋（而非仅仅同性社交）"男性互文性"[3]的形成过程中，它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惠特曼"——拜访惠特曼、喜爱惠特曼、赠送"惠特曼礼物"——固然是一个维多利亚式同性恋的标志，不仅如此，惠特曼还是一个维多利亚新兴阶层——资产阶级同性恋[2]——的许多成员的意识和自我形成当中的重要环节。同样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男性同性恋话语中一直都像一种浮点小数；王尔德、纪德、奥登、帕索里尼等人都帮助了我们去理解十四行诗。而面对这些十四行诗以及1895年之前发表的少量的其他文本，身处男性同性恋传统之外的批评家不得不正视这个传统所提出

〔1〕 本文所选用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文为朱生豪版本。如果作者的讨论紧密依赖于原文的某些片断，译者在对应的附注中附上英文原文。——译注

〔2〕 "Triangle" schema 是作者在上一章（"Gender Asymmetry and Erotic Triangles"）里阐述的一个理论模型，用来分析异性恋三角关系的欲望这一结构情境中的男性同性社交欲望（并用它来解释男人对女人的不平等）。——译注

〔3〕 本译文中，为准确地传达作者的解读和理论思考，man 译为"男人"，male 不论其为形容词还是名词，都译为"男性"。Woman 和 female 的译法与此相同。——译注

的问题,说出它的名字[1],并且至少建立他们自己的关于同性恋这一主题的初步认识。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草叶集》的不同之处在于(且不考虑它们作为同性恋文献的传播广度),莎氏十四行诗在诞生之后几百年才流行起来,而此时已经脱离了它们诞生时的社会环境、情欲语境和叙事背景。所谓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传统,就是把它们剥离历史语境和事实基础进行解读的一个传统。关于这些十四行诗是否具有内部顺序、何时书写、为谁书写、为多少人书写、多大程度是自传性、有多么传统、发表原因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有五花八门的神话和猜测。对于相信这些十四行诗有一个内部顺序的读者来说,将它们剥离情境来解读似乎恰恰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可以把这些十四行诗解释为比较具有延续性的一个情欲叙事,而且出演这些叙事的人物非常少——在我们所要解读的这些诗里只有四个人物:诗人[2]、一个俊美的年轻人、一个诗人情敌以及一个深肤色女子。我将运用化约式的解读传统(事实上代表了我解读这些十四行诗的方式),通过(因为共时性、非历时性而)简化的解读方式,用这些十四行诗来阐释某些男性同性社交欲望的模式。马克思曾经警告我们:脱离了历史情境的抽象概括,经常会呈现"过于发达或过于萎缩或漫画式的形式"。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牢记。[3]

这些十四行诗是非常好的说明材料,因为其中既包含着性别的三角关系的对称,又有社会性别结构的不对称,而这二者都令人惊讶地明了。基内尔(René Girard)式的解读认为:讲述者对俊美青年的关爱不亚于对黑女士的关爱;在最后一组十四行诗中,他们是争夺这个女子的对手;这个观点也是莎士比亚的观点。并且诗人本人显然相当沉迷于对称结构的

[1] speak its name,出自王尔德"the love that dare not speak its name"(不能说出名字的爱),意指同性恋。——译注

[2] "诗人"在这篇分析文章中也就是"讲述者"。——译注

完美秩序：

你占有她，并非我最大的哀愁，
可是我对她的爱不能说不深；
她占有你，才是我主要的烦忧，
这爱情的损失更能使我伤心。
爱的冒犯者，我这样原谅你们：
你所以爱她，因为晓得我爱她；
也是为我的原故她把我欺瞒，
让我的朋友替我殷勤款待她。
失掉你，我所失是我情人所获，
失掉她，我朋友却找着我所失；
你俩互相找着，而我失掉两个，
两个都为我的原故把我磨折：
　　但这就是快乐：你和我是一体；
　　甜蜜的阿谀！她却只爱我自己。（十四行诗，第42首）[4]

从这一首诗歌中很容易看出，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这样的批评家为什么坚持认为，爱人的性别（sex）与这些十四行诗的含义无关——至少在第1—126首诗中（人们通常认为这些诗歌是写给一个男人的）："鉴于[莎士比亚]谈及的新柏拉图式恋爱当中这个人物的贞洁……我必须坚持如此认为，无论真相如何，我的理解都不会改变。"[5] 第42首并没有鲜明的新柏拉图特点，甚至并非柏拉图式的，但是即使在这里克里格也毫不留情地从遣词上将诗中表达的爱人之间的以及爱情之间的各种"偶然"差异彻底抹除，以期恢复他所喜爱的对称和平衡的理想。

社会性别差异具有动摇平衡的力量。这种力量与清晰的对称之间的互动，更容易在这些十四行诗的结构性限制当中显现出来。

两个爱人像精灵般把我诱惑,
一个叫安慰,另外一个叫绝望:
善的天使是个男子,丰姿绰约;
恶的幽灵是个女人,其貌不扬。
为了促使我早进地狱,我那女鬼
引诱我的善精灵硬把我抛开,
还要把他迷惑,使沦落为妖魅,
用肮脏的骄傲追求纯洁的爱。
我的天使是否已变成了恶魔,
我无法一下子确定,只能猜疑;
但两个都把我扔下,互相结合,
一个想必进了另一个的地狱。
　　可是这一点我永远无法猜透,
　　除非是恶的天使把善的撵走。(十四行诗,第 144 首)[6]

这首诗歌的创作和表达基于一系列配对。在句法安排上,这些配对看起来总是对等或是截然相反的:

爱人 1	爱人 2
安慰	绝望
善	恶
男子	女人
风姿绰约	其貌不扬
天使	幽灵
善精灵	妖媚
纯洁的爱	肮脏的骄傲
天使	恶魔

两个之 1　　两个之 2
互相结合 1　　互相结合 2
……　　……

此处主要句法结构是高度对称的。但是，上文所列的都是选自这首十四行诗的前九行的词语，尤其是后五句对称更强。但即使在这些句子中，语义符号层面的差异也到处弥漫，最终盖过了这首十四行诗的句法正规性。到最后，连句法上的对称也不复存在：那个女人控制了三个主动动词，而那个男子的只有一个，还是被动动词；更重要的是，那个女人有一个特征修饰词（一个“地狱”），而那个男子是否有一个相对应的词语在句法上却并不清楚。

当然，在语义层面上，男和女之间的重要性却不对等，这一点显而易见。二者除了价值观上的明确**对立**（简单说就是善与恶的对比），在权力和能量上有一个与此相关的**不对称**。那个女人是有欲望和行动力的人物，而那个男子至多是可能会反抗。在这个三角关系上，还暗示了一个从点到点的单向发展路径：天使可能变成恶魔，但是却没有暗示恶魔可能变成天使。诗中有两个似乎彼此对应的精灵，整个情节要取决于他们其中之一的主动性。

而“地狱”的问题也很棘手。地狱在第五行中第一次出现，读到这里我们准备面对如赫拉克勒斯式两难选择[1]的戏剧场景：两个精灵，一手一个，引诱着讲述者——下地狱？上天堂？但是恰在此处，这首诗开始脱离对称的范式。（1）诗中未提及天堂，善的天使没有采取积极的引导。（这使我们回过去意识到，这一场景的“慰籍”其实不过是“善的天使”发

---

〔1〕 Herculean choice，希腊战神赫拉克勒斯，18 岁时在他面前出现了两位女神，一位是雍荣华贵的幸福女神，另一位则是端庄矜持的美德女神。前者向赫拉克勒斯许诺取之不尽的财富和安逸平静的生活，远离劳碌、痛苦和考验。而后者则许诺他会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壮举，可以得到荣耀和尊重，但是首先他要付出，没有享之不尽的财富，只有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赫拉克勒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译注

挥的隐晦而毫无生气的作用。)(2)更具破坏性的是,恶的幽灵太过阴险、太缺乏耐心,不想与善的天使进行一场残酷的、势均力敌的斗争来赢得讲述者,而是决定先行引诱善的天使。在这首诗的其余部分,恶的幽灵干脆完全忽视诗人的存在。而且事实上,诗在第五行之后的形态,呈现出一个被重新安排的场景,这个新的结构非常重要:善的天使在中间,像赫拉克勒斯那样面临抉择,一边是恶的幽灵不断的勾引,另一边是目瞪口呆只会祈祷好结果的诗人。可以想象,这首诗未曾提及的最终场景,即恶的幽灵所期待的结果,必然是不对称的:善的天使变成恶魔,他们二人站在同一方共同与诗人角力,力量必然超越诗人。同时,到了第14行,似乎所有人都已经忘记这场斗争才是关键。诗人拥有"天堂"的可能性——以及诗人命运的根本问题,甚至诗人在诗里的中心位置——竟从诗中消失得如此悄然无痕,令人叹为观止。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关于两个精灵的猜忌,使这首诗既充满了遗憾又令人感动。

到第12行,关于"地狱"的对称问题,不再是善的天使是否拥有一个天堂来与恶魔的地狱对抗,而是善的天使自己是否有一个地狱:在前一行完美的对称之后[1],"一个想必进了另一个的地狱"有可能是不确定的。当然,确定与否也许是符号层面的,取决于如何对"地狱"进行解读——是泛指情欲迷恋不可自拔的折磨(这可能是指其中任何一方),还是针对性地特指阴道(这个必然专指恶的精灵)。究竟讨论的是谁的地狱,这个问题在最后一行被回答了,至少"地狱"的解读更倾向于"阴道"。

如果我们不再将这首十四行诗中的问题抽象为"对称"与"不对称",我们会发现什么?我们发现一个男子和女人各被赋予一些特征,其中女人发现与她的"女-性"(femaleness)相关的特征,全部都是末世般的负面道德判断,是对主动性、欲望和权力的垄断,并且一整套句法和遣词暗示

[1] 第11行的英文原文非常对称,"But being both from me both to each friend"。——译注

出她是容器/限制者，而其他人是被限制的对象。作为对女性属性的处理，负面价值判断与阴性（凹陷）空间[1]之间的关联并不令人意外；负面的男性价值判断与主动的女性欲望之间的关联也不令人意外。但是这首诗隐含着却未直接描写的“地狱之饥”，应该是既包括这个女人还包括着两个男人的这个世界中唯一的主动力量。这种表达实有独到之处，从后浪漫主义立场看来出人意表。（例如，巴特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列举各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其中他将女人与缺席相联，但是原因是其被动性：“女人是忠实可靠的[她等待]，男人是反复无常的[他游离、四处寻乐]。女人具现了缺席，充分表现其虚构性，因为她有时间干这个。”[7] 可是如果将黑女士和那个特定的、多余无意义的资产阶级“永恒女性”的特点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弄错时代了。）

与这个女人相互成双/相互对比的那个男子最多只有一个特征（如果“fair”在此的意思是“美貌”而非仅指“白皙的”皮肤），[2]而且毫无活力。就这首诗的表达看，连他的“被迷惑”或“沦落”，也不是什么充满活力的内心活动过程。他要么为天使要么为恶魔，要么身在地狱之中要么身处地狱之外；这情形是麻木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其选择是简单的不带矛盾的，结果是明了的。

这个三角关系中的第三个人物，即另一个男性，在句法上没有相互对应的成分，他以第一人称出现，与另外二者各有相似之处。就像恶的精灵，他实际上是主动动词的主语，是事件发生的场所而非仅仅是对象。另一方面，他的动词的主动性又不够充分——并非是“知道”发生什么，而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讲述者有意识、自我分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我那女鬼”有相同的欲望，但是他（被动、为客体、男性）更为认同的仍然是“我的天使”。

---

〔1〕 英文“负面”和“阴性”同为negative。——译注

〔2〕 fair在英文中既指“美丽的”也指“肤色白皙”。朱生豪本译文取前意，译为“风姿绰约”。——译注

因而，此处的基本布局包括：一个按传统风格处理的女性，她作为行动的主体出现，而非思想的主体；一个按传统风格处理的男性，他作为纯粹的客体出现；另外还有一个风格较不明显的男性讲述者，他作为思想的主体而非行动的主体出现。虽然此布局看上去不符合常识，这却是整个这些十四行诗的主要特征，而且在莎氏戏剧中也不断反复出现。我所感兴趣的，不在于这些诗歌赤裸裸地记录了厌女症和恐女症，并以它们作为主题，而在于：一系列男性纽带，以及讲述者对诗的对称性的程式化坚持，是如何与这个主题相角逐的。

的确，在这些十四行诗中，我们需要应对两种可能的鲜明对称。一种对称，我已通过第 144 首诗进行了讨论，在后面我们还要回到这种对称；它以白皙的男子和黝黑的女士作为讲述者的两个欲望对象，但这清晰表达的对称也是被颠覆了的。在那些直接讨论这三者之间的三角关系的诗中，这一对称得到最有力的呈现。同时，在前面的那些单独写给年轻男子的诗和后面写给黑女士的诗的对比中也隐含这一对称。另外一种对称是两组诗歌的对称，这种对称在这些十四行诗中如此广泛，以至于读者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第一组诗歌中，讲述者恳求俊美青年结束他的独身生活，进入异性恋秩序中；在后一组诗歌中，俊美青年与讲述者的情妇发生了异性恋关系，使讲述者陷于痛苦的折磨。在什么意义上，诗人——青年——女士最终的关系结构，成为针对诗人在第一组诗歌中向俊美青年提出的要求做出的回应（即使这个回应是残酷讽刺和准确的）？

在早期十四行诗中，诗人为青年指定了异性恋；在后期诗歌中，青年和女士之间的异性恋为诗人带来了痛苦。但是，我们很难认为前一种异性恋与后一种异性恋重叠，因为前一组诗歌具有一个鲜明特点，即，几乎从未提及过女人；女人不过是一个使男人得以繁衍出更多男人而令其他男人满意的途径：

另造一个你吧，你若是真爱我，
让美在你儿子或你身上永活。（第 10 首）

在前一组的诗歌中，女人往往是作为潜在的障碍被提及，继而又被排除：

因为哪里会有女人那么淑贞
她那处女的胎不愿被你耕种？（第 3 首）

是否因为怕打湿你寡妇的眼，
你在独身生活里消磨你自己？
哦，如果你不幸无后离开人间，
世界就要哀哭你，像丧偶的妻。（第 9 首）

总体来看，向俊美青年灌输一个社会化的、异性恋的身份，完全是在男性纽带与男性劝导的领域中进行。如果说为那个青年的人物设计过对妇女的态度，那就是冷漠，或者说是主动的反感，如第 8 首所显示的：

如果悦耳的声音的完美和谐
和亲挚的协调会惹起你烦忧，
它们不过委婉地责备你不该
用独奏窒息你心中那部合奏。

（诗以“你独身就一切皆空”结尾，预示了第 136 首中的“微末”，[1]与当今没有教养的高中男生口中“不用则废”的可怕真理在根本意义上没有差别。）无论是针对女人的欲望还是控制，似乎都是不言而喻的，重要的是如

---

[1] “你独身就一切皆空”原文是“Thou single wilt prove none”；而 136 首中表示“微末”的原文是“none”和“nothing”。——译注

何保持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延续。

这些早期十四行诗中辩论的轨迹是:通过异性恋的——即男人气质的(the manly),移向同性社交——即男人(men)。真实的妇女,距离思想意识的中心如此遥远,以至于在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男人身上的女人气也不再是危险的。十四行诗第 20 首的开端非常著名:

> 你有副女人的脸,由造化亲手
> 塑就,你,我热爱的情妇兼情郎;[8]

在早期诗歌的语境中,这首诗仿佛应是异性恋计划的一部分。讲述者的意思似乎是:你可以既拥有女人,同时仍然保持对我的爱慕:

> 让我占有,而她们享受,你的爱。

即便讲述者在表面上放弃对青年有任何主动的生殖器性行为兴趣,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却表达了一种愉快的暧昧:男孩的阴茎"对我毫无意义(nothing)";但是,像在其他一些十四行诗中一样,这里可以有不同方式解读"nothing",其中一个含蓄意指是女性生殖器。(在此说明这一点,我的意图并不是要断定十四行诗中说这些男人之间有涉及生殖器的性关系;在我看来那个时代的性语境太过遥远,我们无法恢复,也不可能分辨出自我吹嘘、坦白交代、轻描淡写、过分强调、逗乐玩笑、不可想象以及各种无法提及但经常从事之活动,等等。)有一点可以确定:出于某种原因,在男女之间性的可互换性这一问题上,讲述者居然可以表现得放松、优雅(或许这是一个未打算公开的文本)——只要他的谈话对象是男性。在一个异性恋社会化很有力的情境中,男性之间的亲密看起来毫无问题。可是身处于这种文化之外的读者,则很难感受这种亲密关系的边界。

或许我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我坚持认为关于俊美青年的十四行

诗都是异性恋的。用常识思考的读者也许会问:如果这些都是异性恋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同性恋的?要定义同性恋,需要有一个能够将同性恋界定为异性恋反面的文化语境。显然,我的意思不是要否认或者低估以下因素的存在:十四行诗中男人之间的爱情,描述这种强烈的爱情的、与性器官相关的语言,甚至被这般描述的爱情已经在性器官上得以实施的可能性。同样,就讲述者和他的男性爱人之间的纽带,以及他和他渴求的女人之间的纽带而言,我也不认为前者没有后者强烈、重要,或者是在道德伦理上不如后者高尚。但是,我的意思是:在这些十四行诗勾勒的世界中,在所谓同性恋(无论如何命名)和异性恋两种机制之间并不存在旗鼓相当的对立或非此即彼的选择。十四行诗呈现男男之爱,这种爱情就像希腊人的爱情一样,在体制化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牢固地确立下来,而社会关系结构通过女人得以实现:婚姻、姓氏、家庭、对祖先和后代的忠诚,全部取决于那个青年利用女人的特定方式——抽象地说,这种利用不能被认为是背离、否定或转移他和讲述者之间的纽带。

另一方面,当我们从早期十四行诗中的异性恋转向后期诗中的异性恋时,发现的是威胁和混乱。其中最明显的差异是:异性恋成了一个包括女人在内的异性恋。(精确地说,其中包含了一个女人;在这个高度集中的十四行诗系列中,一个包括了女—女关系的解读框架会使这个世界看上去有多么不同,这个问题尚有待讨论。)就像在"我有两个恋人"中看到的,说一个女人在场,并不意味着她的观点得到了表达或是我们能够对她有丁点了解,也不意味着她是意识的主体——尽管她的确是行动的主体。(人们其实很容易忽视这样的问题:这些十四行诗没怎么对那个女子——这个层面上看,还有那个青年——作为人物进行塑造;并且,读者视角的失败是由于一个特殊原因造成的:自19世纪起,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解读成小说更简单,但是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可知的。所以,奥斯卡·王尔德随心所欲地诠释诗中的那个讲述者和那个女子,仿佛能够通过相同的方式了解他们。比如,他确定地说,理查德·博倍之(Richard Burbage)

决非是那种能够让她"感到有魅力的男人类型"。[9] 被普鲁斯特熏陶的小说读者们,很可能已经丧失了能力去发现,欲望的视线[不同于詹姆斯小说中那种纯粹的视角游戏]极不全面;而在小说时代之前的、那些把十四行诗当作抒情诗诵读的读者看来,这种欲望的视线是自然而然的。)黑女士能够被看到的,最多仅仅是一双眼睛和一个阴道,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碎片形态中,她也破坏了早先的异性恋视线——那种异性恋视线主要意指一个男性之间的父系延续体的高度可实现性。一个真实女性突然出现于这一场景中,而孩子——即父亲的缩影——与此同时消失了(在早期的十四行诗中,孩子本来是性结合的客体);另外,这个女性出现的同时,正好是鼓励那个青年维持父系制度良好运作的论调在诗中结束的时刻。

成功地将女人遮蔽起来的异性恋,正如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没有被两个男人其中一方出现的女性化所威胁。但是,在包含着一个女人的框架中,被女性化或是遭受性别混乱却是令人恐惧的。此外,我们将在下文看到,任何与真实的女人之间的情欲关系,都可能会削弱男人身份。色欲本身(在这个语境中意味着对女人的欲望),会剥夺男性的自我身份(十四行诗第 129 首)。

将一个女人包括进来,既改变了异性恋关系,也具体地改变了同性社交关系。讲述者与那个美貌青年最初的关系,与后来他和黑女士之间的关系有相似之处,因为他可以通过爱人与其他的男人保持亲密关系。这两种当中任何一种的爱情,都能够使得男性主体进入与其他男性的一个关系中,但是这一关系要么强化主体的位置,要么将其颠覆。

就是在涉及黑女士时,对与其他男人分享性领地的反应或许是出人意料地(虽然可能只是短暂的)兴奋。这是参与到一种超个人的、凌驾于女人之上的权力的方式,也是能够接近更有特权的男性的方式。有两首序号相连的十四行诗,为我们提供了尤为重要的例子来解释这种兴奋的机制和威胁这种兴奋的因素。

假如女人有满足，你就得如“愿”，
还有额外的心愿，多到数不清；
而多余的我总是要把你纠缠，
想在你心愿的花上添我的锦。
你的心愿汪洋无边，难道不能
容我把我的心愿在里面隐埋？
难道别人的心愿都那么可亲，
而我的心愿就不配你的青睐？
大海，满满是水，照样承受雨点，
好把它的贮藏品大量地增加；
多心愿的你，就该把我的心愿
添上，使你的心愿得到更扩大。
　　别让无情的“不”把求爱者窒息；
　　让众愿同一愿，而我就在这愿里。

你的灵魂若骂你我走得太近，
请对你那瞎灵魂说我是你“心愿”，
而“心愿”，她晓得，对她并非陌生；
为了爱，让我的爱如愿吧，心肝。
心愿将充塞你的爱情的宝藏，
请用心愿充满它，把我算一个，
须知道宏大的容器非常便当，
多装或少装一个算不了什么。
请容许我混在队伍中间进去，
不管怎样说我总是其中之一；
把我看作微末不足道，但必须
把这微末看作你心爱的东西。

把我名字当你的爱,始终如一,
就是爱我,因为"心愿"是我的名字。
(第 135,136 首)10

这两首诗里,讲述者像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1]("而多余的我总是要把你纠缠"),似乎他的快乐原则是"多多益善"。仅仅因为她不可能知道你的存在而去追求她,这很是有趣,不过也很侮辱人。(即使不考虑滥交的问题,这仍然是有侮辱性的;通过也许连有些女人都会喜欢的一个意象来侮辱:女性的性存在,作为一个巨大的令人愉快的熔炉,痛快地容纳下它不经意就接受进来的家伙。)在"我拥有的两个爱人"中(并且在所有十四行诗中都很显著的是),性愉悦好像是只为女人所有。不过在这些充满色欲和快感的十四行诗中,有一点不同寻常:好像没有人会强烈地感觉到性(至少直到第 136 首诗的最后四行为止):男人,或是他们的"心愿"("wills"),好像被降低为矮子的标准,几乎像浮游生物一般漂游在温暖却漠然的大海。[2]我们的"心愿"("Will"),期待着为他自己实现什么样的快感?[3]要隐藏咿呀学语期的快乐,或者更具快感的是,要被其隐藏。但是更重要也更成熟的快感是,把他的名字(Will)[4]赋予一个女人(或者赋予女人的某个部分),还有因被误认为是拥有对女人的所有权的男人(单数或复数)而带来的快感。再或许,因被误认为是一个年轻富有活力的男性而带来的快感,以及更普遍的、融合的快感——并非首先与乐于应承的女人融合,而是与其他的、被[这个女人所]应承的男人融合("让众愿

[1] 此句原文为 More than enough am I that vex thee still,其中"more"译为"多余"。——译注

[2] 第 136 首十四行诗的最后一句是"And then thou lov'st me, for my name is Will",其中 will 翻译为"心愿";但是在本文的分析中,作者强调这个词汇隐含的性器官的性别意义。——译注

[3] 作者在这里用的是有性别指示的"himself"来指代"Will",而且是大写的 Will。——译注

[4] Will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英文男性名字。——译注

同一愿,而我就在这愿里"[1])。这个男人当真是要把他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甜蜜都卷成一堆儿。

当然,我并不是要说,在此出现的是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么认为就是犯了时代错误),而是要(冒着年代错置的危险)说:在这里出现的,是男性异性恋欲望;其形式表现为,想要(通过女性身体)巩固与权威男性之间的伙伴关系的欲望。

但是,通向异性恋欲望之路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在短暂的游戏般兴奋中,在第十四行,危险被提及,而且它不会轻易离开。这两首诗之后的下一首,虽然它在主题上与其他比较喜悦的诗有关联,却是整个诗集中最为悲惨痛苦的。我们如何能够在"will"的十四行诗中,发现灾难的可能以及灾难的雏形?

如果说嫉妒一直在潜伏着,未免太含糊。也许一个修辞上的婉转更有效。重要的是,在第135—136诗中的愉悦里,充满了为生殖器命名而带来满足以及这些淫秽的隐语的奇怪功用。斯蒂芬·布思(Stephen Booth)已经说明了,这些音节被其他作家利用表达相同的意义(也有不同的意义),而在"心愿"的问题上不需有渊博的知识就一目了然。莫名其妙的重复(第135首出现了14次"心愿")讲述了整个故事:它一定是指向一个有性含义的双关语。从定义上说,双关只能意味着一个东西。但是这个双关语却可有多种含义:它指一个——或者是两个,也有可能是三个——被涉及的男人的名字;它是一个未来时态的助动词;它也是一个普通名词,(大概)意思是欲望;它意味着阴茎;它意味着阴道。正如最终所显示的,这个词的各种社会性别意义绝不是中性的,而是不规矩地、危险地分散的 。

在这一特定阶段中,"will"的第一个意思必然是一个男性的名字——诗人自己的名字或是其所爱之人的名字;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首诗中对"will"的处理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应该是这个词汇延伸到女性生

---

[1] 这里所引用的第135首十四行诗原文最后一句是"Think all but one, and me in that one will",其中one也可以解读为"the other man"(另一个男人)。——译注

殖器上(确如其主要意思一般)。为什么他会这样做?第136首诗里的生殖器名称的社会性别是不断变化的。布思对第20首十四行诗中“nothing”的解释包括:“(1)无价值的;(2)无物,非物(no-thing, a non-thing)。‘nothing’和‘naught’都是‘阴户’的流行俗称(或许是因为状如O形)”(164页)。讲述者权且乐观地表示放弃自己,愿意(为了特权)被“当成什么都不是”——“For nothing hold me”[1],只要你拥着我,“把这微末看作你心爱的东西”。这最后一个nothing(微末)——这个要被“看作你心爱的东西”,显然是一根阴茎;事实上,在这两首十四行诗中,只有这几行听起来类似实际的生殖器感受,与黑女士那具有庞大的却被分散了包容力的“will”截然相反。但是,讲述者可以感知的“nothing”(微末)基本上就是女性器官或“无物”。黑女士由于拥着他而获得的愉悦,最终是要被遮掩的,不是被她自己在其他某个Will[的男人]那里的愉悦遮蔽,而是被她拥着自己的性器官的愉悦所遮蔽——“For nothing hold me”。与之相近,在这两行诗句中,“爱”(“love”)在双性生殖器的名称链上也有它的位置。“把我名字当你的爱”,诗人在这里指示并且具体说明那个名字是什么:它是Will,是阴道/阴茎。(如果他太关注他的另一个名字,这些社会性别的模糊就会失去平衡。)“始终如一,就是爱我……”

诗人在这些诗里让那个女子拥有自慰的快感,这是很不同寻常的——应该说是很不同寻常的善意和同情。他使用的韵律却没有什么不寻常。用这样的韵律,讲述者落入异性恋的冒险中,同时他还想要验证他与其他男人之间的身份认同,却发现自己意外地陷入——不是一种认同,而是——与那个女子之间的身份混乱。性的愉悦进入这首诗的时刻,与虚张声势、玩笑的侮辱相反,恰好是讲述者身上出现因“微末”被拥之危险的时刻;在那个时刻,随着他把自己的名称赋予那个女人的“爱”,这个名

[1] 这是第136首的第11行,前文所用朱生豪译本是“为把我看作微末不足道”,但是这个翻译很难表达出本文作者对莎翁诗句中的复杂隐喻所进行的分析。作者在此重点分析nothing无物(朱生豪翻译为“微末”)同时指代阴茎与女性生殖器的语义转换状态。——译注

称自身就被女性化了。于是下一首诗在一开始就充满愤怒地恳求道：

> **又瞎又蠢的爱**，你对我的眸子
> 干了什么，以致它们视而不见？
> 它们认得美，也看见美在那里，
> 却居然错把那极恶当作至善。（第137首，本文作者标注的强调）[11]

莱丝丽·费德勒（Leslie Fiedler）讨论了莎士比亚诗歌中与此密切联系的一些问题。她巧妙地利用了奥维德（Ovid）关于赫马佛洛狄忒斯[1]的分析。赫马佛洛狄忒斯是一个逃避女人的男人，他跳入溪水中，变成半男半女。他诅咒说：

> ……哦，父母二人，赋此予我
> 惟愿此后，入此溪者
> 出来时都为半个男人
> 踏入这邪恶之水使他软弱！[12]

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使之发生变形的溪水，就是女性"地狱"（female Hell）。只有女人才有力量将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变得不足为男人（make men less than men）。同时，要成为一个完整男人，意味着需要掌握对一个女人的工具性利用，也需要冒着被她变形的危险。

通过对一个男性爱人的竞争而与其他男人保持联系，这与针对黑女士的各种竞争在结构上相近；但是前者没有那么大的威胁性。黑女士的"汪洋无边"，使她能够想象，她所有的情人都"同一愿，而我就在这愿里"；同样地，俊美青年也是精英们的相遇之处。"爱的一切可爱部分"，"死去的

〔1〕 Hermaphroditus，希腊神话中 Hermes 和 Aphrodite 之子。——译注

情人的纪念牌"以"挂"、"已埋葬"、"已藏"的方式,存在于俊美青年体内;

在你身上我瞥见他们的倩影,
而你,他们的总和,尽有我的心。(第 31 首)

那个青年的价值,由于他吸引并聚集其他男人的爱而增加;一个男人拥有"织就这众目共注的可爱明眸"是一种魅力,而非罪过(第 5 首)。第 137 首诗中表达对黑女士的仇恨的诗句,在关于"心愿"的诗歌后面产生了灾难性的结局,是对"织就这众目共注的可爱明眸"的一个被谴责的也是谴责性的回应。但是:

我的眼睛若受了偏见的歪扭,
在那人人行驶的海湾里下锚,
你为何把它们的虚妄作成钩,
把我的心的判断力钩得牢牢?
难道是我的心,明知那是公地,
硬把它当作私人游乐的花园?[13]

"人人行驶的海湾"必然是第 135 首诗歌中精液样群体(spermatic community)那令人烦乱的变形("大海,满满是水,照样承受雨点/好把它的贮藏品大量地增加;多心愿的你[" The sea, all water, yet receives rain still, / And in abundance addeth to his store; / So thou, being rich in 'Will']……")。一个更为谦卑、没有那么歇斯底里的水手身份,被用来描述那个青年以及青年与他的对手诗人之间的关系。

……你的价值,像海洋一样无边,
不管轻舟或艨艟同样能载起,
我这莽撞的艇,尽管小得可怜,

也向你茫茫的海心大胆行驶。
你最浅的滩濑已足使我浮泛，
而他岸岸然驶向你万顷汪洋；
或者，万一覆没，我只是片轻帆，
他却是结构雄伟，气宇轩昂。（第80首）[14]

我们不能认为，与他所表达的围绕黑女士的嫉妒相对，讲述者从未表达过因俊美青年而产生的嫉妒（在黑女士出现之前的十四行诗中）。“恋人如海洋”的隐喻表明，两个爱人之间的主题和基本对应关系还算完整。各种相呼应的情况在两个关系中都出现了，比如庆祝、不安、谴责、自我折磨、荷马式明喻等等；这种呼应最后在三角挣扎中纠结成具有威胁性的统一体。但基本上来说，在对这两种关系的处理上，在情感、结构和形式方面的种种差异勉强足够掩盖主题上的这些呼应。

我将以青年和黑女士的自我分裂和自我身份认同为例，因为这个例子从社会性别角度看尤为有趣。十四行诗对这个问题是不是提供了什么“事实性”的信息？这些诗告诉我们：那个青年和黑女士都有能力欺骗讲述者，而讲述者至少有时候会怀疑他们都欺骗他。然而，十四行诗竭力将那个青年塑造为一块道德巨石；把女士却定义为两面性和虚伪。讲述者要围绕非常相近的各种元素构造如此丰富多样的画面。为了达到此目的，讲述者的位置——他的自我定位——需要改变。

在献给英俊青年的诗中，有许多分歧、两面性和自我分裂，但是它们都被描述为外在于那个青年，但尽量内在于讲述者。那个青年的欺骗与他自身之间的关系，就像云朵与太阳（充其量是日蚀与太阳）；但是对讲述者的影响是，这些欺骗将讲述者与其自我分裂，为的是尽量理解并谅解那个所谓的更加单纯和有诗意的青年：

运用种种比喻来解释你的恶，

弄脏我自己来洗涤你的罪愆,
赦免你那无可赦免的大错过。
因为对你的败行我加以谅解——
你的原告变成了你的辩护士——
我对你起诉,反而把自己出卖。(第35首)

这样,许多留在我身上的瑕疵,
将不用你分担,由我独自承起。(第36首)

为抵抗那一天我就躲在这里,
在对自己的恰当评价内安身,
并且高举我这只手当众宣誓,
为你的种种合法的理由保证:(第49首)

当你有一天下决心瞧我不起,
用侮蔑的眼光衡量我的轻重,
我将站在你那边打击我自己,
证明你贤德,尽管你已经背盟。(第88首)

说你抛弃我是为了我的过失,
我立刻会对这冒犯加以阐说:
叫我做瘸子,我马上两脚都躄……(第89首)

心中满是你,什么再也装不下,
就这样我的真心教眼睛说假话。(第113首)

青年的不可分裂(indivisibleness)似乎是邪恶的:如果他要背叛讲述者,

那么后者不可能有所觉察：

> 憎恨既无法存在于你的眼里，
> 我就无法看出你心肠的改变。
> 许多人每段假情假义的历史
> 都在颦眉、蹙额或气色上表现；
> 但上天造你的时候早已注定
> 柔情要永远在你的脸上逗留；
> 不管你的心怎样变幻无凭准，
> 你眼睛只能诉说旖旎和温柔。（第 93 首）

第 94 首诗歌中有一个著名的难题："谁有力量损害人而不这样干"，至少能提供一部分的线索帮助我们理解，青年（表面上）的完整与他造成的爱慕他的那个男人之自我分裂这两者的互动。当那个青年的确发生变化时，讲述者便引入一个高高在上、具有惩罚性的外部力量——时间——来完成改变。

这一切都与讲述者对黑女士的处理完全不同；但是奇怪的是，作为一种对着女人说话的形式——或说是物化女人的形式，它却似曾相识。十四行诗诗集将一个俊美青年呈现为阅历不深的人，像一个生活在理性、道德和人性等概念还未出现的世界里的生命，既不可能抗拒他，也不可能理解或谴责他。这个年轻人如同玛丽莲·梦露一般，让观看他的男人自感衰老、堕落和责任感，即使这个男人可以尽情享受青春与从容（几近承诺给他）。由讲述者确定的认知分工一目了然：你是色（sensuality），我是感（sense）；你是动物般的闲适、甜美和真实，而我是成年人的内疚、自我颠覆和暧昧。这一认知分工的推论是：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我——拒绝我、折磨我、消耗我、令我疯狂，怎么都行，就是不要让我吃惊。在讲述者对青年的态度中，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事先预想的自我保护（你对我做什

么都行,我会做得更过分)。这种自我保护是与普鲁斯特笔下情人之间最强有力的关联之一,也是最有力地阻止俊美青年自己凸显出来的手段之一。讲述者关于爱情最巧妙(也是最有特色)的表达,是防止背叛,或者是防止一个抱憾,但他却不说明是青年招致了这一遗憾:

我死去的时候别再为我悲哀,
当你听见那沉重凄惨的葬钟
普告给全世界说我已经离开
这龌龊世界去伴最龌龊的虫:
不呀,当你读到这诗,别再记起
那写它的手;因为我爱到这样,
宁愿被遗忘在你甜蜜的心里,
如果想起我会使你不胜哀伤。(第 71 首)

在我死后……爱人呀,把我全忘掉……(第 72 首)

别再为你冒犯我的行为痛苦……(第 35 首)

夺掉我的爱,爱呵,请通通夺去……(第 40 首)

那使我做你奴隶的神不容我,
如果我要管制你行乐的时光,(第 58 首)

青年的变化、不忠、忧虑、自我分裂、隐蔽动机等,被爱慕他的人完全地想象着并体现着——目的是要维持被爱慕者简单、真诚的形象;以至于讲述者自己都知道,没有如此理想的人——青年自己的形象被简单化,就差被彻底抹杀。读者们关于青年的直觉猜测会很不同:一个读者眼中的亚西

比德，在另一读者眼中是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1]

讲述者在修辞上把青年处理为一个金发傻女式的人物，[2]这并不是说青年在诗中被女人化。相反，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强调，那些影响最为深远的、对女人有压迫性的形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偶然形成的：玛丽莲·梦露、海蒂·索雷尔、贝拉·威尔佛，就连弥尔顿笔下的夏娃，都不能进入莎士比亚的女性肖像录[3]——不论是极度负面的还是极尽赞颂之笔的。（俊美青年、"女人的脸"等等，被表现为夸张地阳具化——一元的、直露的、无反思性的、粉红、不易看透。）青年有女人般特征，但是在十四行诗的格式塔整体中，他其实是"男一性"的标准：他将男性化作为纯粹的客体表现出来。事实上，自我分裂总是被从青年那里转移，落到讲述者身上；在这一语境中，讲述者自己被变得更加女人化。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些十四行诗中，带传染性的自我分裂似乎是对女性特质的界定——或者更简要地说，是"虚假瘟疫"，意即一个传播虚假的瘟疫。这里有一个被特别夸张强调的"悖论"：黝黑(dark)女士被认为是白皙的(fair)[4]（若非如此，这也不会成为最有效的一个双关语，至少有10首关于黑女士的诗是以此为焦点的）。它通过某种不算巧妙的表达方式表明：作为一个女人，已经意味着是极其自相矛盾的，爱慕一个女人或是对一个女人有欲望则是被同一把凿子分裂。

无论思想或谈话，全像个疯子，

---

〔1〕 亚西比德，Alcibiades，是雅典著名政治家、演说家和将军；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是英国诗人、翻译家和散文家。——译注

〔2〕 dumb blonde在美国英语中用来指金发白人女子，相貌美丽但是没有智慧。是个贬义性很强的词汇。——译注

〔3〕 海蒂·索雷尔(Hetty Sorrel)，是艾略特小说《亚当·比得》(*Adam Bede*)的主要人物；贝拉·威尔佛(Bella Wilfer)，是狄更斯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的主要人物；弥尔顿的夏娃出自长诗《失乐园》。——译注

〔4〕 此处用于描述黑女士的形容词dark与fair形成对比，fair在前文翻译为"俊美"，但是这一英文词汇同时具有"美丽的、女性的、白皙的"等不同意义。——译注

脱离了真实,无目的,杂乱无章;

因为我曾赌咒说你美(fair),说你璀璨,

你却是地狱一般黑,夜一般暗(dark)。(第147首)[15]

这里隐含着一个同源关系:fair:dark::fair:foul〔1〕,一方面是将污秽与传染病联系,另一方面把黑暗与地狱及女性生殖器联系起来;通过这样的联系进行聚类,把包括女人的黑肤色、黑色被认为是美丽(fair)这个说法的"虚假"、她的性滥交(一种对虚假的传染)、讲述者对自我的异化(另一种虚假的传染)等等归类到一起。

在讲述者和俊美青年之间的关系上,他的心理策略是,心甘情愿地吸收青年自我分裂而造成的震动。对青年来说,身为"fair"(俊美)意味着一种统一、静态的状态,牺牲的是那个把他看作"俊美"的人。与黑女士之间的关系与此并非截然不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自我分裂被认为原本就在她自身,以讲述者无力控制的一种方式[由她]传染给他。讲述者的预先宽恕、通过自我背叛来防止他人背叛,这些方式都适用于男人身上,但不适用于女人。相反,讲述者被赋予歇斯底里的特征,被简化为一种声音来表达对她的抗拒以及充满仇恨的顺从。

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可以用来考察男—男纽带与男—女纽带之间的差别,即男—男关系中隐含的张力是空间地建立的(你是这条路,我是那条路)〔2〕,因此男男关系被想象为稳定的;而男女关系的张力却是按时间建立的(因你这样,我则如此),故而显然是不稳定的。所以,爱恋俊美青年时的自我分裂似乎是坚忍克己的美德,而爱恋黑女士时的自我分裂却像是被毁灭。换句话说,让一个男人在与男人的关系过程中哪怕经历一种

---

〔1〕 homology同源关系是一种类比类型,其中两种人的信念、实践或人为现象被时间分离,但是因基因或历史联系拥有相似性。本文作者在此分析英文诗句中fair与dark这一悖论中隐含的相似性。——译注

〔2〕 You are this way; I am that way明显有两种理解。这里为了突出作者"空间地建立"的观点而译为"路"/方向。——译注

羞辱的变化，都好像是维系或参与着一定的男性权力；而让男人在与女人的关系过程中经历任何变化，都像是对其本质的彻底贬低。

讲述者与俊美青年的关系似乎给人一种无性(sexlessness)的印象，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顽皮、生殖器暗喻(allusion)、细微的个人关注、挫折或者爱情，这种印象一直存在。男—男关系与男—女关系之间的差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它。这些十四行诗对性存在(sexuality)本身的界定，似乎基本上与以上任何这些东西都无关，而是把它界定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原则，就像历时性本身，

> 感受时，幸福；感受完，无上灾殃；
> 事前，巴望着的欢乐；事后，一场梦。(第129首)

如此定义"性"与爱情正相反；爱情是"亘古长明的塔灯"(第116首)。(因此，早期给俊美青年的诗中，有一个毁灭性、贪婪的男性角色形象，即时间[Time]，后来变成了[女性]性存在的盟友——这要被婚姻和家庭的体制所反对，也被诗[poetry]所反对。)我们已经看到，十四行诗第144首中呈现了对于理想中的对称三角关系最为直观的描写。在这里，无论行动还是性，都是女性专属的特权，但是它们必须通过改变男人而实现——将男人从天使变成恶魔、从天堂(在其他一些版本中，是通过天堂)到地狱的没有回头路的旅程。

从这一点上看，或许有几个不同的理论策略能够发挥作用。最可能的是，上文中通过生殖器的比喻指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权力转移，我们可以让生殖比喻意义更清晰、更复杂。十四行诗集中隐藏了许多关于家庭、童年、母职，尤其有趣的是父职的形象，这些形象并不明显，且极富变化性。我甚至认为，生殖器比喻的意义或许可以朝这个方向延伸。

然而，另外还有更加有趣的讨论思路，这个思路有助于为思考家庭的问题提供一些具体性和基础。它要求我们将权力的概念多元化、具体化，

而到目前为止我都一直需要对权力进行具现，甚至量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最希望十四行诗集是一部小说。读者基本上是将它当作小说，而我们却要将十四行诗最为关注的问题拿来解读真正的小说。但是，不了解十四行诗中那个青年的"杀伤力"是否代表了贵族的庇护权、还是代表演员之于剧作家的强势——尽管它们都可以体现为一个爱恋关系；不了解"那座你唯一念头是把它重盖……的殿宇"(第 10 首)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青年在尚未建立起房子和声名时的职位，还是代表了他以自己的外貌和雄劲作为个人主义的资本来进行充满自恋的历险；不了解在什么意义上，关于法律、资本和高利贷、食物和需求等无处不在的语言是否真的把这些关系编织缠绕在一起；不了解就具体的阶级、社会性别和历史时刻而言，一个违背自己"床头盟"的女人(第 152 首)胆敢做什么，或是"夺过别人床第应得的租金"的女人(第 142 首)威胁着什么；不了解当一个特定的男人向一个特定的女人发出以下疑问时，其中隐含的奚落如何表达最为关键的讽刺意义：

何必要耍手段，既然你的强权
已够打垮我过分紧张的抵抗？(第 139 首)

——简而言之，甚至连理解莎氏著作中那个物质世界语言的启蒙读本都没有，除了认为它是纯粹的自我反思——在这些巨大的空白之处，我们失去的，不是"莎士比亚这个人"或是莎士比亚的时代，而是一个关于性政治的多变且执着的思考中的质感、比例、句法、修辞等问题。此外，我们跨越这些重要的空白进行的解读，把我们推向更大的失职——具体说来，把我们推向普适化和本质化(在我们对抗这个时代和这个阶级的焦虑时)，让我们相信有那么一些东西(例如：生殖比喻)从另一个时代和阶级的话语中强大地存留下来。我们总是拥有社会性别和生殖器的；但是社会性别和生殖器的这些意义和内容，如"家庭"、"性"、"男性的"、"女性的"、"权力"、"事业"、"隐私"、"欲望"都是在时间和各种体制上具体体现出来的，

其中也包括文学。

但是，本研究对十四行诗集进行的脱离背景的阅读，为后面要进行的较有联系的、小说的解读，也提供以下尝试性的归纳：

或明或暗地执行的社会性别之间的对称、同性社交和异性社交之间的对称、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对称，可能造成一种情欲三角关系。

这一对称关系将是人为制造的或是被歪曲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男性和女性的权力在数量和类别方面的基本差别，二是由于在大多数文化的话语中，隐藏在“对立”、“反面”或“互补”这样的措辞下面，一个社会性别被视为是另一个社会性别的边缘化附属，而非与之对等。因此，同性之间的纽带必然无法与异性之间的纽带有直接可比性（男性之间的同性纽带与女性之间的同性纽带相比，含义和特点也有所不同）。与“女一性”(femaleness)同“男一性”(maleness)之间的关系相似，男性同性恋纽带与男性异性恋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被后者限制、边缘化的；但是它们的差异在于：男同性恋是在一个已经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同性社交领域中实现。

通过遮掩实际的社会性别差异，或是通过将实际的社会性别差异转换为人为制造出来的有可比性的空间和/或时间的修辞形象，对称关系的维持则成为可能。“有可比性”的修辞形象，带着它们不对称起源(asymmetrical origins)的标记，但是它们不能被再转译到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其原初状态的新版本。

一个能够男女“各半”的人物，作为社会性别对称(gender symmetry)的谎言的一个重要传统主题，将会不断重现；但是其出现的形式将最终揭示，对称关系的维持需要偏见的存在。即使在对十四行诗集进行的最为敏锐、犀利的批评中，这个问题也是症结所在。由于在修辞和政治上盲目崇拜对称性，像王尔德、温德汉姆·刘易斯和G.威尔逊·奈特等人[1]都强调被女性化的男性为通灵者，是超越社会性别的观察者：“诗歌本身是

[1] 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英国画家和作家；G. Wilson Knigh (1897－1985)英国文学批评家和学者，以对文学作品中的神话内容解读而著名。——译注

一个双性的意识或者行为"；"在任何普通的恋爱故事中，男性从女性中寻找完整。这里，一个完整的个体，因为在某些特定时刻诗人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看到自己的灵魂状态在其自身的统一性（俊美青年）的身体体现中反映出来；从这一独特体验中涌现了我们这些伟大的诗篇"[16]。

最后，正如我在"导言"中已经提到的，为了寻找权力关系在语言上的集中表现，虽然涉及生殖器的性存在是一个合适之所，但是这个（生殖器性存在）语言——以及，性存在本身——与其他权力关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有含义的关系，因此这个关系具有严密的结构性、高度的时空具体性和可变性，而且通常是隐秘的。有一个纽带，把"性的"领域与涉及生殖器的变化作为生殖器之外的各种关系和权力形式联系起来。这个纽带的力量和形态也是变化的；反过来，那种纽带的本质又在影响着力量和形态的分布。

注释：

1 Roland Barthes, *A Lover's Discourse: Fragments* (tr.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8), p. 14.

2 有关此问题，参阅 Weeks, *Coming Out*, pp. 52, 57, 68。另外参见本书的"尾声"部分。

3 Marx, *Grundrisse*, p. 106.

4 Shakespear, *Sonnets*, p. 39, Sonnet 42. 以下引用将融入分析文本中，以诗号标注。

5 Murray Krieger, *A Window to Criticism: Shakespear's Sonnets and Modern Poe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80.

6 原文是：

Two loves I have of comfort and despair,
Which like two spirits do suggest me still;
The better angel is a man right fair,
The worser spirit a woman coloured ill.
To win me soon to hell, my female evil
Tempteth my better angel from my side,
And would corrupt my saint to be a devil,
Wooing his purity with her foul pride.
And whether that my angel be turn'd fiend
Suspect I may, yet not directly tell,

But being both from me both to each friend,
I guess one angel in another's hell.
Yet this shall I ne'er know, but live in doubt,
Till my bad angel fire my good one out. (144)

7 Barthes, *A Lover's Discourse*, p. 14.

8 原文是：

A woman's face, with nature's own hand painted
Hast thou, the master mistress of my passion—

9 Oscar Wilde, *The Portrait of Mr. W. H.* ed. Vyvyan Holland (London: Methuen, 1958), p. 68.

10 原文是：

Whoever hath her wish, thou hast thy will,
And will to boot, and will in overplus;
More than enough am I that vex thee still,
To thy sweet will making addition thus.
Wilt thou, whose will is large and spacious,
Not once vouchsafe to hide my will in thine?
Shall will in others seem right gracious,
And in my will no fair acceptance shine?
The sea, all water, yet receives rain still,
And in abundance addeth to his store;
So thou being rich in will add to thy will
One will of mine, to make thy large will more.
Let no unkind, no fair beseechers kill;
Think all but one, and me in that one will.

If thy soul check thee that I come so near,
Swear to thy blind soul that I was thy will,
And will thy soul knows is admitted there;
Thus far for love my love-suit sweet fulfill.
Will will fulfill the treasure of thy love,
Ay fill it full with wills, and my will one.
In things of great receipt with ease we prove,
Among a number one is reckoned none.
Then in the number let me pass untold,
Though in thy store's account I one must be,
For nothing hold me, so it please to thee.
Make but my name thy love, and love that still,

And then thou lov'st me, for my name is Will. (135, 136)

11 此处原文是:

Thou blind fool love, what dost thou to mine eyes,
That they behold and see not what they see?
They know what beauty is, see where it lies,
Yet what the best is take the worst to be. (137)

12 Leslie Fiedler, *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 (revised ed.)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66), pp. 25 – 26。引用诗的原文是:

... O father and mother, grant me this!
May every one hereafter, who comes diving
Into this pool, emerge half man, made weaker
By the touch of this evil water!

13 原文是:

If eyes corrupt by over-partial looks
Be anchored in the bay wehre all men ride,
Why of eyes' falsehood hast thou forged hooks,
Whereto the judgement of my heart is tied?
Why should my heart think that a several plot,
Which my heart knows the wide world's common place?

14 原文是:

... Since your worth, wide as the ocean is,
The humble as the proudest sail doth bear,
My saucy bark, inferior far to his,
On your broad main doth willfully appear.
Your shallowest help will hold me up afloat,
Whilst he upon your soundless deep doth ride;
Or, being wracked, I am a worthless boat,
He of tall building and of goodly pride. (80)

15 原文是:

My thoughts and my discourse, as madmen's are,
At random from the truth vainly expressed:
For I have sworn thee fair, and thought thee bright,
Who art as black as hell, as dark as night. (147)

16 关于通灵者化的问题,参阅 Wyndham Lewis, *The Lion and the Fox: The Role of the Hero in the Plays of Shakespear* (London: Methuen, 1951), pp. 149 – 158。引用部分出自 Wilson G. Knight, *The Mutual Flame: On Shakespear's Sonnets and the Phoenix and the Turtle* (London: Methuen, 1955), pp. 36 – 37。

如何书写男同性恋历史
How to Do the History of Male Homosexuality

大卫·霍尔朴林(David M. Halperin)

性存在(sexuality)[1]的历史研究现已变成一门受人尊重的学科,至少,它已作为一门学科确立下来,从事此研究的学者在捍卫其志业时不再感到压力——有人认为这显然是一门很荒唐的学科,而这些学者把它从各种质疑声中解救出来。从前,"性存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这个说法本身,在很多人听起来就是自相矛盾的:毕竟,性存在怎么会有一个历史呢?然而,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一个观念,即性存在确实有它自己的历史,但我们很少自问的是,性存在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即使当这样的问题的确被提出来,它们也是被马虎对待的——正如历史学家们依照惯例写下学术文章开篇段落,在方法上做出澄清时所表现出的那样。近来,这种做法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义务性的注释,是我们必须提及的一个麻烦,被生活在长久以前、遥远国度的人给当今的历史学

〔1〕 本文译者参考港、台一些学者的译法,使用了"性相"来翻译 sexuality。但本译文集出于整体统一的考虑,编者将其改为"性存在"。在此要感谢译者的理解。——编者注

家们带来的麻烦——因为曾有理论家提出性是被社会地建构的，（据说）这在其时其地是一种有趣的观念；但在当时这一观念被认为是奇谈，而现在人们又不再提及它的贡献了。[1] 当这些宏观历史问题的挑战性潜能被安全地归结为过去，历史学家们现在可以开始（或者说可以回到）“正经的”历史研究了。

可是，这一新的共识及伴随它的理论上的终结，都是不成熟的。我相信，要探讨“性存在如何才能拥有一个历史”，现在比任何时刻都更有助益。请相信，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显示那些质疑者的怀疑或者不信任（好像是说：“这种事怎么可能？”），而是更加仔细地考察，性存在所拥有的历史存在的形态是什么：到底在何种条件下、在何种时间性（temporality）当中、在它的哪些维度或方面，性存在确实有一个历史？

当然，在很多方面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每一种解答都表明了一种不同的策略来详细描述在性存在的历史上，连贯性与不连贯性、身份与差异之间的关系。1980 年代后期建构主义者与本质主义者的辩论，应该被视为寻求此问题答案的努力；但是，即便建构论者宣布取得了辩论的胜利、本质论者宣称揭露了这场争论产生的劣质学术，而其他所有人都对这一争论感到厌倦之后，关于性存在历史性的基本疑问依然存在。实际上，性存在历史研究的现有工作，仍然试图在身份与差异这两极间保持平衡，在我看来，这只是旧有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立场的翻版而已。尽管如此，以不那么引起争端的方式、不那么老式的术语来重提问题，可能是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应该承认任何描述性存在历史性的努力都需要采取某些策略，以便能够同时处理在历史上持续留存的性生活侧面，和历史上记录下来的、关于性经验的不同形式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目前，有些分析模式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们或是在所谓永恒不变的“性存在”中标识出不断变化的范畴或分类；或是坚持在前现代的性行为与现代的性身份之间做出历史区分。但这些都难以充分捕捉那些新的关于性主体性历史中的重要议题之复杂性。[2]

在关于同性恋的历史研究中有些相当痛苦的强大的张力，存在于阐释中不同的强调点：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身份与差异。这些张力不仅反映了在当代对同性恋进行再表现的任何企图都具有高度政治后果，也反映了对于 homosexuality 这个概念定义的彻底不确定性。[3] 对于历史学家们而言，这种不确定性的后果，最明晰的表述见于有关男女同性恋历史的开创性文集《被历史遮盖的》(*Hidden from History*)绪论部分：

> 同性的与生殖器有关的性存在、爱情与友谊、社会性别的越轨，以及一种特定的美学或政治视角，这些都被认为与我们今天定义为“同性恋”的整体特征之间存在着某种(常常是模糊而且总是被挑战的)联系。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有些特征构成了当代的某些同性恋身份——无论是肛交、换装还是亲密友谊；于是许多历史研究就努力寻找这些特征的历史源头。[4]

当代的男女同性恋身份，似乎周旋于一些不同的、不连续的关于肛交、社会性别倒错、同性爱等的各种话语之间；当我们试图回溯它的历史时，它同样——而且似乎更加——游移不定。毕竟，同性恋历史研究中的建构论方法的要义在于：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现代的建构，并不是因为1869年(这一年，同性恋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印刷品中)以前不存在同性性行为，或者对情欲的命名，而是因为前现代和非西方的世界中不存在单一的话语或者经验范畴，来一模一样地概括我们今天广泛定义的同性恋所指——包括同性性行为、欲望、心理和社会交往，以及性别越轨的不同形式。早先有些与同性恋性实践相连的身份范畴，属于今天同性恋的某些话语领域；而其他一些范畴，则跨越着同性恋与异性恋的边界。在同性恋的现代术语和观念被发明以前，这些身份范畴以各种形式历经数千年留存下来。今天定义上的不确定性(比如同性恋是什么，或者男女同性恋的身份特征是什么)，很可能是历史长期积聚、增殖、覆盖的结果。关于各

种男性之间亲密关系形式的话语的历史，可能尤具启发性。因为这些话语随时代变迁而广泛而复杂地发展了；它们浓缩了一些交叉着的思想体系，正是在这些交叉点上我们现在得以找到自己。

接下来我将提供一个策略——我认为它是全新的，我们可以借助它贴近一般意义上的性存在历史，特别是男同性恋的历史。我设计的策略是，恢复一套经过改进的建构主义方法，以此来研究性存在的历史——它充分地揭示超历史的连续性的存在，但又把这样的连续性放在（同性恋的）性存在本身的系谱性分析框架之中来考察。我将从所有人必须起步的地方开始（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也就是说，从同性恋的现代概念开始——这套现代概念或隐或显地限定了我们的感性理解的视野，也无可避免地塑造了我们对于历史上的同性性欲望及行为的提问方式。即便我们采取严谨的学术的态度，如通过在方法上坚持悬置那些现代范畴、用严格的历史主义的精神来发现和鉴别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从而能对早期现象的文化具体性和特定时间内的纯粹性做非简约化的描述，我们也无法摆脱“同性恋”概念的桎梏；但我们至少可以在对同性恋的各种现代定义进行历史追溯时让它们消解。换句话说，对同性恋的系谱性分析，应该从同性恋的当代观念开始（虽然这种观念可能并没有内部一致性），不仅因为这个观念决定了我们如何去考察过去的同性性欲表达，还因为它本身也包含着历史演化的遗痕。实际上，同性恋的现代概念的中心就有内部不一致性，它极其有力地显示着在表面的完整之中隐藏的那些不一致观念的历史累积。系谱学家要分解这些观念，就必须试图通过追溯这些观念的个别历史，它们互为影响、互相交叉的过程，最后还有它们今天是如何不稳定地汇聚在一起的。

我希望在本文中提出一个初步尝试。我试图描述（虽然是尝试性地）一些重要的前同性恋的（prehomosexual）话语、实践、范畴、模式或者典型（真不知该如何为它们命名），勾勒出它们与今天所谓的同性恋之间的相似与相异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必须尽量做到有系统性；也就是说，

我需要辨识出同性恋话语的那些更早的、前同性恋传统——从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从同性恋的现代话语之中，不过我仍然会注意它们之间的交叠和共性。这意味着，我必须非常确定地描述这些不同的范畴，并考虑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尽量描述各个范畴的具体性。我的目标是，在相异、并存的长期话语传统的共时多元性(synchronic multiplicity)当中捕捉各种身份与差异的运作；同时我也希望了解，过去三、四个世纪内，受(同性恋)性话语出现的影响，经历了历时性转变(diachronic transition)的身份与差异是如何运作的。

我不想夸大自己的原创性。已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确认了四种主要的模式，同性性行为就是在世界各地以这些模式而文化地建构起来的：年龄差异模式、具体角色模式、社会性别越界模式和同性恋模式；很明显，这四种模式与本文归纳男同性恋系谱时采用的那些范畴之间有很大关系。[5] 我相信，我的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了明确的系谱学方法而非社会学方法(甚至在更严格的意义上，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并且揭示出欧洲社会和文化传统中一系列固有的话语特点(本文中，我集中讨论欧洲话语的历史，因为我试图建构一个欧洲概念也就是"同性恋"的系谱；但在某些相关的地方，我也囊括了一些非欧洲的材料)。我直接继承了上文提到的《被历史遮盖的》编者们的思路。他们列举的同性恋的三种模式："同性生殖器性存在"或称"肛交行为"，"爱和友谊"或称"亲密友谊"，和"社会性别越轨"或"易装"，与本文中的分类方法有很大关联。

我将阐述，并不存在"男同性恋历史"这么一回事。至少，不存在一个单数的、一元统一的男同性恋历史。相反，我们现今定义为同性恋的内容，至少存在四个相异、共存的范畴或话语传统；它们的历史尚待书写。这些传统中的每一个，都有其在历史上的一致性、独立性、复杂性、特殊性和连续性。这些传统彼此之间不断发生互动，但是每个传统或多或少独立于其他传统而存在，并且它们通过其他形式的排异而参与彼此的建构。它们当中每个传统独立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互动的历史，被近来出现的

(同性恋)性话语遮蔽了,但并未被取而代之。实际上,今天的同性恋指示的,正是不断交叠和增长的历史累积过程的结果。这样的历史过程的结果之一,由依芙·萨芝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著名地概括为:今天的性和社会性别的"不同模式的非理性化共存"。[6]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以一个假设的形式为萨芝维克精辟地描述的现象提供一个历史的解释。我认为如果我们"对同性恋定义的理解……是围绕着一种彻底的、绝对的内部不连贯性来组织的"(85),(基于性与社会性别"不同模式非理性化的共存")那么原因在于,我们保留了至少四种被用来概括男人的性/社会性别越轨的前同性恋模式。这些模式源自一个前现代体系,这个体系中社会性别比性存在更重要;与此同时,晚近的同性恋模式源自于一个现代体系,这个体系中性存在比社会性别更重要(虽然前同性恋模式与晚近模式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如果这套因果关系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当代同性恋话语的系谱——即对同性恋这个范畴的历史批判,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就能够强有力地支持和扩展萨芝维克在《暗柜的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一书中提出的对同性恋这个范畴的话语批判;并且给她所提出的批判一个历史基础(至今为止,这个历史基础还基本不存在)。[7]

我提出的男性的性与社会性别越轨的四种前同性恋范畴,可以暂时如下概括:(1)阴柔(effeminacy),(2)男人/男孩之爱(pederasty)或"主动的"肛交行为("active" sodomy),(3)友谊(friendship)或男性之爱(male love),(4)被动性(passivity)或性倒错(inversion)。第五个范畴,即"同性恋"(homosexuality),是直至现代才增加的。每个范畴都需要加以单独分析。我的分析重点是话语的历史,因为本研究旨在探讨同性恋现代话语的系谱;然而正如本文将要显示的,重点考察话语的历史,并不意味着排斥实践的历史(history of practices);两种历史的关系为何,有待研究者详加考虑。

在本文开头,我希望强调,选择用来命名前四个范畴的名称都是探索

性、假设性、临时性的。我指定的这些名称并不是合适的历史性描述语——不过,它们怎么可能是合适的历史性描述语呢?它们纵贯了不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啊!我对这四个范畴的定义,也并非要去说明这些用语在历史上的含义。比如说,sodomy 这个词——"一个完全混淆的范畴",[8] 在历史上曾被用于描述手淫、口交、肛交和同性性关系,还有其他各种现象。而我使用的第二个范畴("active sodomy")则指向非常具体。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 sodomy 一词在历史上具有多种含义,而是现在还没有一个现成的词能够命名这种特定的模式和结构,我用主动肛交来特指男同性恋关系的某种特定模式或结构。很遗憾,我目前还未想到更好的替代用词。交代完这一些,让我开始进入正题。

阴柔时常被认为是所谓男性性倒错的标志,同时它还会造成跨性别或性角色颠倒,其结果是导致同性欲望的产生。尽管如此,将阴柔与男性的被动性、性倒错和同性恋区别开来,这是很有用的。尤其是,阴柔应该与男性同性性欲对象选择或同性性偏好明显区分开来。这不仅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阴柔气质的男子并非就是同性恋,同性恋男子也不一定就有阴柔气质),而且,阴柔的问题值得单独处理,这是因为它本身长期以来被当作所谓异性恋或同性恋欲望过度的症候。由是,它自己就是一个范畴。

阴柔不一定就意味着同性恋。在欧洲多种文化传统中,一些男人被认为是"柔弱的"或"缺乏男子气的"(unmasculine)(希腊语中的 malthakos,拉丁语中的 mollis 及其罗马派生词)既可以是因为其倒错也可以是出于病态——既可以因为他们像女人,或者跨越性别,喜欢被别的男性插入;也有可能反过来,因为他们过分喜欢追求女人,偏好爱的柔情甚于战争的蛮力,从而偏离了男性社会性别规范。在欧洲军队精英文化里,至少从古代社会直至文艺复兴,标准的男性特质要求苦行,拒绝欲望,控制对愉悦的冲动。(美国曾经风靡一时的校园风云人物,即橄榄球队员,他无限钟情于热水澡、冰啤酒、开快车、频繁更换女人,如果放到这种文化里,他就不是男性

特质的象征，而是其堕落的反面——阴柔的怪物。）一个男人在战争中展示其勇气，更多时候在与其他男人争夺荣誉时展示其勇气，比如在政治、商业和其他竞争性行业中。那些拒绝接受挑战的男人，那些拒绝与其他男人竞争反而与女人发展情感联系、追求愉快的生活、喜欢做爱而不爱作战的男人，他们身上体现了经典的阴柔类型。这种类型化特征似乎仍然存在于美国南部文化中，在那里，“同性恋乡巴佬”（redneck queer）指的是像“阿拉巴马州来的、爱女人胜过爱足球的男孩子”那样的人。[9] 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澳大利亚白人当中，在那里，真正的男人要避免跟女人结伴，他应该喜欢整天跟男伙伴呆在一起（这才能说明他是异性恋）。

这一类型可以追溯到古代——用今天的异性恋/同性恋观点来看，这未免很怪异。对于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一个人沉迷于女色，不一定能增强其阳刚，反而常常会削弱它。为了取悦女人，这样的男人很可能努力使自己变得光鲜不粗野，优雅而非孔武有力，甚至有可能施以脂粉和香水，精心地修饰自己，穿得珠光宝气，以获得某些阴柔风格。在被认为是卢西恩（Lucian）所作的一段古代晚期对话中，两名男子争论到底是女人还是男孩更适于作为男人的情欲愉悦的对象，那个鼓吹男孩才是性欲对象的人，往往被描绘得极为阳刚；而那个为追求女人辩护的人，一个英俊的男子，他被描绘成“具有熟练的化妆术技巧，以便吸引女人”。[10] 同样地，在古希腊文学传统中，通奸者的刻板模式通常可以从这类描述中看出来（比如希腊散文家查立顿[Chariton]罗曼史中描述的）：“他的头发焕发出光泽、香气袭人，双眼精心描画，他披着柔软的斗篷，穿着上好的鞋子，斗大的指环在指间闪烁”。[11] 传统上，阴柔被认为是男人异性恋（性欲）过剩的标志。

那些喜欢男人的男人看上去似乎有些粗野。他们也许喜欢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温柔体贴，但却不喜欢这些品质出现在成年男子身上。相反，女人们觉得气质柔弱的男人更具吸引力。这就产生了男人的社会性别规范

和情欲生活之间的某种矛盾。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赫拉克勒斯(Hercules),这个例子说明了传统上强硬的与柔弱的男性特质形式之间的冲突。赫拉克勒斯是一位英雄,在极度男性特质和阴柔两极之间来回游动:他具有超自然的强壮身体,然而他也被女人(即 Omphale,翁法勒女王)奴役。他的武功远胜所有男人,却也为爱痴狂,无论对女人(Iole)还是男童(Hylas),皆是如此。[12]赫拉克勒斯的形象为某些现代人物、诸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奠定了基础。莎士比亚宣称,《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中的安东尼在文学上的先祖便是赫拉克勒斯。安东尼出走他统治的罗马帝国,与克莉奥佩特拉一起过着激情的、纵情声色的生活,他也因为身上的阴柔而受到了类似的责难。从戏剧一开始,统治者和情人的角色就一直被塑造成相反的,安东尼被描绘为"这个世界的顶梁柱/变成了一个被妓女愚弄的人"(1.1.12—13)。安东尼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并非独一无二。奥赛罗身上也有类似焦虑,反映了夫妇之爱能够导致军事将领的无能。然而,这种张力最明显的例子出现在罗密欧这个人物身上,罗密欧斥责自己缺乏尚武的热情,并且引用了爱情之阴冷潮湿的忧郁与男性美德之火热干燥的本质之间的传统对立。他说:

> 亲爱的朱丽叶啊!
> 你的美丽使我变成懦弱,
> 磨钝了我的勇气的锋刃!(3.1.11315)[13][1][13]

阴柔的不同概念之间的历史留存与互动,也许有助于解释诸如兄弟情谊、军队、教会、公司董事会、议会这样的男性主导的机构组织,时至今日依然被赋予一种性暧昧的印象:人们是否认为这些地方培养的和表达的男人

〔1〕据朱生豪译本。——译注

身份是男性特质最真实、最重要的形式？抑或是男性特质的一种特殊的、或者是奇异的变态？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把阴柔与同性恋分开。我现在讨论第二个前同性恋范畴：男人/男孩之爱或“主动的”肛交行为。这些用语指一个男性对一个低层的男性的性插入行为。所谓“低层”，指年龄、社会阶级、社会性别类型(gender style)和(或)性角色上的“低层”。男人/男孩之爱或“主动的”肛交行为的话语发展，取决于男性的插入欲望与被插入欲望之间的重要区分，以及男性性倒错与男人/男孩之爱或肛交行为中的被动性之间的区分。两者的反差反映在我命名的五种范畴中的第二和第四种范畴之间的区分。

19世纪的性学家对男人/男孩之爱(希腊之爱[Greek love])和被动性(反面的性欲感觉或性本能倒错的系统性阐述，其基础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区分——perversity与perversion。[1] 根据这一区分，倒错的、跨社会性别的或被动的性倾向，代表了一个男人的变态，而对从属一方的性插入行为有可能只是一种恶习。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医学专著作者，当时大部分人尚未接触到关于同性恋/异性恋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才上升并压倒此前的性区分)，他们主要的兴趣是，探讨反常的性行为是否因为个人精神上的堕落特征(perversity)——也就是说，它们是否只是恶习的结果而可以用法律和惩罚犯罪的方式加以约束；或者，他们是否源于一种病态的情形(perversion)、一种精神上的疾病、一种变态的“性”，而只能用医学的方法加以治疗。对于这一区分，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解释如下：

> 性本能变态，不应跟性行为中的堕落混为一谈；因为后者有可能是由境遇、状况而非精神病患引起的。具体的堕落行为，无论多么荒

---

[1] “perversity”是“perverse”的名词，是指错误的或相反的固执恶习；“pervert”(perversion)则指有堕落变态色彩的倒错。——译注

谬，都无法从临床上加以确诊。为了把变态（perversion）和恶习（perversity）区分开来，就必须调查一个人全部的人格特征以及导致其变态行为的原始动机。[14]

男性对于“低层”男性的性插入，的确曾经被视为错误行为，但不是每一个这样的例子都表明这是性本能的变态或是影响着“整个人格”的精神疾病；它有可能是指一种道德上的恶劣品格，而非病理状态。

这一学说暗含了一种前提，即认为男性对另一名低层的男性的性插入本身，未必就是什么性反常或心理反常。如果一名男子在性交过程中扮演“主动的”性角色，只要他不寻求被其他男性插入，同时/或者只要他依然跟女人保持性关系，那么他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感知和行动方式方面，是传统上意义上的男性的——他可能是不道德但并不是病态，他可能是恶劣的但并不是变态。他插入另一名男子，也许应该受到谴责、令人生厌，仍然可以被认为（虽然过度的）属于正常男性欲望。相对早期的浪子、放荡者的贵族人物一样，[15]这样的男人固执地拒绝别人（通常都是所谓大自然的规定）限制他选择获得性快感的多种方式，他追求更不寻常的、非法的、复杂的、精致的性体验，以满足他无限的性爱好。这种情况下，男人/男孩之爱与肛交行为是不道德品质的标志，但远非人格紊乱、“精神失常”或心理变态。[16]

性学家对恶习与变态、不道德与病态、品行不端与疾病所作的区分，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有点维多利亚式地古老过时。然而，时至今日，杰出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理学家仍然在采用类似的区分，诸如“假性同性恋”/“同性恋”，或“条件性的、机会性的同性恋”/（缺乏更好的词汇，姑且用他们的话来说）“真”同性恋之间的区分。[17]比如，那些在监狱外过着异性恋生活的男人，他们在监狱中进行同性插入行为，通常这并不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精神性欲倾向病征，也不是色情欲望的表达，甚至也不被看作“同性恋”，而只是男人在一个没有女人的环境里的一种行为上的适应调

整。今天人们常常相信，这样的行为仅仅说明，男性有能力享受不同的、不好的性满足形式，[18]并且这还说明男性有能力将等级制性欲化，由于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关系中扮演一个强势角色而感到性兴奋。

我从19世纪的精神病学推导出来的这种今天仍然存在的男人/男孩之爱与性倒错的区别，并非源于维多利亚时代。毋宁说，它反映了一种古老的实践，这种实践按照插入/被插入，高阶/低层，男性特质/女性特质，主动/被动来将各种性关系分类，也就是说，按照等级制和社会性别，而不是按性和性存在来分类。早在公元前2000年晚期的铜器时代希腊克里特文明时期的地中海盆地，[19]迟至公元14至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都能找到相关证据，证明男性中存在着根据年龄构成的、有具体角色的、等级制的性关系模式。最著名的也是完全被记录下来的历史档案足以证明这种模式存在的，也许莫过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男人/男孩之爱和早期现代欧洲的肛交行为的例子。然而，这个模式似乎存在得更早，并且比这些例子的寿命更长。15世纪佛罗伦萨地区法律档案中记录了非常详细的证据，使我们得以观察一个（毫无疑问是声名狼藉的）前现代欧洲社区内肛交行为的广度和分布情况。从1432年至1502年，在佛罗伦萨全部人口40000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中，有17000人——大多数是男性——被正式法律定罪至少与人发生过一次肛交行为：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内年满40周岁的人中，每三个男人中就有两人因为鸡奸行为而被正式定罪。在那些被判罪的人当中，年龄在18岁或以下的约占“被动”者的90%（根据佛罗伦萨的观念，这些被动者包括口交行为中的插入者和肛交行为中的被插入者），93%的“主动”者年龄在19岁或者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人年龄在30至35岁以下，正值习俗上男人已结婚的年龄段。[20]

这是一种有等级的性，它不是互惠的；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的服务，不是共同追求、分享愉悦或纯粹的、私人的体验（即，并非抹去以年龄或社会地位为基础的、大的社会身份的私人体验）。此时，性，暗示了差异

(difference)而非身份(identity),并且开启了劳动的系统分工。年轻的一方被认为更有性魅力,年长的一方对年轻的一方有性的欲求。虽然,这种关系并不缺乏爱情、亲密感和温柔,但是,情欲激情与性愉悦的分配多少是不平衡的:年长的、"主动"的一方是欲望的主体,从年轻的一方——性的客体——那里得到了更多的愉悦,年轻的一方感受到的愉悦无法与之相比,在接触中也无法产生与对方等量齐观的愉悦(除非他是性倒错者或病态者,属于我归纳的第四个范畴)。因此,年轻一方得到的回报必须是其他范畴的——比如赞美、资助、礼物或者金钱——而不是愉悦来补偿。作为一种情欲体验,男人/男孩之爱或肛交均仅仅指"主动的"一方。[21]

这种传统的、等级制的男性性关系类型,代表了没有性倾向的性偏好。大量的古代文献证实,男人当中存在着一种自觉的情欲偏好;这种情欲偏好的人只与一种性别而非其他性别的人性交,甚至达到了排他的程度;[22]确实,色情文学中存在一种古老的亚类,其中包含了两个男人的正式辩论,他们讨论女人还是男孩谁才是满足男人性欲的更好的工具。传统的男性上流社会的高典华章当中,都充满了这样愉快的讨论,比如古代晚期的希腊散文、中世纪欧洲和阿拉伯诗歌和散文,中国帝国晚期的作品,以及 17 世纪日本反映市镇生活的"浮世"作品。[23]

但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出现的明确、自觉的情欲偏好,不能与性倾向画上等号,原因起码有三点。第一,这种偏好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表达了男性主体的价值以及他喜欢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非自愿的精神性欲状态的病征。表达出这些偏好的男人常常认为,至少在名义上他们能够同时被容貌姣好的女人和男孩的性魅力所吸引。性欲对象的选择是一种伦理或美学上的表达,也是一种情欲鉴赏的演练,而不是性存在的反映。它更像是素食主义而非同性恋。第二,在此语境中,同性性欲对象的选择本身(或在这些选择之内)不一定具有标识差异的功能,一个人也不会因其"性存在"而有别于其他男人。最后一点,在此情况下,我们无法根据一名男子的身体外观、人格怪癖或者举止,来判断他是否选择同性作

为性欲对象，也无法判断他是否拒斥男性特质。[24]

尽管如此，男人/男孩之爱者或肛交者确实给男人提供了一种方式，以表达和讨论他们的性口味，探索他们的情欲主体性，比较他们的性偏好。有社会权力的、地位高的、具有传统意义阳刚气质的男性，他们的社会优势位置在情欲生活中得到了反映，在此情况下，男人得以表达一种自觉的情欲偏好，他与男孩或女人发生性关系，有时会达到只与某一性别的人有这种关系的程度。高度发达的、仪式性的、高度公开的求爱和调情实践，为那些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男性提供了一个传统的、社会认可的话语空间，在此话语空间里，这些男性得以表达自己的性偏好并将自己表现为自觉的欲望主体。

这一点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非常重要，但长久以来尚未得到揭示。约翰·柏斯维尔(John Boswell)曾经把所有同性间"与自觉的偏好联系在一起的情欲倾向"定义为"同性爱性存在"，这个观点非常有影响。他认为，只要在前近代欧洲找到一名男子对其他男性产生自觉的情欲偏好的证据，他就能记录下那一时期同性恋性存在的存在。[25]当然，自觉的色欲偏好的证据确实大量地存在着，但是，人们一般只能在关于男人/男童之爱与肛交者的等级制关系中年长的一方的话语情境中发现它。因此，这些证据并不指向同性恋性存在本身，而指向一个特定的话语和一组实践，这些话语和实践组成了我们目前所定义的同性恋性存在的一个方面。对一种自觉的色欲偏好的宣言，这在我们讨论的其他三种传统的男性同性情欲话语和社会性别反常的话语中非常少见。因此，自觉的同性色欲偏好，不应该被等同于同性恋性存在或男同性恋的全部，它仅仅代表了几种历史传统中的一种。[26]

远离了地位高的男子对低层地位男子的性插入行为所形成的那个等级世界，还有一个男性友谊与爱的世界，那里有一种同样古老的话语传统。请相信，男性友人的社交关系中，等级制并不总是缺席的——从巴比伦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中的吉尔伽美什与安奇度

(Enkidu)、《圣经·撒母耳记》中的大卫(David)与约拿单(Jonathan)、《伊利亚特》中的阿基里斯(Achilles)与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一直到晚近的美国黑白种族警匪惊悚片,男性的友谊模式常常显示出惊人的不对称模式。[27]正因这种友谊由社会差别或权力不平等决定,正因两者间有近似于一种庇护关系模式——在此关系中两位"友人"被指派了全然不同的责任、姿态和角色,这种友谊(那时以及现在)有可能被阐释为男人/男孩之爱(pederastic)或肛交者关系。[28]我们看到,在男性世界中,等级制本身是性感的(*hot*):它至少与色欲意涵的潜在可能性不可分割地捆绑在一起。因此,男性密友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展现出一种直接的、无可遁逃的色情意味。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伊利亚特》出现后的三四个世纪里,古典时期的一些希腊人把阿基里斯与普特洛克勒斯视为一对男人/男孩之爱的伴侣(尽管他们对于谁是男人谁是男孩有不同的看法),而更晚近的一些学者对大卫和约拿单是否是同性爱人争论不休。这些争论常常有其漫长历史,并且倾向于把友谊的观念、色欲或肛交行为的等级观念与有关同性恋的观念合并到一起。因此,我们若能把友谊跟情欲的等级观念、同性色情欲望区别开来将会是有益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勇士传统(故事中勇士的下层男性友人或伙伴总会死去)和男性友谊的庇护模式,还有一种传统强调男性之爱的平等、相互依存和互惠的性质。只有在两个男人属于相同的社会等级(通常是精英阶级),并且在年龄、男性特质和社会权力等方面情况相同时,才能达致这种平等。在《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第八、九卷中,亚里士多德支持的恰恰是男性平等关系中友谊的互惠模式。他写道,最重要、最要好的朋友是"另一个自我"(allos autos 或者 alter ego)(9.4[1166 a 31])。多少世纪以来,这种情感在不断回响——真正的朋友是自己的一部分、与自己不可分割,真正的朋友之间一心一意。蒙田在《论友谊》(*On Friendship*)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心灵叠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浑然成为一体,令二者联结起来的纽带已消隐其中,再也无从辩认。"[29]品德高尚

之男士间的友谊以无私的爱为特点，这种无私的爱导致彼此个体的身份的融合，因而在生活中不情愿离开对方，是随时准备与对方共赴生死，或者为对方而死。我们从此类再表现中不断重复地发现男性生死之交、不可分离的主题——从古代世界的阿基里斯和普特洛克勒斯、俄瑞斯忒斯(Orestes)和皮拉得斯(Pylades)、特修斯(Theseus)和庇里托俄斯(Pirithous)，到现代世界《致命武器》(*Lethal Weapon*)中的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和丹尼·格洛弗(Danny Glover)。

对于现代人的敏感度来说，用于传达此类激情的男性结义的语言，如果不是赤裸裸色情的话，也常常过分得让人生疑。像蒙田写道的那样：

> 倘若有人硬要我说出为什么我爱他，我会感到不知如何表达，而只好这样回答："因为那是他；因为这是我……这种东西无以名之，它控制我的全部意愿，使之与他的意愿融合在一起，消失到他的意愿中去；它也支配着他的全部意愿，使之与我的意愿融合在一起，消失在我的意愿之中——以同样的热望，同样的追求。我说'消失'，那的确如此，因为我们两人没有保留自己任何东西，属于他的，属于我的，都没有。我们齐心协力，如此和谐，以热烈的情感彼此相待，以同样的赤诚肝胆相照，并且达致我们内心深处；我了解他的心，如同了解我自己的心；我信赖他，胜于信赖我自己。"[30]

同样，德莱顿(Dryden)写于1677年以罗马为主题的戏剧《一切为了爱》(*All for Love*)中，安东尼对他的贵族友人多拉贝拉(Dolabella)说：

> 我就是他的灵魂，他存活于我的体内。
> 我们的胸膛如此接近，最初将我们连成一体的铆钉不可寻踪，
> 它并未将我们连成一体，我们原本就我中有你
> 如同汇合的溪流，我们迷失其中，属同一群体，不可与授，也不可分离

我们如同一物，他就是我，我就是他。(3.9096)[31]

现代人严重依赖于人格、有意识或无意识欲望这些心理学模式，对于违反异性恋男性特质的任何东西我们都高度紧张。因此，要避免将男性之爱的热情表达解读为某种关于"同性情欲"(如果不是"潜在的同性恋"的话)的暗示，这是困难的——我们常常用这样的错误解读来解决自己在阐释历史材料时的困惑。除了在进入前现代主体的情感生活时遇到的困难，我们还需要认真对待话语的情境；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充满激情的宣言产生出来。对于个体身份的模式与融合的坚持(虽然这很可能激发起现代读者内心的异性恋浪漫爱情模式，例如，《呼啸山庄》中凯茜说的"我是希斯克利夫")，实际上将男性友人间互惠之爱的誓言置于一个崇高的，甚至是深具魅力的英雄同侪情谊的传统中：恰恰是通过消除朋友一方屈从于另一方的任何线索，以及任何关于等级制的暗示，关于两个灵魂融为一体的强调事实上把这种爱恋与色欲激情分割开了。蒙田对此从未流露出任何一点怀疑，在他关于爱人德·拉博埃西(Etienne de La Boétie)的文章里，他所表达的情感是完全正常，甚至是令人羡慕的、值得夸耀的(当然他们的个案较为独特)。蒙田没有精神病理问题，他在不经意间向我们透露其压抑的、无意识的欲望以及色情偏好的蛛丝马迹(在他的《随笔》其他地方他做了自由的表达)；蒙田似乎早已明白，对于友谊的评论将避免那些有损声名的误解，部分原因在于，作者与其爱人的关系被巧妙地表现为一种平等主义的、非等级的、互惠的爱。正是通过此一方式，他将这种爱从差异和等级的情欲领域中剥离出来，明确地将其与男女性爱、男人享受男孩的性愉悦等区别开来。

至少从男性世界的文化视角看来，性爱就是插入，因此它就是与地位有关的——优越与低下、级别与层次、社会性别与差异。反之，友谊是相同性的问题——同样的等级和地位、同样的情感、同样的身份。在其最初

的社会和话语情境中，正是由于强调了身份、相似性、互相性，友谊的传统才得以与性爱领域分割开来。那么，为什么要在男同性恋的系谱中包括友谊的传统？因为它为在社会上有权势的男性确立了一个话语的场域，在避免社会谴责的情况下表达热烈的情感和相互的爱；而同性间的激情与相互之爱，是我们今天所谓"同性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男人/男孩之爱与肛交行为、友谊与爱情都与男性的社会性别规范相符合，也与许多欧洲文化所定义的传统男性特质相符合。只要表达的是男性主体的阳刚，并且暗示拒绝所有女性的，那么男人/男孩之爱与友谊在传统上都是男性化的。因而，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巩固男性社会性别身份（当然，并非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同样地，它们与希腊的 *kinaidia*（性倒错）、罗马的 *mollitia*（同性恋感受力），以及 19 世纪性学家们所谓"反面的性欲感觉"（contrary sexual feeling）、性倒错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道德和社会本质。而后面这些词汇指男性的"倒错"，或者男性社会性别身份的颠倒；指全然放弃男性的阳刚而投向女性特质；指一个跨社会性别状态，这种跨社会性别状态表现为个人举止、风格、身体外貌、感觉方式和对"正常"男人的性兴趣等各个方面；还指在与"正常"男人做爱时，偏爱被插入的或"被动的"角色。

被男人性插入，这在被动者的或倒错者的性分类中的重要性远远低于被插入男性的快感的问题。在男人/男孩之爱和肛交行为的前现代系统中，男孩并不会从性交中获得多少快感：他们或多或少只是自愿成为成年男性欲望的客体而已，但他们在常规上并不获得与其成年的伴侣平等的欲望，人们也并不认为男孩应享受被插入的行为。虽然就其行为来看，他们是"被动的"一方，但就全部性爱活动的情绪和态度来讲，他们又不是被动的——他们并未在屈从的前景或行动中获得性兴奋；他们被各种更大范围内的非性爱因素动员起来（比如礼物、威胁），服从其男性爱人。因此，他们的"被动性"并未延伸到他们的欲望领域，而欲望也没有投入到性爱活动中，因此，他们可以声称，他们的欲望并未受到屈从的冲动或"女性

特质”的痕迹的玷污。相反地，*Kinaidoi*[1]与性倒错者非常渴求将他们的身体“被动地”被男性插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被视为拥有女人的欲望、主体性和社会性别身份。而男性被动性或性倒错这一分类，具体地适用于那些处于屈从的男性，他们愿意被别的男人插入，这种欲求不是来自非性爱动机，而是来自他们自身的色情欲望和（或）其自许的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

尽管被插入者享受性快感可能是非常可耻的，倒错是男性性倒错者中最为极端的社会性别倒错之表达，但它并不一定，也不主要是由享受特定的性行为来定义的。它不一定严格地与同性恋欲望有关，因为性倒错者也有可能与女人发生阴茎插入的性行为但仍然被看作倒错者。毋宁说，倒错与乖常和社会性别认同、情感以及个人风格有关，其表现之一是，他“像女人一样”喜欢在与其他男人性交时扮演被动角色。因此，倒错的概念不在于严格地将特定的倒错性行为与其他同样显著地违反男性特质规范的行为（比如穿女性连衣裙）区分开来；重点在于，这些行为都违反了男人身份的常规，这是一种很严重的人格缺陷；即便与女人发生性关系、从中得到快感，也无法补偿这种缺陷（而肛交行为则可以弥补）。性倒错与性无关，而与社会性别（gender）有关。[32]

接下来的问题是，阴柔跟被动性的差异何在？如何才能区分（我所列第一个范畴中）那些喜欢做爱而不喜欢打仗、实践一种“阴柔的”男性特质的男人与（我所列第四个范畴中）有“阴柔”举止的、希望把自己“女人般”的身体献给其他男性使其获得阳具快感的男人？其实差异非常细微，也很容易混淆。毕竟，对社会性别乖常和阴柔的污名同样适用于这两类男人。男性的与女性的两极化定义，以及性刻板模式的夸张本质，使得社会性别乖常的任何蛛丝马迹被立刻放大、变形，进而被指控为一种根本的、完全的社会性别反叛。根据这种男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逻辑，喜爱女

---

〔1〕 希腊语中指“被动的男人”，拉丁语中的 cinaedi。——译注

人和想要像女人一样这两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这也是为什么“阴柔男人”跟“被动者”(“变态者”)都被视为是“轻软的”或没男人气的。社会性别乖常的相关词汇被无区别地运用于“阴柔男人”和“被动者”身上,这使得现代研究者对于两者的区分变得复杂。

描述“阴柔男人”与“被动者”之间区分的方法之一是,把社会性别乖常的普适化概念与一个界定少数人的观念进行对比。“柔软”既可以代表潜在的社会性别失败之幽灵——困扰着所有规范性男性特质,并不断地威胁每个男人的男性特质,也可以用来代表一小部分乖常的个人的变形的特征。[33]“阴柔男人”指的是这样一类男人:他们屈从于一种所有正常男人都具有的,但所有正常男人内心都不得不提防、压抑的倾向;与此相对,“被动者”指另一类男人:他们是如此无力对付这种挣扎,以至于他们可以被看成是有特别的、构造上的缺陷,也就是说,他们缺乏男人抵挡愉悦欲求的能力(尤其是那种被社会普遍认为特别可耻的、不名誉的愉悦),他们也倾向在与其他男子的关系上采取特别女性化的顺从态度。

正是这些特点——甚至比欲望和性客体选择更重要——定义了所谓倒错,因为欲望和性对象的选择并非仅是性倒错者所独有的。比如,性倒错者对于男性伴侣的欲求,与男人/男孩之爱者、英雄友人的欲求是一样的,但是这些人与他在社会地位与道德地位上已经和他是两个世界了。性倒错者与男人/男孩之爱者、友谊的区别还在于,对男孩和朋友的爱不一定是一种有损名誉的情感,这种情感有可能被公开表达,甚至得到主体自身的积极捍卫;而性倒错是一种卑贱的状态,个人从不对之予以赞美的状态,它总被那些试图贬低和诋毁这种状态的人归结为另外的什么东西。

此外,传统上对“主动”的男人/男孩之爱者和肛交者的再表现,不一定把他们描绘为外表上与正常的男人有什么差异。爱慕男孩者和肛交者没有什么标识。相反,倒错者总是明显的,因为他的社会性别反常影响了他个人的样态并塑造着他的态度,姿态和举止。与男人/男孩之爱者不同(男人/男孩之爱者与爱女人者只是在色情偏好上有区别但并不因此把他

标识为一个不同的人),被动或倒错就印在一个男人的全部社会表现上、并把他显示为一个特别反常的社会类型。正是在性倒错的语境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被制造出来的、精心描绘的特定类型或刻板定型,那些带有恐惧心理的讽刺手法,被用来呈现那些可见的、令人讨厌的男性之性欲/社会性别乖谬特征。虽然这种类型是附属于同性恋性欲的,但又不完全附属于同性恋性欲,因为它并不怎么跟男人/男孩之爱或者“主动的”肛交行为联系在一起。毋宁说,它似乎与被动的或受动的同性恋性欲有关,仅仅被视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性别倒错的其中一方面而已,是一种对男性特质的潜在背叛。[34]欧洲关于性的再表现的历史,一贯强调性倒错者的乖谬形态,强调性倒错者外表和衣着上明显的不同模式,以及其自我表现的女性风格。性倒错者总是在外表上表现出自己的特征。

常言道:同类相识。但在此则相反。人人似乎都知道性倒错者的长相和行为举止是什么样子的,尽管没有正常的男子能去模仿他们。正如古希腊一出喜剧中的人物说的:“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发出喋喋不休的声音,如何以一种娘娘腔的方式走路,让我的头向一边斜翘,就像所有我在城里看见的那些抹除毛剂的病态者。”[35]同样,古罗马演说家昆体良(Quintilian)谈到“脱了毛的身体,柔弱的步伐,女性化的服装”“表明这个人是*mollis*[具有阴柔气质的男人],不是一个真男人”。[36]古代那些长于帮人看相的相士,他们有一套更为详尽的关于此类人的描述:

> 你可以通过多愁善感的眼神,睁得大大的、转得很快的眼睛来识别这一类人。他的双眉紧蹙,眼珠和双颊总处于运动状态。头斜向一边,摇摆着腰身,乏力的四肢从不会保持静止。他操着碎步跳跃向前,膝盖靠着膝盖。他的手掌总是向上翻。目光游移不定,声音尖细,带着哭腔,有气无力。[37]

所有掩盖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抽搐的嘴角,转动的眼珠子,任

意不协调地迈步，他们臀部的动作、乱摆的手臂，颤抖的声线，连说话都有困难，这一切令娘娘腔很容易被人看出来。”[38]

但是，揭露性倒错者的能力并不仅局限于那些有特长的社会性别侦探。古罗马将领西庇阿·伊密连那斯（Scipio Aemilianus，公元前 147 年任执政官，前 142 年任监察官）轻而易举地把对手打上如下记号：“对于那些每天对镜打扮、涂抹香水的男人来说，他们除去自己的眉毛，剔除胡须和腿毛后四处招摇，当他年轻之时，他在宴会上斜靠着自己的情人，穿着长袖的束腰外衣，就像爱美酒一样爱男人难道有人会怀疑他们正在做西拿第（cinaedi）〔1〕习惯做的事情吗？”[39] 当然，这难以启齿的“西拿第”干的勾当，指的是身体被插入的行为。

倒错行为的特定标记，可能与文化有关联，因此容易受时代变化的影响，但是，性倒错者容易被人辨别出来，这是其经久不衰的特点之一。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娈童”（catamite）（根据尚存疑的语源学解释，人们常常认为这个词表示鸡奸行为中被动的一方）被认为是另一种非常“明显”类型，他们看上去像是穿中世纪服装的古罗马性倒错者。下面要举的例子，乃是 11 世纪末 12 世纪初，英国威廉二世法庭上一位叫奥尔德里克·维塔尔（Orderic Vitalis）的僧侣兼编年史家发表的回顾性评论：

> 在那个时代，世界许多地方的娘娘腔者都惊世骇俗：注定要被施以火刑的邪恶的娈童，纵情声色，恬不知耻地沉迷于猥琐的鸡奸。他们拒绝做一个正直的男人，奚落牧师们的劝告，坚持他们粗鄙的生活方式和着装打扮。他们像女人一样把发绺自头顶分成两股结于前额，留着华丽的长发，喜欢穿修长的、过紧的衬衫和束腰外衣。[40]

如此看来，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亨利三世时代比之威廉二世时代，只前进了

〔1〕 cinaedi 为古罗马城市的亚文化圈，特指选择被插入性交方式的被动男性。——译注

一小步。1576年，一位评论者愤怒地评论国王身边那些"女性化的、穿戴放荡"的"宠儿"(mignon)——奴仆(minion)，或"亲爱的人"(darling，"娈童"[catamite]的同义词)，他谈论道："这些柔美的宠儿披着长发，卷曲的发梢经过了精心编织，头上戴着小帽子，就像妓院里的娼妓。"[41]

一个半世纪之后，伦敦人给"花样男子"(molly)画了一幅惟妙惟肖的画像，这些娘娘腔男人秘密地聚集在名为"莫利屋"的地方。道德改良运动领导者塞缪尔·史蒂文斯(Samuel Stevens)1725年11月写道：

> 我发现，一些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的男性在做爱(他们把这种行为称为做爱)。有时他们会坐在彼此大腿上，猥琐地亲吻和爱抚。然后起身跳舞、行屈膝礼，模仿女人说话……接着他们会拥抱，玩耍，成双成对地走到同一层楼的另一间屋子里，(用他们的说法)举行婚礼。

还有一则关于"莫利屋"的原始材料是一份化妆舞会的记录：

> 这些男人把对方成为"亲爱的"，拥抱、亲吻、互相搔痒逗弄，就好像他们是淫荡的男女混合体，他们像女人一样假声假气……有人穿上长袍、衬裙，包上头巾，穿上精美的镶边鞋子，镶边丝巾和面具，有人穿斗篷，有人穿得像挤奶女工，还有人像牧羊女一样戴上绿色的帽子、背心和衬裙，还有人在脸上遮以斑纹或油彩，套以大裙撑的裙子，这都是时新的打扮。[42]

在文学上，此类刻板印象也得到了呼应。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兰登传》(1748)中的威福船长(Captain Whiffle)就是其中一例。但是，正是约翰·克雷蓝(John Cleland)《一个欢场女子的回忆录》(也写于1748年)中的一个人物使得这些传统的观点能够与现代的病理化话语

衔接起来。正如她说的,“那些患瘟疫的人身上都会有看得见的斑点”。[43]

恰恰是这些情欲恶瘤的受害者们——他们身上有着可见的瑕疵——为19世纪后半叶的神经学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提供了临床基础;在此基础上,系统性的科学概念、病态的(或异常的)性倾向定义才得以第一次建立起来。1869年8月,印刷品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个词的同年,德国“神经疾病”或“神经系统”专家卡尔·弗雷德里克·奥拖·韦斯特法尔(Karl Friedrich Otto Westphal)发表了一篇关于“反面的性欲感觉”或“感受力”(conträre Sexualempfindung)的文章,文中将这种感觉定义为一种神经病态的或心理变态的状态。[44]专家们不断争论,应该如何科学地命名这种状态。到了1878年,意大利专家阿里戈·塔玛西亚(Arrigo Tamassia)已经提到“性本能的倒错”(“inversion of the sexual instinct”),这一命名后来证明比韦斯特法尔的说法要流行得多。[45]但是,我们不能被这些术语发明的热潮所欺骗:尽管有了这些新颖的名字,医生们忙于建构的这些变态倾向状态,与自古以来那些受污名的“娘娘腔”(kinaidos 或 cinaedus)、花样男子(mollis)、“娈童”(catamite)、“病态者”(pathic)、“奴仆”(minion),或“懦夫”(molly),根本就是一回事。[46]正是这个古老的“民间”范畴,通过现代的性学概念工具,得以重新建构为一种性和社会性别乖谬的新的科学分类,一种精神性欲倾向(psychosexual orientation)。

但是那时性倒错如果真是一种倾向(orientation)的话,它仍不同于所谓的同性恋(homosexuality)。比如,“反面的性欲感觉”(contrary sexual feeling),试图表示一个人与其性别(sex)相反的性感觉经验,即一个人感到自己属于与自身性别不同的性别,同时,也感到一种情欲吸引力与其本人所属的性别不一致。(因为这个性欲对象为同性成员,也因为这个情欲所表达的男性的或者女性的态度仅在与自己不同的性别身上才是妥当的。)与其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韦斯特法尔并没有在性乖常(sexual deviance)与社会性别乖常(gender deviance)之间做出系统性的区分。被

同性所吸引意味着与异性的认同，与异性的认同有时表现为一个人感到自己被同性所吸引。在这一点上，韦斯特法尔复制了他自身所处文化的那套假设，同时也受到了卡尔·亨利希·乌尔利克斯（Karl Heinrich Ulrichs）所持论点的影响；作为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第一位政治活动家，乌尔利克斯自1862年开始的一系列写作中，把他本人的状况描述为 *anima muliebris virili corpore inclusa*，即“一个女人的灵魂被囚禁在一个男性的身体里”。[47]

同样地，当时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的概念，将同性性欲望和对象选择仅仅理解为那些性别角色反转或“倒错”的人所展现出的诸多病态症候中的一种：这些症候表现为女人认同于男性特质，而男人认同于女性特质，它包含了许多个人风格的各种元素，从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含义丰富的（比如那些对政治或者选举权运动感兴趣的女人）到琐碎、古怪的行为（喜欢猫的男人），[48]贯穿其中的线索是性角色的颠倒和社会性别乖常。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规范所定义的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并没有将同性性偏好与其他各种社会性别身份越轨做出明确区分。这一模式的一个含义是——这一点将它与“同性恋”的概念显著区别开——那些性倒错者的男同性伴侣们，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男子气的或女人气的，他们不一定是不正常、有问题的，或者是变态的：自认为异性恋的男性皮条客，或者求欢于女同性恋者的女人（“婆”），他/她们的性行为被认为是合理的，仅仅是性对象不妥当而已，他/她的性行为很正常。[49]

如果男人/男孩之爱者和肛交者在传统上被理解为一种不带性倾向的性偏好，那么当时，性倒错则被定义为一种不带性存在的心理倾向。在一篇文章的脚注里，韦斯特法尔强调：“事实上，‘反面的性欲感觉’不总是与性欲相关，就一个人的全部内在而言，它只是对自己的性别疏离的感觉——好像一种病理现象中尚未得到发展的部分”。[50]在韦斯特法尔和他的同事看来，“反面的性欲感觉”或者性倒错在本质上是一种影响人的内在生活的社会性别焦虑（gender dysphoria）心理状态，不一定表达于特定

的(同性)性活动的表演或享受的某种性倾向。韦斯特法尔所谓“反面的性欲感觉”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其实是一位严格避免——至少他本人声称避免——与同性进行性接触的人,此人只是因为其社会性别样式——并非同性欲望——而被诊断患有“反面的性欲感觉”。1868 年冬天,这个叫“Aug. Ha.”的人因为在柏林火车站身着女装而被捕。他给好几户人家做仆人,经常穿女装,甚至拥有一付假乳,他曾经偷窃女主人的衣服和化妆品,也曾因为身份造假而入狱。韦斯特法尔注意到“病人的行为几乎完全是一个女人,说话口齿不清,声调阴柔”,而且耳朵上有扎过耳环的痕迹。在解剖学上,Aug. Ha. 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体检结果显示,他脐下阴毛很浓,阴茎皮肤呈深色,有很多皱纹,睾丸“尺寸中等”,肛门也“无特别之处”。Ha. 宣称“从未与男人性交,也从未跟男人有过其他性活动,虽然许多男性对他提出过性要求”。他只是从 8 岁开始有穿女装的“冲动”。他与女性关系良好,也曾穿上女装与女性一起外出跳舞。即使在留院观察期间,他也一直做针线活,刺绣、制作女帽。[51]

因此,性倒错跟同性恋的概念不一样,因为同性性欲对象的选择,或者同性欲望并不是首要问题:一个人可以是性倒错,却不一定是同性恋,一个人也可以跟同性发生性关系而不被当作性倒错,只要他是男人/男孩之爱者或者是肛交者。所以,金赛(Kinsey)(他本人精通于这些概念)坚持认为,“性倒错与同性恋是两种东西,并不总是相关联的行为模式。[52]实际上,“反面的性欲感觉”与性倒错的概念反映了长久以来男性被动性、女性化、性变态受污名的传统,这一传统较少关注同性恋行为或同性欲望本身,而更多关注伴侣一方或双方缺乏规范性的男性特质。[53]

现在我们终于要谈到同性恋了(homosexuality)。我希望,同性恋这个有着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特征与分类的范畴,能够与我们之前讨论的四个话语传统形成对比。“同性恋”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 1869 年的德国;匈牙利文学的奥地利译者卡尔·玛丽亚·科特伯尼(Karl Maria Kertbeny)在莱比锡出版的两本匿名小册子里出现了这个词。虽然科特

伯尼本人宣称自己是一个“性正常者”,他使用的“同性恋”这个词,应该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同情同性爱者的造词,因为他是在反对新成立的北德联邦将同性恋性行为定罪的政治运动中使用的这个词(这个运动最终失败了)。

不同于“反面的性欲感觉”、“性倒错”与“乌拉尼亚之爱”(Uranian love)[1],“同性恋”这个词并不是造出来以解释它所描述的现象,也不是为了添加一种心理学的或医学的理论;科特伯尼本人强烈反对第三性(third-sex)的说法,也反对同性欲望的倒错模式。“同性恋”是指一种性欲,受它驱使的人与性驱力所指向的人有相同的性别。事实上,从理论上看,正是由于“同性恋”这个词太简洁了,后世带有不同意识形态目的的作者和理论家才能方便地使用它。其结果是,现在这个词浓缩了许多关于同性性吸引力的不同概念,也浓缩了那些定义何为“同性恋”的不同概念模式。

具体来说,“同性恋”这个词吸收、连结了至少三种截然不同的、过去看来无甚关联的概念:(1)精神病学中倒错或病态倾向的概念,这个概念源于韦斯特法尔和他19世纪的同行,这主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应用于个体的内在生活,不一定假设为同性的性行为;(2)精神分析学中同性性欲对象选择或欲望的概念,这个概念来源于弗洛伊德及其合作者,是一个情欲意向性范畴,并不一定意味着永恒不变的性倾向,更不是反常的或病态的性倾向(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大多数正常的个体在他们幻想中的某个时刻,会有无意识的同性性欲对象选择);(3)社会学上性反常行为的概念,来源于19、20世纪对于“社会问题”的法庭调查,主要聚焦于非标准的性实践,不一定指情欲心理学或性倾向(就像金赛所显示的那样,同性性行为并不具有同性恋性倾向者的排他性特征,也不一定是一种病态,因为这在人口中大量存在)。因此,倾向的概念(orientation)、目标选择的

[1] 19世纪欧洲流行的英文词,指同性爱。——译注

概念(object choice),或者行为的概念(behavior),这三者都不能单独地产生现代意义的“同性恋”;“同性恋”这一概念依赖于这三种概念的不稳定的结合。“同性恋”同时可以指的是心理状态、色情欲望,也可以是性的实践(这是三种非常不同的东西)。

此外,同性恋这个概念意味着,同性性感觉与表达的所有形式,构成了一种被称为“同性恋”的单一的综合的现象,明确地区别于并脱离所谓“异性恋”(heterosexuality)。“同性恋”指所有的同性性欲和行为,无论这种欲望和行为是等级制的还是互惠的,社会性别两极化的还是无社会性别的,潜在的还是实存的,精神的还是肉体的。

从这个角度看,“同性恋”作为一个范畴和概念是具有相当丰富的独创性的。早期的时候,无论是关于肛交还是性倒错的话语,都仅指伴侣中的一方——肛交行为中“积极的”一方,性倒错中的女性化男子或男性化女子。伴侣中的另一方,只要他并不为性欲驱使,或者不是社会性别反常者,他就无资格归入这一范畴。相反,“同性恋”则应用于伴侣双方,无论是积极主动的一方抑或被动的一方,也无论他符合还是违反社会性别规范。实际上,“同性恋”的标志就是,它拒绝在同性伴侣中做出区分,或拒绝把一方视为比另一方更具(或更少)同性恋特质。

金赛可被视为此一现代观点的代表人物。某些男人倾向于根据特定角色、前同性恋模式来定义他们本人的性身份——他们认为自己是异性恋,因为他们只接受其他男子的口交,而从不为其他男子口交。金赛说这纯粹是“宣传”而不把它当回事。金赛写道,“与其他男子的身体接触”而导致性高潮的人,“无论根据何种严格的定义……都是同性恋者”。[54]换句话说,按照金赛的说法,谁为谁口交并不重要。

通过这种方式,同性恋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社会实践,从根本上重组和重新阐释了情欲建构的早期类型,它同样也带来了新的、重要的实践上的后果。首先,在“同性恋”概念的掩护下,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角色在为性行为和性行为参与者归类时的重要性渐退。[55]因而,同性恋概念的一个

结果，是消除了性欲对象的选择与社会性别身份之间任何必要的关联，这使得人们有可能将同性恋特质加之于那些社会性别样式及外表、举止都很正常的男女身上。

当然，这一概念上的变迁既不是完全的，也不是绝对的。今天有许多人，无论他们是不是同性恋者，总是把社会性别乖常与同性恋联系在一起。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同性恋和异性恋两大范畴，“主动”的女人和“被动”的男人，还有阴柔男子和阳刚的女人，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比那些不太明显反常的、选择把同性作为性欲对象的人更同性恋。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早期的、前同性恋的性范畴的力量，在新近的同性恋/异性恋概念的世界里得以持续发威。在某些领域，谁为谁口交，仍然事关重要。尽管如此，现代同性恋/异性恋分类模式的结果已使得社会性别身份与性角色的分类学意义降低了。根据性活动双方是同性还是异性来进行性分类的原则下，连最不对等的性行为也被模糊了。一份非主流报纸上提供性咨询的专栏作家收到了一封匿名读者来信，让我们来看看其中透露出的焦虑：

> 我是个百分之二百的真男，已结婚生子。大约六个月前，我去同性按摩，男按摩师完事前为我做了极棒的口交。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没有阻止他，事实是，我不能，因为他为我口交时以手指按摩我的肛门。那感觉如此之好，以至于我每个礼拜都要去找这位男按摩师，不是为了接受按摩，而是为了他帮我口交。现在我开始担心，这是否意味着我是个同性恋。我没有兴趣为他口交，但是我很想知道，接受口交的人是否跟那些为他人口交的人一样有罪。[56]

写信者的担忧，正是性话语的出现以及这些话语提出的性的分类引起的新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那些没有接触到此类性话语的人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57]

同性恋/异性恋分类模式还带来了其他后果。同性恋话语把同性之间的性关系解释成相同性和互惠性的。同性恋关系不再暗示一种社会身份或者性地位的不对等，也不再按权力、年龄、社会性别或性角色的等级来加以描述（这不是在否认这些等级可能在女同性恋者或男同性恋者的语境中仍然发挥实际的作用）。[58]同性恋关系在性愉悦或性欲望的分配上不一定倾向某一方。毋宁说，就像异性恋浪漫爱一样，同性恋的概念意味着性伴侣不再根据他们的差异，而是根据他们的相同性，根据欲望、倾向和“性存在”来与对方结合。同性恋关系不再由身份和角色的两极化（主动/被动，插入/被插，阳刚/阴柔，男人/男孩）强迫性地加以构成。一种排他的、终身的、同伴式的、浪漫的、互相依存的同性爱情对伴侣双方皆有可能。同性恋关系不再仅仅根据大的社会体制（如亲属制度、年龄阶级，或者成年仪式）的要求和指定来组织，而是根据符合自身需要的社会组织原则来运作，并且导致了属于同性恋自己的独立的社会体制。[59]

同性恋现在被置于一个与异性恋相对的位置。同性性欲对象选择，被视作与异性性欲对象选择不同的一个记号。同性恋和异性恋或多或少已成为互相排斥的人类主体性的形式、人类的性存在的不同类别，就个人而言，异性欲望的感受和表达被认为是排除了任何同性欲望的感受和表达。性对象选择被归为性倾向的概念之下，人们认为性行为表达了人类主体精神性欲根本的、永恒的特征。由此，人们依其性对象的选择或性倾向，例行公事般地被指派为两个性物种中的一类或另一类。

简而言之，同性恋不仅仅是同性之间的性对象选择，也不仅仅是自觉的同性情欲偏好。“同性恋”是把同性的性对象选择作为决定性差异与社会差异的首要原则的具体规定。“同性恋”是一个新的性存在制度的一部分，是对一种对人进行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手段：它为每一个人指派一种性倾向和性身份。这样，它将新的元素引入社会组织、人类差异的社会表达和欲望的社会生产中，最终，将此新元素引入“自我”的社会建构中。

（表一：五种范畴）

	阴柔	肛交	友谊	性倒错	同性恋
是性倾向吗？	否	否	否	是(?)	是
是否包含社会性别异常？	是	否(?)	否	是	也许
是否包含同性性器官接触？	不一定	大多数是	否	有时是	大多数是
是一种性偏好吗？	否	有时是	否	否	否
是否表现出某种人格类型？	是	否(?)	否	是	也许
是否包含同性色情欲望？	有时是	是，至少	也许	有时是	是
	对于伴侣的一方				
是否把女性和男性一起分类？	否	否	否	是	是
是否不断地跨越性和社会性别变化？	否	否	否	否	也许

我们根据表一分类列出的（同性）性分类的历史的五种话语传统，也许很容易抓住这些互相交叠又互为区别的特征。如以上图解对比所显示的，五种传统中的每一种对于其他传统来说都是不可简约的。我无意为自己的自问自答正确与否进行辩护（我承认这些答案是有争议的）；我希望通过这些表格中的肯定与否定选项来显示，我勾勒出的这些模式无法简化为一个单一的、连贯的大纲。

要理解表一，就要注意最后的一种范畴（同性恋特质）与其他四种范畴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前四种传统的、后古典或前现代的范畴（“阴柔”、“男人/男孩之爱与肛交行为”，“友谊/爱”、“被动性/性倒错”）非常依赖于社会性别的观念。这一点在“阴柔”和“被动性/性倒错”的情况中表

现得很明显，在“男人/男孩之爱与肛交行为”和“友谊/爱情”也是如此，因为，后两种范畴的定义被界定于男性主体去体现和表演传统上的男子气的/男性化的规范，正如“阴柔”和“被动性/性倒错”范畴的定义被界定于男性主体违反这些规范一样。在前现代的性/社会性别制度中，“性存在”的概念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对于行为与社会地位的管理是由社会性别制度独立完成的。当然，社会地位与阶级也参与了前四种范畴的生产。比如，“阴柔”尤其适用于那些有足够高的等级和地位的男人，他们因其行为不符合社会对于精英的期待，原有的等级有可能遭降低或者丧失原有的等级。友谊/男性爱情需要在伴侣之间的级别上的平等，而男/童恋及肛交关系则需要两个人在年龄、地位和性角色上有显著的差别。“被动性/性倒错”是根据社会性别等级来定义。随着“同性恋”的出现，内在于前四种范畴结构的差异体系在“同性恋”与“异性恋”的边界被外化和再造；而这两个新范畴自己代表了新的社会区分与管制的策略。同性/异性范畴的运作不是要维持既存的社会性别和地位等级制，而是要通过区分和规训来管理还未被定类的那些在名义上相同的大量“个体”。这种治理成群的个体的技术，其名字叫“正常化”(normalization)。[60]

也许，所有这一切里最终的讽刺在于“sex”(性别)这个词。“sex”源于拉丁语“secare”，指“切割或分割”，最初用于表示男性和女性的自然分类之泾渭分明，这个词的词义随历史变化，如今已在我们关于性生活的概念地图中变得模糊不清。今天，这个词正好代表了对各种明确的分类、歧视和分隔的最顽强的抵抗。

后记：

本文题目得益于 Arnold I. Davidson 的研究对我的学术一贯、不懈和有力的帮助，特别是他的以下文章：“How to Do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A Reading of Freud's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Critical Inquiry* 13(1986 - 1987):252 - 77；“Sex and 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Critical Inquiry* 14(1987 - 1988):16 - 48; and "Closing Up the Corpses: Diseases of Sexua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sychiatric Style of Reasoning", in *Meaning and Method: Essays in Honor of Hilary Putnam*, ed. George Bool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295 - 325。在我自己最近关于性的历史的研究中,特别是本文以及"Forgetting Foucault: Acts, Identities, and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Representations* 63(1998):93 - 120],我从他的作品中最先提出的一些问题那里得到启发。这篇文章是我的一个更大研究中的第一小步。

很多人与我一起讨论了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我必须感谢:Patricia Crawford 和 Hilary Fraser,他们邀请我参加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学会的研讨班:"Gender, Sexualities, and Historical Chang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31 July—1 August 1998)。在那个研讨上的很多讨论,直接地激励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在此特别铭谢 Judith M. Bennett。

这篇文章当初是为了在"Sex and Conflict: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und University, 9—10 October 1998)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而撰写的。我感谢 Eva Österberg 和 Johanna Esseveld,她们邀请我发表此文,还有 Martha Vicinus 和 Lillian Faderman 鼓励我继续努力。最后,我要感谢 George E. Haggerty。他的学术和对话对我开拓思路有很大帮助。他的作品 *Men in Love: Masculinity and Sexua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也对如何书写男性同性恋历史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但非常有趣的答案。

本文的有些材料和论述在我的另外一篇已经出版的文章中业已呈现:"Sex, Sexuality, Sexual Classification", in *Critical Terms for Gender Studies*, ed. Catharine Stimpson and Gilbert Herd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thcoming)。

本文发表于：

GLQ 6:1(2000):87 - 124

黄海涛 译　张　颖 校

注释：

1 参见，比如 Jacqueline Murray, "Twice Marginal and Twice Invisible: Lesbians in the Middle Ages", in *Handbook of Medieval Sexuality*, ed. Vern L. Bullough and James A. Brundage (London: Garland, 1996), 191 - 222；还有另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Anna Clark, "Anne Lister's Construction of Lesbian Identi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7(1996):23 - 50。

2 参见我的讨论："Historicizing the Subject of Desire: Sexual Preferences and Erotic Identities in the Pseudo-Lucianic Erôtes" in *Foucaul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d. Jan Goldstein (Oxford: Blackwell, 1994), 19 - 34, 255 - 61; and in "Forgetting Foucault"。另外，Judith M. Bennett 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同样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观点，强调妇女史的连续性："Confronting Continuity",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9, no. 3(1997):73 - 94。

3 充分地展示 homosexuality 定义的彻底不确定性，是 Eve Kosofsky Sedgwick 的一个重要的贡献：Eve Kosofsky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后面我将说明，我也借鉴了她对我从前的研究（*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and Other Essays on Greek Love* [New York: Routledge, 1990]）的批评，她指出了"我们今天不加思考就用的 homosexuality 这个概念"当中无法解决的各种矛盾。但同时，我也要继续坚持描述同性恋历史中——被她讽刺地称为——"一个伟大的范式转变"的存在，即现代社会中同性恋话语本身的出现。我并不认为，在讨论同性恋的历史建构与针对现代同性恋观念中的各种矛盾进行的话语分析之间有什么矛盾；我认为，这样一种历史探讨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阐述现代同性恋观念的自相矛盾。其实，Sedgwick 自己的研究，帮助我更加仔细地而且更加有系统地进行对 homosexuality 历史的和话语的批判。

4 Martin Bauml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and George Chauncey Jr., eds.,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9), 8.

5 参见 Randolph Trumbach, "London's Sodomites: Homosexual Behavior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1

(1977):1 – 33; Barry D. Adam, "Age, Structure, and Sexuality: Reflections on the Anthropological Evidence on Homosexual Relations", in *Anthropology and Homosexual Behavior*, ed. Evelyn Blackwood (New York: Haworth, 1986), 19 –33; Adam, "Structural Foundations of the Gay World", in *Queer Theory/Sociology*, ed. Steven Seidman (Oxford: Blackwell, 1996), 111 – 126; and David F. Greenberg,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25。Greenberg 讨论了"transgenderal","transgenerational"和"egalitarian"这些类型(在我看来,后两个名词很有误导性)。

6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47.

7 Sedgwick 的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里有一个极大的讽刺——同样让人惊异的是这个讽刺性现象从没被人关注过。里面有一处,她合理地批判了研究同性恋历史社会建构主义历史学家们,因为在他们强调前现代和现代同性恋表达方式的差异的时候,他们非常典型地划出一个明显的差别:一边是早期的各种性范畴,一边是"我们今天关于同性恋"的一个假装一致的、同质性的和一元统一的观念;于是就把当代同性恋的概念当成是"一个有内部一致性的定义领域,而不是一个充满了重叠着的、矛盾的以及互相挑战的各种定义性势力的场所(45)"。Sedgwick 认为,我们不应该假设早期的性范畴被后来的范畴简单地颠覆或完全取代;相反,她认为,早期的性范畴继续与后来的范畴一起不断出现,因此在后来的范畴中制造出一种无法抹杀的不稳定性。另外,她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同性恋话语的分析,她分析了四个定义性轴线之间几乎不断的张力:个别化/普适化定义模式(minoritizing/universalizing modes of homosexual definition),社会性别转变型/社会性别不变型或称社会性别隔离型定义模式(gender-transitive versus gender-intransitive or gender-separatist modes of homosexual definition)。通过这个,Sedgwick 试图通过"集中讨论矛盾的一个操演空间"(a performative space of contradiction),来将社会建构主义历史学家(明显包括我本人)写出来的历史叙述"去叙述化"("denarrativize" the narratives)(48)。尽管我接受她的批评(本文的分析即显示这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她自己忘了她在宣讲的教训。因为她宣称,她要结束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的争论并让它"失去意义"(40),这一点她成功实现了。正如 Ross Chambers 对 Sedgwick 这一说法的精彩评价中指出的,"她没有要结束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的争论,但是她有效地让它靠边站,通过改变主题将它放进一个正在进行的对话当中("Strategic Constructivism? Sedgwick's Ethics of Inversion", in *Regarding Sedgwick: Essays in Queer Cul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ed. Stephen Barber and David L. Clark [New York: Routledge, forthcoming])。换言之,Sedgwick 故意将有关现代的性范畴出现问题的历史质疑放到一边,宣称她的方法取代了这些历史问题。就像被她批判的方式那样,她通过自己的研究设计"使得被取代的模式离开分析框架"(47)。然而,正如鸡奸或倒错的话语不会随着同性恋话语的出现而消失一样,Sedgwick 自己也指出,描述前同性恋与同性恋形构的区别这个历史问题,也不会因我们目前意识到了同性—异性恋定义危机的存在而主动消失。现在我要针对 Sedgwick

来坚持她自己的宗旨:尽管她出色地展示了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争论的无用,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那场争论的语言还没有被她称之为“集中讨论[同性—异性恋定义这样一个]矛盾的操演空间”的东西取代。我并不是要与她对立着去重新强调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争论的语言;我希望以更自觉和理论化的姿态来重新运用建构主义历史研究,目的是,更好地结合 Sedgwick 提倡的去叙事化及操演性批判与福柯式针对同性恋本质主义的历史性和叙事性批判。

8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Robert Hurley, 3 vols. (New York: Pantheon, 1978 - 1986),1:101.

9 Rosemary Daniell, *Sleeping with Soldiers: In Search of the Macho Ma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4),71.

10 Pseudo-Lucian, *Erôtes* 9, trans. M. D. Macleod, in *Lucian VII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See, generally, Halperin, "Historicizing the Subject of Desire".

11 Chariton, *Chaereas and Callirhoe* 1.4, trans. B. P. Reardon, in *Collected Ancient Greek Novels*, ed. B. P. Rear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27.同样地,Artemidorus 也指出那些化妆,戴珠宝或抹香脂的男人将(被发现)有通奸的行为而遭受不名誉。81.15 - 17,106.16 - 107.2, and 269.11 - 13 Pack, cited with discussion by Suzanne MacAlister, "Gender as Sign and Symbolism in Artemidoros' Oneirokritika: Social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 Helios 19(1992):140 - 160, esp. 149 - 150. C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Agathon in Old Comedy: commentary by Froma I. Zeitlin, "Travestie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Aristophanes' Thesmophorizusae", in Playing the Other: Gender and Society in Classical Greek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375 - 416; Frances Mueck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Woman", Classical Quarterly 32(1982):41 - 55。

12 参见, Nicole Loraux, "Herakles: The Super-Male and the Feminine", trans. Robert Lamberton, in *Before Sexu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Erotic Experienc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ed. David M. Halperin, John J. Winkler, and Froma I. Zeitl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21 - 52。

13 参见 Stephen Orgel, *Impersonations: The Performance of Gender in Shakespeare's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 - 26。我要感谢 Vernon Rosario 建议的理解。参见 Joseph Cady, "The 'Masculine Love' of the 'Princes of Sodom', 'Practising the Art of Ganymede' at Henri III's Court: The Homosexuality of Henri III and His Mignons in Pierre de L'Estoile's Mémoires-journaux", in *Desire and Discipline: Sex and Sexuality in the Premodern West*, ed. Jacqueline Murray and Konrad Eisenbichl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123 - 154, esp. 132 - 133:“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阴柔’这个词,当用到一个男人身上的时候,不一定就指示同性恋,而是指向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词里面缺乏的那种多样的含义。比如,那个时候,这个词有时指某种极度的

或者无法控制的‘男性同性恋’而这种用法已经不存在了。Donne 在他的‘The Jughler’(1587? —1596?)中说他自己因为‘爱女人’而被称为‘阴柔’，这其实就属于这个文艺复兴的传统。”参见 Cady 早期的研究，“Renaissance Awareness and Language for Heterosexuality: ‘Love’ and ‘Feminine Love’”, in *Renaissance Discourses of Desire*, ed. Claude J. Summers and Ted-Larry Pebworth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3), 143 - 158。

14 引用在 Davidson, “Closing Up the Corpses”, 315。

15 参见 Randolph Trumbach, “The Birth of the Queen: Sodomy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der Equality in Modern Culture, 1660 - 1750”, in Duberman, Vicinus, and Chauncey, *Hidden from History*, 129 - 140, 509 - 511。

16 这里我采用 Davidson 在“Closing Up the Corpses”中的观点，以及 George Chauncey Jr., “From Sexual Inversion to Homosexuality: Medicine and the Changing Conceptualization of Female Deviance”, in Passion and Power: Sexuality in History, ed. Kathy Peiss and Christina Simmons, with Robert A. Padgu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87 - 117。

17 最近这方面的学术，参见，比如 Thorkil Vanggaard, *Phallos: A Symbol and Its Historyin the Male World*, trans. from the Danish by the autho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72), 17 and passim; Lionel Ovesey, *Homosexuality and Pseudo-homosexuality* (New York: Science House, 1969); and Richard A. Posner, *Sex and Rea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sp. 105 - 107, 152, 296。

18 E. g., Gary W. Dowsett, *Practicing Desire: Homosexual Sex in the Era of AI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 参见 Robert B. Koehl, “The Chieftain Cup and a Minoan Rite of Passag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06 (1986): 99 - 110; and Koehl。“Ephoros and Ritualized Homosexuality in Bronze Age Crete”, in *Queer Representations: Reading Lives, Reading Cultures*, ed. Martin Duberm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7 - 13。

20 Michael Rocke, Forbidden Friendships: Homosexuality and Male Cultur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96 - 97.

21 所以，比如在 14 和 15 世纪的意大利对鸡奸和鸡奸者的定义仅仅指“主动的”或插入者一方(同上:14,110)。

22 参见 Halperin, *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163n. 53 列出的一个部分文献列表。

23 参见 Halperin, “Historicizing the Subject of Desire”, esp. 24 - 25, 257 - 258 nn. 30 - 32; also Everett K. Rowson, “The Categoriza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 Irregularity in Medieval Arabic Vice Lists”, in *Body Guar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ender Ambiguity*, ed. Julia Epstein and Kristina Straub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50 - 79; and J. W. Wright and Everett K. Rowson,

eds., *Homoeroticism in Classical Arabic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4 参见 Cynthia B. Herrup, *A House in Gross Disorder: Sex, Law, and the Second Earl of Castlehav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3: "17 世纪晚期之前的对鸡奸的起诉,就我们所知,很少是关于阴柔行为的;反之亦然,对阴柔的谴责也很少包括性的问题。"

25 John Boswell, *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Gay Peopl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4.

26 我曾试图记录几种同性性欲对象选择的例子,甚至有意识的同性情欲偏好的例子,但是它们都不符合同性恋的定义:Halperin, "Historicizing the Subject of Desire"。

27 参见 Halperin, "Heroes and Their Pals",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75-87, 176-179。

28 参见 Alan Bray, "Homosexualiy and the Signs of Male Friendship in Elizabethan England", in *Queering the Renaissance*, ed. Jonathan Goldber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0-61。我对 Bray 的诠释是他为这一说法提供了证据,尽管他自己并没有这么说。另见 Herrup, *A House in Gross Disorder*, 33: "不管是不是真正的男人/男童性关系,肛交关系在法律文献中一直被形容为权威/依赖的成对关系——男人/男童,主人/仆人,师/生,保护人/被庇护者。"

29 *The Complete Essays of Montaigne*, trans. Donald M. Fram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139.

30 同上,139-140。

31 我在 Haggerty (*Men in Love*, 25)那里得到了这段话。他非常好地诠释了这段文字,但与我的正相反。一个不同方法的研究,参见 C. Stephen Jaeger, *Ennobling Love: In Search of a Lost Sensibil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9)。

32 为了加重强调,我特意表达得过于强烈。关于跨性别实践当中的性存在与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一个更细致和复杂的描述,参见 Don Kulick, *Travesti: Sex, Gender, and Culture among Brazilian Transgendered Prostitu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33 参见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esp. 1, 9, 85-86;从这里我发展了"普适化"和"个别化"性身份建构的区别。

34 关于倒错者与肛交作为话语类型之间区别的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 Halperin, "Forgetting Foucault"。

35 引文和译文见 Maud W. Gleason, *Making Men: Sophists and Self-Presentation in Ancient Ro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68。

36 Quintilian, *Institutes* 5.9.14,引文和翻译见 Amy Richlin, "Not before Homosexuality: The Materiality of the Cinaedus and the Roman Law against Love between Me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3(1992－1993):542。

37 编辑于 Gleason, *Making Men*, 63。

38 同上,78。

39 Aulus Gellius, 6.12.5,引文和译文见 Craig A. Williams, *Roman Homosexuality: Ideologies of Masculin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23.这里有一个判断倒错和被动的差别的衡量方法:Scipio 很乐意公开地把自己说成是与好友 Laelius 之间有"爱的纽带",据罗马历史学家 Valerius Maximus (8.8.1)(我感谢 Tom Hillard of Macquarie University 给我提供这个观点和引文。)Scipio 的态度中未必一定有不一致性或虚伪。

40 *Historia ecclesiastica* 8.10,引文和译文见 Glenn W. Olsen, "St. Anselm and Homosexuality",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Saint Anselm Conference: St. Anselm and St. Augustine, Episcopi ad Saecula*, ed. Joseph C. Schnaubelt et al. (White Plains, N.Y.: Kraus, 1988),110。请注意,这个片断中并没什么能确立"阴柔男人"具体因性被动而被谴责(尽管娈童这个词明确指向那里)。粗心的(或本质主义的)历史学家很容易把 Orderic 对"鸡奸的肮脏"的提及,解释得与原意正相反,即"阴柔男人"被指控在同性恋性交中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不太可能,但我希望我在这里建立的历史语汇能够帮助我们处理这些模糊点,并最终理解这些历史文献。Orderic 的情况中,文本坚持娈童有明显的乖常,以及把他们归到一种阴柔的形态学中,于是就把它放到了一个比"gay male representation"具体得多的话语传统中。其实 Orderic 的描述似乎更属于一个特定的欧洲话语传统,一个再现男性倒错者和被动者的话语模式。我们对控制着关于历史上的性行为者的描述的那些话语规则和限制了解越多,就越容易明白,一个特定的文献中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即使它缺乏明显的语言学标识。我相信,这样一来,对 Orderic 这段话的话语背景的仔细分析,就使我们得以从他晦涩和不定的语言里——而不是他自己的话里——找出关于越界的更好的理解。这个越界是"阴柔男人"被谴责的原因。

41 引文和译文见 Cady, "'Masculine Love' of the 'Princes of Sodom'", 133。我略有改动。从这里以及 Pierre de L'Estoile 其他的评论,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同性恋是否存在的问题 Cady 当然有一个不同的结论。

42 引文自 Alan Bray, *Homosexualit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London: Gay Men's, 1982),81,87。

43 引文和分析见 Lisa L. Moore, *Dangerous Intimacies: Toward a Sapphic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72－74。

44 C. Westphal, "Die conträre Sexualempfindung, Symptom eines neuropathischen (psychopathischen) Zustandes", *Archiv für Psychiatrie und Nervenkrankheiten* 2(1870):73－108.

45 Arrigo Tamassia, "Sull 'inversione dell' istinto sessuale", *Rivista sperimentale di freniatria e di medicina legale* 4(1878):97－117.

46 当然,"莫利"自己也是一个复杂的形象,已经处于同性恋的边缘(the homosexual),

正如 Trumbach 等人已经分析过的。莫利的形象，不管如何在其他方面看是超前的，保留了传统上人们对男倒错者或被动者的特征描述——我并不想仅仅因为说明这一点而越过困难的诠释问题.

47 基本研究参见 Hubert Kennedy, Ulrichs: The Life and Works of Karl Heinrich Ulrichs, Pioneer of the Modern Gay Movement (Boston: Alyson, 1988)。

48 参见 Chauncey, "Form Sexual Inversion to Homosexuality"。

49 我的阐述来自 Chauncey，同上。

50 Westphal, "Die conträre Sexualempfindung", 107n；我自己的强调。

51 Westphal, "Die conträre Sexualempfindung", 82 - 84, Robert Grimm 进行的翻译，引用和讨论："The Dawn of Contrary Sexual Sensitivity"（未出版书稿）。

52 Alfred C. Kinsey, Wardell B. Pomeroy, and Clyde E. Martin,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Philadelphia: Saunders, 1948), 615. 同性恋与倒错的区别的详细阐述，参见 C. A. Tripp, *The Homosexual Matrix*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22 - 35。

53 至少在这一方面，金赛比福柯是一个更为可靠的历史学家。在《性史》当中福柯将"同性恋"（作为一个话语范畴）的最早时间，推定为 Westphal 的文章："我们不能忘记，心理学的，精神病学的和医学意义上的同性恋这个范畴——Westphal 著名的 1870 年关于"反面的性欲感觉"文章是它诞生的时刻——的建构，从一开始就不被描述为一种性关系，而被描述为一种性感觉的特质，一种在一个人当中倒错男性的和女性的的方式。同性恋当时似乎是性存在的一种形式，它被从肛交实践转嫁到一种内心的雌雄通体，一种灵魂的阴阳人。肛交者曾被当成是一种异常；而同性恋者则变成了一个物种"（1 : 43）。我相信，福柯当时正确地在 Westphal 身上看到了一个现代精神病学意义上的"倾向"的观念，它对于乖常的个人有非常具体的分类，还代表了一个转变——从针对被禁止行为的法律话语，到变态心理学的规范性话语。但我也认为，福柯错误地把 Westphal 的范畴"反面性欲感觉"与"同性恋"看成一回事。在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中，Sedgwick 指出我"对'我们今天理解的'所谓'同性恋'的解读……实际上是与福柯正相反的"，因为福柯对同性恋有一个"社会性别转变式"的理解，而我的则是"社会性别非转变式"的（46）。这倒是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福柯没有历史地系统区分"性倒错"与"同性恋"这重要的一步。不过，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关于同性恋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持不同意见，而是不清楚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欧洲现代史的话语中找到"倾向"与"性存在"之间一个有意义的区别。

54 Kinsey, Pomeroy, and Martin, *Sexual Behavior*, 616, 623.

55 我特别选择的"渐退"这个词（*fade*）其实是 Adam 的，他曾经写道，在同性恋中"性角色的定义从人际纽带中渐退"（"Structural Foundations," 111）。这一段和后面很多阐述都受到他的启发。

56 Quoted by Dan Savage, Savage Love: Straight Answers from America's Most Popular Sex Columnist (New York: Plume, 1998), 189 - 190.

57 参见：Kinsey, Pomeroy, and Martin, *Sexual Behavior*, the following: George

Chauncey Jr., "Christian Brotherhood or Sexual Perversion? Homosexual Ident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Boundaries in the World War One Era", in Duberman, Vicinus, and Chauncey, *Hidden from History*, 294－317, 541－546; and Michael Bartos, John McLeod, and Phil Nott, *Meanings of Sex between Men: A Study Conducted by the Australian Federation of AIDS Organisations for the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and Health*, 1993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4)。

58 参见 Barry D. Adam, "Age preferences among Gay and Bisexual Men", *GLQ*（即将出版）。

59 Adam, "Structural Foundations".

60 参见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9), 182－184（我这里的引用对这个版本的译文有较大改动）：In short, under a régime of disciplinary power, the art of punishing... brings five quite distinct operations into play: it refers individual acts, performances, and conducts to a group ensemble that is at once a field of comparison, a space of differentiation, and a source of the rule to be followed. It differentiates individuals in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and in terms of that group rule, whether the rule be made to function as a minimal threshold, as an average to be looked to, or as an optimum to be approximated. It measures in quantitative terms and hierarchizes in terms of value the abilities, the level of attainment, and the 'nature' of individuals. It imposes, through this 'valorizing' measurement, the constraint of a conformity to be achieved. Lastly, it traces the limit that will define difference in relation to all other differences, the external frontier of the abnormal... [To recapitulate, it] compares, differentiates, hierarchizes, homogenizes, excludes. In a word, it normalizes... Like surveillance and together with it, normalization becomes one of the great instruments of power at 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age. The marks that once indicated status, privilege, and group membership come to be replaced, or at least to be supplemented, by a whole range of degrees of normality: these are signs of membership in a homogeneous social body, but they also play a part themselves in classification, in hierarchization, an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ranks. In one sense, the power of normalization enforces homogeneity; but it individualizes by making it possible to measure deviations, to set levels, to define specialties, and to render differences useful by calibrating them one to another. The power of the norm functions easily within a system of formal equality, since within a homogeneity that is the rule, the norm introduces, as a useful imperative and as the result of measurement, all the gradation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对被模仿者的模仿："女形"的社会性别

——其历史性、操演性及其在女性特质传播中的参与〔1〕

The Gender of Onnagata As the Imitating Imitated: Its Historicity, Performativity, and Involvement in the Circulation of Femininity

依坂真纪(Maki Morinaga)〔2〕

在日本歌舞伎中，专门扮演女角色的男演员被称为"女形"(onnagata)。〔3〕在对日本戏剧的专门研究之外，女形的研究最受跨学科研究的关注。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日本，不论是在剧场内，还是在社会意义上，女形都被认为是扮演了女人身份的"典范"。[1] 因此，对妇女学来说，女形是个有趣的个案研究。女形的社会性别成为一个具体的要素，来

〔1〕 作者对日文词汇特别用罗马字注音方式标记，出于翻译统一性的考虑，本文以同样方式标明，而不用日文的平假名或片假名。——译注

〔2〕 作者的名字现为 Maki Isaka，我们用的中文/日文翻译是她的现名。——译注

〔3〕 相当于男扮旦角。本译文统一采用日文本来的汉字形态，"女形"。日文中也常作"女方"。"女形"和"女方"的用法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研究课题。本译文只有在引用文献处保持"女方"的写法。——译注

帮助我们解释女性特质。对社会性别研究来说，女形的社会性别非常戏剧性地具象化了目前对社会性别的两个理论理解：操演性与时空具体性。[2] 而且，女形的社会性别对社会性别研究非常有帮助，因为它可以质疑社会性别的一些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在习俗中被自然化了，因而隐匿不见。毫无疑问，社会性别是很难讨论的，因为社会性别概念总是被放在一对概念——即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中来考虑；而且，这个概念总是和性别(sex)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即使我们意识到社会性别应脱离于性别的生物属性，性别与社会性别仍然被这样那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这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性别的数量从来不是只有两个。雌雄间性(intersexuality)是存在的。发展基因学者安妮·弗斯特-斯特林(Ann Fausto-Sterling)甚至曾提出，人类的性别一共有五种。[3] 其次，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一直被作为一对概念，两者互为构成性他者。构成性他者这个概念解释了我们的一种认识，即对甲与乙两者的区分是功能性的，而不是本质性的。(换言之，甲和乙是在一种延异[différance]的关系中。)我们只能通过"乙为非甲"来定义甲，这样，乙就成为甲的构成性他者。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之间的关系牵涉到这样的特点。[4] 我们要对社会性别进行概念梳理，就要考虑这些情形，考虑我们自己不可避免的历史性。也正因为如此，社会性别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论题。女形的社会性别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毫无前途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二元论为什么在理论上是靠不住的，但在实践中这种二元论却如此顽固。

在17世纪和18世纪，从起源之初到其艺术上的成熟，女形经历了急剧的变化。这个过程非常有意义。在17世纪的形成阶段，女形的模仿对象是武士阶级中地位较高的"若众"(wakashu)。"若众"本义是"少男"，在同性恋关系历史久远的武士阶级中，若众指的是男同性恋伴侣中年纪较幼者。至少在女形形成的17世纪，若众武士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未成年男子，他们实行同性恋关系，勤奋地向比他们年长的武士伴侣学习武士男人身份。女形从这样的"军事性男性特质"开始，最后在18世纪，达到了其艺术的完善

境界，此时他们被认为是理想女性特质的具体化身。当时，妇女和女形作为女性特质的"实行者"，通过互相模仿的形式传播女性特质。（只要社会性别是一种实际行动，人们就不得不去"实行"各自的社会性别，因此也就成了社会性别的"实行者"。）这里我不得不冒着简单化的危险归纳我的观察：女形在短短大约一个世纪内，表现出从"军事性男性特质"（通过"雌雄同体审美"）急剧地转变为"理想女性特质"这样一个过程。

歌舞伎的历史研究虽然详细丰富，但是却没能对女形作出应有的充分分析。简而言之，有关歌舞伎的历史研究用两个假设解释了女形：替身女优假设和变身假设。根据这种历史叙述，一般认为女形的历史从 1629 年的一个针对女优的禁令开始。这个禁令针对女歌舞伎。女歌舞伎在当时是新兴的一种由一个据说叫阿国的妇女创立的、糅合了多种艺术元素的娱乐形式。女歌舞伎从先前存在的表演艺术中继承了很多元素，主要有唱歌、跳舞以及事实上的卖淫等。1629 年的禁令以卖淫为打击目标。女歌舞伎的风头因此被由年轻男子（若众歌舞伎）表演的歌舞伎取代了。这种歌舞伎形式，不用说，是全部由男子表演的娱乐形式，突出特点是少男扮演女角，而且这种女角特别注意突出女性美。但是不久，若众歌舞伎也成为封查的对象，而且也是因为卖淫。最后，在 1652 年，它也被赶下舞台。于是，就产生了对扮演女角的男演员的新需求：这种男演员不仅仅是外形上有女性特点，更重要的是要有很高的表演艺术技巧。这个历史叙述认为，就是这样，作为歌唱/舞蹈/表演的歌舞伎——而不是歌唱/舞蹈/卖淫的歌舞伎，就产生了[5]。歌舞伎历史研究认为，这个时刻才是歌舞伎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真正诞生的时刻；而女形则代表了歌舞伎克服恶劣政治环境（即管制）——也许正好得益于它——而发展成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经历。因此，雏形时期的女形被认为是女演员的替身，即对妇女的模仿、扮演和描绘。按这样的历史叙述，于是，女形代表了极富艺术性的女性特质的精髓，因为他们的艺术热情和精湛技艺超过了扮演真实生活中的妇女角色所需的程度。他们如此尽善尽美，以至于他们的艺术从原先仅仅

是模仿发展成了变身。这类历史研究用这样两个假说来解释女形：初始阶段的女形被看作是替身，而他们的后继者是变身。但是，我认为，这些假说歪曲了女形从17世纪到18世纪所经历的激烈转变。

更确切地说，我认为这些假说不仅错误地解释了那两个世纪里女形的社会性别的构成轨迹，同时还遮蔽了女形和妇女之间的社会性别互动：18世纪之后，互动的形式是互相模仿，甚至是互相扮演。所以，本文在下面三个部分，将分析这重要的两个世纪里女形的社会性别：第一部分我将分析17世纪初始阶段的女形；然后，讨论18世纪的女形；最后，我将讨论18世纪女形和妇女的关系。

我把模仿作为我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概念性主题。根据长期以来的历史论述，18世纪的品行高尚的女形大师，"变身的女神"，已经不仅仅进行模仿。相反，为了达到艺术的完美，模仿是他们要克服的庸俗的表演。我的观点与此相反。我认为，正是因为成功地模仿，18世纪的女形才脱颖而出，大大超越了前辈。正是以模仿为基础，艺术大师们创造了社会性别训练，并由此达到了艺术的完美。同样，他们也是通过模仿参与了女性特质的传播，女人身份的典范的传播。[6]

1. 从骄傲的少男到雌雄同体的魔女：女形的起源

简言之，我们将要在这一部分讨论女形的社会性别怎样从"军事性男性特质"转变为"雌雄同体社会性别"，下一章讨论它又如何成为"理想女性特质"。这个发展轨迹绝对不是线性的。女形在刚出现时，首先代表着与他们最贴近的前辈——若众——之间一定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隐藏了一种潜在的，但是急剧的断裂。我们将要看到的变化，不过是这种断裂在时间上略有滞后的具体表现。换句话说，当理论上的断裂发生时，在实践中它被否决了。但它仍然造成了一些成为症候的悖论。女形社会性别构成的轨迹，代表着女形针对这样的僵局作出"滞后"的反应。女形最基本的一个悖论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若众的实践和审美，但女形成为

可能又恰恰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对若众的否定。我认为，在这个时期女形社会性别构成的轨迹上出现的断裂，其实就是一个在理论上对若众的否定。如果没有这种断裂，女形绝不会成为女人身份的"实行者"，更不会成为其典范体现。

具体来说，歌舞伎女形的社会性别与若众的社会性别间有连续性，但女形的社会性别又在逻辑上建立在对后者两个基本特点的否定之上。若众社会性别的这两个基本特点是：(1)瞬态性(2)我命名为"同一社会性别性"(homogenderity)的现象。"同一社会性别性"指若众与他们的男性同性恋伴侣的社会性别是一样的。下一部分我将要分析 18 世纪对瞬态性的否定。在这里，我要先讨论若众的"同一社会性别性"怎样在 17 世纪遭到了否定。雌雄同体审美的出现，戏剧化地改变了若众的社会性别本身。它从军事性男性特质变成了漂浮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某种东西。这使 17 世纪女形的社会性别构成难以捉摸。一方面，若众自己当时正在演变成一种新的模式。另一方面，同时，正在形成中的女形由于本身都曾是若众，因此继承了若众的社会性别。

从任何实际意义上说，歌舞伎女形与若众歌舞伎的女角扮演者之间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女形和若众都没有模仿被法律禁止了的女优或者包括女优在内的一般妇女。为了理解这一现象，我认为有必要讨论禁令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关于若众的历史研究非常关注这两次法律禁令，即 1629 年的女优禁令和 1652 年的若众歌舞伎禁令。目前有影响的研究认为，两次禁令使得戏剧表演不断出现需要被替代的空缺。也就是说，女优禁令使得若众取代了女优，而若众歌舞伎禁令造成了女形艺术家的诞生。这些禁令是不是真的通过形成一个(最终被女形填充的)真空而造成了一个清晰的断裂呢？我认为，这两个禁令没有造成这样一望而知的真空，但是禁令本身却提供了一个漏洞，这个漏洞允许若众和女形之间存在某种连续性。这里我不是指这两个禁令的生效都很耗时的情况[7]。我不否认，从本质上说这种情况非常重要。但我认为对本研究更重

要的是，这些禁令不管在制度上取得了多大胜利，但却允许了实践中一定的连续性。这种观点可能有点出人意料，因为长期以来的历史叙述一直注意歌舞伎作为一种戏剧形式的产生，认为它不仅摆脱了女歌舞伎也摆脱了若众歌舞伎这两种娱乐加卖淫的形式。但是，我们应考虑这种现象涉及两个问题：(1)在女优禁令的问题上，女歌舞伎和若众歌舞伎有时间上的重叠；(2)在若众歌舞伎禁令的问题上，男优的身体从若众歌舞伎延续到了歌舞伎。

首先，严格说来，若众歌舞伎中女角的扮演者不是女优的后继者。1629 年前后，女优被禁止演出，但在这之前，事实上的若众歌舞伎及其女角扮演者早就存在了。虽然人们不是很确定"若众歌舞伎"一词什么时候开始使用[9]，但由年轻男孩子表演歌舞伎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 1603 年。重要的是，这种时间上的重叠告诉我们，曾有一段时间，女歌舞伎中的女优和若众歌舞伎中扮演女角的男优曾有几十年的时间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他们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女优被禁以后，若众歌舞伎当然就接过了女歌舞伎曾拥有的人气，但他们并不是因禁令才产生的。[10]

其次，在若众歌舞伎和歌舞伎之间，我们可以看到男优的身体中所体现的一种连续性。如果我们考虑两个禁令完全不同的含义，这种连续性就很容易理解了。1652 年，像之前的女歌舞伎一样，若众歌舞伎面临的是一种全面的禁止。"[1629]十月二十三日。此通知由江户警察局局长发出。严令禁止最近在江户地区演出的女歌舞伎的活动，以及其他类似活动。因此，今后此类活动都不允许举行。"[11]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我们就会看到，这两个禁令的针对对象迥然不同。在 1652 年全面禁止歌舞伎演出之前，若众经常被"剥夺"留前面额发的权利："[1652 年]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因为若众歌舞伎已经被禁止，市内[某些]男孩子的额发被剃除。"[12]若众歌舞伎禁令指向表演者的额发，这很有象征意义。它强调了若众的额发作为一个能指的重要性。若众一词指的是男同性恋关系中的年幼者。因此，到了成年的时候，他们剃去额发，不再是"若众"。若众是

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如果失去了他们青少年身份的能指——额发,同样也不再是若众。因为若众歌舞伎禁令聚焦在额发这个能指上,若众就能发现一个可以钻的空子,而当年被禁的女优则没有这种空子。女优不能正式地回到舞台上;若众可以绕开禁令。剃除额发之后,若众可以宣称自己不再是若众,若众歌舞伎的若众就是这么做来遵守禁令的。实际上,早期的女形很多都曾是若众,之前都已经在若众歌舞伎中扮演女角[13]。他们剃除额发后,在头上带上紫方巾,又返回了舞台[14]。因此很自然地,从表演类型来说,歌舞伎与若众歌舞伎——而不是与女歌舞伎——有很强的共通性[15]。其实,歌舞伎“从本质上说,是若众歌舞伎一种更成熟的形式[不过其兴趣从舞蹈转移到了戏剧表演]。”[16]因为歌舞伎的女形和若众歌舞伎中的女角扮演着之间有着深刻的传承关系[17],我们应该研究若众,以求更好地理解女形的社会性别。

在历史上,武士阶级和佛教徒群体有很悠久的男同性恋实践的传统。[18]在这个传统中,被称为“若众道”(热爱男孩的方式)的男同性恋实践,不仅是“男性性行为的一个正常的内容”,也是富裕但社会地位低微的城镇男人得以稍稍认同于尊贵的武士阶级的一种方式。[19]在若众道的情境中,若众在与其成年且优势的伴侣——“念者”——的关系中有以下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最初定义了若者:(1)若众和他们的伴侣有着同样的社会性别;(2)若众是非常严格的瞬态的存在。在这种实践中,一个若众和他的念者会建立一种像婚姻关系那样紧密的关系。保罗·高登·沙娄(Paul Gordon Schalow)认为,“就像婚姻中一样,性(sex)只是这种男一童关系中的一个内容。”[20]

重要的是,武士阶级中的一个青少年与本阶级的一个成年成员形成一种类似婚姻的关系(后者是念者),是为了内化理想的武士男人身份:“成年男性爱人……必须给予这个男孩社会支持,情感帮助,还要为他提供男人气质的一个典范。作为回报,这个男孩应该要成为一个武士男人身份的好学生,以证明自己配得上爱人的垂青。他们发誓要一起捍卫武

士阶级男人的美德：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忠诚，坚毅，高尚。"[21]当若众达到成年时，要在外形上发生几种变化来象征他达到了成年，包括剃光了的额头。这时候，"他不再能作为若众与和他一样的成年男子形成性关系，但是现在他自己可以和一个若众发生关系了。"[22]在这点上，若众道和露西·伊利格瑞(Lucy Irigaray)所说的"示范性同性恋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处："父子关系保证父权制的权力及其法律、话语、社会结构等的传承。"[23]

这种父一子的比喻非常适用于武士的念者一若众关系，并且可以延展到这个语境中的若众的社会性别。原因有两个：首先，就像父与子一样，念者与若众这对伴侣有相同的社会性别。毕竟，若众需要学习(复制)念者的武士身份。井原西鹤的《男色大鉴》就比喻性地描写了很多若众，他们故意摆出一副很暴力的样子以显得很有男人气。西鹤的描写同时也提供一个若众行为模式的样本。[24]这种类型的若众虽然比他的念者年轻并且比后者地位"低卑"，却不能是柔弱的，不能是女人气的。在这种范式里，如果你美貌得简直像女人，以至于"没有人认为[你]是男人"，那你可能根本连一个念者也找不到。[25]再者，通常儿子总是需要成长为父亲，这样父权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同样地，若众也总是被期待成为一位念者，以保证武士男人身份传下去。[26]这象征着，若众性存在是严格地瞬态的。最初，就是武士中若众一念者关系的这两种特点决定了若众社会性别的"本质"：同一社会性别性以及瞬态性。这种若众，才是舞台上的若众——即若众歌舞伎——最初认同的对象，正如《男色大鉴》所"描写"的这种共性。

从作为"模仿者"勤奋学习武士男人身份的学生，到理想女人身份的具象表现，这之间的道路一定是漫长的。我要再重复的是，早期的女形自己本来就曾是若众歌舞伎中的若众。他们的彻底变化的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若众歌舞伎时期就在进行了。也就是说，在若众歌舞伎时期，"原型的"若众一念者关系中的第一个原则，即念者与他的若众有

着共同的社会性别，就被否定了。出版于1687年的《男色大鉴》，似乎抓住了若众的社会性别所发生的一个有趣变化：

在过去，男人情爱之道是粗野，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们说话粗糙。身材高大的若众最受欢迎，而身体上的擦磨伤痕被认为是此男人情爱之道的标志。甚至戏剧舞台上的若众也继承了[这样的特点]……但是现在到了连武士也不需要铠甲的时代。那么，在寻欢作乐的地方，连一把小刀也多余了。西瓜可以在厨房里切好，用盘子送上来。如此而已。那些被叫做若众的人简直就是弱不禁风。[27]

作者接下来就批评当时舞台上的若众的名字和衣着非常女性化，把他们和当时的妓女相比。[28]这样，17世纪晚期，男同性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过去，男同性恋不但是同性的，同时也是同社会性别的。但现在，若众的社会性别变得非常复杂了。

这种新型同性恋关系与社会性别的之间的游戏，体现了当时存在的一种叫"双成之美"(futanarihira)的现象。Futanarihira是个新造的词，是把futanari——即雌雄同体〔1〕——和在原业平(Ariwara-no Narihira)的名字放在一起造的新词。在原业平是9世纪的贵族男诗人。在文学传统中，他一直被当作美的极致。因此，这个新造词指的是雌雄兼具的绝世佳人。根据今尾哲也的研究，双成美人的范畴是这样的："他们漂浮在两极化的男与女之间，自己综合了这两性的原则，因此闪动着中性的、动人心魄的性感，也因此使男人和女人都感到愉悦。"[29]

一般认为，"双成之美"审美的流行，是因为长时间战争状态的结束。[30]绵及几代人的军事对抗逐渐转入政治稳定的和平时期。这种变化发生得缓慢但明确。其中1600年、1614—1615年、1637—1638年的几场

〔1〕日文"ふたなり"的汉字形态是"二形""二成"或"双成"，意思指一个东西可以有两个形状，特别是指一个人兼有男女两种生殖器。——译注

战役被认为是标志性的。这种变化不但带来社会转型，也带来了认识论的变化。对一直以来珍视着若众传统的武士阶级来说，变化尤其巨大。简而言之，武士阶级是统治阶级，他们的天职是打仗，但在一个没有战争的社会，他们自己就成了矛盾体。对这样一个尴尬，他们做出回应是反向形式的。比如，把格斗技巧演变成"武术"。[31]"双成之美"就是这个历史时刻大众眼中的若众标准以及若众（包括早期女形）这个审美领域的具象化。甚至在18世纪早期的女形中，"双成之美"审美还占据着主导地位。[32]

"双成之美"一词，以及我按字面翻译的"雌雄同体的美人"一词，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在今天，有人会觉得，一个和平的社会并且接纳雌雄同体美，那这个社会一定是自由的，是让人向往的社会。[33]但"双成之美"现象并没有那么单纯。首先，这个词的一部分，"双形"（futanari），意味着对一个阴阳人（hermaphrodite）的理解深深根植在性（sex）的二元论中。日语中，futa指的是数字"2"，nari指一个"人"或一种"正在变成"的状态。[34]其次，"双形"（futanari）与"双成之美"（futanarihira）是截然不同的。"双形"指的是雌雄同体；而不论雌雄同体程度如何，"双成之美"都从根本上指向男性。

我们必须强调，"双成之美"，即"雌雄同体的"美男，不能被简单理解为阴阳人。诗人在原业平毕竟是一个男性，而作为标准的"双成之美"是形容"若众"的，也就是说，它是为是男同性恋的实践者准备的。不论他们的社会性别如何，雌雄同体美人的性一定是被认定是男性。[35]这样，雌雄同体美人是对若众的流行标准的具象化；他们的性（被认为）是男性的，他们的社会性别在男与女之间游动。换言之，他们保有男性的性身份以及雌雄同体的社会性别身份〔1〕，这说明这两种身份类型不一定总是捆绑在一起的。而且，语言也说明，接纳雌雄同体美人的社会以前就对性有着毫

〔1〕 现代汉语因为已经被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的词汇塑造，所以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避免本质化指向。这里我们遵循常规将"androgynous gender"译为"雌雄同体的社会性别"，但是文章的论述明显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雌"和"雄"，而更倾向"男"和"女"的意思。——译注

无疑问的二元理解。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双形"被包括进了《病草纸》一书中,[36]"双成之美",雌雄同体美人,却被认为是美丽的若众。换一种说法,在这个范式里,"双形"被划进了疾病的类别中,和肛瘘、脓露、虱子等为伍;而"双成之美"却成为一种审美。二者对比非常鲜明。"双形"被给予了一种否定的属性,而"双成之美"则被给予了一种肯定的属性。我认为,在"双形"与"双成之美"之间某处有一个界线,这个界线划定了什么被诋恶。而雌雄同体美人可能从卑贱的处境中被(在原业平这位君子的美德?)拯救了出来。[37]无论如何,这个历史时期的若众将要失去一个重要的定义其身份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与其男性同性恋伴侣一样的社会性别。同样,若众社会性别的另一个特点,瞬态性,也面临着危机。

2. 永久瞬态性的悖论:女形大师的社会性别训练

在这一部分中,我将通过分析两个关于女形的重要论述来说明,在18世纪,女形的社会性别依赖于社会性别训练来克服若众社会性别的瞬态性性质。18世纪的社会条件注定女形要继续做若众,但是若众审美的瞬态性原则又不允许他们保持若众身份不变。这样,为了延长生命,他们发现有必要训练自己,让自己成为另一个社会性别——即女性特质——的"实行者"。我们将会看到,就是这种社会性别训练完成了女形的社会性别转化,使女形艺术达到完美,并因此使女形能够成为女人身份的典范体现。有趣的是,即使在这样一个要彻底脱离若众的关键时刻,关于若众的记忆似乎在女形的世界里阴魂不散。这表明了这个转化的戏剧性,它是多么急剧但又微妙。

在分析社会性别训练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先讨论这种新获得的"永恒性"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奇妙的是,"永久的若众"当时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它指向了若众在戏剧界生存下去的唯一的方式。实际上,它一出现就似乎是个"福气",尽管也好像是个计谋。《男色大鉴》写道:

> 当[若众]歌舞伎被禁之后，若众必须剃去额发，变成普通人。这样，若众和他们的主人都非常悲伤，像看着花骨朵还未开放就从枝头落下一样。但以后回过头来看，这简直是最幸运的。不论男爱多么美好，没有人可以在二十岁之后还保留着额发，继续扮演若众角色。但是，三十多岁的普通男人却假装是若众而被人拥抱。情欲之道似乎有些奇怪……演员可以在灯光昏暗的舞台上表演……只要是表演，七十岁的“若众”穿长袖和服也没问题(长袖和服只是年轻人的装扮)。[38]

这种“永恒感”极其不稳固，因为阳刚的年轻人才是若众的美感的源头。《男色大鉴》取笑了一位38岁的若众，由于年纪被暴露了，他非常尴尬。[39]毕竟，“若众的全盛时期只有四五年的时间[这比女人的要短暂得多]”。[40]女形是不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呢？也许吧。他们当时也许没有其他选择，至少在他们生存的社会中是如此。

从社会意义上，克服瞬态性是戏剧界中的若众的当务之急。在戏剧界里，被指定去扮演若众——念者制度中的若众身份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升迁机会。他们和武士阶级中的若众不同。武士阶级中的若众有一天会成为念者。但戏剧界里的若众生存在另一种经济制度中：男同性恋被以倡伎的形式赤裸裸地商品化。变童茶馆里的若众，不可能成长为作为消费者的念者，除非他们的经济状况，还有社会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初代芳泽是18世纪早期一个著名的女形演员。他曾在文章里详细谈到他的一个重要的保护人——这人无疑也是他的念者，橘屋。[41]但是，假使芳泽成为念者，我们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若众与他形成关系。据说，芳泽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5岁的时候，因为父亲的败落或死亡，他被卖掉，成了一个“色子”(iroko)，也就是男童伎，为成年男人提供性服务。[42]如果他能一直是武士阶级中的一员，毫无疑问他会成为一个念者。所以，像芳泽这样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成为念者的。只要他们继续留在若众—念者这个制

度中,他们注定是若众。

但是,在理论上,永恒性与若众的本质是矛盾的。换句话说,作为永久的若众的女形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体。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看到二者之间有这么重要的连续性,女形与若众在理论上是互相排斥的。把矛盾的双方结合在一起,这本身就很奇怪。二者关键的差异在于对时间的理解不同。从定义上看,若众追求是被世阿弥称为"瞬间绽放"的东西,而女形想要追求的是"真正的花朵"(true Flower[1])。[43]更重要的是,若众追求的是一个短暂的盛开而已,而不是什么有一天会变成真正的花朵的东西,所以瞬态性是若众最重要的本质。另外,佛教影响可能也是若众审美重视瞬态性的原因之一。无常是佛教世界观里很重要的一个基本认识。我们应该记得,佛教社群是男同性恋盛行的另一个场所。这样,若众有着严格的年龄段规定,视觉上有额发作为他们身份的指示。在幕府禁止若众歌舞伎之前,一个人即使再美貌,也不能在一定年龄之后仍拥有若众的身份。[44]

对若众歌舞伎的禁令本身虽然严厉无情,但是在瞬态原则方面,这个禁令却产生了一个漏洞,给女形带来一个微妙的矛盾。因为若众被逼得走投无路,就发明了头巾这个假能指。头巾不但能成为失去的额发,而且实际上还带出一个副产品,这就是永恒性。这真的是好运气吧。新的规定要求,所有的男演员都要在比若众习俗所要求的年龄提前剪去额发。任何男人,只要超过了十四岁,都必须把额发去掉,把头发梳成男子的样式。[45]所以,所有的男优,包括那些本来有资格做若众的,都失去了额发这个能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没有人能宣称自己是若众;那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宣称,如果没有这个规定,他本来该是若众。形象一点说,"这个新规定……使男人终生从事表演成为可能。"[46]女形剃去额发后,戴上紫色头巾,这条头巾就成为青年身份的一个假能指。同样,戴头

〔1〕"花"在世阿弥戏剧表演理论中是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和词语,所以本文作者将英文单词大写。——译注

巾的女形是个矛盾的存在，因为这意味着他是一个永久的若众，但被年龄阶段界定的若众是绝不能持久的。这个两难在理论上是彻底的，在实践中却难以捉摸。正如我们在《男色大鉴》一书中看到的，禁令非常有效地延长了若众作为女形的寿命。如前文所述，在这个变化最后完成前的很长时间里，雌雄同体若众审美在女形中影响巨大。这个理论上的悖论很长时间后才凸显出来。

所以，尽管源自若众的雌雄同体美男的审美对早期的女形有决定性的影响，女形一旦产生，却必须切断自己与前辈——若众——之间的关联。这就意味着女形无论如何都要维系自己的存在，即使不得不冒险去放弃若众最基本的原则——瞬态性，并因此放弃最受推崇的雌雄同体美男的审美。好比一个唱女高音的少男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男高音，"瞬间绽放"要成为永恒的花朵，他们必须做些工作。这样的转变造就了以艺术方式表现理想女性特质的男优。18 世纪早期的名角初代芳泽（1673—1729）、初代濑川菊之丞（1693—1749）通过严谨的社会性别训练，做了这些"工作"，以此完成了最终转型，并且在 18 世纪把女形的艺术推向了完美。

初代芳泽被认为是开创新纪元的女形，他决定了以后的时代中女形的本质。人们认为是他把女形艺术推向完美，而且他被认为是"[女形之]道的保护神"。[47]他的著述，《菖蒲草》，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有关女形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两部著述之一。另一部通常称为《女方秘传》[1]，作者为濑川菊之丞。普遍认为濑川菊之丞直步初代芳泽的后尘。[48]我在这里用《女方秘传》做为初代芳泽的补充，来进一步阐明《菖蒲草》中的观点。《菖蒲草》被收录在《役者论语》(1776)中，其中不但分析了女形的表演技巧，也有对女形艺术的思考。而《女方秘传》被收录进《古今役者论语魁》(1772)，主要是讨论表演技巧问题。[49]这两部著作都产生于一个有趣的交

[1] 此处保留日文著作原题对"女方"两个汉字的使用。——译注

合处,在这里我们观察女形社会性别的变化。学界很多有影响的研究都把女形艺术的完美看作是一种变身(metamorphosis),而不是仅仅是模仿。这些研究认为我们能够在《菖蒲草》中看到朝这个方向的变化。然而我认为,初代芳泽和濑川菊之丞初始的目标并不是变身;女形表演的艺术完美是建立在严谨的社会性别训练上,女形操演的基础则是初代芳泽所理解的女人的客观陈述。

与若众的本质——即瞬态性——不同,《菖蒲草》和《女方秘传》提倡永恒性作为必须的追求。《菖蒲草》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女形保持年轻并且一直被称为"年轻"的重要性:"一个女形即使是过了四十岁,仍可以被叫做'若—女形'[1]。我们可以坚持叫他们女形。但是'若'这个字被放在'女形'前面。因此,他不应该让花样的感觉消逝。'若'字虽小,但却是女形在一个重要时刻的大问题。"[50]《女方秘传》则更为大胆,认为四十岁以上也不是问题。它提出,一个女形临死的时候要为自己穿好衣服,戴上紫色头巾这个代表"青年"的替代性能指。[51]初代芳泽与濑川菊之丞本身非常忠于这样的原则。《役者评判记》是江户时代(1600—1867)流行的一本刊物,主要是给男优排名。这本刊物在1719年菖蒲四十六岁的时候,还把他的姿色评为"三国无双"。[52]但是,两年后,他不再扮演女角,开始转为扮演男角。他的这种选择违反他自己定下的女形的要求。[53]他做男角很不成功。所以,一年后他又重开始扮演女角。因此他专门在著述里提到四十这个年纪是很有深意的。濑川菊之丞似乎幸运些。一个1750年的文献这样描述他:"虽然他年近花甲,但[青年人穿的]美丽的长袖和服在他身上仍然非常合适,这真令人难以置信。"[54]

为了达到永恒,这两部著述列出一丝不苟的、自觉的而且是终生要坚持的社会性别训练方法,目标就是要实现"女人气质"。他们选择"女人气质",并不只是因为女形是扮演女角的。他们的前辈浸淫在雌雄同体美人

[1] "若"这个日文汉字的意思是"年轻的",读为"わか"(waka),在这里被放在"女形"(onnagata)前做前缀组成一个词。——译注

的审美哲学里，而他们自己的审美是在男与女之间沉浮的社会性别。所以，这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他们的艺术中，他们在那个时刻决定把女人气质表现为他们在舞台上的社会性别，并且这种女人气质是他们对女人如何表现的概念化。这里的女人气质和我们在《男色大鉴》等文献中读到的以往的思维模式不一样。《男色大鉴》所展示的男同性恋的实践（“男色”，字面的意思即为男欲），是不同于并且优越于“女色”，女欲，即男人的异性恋活动。在这个范式里，若众是男人喜欢的伴侣，正因为这个关系从任何方面看都是同性恋关系。与此不同，濑川菊之丞认为，一个女形演员必须能让男人追捧者把他当成女人一样追求：“一个女形演员不应该被女人喜欢。要是女人想成为女形演员的丈夫，那就糟糕了。女形演员要由很多男人来追捧，这些男人的梦想是，‘要有个女人像他那样多好啊’。”[55]濑川菊之丞认为女形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是幻象的女色或是替身的女色，而不是像《男色大鉴》定义的那种“真正”的男色关系。[56]换句话说，他提出的女形，不管是不是虚幻的，都是男人理想的“异性恋”配偶。两部作品中所提出的社会性别训练是种方法论，使女形获得这样的女人气质。

具体来说，《女方秘传》简练地用十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表演技巧，对此很多研究已经有论述。[57]这些章节规定了在各种情形下怎样做看上去像个女人。书中讨论了怎样用小道具、化妆品等，让自己看上去很有女人气质（第一、二、六、七章）；女人外貌和状态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情绪状态还是社会状态（第三、四、五章）；怎样用化妆品让女形的脸不显出皱纹（第八章）。[58]相比之下，《菖蒲草》的二十九章论述更加详细，比较有哲理性。如研究者指出的，书中充满了今尾哲也称之为道德伦理的东西。[59]初代芳泽要求女形外貌要调皮，但心灵必须纯洁（第三章）。女形每天要像女人那样生活（第七章）；不要轻易扮演女强人角色（第八章）；要避免使观众发笑（第九章）；要重视贞洁（第十三章）；即使在化妆室里也要保持女形的样子（第二十二章）；把自己的妻儿藏匿起来（第二十三章）；尽量不要与女人

的情感相偏离（第二十四章），要保持年轻（第二十九章）。[60]除了提出女形要"在脑中"构想具有女人气质的外貌，同时他还提供了身体举止的实用指南（第二、六、十二、二十四章）。[61]简而言之，女形应该总是有女人气质的自觉——不仅在大脑中而且在身体上。

仔细分析两本书我们就会发现，初代芳泽的教导的多重性简直难以捉摸。他的教导说明，女形的"女人气质"是根据"与男性特质对立的各种女性特质"来具体地建构的。这里面有三个问题。首先，虽然初代芳泽在第七章说"除非一个女形每天都像女人一样度过，否则他达不到技艺精湛的地步"[62]——这句话很多人引用，他实际上积极地评价女形身体里的"天生的"男性特质。从一开始他就不假思索地谈论男性特质。他说："如果一个女形能驾驭高级艺妓的角色，那别的[妇女]角色对他来说就易如反掌了。因为[女形]本来就是个男人，所以他身上天生就有某种严厉、尖锐的东西。"[63]这还被认为是女形在出演某些角色时必须利用的东西："有时候，你要扮演武士的妻子，她有刀。她要用男人的方式拿这把刀。比如，你要扮演一个被一大群人追赶时努力去保护公主的女人。"[64]初代芳泽进一步建议，女形要把自己的妻儿隐藏起来。但是他好像并不想讨论更基本的问题——女形应不应该结婚生子："一个女形应该不让人们知道他有个妻子。如果人们问及他妻子的时候，他却不脸红，那他可能就不能做女形，更不可能在这个行业里成功。不管他有多少个孩子，他自己要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这是一个优秀女形的本质。"[65]在这点上，虽然断然脱离了若众，女形却和若众有着一个同样有趣的特色：他们都用某种方式保留着"男性特质"。我稍后将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把这些男性特征作为相反的标准，女形的操演经常同妇女的"客观特点"相连：软弱（第八章）；不善于令人发笑（第九章）；在人群前容易退缩（第十二章）；贞洁（第十三章）。[66]例如，关于女人不善于逗笑这一点，第九章中写道："[初代芳泽曾经给另一个女形这样的建议：]不要尝试逗观众去笑。如果他们看到一个动作，自发地大笑，这是可以的。但是故

意逗人笑不符合女人的本来情感。"[67]这句话后半部分的说法，好像是一个关于女人的客观真理(客观陈述)，这个真理恰巧支持初代芳泽的议论。一个纯粹的假设层面的客观陈述是这样的，说话者排除所有可能的变量，直白、客观地陈述一个事实。但是，后现代主义对操演性的探讨已经揭示了这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我们宁可把"客观陈述性的"看成是(有意无意地)伪装起来的操演性的内容。这种"甲为乙"的陈述方式最可能把乙的属性归结到甲上。这样，最后一句"女人们不会故意去逗人笑的"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可以和另一句没说出来的，甚至没被意识到的话连在一起："我认为[女人们不会故意去逗人笑的]"。这句话暗含的是期望，是规训，也是禁止。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句子，"女人是贞洁的"。如果这是一个客观陈述，那我们如何解释很多社会里存在各种各样惩罚通奸的法规呢？所以，女形关于具有女人气质的样态的理解，既是他们对女人的观察，同时也是一种主张，规定女人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这种操演性的与客观陈述性之间的模糊关系会产生一个反面效果，即，很可能女形的操演可以在技术上成为关于女人的一种客观陈述，进而成为女人身份的典范表现。

第三，初代芳泽对女性特质的总结不但依据"阶级"，也依据"程度"。如詹妮弗·罗伯斯顿(Jennifer Roberston)所指出的，与性别和年龄阶段一样，阶级也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因素，决定着一个人像不像女人。[68]因此，在女形决定对某个角色需要有什么样的女性特质的时候，阶级是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初代芳泽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二、三、六、十二章)，濑川菊之丞也是如此(第五章)。[69]而且，初代芳泽还引入了另一个评判标准来理解女性特质，这就是女性特质的程度。第一章中，他写道："如果一个女形能驾驭高级艺妓的角色，那别的角色对他来说就易如反掌了。因为[女形]本来就是个男人，所以他身上一出生就有某种严厉、尖锐的东西。所以，假若不加以特别注意，他不可能去具体体现高级艺妓的特征——天真和温柔。"[70]这里，高级艺妓被认为是个有挑战性的角色，因为她具有女

性特质最核心的内容，这是与男性特质相反的极端。与其他女人相比，她更女性化，因此也就最不男性化(less masculine)。因为其他女人没有像艺妓这么"女人"，由另一极端的人(即女形)来表现，也许是比较容易的。

学术界高度评价《菖蒲草》的第一章，不加质疑地接受其观点。这说明，"女性特质的程度"这个观念一直是被当成是自然的，直到最近才受到质疑。[71]但是在当时，这个观念一定是非常新颖大胆的。比如，它和世阿弥在15世纪提出的表演理论非常不同。世阿弥认为，男优表演一个女角的难度，取决于他能够多大程度地了解现实当中的那类女人。根据这个观点，宫廷女官是难表演的，不是因为她们更"女人"，而是因为她们平时不为人所见。[72]用世阿弥这个观点看，对初代芳泽来说扮演一个高等武士的妻子应该有困难，而扮演高级艺妓则容易些，因为初代芳泽无疑更容易接触到后者。尽管如此，初代芳泽则认为，表演角色的难度与女性特质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他甚至暗示，在一定程度上，武士妻子的角色表演起来应该更简单，由于她们有一些严厉、坚硬的特点，所以她们对女形来说其实是更接近的，因为女形天生就有这种倾向。[73]艺妓更"有女人气质"，因此也就较少男人气；武士的妻子更有男人气，因此较少女人气。这样女性特质就被排列出顺序来，艺妓在顶端，武士的妻子在另一极端，这些女性特质因此几乎完全是操演性的。

这些关于社会性别训练的描述，不但揭示了舞台上下女形的社会性别，也使我们对社会性别及其体制有一些了解：(1)社会性别身份可以是和性身份分离的；(2)社会性别的二元论其实建立在社会性别的宽谱基础上；(3)社会性别是表演，而不是再表现。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即便在女形把自己作为女性特质永远的表演者、作为非若众以区别于若众的时候，若众的影子仍然存在。

首先，女形"实行"社会性别的方式和雌雄同体美人"实行"社会性别的方式完全不同，但这两种方式又有奇特的共谋。简言之，他们都保留了一个与社会性别身份截然不同的性身份，这意味着这两种身份并不是必

然联系的。先前已经讨论过，雌雄同体美人绝对不是阴阳人。他们被看作是男性，是男同性恋实践中令人向往的伴侣，他们的社会性别在男与女之间游移。女形也坚持自己的身份为男，但却追求女性特质。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在耍弄所谓的两个“基本”社会性别：保持一种社会性别（男）的同时，雌雄同体美人“实行”另一个社会性别；这个社会性别在那两个所谓“基本”社会性别之间。而女形则同时表演两种社会性别。在这些“不自然”的情况下，他们都是用极为显著的方式在“实行”社会性别。[74]这种现象在最初的武士若众和《病草纸》曾取笑过的阴阳人身上没有这么显著。武士若众和阴阳人的社会性别和性身份被认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75]女形和雌雄同体美人成功地扰乱了性与社会性别之间假定的稳定性，质疑这种稳定性是否真的有效。不管怎样，这种在性身份与社会性别身份之间的划分在理论上提供了一种可能，使得性身份为男的人——即女形——得以表现理想的“女性”社会性别身份。

第二，初代芳泽用程度不同来排列女性特质，这说明在社会性别制度中，雌雄同体美人和女形之间微妙地合谋：社会性别二元论的存在，需要一种相反的把社会性别看作一个连续体的观点。初代芳泽对女性特质的排序，假定高等艺妓身上存在的女性特质的核心或本质，这其实暗示着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二元对立存在的可能。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这种趋向二元对立的运动，在理论上需要有一个连续体的存在。在第一章中（有关艺妓一章），我们发现“更女性的”与“不那么男性的”是可以互换的，也就是说，它们虽各处一极，但有着共同的轴。这说明，女形当时有可能在被冷落的雌雄同体美人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总之，一个“连续体”，加上所谓的“向内引力”（比如，“更女性的”），就等于“二元”。正是在这种宽谱与两极化的亲密共存当中，我看到了女形与雌雄同体美人之间的共谋，或者说，看到了对后者徘徊不去的记忆。

现在来看，这种共谋关系指示了日本社会性别制度日后的方向。学者们已经指出，在现代之前，日本不存在单一的女性特质，并且，女性特质

不仅是与性别相连，也同阶级和年龄连系在一起。但是，排序的女性特质概念，含蓄地预期了单一的"女性特质"的创造，因为这样的概念以情欲为主去排列不同的女性特质。换言之，虽然初代芳泽在实践中并不抛弃阶级这一条件，但他提出的情欲的宽谱这一概念，从理论上则否定了阶级多样性。[76]也就是说，在这个排列过程中，连续体的存在是必须的。社会性别在宽谱与二元化之间来回摆动，后来一定是在趋向二元化，但这个动态的过程如果没有宽谱的存在就不可能发生。初代芳泽所做的选择是用情欲的宽谱取代阶级差别，在这个特殊历史时刻做这样的选择，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方面，它似乎预见着在即将出现的二元论社会性别制度中那个单一的女性特质所凝缩的历史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充满了对过去的一个历史存在的回忆。

第三，若众的历史研究所提出的变身假说，被社会性别训练的叙述深刻地质疑了。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首先，考虑到 18 世纪日本的情境，我们很难说这种严谨的、自觉的、终生的训练是一种"变身"。在这里的"变身"一词必不可免地体现着一种佛教对世界的理解。[77]在佛教的宇宙观里，变身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顿悟，不论它的发展是"缓慢的"还是"突进的"。[78]但是，很难想象，一个顿悟了的女形（即，一个变身了的女神）应该在他走下坡路的时候被人指导如何打扮。

此外，初代芳泽追求女性特质，但他并不抹杀他所说的自己的自然的男性特质。在书里，他不否定男性特质，反而认为男性特质对女形艺术非常重要，更不用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生育后代。初代芳泽至少有亲生的四个儿子后来成了女形，他们的表演优秀到了足以被文献纪录下来。这个男性特质的"残余"和变身假设是矛盾的，因为变身应该是从一物到另一物的彻底变化。初代芳泽所论述的女形则难以捉摸得多。女形在舞台下像个女人一样生活（第七、二十二章），总是保持女人的情感与贞洁（第十三、二十四章），别人一旦问及他的妻子，他就真的羞红了脸（第二十三章）。他脸红，但却不诧异，因为他的婚姻和孩子都已经通过《役者评

判记》等作为歌舞伎与爱好者纽带的流行刊物而为人所知了。(这些刊物中也能找到有关初代芳泽的四个儿子的文章)简略地说,虽然女形要像女人那样生活,但他们是男的。所以这个变化不是变身,而是把一个形象加到另一个形象上。而这种叠加实际上与人们对歌舞伎的长期一贯理解是一致的。服部幸雄认为这是种"兼演的"变化,一个表演者先是把自己变成演员,演员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角色,然后再变成要扮演的角色。重要的是,第一个变化是不能抹消的。[81]它是一个表演,而不是再表现(粗略来说,再表现这种表达形式,抹掉自己中介的性质,看上去仿佛是直接的和现实的。但表演这种表达方式,则公开表露出自己的中介性质)。[82]

3. 戏剧、身体以及范畴的可渗透界限:女性特质的模仿与传播

同时代人评价道,初代芳泽"从脚到头都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濑川菊之丞则"根本不需要那个'形'字来称呼他。"[83](“女形”中去掉了“形”就剩一个“女”字,就是说,他就可以被当成女人。)如果用“替身女人”来指女形,那对这两位更合适却不适合早期的女形。早期的女形的美在于他们雌雄同体的身体。形象地说,濑川菊之丞就认为,女形应该要被男人想象成异性恋的伴侣。[84]在这一部分中,我将讨论18世纪里女形的社会性别如何通过模仿和引用建构起来。18世纪的著名女形都通过模仿的行为参与到建构女性特质当中来、保护他们的知识、努力达到女性特质的完美并使之成为第二天性。重要的是,模仿是个共同行为,所有女性特质的“实行者”,不论是女形还是妇女,都互相“引用”对方。由于女性特质的概念独立于女人的身体,女形和妇女通过传播媒介得以一起参与到引用的迷宫里。模仿因此就成为一个难以捉摸的行为,它帮助建构“女性特质”,却同时瓦解了“女人”这个范畴的边界(而“女人”正是女性特质所谓的母体)。

模仿在这个情境中有三重重要性,分别关于(1)起源(an origin)(2)密宗(esotericism)(3)修行(cultivation)。首先,模仿产生了一个关于

起源的幻象，这种幻象的不断重复在建构着同时也不断地加强着一个凝缩的历史存在。但是所谓的起源并不是一个纯真的的幻象。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通过展示"异性恋[如何]预先假定了同性恋，并成为其先决条件"，从而揭示了，无穷无尽的复制如何创造了一个关于起源的幻象："从逻辑上说，这种'起源'观念是让人怀疑的。如果没有一个次级结果翻回来确认那个起源的'独创性'，这个叫做'起源'的东西怎么可能运作呢？起源需要派生物的存在，以便确立自身为起源，因为起源只有与其一，体体派生物不同，它才有意义。"[85]所以就"创始性"或"模拟性"的程度而言，"同性恋之于异性恋，不是复制品之于原版的关系，而是复制品之于复制品的关系。"[86]就像这个同性恋/异性恋的例子所显示的，起源幻象一旦形成，就占据着作为"起源"的权威地位。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做为"("doing")的重复，创造着所谓的真正的起源，而我们会让自己去相信，那个起源是先于我们存在的。我们按一定的规范去行动，有的行为合适有的不合适，但实际上，这些规范本身就是通过不断复制的行动而生成的。因此，只有通过模仿，女形才能参与到女性特质的生成中；而且由于女性特质的"实行者"几乎都是妇女，所以模仿妇女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现代学者一直费尽心机地试图否认模仿的问题，尽管有初代芳泽和赖川菊之丞坦白地说过的那些话。他们不希望大师们去模仿。独创性在现代性中成了一个获得殊荣的属性。到今天，尽管"作者"已经被宣布死亡，并且我们现在把无限的引用当成起源的造物主，我们还是没有完全走出独创性的神话。[87]如马克·罗斯(Mark Rose)所言，"我们还没有准备……放弃对我们自己的认识。"[88]然而初代芳泽和濑川菊之丞的论述则存在于一个在理论上与现代性不相容的制度中。

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制度就是密宗。在日本的密宗实践最早是由空海(774—835)这位佛教真言宗的开山祖师创建并体制化。后来，密宗被广泛应用到从文学到武术的各个领域。在戏剧领域，据说是世阿弥引进了密宗实践，此后戏剧界一直奉行。密宗实践指一些人在其群体中用秘密

的方式传递一种具体知识的行动，比如某一戏剧的歌舞设计等，伴随着传递象征这门知识的合法性的东西(例如，传递仪式，象征性的物件，如珍贵的扇子、刀等)。通过这些实践，“知识”被概念化和商品化。简单来说，密宗的制度通过下面的方式来为一种具体的知识提供合法性：首先，提供这一知识的权威地位的，是被阐述的内容本身(如最先把这门知识传递给某个学派的创始人的神秘人物)。其次，阐述的主体——即后继的一些导师性人物，被纳入这个学问的传统、并因此又成为被阐述的集体内容的一部分。这种“追溯性的”过程——从精神分析来看的倒返现象——不断将阐述主体合法化，而且进一步将被阐述内容，即知识本身，合法化。重要的是，在这个范式中，合法化就是合理化。例如，世阿弥在关于能剧的阐述中，宣称自己是“接受”了而不是“创造”了学问。[89]现代研究有时候把他的这一表白理解为孝道的一个证据。我认为，他的阐述是存在于密宗体制中的，也根据密宗来运作。简言之，在这个体制中，如果他希望他传授的学问具有合法性，就必须证明这些学问一直被“适当”的人掌握着。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宣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学问的接受者。因此在这个体制中，模仿、重复和传递，正是知识被创造、被合法化、被强化的时刻。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恰当地评价初代芳泽、濑川菊之丞和世阿弥的论著中的“模仿”的积极意义。[90]

第三，“艺”(即获得的技艺)的实践者在获得知识以及理论化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模仿和重复。“艺”是个含义广泛的词汇，囊括武术、文学或者音乐方面的几乎任何技艺。获得技艺的训练过程叫做“修行”。修行本来是一个佛教词汇，意思指“一项实用性的事业，目的是通过对身体的训练而达到精神方面的训练以完善品格。”[91]在“艺”这个问题上，汤浅泰雄认为，修行首先在12世纪被诗人用来作为一种训练方法并进行理论化，之后又被戏剧演员运用。[92]这些实践者认为，修行有两个重要的阶段：(1)重复性的对姿态、动作等进行身体训练；(2)有关技艺的内化，使其成为第二天性。这里面很重要的是，重视身体训练的目的并非身体性技能

本身。这一宗旨虽然在武术和舞台艺术等运用身体的活动中变得不明显了，但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反映着其佛教源头。在佛教中，修行指的是通往"般若"的道路。般若指的是心的原态的大智慧，要达到般若，就要自我规戒和冥想打坐。[93]举一个很有说明性的例子。藤原定家(1162—1241)在他的诗论《每月抄》中说，写诗的时候，一个人的身体姿态是非常重要的。[94](这里的前提是，我们通常不把诗歌写作看成是一种身体性技能。)用汤浅泰雄的话说："身体存在的方式决定了头脑存在的方式。"[95]

此外，修行的理论认为，它可以被内化为"第二天性"。托马斯·P.卡苏里斯(Thomas P. Kasulis)总结汤浅的观点如下："慢慢地，……姿态成为自然的或者第二天性。说它是第二天性，因为头脑已经进入了黑暗意识中，并给予它一个形式。这是一种习得的天性。"[96]因此，修行寻找的是一个方法，从被作用过的中介状态中产生类似直接的状态。[97]所以对于女形这些修行的实践者来说，身体动作方面的"纯粹的模拟"(比如怎样举起手)，如果重复足够多的次数，就能使他们从精神上达到女性特质。总结以上的要点可见，模仿是一种方式，初代芳泽与濑川菊之丞等能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女性特质的建构，巩固自己的知识，获得完美的女性特质，并把它变成自己的第二天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的日本，女性特质的引用过程明显是互惠的。根据濑川菊之丞的说法，"一个女形不应该被女人喜欢。要是女人想成为女形的丈夫，那就糟糕了。女形要有很多男人来追捧，这些男人的梦想是，'要有个女人像他那样多好啊。'对女戏迷来说，女形应该具有促使她们去效仿其时尚——如梳子、发夹、[前额上带的]头巾、衣服和带饰等——的能力。"[99]在这里，女形不但清楚自己作为男性凝视的客体的"被观看地位"，[100]同时他也清楚意识到，在女性特质的"实行者"互相引用的链条中，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意思的是，头巾本来是若众美的一个替代性符号，现在它自己成为女形美的一个象征。)要使男优被纳入

到这个链条中，甚至要让男优被推上典范的位置，有两个条件必须满足：(1)要存在这样的认识，即：女性特质不必以女人的身体为基础，(2)存在一种媒介，女形和妇女之间的社会性别互动通过它来进行。在18世纪的日本，这两个条件都被满足了。

首先，理想的女性特质在概念上脱离了妇女的身体。我们可以从《女大学》中看到这一点。《女大学》出版于18世纪早期，是当时流行的一部关于妇女言行训诫的书籍。[101]它认为，自然的女人本身具有一些天生恶劣的特征，所以她们需要被教育，才能获得理想的女性特质。构成论——更确切地说是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在这里合谋来建构理想的女人身份。[102]首先，它规定了妇女的衣着(第十二、十四章)，日常杂务(第十、十七章)，姿态(第十、十七章)，使妇女能获得好的精神(第二章)，从而拯救她们整个的人生(第十九章)。[103]这应和着修行对于身体模仿的关注；它认为身体模仿可以创造一个人的精神属性。在这里，女性特质是女人的第二天性，正如女性特质是女形的第二天性。妇女和女形都应该通过修行获得它。

另外，生物学意义上的母性获得了一个特别的意义。在18世纪的日本，对“家”(即单枝家庭制度)的维护成了“家”存在的理由。而且，在当时的社会里，已经有一种佛教的宇宙观，认为“个体的发生概述着本体。”[105]在这里，从一个个体的死亡到另一个体的出生，这个轮回就象征着整个宇宙。这种观点严格上说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赋予生物意义上的母性最重要的女性特质的地位；而没有生育能力的人群，不论是男是女，都不能参与女性特质的建构。我们今天回顾18世纪，发现在当时的日本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根据胁田晴子的研究，日本出现的是一种叫“借腹”(hara wa karimono)的现象(腹，就是子宫，是借来的)。[106]这意味着人们当时不再重视“作为传递工具的子宫”，而是重视“作为乘客的胚胎”。子宫可能曾经被神圣化；但在这个范式里，子宫是单独存在的，从未被神圣化，从而也未能将妇女整个身体神圣化。[107]《女大学》就印证了这个观点。书中列

举了女人的“七出”:不事姑舅、无子、淫泆、妒忌、恶疾、口舌、盗窃。在这七种“致命的”恶中,只有无子是可以饶恕的:“但是,如果这个妻子仍然心正,行动符合礼仪,不嫉妒,那她就不用被‘出’,并可以养育同姓氏的儿子。或者她丈夫的妾生育了孩子,那她也不用离去。”[108]这种救赎的另一面,是妾的境遇。她是“家”的继承者之一的生理上的母亲,但却没有被给予相应的继承者的母亲的地位。即使她生了儿子并且儿子成了继承人,她仍不能只靠这一点就登上社会阶梯。不可能有什么“超人子宫”来奇迹般地改变这种状况。生物母性的这种具体的地位开启了一种可能,使不能生育的人也能代表理想的女性特质。于是,在这种范式中,女形的身体成为投射女性特质的理想场所,因为女性特质的建构可以不去涉及到生物学意义的女人的本质之恶。

第二,在当时,使妇女得以模仿女形的女性特质的媒介非常丰富。我们所说的媒介并不一定只指去戏院看戏。在当时女性特质的传播中,其他的传播媒介也起着同样大的作用。原因有两个。首先,去戏院的只是歌舞伎迷中的一小部分。歌舞伎戏院的容纳能力很小。[109]这样,就像戏院指南中说的那样,“戏迷虽然众多,但真正光顾戏院的却是少数。”[110]但是,不去戏院的爱好者们有很多其他的途径来“观戏”。关于歌舞伎的出版物,如《役者评判记》,当时非常流行,通过图片和语言等手段提供关于演员和歌舞伎的信息。当时有很多图书馆,进一步促进了出版以及戏剧读物在戏迷当中的流传。很多别的比较便宜的表演艺术都积极地模仿歌舞伎及其名角(这些艺术形式包括无执照的小戏院,声音模仿等)。在出版物中,甚至出现了一种流行的体裁,叫“鹦鹉石”。这是种指导性书籍,用歌舞伎戏中的台词教人们怎样进行声音模仿。这种非常接近去戏院的行为拥有更大的空间——模仿和重复是没有限制的。

更重要的是,尽管这两种“观戏”的行为——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拟的——并不互相排斥,但是在后一种形式里,人们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到引用和传播当中。名演员的声音、口音、姿态、手势、动作、衣着和装饰都

被连篇累牍地详尽报道出来。[11]我想，几经被作用之后的模仿更容易抹掉"被模仿的原型"。引用、传播的过程越漫长，产生的复制品就越多样。于是，找出所谓的原型就更加困难。例如，如果在一个18世纪乡下小镇上，有一个商人的妻子，她买一种叫"江户鹿子"的布料（江户的鹿子花色），但是在江户，这种布料被叫做"小太夫鹿子"，是以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期间非常著名的女形伊藤小太夫的名字命名的。那么，这个妇女是在追随江户妇女中流行的大城市风尚呢？还是在追捧这位女形男优呢？她一定不能明确说出是哪一个，我们也不能。这个迷宫恰恰是18世纪日本人如何"实行"女性特质的缩影：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既是引用者，也是被引用者。形象一点说，他们都只不过"被当成是"（passing）有女性特质的。〔1〕

4. 后记

到这里，我们的回顾结束了。我们看到了女形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漫长路程。这个过程是激剧的但又是微妙的，因为女形存在的基础，其实是理论上对女形的实践基础、其先行者——若众——的否定。他们否定了若众的"本质"特点，包括若众美的来源（即它的瞬态性），从此开始需要社会性别的训练。他们的社会性别训练不但展示了女形社会性别的构成，也预示了社会性别制度的发展方向。这个社会性别训练也能为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模仿的功能，以及模仿的有趣意义。社会性别训练即以模仿为基础。通过模仿，18世纪女形的名角们参与到女性特质的建构中，巩固了自己的知识，达到将完美的女性特质变成他们的第二天性。通过模仿，女性特质的"实行者"——其中包括妇女和女形——

〔1〕"Passing"是社会性别和种族理论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常指一个处于从属性、被歧视的范畴的人，由于相对于同处这一范畴的大多数人而言有某种优势，而更容易"混入"或"被当成"占统治地位的人群/意识形态。比如，肤色非常白的黑人，有钱的犹太人，就常常被研究者们用来作为"passing"的例子。——译注

传播着这一社会性别，并暴露了妇女这个范畴的可渗透性。从这个方面来看，女形参与了一项矛盾的事业。一方面，他们"实行"女性特质，有效地展示了"女人"这样的范畴的可渗透性和时空具体性。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在那些著述中看到的，他们提出一种女性特质的概念，参与促使社会性别制度朝着某一个方向发展，使女性特质成为单一固定的概念。

在这个过程中，女形的社会性别表现出一个戏剧性的轨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女形在社会性别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勤奋的、骄傲的年轻男孩，从年长者那里学习男性特质；然后变成"雌雄同体"的美人；最终成为在女性特质的传播中有主导地位的参与者。确切地说，我应该说"女形的多种社会性别"。但我还是继续用单数的社会性别吧。因为这种"虚伪"正好强有力地证明，社会性别一般来说在一个很大范围内不定的。我们看到很多"交叉口"。在这些交叉口，女形的社会性别完全可以朝着别的方向发展。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确定性，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不确定性；他们那个时代的引用的迷宫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迷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七、十八世纪女形的社会性别，不仅仅指向了之后在日本发生的女性特质，同时也非常戏剧性地把社会性别视觉地展现出来。

本文发表在：

Positions, 10:2(2002):245 - 284

郑岩芳 译　张　颖 校

附注：

本文献给琳达·哈特(Lynda Hart)。琳达阅读了这篇文章几个不同的版本，但却在正式出版前不幸谢世。我非常感谢 Ayako Kano 和 William R. LaFleur。他们从我一开始提出设想就认真引导我，也感谢 Eli Noah Alberts, Bruce Baird, Patricia Schiaffini-Vedani, Bert Scruggs, Cecilia Segawa Seigle, G. Cameron Hurst III, Linda H. Chance, Jennifer Robertson, Gregory M. Pflugfelder, Michael Molasky, Arlene

Teraoka, Ann Waltner, and Lynda Hart。他们都给了我宝贵的评语。我同时感谢*Positions* 杂志两个匿名的评审员及其高级编委 Tani E. Barlow,感谢她对这个题目的兴趣。本文也受益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提供的一个研究基金,使我能够参加 1999 年康奈尔大学 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的第二十三期的学习,它给我提供了最好的环境,使我能进行理论的、跨学科的思考。

注释:

1 詹妮弗·罗伯斯顿(Jennifer Robertson)将这个时间段具体称为"德川时代[1600 -1867]"(以降)。Robertson, "The Shingaku Woman: Straight from the Heart", in the *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 1600 - 1945*, ed. Gail Lee Bernste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90; Ayako Kano, "The Roles of the Actress in Modern Japan", i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eiji Japan*, ed. Helen Hardacre and Adam L. Kern (Leiden: Brill, 1997), p. 190。

2 非常概括地说,"操演性"的概念解释了一个"实行"("doing")怎样参与一个"存在"("being")的建构。就社会性别来说,操演性的概念很重要,因为它的基础是针对生物决定论(即生物属性决定一切)与文化决定论(即社会性别是社会产品)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差异)的批判。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都以一个现代的、由形而上学理论设定的主体为前提,它们对"社会性别如何获得"这个问题的描述有同样的结构。在它们的模式里,人被认为是能动性的形而上的场所。在生物决定论中,"自然"(大写的 Nature)把社会性别赋予这个人的主体;在文化决定论中,"文化"(大写的 Culture)赋予社会性别给这个人的主体。这种"赋予社会性别"(gender-giving)的结构,其基础是关于物质的形而上的假设。操演性的概念则发现这样的一个结构其实是错觉的。社会性别不是自动被"自然"或"文化"赋予我们每个人,社会性别的建构要通过我们的"实行"("doing")。也就是说,通过我们引用(cite)别人"实行"性别(别人的"实行"也是引用)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性别是文化地建构的,并且认为它是不稳定的。由于"引用性"(citationality)的存在,所谓纯粹的原型(即被假设为从来没有进行过引用的原型)是不存在的,连一个极为精确的模仿(即一个完美的复制,与其原型完全一致的复制)也是不现实的。社会性别既受文化限制,又以文化为条件。因此我认为,女形的社会性别显示了社会性别的这些方面。参见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Butler, "Imitation and Gender Insubordination", in *Inside/Out: Lesbian Theories, Gay Theories*, ed. Diana Fuss,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3 - 31。

3 Anne Fausto-Sterling, "The Five Sexes: Why Male and Female Are Not Enough", *Sciences* 33, no. 2 (March-April 1993): 20 - 25; Fausto-Sterling,

Sexing the Body: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78 - 79, 101, 110.

4 因此，从理论上来看，"构成性他者"没有本质的、内在的特征。例如，上野千鹤子提出，在很多社会里，妇女与自然(相对于文化)联系在一起；但在有时妇女也被与文化(相对与自然)联系在一起，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但是同时，这种理论上的"不稳固"并不会否认社会性别在实践中有极强的约束性。例如，上野氏指出，就劳动性别分工问题来说，"在所有社会，'打斗'都是由男人垄断的一种行为。"因此，当我在本文中使用"典型的"、"理想的"这些词的时候，这些词前面其实有一个隐蔽的词，那就是"据认为"。这些词后面是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具体规定了诸如什么是典型的、什么是理想的等等。参见上野千鹤子「女は世界を救えるか」；同氏，「家父長制と資本制」(東京：岩波書店、1990)。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所有翻译都由作者本人由日语翻译到英语。

5 "歌舞伎"一词源自动词"傾く"：(1)倾向；(2)行动或衣着脱离常规，风格奇异。最初，其中的三个汉字一个表示歌唱(歌)，一个表示舞蹈(舞)，一个表示女演艺者/妓女(妓)。后来，"妓"字被表示性别中性的"伎"字取代(这样也就暗含着男性的意思)，表示性别中性的演艺者/优人、技艺和才能等。但优人和他们的主顾之间色情的关系还一直存在。

6 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英语的 female impersonator 作为对"女形"一词翻译成功地传达了原意。女形("女"的"形")一词的字面意思并不显示"扮演"的意思。关于"形"的具体意思，存在着几种说法。詹妮弗·罗伯斯顿认为，"形"指的是"要去接近的样板模式"(Robertson, "Gender-Bending in Paradise: Doing 'Female' and 'Male' in Japan," *Genders* 5 [summer 1989]: 53)。不管怎样，我们不能忽视女形的"扮演"因素，不管在它的雏形阶段还是其他。

7 我们的确从历史文献中了解到，类似的禁令被不断发布，这说明禁令要起到效用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参见服部幸雄「歌舞伎の成立期」，武井协三「若衆歌舞伎・野郎歌舞伎の研究」，鳥越文藏はか編「岩波講座　歌舞伎・文楽　第2巻」「歌舞伎の歴史」(東京：岩波書店，1997)，30—32，36—37；伊原敏郎「歌舞伎年表」，河竹繁俊、吉田暎二編「歌舞伎年表」(東京：岩波書店，1956)，24，49，55，63—66。《歌舞伎年表》是一部长达八卷的有关歌舞伎的编年史资料(1559—1907)，由伊原汇编，引用大量原始材料，包括很多没有出版过的文本。

8 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还有一部分的女优留了下来。她们人数不多，对女形也不会构成威胁。讨论女优在边缘场所的幸存下来问题，小笹吉雄「日本現代演劇史」(東京：白水社，1985)，61。

9 武井协三「若衆歌舞伎・野郎歌舞伎の研究」，35—36。

10 这也许能解释下面的观点。从表演的类型学角度来看，有人指出女歌舞伎与若众歌舞伎是不相关的。参见 9，35—37；参见郡司正勝「歌舞伎のかたち」，「郡司正勝删定集」(全6卷)(東京：白水社，1991)，2：201。实际上，如果青年男子

和女人同时都参与歌舞伎(即歌、舞、卖淫)中,并且女歌舞伎又比若众歌舞伎更有人气,那么这种人气度的不同正说明他们两者间在娱乐艺术方面异大于同。毕竟,在女优禁令颁布前,虽然若众歌舞伎和女歌舞伎一样也包括着歌、舞、卖淫,但它一直处于不起眼的地位。

11 伊原敏郎「歌舞伎年表」,49;河竹繁俊『日本演劇全史』(東京:岩波書店,1959),268。

12 伊原敏郎「歌舞伎年表」,49,63 65。

13 为避免论述上的混乱,到现在为止我在讨论歌舞伎时用"女形"一词。我用 female-role players 来指女形的前身,若众歌舞伎。但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这个词最早在 1638 年到 1648 年间就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在女优禁令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也支持了若众歌舞伎和歌舞伎之间有连续性的观点。参见同上书,第 53,59 页。

14 例如,有一个叫右近源左衛門的女形,他首先在《歌舞伎年表》1648 年中出现。若众歌舞伎禁令之后,他的演出在 1657、1662、1676 年中又有记载。同上书,第 59,78,86,127 页。

15 武井协三「若衆歌舞伎・野郎歌舞伎の研究」,35—37;郡司正勝「歌舞伎のかたち」,201。

16 郡司正勝「歌舞伎のかたち」,207。

17 这种连续性有助于解释一个现象,就是歌舞伎实际上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酷儿表演,直到 19 世纪晚期仍是如此。关于 19 世纪晚期歌舞伎从当代的、酷儿的,转变为传统的和经典的。参见 Ayako Kano, "Japanese Theater and Imperialism: Romance and Resistance", *US-Japan Women's Journal*, English supplement, 12(1996):28 - 32;小笹吉雄『日本現代演劇史』,31—32,53;河竹繁俊『日本演劇全史』,855—857。

18 "同性恋性爱实践在 15、16 世纪军事行动的时代中变得非常流行,在佛教寺庙里也很常见。到了 17 世纪,很多幕府的将军和封建主喜好貌美少男。"Donald H. Shivel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okugawa Kabuki," in James R. Brandon, William P. Malm, and Donald H. Shively, *Studies in Kabuki: Its Acting, Music, and Historical Context*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8),9。

19 Paul Gordon Schalow, introduction to Ihara Saikaku, *The Great Mirror of Male Love*, trans. Paul Gordon Schalow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27.

20 Ibid.

21 同上,第 27—28 页。当时有一种非常普遍的观念,认为异性恋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家"的延续。如果我们把文中这种现象和当时这种观念放在一起考虑,它就变得更加有意思。异性恋婚姻似乎是为了保存人类的身体(以生殖为目的的婚姻),而同性恋婚姻是为了保存武士的男人身份(精神意义上的婚姻)。有趣

的是在这个情境下的同性恋几乎全部是男性的。男性同性恋实践还有另一个词汇,“男色”。“男色”有一个反义词,“女色”。“女色”的意思是男人和妇女发生异性恋,并不是指女同性恋行为。男色与女色这对词非常对称,无意中显示了,在这两种行为中,性实践的“实行者”(doer),即使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应该总是一个男的。井原西鹤的《男色大鉴》头一章就以“两种情欲间的争斗”为题,比较了男性的同性恋与异性恋行为。参见井原西鶴「男色大鑑」,潁原退藏、暉峻康隆、野間光辰編「定本西鶴全集」(東京:中央公論社,1964),4:25 。

22 Schalow, introduction to Ihara Saikaku, *The Great Mirror of Male Love*, p. 29.

23 Luce Irigaray, “Commodities among Themselves”, in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trans. Catherine Porter and Carolyn Burk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193,黑体为原作者所加。伊利格瑞使用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个词以说明如何理解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它是“整个经济体必须依赖的一个基础”(192)。若众/念者之关系,也同样强调了同性情欲和同性社交两个词是密不可分的。

24 井原西鶴「男色大鑑」,45,53—54,72—73,118—119。“暴力是男人气的”这种观点要与男性特质一起讨论。

25 同上书,第 50 页。

26 参考米歇尔·福柯著《性史》第一卷,《前言》:“之前,所谓鸡奸(sodomite)一直是被作为一种暂时的出轨;而同性恋(homosexuality)[在现代社会]是一个物种(species)。”这句话稍加注释,就适用于若众。若众道中的同性情欲甚至不是什么偏离常规,因为若众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年龄阶段,男人必须经历这个阶段,但重要的是它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不然,山本常朝(1659—1721)的「葉隠」这部讨论武士规范的著作,就不会在赞美若众道的同时,又要维护“家”的存在。这是一名叫田代陳基(山本常朝的同辈但略年少)的口述。参见山本常朝、田代陳基「葉隠」,「日本思想大系〈26〉三河物語・葉隠」(東京:岩波書店,1974),263—265 。

27 井原西鶴「男色大鑑」,270—271。

28 同上书,271。

29 今尾哲也「「変身」の思想:日本演劇における演技の論理」(東京:法政大学出版社,1970),146 。在强调“双成之美”的不同本质的同时,今尾哲也保留了传统学术对“双成之美”的替身性质的解释:“最终,双成美人的身体是参与男性同性性活动的身体。他们的魅力是若众的。那不是女人的身体,也不是女人的魅力。这些身体不过是女人身体与魅力的替代”。今尾哲也,「役者論語評注」(東京:多摩川大学出版社,1992),232。

30 今尾哲也「「変身」の思想」,145 ;井原西鶴「男色大鑑」,271。文中说:“但是现在,连武士也不需要什么铠甲了。”

31 G. Cameron Hurst III, *Armed Martial Arts of Japan: Swordsmanship and*

Arche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53 - 81.

32 今尾哲也「「変身」の思想」,145;服部幸雄「歌舞伎成立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6)。

33 这听上去很像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学术圈子里听到的关于性学的论述:现实中两性兼具的人的比例要比我们知道的高(Fausto-Sterling, "Five Sexes," 20 - 25);之前,阴阳人一直被认为是存在于"一个连续体"的性,直到最近才被"性别二元论"取代。具体而言,用 Thomas Laqueur 的话说,我们所说的宽谱,其实是一种单一的性的模式(one-sex model)。在这个单一性模式中,"女人本质上是男人","男人和女人被根据他们形而上的完美程度,被排列在这宽谱之上"。在这样的范式里,越完美就越男性,反之亦然。参见 Thomas La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4 - 5。注意我在这里列举的最近性学的新发展并不一定是关于日本的。

34 根据《日本国语大辞典》(東京:小学馆,1972—1976),20 卷。

35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有些双成之美的人可能其实是阴阳人,当时的确他们的人数高得让人难以相信。但我没有任何数据能说明在 17 世纪的日本究竟有多大比例的人是阴阳人。

36 《病草纸》,选自《日本绘卷大成》,第七卷,《饿鬼草纸》,《地狱草纸》,《病草纸》,《九相诗绘卷》(東京:中央公论社,1977),第 82—83 页。书中说:"当他们秘密地把这个[奇怪的]人的衣服剥掉,[他们]会发现]他既有男根,又有女根。这就是二形。"《病草纸》是 20 世纪晚期的(无名)绘卷。

37 抑或是因为菲勒斯(phallus)? 值得注意的是,在浮世绘中(日本的木板印画,在 17 世纪到 19 世纪间发展起来),"需要一些实践,才把女孩子和男孩子分开。"(Richard Lane, *Images from the Floating World: The Japanese Print* (New York:Konecky and Konecky, 1978],52)。男孩女孩的脸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他们的发型头饰、衣着、语言(印画中的题目、诗歌、名字等)经常是唯一的线索来帮助我们区分男女。但是,根据 Lane 的其他研究,很多浮世绘在进入现代市场前,都经过了"修缮",这些修缮经常包括对生殖器的隐藏。把这些浮世绘复原后(包括很多原来如同双生儿的男女的),会发现女孩子坦露着她的生殖器,男孩也是一样。男孩的生殖器故意画得很大,一看就是男性的。可能当初欣赏这些浮世绘的人不需要"实践"就能轻而易举地看出性别,我们甚至看到一种极端的"生殖器主义"把社会性别完全减化到性器官。无论如何,这里暗含"美丽的少男"可属于一个范畴或者多个范畴,尽管他们巨大的生殖器象征了他们的性被认为是男的,但从他们与女孩一样的脸和身材可见,他们的社会性别却被认为是"男女同体"。参见 Lane, "Shunga: The Disappearing Act,"「芸術新潮」1994 年 6 月,第 20—27 页,第 36—40 页。

38 井原西鹤「男色大鑑」,178—179。

39 同上书,第 234 页。

40 同上书，第 249 页。

41 福岡弥五四郎「菖蒲草」，「役者論語」（郡司正勝「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8 歌舞伎十八番」）（東西：岩波書店，1965），322 。

42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例如可以参见今尾哲也，「役者論語評注」，286。"色子"字面的意思是"色之子。"

43 分别是"时分之花"（時分の花）。和"真之花"（まことの花）。参见世阿弥元清（Zeami Motokiyo），「風姿花伝」（「風姿華傳」、「花伝書」），野上豊一郎、西尾実编（東京：岩波書店，1985）。世阿弥（1363—1443），能剧演员，剧作家，被认为是日本表演理论方面的中心人物。

44 Schalow, introduction to Ihara Saikaku, *The Great Mirror of Male Love*, p. 29。

45 Shively, "Social Environment", 9.

46 Benito Ortolani, *The Japanese Theatre: From Shamanistic Ritual to Contemporary Pluralism* revised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7.

47 今尾哲也「「変身」の思想」，166。

48 山本じろう「あやぬぐち」，「日本演劇」1994 年 10 月，31 页。

49 郡司正勝「歌舞伎のかたち」，230 - 231；今尾哲也「「女方秘伝」と菊之丞の意識」，「演劇学」（1959 年 3 月），54。「役者論語」和「古今役者論語魁」都是全集性的著作，是初代芳泽和菊之丞之外的作者写的。这些书籍的收录都需要解释。《菖蒲草》在 1771 年中就曾被收入另一书。还有文献表明，1771 年的版本并不是最早的。在这篇文章中，根据常规我用的是 1771 年的版本。参见福岡弥五四郎「菖蒲草」，第 317—326 页。「女方秘伝」曾被认为早就遗失，唯一的版本是伊原所著「日本演劇史」（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社，1904; rpt. 東京：クレス出版，1996），第 677—678。编辑《歌舞伎年表》的伊原是著名的文献学者，他引用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但是后来的一些发现表明，一些资料曾经被收入到「古今役者論語魁」，但当时没有注明，因此的「女方秘伝」名字很有可能是伊原自己取的。在本文中，我用的的"古今"版但仍然依俗用"女方秘伝"。近仁斎薪翁（郡司正勝 ed.）「古今役者論語魁」，「日本思想大系 61 近世芸道論」（東京：岩波書店，1972），482 483 。

50 福岡弥五四郎「菖蒲草」，326（第 29 章）。

51 近仁斎，「古今役者論語魁」，483 。

52 歌舞伎評判記研究会「歌舞伎評判記集成」（東京：岩波書店，1975），193—194。每一集都有自己的标题。例如，1979 年 1 月刊被命名为"役者化妆"。在本文中，我用「歌舞伎評判記」这个名字，来避免混淆。

53 福岡「菖蒲草」，320 。

54 八文字屋自笑等著「新撰役者大成」，芸能史研究会编「日本庶民文化資料集成」卷 6「歌舞伎」（東京：三一書房，1973），51 。瀬川菊之丞应该在某些意义上比初

代芳泽要幸运。要讨论这一点，需要更认真地研究「菖蒲草」与「女方秘伝」之间的区别。

55 近仁斎，「古今役者論語魁」，483。

56 参考井原西鶴「男色大鑑」，25—29。对男色与女色问题，参考附注21。"有女人气"的女形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女形在体系上向"女人气质"移动的这种变化，既不是自然的结果，也不是一个偶然的幸运的发明。这种变化要与至少两个问题相关。首先，T/婆(butch/femme)美学在理论层面对我们的分析有帮助，虽然我们不能照搬。See Lynda Hart, "Identity and Seduction: Lesbians in the Mainstream," in *Acting Out: Feminist Performances*, ed. Lynda Hart and Peggy Phel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9), 282－299。其次，就像Sue-Ellen Case指出的那样，男人扮演女角，指示着男扮女装的一个要素，意味着那是"父权制对社会性别的再现"。参考 Case, *Feminism and Theatre*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7。

57 郡司正勝「歌舞伎のかたち」，230 231；今尾「女方」，54。

58 近仁斎，「古今役者論語魁」，483。

59 今尾「女方」，54。

60 福岡「菖蒲草」，318—321，323—324，326。

61 同上书，第317—320，324页。

62 同上书，第319页。

63 同上书，第317(第一章)，319页(第七章)。

64 同上书，第318—319页(第六章)。

65 同上书，第323—324页(第二十三章)。

66 同上书，第319—321页。

67 同上书，第319—320页。关于妇女不幽默这个属性，参见 Philip Auslander, "Brought to You by Fem-Rage: Stand-up comedy and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Hart and Phelan, *Acting Out*, 316－325。

68 Robertson, "Shingaku", 89－90。

69 福岡「菖蒲草」，317—320；近仁斎，「古今役者論語魁」，482。

70 福岡「菖蒲草」，317。

71 "在再表现中出现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显现为理所当然的、看上去非意识形态的。"(Jill Dolan, *The Feminist Spectator As Critic*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8], 41)。

72 参见世阿弥「風姿花伝」，24—25。

73 福岡「菖蒲草」，317 318(第一、二、三章)。因此，初代芳泽认为，一个女形应该谨慎，不能过于有棱角。要不然，他会"看上去像戴着头巾的、扮演男角"。参见同上书，第317，318，320页(第二、十二章)。

74 参考 Butler, *Gender Trouble*; Butler,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75 《病草纸》中提到,如果一个人的外貌看上去又像男人又像女人,那就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不安。这种说法认为,一旦被诊断为阴阳人,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一个人的性和社会性别一致了。形象地说,在上文里的那个偷窥狂正在开怀大笑,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正文那句:“人们会觉得不安”(《病草纸》,第 82—83 页,175 页)。

76 使他的观念更为复杂的是,他又引入阶级来思考这个宽谱。注意他怎样形容武士的妻子或者艺妓。初代芳泽选择将情欲宽谱置于阶级区别之上,这本身就值得深入研究。

77 Jennifer Robertson, “The ‘Magic If’: Conflicting Performances of Gender in the Takarazuka Revue of Japan”, in *Gender in Performance: The Presentation of Difference in the Performing Arts*, ed. Laurence Senelick (Hanover, N. H.: Univeris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2), 50.

78 William R. LaFleur, *Buddhis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88), 47.

79 福岡「菖蒲草」,第 319,321,323—324 页。

80 八文字屋自笑等著「新撰古今」,第 25,49—50,53 页。

81 服部幸雄「歌舞伎の構造　伝統演劇の創造精神」(東京:中央公論社・新書,1970),53—56 .

82 关于日本文学中的这些概念,参见 Edward Fowler, *The Rhetoric of Confession: Shishosetsu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ese Fi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28 - 42。

83 歌舞伎評判記研究会「歌舞伎評判集成」,3:548;郡司正勝「歌舞伎のかたち」,230 。

84 近仁斎,「古今役者論語魁」,483 。

85 Butler, “Imitation”, 22.

86 Butler, *Gender Trouble*, 31. 原文强调。

87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Image Music Text*, trans. Stephen Heath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142 - 148.

88 Mark Ross, *Authors and Owners: The Invention of Copyright* (Cambride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2.

89 如,参见世阿弥「風姿花伝」,11,59—60,78—79。

90 关于密宗以及密宗与现代性的暧昧关系,参见 Maki Morinaga「小山内薫と素人主義」,西村圭子編「日本近世国家の諸相」(東京:東京堂,1999) 286 - 290; Morinaga, “Analysis of Esotericism in Selected Japanese Interpretative Traditions: Hiden's Operation, Logic, and Survival in Modern Times”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1)。

91 汤浅泰雄,《身体論—東洋的心身論と現代》(東京:講談社学術文庫,1990),101;重点号为原文。

92 同上书，第 124—125 页。有意思的是，这里又提到是世阿弥把修行引进了剧院。

93 同上书，第 116—117 页。

94 藤原定家「每月抄」，久松潜一、西尾実「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65 歌論集能楽論集」(東京：岩波書店，1961)，31，137 138。值得注意的是，从密宗的观点看，藤原定家强调他的学问来自他的父亲，藤原信西(1114—1204)。

95 汤浅泰雄，《身体論—東洋的心身論と現代》，153。重点为原文所有。

96 Thomas P. Kasulis,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Yuasa Yasuo, *The Body: Toward an Eastern Mind-Body Theory*, ed. Thomas P. Kasulis, trans. Shigenori Nagatomo and Thomas P. Kasulis (New York: State Unv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6.

97 有意思的是，通过审查"语言"，精神分析发现了同一问题的另一面：显而易见的直接(immediacy)其实是非常难以实现的。这两个现象不可思议地联系在一起：(1)纯粹的、完美的直接性是不可能的，(2)"假—直接"可以在被介质作用过的东西上面创造出来(quasi-immediacy can be created out of what is mediated)。如果语言是一个方式来显示"直接"这种东西的存在是一个错觉，并展示是什么捷径达成了这种错觉，那么，不断重复的身体训练(修行)就是一种方法来创造、加强，并因此尽可能使捷径更便捷。

98 近仁斎，「古今役者論语魁」，482 。

99 同上书，第 483 页(第九章)。

100 Laura Mulvey,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Screen*, autumn 1975, 11.

101 「女大学」，荒木見悟、井上忠「日本思想大系 34 貝原益軒 室鳩巣」(東京：岩波書店，1970)，202—205 。有关本文文献学方面的信息，参见石川松太郎「女大学について」，荒木、井上「貝原益軒 室鳩巣」，第 531—533 页。20 世纪早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反其道而行之的现象。Ayako Kano 认为，在当时，女演员重新出现，开始取代女形，这反映出那个历史时刻，"女人身份(被发现)是以物质存在的身体为基础而被重新定义，而不是在表演中形成"(Kano, "Roles", 190)。

102 关于 constructionism 与 constructivism 能否在这个语境中清晰地区分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分析。

103 《女大学》，第 202—205 页。

104 Kathleen S. Uno, "Women and Changes in the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in Bernstein, *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 17 - 41；另见源了円「德川思想小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3)，98 100 。

105 James H. Sanford, "Wind, Waters, Stupas, Mandalas: Fetal Buddhahood in Shingon",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24, no. 1 - 2(1997): 24.

106 脇田晴子「母性を問う—歴史的変遷」(京都：人文書院，1985)，I: 3。

107 因此，在这个语境中，"家"不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群体，而是一个社团。参见 Uno，"Women and Change"。

108 《女大学》，第 202 页（第四章）。

109 例如，当时的江户是事实上的首都。但 1714 年规定颁布后，歌舞伎只能同时在三个剧院里演出。文献表明，每个剧院一年表演五到六次。跟现代装有电子灯光设备的剧院来讲，那些剧院都很简陋。剧院容量很小，也进一步造成票价昂贵。松平直典「松平大和守日記」，芸能史研究会『日本庶民文化資料集成 12 芸能記録 I』朝倉治彦、服部幸雄（東京：三一書房，1977），5625；柳沢信鴻『宴遊日記』，西川松の助、服部幸雄『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 13 芸能記録 II』（東京：三一書房，1977）。伊原敏郎『近世日本演劇史』。

110 默々漁隱，『劇場一覿顕微鏡』，ed. Munemasa Isoo，in *Kabuki*，311。

111 例如，八文字屋自笑『役者全書』，Oshima Masakazu，MunemasaIsoo，and Takatruki Kazuko ed.，in *Kabuki*，199 - 241。《役者全书》出版于 1774 年，是当时的"剧院指南"之一。有意思的是，这些流行的关于"歌舞伎"的书籍用大量篇幅讨论某一个演员的声音和动作，其实就让大家获得看戏体验。一个男演员的确是通过声音与身体动作的模仿来越界（pass）成为女性。例如，在 Fires in the Mirror 中，Anna Deavere smith 的表演跨越了种族、性别、年龄、族群和阶级的"范畴"，她是通过不断地改变嗓音、语言、服装，道具，身体动作等等达到这样的效果。这里，身体存在的方式决定了身份存在的方式。参见 Anna Deavere Smith，*Fires in the Mirror*，dir. George C. Wolfe（PBS/American Playhouse，1993）。关于现代日本戏剧中声音与动作的分析，参见 Ayako Kano，"Visuality and gender in modern Japanse theater：Looking at Salome"，*Japan Forum* 11，no. 1(1999)：43 - 55。

112 八文字屋自笑『役者全書』，229。

113 我们对于这个时段的讨论在这里结束。这一时期之后，我看到至少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在某个历史时刻，女优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渠道，可以扮演女形。第二，歌舞伎戏剧中，最近已经开始有女形成功地和女演员一起登台演出（例如坂东玉三郎）。

给男性特质一个历史:殖民地时期印度历史研究的贡献

Giving Masculinity a History: Som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

马里娜力·辛哈(Mrinalini Sinha)

在当代史学研究中,尤其是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历史学界,目前已出现了一批为数可观的有关男人和男性特质的研究文献。[1] 此类研究中的优秀成果已经远远超越了"性角色理论"以及男人的性角色社会化过程理论的限制,从而为我们理解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历史分析的有用范畴"做出了重要而宝贵的贡献。[2] 但是,关于"男性特质"的研究兴趣以及随之发展起来的"男性研究"和"男人运动",也已经在女权主义学术内引发一定的警觉,而女权主义学术显然是推动批评界关注社会性别化身份问题的主要力量。虽然当初是许多女权主义学者首先起来呼吁,不仅要研究女性特质的建构,也要同样研究男性特质的建构,但是现在她们对这种新学术研究中出现的一些趋势表现得更加谨慎,因为她们意识到这些研究在暗中回避女权主义关注的一个中心议题:权力如何通过社会性别

被组织起来。[3] 康奈尔（R. W. Connell）在社会性别和男性特质研究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从来不回避这个中心议题；也许现在仍然有必要回顾一下他在最近出版的关于男性特质研究的文集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书写男性特质的历史究竟要涉及哪些问题？[4] 我借用关于男人和男性特质学术研究的双重遗产，思考有关殖民地印度史学研究对男性特质研究可能做出怎样的贡献。

就在不久以前，无论是妇女史，还是更笼统的社会性别研究和女权主义学术，其紧迫的任务都是要书写"显现"妇女的历史。[5] 但是，人们很快注意到这样一点：从许多方面看，没有历史的是男人。的确，几乎所有的历史学术文献如果没有专门指出"妇女"，总是关于男人的所作所为——而且一直都是如此。但是，在迈克尔·基莫尔（Michael Kimmel）看来，这些历史并不是把男人作为男人来书写的历史。[6] 根据基莫尔的观点，把男人作为（有社会性别的）男人的历史，至少需要考查这样一个问题：男人身份的建构和体验，如何影响男人活动的过程和意义。此外，这样的历史还需要考查：男人身份和男性特质的含义，对不同群体和阶级有何差别，以及这些含义如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同时应该开展批判性的分析来探讨：一个始终难以捉摸的理想男性特质的观念，如何推动了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直到最近，男人和男性特质在历史中也几乎是不可见的。

当代历史研究中对殖民地印度的社会性别分析模式已很有影响，而其中男性特质作为一个历史分析的范畴的出现，则处于某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关于殖民地印度的社会性别学术研究，基本上都以妇女为研究对象。[7] 无论是关于殖民地印度的社会性别关系的社会史，还是关于殖民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社会性别化建构的话语分析，都倾向聚焦于妇女。虽然这类学术的理论和方法非常多样，总体而言也使殖民地印度的男性特质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显现。[8] 结果，一方面，关于殖民地印度的男人和男性特质研究相对缺乏；另一方面，很有意义的是，社会性别学术研

究已经使男人和男性特质的历史不再被当成无须考察的自然状态。我想说明一点：这一矛盾并不表示研究的薄弱；这样一个处境反而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使我们将男性特质历史充分地放在具体情境中进行考查。这样的历史研究将揭示，男性特质如何建构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并且被这些社会关系所建构。如是理解，男性特质则跨越多重轴线，包括种族、种姓、阶级、性存在、宗教和族裔。就是说，对男性特质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所谓男女问题的"恰当"范围里。在这个意义上，殖民地印度史学的贡献格外重要，它提供一个实例说明在书写男性特质的历史时应当包括哪些问题。

事实上，现有的殖民地印度史学在几个方面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男性特质的历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最显见的层面，殖民地印度的史学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即爱德·科恩(Ed Cohen)称之为"'想象地'勾勒"身体差异的问题(即所谓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9] 换句话说，殖民地印度史学研究使我们看到，为标示身体差异的象征意义分配质化属性时，"权力"的问题至关重要。学术界对社会性别化范畴的质疑，当然是由于印度殖民权力在男人气质和男性特质问题上的特别投入。研究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英国历史的学者，已经详细追溯了英国"男人气质时尚"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与英国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10] 所以，关于英国研究，或印度的盎格鲁—印度人社会研究中，尤其是对殖民地印度的官僚制度和印度军队的描述，一个核心部分就是揭示了男性文化堡垒的影响(这些文化堡垒包括维多利亚时期的公立学校和俱乐部区，还有维多利亚式理想男人气质、运动崇拜与尚武精神等)。[11] 此外，在印度方面，学者们发现，同类的精英男性文化存在于印度土邦的王侯和王公当中，以及诸如马由学院和度恩学校等机构中；[1]这些机构最初在殖民者的赞助下创办，目的是对印度贵族家庭的儿子们进行社会化培养，使他们能够学

〔1〕 Mayo College, Doon School。——译注

习得体的“有男人气质的”高尚行为。[12]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关于以下这些问题的研究:殖民主义者对“女人气”的刻板印象建构无所不在。1857年叛乱后,为重新组织招募印度人参加印度军队,殖民者对印度人进行了“勇武”与“不勇武”的种族划分,并且发展了极为详尽的殖民主义民族志研究。旁遮普和西北边境省的民族被视为具有“男子气”,而孟加拉〔1〕“定居”特点明显的英属印度地区的民族较多“女人气”;也有人认为穆斯林人更有男子气,而印度人更为阴柔。诸如此类帝国主义思维的比较分类,已经为研究殖民地印度的学者长期以来熟知了。目前最优秀的学术研究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到,对殖民印度进行官僚控制的方式,是通过招募不同地区、宗教、种姓、阶级的男人并让他们进入各种殖民体制中;这也使我们更深地理解,某个阶级印度人将“女人气”观念的内化,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13]虽然这类研究大多数本身都未能关注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本身(就像对英国本土社会中的男人气质风尚的历史描述一样),但是它使我们有可能更深入地质疑各种社会性别化的范畴。后来的学术研究已经结合权力关系对男性特质进行了更加充分的解释。

近年来,尤其是随着萨义德有关帝国权力话语建构的开创性的论著问世,帝国权力的社会性别化已经获得广泛的关注。[14]虽然萨义德自己只是一笔带过地提及与社会性别有关的问题,比如殖民话语将“东方”情欲化为女性、将被殖民的男人(在与殖民者男人的关系中)女性化,他启发一代学者专门探索殖民话语的社会性别含义。而且,就英国殖民印度的特定语境而言,殖民话语的社会性别化色彩已经进一步得到详细阐述和修正,从而使男性特质尤为可见。例如,在《英属印度的修辞》一书中,撒拉·苏乐里(Sara Suleri)更为复杂地分析了关于异性强奸的殖民话语喻说——即,把被殖民国家比喻为受到殖民者强奸的女人,指出其中“延宕的同性礼仪”这一系列更复杂的动态关系。[15]在苏乐里看来,一个基本的

〔1〕本文中的孟加拉指印度的孟加拉地区和孟加拉人,并非今天的孟加拉国家。——译注

同性社交色情的脚本——它存在于极度男性化的英国男人与女性化的印度男人的接触之中——既支持着英国殖民话语，也将英国和印度的妇女驱赶到“男人之间的交流之外围。[16]但是，在印度的英国东方主义极度男性特质话语到底有那些意义，有关这个问题做得最出色的是阿细丝·南蒂(Ashis Nandy)关于殖民主义心理的开拓性研究。南蒂集中讨论了他称之为殖民文化中“性与政治同源的语言”[17]。他认为，所谓“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两者之间的绝对二元对立，是西方后启蒙主义时期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性别二元对立通过在印英帝国意识形态当中的极度男性特质表现出来，重新塑造了印度传统中本来不固定和杂散的社会性别身份。根据南蒂的分析，英国人当中的男性精神气质是“既咄咄逼人又具绅士风度”的竞争精神，这被19世纪许多印度男性精英所接受。他们认为，英国的统治地位，恰恰证明了他们应当效仿这种男性优越性。由之，南蒂认为甘地对英国殖民主义深刻的挑战，正是在于他根本就不认为那种愈来愈等同于理性、唯物主义和体力的“男性特质”有什么固有的优越性。[18]不过，南蒂也在其论述中建构了许多“西方”和“传统”印度男性特征的二元对立。虽然这个二元对立的许多方面都有问题，但是他的学术激励了很多人在文学和历史学领域开展研究，分析殖民印度的男性特质建构与再建构。[19]

继南蒂之后出现的许多学术研究表明：在任何男性特质历史中，权力问题至关重要。许多研究重点探讨孟加拉印度教“士绅”(bhadralok，即新兴中产阶级)，这并不令人意外。在整个19世纪，“士绅”阶级最被注意的一点，就是他们与殖民地英国精英之间特殊的互利共生关系。[20]此外，孟加拉“士绅”阶级对于阴柔的自我感知中，有个独特的体格层面尤为重要。这表现在19世纪室内体育场的新体格文化蓬勃兴起，以及后来20世纪初期出现的秘密恐怖主义组织的男权亚文化当中。[21]还有，19世纪孟加拉“士绅”阶级的男性领袖人物受到各种男性焦虑的困扰，对于所谓的男性特质危机，他们发展了丰富的、巧妙的新方式做出回应。这也是研究的一个

重要的方面。班金·昌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在其作品中,对所谓的孟加拉男人的阴柔做出回应(*Bharata Kalanka* 或《印度污名》),他重新建构了奎师那[1]这一偶像人物,抹消了奎师那纵情声色娱乐的有名秉性,强调他敢于行动、理性的自我控制,以这些品格来将他升华为男性特质的全新再表现。[22]而甘地则把自己建构成其信徒的父母。其实,比甘地略早的帕拉姆汉萨(Ramakrishna Paramhansa)在自我陈述中,已经挪用了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种再表现,他这一做法既有反叛性,又具矛盾性。[23]维伟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不遗余力地倡导一种男性化的孟加拉和印度教身份,这一身份兼具印度教的精神追求与"西方"对身体力量的强调,他据此创立一种新的男性特质——优越的印度人/印度教精神型男性特质。[24]事实上,在孟加拉这一"男人气质的救赎式教育",正是英地拉·乔杜里(Indira Chowdhury)新著研究的中心问题。在这本著作中,她考察了从19世纪70年代的《印度教梅拉》(*Hindu Mela*)杂志到1905年抵制英货运动(*Swadeshi*)中的流行歌曲,以阐释各种组织和制度的网络如何对男性特质进行了创造与再创造。[25]正如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的,把所谓阴柔观念内化,正是新的霸权性运作中的一部分,就是要在男性特质重新建构的过程中确保一种相当精英的、上层种姓的,以及印度教的男性特质占据主导地位。[26]当然,在不同程度上、出于不同原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谓"阴柔"的意识也明显地出现在其他社会群体中。例如,在印度获得独立后,帕西人认识到自己的地位与殖民时期相比有所下降,作为回应,在他们的自我认识中开始出现阴柔。[27]这里我想要说的大问题是:有关殖民背景下男性特质的学术研究,为更好的男性特质历史的写作打下了基础。男性特质历史不能局限于追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对男性特质的感知和理解。实际上,它告诉我们:男性特质

---

[1] Krishna,毗湿奴神的第八个化身,可以说是印度最有特色的神,小时候可爱又调皮,长大之后是受到无数人喜爱的美男,同时又是伟大的英雄,而且还是印度教重要的圣典《薄伽梵歌》的传授者。——译注

的历史能够——其实也应该——把它的根本的关注点放在权力关系问题上，即，种族、阶级、种姓、社会性别和性存在等各种等级关系相互交叉的网络。

在第二个层面上（也是基于第一个层面），殖民地印度的史学研究既显现了男性特质的关联性建构，也揭示了在男性特质规范中郁结的各种焦虑。为我们提供这一重要认识的，是考察印度的国家身份和宗教社群身份的社会性别化建构的大量研究。所以，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印度官方国家主义研究最富有影响力的理论家——指出，内在/精神世界—外部/物质世界的社会性别化二元对立，对于印度国民身份的建构至关重要。[28]他认为，考虑到殖民主义下迟到的民族主义具有“构成性矛盾”，印度民族主义者一方面将其自主身份定位在内在/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又在外部/物质世界中承认西方的优越性。因此，印度民族主义的话语策略是，承认自己在男人的“外部”世界中俯首称臣、软弱无能，同时利用“印度女人”这个人物来承担定义所谓真正的“印度身份”的责任。[29]此后，妇女解放和自我解放的条件就被限定于一个全新的、完善的民族主义父权制的尺标之内。这一关于民族主义的社会性别分析告诉我们：随后进行的民族主义者对印度家庭和印度家庭生活的重新构建，既是针对男性特质建构的暧昧性，也是针对女性特质进行的规范性建构。

各种男性身份的关联性建构，被苏米特·撒卡（Sumit Sarkar）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他超越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论，阐明了19世纪孟加拉中产阶级下层男人的男性焦虑。他分析了男性特质建构的一个特定背景，即，大多数孟加拉中产阶级男性遭受着查克里（*chakri*）（或者说孟加拉殖民政治经济的特定条件下小文员的工作）的奴役。他的分析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来帮助我们思考男性特质与工作，以及财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之间的关系。[30]他对中产阶级下层男人文化的考察以查克里为背景，挑战了一些人提出的一种臆测，即，当时那些男人对金钱和女人的向往在不断消退。他的研究描述了殖民地时期中产阶级的状况：这个阶级

的内部，社会地位上的分化程度远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严重。男性特质建构的各种不同情境恰恰说明，男性身份的建构与其他社群中男人之间的关联程度，并不亚于男性身份建构与女人的关联。

或许，关于男性特质的新的研究兴趣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考察当代印度以及殖民地时期印度宗教社群主义社会性别化的政治。在当代印度的印度教右派的上升当中，社会性别化的政治在重新构成。这是男性特质研究兴趣的一个背景。[31] 例如，1992 年，右翼印度教社群主义团体破坏巴布里清真寺，表面上提出的是收回"罗摩出生地"的主张，他们的宣传论调其实一方面利用了重新男性化的印度教救世主罗摩的形象（罗摩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主人公），另一方面又运用罗摩幼儿化形象，或称"婴儿罗摩"（博取妇女的母性保护）。[32] 这个事件标志着当代印度社会"印度教权利"形象的重大转变——从"身穿咔叽布短裤、举着藏红色旗帜"的失望的年轻男人，变成身穿藏红色外袍、发表充满憎恨的演讲的武断自信的女人。[33] 殖民印度末期的印度教武装组织成员，主要来自"尚未被腐蚀的或因家庭顾虑而胆怯不前的城市青少年，大学生以及小店主和文员等中产阶级地层"。这些组织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极度男权的论调，把女人的能动性排斥到边缘。[34] 1947 年印度次大陆最终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分离最终发生的前后曾出现了众多的宗教社群暴动。关于这些暴动的研究，揭示了妇女真实的身体如何成为划分和侵犯宗教社群之间边界的场所，也揭示出对立的宗教社群中的男人如何被彼此建构为强奸犯和诱拐不幸女人的坏蛋。[35] 关于宗教社群主义的语言表达的社会性别化，学者们的考察已经揭示出，男性荣耀和耻辱这样的观念、呼吁男性复仇、考验男人身份等等这些语言表达，对持续煽动印度教、穆斯林和锡克教之间宗教社群主义的大火有着重要意义。[36] 此外，印度教宗教社群主义中的极度男权的语言表达，重新建构了印度教人的"阳刚"。这个建构不仅与女人相关，而且与"其他"宗教社群的男人相关，并且针对着同一宗教社群的某些男人，如那些被认为是应该为本社群的衰败和遭受阉割负责的男人。所

以，正如吉内伽·旁帝(Gyanendra Pandey)指出的，从20世纪40年代起，印度教武装组织反复地提出这个问题："携着'女性的'纺车的圣雄甘地，如何能够被当成'国父'?"[37]这类研究充分显示，男性特质的建构既不是孤立于社会关系的整个动态状况，也不是建立在不证自明的基础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表明，要对男性特质进行充分的研究，就不能对某个特定群体做孤立的处理。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已有的关于殖民地印度不断变化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关于男性特质的知识；这些了解及时地提醒了我们：研究男性特质不仅要关注文化再表现，而且要注意物质和意识形态的状况。[38]举几个例子便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塔尼卡·撒卡(Tanika Sarkar)关于19世纪孟加拉的研究表明，印度家庭生活被建构为充满情爱的空间，妻子心甘情愿服从丈夫。这种家庭生活被视为印度教男性身份的主要场所，因为他们能够在殖民地公共领域获得的权利很有限。印度教男人接受了西方的殖民化，将他的自主拱手让出；于是，他们就开始对印度人的家庭生活重新设计，在新的家庭生活中，由"印度教妇女的贞洁身体"来承担区分印度人与西方差别的任务。撒卡分析了围绕童婚、与未成年人性交等问题的争论。在她看来，最关键的问题，恰恰是这种男性特质建构所维持的这种特别的家庭生活的安排。[39]同样地，乌玛·查克拉瓦提(Uma Chakravarti)关于19世纪印度西部的研究，考察了"婆罗门教男权制"的重新建构。这种重构的背景是：当时印度西部正经历着种姓斗争、阶级形成和民族主义的出现所造成的压力。这个研究的最终兴趣在于，考察社会性别问题与某些意识形态实践和物质实践是如何互相维持的。[40]另外还有帕德玛·安那哥-麦克金(Padma Anagol-McGinn)探讨了男人对女人进行公开性骚扰的一种特定类型，即现在在印度的官方和大众话语中称之为"调戏夏娃"的现象。她的研究同样揭示了男性特质作为一种物质的及意识形态的安排的背景条件。由于在城市化进城中需要招募许多男性流动工人进入工厂和产业中工作，把女人留

在农村，因此导致城市中男性人数占明显优势，殖民印度的城市化发展不平衡。这就是安那哥-麦克金所研究的“调戏夏娃”现象的大背景。[41]这一关于殖民地印度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强有力地说明——就像库木昆·桑加利(Kumkum Sangari)和苏地西·威德(Sudesh Vaid)关于“重塑女人”(recasting women)进行的研究所强调的，殖民地时期的“重塑男人”，不可能脱离于整个社会安排，及其不断积累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成果这样的大背景。[42]

通过上述归纳我要说明的是：尽管专门关注男性特质的历史研究相对稀少，但是殖民地印度社会性别研究的学术中已经凸显出来的有关男性特质的问题，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从这些问题出发，具体关注男性特质的学术研究可以朝几个方向开展。第一个方向在罗撒林德·欧汉隆(Rosalind O'Hanlon)的文章“北印度历史的男性特质问题：孟加拉法鲁卡巴德纳华伯〔1〕”中出色地表现出来。[43]在这个对前殖民时期的政治文化的考察中，欧汉隆探讨了北印度莫卧尔王朝统治相对衰败、各种宗教当权者势力上升时期的一种社会性别文化“尚武与合体的男人行为条规”。[44]在政治不稳定的局势中，这些条规被用来强化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雇佣军领袖与其军团之间的联盟。欧汉隆认为，莫卧尔王朝统治者曾经一度成功地利用军事性男性特质(military masculinity)规范来招募精英阶层的支持者，但是后来随着其他军事性男性特质模式的出现及其对莫卧尔模式的挑战，这些规范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她认为，在北印度18世纪的政治制度的运作中，莫卧尔“帝国男性特质”(imperial masculinity)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条规被各种敌对势力的精英们共有，但又被他们挑战。欧汉隆分析了一个莫卧尔武仆如何玩弄这些条规。他的分析表明，“帝国男性特质”的要求，是通过一系列的情境来界定的：一方面是士兵们简单而男人气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另一个世界——

---

〔1〕 法鲁卡巴德纳华伯，英文 Nawabs of Farrukhabad。Nawab 是印度莫卧儿王朝分封各地的军政长官，世袭职；Farrukhabad 是印度北方地名。——译注

“后宫及闺房内的女人气的空间”以及“宫廷的奢华世界”；[45]宫廷中武士之间的格斗比赛风气；以打猎和动物打斗为娱乐的宫廷风气；以及战场本身特有的体验等。[46]她认为，“帝国男性特质”的条规决定着，在个人身份和体验层面上，“18世纪北印度身为一个男人(政治精英)意味着什么”。[47]

欧汉隆将18世纪北印度政治中社会性别化的文化——尤其是男性特质——放在具体历史情境之中进行充分研究。她的研究给男性特质历史研究指出的方向是，把男人的历史作为社会性别化的人(gendered being)的历史，围绕着这样的历史来建立关于男性特质的学术研究。欧汉隆对男性特质是这样定义的：“[它是]男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被社会性别化——他被这个社会性别化的内容界定为男人、并且与其他男人发生关联，并且它还决定他的身份认同的其他方面，比如阶级、职业、种族和族裔。”[48]从这个定义出发，欧汉隆的分析不仅成功地通过新的视角讨论了18世纪北印度政治为人熟知的一个内容——政治外交、联盟和协商，而且也重新思考了：18世纪晚期英国殖民势力的社会性别化表达，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和意义。正如欧汉隆自己指出的，关于后一个问题的思考，是她的研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为我们提供的启示。首先，这个关于殖民时期以前的印度“帝国男性特质”的研究清楚地显示，就运用男性特质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这一点而言，英国殖民文化决非首开其先河者；实际上，英国殖民文化对男性特质的运用，或许就是建立在此前男性特质的各种运用方式之上的。在此，她实际上针对南蒂的观点提出明确的质疑。南蒂认为，刹帝利[1]的勇士传统在印度的前殖民文化中原本只是相对小的内容，直到英国殖民统治的极度男性特质文化激发它的膨胀。人们经常假设，前殖民印度时期的社会性别身份具有流动性，英国统治时期引入了刻板的社会性别身份，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一个断裂。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或许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第二，帝国男性特质的共同

〔1〕 Kshatriya，印度四大种姓之一。——译注

条规，主要由“竞争、比赛、打猎与战场的外部世界”来界定——与“宫廷、家庭和内室的内部领域”形成鲜明对抗。因此这些条规提供了一个空间，把男人聚到一起——这其中既有“在社会性别领域的斗争，也有对他们在此领域的、超越其他文化差异的共通性的认识”。[49]帝国男性特质这一世界的衰落（尤其是考虑到它本来有能力将印度教或穆斯林、拉普吉特、马拉地或帕坦人[1]聚到一个他们共有的军事男性特质的条规内进行抗衡），对于重新划分印度的各种宗教派别和社团界线有一定影响。最后，在英国统治下，表达这一帝国男性特质的机会减少，家户和家庭这些内部领域在印度社会获得了更大的重要性。这一点对理解殖民统治下的妇女和社会性别关系转型都有重要启示。

欧汉隆的方法启示我们，研究前殖民后期和殖民地印度这两个阶段中男人作为社会性别化的人的历史，可以有什么收获。的确，在学术中，男人作为社会性别化的人的历史，可以在很多领域中揭示出来——比如工人阶级文化、性存在的建构、下属群体政治、社会运动、大众文化，等等——然而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50]不过，正如朱迪丝·艾伦（Judith Allen）在别处提到的，这种方法可能会产生一个倾向，即把“男性身体（男人）与男性特质的各种历史形式之间的关联”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对这样的关联做出解释。因此，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外在表现，总是在“家庭”、“工作场所”、“邻里关系”等领域中发现。[51]虽然欧汉隆的研究方法能够提供对某种男性特质（和某种女性特质）的描述，但是它或许不能穷尽男性特质的所有政治效能、或其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它可能会陷入这样一个危险，即认为所谓真实的女人（以及真实的男人）连续地存在，不断变化的、虚幻的描述被加在她/他们不变的身体之上。[52]

---

〔1〕 拉普吉特：Rajput，印度北方一部分专操军职的人，自称是刹帝利王朝皇家卫士的后代；马拉地：Maratha，生活在印度中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印度民族的成员；或帕坦人：Pathan，印度西北国境的阿富汗人。——译注

关于男性特质另外一个方向的探索，以我自己的著作《殖民男性特质：19 世纪末“男人气的”英国人和“女人气的”孟加拉人》为例说明。[53]本书的一个目的是，把现有的关于殖民印度男性特质的研究与那些提出了针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性别分析模式的学术结合起来。有一批深受女权主义启发的研究，揭示了殖民地印度社会中，社会关系如何在社会性别层面组织起来。于是我在分析男性特质时引进了这批学术关注的一些典型问题。我的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殖民男性特质（colonial masculinity)，将整个帝国的社会形成视为分析单位。用这样一个启发性模式来分析帝国的社会形成，对于殖民男性特质的研究来说，可以达到以下目的：一是将“英国”男性特质的形构和“孟加拉人的”阴柔放到同一个分析领域中，考察在殖民统治的具体实践的历史条件下两者如何互相建构；二是考察“殖民男性特质”如何成为各种矛盾作用下的产物——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基于社会性别、种姓、阶级、社会地位、宗教和省份身份等区分在各种群体内部出现的矛盾。由之，我试图避免忽视殖民遭遇本身如何既产生了英国精英殖民者的极度男性特质的语言表达，又产生了该语言表达的推论，即本土精英之间的“男人气”和“女人气”区分（这一区分，被制造了种族含义的殖民地民族志详细阐释，并赋予新的意义）。所以，我不把英国的极度男性特质理解为在英国内部建构之后就原样移植到印度，并成为区分本地种族的“有男人气”和“没有男人气”的基础。我认为，英国男性特质与印度本地男性特质一样，都受到殖民统治的具体实践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在我的分析中，“男性特质”只在具体实践中获得其含义：它没有必然的情境或起源。

故此，《殖民男性特质》一书代表的研究方向，必然让男性特质离开它的被给予了最重要意义的基础，即所谓“真实的男人”（他们的在生物意义上被赋予性别[sex]的身体）；因为如果太强调这一背景（即便这能够揭示与其他的权力轴线相互关联)，我们就不能充分地质疑男性身体和男性特

质之间的、非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研究既不试图提供关于殖民男性特质的单一定义,也不尝试穷尽所有可能的殖民男性特质的表达领域。殖民英国精英和孟加拉地区印度教中产阶级之间的各种遭遇,是一个被多种因素决定的领域;“殖民男性特质”这个术语,浓缩了这个领域在19世纪末期帝国的社会形成中一个具体历史时刻的样态。这个研究方法的启示在于:男性特质本身的含义源自具体的权力关系,男性特质的含义就是被运用来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再生产这些权力关系。所以,男性特质学术研究的第二个方向,要建立在对所谓“男性特质”进行更为深刻的质疑的基础上。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男性特质”,我们就发现它的含义是以涵盖了一切社会关系的各种实践来构成的。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殖民地印度史学对围绕男性特质开展更广泛的学术研究有重要意义。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一史学的真正贡献是——借用琼·斯科特(Joan Scott)在别处提出的说法,它不光确立了“男性特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这一认识;它还为给“男性特质”写一个历史打下了基础。[54]殖民地印度男性特质的政治,对多种社会关系进行了再生产;认识到这一点,就必然促使我们超越那种简易的“男人等同于男性特质”思维模式。[55]这意味着,男性特质不是必然地或自然地属于任何一个领域;也没有什么基础点或固定点能够让人去追踪男人和男性特质之间所谓变化而延续的关系的发展。虽然我们不认为男性特质有任何稳固的根基,但今后的男性特质的历史会发现,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来说最好的分析单元,正是最广义上的“社会”(the social)。如果把男性特质和男一性(maleness)之间的联系切断,那么“男性特质”的领域就不再仅限于把男人作为社会性别化的人而书写的历史。相反,这个领域可以被开放,从而历史地分析:男性特质如何在保障权力的各种安排中,发挥它在语言表达、意识形态层面的效力。殖民地印度历史研究成果最激进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我们得以认识到:男性特质的历史,或许根本无所谓“适当的”或是预先被确定的主体。

本文发表于

Gender & History, vol. 11 no. 3 (Nov. 1999): pp. 445 - 460

注释

1 近期关于男人和男性特质研究的文献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关于这一新近出现的学术研究的综述，见 J. Hearn, "Review: Men and Masculinity or Mostly Boy's Own Paper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6(1987), pp. 665 - 689; Lisa Cody, "This Sex Which seems to Have Won: The Emergence of Masculinity as a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Radical History Review*, 61(1995), pp. 175 - 183; Michael Roper et al., "Recent Books on Masculinit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29(1990), pp. 184 - 192; David H. Morgan, "Men Made Manifest: Histories and Masculinities", *Gender and History*, 1(1989), pp. 87 - 91; R. W. Connell, "Book Review", *Signs*, 19(1993), pp. 280 - 285; James Eli Adams et al., "Recent Works on Masculinity: A Forum", *Victorian Studies*, 36(1993), pp. 207 - 226; Jeffrey Weeks, "Telling Stories about Me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4(1996), pp. 746 - 757; Victoria Thompson, "Sexuality: Another Useful Category of Analysis in European History",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9(1998), pp. 211 - 219; James A. Hammerton, "Forgotten People? Marriage and Masculine Identities in Britain",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22(1997), pp. 110 - 117。又见 Judith Allen, "Discussion: Mundane Men: Historians, Masculinity and Masculinism", *Historical Studies*, 22(1987), pp. 617 - 628; John Tosh, "What should Historians Do with Masculinity? Reflections o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8(1994), pp. 179 - 202; Michael Roper and John Tosh, "Introduction: Historians and the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in *Manful Assertions: Masculinities in Britain Since 1800*, ed. M. Roper and J. Tosh (Routledge, London, 1991), pp. 1 - 24。

2 此语出自琼·W. 斯科特的开创性论文"社会性别：一个历史研究的有用范畴"("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1986), pp. 1053 - 1075; reprinted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 pp. 28 - 50。

3 有关此问题，参见 Caroline Ramazanoglu, "What Can You Do with a Man? Feminism and the Critical Appraisal of Masculinit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5(1992), pp. 339 - 350; Diane Richardson and Victoria Robinson, "Theorizing Women's Studies, Gender Studies and Masculinity: The Politics of Naming",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1994),

pp. 11-27; Christine Griffin and Joyce E. Canaan, "The New Men's Studies: Part of the Problem or Part of the Solution?", in *Men, Masculinities and Social Theory*, ed. Jeff Hearn and David Morgan (Unwin Hyman, London, 1990); and Thomas Laquer, "The Facts of Fatherhood", and the response by Sara Riddick, "Thinking about Fathers", in *Conflicts in Feminism*, ed. Marianne Hirsch and Evelyn Fox Keller (Routledge, New York, 1990), pp. 205-221, and pp. 222-233。

4 见 Connell,"Book Review",第 282 页。关于 Connell 自己在本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见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Polity Press, Cambridge, 1987) 及 *Masculi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5)。另一个对"男性特质"研究所做评价,见 Jeff Hearn, "Is Masculinity Dead? A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of Masculinity/Masculinities", in Understanding Masculinities: Soci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Arenas, ed. Martin Mac An Ghaill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ckingham, 1996), pp. 202-217。

5 见妇女史领域的现代研究中一部早期的开创性著作的题目,该书由 Claudia Koonz 和 Renate Bridenthal 主编,题为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and Co., Boston, 1977)(《浮出水面:欧洲历史中的妇女》)。

6 Michael Kimmel, "Invisible Masculinity: Examining Masculinity in Relation to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30(1993), pp. 28-36.

7 关于印度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学的总结,见 Barbara Ramusack, "From Symbol to Diversity: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on Women in India", *South Asia Research*, 10(1990), pp. 139-157; and Tanika Sarkar, "Women's Histories and Feminist Writings in India: A Review and A Caution", *Plenary Address to the Seventh Berkshire Conference on Women's History*,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June 1996。

8 两部关于印度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关系史学研究的著作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方法,见 Dipesh Chakrabarty, "The Differnece-Deferral of (A) Colonial Modernity: Public Debates on Domesticity in British Bengal",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0(1993), pp. 1-33;与 Tanika Sarkar, "Rhetoric Against Age of Consent: Resisting Colonial Reason and Death of a Child-Wif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 September 1993, pp. 1869-1878。关于殖民印度研究中有关当代史学争论的对立的例子,见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93);与 Sumit Sarkar, *Writing Soci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1997)。

9 该表达出自 Ed Cohen,文章载于 Adams 等主编的著作"Recent Works on Masculinity: A Forum"。

10 见 David Newsome, *Godliness and Good Learning: Four Studies on a Victorian Ideal* (John Murray, London, 1961); J. R. de S. Honey, *Tom Brown's Univer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Public School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Quadrangel/New York Times Books Co., New York, 1977); Norman Vance, *The Sinews of the Spirit: The Ideal of Christian Manliness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5); J. A. Mangan, *Atheleticism in th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Public Schoo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1); Michael Rosenthal, *The Character Factory: Baden Powell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oy Scout Movement* (Collins, London, 1986); H. John Field, *Toward a Programme of Imperial Life: The British Empi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Greenwood Press, New Haven, CT, 1982); and Graham Dawson, *Soldier Heroes: British Adventure, Empire and Imaging of Masculinitie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11 关于这些体制精神的经典论述,见 Leonard Woolf, *Growing: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Years 1904 - 1911* (Hogarth Press, London, 1967); Philip Mason, *A Matter of Honour* (Holt, Rinehart & Winston, New York, 1974); Philip Woodruff, *The Men Who Ruled India: The Guardians* (Jonathan Cape, London, 1954)。关于对其批判性分析,见 Kenneth Ballhatchet, *Race, Sex and Class Under the Raj: Imperial Attitudes and Policies and Their Critics* (Weidenfeld & Nicolson, London, 1980); Francis G. Hutchins, *The Illusion of Permanence: British Imperialism in In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67); Lewis D. Wurgaft, *The Imperial Imagination: Magic and Myth in Kipling's India*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Middletown, CT, 1983)。

12 见 J. A. Mangan, "Eton in India: The Imperial Diffusion of a Victorian Educational Elite", *History of Education*, 7(1978), pp. 105 - 118。另见 Mady Martyn, Martyn Sahib: *The Story of John Martyn of Doon School* (Dass Media, New Delhi, 1985)。

13 见 John Rosselli, "The Self-Image of Effetenes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Bengal", *Past and Present*, 86(1980), pp. 121 - 148; David Omissi, "Martial Races: Ethnicity and Security in Colonial India, 1858 - 1939", *War and Society*, 9(1991), pp. 1 - 27,及其著作 *The Sepoy and the Raj: The Indian Army*, 1660 - 1940 (Macmillan, Houndshill, Hampshire, 1994); David Arnold, "Bureaucratic Recruitment and Subordination in Colonial India: The Madras Constabulary, 1859 - 1947", in *Subaltern Studies 4: Writing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ed. R. Guh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1985), pp. 1 - 53。

14 见 E. Said, *Orientalism*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78)。

15 S. Suleri, *The 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2)。

16 此处指 Eve Kosofsky Sedegwick 的开拓性著作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Homosexual Desi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5)(《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同性欲望》)。

17 A. Nandy,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1983)。

18 甘地关于男性特质的矛盾态度吸引了 Nandy 之外许多其他学者的关注。见 Erik H. Erickson, *Gandhi's Truth* (Norton, New York, 1969); Susanne Rudolph and Lloyd Rudolph, *The Modernity of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7); Sudhir Kakar, *Intimate Relations: Explorations of Indian Sexual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0)。有学者就在此背景下甘地对于性存在的态度进行了颇有意思的分析,见 Joseph A. Alter, "Celibacy, Sexual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into Nationalism in North Ind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1994), pp. 45-66, 及"Gandhi's Body, Gandhi's Truth: Nonviolence and the Biomoral Imperialism of Public Health",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1996), pp. 301-322。

19 关于我对 Nandy 对印度男性特质概念中"西方"和"传统"的二分之批评,见 Marinalini Sinha, *Colonial Masculinity: 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1995;重印于 Kali for Women Press, New Delhi, 1998), Introduction。

20 例见 Rosselli, "The Self-Image of Effeteness"; Sinha, *Colonial Masculinity*; Indira Chowdhury-Sengupta, "The Effeminate and the Masculine: Naitionalism and the Concept of Race in Colonial Bengal", in *The Concept of Race in South Asia*, ed. Peter Robb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1995), pp. 282-303; *The Frail Hero and Virile History: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Colonial Beng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1998)。关于孟加拉之外男性特质的殖民政治讨论,见 M. S. S. Pandian, "Gendered Negotiations: Hunting and Colonialism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Nilgiris", in *Social Reform, Sexuality and the State*, ed. Patricia Uberoi (Sage Publications, New Delhi, 1996), pp. 239-264。

21 Rosselli, "The Self-Image of Effeteness".

22 见 Sudipta Kaviraj, "The Krishnacharit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gure of Krishna in the Work of Benkimchandra Chattopadhyaya", in *The Unhappy Consciousness: Benkimchandra Chattopadhyay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ist Discourse in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mbay, 1995)。又见 Rachel R. Van Meter, "Bankim Chandra's View of the Role of Bengal in Indian Civilization", in *Bengal Regional Identity*, ed. D. Kop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East Lansing, 1969), pp. 61 - 72;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Zed, London, 1986) ch. 3。

23 见Sumit Sarkar, "'Kaliyuga' 'Chakri' and 'Bhakti': Ramakrishna and His Tim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8 July 1992, pp. 1543 - 1566; Partha Chatterjee, "A Religion of Urban Domesticity: Sri Ramakrishna and the Calcutta Middle Class", in *Subaltern Studies 7: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ed. P. Chatterjee and G. Pand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1993), pp. 40 - 68。有关印度文化传统中雌雄同体问题有意思的讨论,见 Wendy Doniger O'Flaherty, *Sexual Meta-androgyny and Animal Symbols in Indian Mythology* (Motilalbanarsidas, New Dehli, 1980)。

24 见 Chowdhury, *The Frail Hero and Virile History*。

25 见 Chowdhury, *The Frail Hero and Virile History*。

26 见 Sinha, *Colonial Masculinity* 与 Chowdhury, *The Frail Hero and Virile History*。

27 见 T. M. Luhrman, "The Good Parsi: The Postcolonial Feminization of a Colonial Elite", *Man*, 29(1994), pp. 333 - 357; and *The Good Parsi: The Fate of a Colonial Elite in a Postcolonial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96)。关于19世纪在伦敦的帕西人在妇女社会改革、印度民族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背景下男性特质建构的记录,见 Antioinette Burton, "A 'Pilgrim Reformer' at the Heart of Empire: Behramji Mlabari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Gender and History*, 8(1996), pp. 175 - 196。

28 见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93); and "The Nationalist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 in *Recasting Women: 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 ed. 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 (Kali for Women, New Delhi, 1989), pp. 233 - 253。

29 在我将要出版的著作 *Refashioning Mother India: The Advent of a Nationalist "Indian" Modernity in Late Colonial India* 中,我讨论了这一话语对印度社会性别化的公民主体建构的影响。

30 见 Sarkar, "'Kaliyuga', 'Chakri' and 'Bhakti'"("'卡利年代'、'恰克利'和'帕克提'")及其著作 *Writing Social History*, 第282 - 357页。

31 有关该语境中男性特质政治的有意思的讨论,见 Rustom Bharucha, "Dismantling Men? Crisis of Male Identity in 'Father Son and Holy Wa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 July 1995, pp. 1610 - 1616。

32 见 Anuradha Kapur, "Deity to Crusader: The Changing Iconography of Ram", in *Hindus and Others: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in India Today*, ed. Gyandendra Pandey (Viking, New Delhi, 1993), pp. 74 - 107。关于巴布里清真寺与罗摩出生地(Babri Masjid-Ram Janmabhumi)之争的历史,见 S. Copal (ed.), *Anatomy*

of a Confrontation: *The Babri Masjid-Ram Janmabhui Issue* (Viking, New Delhi, 1991)。

33 这个表达出自 Tapan Basu et al., *Khaki Shorts and Saffron Flags*: *A Critique of the Hindu Right* (Orient Longman, New Delhi, 1993). 关于妇女的可见度,以及印度教权利政治中对妇女能动性的调动和社会性别平等,见 Tanika Sarka, "The Woman as Communal Subject: Rashtrasevika Samiti and Ram Janmabhoomi Movem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1 August 1991, pp. 2057-2662; Tanika Sarkar and Urvash Butalia (eds) *Women and the Hindu Right* (Kali for Women, New Delhi, 1995); Kumkum Sangari, "Consent, Agency and the Rhetorics of Incitem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 May 1993, pp. 867-882; Ratna Kapur and Brenda Crossman, "Communalizing Gender/Engendering Community: Women, Legal Discourse and Saffron Agend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4 April 1993, pp. Ws 35 - Ws 44; Paula Bacchetta, "All our Goddesses Are Armed: Religion, Resistance and Revenge in the Life of Hindu Nationalist Wome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5(1993), pp. 38-52; and Sucheta Majumdar, "Women on the March: Right-Wing Mob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India", *Feminist Review*, 49 (1995), pp. 1-28。

34 见 Basu et al., *Khaki Shorts and Saffron Flags*, p. 24。关于殖民印度晚期的军事化印度教组织中的极度男性化话语,见 Gyanendra Pandey, "Hindus and Others: The Militant Hindu Construc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8 December 1991, pp. 2997-3009。

35 见 Papiya Ghosh, "The Virile and the Chaste in Community and Nation Making: Bihar 1920s to 1940s", *Social Scientist*, 22(1994), pp. 80-89。

36 正如 Ritu Menon 和 Kamla Bhasin 所说,"男性荣耀"的概念也可在非宗教民族主义的家长制态度中看到。见 R. Menon and K. Bhasisn, "Abducted Women, the State and Questions of Honour: Three Perspectives on the Recovery Operation in Post Partition India", in *Embodied Violence*: *Communalizing Women's Sexuality in South Asia*, ed. Kumari Jayawardena and Malthi de Alwis (Zed, London, 1996), pp. 1-31。关于被强奸妇女的意象如何在社群暴力中激发男权报复,见 Veena Das, *Mirrors of Violence*: *Communities, Riots and Survivo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1990), pp. 1-36。

37 G. Pandey, "Hindus and Others", p. 3005("印度教与他者"第 3005 页).

38 我在此引用的是 Uma Chakravarti 对一些社会性别分析的批评。她认为这些分析将社会性别简单化为一种再表现现象,而不是将社会性别当作物质和意识形态实践进行考查。见 Urea Chakravarti, *Rewriting History*: *The Life and Times of Pandita Ramabai* (Kali for Women, New Delhi, 1998)。

39 见 Tanika Sarkar, "The Hindu Wife and the Hindu Nation: Domest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Bengal", *Studies in History*, 8 (1992), pp. 213- 215; 'Rhetoric Against Age of Consent'; and also 'Talking About Scandals: Religion, Law and Love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Bengal', *Studies in History*, 13(1997), pp. 63 - 95。

40 Chaklavarti, *Rewriting History*. 关于"婆罗门教父权制"这一概念,又见同作者文章"Conceptualizing Brahmanical Patriarchy in Early India: Gender, Caste, Class, and Stat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 Aplil 1993, pp. 579 - 585。

41 See Padma Anagol McGinn, "Sexual Harassment in India: A Case Study of Eve Teas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Rethinking Sexual Harassment*, ed. Clare Brant and Yun Lee Too (Pluto Press, London, 1994), pp. 220 - 234. 关于调戏夏娃的当代威胁分析,见 Deepti Priya, "Challenging a Masculinist Culture: Women's Protest in St Stephen's College", *Manushi*, 28(1985), pp. 32 - 35。关于殖民印度黄麻纤维工业中招工形式产生的社会性别化不平等的例子,见 Dipesh Chakrabarty, *Rethinking Working Class History*, *Bengal, 1890 - 194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1989)。

42 见 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 "Recasting Women: An Introduction", in *Recasting Women*, ed. Sangali and Vaid, pp. 1 - 26。

43 *India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4 (1997), pp. 1 - 19. 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她即将出版的作品,在上面文章中有所引用, *Masculinity Between Empires: Gender and Power in North India*, c. 1750 - 1850。

44 O'Hanlon, 'Issues of Masculinity', p. 5.

45 同上书,第 11 页。

46 同上书,第 10 页。

47 同上书,第 7 页。

48 同上书,第 31 页。

49 同上书,第 16—17 页。

50 见 Joseph Alter, "Somatic Nationalism: Indian Wrestling and Militant Hinduism", *Modem Asian Studies*, 28(1994), pp. 557 - 588; David Hardiman, "Community, Patriarchy; Honour: Raghu Bhanagre's Revolt",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3 (1995), pp. 88 - 130; Poonam Alora, "Devdas: Indian Cinema's Emasculated Hero, Sado-Masochism and Colonialism", *Journal of South Asian Literature*, 30(1995), pp. 261 - 270; and Ashwini Sharma, "Blood Sweat and Tears: Amitabh Bachchan; Urban Demi-God", in *You Tarzan: Masculinist, Movies and Men*, ed. Pat Kirkham and J. Thumim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3), pp. 167 - 180。

51 见 J. Allen, "Discussion: Mundane Men"。我发现 Allen 在文中所做的区分很有用;但是我是对她进行自己的解读,因为她不支持在男性特质研究中的"起源的分析科学:历史中的性、性区分和性政治"。

52 Denise Riley, *"Am I That Name?" 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88), p. 7. 又见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New York, 1990)。

53 Sinha, *Colonial Masculinity*.

54 See J. Scott, "Book Revi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9 (1994), pp. 1329 - 1330.

55 关于针对男人和男性特质之间关系的"自然化"的讨论,见 Judith Halberstam, *Female Masculinity*. Duke University, Durham, 1998); and "Annamarie Jagose Interviews Judith Halbemstam, 'Masculinity without Men'", *Genders*, 29 (1999)。

用种族和"文明"重塑男人身份

Remaking Manhood Through Race and "Civilization"

盖儿·比德曼(Gail Bederman)

1910年7月4日,下午2:30。内华达州,雷诺市。随着乐队奏起《我看黑鬼都一样》的曲子,[1]杰克·约翰逊登上拳击台,面对吉姆·杰福瑞斯的挑战,捍卫他的拳王宝座。约翰逊是美国第一位获得重量级拳击冠军称号的黑人。而杰福瑞斯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白人前重量级拳击冠军,六年前他引退的时候保持了全胜。就拳击比赛本身而言,这绝对是一场精彩的较量。然而,要较量的远不止拳击水平。实际上,约翰逊—杰福瑞斯之战是当年最重要的事件。从全国各地有两万男人跑到雷诺,坐在沙漠灼热的烈日下观战。500位记者被派遣到雷诺进行报道。赛前一周,每天这些人发回约10万—15万字的报道,其中大部分告诉其白人读者群,杰福瑞斯肯定获胜。比赛当日,男人们连独立日的家庭野餐都不去

〔1〕"All Coon Look Alike to Me"是19世纪末一首对黑人很具侮辱性的歌曲。——译注

了。全美国的男人们聚集在球场、电影院甚至报告厅，听电报局发来的每一回合的战况。超过三万个男人站在《纽约时报》外等着最新消息；《亚特兰大宪报》外则聚集了约万人。一句话，这场赛事掀起了全国性的关注。[1]

1899 年杰福瑞斯第一次赢得了重量级拳击冠军称号，从那时起他一直拒绝与黑人挑战者比赛。杰克・约翰逊第一次挑战他是在 1903 年。杰福瑞斯回答说：“等没有白人能打了，我就不干了……我下定决心，不会冒险把冠军头衔输给一个黑鬼。”[2] 杰福瑞斯这样对种族界线的坚持并非一个独特的现象。从 1882 年约翰・L. 苏利文赢得此头衔，还没有一个白人的重量级拳击冠军接受黑人的挑战——虽然以前白人和黑人拳击手曾自由地对抗。[3] 苏利文宣称他接受所有人的挑战——就除了黑人。“我不会和一个黑鬼比赛——以前没有过，将来也不会！”[4]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杰克・约翰逊开始了他的拳击职业生涯，并最终打败了所有对手，包括黑人和白人。

整整两年时间杰福瑞斯拒绝和杰克・约翰逊比赛。但是当他在 1905 年退役之后，失去了他的白人拳坛水平非常糟糕，以至于人们一时对商业拳击丧失了兴趣。终于，在 1908 年，当时的白人重量级拳击冠军托米・波恩斯同意对抗约翰逊。波恩斯接受挑战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够提高人们的兴趣和奖金数目。可是，约翰逊很痛快地就把波恩斯打败并赢得了冠军头衔。一个黑人竟然戴上了全世界最强大的男人这一皇冠！面对这个“不可想象”的现实，对拳击的兴趣立刻反弹上升。由白人控制的媒体叫嚷着鼓动杰福瑞斯重返拳坛。“杰福应该从乡下出山，把约翰逊脸上的笑容打掉！杰福，你看着办吧。”杰克・伦敦在《纽约先驱报》上呼吁道。[5]1909 年 4 月，《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幅画，上面是一个金发小女孩儿恳求前重量级拳击冠军：“求你了，杰福瑞斯先生！你会去打约翰逊吗？”[6] 在美国各地，白人报纸请求杰福瑞斯展示盎格鲁-撒克森的男人身份(manhood)，征服正在上窜的“黑鬼”以拯救文明。

最终，上了岁数而且满心不太情愿的杰福瑞斯同意去打约翰逊，据称

他如是说明此举:"我去打他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证明白种男人比黑鬼强。"[7] 所以从一开始,约翰逊—杰福瑞斯之战就被认为是一场较量到底哪个种族的男人培育了最有力量的、最有雄性气魄的男人。杰福瑞斯被视为"白色人种的希望",而约翰逊则被当成"黑鬼的救世主"。[8] 除极少数之外,大部分的比赛结果预测集中在白人和黑人的男人气质(manliness)上。比如,《今日文学》预测杰福瑞斯取胜,因为"黑人……打拳情绪化,而白种男人二十回合后还能用大脑思考。"[9] 白人们确信杰福瑞斯天生的盎格鲁-撒克森的男人身份会帮助他战胜(据称)头脑简单的更情绪化的黑鬼。

这样,当约翰逊击溃杰福瑞斯的时候(那确实是一场血战),白种男人优越论的维护者们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在赛前一直把这场较量描述成展示哪个种族创造出更具有雄性气魄的男人来。约翰逊的胜利是压倒性的,因此问题的答案虽然不得人心,但也明白无误。赛后,黑人报纸《芝加哥守卫者》宣称:约翰逊是"第一个被承认为全世界最棒男人的黑人"。[10]

随之而来的暴力显示出,对美国的许多白种男人来说,这是个多么难以吞咽的苦果。在南部各州都发生了种族暴乱,在伊利诺伊、密苏里、纽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科罗拉多等州及哥伦比亚特区也有发生。偶尔有黑人也会攻击某些嘴里对约翰逊不敬的白人。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是疯狂的白人攻击那些庆祝约翰逊获胜的黑人。[11]《纽约先驱报》报道,在曼哈顿,"警察从一群白人手里救下一个脖子被绳子套牢的黑鬼……在第八大道上三十七与三十八大街之间,将近三千白人聚众对路过的所有黑人拳打脚踢,有的黑人被打得失去知觉……三千白人占据了第八大道,一边和警察对峙,一边攻击出现在那里的每一个黑人。"[12] 当时的新闻报道估计全国有十八人死亡和几百人受伤。[13]

约翰逊获胜对白种男人的男人身份的潜在威胁,连美国国会都有反应。约翰逊—杰福瑞斯之战前夕,国会甚至拒绝讨论一个管理表现拳击

题材的电影的法案。然而，设想一下如果全美国的电影院里放映“黑人救世主”如何地挫伤“白种希望”，这些议员们可受不了那种可怕的景象。于是就在赛后三个星期，两院就通过了限制拳击题材电影的法案，它很快就被签署为法律。[14]

约翰逊获得冠军称号后，出现了一个更耸人听闻的事：这位“黑人救世主”丝毫不隐讳他对白种女人的兴趣。白种男人着急了：难道说约翰逊在白种女人身上的成功，表明他作为男人更优越？几十个白人女子追逐着约翰逊的垂青。这情景让约翰逊非常高兴却激怒了很多白人。这些女子大多是妓女，但是种族歧视的观念认为所有的白人妇女对黑人来说都太“纯洁”了，不能与黑人为伍。[15]约翰逊的第一任妻子是个白人，这就够糟糕的了——不过 1912 年她的自杀使不少反跨种族婚姻的人暗自满意。[16]但是当局发现约翰逊和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十八岁金发少女露西儿·喀麦隆的关系，就指控他违犯了曼恩法案——即拐卖白人女子。美国的白人民众，不论南北，都愤怒了。在约翰逊的故乡芝加哥，一名男子趁他在银行出现的时候冲他扔了一个墨水瓶。约翰逊的肖像被悬挂在全城的电车上和电线杆子上。不管他走到哪儿，人们就冲他喊：“吊死他！吊死这个黑鬼！”[17]其实露西儿·喀麦隆坚决声明她爱约翰逊，而且他们很快就结了婚；但没人在意这个。她实际上是个成名的妓女，并不是什么被引诱的处女；但这也不重要。约翰逊并没有违犯曼恩法案，而且早先的指控已经撤消了，连这一事实也没什么意义。就凭他获得重量极拳王称号和显摆他在白人女子那里的成功，他就已经越轨了；白人公众要求他受到惩罚。[18]

国家调查局受命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调查，希望寻找出约翰逊的什么把柄。经过一番耗费人力财力的查询，约翰逊和共处多年的一个白人情人跨越州界的一些旧案子被调查局挖出来。通常来说，政府只用曼恩法案来惩治拐卖白人女子和商业性娼妓，官员们这次把约翰逊搞成了一个特例。他被判有罪，罪名是携其情人跨越州界，给她钱物。对大多数美国

男人来说，这些是绝对合法的行为。但约翰逊被判入狱一年及一千美元的罚款。政府官员希望彻底搞垮他，于是就狡猾地鼓励他越狱并离开美国；他真的这么做了。此后的七年，约翰逊试图和政府协商并自首的努力都被挫败。直到1920年他才被允许回到美国服刑，此时他早已经是一个穷困潦倒没什么架子可言的前冠军了。[19] 1915年他在哈瓦那被白人拳手杰斯·威拉德打败并丢掉他的冠军头衔，当时的照片多年后还是白人酒吧的标准装饰品和谈资。[20]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白种美国人对杰克·约翰逊的反应都是过度的。为什么一个商业拳击比赛会导致暴乱和死亡？杰克·约翰逊到底有什么问题，值得联邦政府动用调查局策划一场针对他的阴谋？值得国会通过联邦立法来控制他的获胜带来的影响？使得像罗斯福总统这样的重要政治领导人站出来在报纸上指责他？[21]让那么多的受尊敬的美国人形容约翰逊的行为是“美国20世纪文明的一个污点？”[22]令美国男人长达几十年在酒廊里庆祝他的最终惨败？

针对杰·约翰逊的怒气是过度的，但并不是孤立的现象。20世纪初前后的几十年，男人身份和种族等级之间的联系是美国人的一大心事。这种强迫症在一连串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从关于私刑的争论，到白人帝国在海外的负担问题，到关于抚养孩子的讨论。白人中产阶级找到了一系列用白种优越论支撑男性统治以及用男性统治支撑白人种族统治的手段。围绕杰克·约翰逊的争议，其实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本书要探讨的就是世纪之交男人身份和种族之间的关联。作者认为，在1890—1917年这段时期，当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积极地巩固其男性统治的时候，种族成为社会性别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有限。白人身份(whiteness)既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又是一个中产阶级白种“男人的理想”。在这段时期，很多社会和文化因素促使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寻找新的理由来解释：他们，作为男人，为什么就该拥有权力和权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约翰逊的夺冠，以及他

有意识塑造的轻浮而且充满了性含义的公共形象，对在美国普遍存在的白种优越决定男性优越的观念而言，是一个不能被容忍的——而且明知故犯的——挑战。杰克·约翰逊在种族和性这两方面的挑衅，对中产阶级男人身份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太大的冲击，以至于被白人控制的媒体和美国政府愿意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彻底地、最残酷地将他消灭。

在所谓“进步主义年代”，人们利用白种优越的观念，创造了一个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男性优越意识形态。所以说，杰克·约翰逊的问题，不过体现了创造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种种途径之一。黑泽尔·卡尔比(Hazel Carby)呼吁我们进行“更加具有女权主义精神的研究，探讨有种族具体性的、有关性的意识形态，并且要明确指出，白人身份(whiteness)和黑人身份(blackness)一样，也是一个种族区分方式”。[23]本研究就是要完成这样的任务。

为了理解在20世纪初前后美国中产阶级为什么如此关心通过种族来重造男人身份，我们需要勾勒出大的历史背景和分析背景。本章以下部分将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我讨论一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所说的男人身份到底指的是什么？怎么研究它的历史？第二，我将描述在19、20世纪之交，中产阶级男人身份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当时中产阶级认为有必要重造男人身份？最后，我要介绍在这个历史时期美国人常用来把男性权力和种族特权联系在一起的一套中心理念，即“文明”的话语。

“男人身份”(“Manhood”)：它是什么？它如何运作？

我们说的“男人身份”是指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尽管大部分人可以很容易地判断谁是男人，男人身份的定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点和情境下是不同的。[24]另外，研究美国男人身份的历史学家，

往往将其分析建立在男人身份这个词的不同含义之上，因而也就导致了混淆和误解。（这里我特别使用"男人身份"即 manhood 而不是"男性特质"即 masculinity，因为 masculinity 这个名词从 1890 年起才被广泛使用，而且当时有着非常具体的意义指向。这一点我们今天经常忘记。下面我也会讲到这个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只是把男人身份当成一个没什么复杂问题的身份认同——一个不变的本质——它与生俱来存在于一切具有男性身体的人类。这些历史学家把男人身份看作人类本性的一个正常存在的方面：它的存在一目了然，不言而喻，仅仅需要在没有"焦虑"之类的障碍时被表现出来而已。尽管意识到男人身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达形式不同，这类历史学家仍然相信它的基本含义保持不变。采取这样的理论方法的历史学家，试着通过描述男人如何行为——在特定历史时期——来表现其男人身份。比如说，有人曾很出色地讲述过兄弟会和童子军等团体活动的情况。此外，这类历史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进步主义时期"是否有一个"男性特质的危机"？[1] 于是，他们也就最先把对男性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看作历史分析的合法课题。就这一点本身来说是个重大贡献。然而，他们的方法有一个缺陷：对研究对象的含义想当然而不是深入探讨。"男性特质"在像童子军这样的组织里到底对男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对他们那么重要？为什么所谓男性特质的失落会痛苦到导致一场"危机"？权力或权威与男人身份有关联吗？他们的方法并未考虑到以上这些历史性重要问题，于是就造成一个错觉，即认为，男人身份是一个超越历史的本质，不会有重大的变化，由生物性决定，所以它不属于历史分析的范围——也与人类改变社会性别关系的行为无关。[25]

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视男人身份为一些在文化层面被定义的特征、属性或性角色。譬如，有一位历史学家用一串形容词来概括维多利亚男

〔1〕 原文为"masculinity crisis"。——译注

人身份的定义：“男人要自立，强大，有毅力，勇敢，诚实。”[26]这类历史学家往往分析所谓的男性的特征或职业如何在历史上变化，或者因阶级而不同。比如，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男人，被社会化为强大的父权制度下的父亲；而19世纪的中产阶级男性，则被引导入性别“分离的领域”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生意人。通过研究男人身份的历史变化，使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学家希望读者把社会性别关系看成变化的、可改善的。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它把男人身份定义为条理清晰的一组规范性理想标准、特征或性别角色。这就掩盖了任何一个历史时刻的复杂性和内部矛盾。例如，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进步主义时期的中产阶级男人身份，基本上可归纳为粗放豪迈的雄劲、积极的室外运动主义和对女性化的恐惧。也有人不同意，而是强调进步主义男性对传统上“女性的”劳动——像照顾子女和家务管理——日益增强的兴趣。把男人身份当作一组统一的特征，并不能帮助我们思考“进步主义男人身份”当中这两个共存却又互相矛盾的方面之间是什么关系，也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男人们自己是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27]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性别——不论是男人身份还是女人身份——是一个历史的意识形态过程〔1〕。[28]通过这个过程，人既被定位，也把自己定位为男人或女人。所以，对我来说，我既不把男人身份当作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质，也不把它作为某些特征、属性或性角色的集合。男人身份——或者说男性特质，人们今天通常用这个词来指男人身份——是一个持续的充满变化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因为男人具有男性身体，他们争取到了某种权威。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各种彼此矛盾的观念，用来解释男人是什么，他们应该如何行为举止，以及他们作为男人可以拥有什么权力和权威。社会性别运作的一部分，就是隐藏起这些矛盾并遮掩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性别是不断变化

〔1〕原文为“a historical, ideological process”。——译注

的。社会性别总是被建构成一个自然的事实，而男人身份总被看作一成不变的超越历史的本质，由固定的自然发生的特征构成。我将要讨论的是：要研究男人身份的历史，就要揭露这个过程并研究历史上各种有关男人身份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发展、变化、组合、修正、被挑战的——又是如何获得了“真理”的地位的。[29]

将男人身份定义为一个意识形态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它就只与知识分子或思想有关。其实这样定义它，可以说明，男人身份或男性特质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人被建构成某个现存社会范畴中的一员，即成为男人。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过程——不论是男人身份还是女人身份，通过一种复杂的政治手段运作，由多样的制度、思想和日常实践构成。这些过程组合在一起，又创造出一套新的“真理”，根据身体的“男”或“女”来确立一个人是什么，他/她可以做什么。人就是在社会性别的过程中被定位的，与他们的选择无关。尽管有的个人会拒绝其定位的某些方面，很少有人把“自己”既不看成“男人”也不看成“女人”。一旦被定位成“男人”或“女人”，必然要随之而来的就是一整套其他社会含义、期望和身份认同。个人除了利用这些社会含义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要么接受，要么抵制它们，要么采用，要么改造它们，这样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换言之，就是将男人身份看作这样的过程：通过把男性生殖器与男性身份(male identity)联系起来，把人体和身份与权威和权力的某种存在方式联系起来，这个过程创造了“男人”。就逻辑上说，这个过程完全是没有道理可言的。身体、身份和权威根本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天然关系。只有——社会性别制度中的“男人身份”建构的过程——才使它们得以互相代表。

下面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看看这个文化过程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回到关于杰克·约翰逊的讨论，思考一下，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以某些具体形式将男性身体、身份和权威联系起来的那个文化，是如何理解他的夺冠的。晚期维多利亚文化把商业重量级拳手那强有力的、庞大的男性身体

看作男人身份的典范。美国白人把重量级拳手的男性身体几乎等同于男性身份和权力，因此断然地阻止在他们看来不能掌握政治和社会权力的任何男性取得重量级冠军称号。从逻辑上说，没有什么理由把重量级冠军对身体力量的拥有等同于对公共权力的占有。然而，20 世纪初前后，男人身份的含义指代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把身体力量与社会权威构建成同义的。所以，在二十七年中，美国黑人被禁止拥有拳击型男人身份，因为白人把他们看成是不那么“有男人气”的。当约翰逊真的赢得了重量级冠军称号的时候，白种男人强烈要求杰福瑞斯改变局势，恢复白人认识中的男人身份的合理社会功效。

但是，并不能因而认为约翰逊仅仅是被这些文化建构(cultural constructs)所定位的——他也主动地利用它们来自我定位。多年来徒劳地争取参加一场冠军头衔争夺赛令他颇为怨苦。约翰逊有意识地利用了美国白人对其男人身份受到威胁的恐惧，公开地显示他占有了男人身份的三个意义层面：身体、身份和权威。在他的公开对抗赛中，约翰逊实际上用纱布把他的阴茎缠裹起来，让它看上去更大。只罩着拳击短裤，他在拳台边走来走去炫耀他的生殖器给所有人羡慕，显示他优越的身体来表明他优越的男人身份。[30]在个人生活中，约翰逊同样乐意表现一种稍为传统的中产阶级男人身份，有时甚至扮成一种个人奋斗成功的角色。1912年，他公然选择搬到只有白人居住的某处郊区，最后是被吓坏了的当地居民想办法阻止了他。[31]他还让他的两任金发美女妻子戴珠宝穿皮草出现在媒体面前。在得克萨斯州长大的约翰逊当然非常清楚，在整个美国南部，和白人女子出双入对的黑人男子经常被暴打、被处私刑。连北部的白人也害怕，黑人面对纯洁的白人妇女无法控制他们的性欲。所以，他特别注意避免让公众感觉他的白人妻子是所谓黑鬼性欲的病态牺牲品。他特地把妻子装扮成富裕的女人——她有一个成功的、有男人气的、足以把她舒适而奢侈地供养起来的丈夫，并且因此值得尊敬。

约翰逊同样也不懈追求拥有作为男人的权力和权威的男性特权。对

于轻微的触犯法律行为——比如他无数的超速罚单和违规驾驶，他不屑去理会，当成是他这种大男人没必要去处理的小小麻烦而已。[32]在他的自传里，他宣称（据一个传记作者调查是假的），曾经“与国王女皇们来往；各国君主和统治者都是我的合作伙伴。”[33]更为不道德的是，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虐待他的妻子和情妇；这是更为隐蔽地行使男人统治女人的权力的一种方式。[34]简而言之，约翰逊意识到，占统治地位的白人习惯，不会允许他被当作男人身份的典范；他得不到白人重量级冠军的待遇。但他还是不屑地拒绝接受这样的种族藐视。约翰逊公然对抗这种对待，通过卖弄地显示男性身体、男性身份和男性权力，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约翰逊的例子说明，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尽管是强制的，并不能完全排斥人的能动性。各种关于性别、阶级和种族的意识形态力量把约翰逊定位在一个网当中，这个网不是他能够彻底摆脱的。他不能摆脱男人的身份、黑人男性的身份、出身于一个前奴隶家庭的贫困的身份，等等。然而，尽管约翰逊不可逃避地被这些话语所定义，他做到了利用这些话语自身内部的和彼此之间的矛盾来表现自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积极主动的历史创造者。他很清楚“黑鬼”被看作不完全的男人。因此他有时在一个种族中立的情境下表现其男人气质——作为一个冠军，一个靠自己奋斗成功的男人和一个闻名海外的英雄。另一些场合下，他又利用他的黑人身份、用他冠军的身体自我表现为一种性特征极其凸显的黑人男性特质的化身。通过所有这些方式，约翰逊进一步加强他对强大的男人身份的拥有权。

换言之，关于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并非严丝合缝。任何意识形态都有内部矛盾性。因为这些内部矛盾的存在，因为各种意识形态彼此矛盾，男人和女人能够影响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过程——虽然他们不可能避开。男人和女人不能创造全新的社会性别形式，但是他们可以改造旧有的。他们可以不断组合旧有的社会性别形构（formations of gender），利

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并努力改变它们。人们还可以像约翰逊那样改变自己与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的位置关系。所以，把社会性别看作一个持续进行的意识形态过程——而不是一种内在天然的本质或一些特征和性角色——使得历史学家得以研究：人如何成为历史变化的创造者？[35]

阶级、社会性别、重塑男人身份的愿望

历史学家们早就注意到，19 和 20 世纪交替之际的中产阶级男性似乎对男人身份格外地在意——甚至成了强迫症。他们的研究提到过进步主义者当中的“雄劲欲望”，“辛苦人生”之崇拜者；并且研究最近还常提到一个美国男人的“男性特质危机”，特别令人关注牛仔题材小说的流行、对打猎和钓鱼的狂热和大量出现的突出男性力量的修辞方式。[36]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不认为有所谓“男性特质危机”存在。他们非常正确地指出，尽管当时有豪迈大丈夫气的论调，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男性并没有逃到西部去；相反地，他们保持了对家庭的投入。[37]

这两种立场都有见地。中产阶级男性在世纪交替之际极不寻常地被男人身份的问题困扰；然而，我不建议称这种强迫意念为“危机”。首先，没有证据显示，生有男性身体就自然拥有男人的身份和男人行使权力的权利这一信念，在此段时期的男人当中有所动摇。有些男人可能不是完全明白这三者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但似乎没什么人怀疑这三者的确是联系在一起的。另外，当我们提到“男性特质经历着危机”的时候，其实是在暗示，男人身份是一个超越历史的范畴或固定不变的本质（有时比较顺利，有时受到挫折），而不是把它看作一个不断被重塑的意识形态的构建。前面我们已将社会性别定义为一个持续进行的意识形态过程，它意味着不断的矛盾、变化和博弈。因此，社会性别制度中的变化——即使是相当大范围的变化——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危机”。不管怎样，到 1890 年的时

候，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正交汇在一起，使持续进行的社会性别过程变得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格外地活跃。这些因素影响着中产阶级对于男人的身体、男人的身份和男人获取权力的权利等等这些问题的看法。

阶级问题存在于所有这些变化之中。到19世纪末，中产阶级权力和权威正在多种形式地被挑战着，而中产阶级男性——看似自然而然地——把这理解成是对其男人身份的挑战。自从19世纪早期中产阶级开始自我定义为一个阶级开始，关于社会性别和“男人气质”的理想就占据了中产阶级意识的中心。[38] 1820到1860年期间，当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作为企业家、专门职业者和管理人员赚取一份惬意的生活，中产阶级就开始通过强调其良好教养和受人尊敬的品格来将自己与其他阶级区分开来。[39]社会性别是这个自我定义的关键。中产阶级颂扬的真正的女人，是那些虔诚、充满母性美德、家庭生活的守护者。[40]真正的男人身份对于那个世纪的中产阶级身份同样重要。中产阶级父母教育他们的儿子，就像通过重复练习掌握对冲动的控制那样，他们应该塑造一个强有力的、有男人气质的“品格”。[41]中产阶级把这种凭着坚强的性格和强大的意志来控制男性热情的能力，看成男人支配女人和下等阶级的力量和权威的来源。通过获取有男人气的力量来实现自我控制，一个男人以此获得实力以及责任，去保护和指挥比他弱的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或者他的雇员。

源于强大的自我控制、荣誉、高尚品格和力量的混合体被囊括在“男人气质”(manliness)这个名词里。[42]整个19世纪，男人气质的理想都是中产阶级男性身份的关键。当时的大环境笼罩着市场经济的不可预测性。建立在高尚的自我约束之上的男性品格，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男人致富的坚实基础。中产阶级男性的性格有多么男子气要被审视评估，这决定他们是否能得到积极评价。而这种评价提供者，如邓白氏(Dun and Bradstreet)之类，报道商人的诚实度、正直度和他们的家庭生活。[43]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控制欲望，这一点使中产阶级得以发展其与众不同的家庭生活实践。对自我约束的颂扬，鼓励年轻男子推迟结婚，直到

他们能够给家庭提供一个像样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努力工作、节俭生活、积攒下足够的资本得以建立自己的生意。[44]简言之，19 世纪末期时，强调自控和自律的男人气质的话语，不仅表达着也塑造着中产阶级的身份。

然而到 1890 年代时，部分因为经济变化使得早先的中产阶级男人身份意识形态不太那么容易实现了，"男人气质"和中产阶级身份似乎同时发生动摇。中产阶级男人气质产生的大环境，是小规模的、具有竞争活力的资本主义；这个环境到 1910 年的时候就基本消失了。1870 到 1910 年间，自雇的中产阶级男性比例从 67%下降到 37%。[45]同时，店铺和办公室低层文书工作大大增加，这意味着年轻男性在工作初期如果从做文书开始，就不太能够像他们的父亲辈当初那样容易被提升到承担管理责任并挣到丰厚薪水的职位。[46]另外，1873 到 1896 年间，一次次严重的经济衰退造成成千上万的破产，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使是一个成功的、自我奉献的小业主，也有可能意外地、没来由地失去一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年轻男性面临一个非常切实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男性权力和地位的来源也许会永远失去——就是说，他们也许会成为失败者，而不是自我奋斗成功者。

情况如此变化了，大男人的自我奉献越来越得不到回报。对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男性来说，具有男人气质的独立业主身份不再能实现。这样，维多利亚式男人气质规范，即，像个真正男人一样的自律，似乎不那么有道理了。中产阶级男人越来越被新的、与旧的男人行为规范相悖的理想所吸引。

在中产阶级男性事业机会不断减少的同时，商业性消遣的新机会却出现了。消费文化的增长，鼓励面临事业上的失望的中产阶级男性在娱乐上而不是在工作中找到自我身份。[47]然而，男人气质规范又要求他们必须拼命工作取得经济独立。消费文化追求愉悦和轻浮的目标与男性自律的理想发生着冲撞，进一步减弱中产阶级男人气质的存在力。[48]中产阶级

文化中由经济原因导致的变化，就这样削弱着既存的、曾在19世纪对男人身份至关重要的男人气质。

中产阶级关于男人气质的理想在弱化，中产阶级男性的社会权威受到来自外部的猛攻。这个威胁来自于劳动阶级男性，他们与中产阶级争夺控制“政治”这个属于男性的领域。19世纪，选举政治还被看作是男性领域的一部分，一个完全属于男人的话题。的确，正如宝莱·贝克尔(Paula Baker)展示的，党派对立政治是证明男性身份的场所。政治活动好像男性的仪式，在庆祝参加者作为党员和男人的双重身份。同时，选举政治既光大了也加强了男人们——作为男人——与政府拥有的具体实在的权力之间的纽带。[49]之所以男人对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极度抵制，就是因为男性权力和男性身份是19世纪选举政治问题的核心。这样看来，移民男性争取对市政府的控制，在实实在在的意义上，是男人身份问题的论争。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移民们与中产阶级男性争夺政治控制权的时候，城市中产阶级男性的男人身份的真正基础，也就在象征意义和实际利益两个层面都受到打击。所以说，移民男性控制城市政治的努力，实实在在地成为男人身份的竞争——胜利者往往是移民男性。[50]

移民劳动阶级的男性，在城市政治方面挑战中产阶级男性的作为男人的权力，而其他劳动阶级男性则挑战了中产阶级男性控制国家的权力。从1877年的大暴乱开始，金权政治时期充满了工人暴动。1881到1905年间发生了将近3700次罢工——这些罢工常常是暴力的——有七百万工人卷入其中。1900年全国才有二千九百万工人，所以参加人数是相当可观的。[51]很多人担心，阶级之战迫在眉睫。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运动力量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恐惧。中产阶级男性担心他们会失去对国家的掌握。在中产阶级男性的认识中，男人身份的权力囊括了实现公民权威、控制冲突与动乱以及决定国家前途的权力。在劳动阶层和移民男性的挑战面前，中产阶级男性不能履行他们这些作为男人的义务，也不能

行使这个男人的权威。这就使得男人身份更成为关注的焦点。

挑战中产阶级男人控制公共权力和权威的，不止是移民男性和劳动阶级男性。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妇女运动也在争取妇女进步。"进步"对这些"新女性"而言，意味着赋予妇女那些原来只有男人才能参与的某些领域活动的机会。虽然还是少数，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妇女在争取行使受教育的权利以及成为教会神职人员、社会科学研究者、医生的权利甚至选举权。男人们激烈地反应，嘲笑这些新女性，预言这些女人不仅会把自己搞得一团糟还会毁了整个国家生活——她们这么做是"反叛自然"。一位愤怒的男性教会神职人员抱怨：女权主义者反对的是"作为女人这一根本事实本身……让女人取代男人或男人取代女人，最后不会有什么好结果"。[52]但是新女性的确"让女人取代了男人"——如果这句话指的是，新女性的成功削弱了这样一个旧认识：教育、专门职业者的地位和政治权力必然需要一个男性身体。妇女运动因而成为中产阶级男性重塑男人身份的另一个压力来源。[53]

这些来自于妇女和工人以及变化着的经济状况的挑战，不仅影响着男性对自己的身份和权威的认识，甚至影响了男人对男性身体的看法。白人的中产阶级男性如今得知，他们受到一种新被发现的叫"神经衰弱"的疾病的威胁。据医生们说，神经衰弱正在整个中产阶级蔓延，原因就是过度脑力劳动和神经紧张，通常专门职业者和商业家因为在日益艰难的经济下为争取成功而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状态。[54]对"神经衰弱"的发现，使很多人担心，中产阶级男人作为一个性别已经衰微。劳力阶层和移民男性，通过他们的罢工和"未开化的"习俗，似乎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已经失去了的男子气和生命力。

当一些医生关注患了神经衰弱的男性身体时，另外的医学人员则开始花大量的精力研究男同性恋者。1880 年代后，医学专家不再把同性恋看作是应惩罚的行为，而是一种不正常的有缺陷的男性身份，是由于疾病或先天畸形导致男性身体出问题的例子。[55]关注男同性恋者的身体——

它被冠上新名词“倒错”，也是一种方式，来调查对危胁中产阶级男人身份的更广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医学化并进行控制。

尽管有些医学专家在试图“发现”威胁男人身体的新身份和新疾病，其他的一些中产阶级男人则找到新的方式来张扬男性身体的健康、肌肉感和力量。[56]连大众流行的理想男性身体的形象都变了。19 世纪 60 年代，中产阶级的理想男性身体是削瘦结实。可是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新的理想男性身体要有块儿、有形状很好的肌肉。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吉姆·杰福瑞斯那副夺得了重量级拳击冠军的身体。[57]中产阶级男性开始对肌肉感如此着迷，使得像尤金·桑多(Eugene Sandow)和波那尔·马克法顿(Bernarr McFadden)这样的人通过展示自己的身体并在市场上推广《身体文化》这样的健美杂志而发了财。[58]到 1890 年代止，高强度锻炼和集体运动项目已被当成发展出强有力的男人身份最重要的内容。大学橄榄球获得全国性的风靡；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评论者认为，橄榄球具有培养男人气概的能力，就算偶尔球场上有死亡也值得。[59]

因此，1880 到 1910 年期间，中产阶级男性对男人身份的问题格外关心。经济发展削弱了维多利亚式宣扬自律的理想男人身份。中产阶级白人男性一向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掌握国家的命运，而劳动阶级男性和移民男性以及中产阶级妇女挑战了这样的想法。医学权威提醒人们关注男性身体的脆弱；吉姆·杰福瑞斯这样的运动员——拳击界的“白人之希望”——则为大家提供了新的力量型的男人身份范本。这些都显示着，男性在主动地甚至是积极地投入到重塑男人身份的过程中。但是尽管男人身份旧的含义在逐步丧失其信服力，男性特质根本算不上经历着危机。很明显，中产阶级男性仍然相信，男人身份是有力的，它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所有具有健康的男性身体的人都拥有男人身份。的确，杰克·约翰逊的重量级冠军和他的跨种族婚姻所激发的强烈情绪，证明了重塑男人

身份这一不断进行的过程是如何地活跃。

重塑男人身份的多样策略：性、阶级、种族以及“男性特质”的产生

面对各种针对男性身体、男性身份和男性权威之传统定义的挑战，中产阶级男人采取了多样的策略以重塑男人身份。他们不满意历史和文化是如何将他们定位为男人的，所以就试着利用一系列文化素材来合成一个更有力的、他们更喜欢的男人身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创造关于男人身份的一些新意识形态——不是关于男性特质的，而是关于男人身份的。

许多男人希望通过颂扬任何“男性的”东西来振兴男人身份。上百万的男子加入了像“棕汉”（Red Man），共济会（Freemasons），共济社（Oddfellows）这样的男性团体。[60]还有人特别努力通过像男童子军和YMCA（基督教男青年会）之类的组织把男孩子培养成大男人。[61]还有很多人，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通过像商业拳击、大学橄榄球和健美之类的力量型体育活动来张扬运动型的男性身体。[62]有人还写书讲述旧式的男人气质，比如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威瑞治（Albert Beveridge）大受欢迎的那部充满陈腔滥调的《年轻男子与世界》（*The Young Man and the World*）。[63]

还有的男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反对过度的女性特质来振兴男人身份。有人把有头脑的妇女认定为主要问题，指责女权主义、男女合校教育、离婚以及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人。[64]有人则试图招募更多的男教师，来保护小男孩儿们的男性特质。[65]更有人提出警告，维多利亚式文化本身就是“阴柔的”；他们坚信男人必须要让这个社会重振“雄风”。在《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s*）一书中，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让他的人物贝索・郎森（Basil Ransom）这样地总结：

> 整个一代人都成了妇人。这个世界上男性的一面在消失。这是个女性的、神经兮兮的、歇斯底里的、喋喋不休、伪善的年代；充满了空洞语言和假装优雅和夸张的关怀和娇里娇气的敏感的年代……男性的品格——勇敢和忍耐的能力、了解但不惧怕现实、直面这个世界不逃避——是我希望要保存的，或者说……要恢复的。我必须告诉你，我这么地努力，根本不关心你们这些女士们会怎么样！[66]

与此姿态相反，有些男性也许是感觉妇女已经从男性领域剥夺太多了，他们试图从妇女手里争夺控制本来是“女性的”工作。比如，男人们开始对父职更感兴趣，并且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担当更主动的角色。[67]与此同时，基督教新教的主要教派组织了1911—1912年的“男人与宗教进步运动”之类的活动，目标是“发现一百万失踪男子”来重振教会雄性气概，积极热衷于将教会“男性化”(masculinize)。[68]

阶级，也为重塑男人身份提供了素材。就像有的男人通过入侵曾被认为是女性领域中的活动来重塑男人身份一样，另一些人利用了劳动阶级的男性活动。整个19世纪当中，许多劳动阶级的男人采纳了一种“粗野”形式的男人身份。这种莽汉男子气概的形成，主要是抵抗中产阶级高尚的、道德主义的男人气质。这个粗野的劳动阶级男性特质，颂扬与中产阶级维多利亚式男人气质相抵牾的那些体制(比如沙龙，音乐厅，商业拳击)和价值观(比如强壮体力，好斗，性)。[69]从1820年代起，这种劳动阶级粗野男人身份的提倡者嘲笑中产阶级男人气质是脆弱的、娘娘腔的，而高尚的中产阶级男性则反过来鄙视这种粗野的劳动阶级男性风气为粗糙、落后。然而到1880年代时，当维多利亚男人气质削弱的时候，很多中产阶级男性开始觉得这种粗野的劳动阶级男性特质极其有吸引力。例如在时髦的纽约，豪华的“龙虾宫”[1]和百老汇餐馆提供给大胆的中产阶级男性

---

〔1〕 lobster palaces，指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纽约的一些场所，男人可以在那里尽情地享用精美的佳肴、音乐和性。——译注

一个类似于劳动阶级男性沙龙式的场所。[70]长期与劳动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拳击和商业拳击赛，同样地令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男人着迷。业余拳击练习成了受欢迎的体面活动，连基督教男青年会都开始提供训练课程。到1908年杰克·约翰逊争得冠军的时候，很多中产阶级男性早就把像吉姆·杰福瑞斯这样的拳击冠军当成了他们自己认识中的男人身份的化身。[71]

当男人们努力重塑男人身份时，他们采用了新词汇，来表达他们对男性权力本质的一些不断变化的新理解。1890年代，他们创造了像sissy，pussy-foot，cold feet，stuffed shirt这样的新词，〔1〕来形容曾一度是沉着的、有男人气质的行为如今已显得“过度文明”(ȍvercivilized)和阴柔。[72]的确，“过度文明的”这个词就是那几年的新名词。[73]然而最说明问题的，是用来描述理想的男人身份根本核心内容的一个新名词，被日益频繁地使用了。这个新的流行词，就是“男性特质”(masculinity)。

尽管历史学家们通常把“有男人气质的”(manly)和“男性的”(masculine)两个词语当成同义词换着用，其实这两个词在19世纪中带有非常不同的含义。直到大约1890年的时候，受过教育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很少用“男性的”这个词来形容某个男子；他们用“有男人气质的”称被大家敬爱的男子。[74]可是1890年以后，“男性的”和“男性特质”这两个词语被更加频繁地使用，其原因就是这两个词语表现了中产阶级男性试图去综合的强有力的男人身份之中的新要素。

要理解“男人气质”和“男性特质”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看看《世纪大辞典》(美国版的《牛津英语大词典》)。这本词典在1890年概括了这两个词的区别。“(具有)男人气(质)的”(manly)的定义中，有我们今天看来有道德层面的内容：“‘男人气(质)的’……这个词囊括了对于作为一个男人的高尚之处或作为男人具有的高尚价值的最高层次的观念。”“具有男人气质的”的定义是：“具有作为一个男人应具备的良好特点；在精神和举止

〔1〕 Sissy，指胆小鬼；pussyfoot，也用来形容男人藏首露尾、闪烁其词；cold feet，指半途退缩；stuffed shirt，指男人摆臭架子。——译注

上独立；强有力，勇敢，心胸宽广的，等等”。它的同义词包括有荣誉感的和高尚情操的。“男人气质”则定义为：“作为一个男人应具有的高尚品格和行为。”换言之，“男人气质”包含着维多利亚中产阶级崇尚的男性所具备的一切高尚的和有道德的特征。[75] 的确，历史学家正确地使用了“男人气质”来指代“维多利亚式男人身份理想”——比如，性自律，意志坚强，强大的品格。[76] 所以，“男人气质”完全是中产阶级维多利亚文化程式，它在19世纪晚期发生动摇。此后，男人希望动用一种不同形式的男性权力的时候，他们就日益频繁地使用像“男性的”和“男性特质”这样的词语。

与指代男人身份“最高层次的观念”的“有男人气质的”(manly)这个词语不同，作为形容词的“男性的”(masculine)被用来指所有男人都具有的任何的特点，不管这些特点是好是坏。《世纪大辞典》是这么说的：“‘男性的’……用于指男人和他们的特征。”这个词的定义是：“具有人类当中的雄性(male sex among human beings)所具有的特别的特点——身体的和心理的；适合于雄性的；适合或为了男人使用的。”[77] 19世纪早期，“男性的”大多时候是用来区别适合男人和适合女人的，比如，masculine clothing(男装)，a masculine gait(雄赳赳的步伐)，masculine occupations(男人的职业)。因而“男性的”(masculine)的使用频率超过了“(具有)男人气(质)的”(manly)、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限——因为，从定义上说，所有的男人都是“男性的”。

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的文化变动削弱了“男人气质”的力量的时候，“男性的”这个词作为一个相对空洞的、有流动性的形容词——缺乏道德层面或情感层面的含义——而存在。就是这个流动性和情感上的中立性，使得“男性的”格外地吸引那些想方设法在编创关于男性权力的新解释和新描述的人。

正当作为形容词的 masculine(男性的)[1]开始添加新的内涵的时

---

〔1〕 为便于读者理解此处作者历史分析的思路，因为词汇之间的关系是关键，翻译突出英文原文某些词汇而把中文放在括号里。——译注

候，人们开始需要一个名词来表达“男性的”事物的统称——然而在“男性的”这个形容词承载了这么多含义之前，没有这样一个名词存在的必要。19 世纪中期，从法语中拿来的一个新的英语词 masculinity 逐渐进入大众经常使用的语汇。[78]这样看来，这些真的不止是一个巧合。名词 manliness（男人气质）在整个 19 世纪是普遍使用的，就在 1890 年版的韦伯词典还把 masculinity 这个词标注为“罕用”。早期词典经常干脆漏掉这个词。[79]但是，1890 年的《新世纪大辞典》给了 masculinity 一个定义：“作为男性的（masculine）的品质和状态；男性的品性和特征。”

正当中产阶级男人们试图给男性的“品质和状态”增添一层层新的含义和权力的时候，masculine 和 masculinity 这两个词语的含义被定义得越来越清晰。到 1930 年的时候，masculinity 这个词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更接近 20 世纪美国人熟悉的“男性的”理想（“masculine” ideals）——比如咄咄逼人，身强力壮，男性的性行为——的混合体。当然，这些理想很早就与男人身份相关联。但是，随着 19 世纪初期中产阶级的崛起，对大多数“体面的”美国人来说，男人身份新的“有男人气的”理想已经部分地脱离了传统男性价值，尽管“粗野的”劳动阶级男性文化继续颂扬它很久。[80]直到经过了几代人，“男性特质”（masculinity）的新观念才取代维多利亚“男人气质”（manliness），成为中产阶级关于强有力的男人身份的最主要意识形态。的确，在 1917 年，就是本研究探讨的历史时期的最后一年，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可以同时夸赞某人正直的男人气质和他阳刚的男性特质。但追溯起来看，从 manliness 到 masculinity 这样一个总体的变化方向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1910 年当杰克·约翰逊跑到拳台上去为冠军称号挑战杰福瑞斯的时候，他也进入了一个更大的赛场——这个赛场里，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正想方设法找新的途径解释男性权力和权威的源泉和本质呢！男人们不仅涌向像职业拳击这样的与粗野的劳动阶层男性联系在一起的娱乐领域，他们还加入了只许男人入伙的团体，比如共济会，试图通过招募男教

师把高中学校男性化,嘲弄女子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和男女同校教育,甚至使用像 sissy 和 masculinity 这样的新词来改变与男人身份有关的语言。虽然其他可以探讨的中产阶级重塑男人身份的策略还有很多,[81]但本研究着重分析一种策略,即中产阶级男人和女人如何通过种族优越、特别是"文明"的话语,来重新定义男人身份。

在种族优越中构建男性优越:一个连续的策略

中产阶级试图重塑男人身份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从社会性别转向一个相关联的范畴,一个像社会性别一样也把身体、身份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范畴。这个范畴就是种族。[82]那些试图重新创造社会性别观念的美国人,利用多样的方式,通过在男性权力和白人优越之间架建关联来解释男人身份。我们前面讲过的在杰克·约翰逊的重量级拳王问题上白人男性的神经质反应就是一个例子。

把白色人种联系到男性权力上,就其本身而言,不是什么新现象。美国白人长期就把强有力的男人身份与白人优越联系在一起。比如,19 世纪中有大概三分之二的时期,美国的公民权利被解释成只有白人男性才能拥有的"男人身份"权利("manhood" rights)。北部和西部的十六个州宪法明确地把黑人男性和所有妇女放在同一个范畴里,即"从属者"。[83]黑人男性,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奴隶,被禁止行使"男人身份拥有的"权利——不能投票选举和被选,不能担任陪审员,不能参军。与此相似,白人的劳动阶层男性坚持认为,作为男人,他们拥有妇女和黑人男性所缺乏的男人的独立。[84]这个逻辑的结论不言而喻,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明白的:黑人男性与白人男性不同,他们还不是男人(less than men)。

反过来,黑人男性明白,所谓黑人缺乏男人身份这一观念,被用来支撑对他们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剥夺。因此他们抗议说,他们——的

确——是男人。争取自由的男性奴隶想要得到他们的“男人身份权利”。[85]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说，当他还是个十六岁的奴隶的时候，第一次公然反抗鞭打，“我感觉在自己身上恢复了我自己的男人身份。”[86]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在1828年控诉道：“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居民(当然，除了非洲的儿子)都被称作男人，也当然是也应该享有自由。但是我们(有色人种)和我们的孩子是野蛮人！因此也应该做奴隶……啊！我的黑人兄弟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这死亡一般的无情中站起来！——做男人!!”[87]南北战争期间，虽然备受不公正的歧视性待遇，还是有多达180000名的黑人加入了联邦军队，因为他们明白，要证明他们是男人且应与所有美国男人拥有同等权利和特权，入伍是最有力工具。[88]这些黑人全都知道，要取得公民具有的权利，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性别；就是需要证明：他们，也是男人。

虽然把男人身份联系到白人优越上不是什么创新，到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发现了数量惊人的方式来把权力和种族联系到一起。有时候他们把男性权力和文明的白种男人的种族优越联系到一起。比如，像《国家地理》这样的大众人类学杂志，在1889年创刊，通过不懈地把“文明开化了的”白人男性探险者描绘成黑暗的非洲“原始”部落里的探险英雄而获得了大量的阅读群。[89]1908年的一篇文章，《穿越刚果东部的旅行》附有一幅照片，就充分表现了当时的这种情况。一个高高的白人探险家，充满尊严，金发，认真地用夹克衫、帽子、靴子、袜子和齐膝短裤装扮起来；扛着一枝很贵的来复枪，夹在两个“矮子打猎跟踪者”当中——他与他们的对比也含蓄地暗示出来。这两个矮人一副野蛮相，裸体，并且只配备着弓箭，个子不及他的肩膀。不管是在外貌还是在武器上，他们的形象暗示的是不如那个白人那么强大、那么有男人气。[90]同样的，盎格鲁-撒克森种族的帝国主义者声称，文明教化了的白种男人具有一种属于他们种族的天赋，使他们懂得如何自治，所以他们必须征服更“原始的”、肤色更深的种族。“未开化的男人”与文明的白种妇女(她们要

求选举权的努力遭到被激怒的男人的疯狂反对)一样无法行使“男人身份权利”,因为他们缺乏的是种族天赋。1910年,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威瑞治号召参议院的白人男性们帮菲律宾人组成一个政府,他说:“这一千年来上帝让说英语的和条顿人做着准备,并不是让我们成为虚荣而无所事事的自恋和自我吹捧者。不!他使我们擅长于管理政府,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野蛮和衰老的民族中治理政府。”[91]在各种场合和情境下,美国白人把文明的白种男性和野蛮的有色人种男性放在一起对比,将前者描绘成男人气优越的典范。

但在另一些场合,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又采用另一种对比策略,把强有力的男人身份与有色种族的“野蛮”和“原始”联系起来,但声称他们自己也拥有这样的男性特质。根据历史学家安东尼·罗通多(Anthony Rotundo)的研究,到1870年的时候,中产阶级男性的书信和日记充斥了一种原始的男人身份的新认识,它与维多利亚道德性男人气质大相径庭。这些生活在19世纪晚期的男人,与其父辈不同,相信真正的男人身份要有一种原始的雄浑——罗通多称之为“男性的原始本性”(“masculine primitive”)。他认为,这种“男性的原始本性”强调的观念是,“所有的男性(all males)——不管是否文明教化了的——都具有同样的追求生存的原始本能”;而且“文明的男人——与妇女相比——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是更原始的”。[92]这样用男性原始本性的观念来理解自己的中产阶级男人,于是就对各种“野蛮”的活动更感兴趣。白人男性加入像“进步棕汉”这样的男性组织,参加每周进行的精心策划的仪式,模仿他们幻想的美国土著美洲人的冒险。[93]对野营、打猎和捕鱼的爱好从没有这么高涨过——这些被看作原始社会的男性的求生技能。中产阶级男性开始阅读豪迈的探险故事:比如杰克·伦敦的小说,如《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之类的西部故事,像《格罗斯达尔克》(*Graustark*)描述的暴徒。[94]原始感觉的英雄故事遍布大众文学,以至一位上层社会的评论家抱怨道:“难道只有杀死狮子和熊的男人可以称王,而一个质朴的牧羊人没有任何美德?我们这

么野蛮吗?”[95]

“文明”及其不满者:通过关于文明的话语联结种族和中产阶级男人身份

中产阶级白人男性怎么能够同时利用“文明教化了的男人气质”和“原始男性特质”这两个方面建构强大的男人身份呢?虽然这两个策略似乎是矛盾的,他们在当时显得很一致,因为两者都利用“文明”这个强有力的话语。对世纪之交的美国人而言,“文明”同时有两个意义外延:种族特征和社会性别特征。这样用各种相互矛盾的方式援用关于文明的话语,就使得许多美国人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把男性支配和白人优越联结起来。[96]

“文明”的应用真是千变万化。不同的人,可以用它来支持保守主义或变革,男性支配或强硬的女权主义,白人种族歧视或黑人的抵抗。一方面,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的白人男性有效地利用“文明”来维护他们在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上的权威——不管他们援用的是原始男性特质还是文明的男人气质。但是尽管“文明”很成功地建构男性支配,它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反对白人男性支配的人,援用“文明”来阐述另一套观点。女权主义者拿它来说明妇女进步的重要性;黑人引用它来证明种族平等的必要性。

于是,“文明”最有意思的倒不是它的含义,而是它怎么以这么多的方式被人们用来阐述他们争取权利的主张。所以在本研究里,我不准备把“文明”简化为一套具体的公式或观点。我对它的探讨,是把它当作一个有效的话语;尽管效果大小不同,它有效地建立了(或挑战着)白人男性的霸权。换言之,这个研究的焦点,是表达的过程本身。我不去试图提炼人们对“文明”一词在使用上的共同之处,这样可能会抹去矛盾和复杂性。相反,我会主要分析,人们援用有关文明的话语来建构什么是男人的观点

的时候，他们都用了什么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方法。

这就要谈及方法论的问题。与近年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我受到福柯及其关于话语的观点的很大影响。我说的“话语”，在这里表示一整套观念和实践合在一起，不仅组织着一个社会如何树立关于它自身的真理，也组织着这个社会运用社会权力的方式。这样的方法，在以下三个有益的方面改变思想史的研究。[97]

第一，不同于传统的思想史，这种方法论不明确区分思想观念和具体实践，不区分上层建筑和物质基础。话语包括了思想层面的建构以及具体存在的实践两方面。像福柯一样，运用这种方法论的历史学家认为，思想层面的知识和具体的权力关系是相互构成的。一方面，在一个社会里执行着它的各种权力关系的日常实践，决定什么样的知识被看成是正确的（这些权力关系包括各种体制，习俗，政治运动）。另一方面，被广泛地接受为真理的观念，决定了人们想要什么样的权力关系，他们可以设想哪些政治目标和策略。同时关注思想层面的建构以及具体存在的实践，使历史学家得以同时分析观念和实践，能动性和权力。

第二，这种方法论认为构成任何话语的观念和实践都是多元的、不一致的、矛盾的。我们刚刚谈到的“文明”的例子就显示了话语的复杂性。正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往往使它们得以紧密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方法论既不试图罗列出一套系统的观念，也不去调和各种观念的不一致，而是审视话语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以哪些不同的方式被表述出来的。

第三，由于这种方法论审视这些不一致的内容，它就意味着要格外地强调人的能动性和主动改变世界的可能。比如上面的杰克·约翰逊的例子里，话语内部和它们之间内在的矛盾和不一致，使得人们可以为各自的目的扭曲它们。话语理论并不能发现主观推动变化的无限可能。在现有的话语条件下，只有某些类型的“真理”，也只有某些行动的可能性，是可以想象的。然而，由于任何一个话语的内部都存在如此大量潜在的意义

模糊和矛盾，异议和抵抗的多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带着这些方法论认识，现在让我们回到关于“文明”的讨论。到大约1890年时，“文明”话语已经有了围绕着种族、社会性别和千禧年主义的人类进化过程论的一些非常具体的含义。女权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对“文明”的认识可能与霸权性认识对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有不同的组合；但是种族、社会性别和千禧年主义总是以某种形式成为这些认识的关键。

为了明白反霸权的(counterhegemonic)“文明”理论是什么，我们需要先明白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认识，以及它是如何把种族、社会性别和千禧年主义编织在一起的。让我们从种族开始。在19世纪晚期流行的达尔文主义的背景下，文明被视为一个明确的种族概念。它不仅指“西方”或“发达工业社会”；文明的含义指向人类种族进化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它在更原初阶段的“原始状态”和“野蛮主义”之后。人类的种族被认为是从简单的原始状态进化经过充满暴力的野蛮主义，再进化到高等的有价值的文明。但只有白色人种已经进化到了文明阶段。实际上，人们有时候提到文明，仿佛它本身就是一个种族特征，被所有的盎格鲁-撒克森人和其他“高等的”白色人种继承的一个特征。[98]

社会性别也是文明的一个核心部分。的确，那时性别区分程度可以是发达的文明的衡量标准。[99]野蛮的(即非白种的)男人和女人被看作几乎没什么大区别，但文明进化了的种族中的男女已经进化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文明的女人是懂得妇道的：精致，有崇高精神信仰，为家庭奉献自我。而文明的男人则是进化得最有男人气质的：品格坚强，自控，妇女和儿童的保护者。相比之下，野蛮人的社会性别差异似乎就模糊了。野蛮人的女子咄咄逼人，有各种沉重的负担，而且还得做各种“男性的”重体力活。野蛮人的男性情绪化，缺乏作为一个男人应具有的控制情感的能力。他们反复无常，不能保护妇女却强暴她们；他们不能抚养孩子而是将他们抛弃。他们甚至穿着也像女人一样，穿着裙子带着首饰。简而言之，

中产阶级的领域分离的教条，提倡明确的性别差异，认为野蛮状态是没有这些差异的——因为这些差异是更高级的文明所固有和必要的方面。[100]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文明的话语把男性支配及白人优越的理论与基督教新教千禧年主义中的达尔文主义一派联系起来。对于人类进程的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的解释，那时已经在美国文化中扎根几个世纪了。根据这些教义，从亚当和夏娃的时代开始，人类历史就有一个宇宙论目的：一千年与魔鬼的战斗。人类历史本身就是这个战场，而基督教的男人和女人，在上帝隐形之手的指引下，与魔鬼搏斗。每一个小小的胜利，都把世界更拉近千禧年——那个时刻，魔鬼将被击退，耶稣将在地球上统治完全地和平和正义的世界一千年。[101]

然而，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广泛接受之后，许多基督教新教徒对于他们自己在这个千年说所描绘的图景中的位置感到迷惑了。大部分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对达尔文的理解当中，世界是按照适者生存的原理进化的。没有任何规律地发生的冲突和暴力——而不是上帝之手——塑造了世界史。而且，达尔文并没有为人类进化提出任何宇宙目的：很难让人们想象，充满暴力的自然选择会最终走向一个和平的千年。[102]

美国新教徒相信他们是改善世界的宇宙蓝图的一部分。对于他们当中接受了进化论的一些人来说，放弃这个信仰实在是太难了。他们在“文明”的概念里发现一个办法来解决达尔文主义和新教千禧年主义之间似乎互相矛盾的含义。关于“文明”的各种话语赋予千禧年主义一个达尔文主义的机械解释。“文明”的信徒们不再认为上帝创造历史来完善世界；他们认为是进化在创造历史以完善这个世界。他们不再相信基督徒与魔鬼斗争，而是想象优等种族比劣等种族更有能力幸存。最后，完美的人类进化会胜利。最高等的和最文明化了的种族，即白色人种，就将是最完善的。达到这个理想状态的过程之一，就是向最完美的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的进化。所有文明的人都有责任去努力，创造这样完美的文明，正如历史上所有基督徒都有责任举起主的旗帜。千禧年主义的这种关于“完善

的种族进程”和社会性别区分的远瞻，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文明的进步”的意思。[103]

但是，“文明”的巨大文化力量不是从这些元素的任何某一个里面衍生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这个话语用某种方式把中产阶级的种族与性别观念和千禧年主义编织在一起。占统治地位的文明话语，通过建立男性优越和白种优越之间的关联并且把二者同时作为完善人类的关键来鼓吹，就把男性权力说成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从而维护了维多利亚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霸权。

这里面一个现象是，占霸权地位的文明话语把种族区分和千禧年主义中人类日益完善的设想融合起来。就是说，它把生物学层面的人类进化差异和道德及知性层面的人类发展混融在一处。1897 年，一个年轻的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解释了这个关联：“世界的历史就是种族的历史。忽略抑或是试图践踏人类历史中的种族观念，就是忽略并且践踏所有历史的中心思想”。他接着说，种族的精神和理想，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进步的最伟大最有创造力的发明”。当世界上最伟大的种族进化的时候，他们的信仰特征和精神特征（这两者以身体特征为基础但超越了后者）已经发展得越来越有差异了。这些“不同种族群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力图为文明而发展出他们各自特有的观念和理想，帮助引导这个世界一步步接近人类社会的最终完善——这种完善是我们都企盼的那个‘遥远的神圣结局’”。那个“遥远的神圣结局”当然是指千禧年之到来，即文明的完善。写下以上这些话的，就是著名的黑人知识分子，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连杜波依斯这个强硬的种族平等的倡导者都接受了这样的种族主义的文明进化论，这一事实说明了反霸权主义话语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也显示了这些千禧年主义设想的普遍存在。[104]

“男人气质”的意识形态，就像关于种族的意识形态一样，深受“文明”的千禧年进化论影响。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男人气质（manliness）——与我们今天观念中的男性特质（masculinity）不同——不是对所有男人来说

都是固有的东西。其实，那时"男人气质"是一个努力争取达到的标准，一个要去实现的男性之最完善状态的理想。正如《世纪大辞典》定义的，"(具有)男人气(质)的"指的是"对于作为一个男人的高尚之处或作为男人具有的高尚价值的最高层次的观念。"[105]关于男人气质的意识形态，因而与关于文明的意识形态颇为相近——其实二者常被联系起来。男人气质是男人身份(manhood)的最高级形式。同样地，文明是人性的最高级形式。男人气质是一个完美男人的最高成就，就好像文明是一个完美种族的最高成就一样。(我们要记住，男性特质当时通常不与文明关联，因为它是"所有男人都具有的特性"——这里"所有的男人"也包括野蛮人。而男人气质与此不同，是表示只有最文明的男人才能取得的道德成就。)

当时支持着种族差异、文明和男人气质观点的各种科学理论在一起发展。生物学家相信，当人类的种族慢慢地在进化的阶梯上移的时候，男人和女人进化出越来越有差别的生命和本性。最高等的种族是那些进化出最完善的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的种族。文明开化了的女人被从重体力劳动解放出来而呆在家里。文明开化了的男人养家糊口，坚定不移地保护他们脆弱的女人和孩子不受外面真实世界的骚扰。正如赫伯特·史宾塞(Herbert Spencer)分析的，"从最低层的原始状态起，文明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已经使得妇女从为糊口从事的劳动中不断被解放出来，并且……在最发达的社会里，她们被束缚在家庭责任和抚养孩子的程度最高"。[106]简言之，当文明开化了的种族逐步向完善进化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完善了并加深了维多利亚式关于社会领域的教条中的性别区分。

另一方面，"野蛮"(即有色人种的)种族，还没有进化出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野蛮"。野蛮人男性还没能发展出骑士般的本能去保护他们的女人和孩子；相反地，他们强迫他们的女人从事辛苦的体力活，比如耕地、生火、负重等等。野蛮人女性过度劳动，也从没能发展出文明化了的妇女所具有的精致优雅。[107]种族歧视的幽默作家常常表现这些观念，把美国黑人的男性描绘成软弱和怕老婆，

饱受他们粗健的霸道的妻子欺压。比如，1910 年《文摘》杂志摘印了《妇女家庭之友》的一则笑话：

> 问：“你家姑娘婚姻美满吧？”
> 答：“可不是！谢天谢地，她找的老公怕她怕得要死。”[1]108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黑人被描绘成无性的原始人，未能进化出更文明的种族那样的完善的男人身份或女人身份。

尽管从 20 世纪的角度看，“文明”似乎混淆了生物学和文化，但维多利亚式种族观念正是以这种含混为根据。人类学历史学家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非常有力地论证了，维多利亚主义者就是把“种族”理解成一个生物学和文化的完全混合体。例如，当达尔文在火地岛遇上一群印地安人的时候，在他看来，对方的身体和文化特征同样地奇怪。由于缺乏关于文化的复杂理论（这样的理论到 20 世纪初才发展起来），他就认为身体的和社会的两方面特征同等地表现着生物学上的种族（biological race）特点：

> 达尔文在火地岛人群中观察到的是一种自然的民族志完全形态。体彩、油脂和身体结构融合进一个对身体类型的感知；身体类型与达尔文听到的不悦耳的语言和粗野的举止在感知上密不可分——这个完态被他纳入到“种族”这个词汇里。这其实是与当时自然史对其他动物种类的理解相符的。自然史在区分一个生物种类或“种族”的时候要综合动物的体型、叫声和行为习惯等所有信息。当时达尔

〔1〕 由于英文本身对底层黑人口语和误用的夸张表现以达到突出黑人的“不文明”的效果，很难将这段对话准确充分地翻译出来。原文是：Mrs. Quackenboss——“Am yo’ daughter happily mar’d, Sistah Sagg? Mrs. Sagg——“She sho’ is! Bless Goodness, she’s done got a husband tat’s skeered to death of her!”——译注

> 文像很多人一样相信拉马克式演化，所以他的“种族”观念，在用于对人的观察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混杂的生物—文化性的特点。[109]

当时，受过教育的维多利亚主义者由于缺少一个可以帮助区分身体形态学和文化特征的概念性框架，把这两者都纳入了他们称为“种族”的这个完形(gestalt)中。于是，美国白人的意识中，原始人男性从生物意义上讲也无法实现男人气质。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不过是混淆了生物学和文化。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其实是他们在对种族的理解之上作出的符合逻辑的——甚至可以说不健康的——一个结论。

“文明”的概念把“种族上原始的男人”看作缺乏实现男人气质的生物能力，它得到了拉马克主义生物学理论关于人类获得性遗传的观点的支持。当时孟德尔人类遗传学和基因突变的概念还未被接受。到 1900 年的时候，大多数的生物学家仍然认为，人类种族唯一的向更高文明进化的途径，就是每一代人都再发展一点并把习得的特征在基因上传给后代。而受过教育的大众在科学家们放弃这些观点后几十年还在相信它们。这样，许多中产阶级白人觉得，科学证明了种族落后的男人怎么努力也不能像白种男人那样有男人气质；他们完全有理由坚信这一点。原始的种族缺乏生物能力发展更为高等的种族特征，比如男性气质；所以他们要由很多代来慢慢地获得男人气质并把这样的文明能力传递给后代。

这样，文明就同时在文化层面和种族层面建构了男人气质。白人男性由于从他们的先辈那里继承了完善的男人气质而拥有它。黑人则可能竭尽全力地想要成为真正的男人，但努力也是徒劳。他们是原始落后的；他们种族的祖先没能进化出文明的男人气质的能力，所以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文明的男人气质。

世纪之交的文明的各种话语，强调种族和性别的生物学因果联系，因而就掩盖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范畴——阶级——的重要性。很多历史学家指出，阶级问题向来是在关于文明的观念中暗含的。至少从 18 世纪起，

相对于不讲究的民众粗鄙的品味，特权阶级的教养一直与高等文明联系在一起。[110]到19世纪晚期，从欣赏莎士比亚和绘画到关于举止礼貌的复杂细致的规范，各种“文明的”艺术和仪态完全彻底地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联系起来。[111]

中产阶级通过淡化道德和文化的重要性来强调：这些“文明教化了的”品味和习俗是具有种族性的；这样他们就得以模糊“阶级”这个一直很重要的问题。借着文明的观点，中产阶级可以把他们自己的选择和品味说成是由生物性决定的高等种族的特征。进化，而不是金钱财富，使得他们有能力欣赏和创造伟大的艺术、古典音乐以及他们细致地装潢的家。进化，而不是中产阶级的文化标准，造就了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精致和善于理家。进化，而不是经济自利，造就了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有男子气质的自律，使得他们成为自我奋斗成功的男人。这些观念因为劳动阶级中有大量的移民加强了：没人相信斯拉夫或地中海地区的人种能拥有像盎格鲁-撒克森人种那样高等的、更文明的品味！由于有了“文明”的概念，这些阶级性的差异才可能被说成是“种族的”。

另外，根植于文明的话语中的千禧年主义进化论，为中产阶级男人提供了更好的方式来对付针对他们以阶级为基础的男性社会权威的挑战。比如，中产阶级美国人长期以来相信，一个男人的勤奋和才能必然会带来财富和成功。但是到1880年的时候，日益加剧的大公司经济以及导致破产的一次次不断的经济危机，意味着越来越少的中产阶级男性能够实现成功独立的企业家那种男人的权力。但是，用“文明”的观念去理解，这些经济衰退可看作是暂时的和不重要的：毕竟中产阶级白人的种族命运是达到文明的完善，所以最终他们或他们的孩子怎样都会继承这个世界。同样地，充满敌意的工人阶级男性发起的一次次好像无法阻挡的大罢工，虽然似乎在威胁中产阶级男性对国家未来的掌握，但文明的话语让这样的挑战失去意义。从长远看，由于中产阶级男性是高度文明化的北欧人种成员，他们进化的未来是战胜移民为主体的——也因而是劣等种族的——

劳动阶级。这样,在阶级上针对中产阶级男人身份权力的挑战,就因文明的观念而消失了。文明的观念让人们相信,勤奋的、成绩值得赞赏的、雄劲的盎格鲁-撒克森男人,一定会迈向种族支配和最高层次的进步。

哥伦布世界博览会上的种族、社会性别和文明[1]

为了更具体地理解"文明"是如何在白人优越和千禧年主义进化论基础上建立了霸权性男性权力(也为了理解女权主义和反种族歧视对这种权力的挑战如何进行),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熟悉的例子,即 1893 年芝加哥的哥伦布世博会。国会在批准世博会的时候,希望把它开成"一个对新大陆的文明之进步的展示"。112 并且,千禧年主义的确深入博览会的思想。正如詹姆斯·吉尔伯特(James Gilbert)指出的,这个博览会最积极的组织者当中的许多民间领袖,都成长在纽约的"烧光地区";[2]这些人在青年时代所汲取的福音派千禧年主义,是他们对这个意在展示美国文明朝着人类最终完善迈出的惊人进步的博览会之设想基础。113

这次世博会所体现的千禧年主义完善当中,两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白人优越和强大的男人身份。正如罗伯特·瑞戴尔(Robert Rydell)揭示的,世博会组织者把它划分成两个具体不同的种族区域。"白色都市"描绘了千禧年主义中的白人文明进步,而"娱乐场"则表现为开化的有色种族的落后野蛮。114 文明的"白色都市"是为了要展示一个千

〔1〕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亦称 The Chicago World's Fair),1893 年在芝加哥举行。它是 19 世纪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世界博览会。名义上,它是为了庆祝哥伦布 400 年前的远航;但它其实主要是为了展示和赞美美国的文化和社会。——译注

〔2〕 Burned-over district,指纽约州中、西部的地区,用这个比喻是因为 19 世纪初这里宣讲福音活动及其活跃和狂热,以至基本上没有未归信的人了。这个词因历史学家 Whitney Cross 的著作标题而流行起来(Whitney Cross, *The Burned-over District: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nthusiastic Religion in Western New York State: 1800 -1850*. It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译注

禧年式的未来：更进步的白色人种在努力创造一个完美的、文明的过程中，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组织者们雇用了最出众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参观者对"白人都市"令人瞠目的完善大加赞赏。

在"白色都市"，白色人种的完善不断地被与强大的男人身份联系起来。它的看点是宏伟的"荣耀广场"(Court of Honorable)，大约半英里长的一个装饰性的水池，两旁环绕着巨大的白色艺术性很强的建筑。Honorable 这个词，在 1890 年的《世纪大辞典》里，是 manly 一词的同义词，[115]而且当时的人一定会注意到荣耀广场和男人身份之间的联系。围起广场的七座建筑，代表着文明成就的七个方面：制造业，矿冶，农业，艺术，行政，机械和电气；它们都被表现为文明的白种男人的领域。这些建筑里容纳了成千上万的庞大的发动机、战船、火车、机器和武器；而且非常有意识地被展示为男人——而且只为男人——制造和使用的物品。"白色都市"还光扬商业这一属于男性的世界，展出了最先进的产品和制造工艺流程——"发电机和凿岩机，织机和墙纸"——并且把这些展览安排在宏伟的白色宫殿里。[116]这样，通过颂扬"文明"，组织者们鼓吹了白人男人身份的力量。在他们看来，只有男人才是促进种族进步迈向上帝和进化为他们安排的千禧年式完善的行为主体。如当时的一位诗人说，"白色都市"是"对强大的男人身份和完美社会的憧憬"。[117]

组织世博会的男人要确保，"白色都市"先进的文明看上去绝大多数是男性的(male)。虽然一大群上层阶级的白人妇女不懈地努力，希望能够有平等的代表机会，但是他们坚持把妇女的创造排除在大部分展览之外。这些妇女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果。1889 年大约有超过一百名的著名妇女人士，包括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1〕和三位高等法院大法官的妻子，向国会申诉，要求指定一些妇女进入世博会的管理委员会。[118]国会不仅拒绝了，反而成立了一个所谓"女士管理者理事会"——很

---

〔1〕 Susan Brownell Anthony (1820－1906)，是一个著名的美国女权领袖，她在 19 世纪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译注

多妇女抱怨,光这个名字就够显得施舍一般的,而且可笑。[119]国会几乎没给她们什么权力。不过通过不懈的努力,女士管理者们得以使自己成为博览会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伯莎·帕尔默(Bertha Palmer)领导,她们组织并建成了"白色都市"里被参观最多的展览之一——妇女大厦(the Woman's Building)。

但是,女士管理者们相信,妇女大厦只不过是她们要完成的更大任务的一个方面而已。这个更大的目标,就是确保"白色都市"不把文明描绘成男性专有的。她们不满地提出,早期的博览会把妇女的展览局限在一个小展楼里,掩盖了妇女对文明作出的多种贡献。所以,她们原先计划把妇女大厦建成一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展示几个世纪来妇女迈向千禧年完美文明的进步。对妇女在文明中的地位的主要展示,不仅在妇女大厦中有,而且遍布"白色都市"中各种由妇女完成的展览。通过在男人的成果旁边展示妇女的科技、学术和艺术成就,她们将显示,文明既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因此,女士管理者的目标就是积极地拉动妇女参展,向她们推荐适当的管理人员,确保妇女的申请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她们还计划在整个"白色都市"放置海报,告知参观者每一个展览的哪个部分是妇女劳动的成果。[120]

不出意料,女士管理者的计划遭到了彻底的抵制。男性参展者不允许女士管理者在他们的展览附近放置关于妇女劳动的海报。[121]而且,很快大家就清楚了,近乎所有的妇女在申请"白色都市"的展位都遭到拒绝。一月,即博览会开幕前五个月,帕尔默收到一份官方通知:"女士们不必再寄来更多关于妇女工作的申请。"尽管帕尔默最终使这份成命被收回,但那会儿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了:几乎所有的展位都被分配出去了。[122]女士管理者很不情愿地决定,与其让"白色都市"完全排除对妇女劳动的展览,还不如把妇女大厦的大片面积用作妇女商业展示。[123]

她们最初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把妇女大厦用作展厅,就等于把"白色都市"的其他部分——因而也就把"文明"本身——标识为男性的。比

如，女士管理者瑞贝卡·费尔顿(Rebecca Felton)不满地说，在园艺大厦，“所有的地方只有男人的工作被承认……在农场展览上，妇女的工作被混到男人的工作里或完全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要发现她们的工作成果，就好像去美丽的密西根湖岸边给鹅卵石或水浪编号分类那么不可能。”[124]尽管妇女们做了最大努力，妇女大厦还是被看作单独的一部分。传达着毋庸置疑的信息：“白色都市”的文明是男人创造的，而且只被男人创造。要展示男人的成果需要占用整个“白色都市”，而妇女的成果则只需博览会上的最小的展厅(比妇女大厦小的只有博览会办公楼)。[125]

更糟糕的是，把妇女的展览隔离在一个小楼里，是在暗示妇女对文明的贡献与男人的完全不同。参观者印象最深的，是妇女大厦的柔和——与“白色都市”男人气的展览里那些男性色彩的发动机和科技奇迹相比。例如，《纽约时报》指出，有的男人可能会说“妇女大厦和它的各种展览不过是显示了男人的优越”，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 整个大厦的氛围不是……妇女侵入男人的领域，而是妇道的那种充满庄严的温柔与关抚的感觉。……男人的成就是铁、钢、木头和其他更基本更粗糙的产品……在妇女大厦里，人们很容易就辨出女性更精致更纤美的产品——它们出自比如织机、针、刷子，以及在家里、医院、教会和个人装饰的领域里等更完备的生产手段。[126]

女士管理者不懈地努力，想要证明女人和男人为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同等的贡献。但是，正如以上《纽约时报》那一段话显示的，她们失败了。大多数参观者在妇女大厦得到的印象是能够“很容易辨认出”男人对文明的贡献——机器、科技、商业——和女人的贡献——针线活、美丽、家事。

连妇女大厦的位置都突出了白人妇女在文明中的边缘地位。博览会安排者不仅把妇女大厦放在文明的“白色都市”的最边缘，使之远离具有男人气质的荣耀广场，而且他们把它设置在唯一通向“娱乐场”——博览

会上的"未开化"部分——的出口正对面。在文明和野蛮的中间边界上(其实这倒对女人很合适,因为科学家们指出女人在生物学意义上比男人更原始),妇女大厦凸显了白人男性的文明最根本是男人气质。[127]"白色都市"转移了女士管理者理事会反霸权的意图,从而作为文明关键的男性优越的纪念碑而存在。

哥伦布博览会把白人妇女描绘成"白色都市"的边缘,但是至少白人妇女拥有一个大厦和一个官方的女士管理者理事会。有色人种的男人和妇女,则连"边缘"都算不上,完全不存在于"白色都市"。尽管美国黑人男性和女性强烈地反对这一政策,白人的组织者(包括女士管理者理事会)不予理睬。在博览会设计的霸权性"文明"架构里,只有白人是文明开化了的。所有其他的种族都未开化;他们属于"娱乐场",而不是"白色都市"。

正如罗伯特·瑞戴尔分析的,"娱乐场"(Midway Plaisance)特别展示野蛮种族的奇态:所谓"正宗异国风情的"显示萨莫斯岛人、埃及人、达荷美人、土耳其人,还有其他异国人居住的村庄,住满了实际上是进口的"土著人"。[128]博览会指南建议参观者在看过"白色都市"后再去"娱乐场",这样才能充分地理解文明的"白色都市"和未开化的土著人村庄之间的差别。[129]"白色都市"向"荣耀广场"周围所有方向辐射开去,强调高尚男人的文明的复杂。相比之下,"娱乐场"的看景沿一条大路顺着排下去,提供种族等级的样板。参观者从"白色都市"进入"娱乐场",先要通过德国和爱尔兰文明的村落,继续向前经过野蛮落后的土耳其、阿拉伯和中国村落,最后一站是观看原始的美洲土著人和达荷美人。《芝加哥论坛报》兴奋地评论道:"这真是为科学的头脑提供了一个回溯螺旋形进化过程的好机会——从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往前回顾,几乎直到它的动物起源。"[130]

"白色都市"把白种男性的文明当做具有优秀男人气质来颂扬;"娱乐场"则把原始和野蛮描绘成完全缺乏男人气质。比如在波斯的、阿尔及尔的、土耳其和埃及的村落里,没什么男人气的黑皮肤男性,试图劝服游客

们摆脱他们的男人气质束缚，体验这些地区的妇女那优美的舞姿。[131]白人男性眼睛瞟着几乎裸体的肚皮舞舞者，同时经历着两种感受：享受舞者的性暗示，并沉浸在他们自己的文明优越感当中——与他们成对照的是，有色人种的男人在外面拼命兜售门票，恬不知耻地推销他们自己国家妇女的魅力。[132]特别是刚刚参观完"白色都市"的男人，会格外地意识到他们自己具有种族优越的男人气质。另外在"娱乐场"里也没有文明的妇人气质（womanliness）。尽管几乎没什么美国妇女屈尊去观看充满外国风情的肚皮舞，她们很清楚这背后的意思：白人妇女在文明中的位置也许是边缘的，但是至少这个位置是守道德的和安全的；但是在野蛮状态中，妇女经历的不是尊重和平等，而是性威胁和道德沦丧的压迫。

当时的很多评论者认为，在"娱乐场"所有的住民当中最缺乏男人气质的，是原始的达荷美人；这些人似乎完全没有社会性别上的差别。《纽约时报》描述说："一个达荷美男士——没准儿是个达荷美女士，反正区别也不明显——可在任何时间看到，基本上就穿着一条简单的草裙，随着藏在他们身体里的一种躁动的性欲而灵活地跳跃。……共有几十个这样的人，性别混杂，你慢慢才能分辨出来。"[133]强调他只能"慢慢地"分辨出这些人的性别，专栏作者其实在告诉读者，原始人的性别差别太不明显，也许达荷美人的性别"种群"要多于通常的两种。达荷美男人——当然不是什么"男士"，作者用的不过是讽刺的称呼——是未开化的，因而也就不能表现出真正的男人的自控；他在公共场合就随着"性欲满足"的鼓声跳来跳去。他甚至穿"裙子"。

简而言之，哥伦布世博会在很多方面显示了，"非白种的"和"未开化的"就是"没有男人气质"；相反地，"白种的"和文明就意味着男人身份。不论他们是看上去像女人还是贩卖他们自己妇女的性，在"娱乐场"里面那些"原始的"和"野蛮的"男人的功能提醒人们，相比之下，白种美国男人的男人气质远远高于对方。同时，在享受带有异国风情的年轻女舞者的时候，白种美国男人也体验了自身的原始男性特质。不管怎样，"娱乐场"

内的这种对文明的利用，使得白种男人能够把他们自己的男人身份看得格外地强大。

世博会利用这样的逻辑，构建起与缺乏男人气质的有色野蛮人种相反的、具有男人气质的白人文明。所以白人的世博会组织者根本不可能允许非欧洲血统的男人和妇女作为充分文明开化了的人而存在。因此，当很多美国黑人男人和妇女要求在“白色都市”的组织机构里有他们的代表的时候，白人组织者坚定地拒绝了。[134]比如1890年，全美黑人男性大会以及美国黑人新闻协会的领袖们敦促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在世博会组织委员会里任命至少一名美国黑人。哈里森拒绝了，说那样“会搞出太多的柔懦情调，[并且]让委员中的大多数感觉没有品位”。“多愁善感”当然是“没有男人气质”的同义词。他没有任命任何黑人委员。[135]女士管理者也是如此。尽管她们自己在不断向白人男性委员妥协中备受挫折，她们坚决地而且一次次地阻止黑人妇女(个人还有组织)的要求，即，在这一百一十五人的女士管理者中安排一位美国黑人。[136]最终，女士管理者们答应了在妇女大厦的一个偏僻的小角落里安插一个小的“美国黑人”展；但和男性委员们一样，女士管理者们自己保持绝对的“纯而白”。[137]除了一些搬运工和极少的小文书，几乎没有什么美国黑人和“白色都市”有任何正式的关系。[138]

然而，女士管理者的确在妇女大厦中突出了某些“原始”妇女的工作。与史密森尼博物院合作，她们组织了一个名为“野蛮社会中的妇女劳动”的展览。这个展览收集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篮子、织物以及其他来自非洲的艺术品。她们通过波利尼西亚和美洲土著妇女来表现妇女从人类有史以来就为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展览的“概括介绍”是这样说的：“展览追踪妇女从史前时期一直到今天的足迹，以及她们与推动其种族的发展的努力之间密切的联系”。对女士管理者来说，表现这些“原始”妇女的贡献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看上去只是历史：非洲的篮子，萨摩亚人的结鱼网，以及纳瓦霍土著人的毯子，并不是作为活生生的非白种妇

女的产品出现，而是作为白种妇女自己的女性祖先在进化史的遥远过去所从事的劳动的再现。组织者们企图证明，“妇女在所有的原始人群当中，是大多数的手工业的创造者”，并通过这个来说明，文明开化了的妇女——就是她们自己这样的——是文明继续发展的重要资源。[139]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把非白种妇女建构成遥远过去的代表，就排斥了接受她们为现在的妇女同胞的可能。帕尔默夫人甚至试图禁止展示所有当时美洲土著妇女的工作；她认为，美洲土著妇女真正的艺术“直觉”已经无法挽回地“被与文明的接触破坏了”。[140]唯一能够被接受进展览的原始人是那些能够象征白人妇女的种族历史的——无名，而且最好是已经死了的，这样就可以用来支持妇女为白人种族千禧年未来作出贡献的说法。

尽管白人强硬地坚持认为，文明的基础是白色人种的统治，美国黑人同样坚信文明不一定就是白人的。这个说法在一份广为流传的小册子里出现。这本小册子是伊达·威尔斯(Ida B. Wells)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策划和部分编写的，它的明确目的就是要驳斥世博会霸权的、种族主义的对文明的表现。它的对象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国家，将用英、法、德、西等语言出版，这样全世界就可以读到并了解为什么美国白人社会把美国黑人排除在世博会之外。他们警告说，“有色的公民不能参与，势必会令参会的文明世界的其他国家代表看低美国白人。”他们承诺这本小册子会说明“我们的人民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以及他们与美国文明之间的关系”。[141]

他们的设想实现了。“白色都市”把“黑鬼的原始状态”描绘成具有男人气质的文明的对立面，而这本称为《美国有色人民为何在哥伦布世博会缺席》的小册子，整个颠倒了这一再表现。它指出，男人身份和文明这两者更能体现美国黑人的特点(相对白人)。美国黑人在获得自由后短短的二十五年里取得了惊人进步。与此相比，还有什么能够说明美国文明进步的更好例子呢？但是，在“白色都市”里没有这样的展示。“哥伦布世博会希望整个文明世界和她一起来欢庆发现美洲大陆四百年……但是最能

说明她道德之伟大的，却被忽视了。”几百年来，美国黑人“为美国的繁荣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世博会对此却一点也没有提及。[142]那么，美国有色人民为何在哥伦布世博会缺席呢？

这本小册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美国白人并不像他装出来那样地具有男人气质的文明开化。组织世博会的白人男性把自己表现成进步的文明和优越的男人气质的典范。可是，体现了真正的美国男人身份和文明的，是美国黑人而不是白人的世博会组织者。世博会压抑了这个真正的男人身份，由此显示的不是美国白人的文明，而是其野蛮、欺骗和男人气质的缺乏。道格拉斯感叹道，他们完全是被迫明确地揭露美国黑人所承受的冤枉和愤怒，虽然不幸的是这“与彰显美国共和的自由和文明彻底相悖”。[143]他说，美国白人表达的根本不是最高的文明，他们身上显示的仍然是“野蛮和种族仇恨”。[144]不管怎样，黑人“很有男人气地抵抗”种族压迫，并且“现在通过勤劳、节约和教育，明智地把他自己提升到文明的状态和相对的富足”。[145]道格拉斯最后坚定地捍卫黑人的男人气质：“我们是男人，我们的目标是完善的男人身份，成为男人中的男人。我们的处境要求我们相信自己，相信事实的力量，相信工作，相信有男人气质的品格的影响”。[146]

小册子余下的部分记载了道格拉斯对黑人男人身份的主张。自从奴隶解放以来，美国黑人已经显示了具有男人气质的品格，他们在教育、专门职业、财富积累和文学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美国白人变态地攻击这一年轻的黑人男人气质。他们采取的手段有压迫性的立法，剥夺选举权，租借监狱劳工〔1〕，以及野蛮的私刑法。在结尾处，小册子记录了世博会组织者如何故意地排斥黑人——“好像为了让黑鬼难看，达荷美人

〔1〕“Convict Leasing”是美国南部在奴隶解放之后的一种劳改制度。农场主和业主们需要有劳动力来取代被解放的奴隶，于是在 1868 年 5 月 11 日，佐治亚州临时州长 Thomas Rugor 颁发了一个囚犯租借许可，100 名黑人囚犯被派去修铁路。这个“囚犯租借制度”很快地推行开来。——译注

在那里被展示，也是要把黑人表现成招人讨厌的野蛮人。”[147]简言之，美国有色人民被排斥在哥伦布世博会外，不仅不是光扬美国白人文明，而是显示了美国白人的野蛮；因为其实，文明开化的美国男人身份的真正典范，正是那些被排斥在“白色都市”之外的人，即美国黑人。

道格拉斯和威尔斯篡改了禁止美国黑人参与世博会的关于文明的霸权话语。同时，他们将其为我所用。他们把总部安在“白色都市”中小小的“海地楼”，在世博会闭幕前三个月期间，从那里散发出一万份这本小册子。（由于道格拉斯不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参会，他被任命为海地驻世博会代表。）威尔斯从英格兰、德国、法国、俄罗斯和印度收到了响应。[148]

总而言之，世博会的历史，清楚地反映了美国人利用关于文明的话语来建构社会性别的一些互相矛盾的方式。表面上，世博会用文明来维护白人男性的霸权。“白色都市”对于未来完善的理念以及男人气的商业与科技具有更高的种族权力这样的观念，把文明建构为白人男性权力的理想。“娱乐场”是一个隐含的对比。有色原始人群的男人，用肚皮舞女招揽生意，穿着裙子像女人似的跳舞，他们的男人气质是低等的。它衬托出“白色都市”那种自律的、文明开化的男人气质。但是，“娱乐场”又让美国男人自己尝试着扮演男性的野蛮人，感受半裸的异国舞女提供的视觉快感，同时并且与此矛盾地享受着他们白人的、优越和文明开化的男人气质带来的满足感。文明的各种话语，把这些看上去互相矛盾的东西囊括在世博会整个的体验里，于是就提供了对霸权的白人男性权力有力的、具有说服力的再现和感受。

但是“白色都市”对白人男性优越的强烈表达，并没能成功地消除反霸权的主张。在女士管理者理事会里的精英白人女性，试图通过在白色都市各处展示妇女的工作，来挑战“文明特别属于男人”的观念。尽管她们的努力失败了，她们的妇女大厦还是提醒了世博会参观者，白人妇女在白色都市是有一个位置的。女士管理者所表达的文明观，抵制了男性优越，但是它又具有白色都市的种族主义。像威尔斯和道格拉斯这样的美

国黑人于是发展了另一种文明观，拒绝接受进步与肤色之间隐含的关联，并把非白种人描绘成文明真正的典范。

所有这些文明观，都把千禧年进步的主张联系到种族和社会性别上。所以，他们明显地是同样的话语。但是不同的人群，带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用不同的方式定义和使用“文明”。正是这个概念的不稳定性和灵活性，加上种族和社会性别强有力的关联，使得“文明”在这几十年当中成为这样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在的话语。

结　　论

经过以上对文明的讨论，现在我们可以来最后看看杰克·约翰逊事件。我们关注的是为什么白人记者们期待吉姆·杰福瑞斯——“白色人种的希望”——大获全胜。记者们常常预测杰福瑞斯会打败约翰逊，因为具有男人气质的白人文明早就朝着千禧年完善的方向进化了。《科里尔》杂志(Collier's)断言，白种男人希望吉姆·杰福瑞斯获胜，因为与原始野蛮的黑鬼不同，他是文明开化了的种族的一员：“白种男人身后有三千年的传统支持——所有最高的努力、发明和征服；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个传统包括邦克山，温泉关，哈斯汀，阿金库尔。”[1]149《旧金山分析家》也持此观点，认为“杰福身上有恺撒大帝的精神，应该能够教训那个野蛮人”。150面对约翰逊可能获胜的传闻，《芝加哥每日新闻》叹道：“如果莎士比亚能够知道这事，他会怎么想？……连赫伯特·史宾塞都不会从这样的局面中得到任何欣慰吧？”如果杰福瑞斯被“有天赋但非白种人的约翰逊”击败，盎格鲁-撒克森文明自身也许就会陨落。151在这些报道当中，约

〔1〕 邦克山(Bunker Hill)，即指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第一个重要战役。温泉关(Thermopylae)，即公元前480年著名的温泉关战役。哈斯汀(Hastings)，是英格兰一个小城，与诺曼底征服据说有密切关系。阿金库尔(Agincourt)，即阿金库尔战役，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军以少胜多的一个战役。——译注

翰逊的胜利被描写成针对文明的千禧年进步以及白人男人气质的权力的一种冒犯。

但是另外一些报道把杰福瑞斯看成是暴力和原始男性特质的典型，而不是先进的文明和高尚的男人气质的代表。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翘首以待的杰福瑞斯的胜利就将显示：白人男性在暴力方面的能力与黑人的一样强大——文明并没有削弱白人的原始男性特质。记者们在描述杰福瑞斯有原始特点的身体特征时使用了这样的修辞：他有“体毛浓密的身体，树一般的双腿，长长的向前探的下巴，深陷的阴森森的眼睛，和宽宽的又薄又残忍的嘴”。[152]他们在媒体上刊出他为备战训练时的照片，照片里面的他正在锯一棵大树干——在20世纪美国的都市里，这一动作马上会令人联想到小木屋和未开发的西部。[153]杰克·伦敦在《纽约先驱报》上的文章表示，他自己想要去观战的强烈愿望，就好像其他白人男性这一愿望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盎格鲁-撒克森种族的特征。在他看来，对拳击的热爱，“不容置疑地属于讲英语的种族，并且……是这个种族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它就像我们的意识一样地深植于并且织入了我们生命的纤维。它像我们的语言那样成长。它是我们种族的一个本能的强烈感情”。[154]对这些男人来说，杰福瑞斯如果胜利就会证明，虽然白种男人已经是文明进化的了，他们并没有失去任何曾经使他们在太古就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力量。

由于这两种态度都利用了文明的话语，没人觉得有什么矛盾的。在“文明”的逻辑里，杰福瑞斯可以既是一个有男人气质的、文明开化了的莎士比亚的后代，也可以是一个很男性的、从古代英格兰的森林里崛起的现代野蛮人。最关键一点是，杰福瑞斯的种族遗传使他成为一个优等的男人；他极致的男人身份将证明他的种族的优越性。不管是有男人气质的和文明开化了的(manly and civilized)，还是男性的和野蛮的(masculine and savage)，白人非常自信地认为杰福瑞斯肯定能打败约翰逊。

就这样，当那位黑人冠军把白人对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很多白人

男性惊慌失措。约翰逊这么彻底地消灭了杰福瑞斯，其实就是挑战了霸权性文明话语在种族之上建立强有力的男人身份的那许多方式。他的胜利似乎在说，莎士比亚的后代并非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有男人气质、那么强大；“原始的”黑种男人比“文明的”白人男性更加男性、更加强大。很多白人男性无法忍受这样的对他们男人身份的挑战。[1] 那些在赛后闹事的人，通过立法手段扼杀约翰逊的拳击电影的国会，还有枉法将约翰逊投入监狱的调查局当局——所有这些人都憎恨他的胜利如何地粉碎了“文明”当中关于白人男性权力的各种意识形态。

总之，当19世纪晚期美国人开始重新组织表达社会性别的时候，文明的话语简洁明了地解释了男性身体、男性身份以及男性权威之间密切的关系。白人男性身体，在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来看，已经进化了几个世纪。他们是文明的进步之始作俑者和行为者，是被进化所优选的，是千禧年进步的领导者。还有谁比他们更适合为其他人类——不论是女人还是低等种族的男人——做决定呢？其他所有的文明必须相信，白人男性理所应当取得权力来确保白人文明继续其千禧年进步。

本书以下各章将探讨，美国的男人和妇女为了支持或抵制这种白人男性权力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运用了文明的话语。作者主要考察四位非常不同的历史人物。伊达・威尔斯，是一个记者和反私刑的活动家。她在美国为种族正义而奔走。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是一位学者和大学校长，为发展处于雏形期的心理学科学而奉献了一生。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作为女权主义理论家，无比热情地投身于妇女进步事业。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是共和党政治家和美国总统，投身于进步主义改革和帝国主

[1] 附上原文，以便读者理解作者在使用词汇上的用心："Johnson's victory suggested that the heirs of Shakespear were not the manly, powerful beings they had thought — that "primitive" black men were more masculine and powerful than "civilized" white men. Many white men could not bear this challenge to their manhood."——译注

义政治。

以上这些人物彼此互不相识，他们的工作和关心的问题也完全互不相干。但是他们全都通过修正和改造文明的话语来努力重造有关男人身份的意识形态。我不考虑他们是否成功地转变了美国人的社会性别观念；我关心的是，在他们努力重塑男人身份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策略。这四位人物展示了，对于种族性的男人身份以及文明，人们可以采取哪些不同的话语位置(discursive positions)。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具有什么代表性。由于我的研究方法具体地关注表达的过程，我主要是想选择一组各不相同的人物，而他们每个人都留下足够多的原始材料，能够显示他们对于种族、男人身份和文明都有哪些文化观念。我可以选择的同样可以成为很好研究对象的，还有比如杜波依斯，简・亚当斯(Jane Addams)，或杰克・伦敦。

第二章将深入探讨男人气质和文明的关系。这章主要是研究伊达・威尔斯如何改变了北方白人男性对私刑的看法。她是一个很出色的宣传家。她利用了关于男人气质和文明的话语之间的矛盾和不一致，成功地使它们反过来针对那些容忍私刑法的美国白人。本章也要考察所谓“危险的”黑人男性性存在，在“有男人气质的文明”这一话语背景下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一点我们在杰克・约翰逊的故事当中已经碰到了)。

第三章是关于斯坦利・霍尔。本章不太关注“有男人气质的文明”这个问题，而是着重考察与之相关的所谓原始男性特质这一主题。他绝对相信有男人气质的文明的力量和好处；但是他担心，美国的中产阶级男人已经丧失了维持文明向上进化所必须的坚忍和力量。可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教学法教授，他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使男孩子们对种族衰败有“免疫力”的方式，这样他们就可以成长为雄劲的、强有力的文明开化的男人。对他来说，塑造一个强大的、有男人气质的文明之关键，在于使得所有的男性都能够自由地体验原始的东西。父母和教育者必须鼓励男孩子们重历本种族进化的过程：在孩童期做野蛮人原始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培

养出使他们既雄劲又文明的男人的那种力量。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也是强烈地相信文明的进步，但她的关于妇女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与她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一样。她试图改变把文明和男人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文明的意识形态，使它将文明和妇人身份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她过多地注意种族对文明的重要性，而降低了社会性别的重要性。为此，她设法利用关于“文明的男人身份”这一意识形态自身的矛盾——像威尔斯的做法那样。但吉尔曼写作的时期比威尔斯晚二十年，她不能说服她政治上的反对者相信原始的男性的残暴是非常邪恶的。她的经历——正如威尔斯一样——提醒我们，妇女也活跃在重塑男人身份这一不断进行的历史过程中。

西奥多·罗斯福比他同代的任何男人都更好地向美国公众表达雄劲的男人身份。在第五章中，我提出，他活跃的雄劲的来源之一，是他能够同时体现两种互相矛盾的男人身份模式：文明的男人气质和原始的男性特质。融合了男人气质和男性特质、文明与原始，罗斯福成了美国人民的一个新型男人身份的典范；这个典范深深地扎根于千禧年主义进化观的关于文明的意识形态。通过这种新的男人身份，罗斯福不仅为自己获得了一种个人的权力，而且为美国的白人种族获得了一个集体的帝国主义男人身份。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四个人显示了文明的话语的灵活性以及它对重塑男人身份是多么有用。每一个人物都有各自的政治目的，而且每个人都运用了文明的话语的一个略微不同的版本。乍看上去，也许他们不太适合被当作一个群体来研究。感到迷惑的读者会想，一个反私刑的活动家，一个教学法的教授，一个女权主义理论家，一个美国总统，怎么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彼此的活动？但是当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每个人都采用了关于种族和男人身份的历史关系的一些可识别的、有系统的观念。每个人都接受了这个话语的一些部分，而且每个人都试图改变这个话语的其他部分。每个人使用的策略，在稍稍

变化之后，都出现在其他几个人的文字当中。他们一起向我们展示了19、20世纪之交“文明”这个词语的含义，清楚地显示了在美国史上，种族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以一些复杂的方式彼此建构的。

本文选自：

Gail Bederman, *Manliness &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 - 1917*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Chapter 1.

张　颖译　王　政校

注释：

1 Al-Tony Gilmore, *Bad Nigger! The National Impact of Jack Johnson*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1975), 41; Rndy Roberts, *Papa Jack: Jack Johnson and the Era of White Hop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99. 两部作品都提供了对约翰逊的人生和文化影响的非常精彩的讨论。

2 Roberts, *Papa Jack*, 31.

3 Gilmore, *Bad Nigger!*, 25 - 26; Elliott J. Gorn, *The Manly Art: Bare-Knuckle Prizefighting in Americ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218, 238 - 239.

4 Gilmore, *Bad Nigger!*, 26.

5 Jack London, *Jack London Reports: War Correspondence, Sports Articles, and Miscellaneous Writings*, ed. King Hendricks and Irving Shepard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0), 264.

6 Robers, *Papa Jack*, 85 - 86.

7 "Is Prize-Fighting Knocked Out?" *Literary Digest* 41(16 July 1910): 85.

8 "A Review of the World", *Current Literature* 48 (June 1910): 606.

9 "The Psychology of the Prize Fight", *Current Literature* 49 (July 1910): 57.

10 Roberts, *Papa Jack*, 114.

11 关于骚动，参见 Gilmore, *Bad Nigger!* 59 - 73; "Is Prize-Fighting Knocked Out?" *Literary Digest* 41(16 July 1910): 85; Roberts, *Papa Jack*, 108 - 109。

12 *New York Herald*, 5 July 1910，引文见 Gilmore, *Bad Nigger!* 65 - 66。

13 "Is Prize-Fighting Knocked Out?" 85.

14 Gilmore, *Bad Nigger*! 75 - 93.

15 Gilmore, *Bad Nigger*! 15; Roberts, *Papa Jack*, 74 - 75.

16 参见,例如"Reflections on a Suicide", *New York Times*, 14 Septermber 1912,12。

17 Roberts, *Papa Jack*, 146; "Mob Threatens Johnson," *New York Times*, 20 October 1912,12.

18 Gilmore, *Bad Nigger*! 138 - 154; Gilmore, *Bad Nigger*! 95 - 116.

19 Gilmore, *Bad Nigger*! 158 - 219; Gilmore, *Bad Nigger*! 117 - 133.

20 Gilmore, *Bad Nigger*! 148.

21 Theodore Roosevelt, "The Recent Prizefight", *Outlook* 95(16 July 1910):550 - 551.

22 Gilmore, *Bad Nigger*! 81,108.

23 Haze V. Carby, *Reconstructing Womanhood: The Emergence of the Afro-American Woman Nove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18. 近来有一些重要的理论文章,非常严谨地探讨了种族与社会性别在历史上的关系。这些包括: Evelyn Brooks Higginbotham, "African-American Women's History and the Metalanguage of Race", *Signs* 17 (December 1992): 251 - 274; Iris Berger, Elsa Brakely Brown and Nancy A. Hewitt, "Symposium — Intersections and collision Course: Women, Blacks and Workers Confront Gender, Race, and Class", *Feminist Studies* 18 (Summer 1992): 283 - 326; and Gerda Lemer, "Reconceptualizing Differences Among Women",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 (Winter 1990): 106 - 122。有两篇非常好的文章运用这些方法: Laura F. Edwards, "Sexual Violence, Gender,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xtension of Patriarchy in Granville County, Nor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68 (July 1991):237 - 260; Ruth Feldstein, "I wanted the Whole World To See: Race, Gender and Constructions of Motherhood in the Death of Emmett Till," in *Not June Cleaver: Women and Gender in Postwar America, 1945 - 1960*, ed. Joanne Meyerowitz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 跨文化的人类学讨论,参见 David D. Gilmore, *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 (New Have,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5 还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参见 Mark C. Carnes, *Secret Ritual and Manhood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Jeffrey P. Hantover, "The Boy Scouts and the Validation of Masculinity", in *The American Man*, ed. Elizabeth H. Pleck and Joseph H. Pleck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0),285 - 302。

26 Peter G. Filene, *Him/Her/Self: Sex Roles in Modern America*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70.

27 这个方法很好的两个例子是: Michael C. Adams, *The Great Advanture: Male*

Desire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90); Filene, *Him/Her/Self*; Michael Kimmel,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of masculin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ed. Harry Brod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7), 121 - 154; Margaret Marsh, "Suburban Men and Masculine Domesticity", *American Quarterly* 40 (June 1988): 165 - 186, and Clyde Griffen, "Reconstructing Masculinity from the Evangelical Revival to the Waning of Progressivism: A Speculative Synthesis", in *Meanings for Manhood: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y in Victorian America*, ed. Mark C. Carnes and Clyde Griff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83 - 204。

28 两个很好的例子是: Donna Haraway,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and Mary Poovey, *Uneven Developments: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Gender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29 Teresa de Lauretis, *Technologies of Gender: Essays on Theory, Film and Fiction*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87), 1 - 30;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8); Denise Riley, *Am I That Name? 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 in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88); Joan Wallach Scott, "Experience", in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ed. 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2 - 40.

30 Gilmore, *Bad Nigger!* 14; Roberts, *Papa Jack*, 74.

31 Roberts, *Papa Jack*, 66 - 67, 160 - 161.

32 Roberts, *Papa Jack*, 124 - 126.

33 Jack Johnson, *Jack Johnson is a Dandy: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69), 22; Roberts, *Papa Jack*, 185 - 214.

34 Roberts, *Papa Jack*, 54 - 67; 122.

35 一个对能动性和社会性别很好地处理的例子是 Poovey, *Uneven Developments*。

36 如, Joe. L. Dubbert, "Progressivism and the Masculinity Crisis", in *The American Man*, 302 - 320; Filene, Him/Her/Self, 69 - 93; John Higham, "The Reorient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1890s", in *Writing American History: Essays on Modern Scholarship*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78), 73 - 102; Kimmel,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of Masculinity", 121 - 154; James R. McGovern, "David Graham Philips and the Virility Impulse of the Progressives", *New England Quarterly* 39(1966): 334 - 355。

37 Marsh, "Suburban Men and Masculine Domesticity", 165 - 186; Griffen, "Reconstructing Masculinity", 183 - 204.

38 Mary P. Ryan, *Cradle of the Middle Class: The Family in Oneida County, New York, 1790 - 18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viversity Press, 1981); 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 -18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尽管 Family Fortunes 一书讨论的是英格兰而不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形成,作者的很多意见,特别是关于男人气质在阶级形成中的重要性,对美国也是适用的。

39 Stuart M. Blumin,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Experience in the American City, 1760 - 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138 - 191,298 - 310; Paul E. Johnson, *A Shopkeeper's Millennium: Society and Revivals in Rochester, New York, 1815 - 1837*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8).

40 Mary P. Ryan, *Cradle of the Middle Class*, 83 - 151,116 - 127; Davidoff and Hall, *Family Fortunes*, 71 - 192; Nancy F. Cott, *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an's Sphere" in New England, 1780 - 183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41 有关品格,参见 Warren I. Susman, "Personality and the Making of Twentieth-Century Culture", in Susman, *Culture as History* (New York: Pantheon, 1984),273 - 277; David I. Macleod, *Building Character in the American Boy: The Boy Scouts, YMCA, and TheirForerunners*, 1870 - 192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

42 关于"男人气质"的问题,参见 Davidoff and Hall, *Family Fortunes*, 108 - 113; Feline, *Him/Her/Self*, 70 - 71; Charles Roseberg, "Sexuality, Class and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Quarterly* 35 (May 1973): 131 - 153; *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 -1940*, ed. J. A. Mangan and James Walvi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Norman Vance, *The Sinews of the Spirit: The Ideal of Christian Manliness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有关 1920 年代维多利亚式自律男人气质的意识形态的最后衰退,参见 Christina Simmons, "Modern Sexuality and the Myth of Victorian Repression", in *Passion and Power: Sexuality in History*, ed. Kathy Peiss and Christina Simmo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57 - 177。

43 Davidoff and Hall, *Family Fortunes*, 207 - 208; Ryan, *Cradle of the Middle Class*, 140 - 142.

44 Ryan, *Cradle of the Middle Class*, 165 - 185.

45 Feline, *Him/Her/Self*, 73;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New York: Vintage, 1955),218.

46 Blumin,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290 - 295; Feline, *Him/Her/Self*, 70 - 73.

47 Lewis A. Erenberg, *Steppin' Out: New York Nightlif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890 - 193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33 - 59.

48 Gail Bederman, "The Woman Have Had Charged of the Church Work Long Enough': The Men and Religion Forward Movement of 1911 - 1912 and the Masculinization of Middle-Class Protestanism", *American Quarterly* 41 (September 1989):435 - 440.

49 Paula Baker, "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 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 - 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June 1984):620 - 647, esp. 628 - 630; *The Moral Framework of Public Life: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Rural New York, 1870 - 193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24 - 55.

50 关于移民与地方主义，参见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 -1925* (New York: Atheneum, 1971); Thomas F. Gossett,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 (Dallas: Southern Methodist Unviersity Press, 1963),287 - 309。

51 罢工的数据，见 Alan Trachtenberg, *The Incorport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Gilded Ag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80; 劳动力方面的数据，参见 Mary Beth Norton et al., *A People and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Since* 1865, 2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A - 20。

52 [Gaius Glenn Atkins], "The Right and Wrong of Feminism: A Sermon Preached at the Central Congregational Church, Providence, R. I.", (Province, 1914),15.

53 有关妇女运动，参见 Mari Jo Buhle, *Women and American Socialism, 1870 - 1920* (Urbana: Un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1), 49 - 103; 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Feline, *Him/Her/Self*, 3 - 68。

54 George M. Beard, *American Nervousness: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G. P. Putnams's Sons, 1881); F. G. Gosling, *Before Freud: Neurasthenia and the Aemrican Medical Community, 1870 - 1910* (Urbana: Un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John S. Haller, Jr. and Robin J. Haller, *The Physician and Sexualtiy in Victorian America* (Urbana: Un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4),3 - 43; T. J. Jackson Lears, *No Place of Grace: Anti-Moder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880 - 1920 (New York: pantheon, 1981),49 - 57; E. Anthony Rotundo, *American Manhood: Transformations in Masculinit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Basic, 1993), 185 - 193; Tom Lutz, *American Nervousness, 1903: An Anecdot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55 George Chauncey, Jr., "Christian Brotherhood or Sexual Perversion? Homosexual Ident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Boundaries in the World War I Era", iin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ed. 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and George Chauncey, Jr., (New York: Meridian, 1989), 313 - 315; John D'Emil and Estelle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si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225 - 227.

56 Harvey Green, *Fit for America: Health, Fitness, Sport, and American Socie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Donald J. Mrozek, *Sport and American Mentality, 1880 - 1910*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3).

57 Green, *Fit for America*, 242.

58 Green, *Fit for America*, 213, 242 - 250.

59 Theodore Roosevelt, "Value of an Athletic Training", *Harper's Weekly* 37 (23 December 1893): 1236.

60 Carnes, *Secret Ritual*.

61 Hantover, "The Boy Scouts", 285 - 302; Macleod, *Building Character in the American Boy*.

62 Green, *Fit for America*, 182 - 215.

63 Albert J. Beveridge, *The Young Man and the World* (New York: Appleton, 1905).

64 Michael S. Kimmel, "Men's Response to Feminism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Gender and Society* 1(September 1987): 261 - 283.

65 Victoria Bissell Brown, "The Fear of Feminization: Los Angeles High School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Feminist Studies* 16 (Fall 1990): 493 - 518.

66 Henry James, *The Bostonia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65), 343, quoted in Kimmel, "Contemporary 'Crisis'", 146.

67 Marsh, "Suburban Men", 165 - 186.

68 Bederman, "The Woman Have Had Charged", 432 - 465.

69 Gorn, *Manly Art*, 129 - 145; Roy Rosenzweig,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 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 1870 - 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3), 57 - 64; Christian Stansell, *City of Women: 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 1789 - 1869* (New York: Knopf, 1986), 76 - 100; 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 - 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84), 257 - 264.

70 Erenberg, *Steppin' Out*, 33 - 59.

71 Gorn, *Manly Art*, 194 - 206.
72 Higham, "Reorientation", 78 - 79.
73 Rotundo, *American Manhood*, 251.
74 Marsh, "Suburban Men", 181 n. 4 支持了我的观点。
75 *The Century Dictionary: An Encyclopedic Lexic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Century, 1890), s. vv. "masculine", "manly".
76 Vance, *Sinews of the Spirit*, *8 - 10*; E. Anthony Rotundo, "Learning about Manhood: Gender Ideals and the Middle-Class Famil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n *Manliness and Morality*, 37 - 40,43 - 46.
77 *The Century Dictionary*, s. vv. "masculine".
78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 v. "masculinity". 它引用的来自 1860 年以前的唯一用法是 1748 年的例子,明确地说那是个法语词。我发现了一个早期的名词用法是从一部 1854 年的小说,描述了一个美丽和性感的女人为"对 masculinity 的献礼"。Elizabeth Oakes Smith, *Bertha and Lily: Or the Parsonage of Beech Glen, a Romance* (N. Y.: Derby, 1854),211。感谢 Lyde Sizer 为我提供了这条线索。形容词的 masculine 当然更为古老:它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最早的引用例子是 1374 年乔叟中来的。
79 Chauncey Goodrich and Noah Porter,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Noah Webster, LLD* (Springfield, Mass.: Merriam, 1890), 505. 两部"省略"了 masculinity 的辞典是:James Stormonth,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85);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Noah Webster* (Springfield, Mass.: Merriam, 1847)。
80 Gorn, *Manly Art*, 179 - 204.
81 关于其他可能性的例子,参见:Donna Haraway, "Teddy Bear Patriarchy: Taxidermy in the Garden of Eden, New York City, 1908 - 1936", in *Primate Visions*, 26 - 58; Anson Rabinach, *The Human Motor: Energy, Fatigu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and Mark Seltzer, *Bodies and Machin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82 我需要说明一下我对"种族"(race)这个词的用法。像 gender 一样,race 是一个在语义上连结身体、身份和权力的方式。但是它与身体的关联,可能比身体与性别的联系要薄弱一些。虽然男人和女人的生殖系统其实不像我们的文化描述的那么非常不同,至少生殖器官是存在的。可是"种族"却纯粹是一个文化符号。(参见:*"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ed. Henry Louis Gates, Jr.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6])大多数的人类学家否认我们能够发现任何纯粹的种族差异。所以,种族和社会性别一样,是一个将权力安排进行自然化的方式,以把这些权力安排表现成无法改变的——而实际上它们是社会

地建构的并且历史性地可变的。简言之，本研究的基本认识是，种族在自然中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文化的建构。

83 Rowland berthoff, "Conventional Mentality: Free Blacks, Women, and Bsiness Corporations as Unequal persons, 1820 - 187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December 1989):753 - 784.

84 David R. Roediger, *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erso, 1991).

85 James Oliver Horton, "Freedom's Yoke: Gender Conventions among Antebelleum Free Blacks", *Feminist Studies 12* (Spring 1986):55; James Oliver Horton and Lois E. Horton, "Violence, Protest, and Identity: Black Manhood in Antebellum America", *in Free People of Color: Indisde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ed. James Oliver Horton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3), 80 - 96.

86 Frederick Douglass,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1845;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 82.

87 David Walker, "David Walker's Appeal: 1828" in *Chronicles of Black Protest*, ed. Bradford Chamb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 56;强调为原文。

88 Jim Cullen, "'I's a man Now:' Gender and African-American Men", in *Divided Houses: Gender and the Civil War*, ed. Catherine Clinton and Nina Sil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76 - 91.

89 关于早期的《国家地理杂志》，参见：Philip J. Pauly, "The World and All That Is in It: the Natinal Geographic Society, 1888 - 1918", in *American Quarterly* 31 (Fall 1979):516 - 532, esp. 527 - 528。关于这一时期"原始的"这一概念的深入探讨，参见 Haraway, *Primate visions*, 26 - 58; Marianna Torgovnick, *Gone Primitive: Savage Intellect, Modern Live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90), 26 - 33。

90 Major P. H. G. Powell-Cotton, "A Journey through the Eastern Portion of the Congo Stat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19 (March 1908): 157. 另见 Philips Verner Bradford and Harvey Blume, *Ota: The Pygmy in the Zoo*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91 引文见 Stuart Anderson, *Race and Rapproachement: Anglo-Saxonism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895 - 1904* (Rutherford, NJ: Farleigh Dickinson Univ. Press, 1981), 25。

92 Rotundo, "Learning about Manhood", 40 - 42. 并见 Rotundo, *American Manhood*, 227 - 232.

93 Carnes, *Secret Ritual*.

94 Amy Kaplan, "Romancing the Empire: The Embodiment of American Masculinity in

the Popular Historical Novel of the 1890s",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3 (December 1990):659 - 690.

95 "The Real Domestic Problem", *Atlantic Monthly* 103 (February 1909): 287; 286 - 288.

96 其他关于"文明"的含义的讨论,见 David Axeen, "'Hereos of the Engine Room': American 'Civilization' and the War with Spain", *American Quarterly* 36 (Fall 1984):481 - 502; Nancy F. Cott, "Two Beards: Coauthorship and the Concept of Civilizaiton", *American Quarterly* 42 (june 1990):274 - 300; Frank Ninkovich, "Theodore Roosevelt: Civilization as Ideology", *Diplomatic History* 10 (Summer 1986):233 - 245。E Anthony Rotundo 也讨论了重塑男人身份中"文明"的作用:但他错误地相信文明总是被标记为"女性的"(*American Mahood*, 251 - 255)。

97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1972). 下面是一些用这样的方法论的优秀历史作品:Robert C. Allen, *Horrible Prettiness: Burlesque and American Culture*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Haraway, *Primate Visions*; Thomas La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90); Rabinbach, *The Human Motor*。

98 George W. Stocking Jr.,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112 - 132, esp. 114,121 - 122. 有一部非常精彩而且全面的关于文明话语的历史和发展的研究:George W. Stocking Jr.,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关于在早期美洲的印地安人—欧洲人情境中的"文明"的观念,参见 Roy Harvey Pearce, *Savagism and Civilization: A Study of the Indian and the American Mi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65)。

99 有关这个观念在 18 世纪的出处,参见 Rosemarie Zagarri, "Morals, Manners, and the Republican Mother", *American Quarterly* 44 (June 1992):192 - 211, esp. 203 - 205。

100 Cynthia Eagle Russett, *Sexual Science: The Victorian Construciton of Womanhoo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89), 144.

101 Ernest Lee Tuveson, *Redeemer Nation: The Idea of America's Millennial Rol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8); James H. Moorehead, *American Apocalypse: Northern Protestants and National Issues, 1860 - 1869* (New Have: Yale Univ. Press, 1978).

102 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的接受,在如下的作品中被研究: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Beacon Press, 1955); Robert C. Bannister, *Social Darwinism: Science and Myth in Anglo-American Thought*

(Philalephia: Temple Univ. Press, 1979); Cynthia Eagle Russett, *Darwin in America: The Intellectual Response* (San Francisco: Freeman, 1976)。

103 关于人类历史的目的论的维多利亚视角，下面的著作有非常好的讨论：Christina Crosby, *The Ends of History: Victorians and "The Woman Ques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04 W. E. B. Dubois, "The Conservation of Races", in *Pamphlets and Leaflets by W. E. B. Bubois*, ed. Herbert Aptheker (White Plains, NY: Kraus Thompson, 1986), 2 – 4.

105 *The Century Dictionary*, s. v. "masculine". 对维多利亚意识形态中认为中产阶级男人身份作为要实现的道德理想，参见下面的著作：Charles E. roseber, "Sexuality, Class and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Quarterly* 35 (May 1973): 131 – 153; Rotundo, "Learning about Manhood," 33 – 51。

106 引文见 Russett, *Sexual Science*, 148。另见：Russett, *Sexual Science*, 130 – 155; Mrinalini Sinha, "Gender and Imperialism: Colonial Policy and the Ideology of Moral Imperialism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Bengal", in *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 ed. Michael S. Kimmel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1987), 218 – 219。

107 Russett, *Sexual Science*, 143 – 148。

108 "A Happy Marriage", *Literary Digest* 41(9 July 1910): 78.

109 Stocking, *Victorian Anthropology*, 106.

110 Zagarri, "Morals, Manners, and the Republican Mother", 204.

111 John F. Kasson, *Rudeness and Civility: Mann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Americ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0); Lawrence W. Levine, *Highbrow/Lowbrow: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Hierarchy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88).

112 引文见 Virginia C. Meredith, "Woman's Part at the World's Fair", *Review of Reviews* 7 (May 1893): 417。

113 James Gilbert, *Perfect Cities: Chicago's Utopias of 189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41 – 42.

114 Robert W. Rydell, *All the World's a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 – 1916*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4), 38 – 71. 我的针对博览会的种族问题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受到 Rydell 的精彩分析的启发。关于哥伦布博览会的文化意义，见 Gilbert, *Perfect Citites*, 75 – 130; Kasson, *Amusing the Million*, 17 – 28; Trachtenberg, *The Incorportation of America*, 208 – 234。

115 *The Century Dictionary*, s. v. "manly".

116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 A View from the Ferris Wheel",

Scientific American 69(9 September 1893):169.

117 *Chicago Daily Inter Ocean*, 26 April 1893, 增刊;引用于 Rydell, *All the World's a Fair*, 249, no. 19。

118 Jeanne Madeline Weimann, *The Fair Wome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1981), 31. 一个很好的对女人楼的简单评价见 Anne Firor Scott, *Natural Allies: Women's Associa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91), 128 - 134。

119 Weimann, *Fair Women*, 36.

120 Ibid., 51 - 52.

121 Ibid., 52, 260.

122 Ibid., 232 - 234.

123 Ibid., 233 - 234; 260 - 261.

124 引用 ibid., 259。

125 Weimann, *Fair Women*, 152. 虽然地图显示了一些更小的建筑,那些都是服务性的房屋,不是有展览的大楼。

126 "Exhibits Which Prove That the Sex is Fast Overhauling Man", *New York Times*, 25 June 1893, 引用在 Weimann, *Fair Women*, 427. 另有一个类似的分析,不过带着点幽默地居高临下,参见 M. A. Lane, "The Woman's Building, World's Fair", *Harper's Weekly* 36(9 January 1892):40。

127 Russett, *Sexual Science*, 54 - 77.

128 娱乐场的一系列景点,见地图,"Opening of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Chicago, May 1, 1893," *Scientific American* 68(6 May 1893): 274 - 275; "Notes from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Chicago 1893," *Scientific American* 68(27 May 1893):23。

129 Rydell, *All the World's a Fair*, 61 - 62.

130 同上书引用,65。Gilbert 正确地指出,把非民族性的展览搀杂在异国风情当中,可能防止了一些观众参观娱乐场里的人类种族进化;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同意,组织者的确把娱乐场计划为一个"由进化与文明的各个阶段的运动联系起来的一个关于民族差异的展览"。Gilbert, *Perfect Cities*, 109。正如《芝加哥先驱报》的引文指出的,很多游客的确就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去看娱乐场的。

131 "Sights at the Fair", *Century Magazine* 46(5 September 1893):653.

132 当时对于这个情况的评论,见"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 A View from the Ferris Wheel", 169; Frederick Remington, "A Gallop through the Midway", *Harper's Weekly* 37(7 October 1893):996。

133 "Wonderful Place for Fun", *New York Times*, 19 June 1893, 9. 关于达荷美人是最原始野蛮的声誉,见 Rydell, *All the World's a Fair*, 61。

134 Elliot M. Rudwick and August Meier, "Black Man in the 'White City': negroes and the Columbia Exposition, 1893", *Phylon* 26 (Winter 1965):354 -

355; Ann Massa, "Black Women in the 'White City'",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8 (December 1974): 319 - 337; Weimann, *Fair Women*, 103 - 105, 110 -123; and F. L. Barnett, "The Reason Why", in *The Reason Why the Colored American Is Not in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ed. Ida B. Wells] (Chicago, 1893), 63 - 81.

135 Rudwick and Meier, "Black Man", 354.

136 Massa, "Black Women", 319 - 337.

137 Weimann, *Fair Women*, 269; photo on 122.

138 Rudwick and Meier, "Black Man", 357.

139 引用于 Weimann, *Fair Women*, 393。

140 引用于 Weimann, *Fair Women*, 404。

141 威尔斯和道格拉斯的信在"No 'Nigger Day', No 'Nigger Pamphlet!'"当中重印。Indiana Freeman, 25 March 1893, 4。不幸的是,他们未能募到足够的钱印刷四种语言的翻译。只有前言被翻译成法语和德语。

142 Ida B. Wells, "Preface", in *The Reason Why the Colored American Is Not in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no page number.

143 Frederick Douglass, "Introduction", ibid., 2.

144 同上书,3。

145 同上书,10—11。

146 同上书,12。尽管他们都支持妇女平等,他们接受了"男人气"是"文明的"的同义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认为文明等于男人,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文明的霸权性话语,通过贬低他们的男人身份来将美国黑人边缘化。所以,他们的反种族歧视版的"文明",就策略地动员了"男人气质",以重写文明与种族的关系。

147 Douglass, *The Reason Why*, 9. 这听上去似乎是道格拉斯缺乏对达荷美人的尊重,注意美国的漫画家们开始用画笔来不客气地表现达荷美人的其大无比的嘴唇、男人(像女人一样)只穿着小草裙、项链、手镯、和耳环。见 Rydell, *All the World's a Fair*, 61。

148 *Crusade for Justice: The Autobiography of Ida B. Wells*, ed. Alfreda M. Duster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0), 117.

149 Arthur Ruhl, "The Fight in the Desert", *Collier's* 45(23 July 1910): 13.

150 引用于 Gilmore, *BadNigger!*, 35。

151 引用于 Gilmore, *BadNigger!*, 35。

152 Ruhl, "The Fight in the Desert", 13.

153 Clippings in Scrapbook 50, Alexander Gumby Collection, 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ew York.

154 Jack London, *Jack London Reports*, 277 - 278.

在阿布格莱布塑造男性特质：一个美国军事丑闻的女权主义解读

Wielding Masculinity Inside Abu Ghraib: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an American Military Scandal

辛西亚·恩露(Cynthia Enloe)

2004 年 4 月，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入侵整整一年的时刻，一批美军士兵虐待伊拉克犯人的触目惊心的照片出现在全球的电视新闻报道和报纸头版上。在这些照片中，充当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守卫的美国男女士兵故意羞辱和折磨被监禁和审问的伊拉克男人。照片上的美国士兵大笑着，他们似乎在羞辱伊拉克囚犯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

看过这些虐囚照片的大多数人——不管是在西雅图还是首尔，迈阿密或是马德里，曼谷还是波士顿——至今仍记得这些场景：一个美国男兵手上戴着外科手术用的蓝色橡胶手套、双臂交叉得意洋洋地站着；一个美国女兵对着镜头微笑着，斜倚在由裸体伊拉克男人的扭曲身体堆积的小山上。一个美国女兵，也是微笑着的，用狗链拴着一个伊拉克男囚。一个

美国女兵，手指一个伊拉克裸体男囚的生殖器，显然把它当作玩笑。美国男兵们用咆哮着的警犬威胁伊拉克男囚们。一个伊拉克男囚站在一个箱子上，他的头被东西蒙着，身体的不同部位缠绕着电线。另一个伊拉克男囚被迫穿上女人的内衣。那些没有留下图片但已被证实的事实还包括：伊拉克男囚被迫进行手淫、模仿口交，一个伊拉克女囚还被美国男兵协迫去亲吻他们（Hersh，2004a）。

对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这些虐俘行为的原因和含义，女权主义者会做出怎样的解释？美国政府的官方调查官员和主流的新闻评论员当中，很少有人运用过女权主义理论来解释监狱中发生的一切。其结果，我认为，就是使我们不能透彻地理解这一事件。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工具，我们可以从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开始，即为何一个美国女兵看守——二十一岁的预备役军人林迪·英格兰（Lynndie England）——会特别地吸引众多媒体编辑、普通电视观众和读者的注意。

这些监狱里的秘密照片有不少让数百万电视观众感到震惊的地方。首先，在布什政府的声明和美国军方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方面，布什政府宣称，通过军事入侵并推翻残忍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他们会为伊拉克人民带来使其迈向文明的“自由”；另一方面，美军士兵却肆意野蛮地对待被关押的未经审判的伊拉克人。第二点让人震惊的是，虽然美国政府既签署通过了反对虐待战俘的国际《日内瓦公约》，也签署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并且通过了美国自己的各种反酷刑法，但是竟然在代表着美国政府的美国士兵身上发生了如此明目张胆的虐囚行为。

然而还有第三个造成震惊的地方：就是亲眼目睹女人参与虐囚。这立刻激发了事件发生后最早的一些媒体评论以及普通电视观众当中激烈的讨论。五角大楼最初起诉送交军事法庭的七个美国士兵（都是低衔级的预备役宪兵警卫），其中有三个是女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照片中带蓝色外科手术手套的那个美国男兵（查尔斯·葛兰纳[Charles Graner]），对许多电视观众来说并不特别让人感到震动，因此没有激起多

少隐隐不安或专栏文章的分析。与男人不同，习惯上人们期待战争中的女人形象应该是作为士兵的母亲或者妻子出现，偶尔也会作为军队护士或车辆维修人员；最常见的则是作为战争暴行的受害者。根据习惯的假定，女人不会是暴力的实施者，尤其不应该是虐囚的罪犯。当这些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别性质的假定被完全颠倒的时候，许多人感到了震惊。“这太可怕了；这怎么可能会发生呢？”

被拍到用狗链拴着犯人的一等兵林迪·英格兰是个年轻的女人，她就这样一下子成为强烈的公众好奇心的焦点。两个月后，也就是2004年8月初，在布拉格堡的审判前听证会上，新闻摄影师不禁把镜头又对准了穿着军人迷彩孕妇装的英格兰。由于在阿布格莱布执勤期间和另一个应征入伍的预备役军人发生了性关系，英格兰怀孕了。她的性伙伴就是查尔斯·葛兰纳，但查尔斯·葛兰纳的名字很少被提及；他显然做了男人们意料之中会在战时做的那些事：发生性行为和实施暴力。公众对前者的好奇心和对后者的好奇心的缺乏，与公众感到震惊的情况是一致的。这三者其实都是基于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如果我们运用女权主义的调查视角，就会发现，公众和媒体对查尔斯·葛兰纳的缺乏好奇，其实与他们对林迪·英格兰的强烈兴趣一样，彻底地暴露出一些问题。

2004年春夏之际，一些关于伊拉克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情况泄露出来。作为对此事件的回应，为打消公众的疑虑，总统乔治·布什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声称监狱中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虐待行为并不代表美国，也不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真实反映。他们对此事件的解释是，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的虐囚行为只是一些“流氓”士兵——他们称为几个“坏苹果”——的个人行为。这种“坏苹果”论一般这样解释事情：[1]某一机构本身运行良好，其价值观是合适的，它的内部关系状况能够支持正面的价值观以及尊重他人的有益行为。因此，按照这种“坏苹

[1] “坏苹果”是英语中的比喻，类似中文“害群之马”的意思。这儿的“苹果桶”比喻从“坏苹果”习语衍生，指这些士兵所在的机构/机制。——译注

果"论解释，这个组织机构的运行方式本身并没有什么需要重新评估和改革的；制止这些虐待行为只需要起诉和开除少数不遵守规则的人即可。有时候，这种解释是合适的。但是这次很多人并没有被布什政府"坏苹果"的解释打消疑虑。他们怀疑，阿布格莱布虐俘这样的结果不是一个坚固的、可靠的桶里出现的几个坏苹果造成的，而是因为这个"苹果桶"根本就是"坏"的。他们也怀疑，这个"桶"包括的不仅有阿布格莱布监狱，其实也包括了美国军事部门、情报部门和文职领导部门这些更大的机制(Hersh，2004b；Hersh，2004c；Human Rights Watch，2004)。

为什么"桶"会坏掉？就是说，是什么使得一个组织、一个机构，或者整个体系变得无视，甚至滋养它们内部工作的某些个人的施虐行为？这个问题，对每个工作场所、每个政治制度、每个国际联盟都有意义。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女权主义努力发展出了一种敏感以及一套分析工具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大部分生命都在复杂的组织机构中度过(不管其规模大小)——工作单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卫生保健系统、司法审判系统、国际机构等等。女权主义研究已经揭示：事实上所有的机构都是被社会性别化的。就是说，所有的机构都是被关于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观念和日常实践所塑造的(Bunster - Burotto，1985；Ehrenreich，2004；Enloe，2000；Whitworth，2004)。女权主义研究发现，如果忽视社会性别的运作，我们将无法准确地解释任何一个机构"嘀嗒运转"的动力，从而我们也就永远无法要求某个机构对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但是调查阿布格莱布虐俘丑闻的长达百页的官方报告，大都是由那些无视女权主义批评的人写的。在他们的报告中，似乎在低级看守和高级政策制定者身上，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问题不必探讨。他们这种假设是非常危险的。

一连串的参议院听证会和一系列的国防部调查试图解释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出了什么问题以及问题症结所在。最具权威性的国防部报告是"塔古巴报告"(Taguba Report)、"费/琼斯报告"(Fay/Jones Report)(都

是以主持这些调查的将军们的名字命名的）和“施勒辛格报告”(Schlesinger Report)(由主持这次调查的现无军职的前国防部长命名)(Human Rights Watch, 2004; Jehl, 2004; [Lewis, Neil] and Schmitt, 2004; Schmitt, 2004; Taguba, 2004)。另外，因为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大量参与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俘虏的审问——而且他们也常常藏匿于这些秘密监狱里，中央情报局也进行了它自己的调查。此外，在2004年，几个人权组织和新闻记者出版了他们自己的调查结果。所有这些调查，一起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体制性“大桶”发生了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发现，在国防部、司法部以及白宫工作的律师们，遵照其文职上级官员的指示，在对《日内瓦公约》和美国法律中关于“酷刑”的法律解释上故意缩小了其定义范围，这样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就可以指示并执行对被监禁的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进行不寻常的审问，在这些审问中使用的手段在通常情况会被认为是违反美国和国际法律的。

其次，调查者发现，在2003年9月，拉姆斯菲尔德部长派遣古巴关塔那摩监狱的指挥官、美国将军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去了伊拉克。拉姆斯菲尔德建议，在伊拉克负责军事监狱的美国指挥官要使用更强硬的审问方式，就像他们在关塔那摩基地用于审问阿富汗和阿拉伯男囚那样。令人颇感惊讶的是，虐囚丑闻发生后不久，米勒将军就被五角大楼指定为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领导。第三，调查人员发现，国防部对军事情报人员不断地施压，希望他们搞到有关那些发动武装攻击抵抗美军占领军的人的信息；这种高强度的持久的压力，促使这些军事情报人员对看管犯人的宪兵施加压力，让他们去“软化”监牢里属他们管辖的犯人，这样宪兵队中男兵和女兵们所处的指挥系统就被打乱。(陆军女将军贾尼斯·卡宾斯基(Janice Karpinski)声称她对宪兵的人事权威被那些插手进来的军事情报人员破坏了。这恐怕就是原因。)研究人员总结道，这种新政策，使军事警备和军事审讯之间那条重要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而这是非

常危险的。第四，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中央情报局及五角大楼雇用的外部合同人员等等的非军事人员，都卷入了阿布格莱布的军事审讯；这会造成一种感觉，好像那些对过度运用强制力量的法律限制，可以不被太当一回事：我们正面临威胁，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谁需要在乎《日内瓦公约》或者法律上的细枝末节呢？

不管是作为低衔级的宪兵预备役军人、作为军事情报单位的上尉，还是作为驻伊拉克总指挥官的参谋将军——那几个女人在监狱中以及更大的军事和情报等级中的不同位置的问题重要吗？显然调查人员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宪兵队、军事审问人员、中央情报局人员都驻扎在一起，当中的这些女人处于数量上的少数。查尔斯·葛兰纳和其他男性宪兵队员与他们的女同事之间的日常关系重要吗？官方的调查人员似乎从不认为深究这些问题会产生什么洞见。很多施加在伊拉克犯人的身上的虐待行为都被有意地做得与性行为有关，这一点是不是很重要？给一个男犯人套上一个头罩和强迫他模仿口交（在动机和结果上）是一样的吗？似乎没有人认为这些问题对调查是重要的。查尔斯·葛兰纳在所有被指控的军人当中年纪较大并且显然在低衔级看守中最有影响力，他曾被前妻指控对其进行身体上的威胁，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必要考虑？这类的问题没有被提出，也没有答案。那些国防部、司法部门和白宫的律师们被指示起草指导方针允许美国政府官员践踏《日内瓦公约》禁止酷刑的条文。在他们当中，是否有什么微妙的压力促使他们争取在战时表现得“有男子气”？这个问题同样被调查组抛在了脑后。

70 年代中期以来，女权主义者们已经发展出一些方法来解释一些组织机构为什么以及何时成了性别歧视行为的场所。国际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的诸多重大贡献之一，就是解释了，在完全不同的各种组织机构当中——比如工厂、证券经纪业、立法机构、大学、学生运动、军队等等，到底是什么在滋生着性别歧视和性骚扰（Bowers, 2004; Kwon, 1999; Ogasawara, 1998; Stockford, 2004; Whitworth, 2004）。所有有

关阿布格莱布事件的报告都谈到了这个监狱中建立的一种“风气”、“环境”或者说“文化”，正是它滋养了虐待行为。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状况被描述为一种“权责不清”的“混乱”的环境。正是女权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组织的风气”这样具有革新意义的概念。

当我们试图明白为何在一些组织机构中，女雇员不得不面对有性别歧视色彩的玩笑，以及不受欢迎的亲近，并且还要为拒绝这些玩笑和亲近付出代价的时候，女权主义的律师、活动家和学者们的研究目光超越了正式的政策和明文规定的工作准则。她们开始探究那些更捉摸不定的、但是也同样（或者甚至更）有影响力的东西：决定着工作场所当中男人和男人之间以及男女之间来往的一整套非正式假设。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她们观察组织层级上上下下的人们之间那些偶然的、非正式的来往。谁和谁在工作后喝酒；谁通过办公电子邮件给谁发送性别歧视的笑话；谁把女人的照片钉在私人物品柜里或者咖啡机的旁边，是什么样的照片。她们还观察，掌权者都有哪些“不作为”。结果发现，他们的不作为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不作为”把默许的信号传达给组织机构中的每个人。女权主义者把这些由假设、非正式来往和故意不作为等等交织而成的网称为某一组织的“风气”。女权主义者已经成功地在法庭辩论中论证了，一个证券经纪公司或一所大学在它们的官方手册上可以写入反对性骚扰的条文，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雇主必须采取明确的步骤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场所风气，使女人得到公平的和受尊重的待遇。

到 2004 年为止，很多分析家都接受了女权主义的这一解释性概念——“组织内的风气/氛围”，以至于他们竟忘了他们受益于女权主义。塔古巴、琼斯和费将军，以及前国防部长施勒辛格，或许从未上过妇女学的课程，但是当他们被指定调查阿布格莱布丑闻的时候，他们利用的很多观念和调查法都是女权主义者创造完善的。

然而，比起不承认女权主义给他们的思想和政治上的启发，更让人不

安的是那些新闻记者和政府调查人员忽视了与女权主义提出的"风气/氛围"概念相联系的女权主义认识。第一个认识是,如果要理解任何一个组织,我们必须要深入了解这个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假设。第二个认识是,妇女常常尝试着去适应或者在某些时候抵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假设,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她们这种体验——这并非因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天使,而是因为如果我们对女人的观念和行动给予密切的注意,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掌权的男性的行为动机。

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观念的影响并没有从美国军方的思想中彻底消失。从 1991 年到 2004 年,一连串的军事丑闻迫使那些不愿意处理性别歧视问题的美国高级官员也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第一个案例发生在 1991 年 9 月,一群美国海军航空母舰飞行员聚集在拉斯维加斯的希尔顿饭店。因第一次海湾战争胜利而容光焕发的男性驾驶员(都是官员)在饭店走廊里排成行,对步出电梯的每个女人进行身体上的性骚扰。但是他们"一不小心"骚扰了一个正在为某海军上将做助手的海军直升机女驾驶员。几个月内,国会议员和媒体告诉公众被命名为"航母着舰钩"的这个丑闻[1]——为什么会发生,谁试图掩盖等等问题(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2003)。紧接着这一丑闻的是陆军阿伯丁训练基地的性骚扰丑闻,以及其后被揭发出来的军队攻击同性恋事件、美军男性人员对其女同事的性骚扰和强奸(Enloe, 1993, 2000)。

1995 年 9 月,在日本冲绳的两个美国水兵和一个海员强奸了当地的一个女中学生,这起事件激起了公众的示威、冲绳妇女的组织行动和美国国会的更多调查。在 21 世纪初,美国媒体开始注意到对东欧和菲律宾妇女的国际性贩卖模式——这些交易正是围绕在韩国的美军基地进行。这

[1] "Tailhook"指的是航空母舰舰载飞机下部的一个小钩,使飞机在着舰时得以钩住甲板上的停机缆而迅速停止滑行。美国有一个"航母着舰钩协会"(Tailhook Association),支持海上飞行特别是航空母舰飞行员的活动。这次丑闻就是从他们在 1991 年 9 月这次年会上爆出的。——译注

使华盛顿政府窘相毕露(其实这先前就已发现基地的男性士兵为那里的卖淫业提供资金,而美军基地指挥官对他们采取了典型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理由是它“只”雇佣韩国当地的妇女。当时这件事并没有导致华盛顿的窘迫)。然后,在 2003 年,三个新的美军性别歧视丑闻抓住了华盛顿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从阿富汗战场回来的四个美军士兵在北卡罗莱纳州布拉格堡谋杀了他们各自的女朋友;在美国空军军官学校,男生对女生的性骚扰和强奸行为——以及他们的上级拒绝认真处理这些事件——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模式;还有,至少有六十位从科威特和伊拉克完成任务归来的女兵提供证词,讲述她们在那里如何遭到男同事的性侵犯——同样地,高级官员采取了不作为的态度,建议这些女兵“忘掉”这些事(Jargon, 2003; Lutz and Elliston, 2004; The Miles Foundation, 2004; Moffeit and Herder, 2004)。

因此,对于那些试图搞清楚阿布格莱布的虐待行为的美国军方内外的决策者来说,性别歧视的文化渗入美军的许多部门这个现象应该不是什么新闻。如果他们认真思考过在近十三年以来发生的教训——从航母着舰钩、阿伯丁、布拉格堡、冲绳、韩国到空军军官学校——他们应该把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运作方式放在调查议程的首位,他们也应该将女权主义视角作为主要的调查工具。当他们开始深究阿布格莱布事件的时候,或许特列·法勒(Tillie Fowler)确实建议过她的同事们将这些军事性丑闻联系起来考虑。特列·法勒来自佛罗里达州,是前共和党国会女议员,也是空军军官学校强奸案(包括包庇罪)调查小组的主要调查人。由于她在那次调查中所表现出的领导能力,法勒被指派代理由詹姆士·施勒辛格领头的阿布格莱布调查小组。她提出过空军军官学校和阿布格莱布之间的关系让大家讨论吗?她的男同事严肃地对待了她的建议吗?

最终这些调查人员没有利用女权主义认识和方法,可能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航母着舰钩、空军军官学校、冲绳的教训的意义仅止于:这几起性犯罪事件中的犯罪者都是男人,而受害者都是女人。所以他们可能认

为，女权主义分析工具在理解那些较早的军队性丑闻事件时卓见成效，但是这次因为林迪·英格兰和阿布格莱布宪兵队中其他女性的存在，女权主义理论未必是适用的。但是航母着舰钩、冲绳和最近的军队丑闻给我们的教训，并不是说只有当男人是犯罪者、女人是受害者时，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政治才成为问题。其实，这些军队丑闻更为深刻的教训在于，我们必须不断地问：这个组织机构（或者说组织机构错综复杂的这一制度）是不是因为赋予某些特定形式的男性特质以特权，把它的对手女性化并且贬低大部分形式的女性特质，而变成了男权化的组织？

带着这个核心的社会性别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揭示管辖着阿布格莱布监狱人事的美国军方和文职部门以及阿布格莱布监狱内部的重要运转情况。首先，美国宪兵队以及他们的军事同事和中央情报局的同事迫使伊拉克男人连续几天裸体，穿着女人的内衣，在别的犯人和美国女看守面前进行手淫；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可能是被自身对于被羞辱的男权化恐惧支配了。也就是说，美国警方和情报人员的主要动机，可能并不是他们真的相信所谓“异国的”、脆弱的伊拉克男性特质是充满着对裸体和同性恋的恐惧的。他们在监狱里搞出这些虐俘手段，是出于他们自己美国本土关于男性特质脆弱性的理解，即，男人气质很容易被女性化。在这一扭曲的男权化情境中，作为宪兵队员的女人的在场可能会显得特别有用。为女看守设计女性化的角色，使她们扮演对男囚犯进行嘲笑的女性化观众，可能被认为是能够进一步以男性化的方式摧毁伊拉克战俘的斗志。从历史上看，占统治地位的男人试图利用至少某些女人的行为去破坏竞争对手的男性自尊，这不是什么新事物。

美国女兵们自身状况又是怎样的呢？2004年美国军队中的女性包括15％的现役人员，17％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军人（令人惊讶的是光是在陆军预备役就占到24％）。自从这些特别的年轻女性加入这个监狱的军事看管部门的那一刻，像他们的男同事一样，她们可能也在试图使自己融入这个团体。如果说预备役宪兵部门的文化是崇尚某一形式的男性化

的幽默、种族歧视和逞能——可能上级出于"士气"和"部队凝聚力"的考虑也滋养了这种文化，那么每个预备役女军人都不得不决定应该怎样应对它。至少有一些预备役新女兵会决定参与其中而扮演分派给她们的角色，以得到她们期望的回报——男性的接纳。阿布格莱布监狱在2003年秋季人手非常不足(相对急剧上升的伊拉克监禁人数，看守太少了)，并且和其他军事行动是隔离开来的，同时这些人日日夜夜遭受着迫击炮的攻击——这些只会让每个士兵面临更大压力去努力尝试从那些仿佛代表着占主导地位的男权文化的部队成员那儿得到认同。那么林迪·英格兰和查尔斯·葛兰纳的性关系呢？我们不能把这简单地当成"缺乏纪律"。我们需要追问，他们之间的性行为、虐囚以及摆姿势拍摄虐囚照片之间是怎么样的因果关系状况。女权主义者已经告诉我们，绝对不能认为性关系与组织的、政治的实践之间没有关联并因此把性关系的问题放在一边。

其次，军事审讯人员的组织文化的男权化，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的男权化以及有关"男子气"的观念的运作，它们一起塑造着整个美国政治制度。许多男人和女人——律师、将军、内阁官员、民选政府官员——都清楚地知道强硬的审问手段违反了《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和美国联邦反酷刑法的精神和语言。但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几个月中，这些男人和女人都在保持沉默。女权主义者告诉我们，要质疑沉默。因此我们要问：参加审讯的美国男人当中，是否有的保持沉默是因为害怕被贴上"温柔"、"软弱"的标签而危及他们"男子气"身份。我们也需要探究，那些选择了沉默的女人当中是否有的因为害怕被贴上"女性味"标签而丧失同事的信任甚至被看作是政治上的圈外人。

如果我们不运用女权主义的敏感，如果我们不回头看看从航母着舰钩、布拉格堡、安纳波利斯、冲绳和空军军官学校等事件得到的女权主义认识，那么我们不会弄清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根源。这些分析工具和认识可能会狠狠地揭露整个美国军方的制度文化甚至当代美国政治生活的问题；这种制度文化和政治气候合在一起，不仅仅对美国人产生深刻的

影响;它们也是韩国、日本、菲律宾群岛、阿富汗和伊拉克仿效的模式。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从这些与美国制度文化、政治气候有密切联系的社会而来的女权主义者提出的见解,可能会帮助美国人认清自己。

本文发表于: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Seoul) 2004 Vol. 10(3) (Sept. 30):89

龙 彦译 冯芃芃 张 颖校

参考书目

Bowers, Simon (2004), "Merrill Lynch Accused of 'Institutional Sexism'", *The Guardian*, (London), June 12.

Bunster-Burotto, Ximena (1985), "Surviving beyond Fear: Women and Torture in Latin America", *Women and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eds. June Nash and Helen Safa, South Hadley, MA: Bergin and Garvey Publishers: 297 - 325.

Enloe, Cynthia (1993), *The Morning After: Sexual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________(2000), Maneuver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Militarizing Women's Lives*,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hrenreich, Barbara (2004), "All Together Now," Op. Ed., *New York Times*, July 15.

Hersh, Seymour (2004a), "Annals of National Security: Torture at Abu Ghraib", *The New Yorker*, May 10:42 - 47.

________(2004b), "Annals of National Security: Chain of Command", *The New Yorker*, May 17:38 - 43.

________(2004c), "Annals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Gray Zone", *The New Yorker*, May 24:38 - 44.

Human Rights Watch (2004), *The Road to Abu Ghraib*, New York: Author.

Jargon, Julie (2003), "The War Within", *Westword*, January.

Jehl, Douglas (2004), "Some Abu Ghraib Abuses are Traced to Afghanista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Kwon, Insook (1999), "Militarization in My Heart",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Women's Studies Program, Clark University, Worcester, MA, USA.

Lewis, Neil A. and Eric Schmitt (2004), "Lawyers Decided Bans on Torture Didn't

Bind Bush", *New York Times*, June 8.

Lutz, Catherine and Jori Elliston (2004), "Domestic Terror", *Interventions: Activists and Academics Respond to Violence*, eds. Elizabeth Castelli and Janet Jackson, New York: Palgrave.

The Miles Foundation (2004), "Brownback/Fitz Amendment to S. 2400," email correspondence, June 14, from Milesfdn@aol.com.

Moffeit, Miles and Amy Herder (2004), "Betrayal in the Ranks", *The Denver Post*, May, Available on the Web at: http://www.denverpost.com.proxy.lib.umich.edu

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2003), The Tailhook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Ogasawara, Yuko (1998), *Office Ladies and Salaried Men: Power, Gender and Work in Japanese Companies*,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mitt, Eric (2004), "Abuse Panel Says Rules on Inmates Need Overhaul",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Stockford, Marjorie A. (2004), *The Bellwomen: The Story of the Landmark AT & T Sex Discrimination Cas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Taguba, Antonio (2004), "Investigation of the 800th Military Police Brigade," Washington, D. 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Whitworth, Sandra (2004), *Men, Militarism and UN Peacekeeping: A Gendered Analysi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附　　录

Masculinities[1]

(原文节选:第三章)

R. W. Connell

3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asculinity

Chapter 1 traced the main currents of twentieth-century research and showed that they had failed to produce a coherent science of masculinity. This does not reveal the failure of the scientists so much as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task. 'Masculinity' is not a coherent object about which a generalizing science can be produced. Yet we can have coherent knowledge about the issues raised in these attempts. If we broaden the angle of vision, we can see masculinity, not as an isolated object, but as an aspect of a larger structure.

This demands an account of the larger structure and how

[1] 发表于 Bel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masculinities are located in it. The task of this chapter is to set out a framework based on contemporary analyses of gender relations. This framework will provide a way of distinguishing types of masculinity, and of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change.

First, however, there is some ground to clear. The definition of the basic term in the discussion has never been wonderfully clear.

Defining Masculinity

All societies have cultural accounts of gender, but not all have the concept 'masculinity'. In its modern usage the term assumes that one's behaviour results from the type of person one is. That is to say, an unmasculine person would behave differently: being peaceable rather than violent, conciliatory rather than dominating, hardly able to kick a football, uninterested in sexual conquest, and so forth.

This conception presupposes a belief in individual difference and personal agency. In that sense it is built on the conception of individuality that developed in early-modern Europe with the growth of colonial empires and capitalist economic relations (an issue I will explore further in Chapter 8).

But the concept is also inherently relational. 'Masculinity' does not exist except in contrast with 'femininity'. A culture which does not treat women and men as bearers of polarized character types, at least in principle, does not have a concept of masculinity in the sense of modern European/American culture.[1]

Historical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is was true of European culture itself befor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omen were certainly regarded as

different from men, but different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complete or inferior examples of the same character (for instance, having less of the faculty of reason). Women and men were not seen as bearers of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characters; this conception accompanied the bourgeois ideology of 'separate spher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

In both respects our concept of masculinity seems to be a fairly recent historical product, a few hundred years old at most. In speaking of masculinity at all, then, we are 'doing gender' in a culturally specific way. This should be borne in mind with any claim to have discovered transhistorical truths about manhood and the masculine.

Definitions of masculinity have mostly taken our cultural standpoint for granted, but have followed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characterize the type of person who is masculine. Four main strategies have been followed; they are easily distinguished in terms of their logic, though often combined in practice.

Essentialist definitions usually pick a feature that defines the core of the masculine, and hang an account of men's lives on that. Freud flirted with an essentialist definition when he equated masculinity with activity in contrast to feminine passivity — though he came to see that equation as oversimplified. Later authors' attempts to capture an essence of masculinity have been colourfully varied: risk-taking, responsibility, irresponsibility, aggression, Zeus energy ... Perhaps the finest is the sociobiologist Lionel Tiger's idea that true maleness, underlying male bonding and war, is elicited by 'hard and heavy phenomena'.[2] Many heavymetal rock fans would agree.

The weakness in the essentialist approach is obvious: the choice of the essence is quite arbitrary. Nothing obliges different essentialists to

agree, and in fact they often do not. Claims about a universal basis of masculinity tell us more about the ethos of the claimant than about anything else.

Positivist social science, whose ethos emphasizes finding the facts, yields a simple definition of masculinity: what men actually are. This definition is the logical basis of masculinity/femininity (M/F) scales in psychology, whose items are validated by showing that they discriminate statistically between groups of men and women. It is also the basis of those ethnographic discussions of masculinity which describe the pattern of men's lives in a given culture and, whatever it is, call the pattern masculinity.[3]

There are three difficulties here. First, as modern epistemology recognizes, there is no description without a standpoint. The apparently neutral descriptions on which these definitions rest are themselves underpinned by assumptions about gender. Obviously enough, to start compiling an M/F scale one must have some idea of what to count or list when making up the items.

Second, to list what men and women do requires that people be already sorted into the categories 'men' and 'women'. This, as Suzanne Kessler and Wendy McKenna showed in their classic ethnomethodological study of gender research, is unavoidably a process of social attribution using common-sense typologies of gender. Positivist procedure thus rests on the very typifications that are supposedly under investigation in gender research.

Third, to define masculinity as what-men-empirically-are is to rule out the usage in which we call some women 'masculine' and some men 'feminine', or some actions or attitudes 'masculine' or 'feminine' regardless

of who displays them. This is not a trivial use of the terms. It is crucial, for instance, to psychoanalytic thinking about contradictions within personality.

Indeed, this usage is fundamental to gender analysis. If we spoke only of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s a bloc and women as a bloc, we would not need the terms 'masculine' and 'feminine' at all. We could just speak of 'men's' and 'women's', or 'male' and 'female'. The terms 'masculine' and 'feminine' point beyond categorical sex difference to the ways men differ among themselves, and women differ among themselves, in matters of gender.[4]

Normative definitions recognize these differences and offer a standard: masculinity is what men ought to be. This definition is often found in media studies, in discussions of exemplars such as John Wayne or of genres such as the thriller. Strict sex role theory treats masculinity precisely as a social norm for the behaviour of men. In practice, male sex role texts often blend normative with essentialist definitions, as in Robert Brannon's widely quoted account of 'our culture's blueprint of manhood': No Sissy Stuff, The Big Wheel, The Sturdy Oak and Give 'em Hell[5].

Normative definitions allow that different men approach the standards to different degrees. But this soon produces paradoxes, some of which were recognized in the early Men's Liberation writings. Few men actually match the 'blueprint' or display the toughness and independence acted by Wayne, Bogart or Eastwood. (This point is picked up by film itself, in spoofs such as *Blazing Saddles* and *Play it Again, Sam.*) What is 'normative' about a norm hardly anyone meets? Are we to say the majority of men are unmasculine? How do we assay the toughness needed to resist the norm of toughness, or the heroism

needed to come out as gay?

A more subtle difficulty is that a purely normative definition gives no grip on masculinity at the level of personality. Joseph Pleck correctly identified the unwarranted assumption that role and identity correspond. This assumption is, I think, why sex role theorists often drift towards essentialism.

Semiotic approaches abandon the level of personality and define masculinity through a system of symbolic difference in which masculine and feminine places are contrasted. Masculinity is, in effect, defined as not-femininity.

This follows the formulae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where elements of speech are defined by their differences from each other. The approa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feminist and post-structuralist cultural analyses of gender and in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and studies of symbolism. It yields more than an abstract contrast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of the kind found in M/F scales. In the semiotic opposition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masculinity is the unmarked term, the place of symbolic authority. The phallus is master-signifier, and femininity is symbolically defined by lack.

This definition of masculinity has been very effective in cultural analysis. It escapes the arbitrariness of essentialism and the paradoxes of positivist and normative definitions. It is, however, limited in its scope — unless one assumes, as some postmodern theorists do, that discourse is all we can talk about in social analysis. To grapple with the full range of issues about masculinity we need ways of talking about relationships of other kinds too: about gendered places i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laces in institutions and in natural environments,

places in social and military struggles.[6]

What can be generalized is the principle of connection. The idea that one symbol can only be understood within a connected system of symbols applies equally well in other spheres. No masculinity arises except in a system of gender relations.

Rather than attempting to define masculinity as an object (a natural character type, a behavioural average, a norm),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processes and relationships through which men and women conduct gendered lives. 'Masculinity', to the extent the term can be briefly defined at all is simultaneously a place in gender relations, the practices through which men and women engage that place in gender, and the effects of these practices in bodily experience,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Gender as a Structure of Social Practice

In this section I will set out, as briefly as possible, the analysis of gender that underpins the argument of the book.

Gender is a way in which social practice is ordered. In gender processes, the everyday conduct of life is organized in relation to a reproductive arena, defined by the bodily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of human reproduction. This arena includes sexual arousal and intercourse, childbirth and infant care, bodily sex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I call this a 'reproductive arena' not a 'biological base' to emphasize the point made in Chapter 2,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a historical process involving the body, not a fixed set of biological determinants. Gender is social practice that constantly refers to bodies and what bodies do, it is not social practice reduced to the body. Indeed

reductionism presents the exact reverse of the real situation. Gender exists precisely to the extent that biology does *not* determine the social. It marks one of those points of transition where historical process supersedes biological evolution as the form of change. Gender is a scandal, an outrag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ssentialism. Sociobiologists are constantly trying to abolish it, by proving that human social arrangements are a reflex of evolutionary imperatives.

Social practice is creative and inventive, but not inchoate. It responds to particular situations and is generated within definite structures of social relations. Gender relations, the relations among people and groups organized through the reproductive arena, form one of the major structures of all documented societies.

Practice that relates to this structure, generated as people and groups grapple with their historical situations, does not consist of isolated acts. Actions are configured in larger units, and when we speak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we are naming configurations of gender practice.

'Configuration' is perhaps too static a term.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e *process* of configuring practice. (Jean-Paul Sartre speaks in *Search for a Method*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means in action'.) Taking a dynamic view of the organization of practice, we arrive at an understanding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as *gender projects*. These are processes of configuring practice through time, which transform their starting-points in gender structures. In the case studies in Part II, I will analyse the lives of several groups of men as gender projects in this sense.[7]

We find the gender configuring of practice however we slice the

social world, whatever unit of analysis we choose. The most familiar is the individual life course, the basis of the common-sense notions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The configuration of practice here is what psychologists have traditionally called 'personality' or 'character'. The psychoanalytic arguments discussed in Chapter 1 focus almost exclusively on this site.

Such a focus is liable to exaggerate the coherence of practice that can be achieved at any one site. It is thus not surprising that psychoanalysis, originally stressing contradiction, drifted towards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s of psychology such as Wendy Hollway have emphasized that gender identities are fractured and shifting, because multiple discourses intersect in any individual life.[8] This argument highlights another site, that of discourse, ideology or culture. Here gender is organized in symbolic practices that may continue much longer than the individual life (for inst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heroic masculinities in epics;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dysphorias' or 'perversions' in medical theory).

Chapter 1 noted how social science had come to recognize a third site of gender configuration,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state, the workplace and the school. Many find it difficult to accept that institutions are substantively, not jusl metaphorically, gendered. This is, nevertheless, a key point.

The state, for instance, is a masculine institution. To say this is not to imply that the personalities of top male office-holders somehow seep through and stain the institution. It is to say something much stronger: that state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are structured in relation to the reproductive arena.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op office-holders

are men because there is a gender configuring of recruitment and promotion, a gender configuring of the internal division of labour and systems of control, a gender configuring of policymaking, practical routines, and ways of mobilizing pleasure and consent. [9]

The gender structuring of practice need have nothing biologically to do with reproduction. The link with the reproductive arena is social. This becomes clear when it is challenged. An example is the recent struggle within the state over 'gays in the military' i. e., the rules excluding soldiers and sailors because of the gender of their sexual object-cho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is struggle was most severe, critics made the case for change in terms of civil liberties and military efficiency, arguing in effect that object-choice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capacity to kill. The admirals and generals defended the status quo on a variety of spurious grounds. The unadmitted reason was the cultural importance of a particular definition of masculinity in maintaining the fragile cohesion of modern armed forces.

It has been clear since the work of Juliet Mitchell and Gayle Rubin in the 1970s that gender is an internally complex structure, where a number of different logics are superimposed. This is a fact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analysis of masculinities. Any one masculinity, as a configuration of practice, is simultaneously positioned in a number of structures of relationship, which may be follow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Accordingly masculinity, like femininity, is always liable to internal contradiction and historical disruption.

We need at least a three-fold model of the structure of gender, distinguishing relations of (a) power (b) production and (c) cathexis (emotional attachment). This is a provisional model, but it gives some

purchase on issues about masculinity. [10]

(a) *Power relations* The main axis of power in the contemporary European/American gender order is the overall subordination of women and dominance of men — the structure Women's Liberation named 'patriarchy'. This general structure exists despite many local reversals (e. g., woman-headed households, female teachers with male students). It persists despite resistance of many kinds, now articulated in feminism. These reversals and resistances mean continuing difficulties for patriarchal power. They define a problem of legitimacy which has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b) *Production relations* Gender divisions of labour are familiar in the form of the allocation of tasks, sometimes reaching extraordinarily fine detail. (In the English village studied by the sociologist Pauline Hunt, for instance, it was customary for women to wash the inside of windows, men to wash the outside.) Equ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gender divisions of labour, the dividend accruing to men from unequal shares of the products of social labour. This is most often discussed in terms of unequal wage rates, but the gendered character of capital should also be noted. A capitalist economy working through a gender division of labour is, necessarily, a gendered accumulation process. So it is not a statistical accident, but a part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that men and not women control the major corporations and the great private fortunes. Implausible as it sounds,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has become firmly linked to the reproductive arena, through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gender. [11]

(c) *Cathexis* As I noted in Chapter 2, sexual desire is so often seen as natural that it is commonly excluded from social theory. Yet when we

consider desire in Freudian terms, as emotional energy being attached to an object, its gendered character is clear. This is true both for heterosexual and homosexual desire. (It is striking that in our culture the non-gendered object choice, 'bisexual' desire, is ill-defined and unstable.) The practices that shape and realize desire are thus an aspect of the gender order. Accordingly we can ask political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involved: whether they are consensual or coercive, whether pleasure is equally given and received. In feminist analyses of sexuality these have become sharp questions about the connection of heterosexuality with men's position of social dominance.[12]

Because gender is a way of structuring social practice in general, not a special type of practice, it is unavoidably involved with other social structures. It is now common to say that gender 'intersects' — better, interacts — with race and class. We might add that it constantly interacts with nationality or position in the world order.

This fact also has strong 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masculinity. White men's masculinities, for instance, are constructed not only in relation to white women but also in relation to black men. Paul Hoch in *White Hero, Black Beast* more than a decade ago pointed to the pervasiveness of racial imagery in Western discourses of masculinity. White fears of black men's violence have a long histor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situations. Black fears of white men's terrorism, founded in the history of colonialism, have a continuing basis in white men's control of police, courts and prisons in metropolitan countries. African-American men are massively over-represented in American prisons, as Aboriginal men are in Australian prisons. This situation is strikingly condensed in the American black expression 'The Man', fusing white

masculinity and institutional power. As the black rap singer Ice-T put it,

>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you're in or out. The ghetto, the Pen, it's all institutionalized. It's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Man ... Ever since 1976, they stop trying to rehabilitate Brothers. Now it's strictly punishment. The Man's answer to the problem is not more education — it's more prisons. They're saying let's not educate them, let's lock them the fuck up. So when you come outta there you're all braindead, so yeah it's a cycle. [13]

Similarly, it is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shaping of working-class masculinities without giving full weight to their class as well as their gender politics. This is vividly shown in historical work such as Sonya Rose's *Limited Livelihoods*, on industrial Eng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 ideal of working-class manliness and self-respect was constructed in response to class deprivation and paternalist strategies of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and through the same gestures as it was defined against working-class women. The strategy of the 'family wage', which long depressed women's wages in twentieth-century economies, grew out of this interplay. [14]

To understand gender, then, we must constantly go beyond gender. The same applies in reverse. We cannot understand class, race or global inequality without constantly moving towards gender. Gender relations are a major component of social structure as a whole, and gender politics are among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our collective fate.

Relations among Masculinities: Hegemony, Subordination, Complicity, Marginalization

With growing recognition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gender, race and class it has become common to recognize multiple masculinities: black as well as white, working-class as well as middle-class. This is welcome, but it risks another kind of oversimplification. It is easy in this framework to think that there is *a* black masculinity or *a* working-class masculinity.

To recognize more than one kind of masculinity is only a first step. We hav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urther, we have to unpack the milieux of class and race and scrutinize the gender relations operating within them. There are, after all, gay black men and effeminate factory hands, not to mention middle-class rapists and cross-dressing bourgeois.

A focus on the gender relations among men is necessary to keep the analysis dynamic, to prevent the acknowledgement of multiple masculinities collapsing into a character typology, as happened with Fromm an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research. 'Hegemonic masculinity' is not a fixed character type, always and everywhere the same. It is, rather, the masculinity that occupies the hegemonic position in a given pattern of gender relations, a position always contestable.

A focus on relations also offers a gain in realism. Recognizing multiple masculinities, especially in an individualist culture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risks taking them for alternative lifestyles, a matter of

consumer choice. A relational approach makes it easier to recognize the hard compulsions under which gender configurations are formed, the bitterness as well as the pleasure in gendered experience.

With these guidelines, let us consider the practices and relations that construct the main patterns of masculinity in the current Western gender order.

Hegemony

The concept of 'hegemony', deriving from Antonio Gramsci's analysis of class relations, refers to the cultural dynamic by which a group claims and sustains a leading position in social life. At any given time, one form of masculinity rather than others is culturally exalted. Hegemonic masculinity can be defined as the configuration of gender practice which embodies the currently accepted answer to the problem of the legitimacy of patriarchy, which guarantees (or is taken to guarante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men and the subordination of women.[15]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most visible bearers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are always the most powerful people. They may be exemplars, such as film actors, or even fantasy figures, such as film characters. Individual holders of institutional power or great wealth may be far from the hegemonic pattern in their personal lives. (Thus a male member of a prominent business dynasty was a key figure in the gay/transvestite social scene in Sydney in the 1950s, because of his wealth and the protection this gave in the cold-war climate of political and police harassment.)[16]

Nevertheless, hegemony is likely to be established only if there is som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ultural ideal and institutional power,

collective if not individual. So the top levels of business, the military and government provide a fairly convincing *corporate* display of masculinity, still very little shaken by feminist women or dissenting men. It is the successful claim to authority, more than direct violence, that is the mark of hegemony (though violence often underpins or supports authority).

I stress that hegemonic masculinity embodies a 'currently accepted' strategy. When conditions for the defence of patriarchy change, the bases for the dominance of a particular masculinity are eroded. New groups may challenge old solutions and construct a new hegemony. The dominance of *any* group of men may be challenged by women. Hegemony, then, is a historically mobile relation. Its ebb and flow is a key element of the picture of masculinity proposed in this book. I will examine its long-term history in Chapter 8 and recent contestations in Chapters 9 and 10.

Subordination

Hegemony relates to cultural dominance in the society as a whole. Within that overall framework there are specific gender relations of 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 between groups of men.

The most important case in contemporary European/American society is the dominance of heterosexual men and the subordination of homosexual men. This is much more than a cultural stigmatization of homosexuality or gay identity. Gay men are subordinated to straight men by an array of quite material practices.

These practices were listed in early Gay Liberation texts such as Dennis Altman's *Homosexual: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They have been

documented at length in studies such as the NSW Anti-Discrimination Board's 1982 report *Discrimination and Homosexuality*. They are still a matter of everyday experience for homosexual men. They includ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xclusion, cultural ab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gay men have now become the main symbolic target of the religious right), legal violence (such as imprisonment under sodomy statutes), street violence (ranging from intimidation to murder), economic discrimination and personal boycott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an Australian working-class man, reflecting on his experience of coming out in a homophobic culture, would remark:

> You know, I didn't totally realize what it was to be gay. I mean it's a bastard of a life.[17]

Oppression positions homosexual masculinities at the bottom of a gender hierarchy among men. Gayness, in patriarchal ideology, is the repository of whatever is symbolically expelled from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 items ranging from fastidious taste in home decoration to receptive anal pleasure. Henc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gayness is easily assimilated to femininity. And hence — in the view of some gay theorists — the ferocity of homophobic attacks.

Gay masculinity is the most conspicuous, but it is not the only subordinated masculinity. Some heterosexual men and boys too are expelled from the circle of legitimacy. The process is marked by a rich vocabulary of abuse: wimp, milksop, nerd, turkey, sissy, lily liver, jellyfish, yellowbelly, candy ass, ladyfinger, pushover, cookie pusher, cream puff, motherfucker, pantywaist, mother's boy, four-eyes, ear-

ole, dweeb, geek, Milquetoast, Cedric, and so on. Here too the symbolic blurring with femininity is obvious.

Complicity

Normative definitions of masculinity, as I have noted, face the problem that not many men actually meet the normative standards. This point applies to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 number of men rigorously practising the hegemonic pattern in its entirety may be quite small. Yet the majority of men gain from its hegemony, since they benefit from the patriarchal dividend, the advantage men in general gain from the overall subordination of women.

As Chapter 1 showed, accounts of masculinity have generally concerned themselves with syndromes and types, not with numbers. Yet in thinking about the dynamics of society as a whole, numbers matter. Sexual politics is mass politics, and strategic thinking needs to be concerned with where the masses of people are. If a large number of men have some connection with the hegemonic project but do not embody hegemonic masculinity, we need a way of theorizing their specific situation.

This can be done by recognizing another relationship among groups of men, the relationship of complicity with the hegemonic project. Masculinities constructed in ways that realize the patriarchal dividend, without the tensions or risks of being the frontline troops of patriarchy, are complicit in this sense.

It is tempting to treat them simply as slacker versions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n who cheer football matches on TV and those who run out into the mud and the tackles

themselves. But there is often something more definite and carefully crafted than that. Marriage, fatherhood and community life often involve extensive compromises with women rather than naked domination or an uncontested display of authority.[18] A great many men who draw the patriarchal dividend also respect their wives and mothers, are never violent towards women, do their accustomed share of the housework, bring home the family wage, and can easily convince themselves that feminists must be bra-burning extremists.

Marginalization

Hegemony, subordination and complicity, as just defined, are relations internal to the gender order. The interplay of gender with other structures such as class and race creates furth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sculinities.

In Chapter 2 I noted how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came a vehicle for redefining middle-class masculinities at a time when the meaning of labour for working-class men was in contention. This is not a question of a fixed middle-class masculinity confronting a fixed working-class masculinity. Both are being reshaped, by a social dynamic in which class and gender relations are simultaneously in play.

Race relations may also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ynamic between masculinities. In a white-supremacist context, black masculinities play symbolic roles for white gender construction. For instance, black sporting stars become exemplars of masculine toughness, while the fantasy figure of the black rapis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exual politics among whites, a role much exploited by right-wing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versely, hegemonic

masculinity among whites sustains the institutional oppression and physical terror that have framed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in black communities.

Robert Staples's discussion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in *Black Masculinity* shows the effect of class and race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As he argues, the level of violence among black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only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changing place of the black labour force in American capitalism and the violent means used to control it. Massive unemployment and urban poverty now powerfully interact with institutional racism in the shaping of black masculinity.[19]

Though the term is not ideal, I cannot improve on 'marginalization' to refer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sculinities in dominant and subordinated classes or ethnic groups. Marginalization is always relative to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hegemonic masculinity of the dominant group. Thus,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 black athletes may be exemplars for hegemonic masculinity. But the fame and wealth of individual stars has no trickle-down effect; it does not yield social authority to black men generally.

The relation of marginalization and authorization may also exist between subordinated masculinities. A striking example is the arrest and conviction of Oscar Wilde, one of the first men caught in the net of modern anti-homosexual legislation. Wilde was trapped because of his connections with homosexual working-class youths, a practice unchallenged until his legal battle with a wealthy aristocrat, the Marquess of Queensberry, made him vulnerable.[20]

These two types of relationship — hegemony, domination/subordination and complicity on the one hand, marginalization/

authorization on the other — provide a framework in which we can analyse specific masculinities. (This is a sparse framework, but social theory should be hardworking.) I emphasize that terms such as 'hegemonic masculinity' and 'marginalized masculinities' name not fixed character types but configurations of practice generated in particular situations in a changing structure of relationships. Any theory of masculinity worth having must give an account of this process of change.

Historical Dynamics, Violence and Crisis Tendencies

To recognize gender as a social pattern requires us to see it as a product of history, and also as a *producer* of history. In Chapter 2 I defined gender practice as onto-formative, as constituting reality, and it is a crucial part of this idea that social reality is dynamic in time. We habitually think of the social as less real than the biological, what changes as less real than what stays the same. But there is a colossal reality to history. It is the modality of human life, precisely what defines us as human. No other species produces and lives in history, replacing organic evolution with radically new determinants of change.

To recognize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as historical, then, is not to suggest they are flimsy or trivial. It is to locate them firmly in the world of social agency. And it raises a string of questions about their historicity.

The structures of gender relations are formed and transformed over time. It has been common in historical writing to see this change as

coming from outside gender — from technology or class dynamics, most often. But change is also generated from within gender relations. The dynamic is as old as gender relations. It has, however, become more clearly defined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public politic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With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and the early homophile movement,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embedded in gender relations became visible. Interests are formed in any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which necessarily defines groups that will gain and lose differently by sustaining or by changing the structure. A gender order where men dominate women cannot avoid constituting men as an interest group concerned with defence, and women as an interest group concerned with change. This is a structural fact, independent of whether men as individuals love or hate women, or believe in equality or abjection, and independent of whether women are currently pursuing change.

To speak of a patriarchal dividend is to raise exactly this question of interest. Men gain a dividend from patriarchy in terms of honour, prestige and the right to command. They also gain a material dividend. In the rich capitalist countries, men's average incomes are approximately *double* women's average incomes. (The more familiar comparisons, of wage rates for full-time employment, greatly understate gender differences in actual incomes.) Men are vastly more likely to control a major block of capital as chief executive of a major corporation, or as direct owner. For instance, of 55 US fortunes above $1 billion in 1992, only five were mainly in the hands of women — and all but one of those as a result of inheritance from men.

Men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hold state power: for instance, men

are ten times more likely than women to hold office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an average across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Perhaps men do most of the work? No: in the rich countries, time-budget studies show women and men work on average about the same number of hours in the year. (The major difference is in how much of this work gets paid.)[21]

Given these facts, the 'battle of the sexes' is no joke. Social struggle must result from inequalities on such a scale. It follows that the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cannot concern only questions of personal life and identity. It must also concern questions of social justice.

A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on this scale, involving a massive dispossession of social resources, is hard to imagine without violence. It is, overwhelmingly, the dominant gender who hold and use the means of violence. Men are armed far more often than women. Indeed under many gender regimes women have been forbidden to bear or use arms (a rule applied, astonishingly, even within armies). Patriarchal definitions of femininity (dependence, fearfulness) amount to a cultural disarmament that may be quite as effective as the physical kind.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often find abused women, physically able to look after themselves, who have accepted the abusers' definitions of themselves as incompetent and helpless.[22]

Two patterns of violence follow from this situation. First, many members of the privileged group use violence to sustain their dominance. Intimidation of women ranges across the spectrum from wolf-whistling in the street, to office harassment, to rape and domestic assault, to murder by a woman's patriarchal 'owner', such as a separated husband. Physical attacks are commonly accompanied by

verbal abuse of women (whores and bitches, in recent popular music that recommends beating women). Most men do not attack or harass women; but those who do are unlikely to think themselves deviant. On the contrary they usually feel they are entirely justified, that they are exercising a right. They are authorized by an ideology of supremacy.

Second, violence becomes important in gender politics among men. Most episodes of major violence (counting military combat, homicide and armed assault) are transactions among men. Terror is used as a means of draw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exclusions, for example, in heterosexual violence against gay men. Violence can become a way of claiming or asserting masculinity in group struggles. This is an explosive process when an oppressed group gains the means of violence — as witness the levels of violence among black men in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youth gang violence of inner-city streets is a striking example of the assertion of marginalized masculinities against other men, continuous with the assertion of masculinity in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23]

Violence can be used to enforce a reactionary gender politics, as in the recent firebombings and murders of abortion service provi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must also be said that collective violence among men can open possibilities for progress in gender relations. The two global wars this century produced important transitions in women's employment, shook up gender ideology, and accelerated the making of homosexual communities.

Violence is part of a system of domination, but is at the same time a measure of its imperfection. A thoroughly legitimate hierarchy would have less need to intimidate. The scale of contemporary violence points

to crisis tendencies (to borrow a term from Jürgen Habermas) in the modern gender order.

The concept of crisis tendencies needs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colloquial sense in which people speak of a 'crisis of masculinity'. As a theoretical term 'crisis' presupposes a coherent system of some kind, which is destroyed or restored by the outcome of the crisis. Masculinity, as the argument so far has shown, is not a system in that sense. It is, rather, a configuration of practice *within* a system of gender relations. We cannot logically speak of the crisis of a configuration; rather we might speak of its disruption or its transformation. We can, however, logically speak of the crisis of a gender order as a whole, and of its tendencies towards crisis.[24]

Such crisis tendencies will always implicate masculinities, though not necessarily by disrupting them. Crisis tendencies may, for instance, provoke attempts to restore a dominant masculinity. Michael Kimmel has pointed to this dynamic in turn-of-the-century United States society, where fear of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played into the cult of the outdoorsman. Klaus Theweleit in *Male Fantasies* traced the more savage process that produced the sexual politics of fascis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uffrage movement and German defeat in the Great War. More recently, Women's Liberation and defeat in Vietnam have stirred new cults of true masculi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violent 'adventure' movies such as the *Rambo* series,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gun cult and what William Gibson in a frightening recent study has called 'paramilitary culture'.[25]

To understand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masculinities, then, we need to map the crisis tendencies of the gender order. This is no light

task! But it is possible to make a start, using as a framework the three structures of gender relations defined earlier in this chapter.

Power relations show the most visible evidence of crisis tendencies: a historic collapse of the legitimacy of patriarchal power, and a global movement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This is fuelled by an underly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equality of women and men,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universalizing logics of modern state structures and market relations, on the other.

The incapacity of the institutions of civil society, notably the family, to resolve this tension provokes broad but incoherent state action (from family law to population policy) which itself becomes the focus of political turbulence. Masculinities are reconfigured around this crisis tendency both through conflict over strategies of legitimation, and through men's divergent responses to feminism (see Chapter 5). While the tension leads some men to the cults of masculinity just mentioned, it leads others to support feminist reforms.[26]

Production relations have also been the site of massive institutional changes. Most notable are the vast postwar growth in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in rich countries, and the even vaster incorporation of women's labour into the money economy in poor countries.

There is a basic contradiction between men's and women's equal contribution to production, and the gendered appropriation of the products of social labour. Patriarchal control of wealth is sustained by inheritance mechanisms, which, however, insert some women into the property system as owners. The turbulence of the gendered accumulation process creates a series of tensions and inequalities in men's chances of benefiting from it. Some men, for instance, are excluded from its benefits by unemployment (see

Chapter 4); others are advantaged by their connection with new physical or social technologies (see Chapter 7).

Relations of cathexis have visibly changed with the stabilization of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y as a public alternative within the heterosexual order (see Chapter 6). This change was supported by the broad claim by women for sexual pleasure and control of their own bodies, which has affected heterosexual practice as well as homosexual.

The patriarchal order prohibits forms of emotion, attachment and pleasure that patriarchal society itself produces. Tensions develop around sexual inequality and men's rights in marriage, around the prohibition on homosexual affection (given tbat patriarchy constantly produces homo-social institutions) and around the threat to social order symbolized by sexual freedoms.

This sketch of crisis tendencies is a very brief account of a vast subject, but it is perhaps enough to show changes in masculinities in something like their true perspective. The canvas is much broader than images of a modern male sex role, or renewal of the deep masculine, imply. Economy, state and global relationships are involved as well as households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vast changes in gender relations around the globe produce ferociously complex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e with which men as well as women have to grapple. No one is an innocent bystander in this arena of change. We are all engaged in constructing a world of gender relations. How it is made, what strategies different groups pursue, and with what effects, are political questions. Men no more than women are chained to the gender patterns they have inherited. Men too can make political choices for a new world of gender relations. Yet

those choices are always made in concrete social circumstances, which limit what can be attempted; and the outcomes are not easily controlled.

To understand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is depth and complexity is not a task for *a priori* theorizing. It requires concrete study; more exactly, a range of studies that can illuminate the larger dynamic. That is the project attempted in Part Ⅱ.

汉译英文关键词简表

CMS (Critical Men's Studies)	男性批判研究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强制性异性恋
counter-hegemonic	反霸权的
contingency	时空具体性
doer	实行者
fatherhood	父职
female masculinity	女性男性特质
femalenesss	女性特征/女一性
feminine	女性的/女性化的
femininity	女性特质
gender	社会性别
gendered	社会性别化的
gendering	赋予社会性别意义

hegemonic	霸权性的
hegemonic masculinity	霸权男性特质
hegemony	霸权
heteronormativity	异性恋规范
homophobia	同性恋恐惧
homosocial continuum	同性社交连续体
homosocial desire	同性社交欲望
hypermasculinity	极度男性特质
intersexuality	雌雄间性
maleness	男性特征/男一性
manliness	男人气质
manly	有男人气(质)的
manhood	男人身份
masculine	男性的/男性化的
masculinity	男性特质
masculinist	男权主义的
patriarchal dividend	男权制红利
performativity	操演性
phallus	菲勒斯/阳具
queer studies	酷儿研究
separate spheres	(男女)分离的领域
sex	性别,性
sexed	性化的

sexes	两性，男女
sexuality	性/性存在/性行为
transgender	跨社会性别
whiteness	白人身份，白人特质
womanhood	女人身份，妇人身份，妇道
womanly	有女人气(质)的，妇道的

主要英文作者译名一览

A

萨莉・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
朱迪丝・艾伦(Judith Allen)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B

宝莱・贝克尔(Paula Baker)
米歇尔・巴莱特(Michele Barett)
凯瑟琳・白利(Kathleen Barry)
盖儿・比德曼(Gail Bederman)
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凯瑟琳・布朗(Kathleen Brown)
安托瓦妮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卡罗琳・拜纳姆(Caroline Bynum)

C

赫泽尔・卡尔比(Hazel Carby)
马克・卡内斯(Mark Carnes)
乌玛・查克拉瓦提(Uma Chakravarti)
班金・昌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
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
南茜・乔多萝(Nancy Chodorow)
英地拉・乔杜里(Indira Chowdhury)
爱德・科恩(Ed Cohen)
路易斯・克罗普顿(Louis Crompton)

D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
纳塔利・戴维斯(Natalie Davis)
特蕾莎・德・劳蒂斯(Teresa de Lauretis)
托比・第兹(Toby Ditz)
戴安娜・德高(Dianne Dugaw)
安德里娅・多尔金(Andrea Dworkin)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E

辛西娅・恩露(Cynthia Enloe)

F

安妮・弗斯特-斯特林(Ann Fausto-Sterling)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
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Foster)

G

简·盖洛普(Jane Gallop)
卡罗·吉里根(Carol Gilligan)
格兰达·吉尔莫(Glenda Gilmore)
理查德·歌德比尔(Richard Godbeer)
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
苏珊·格拉芬(Susan Graffin)

H

大卫·霍尔朴林(David Halperin)
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
亨觉克·哈尔特格(Hendrik Hartog)
杰夫·荷恩(Jeff Hearn)
贝儿·胡克斯(bell hooks)

I

露西·伊利格瑞(Lucy Irigaray)

K

简·卡门斯基(Jane Kamensky)
马克·坎恩(Mark Kann)
卡萝·卡尔森(Carol Karlsen)
琼·凯利(Joan Kelly)
迈克尔·基莫尔(Michael Kimmel)
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

L

简·林德曼(Jane Lindman)
肯尼斯·洛克里治(Kenneth Lockridge)

M

卡特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
詹姆士·梅瑟施密特(James W. Messerschmidt)
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
詹妮弗·摩根(Jennifer Morgan)
依坂真纪(Maki Morinaga/Isaka)

N

阿细丝·南蒂(Ashis Nandy)
达那·耐尔森(Dana Nelson)
玛丽·柏丝·诺尔顿(Mary Beth Norton)

O

玛丽·奥布赖恩(Mary O'Brien)
罗撒林德·欧汉隆(Rosalind O'Hanlon)

P

吉内伽·旁帝(Gyanendra Pandey)
卡萝·培特曼(Carole Pateman)

R

马尔克斯·列迪克尔(Marcus Rediker)
艾德里安娜·利奇(Adrienne Rich)
丹尼斯·赖利(Denise Riley)
詹妮弗·罗伯斯顿(Jennifer Roberston)
米歇尔·罗塞尔多(Michelle Rosaldo)
盖儿·卢宾(Gayle Rubin)
罗伯特·瑞戴尔(Robert Rydell)

S

苏米特·撒卡(Sumit Sarkar)
塔尼·撒(Tanika Sarkar)
克罗地奥·桑特(Claudio Saunt)
琼·斯科特(Joan Scott)
依芙·萨芝维克(Eve Kosofsky Sedgewick)
马里娜力尼·辛哈(Mrinali Sinha)
卡萝·沙玛斯(Carole Shammas)
卡萝尔·斯密司-罗森博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
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
安·斯托勒(Ann Stoler)
撒拉·苏乐里(Sara Suleri)

T

布鲁斯·特雷斯特(Bruce Traister)

W

伊达·威尔斯(Ida B. Wells)